

《现代汉语词典》 编纂学术论文集

韩敬体 编



商務印書館

《现代汉语词典》 编纂学术论文集

韩敬体 编

商务印书馆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学术论文集/韩敬体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ISBN 7-100-04121-X

I. 现... II. 韩... III. 现代汉语词典—文集
IV. H1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678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XIÀNDÀI HÀNYŪ CÍDIǎN》
BIĀNZUǎN XUÉSHÙ LÙNWÉNjí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学术论文集
韩敬体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121-X/H·1018

2004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¼ 插页 2
印数 4 000 册

定价:33.00 元



▲ 1958年春语言研究所领导与本所下放干部合影。前排从右至左：丁声树、吕叔湘、石明远、罗常培、郑奠、陆志韦、周浩然，其中丁、吕、石、陆、周和最后排右一周定一、右二李荣均为《现汉》试印本审订委员。

▼ 1960年欢送周浩然、王德林等下放，语言研究所领导与词典编辑室全体人员合影。前排从右至左：孙德宣、萧家霖、石明远、王德林、周浩然、吕叔湘、赵宗儒。





▲ 1989年词典编辑室部分人员合影。前排从右至左：韩敬体、吴昌恒、单耀海、李国炎、莫衡，后排从右至左：陆尊梧、曹兰萍、吕天琛、冯君、李志江、晁继周、安明玉、董琨、刘向军。

▼ 1993年4月在浙江宁波召开《现代汉语词典》研讨会，语言研究所领导与出席会议的词典编辑室同志合影。前排从右至左：郑宣沐、刘庆隆、孙德宣、刘坚、李荣、石明远、李伯纯、单耀海、吴崇康，后排从右至左：吕天琛、王伟、郭小妹、宋惠德、舒宝璋、李国炎、晁继周、韩敬体、董琨、李志江、黄飞、曹兰萍。



《现代汉语词典》的 的历史地位*（代序）

曹先擢 晁继周

现代汉语词典就是普通话词典。普通话是咱们民族的语言，是一种规范的语言。规范是合乎标准的意思。普通话在语音上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在词汇上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在语法上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

编纂普通话词典，其本身就包含了规范的要求和内容。要实现这个要求，在学术上，在词典编纂的方法上，都有极大的难度。

影响比较大的现代汉语词典有两部：一部是1937年开始出版、延续多年陆续出齐的《国语词典》；一部是1978年正式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国语词典》在注音上体现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原则，字、词注音按照北京话语音系统，而不是像“老国音”那样有人声、分尖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进步。在收词上收现代的，但也有大量近代的和少量古汉语词，比较杂，规范程度不够。注释采用半文言，

* 这篇文章是作者提交给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辞书理论与辞书史专业委员会2002年9月联合在江西南昌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曾在研讨会上进行宣读、讨论，并发表于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辑的《中国辞书论集·2002》。

在词典用语上未完成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过渡。这自然有客观的原因,我们不能苛求先辈。从总体上讲,《国语词典》筚路蓝缕,厥功至伟。

《现代汉语词典》则后出转精,解决了上面讲到的问题。它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收词对象,与文言词典划清了界线。就拿虚词来说,文言虚词和现代汉语虚词既有联系更有不同,“之、乎、也、者、亦、焉、哉”与“的、了、吗、呢”完全不同。《现代汉语词典》的虚词注释是一个亮点,是词汇问题更是语法问题,最能体现现代汉语的性质。此外,对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等也都是根据普通话的应用需要来安排取舍,只有学贯古今、兼通中西者方可为也。至于语音,《国语词典》只解决了北京语音为标准的问题,而普通话内部的问题,口语及大量书面语中字词的异读分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均第一次比较好地作了解决。当然,这也是贯彻国家政府部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结果。

《现代汉语词典》是第一部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词典。在它之前还没有这样的词典;它以后的同类性质的词典则是沿着它开辟的道路在某一些方面加以改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汉语词典》是汉语辞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一

现代汉语词典在收词上要全面反映现代汉语的词汇面貌。一方面,它要把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收进词典,不要有太多的遗漏;另一方面,要分清现代汉语词与古代汉语词的界线,普通话词与方言词的界线,不要使文言词(及早期白话词)、方言词与现代汉语普

通话词混杂相列。在收词上,《现代汉语词典》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而《国语辞典》则有很大的距离。我们以“好”字下面所收的条目为例,把两部词典作个对比。

《国语辞典》收而《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的有下面一些词条:

好鸟 美丽之鸟,如“好鸟鸣高枝”,见曹植诗。

好官 犹美缺,如“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见宋书。

好合 谓和好,如“妻子好合”,见诗经。

好逑 谓佳偶,本于诗经“君子好逑”语。

好不当儿的 犹好不应儿的。

好不应儿的 犹云没来由、无缘无故等,如言“好不应儿的生甚么气!”

好劲 惊奇之词,如“这天气,好劲,快把耳朵冻掉了。”

这7个词条中,前4条是文言词,从所引书证可以看出;后3条是北京方言词(属土语),从所举例句可以看出。这些词由于不是普通话词语,又不是常见的文言词语和方言词语,《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录。

《现代汉语词典》收而《国语辞典》没有收的词语有22条:“好多、好感、好话、好家伙、好景、好看、好脸、好评、好气儿、好人、好日子、好声好气、好说歹说、好说话儿、好似、好听、好玩儿、好笑、好性儿、好样儿的、好意思、好自为之”。这22个词语都是普通话常用词语,现代汉语词典是应当收的。这些词语在《国语辞典》时代已经存在,这么大数量地漏收,说明《国语辞典》在收词上是不符合现代汉语词典的要求的。

《现代汉语词典》对普通话词语根据常用的原则做了比较全面的收录。为查考需要,除普通话词语外,还收录少量常见的文言词

语、早期白话词语和方言词语。在收词比例上,普通话词语占绝对优势。收入词典的文言词语、早期白话词语和方言词语都加上标志或文字说明,使读者很容易把它们同普通话词语区别开。

《国语辞典》的局限是历史造成的。《国语辞典》编写所依据的语料,主要是文言和早期白话,而缺少现代白话文学作品资料。《现代汉语词典》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国语辞典》完全不同。全国解放后,白话文在文学创作和应用文写作上都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现代汉语词典》所依据的语料绝大部分是现代白话语料,主要来自现代文学作品和报刊。至开始编写时,已经搜集语料卡片 100 余万张。这就使得《现代汉语词典》所记录的语汇与《国语辞典》有很大不同。《现代汉语词典》比较好地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的面貌,而《国语辞典》却是现代词语与古旧词语的杂糅。

二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用语应该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20 世纪前半叶的汉语词典,释义用语大多是文言或半文言。《国语辞典》就是用半文言作注的,释文中“谓、貌、犹、之、者”等带有文言色彩的词随处可见。用文言或半文言解释现代词语,不但犯了以难释易的忌,而且很难做到准确,也很难避免互训和递训。比如“很”,《国语辞典》释为“甚”,“甚”释为“极”,“极”释为“最甚”,这样绕来绕去,读者还是弄不明白“很”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弄不清楚它的用法。《国语辞典》释义用语采用半文言也是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所致。《国语辞典》编写的时候,白话文在文学创作中已经占据统治地位;而在应用文领域,如新闻、书信等,浅近文言还占有一定优势。词典释义基本

上属于应用文范畴,使用半文言就是很自然的了。

《现代汉语词典》是第一部成功地用白话解释词语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用准确、精练的普通话书面语解释词语,而且尽量多地采用定义说明式的释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同义词互训、递训的毛病。如“大”,《国语辞典》注为“小之反”,“小”又注为“大之反”,这样作注,除了表明“大”、“小”互为反义词外,对它们的意义没有作任何解释。再看《现代汉语词典》,“大”、“小”的释义:

大 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比较的对象(跟‘小’相对)。

小 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不及一般或不及比较的对象(跟‘大’相对)。

这样解释,既清楚说明了“大”、“小”两个词的意义,也指明了它们之间的反义关系。

同以前的词典相比,《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更加准确,在解释词的词汇意义的同时,注意反映词汇的语法和语用特征,并注意用例句显示词的意义和用法。特别是虚词,例句对于说明其意义、用法是必不可少的。还以“很”为例。《国语辞典》只用一个“甚”字作注,没有例句。《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

很 副词,表示程度相当高:~快|~不坏|~喜欢|~能办事|好得~|大家的意见~接近|我~知道他的脾气。

《现代汉语词典》用精心选择的7个例句说明“很”的主要用法:修饰形容词,修饰形容词的否定式,修饰动词,修饰动宾短语,做补语等。此7例添一个嫌多,减一个嫌少,而且排列次序也是有讲究的。

从总体上说,《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水平在现有的语文词典

中是最高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它开创的释义体例也多为以后的词典所借鉴。

三

20 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推广国语做得最多也最有成效的方面是统一读音。汉语方言的分歧,最突出的是在语音方面,因而规定国语的标准,首先关注的自然是语音。1919 年在《国音字典》上公布了第一个国音标准。这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在这套“标准音”中,北京语音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又保留入声,并且分尖团。赵元任先生在讲解这个读音标准时,举“荤油炒菜吃,偷尝两块肉”分别代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 5 个声调。这套“标准音”后来被称为“老国音”。赵元任先生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十三年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说。”由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可以自然地说出标准的“国音”,无论在官话区还是在其他方言区,推行中都遇到困难和阻力。1932 年,《国音字典》修订成《国音常用字汇》,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个标准后来被称为“新国音”。

确立以北京话语音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是汉语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我国辽、金、元、明、清各朝相继建都北京,大约有一千年的时间,北京长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有历史依据和群众基础的。从“老国音”到“新国音”也说明一个语言学原理,那就是确定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要依托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地点方言,即某种自然语言;而不能采取杂糅的方法,从不同方言的语音中吸收成分,形成“人造语言”。

在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国音方面,《国语辞典》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语辞典》之前,《国音常用字汇》也是推广北京语音为标准的国音的,但由于只收单字,作用受到很大局限。《国语辞典》着眼于词,除为单字注音外,凡立为条目的词或短语都标注读音,轻声、儿化都按北京话的实际读音注出,这在以前的词典中是没有过的。

但是,在推广标准音方面,《国语辞典》同样也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许多语音问题解决得不完善,如异读词问题、轻声和儿化问题、古今音演变问题等等。全面解决现代汉语语音问题的是《现代汉语词典》。以北京语音为标准是就北京音系而言,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还要经过深入的学术研究和对实际读音情况的调查。差不多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的同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异读词读音进行审订。审订读音的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字的读音在北京话里非常通行而不合北京语音的一般发展规律的,这个音还是可以采用,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个音在北方方言里应用得是否广泛。例如在北京话里,“危”念 wēi,“期”念 qī,“帆”念 fān,这些音不合一般发展规律,但是采用了,因为在北京话里非常通行,北方方言也大致通行。而在《国语辞典》里,这几个音还是读作 wéi、qí、fán 的。如果一个字的读音只在北京话里通行(甚至只在北京的部分地区或部分人群中使用),既不合语音的一般发展规律,也不在广大北方方言地区通行,这个音就不应该采用。《国语辞典》在这方面又过于迁就北京话,如连词“和”不读 hé,而读 hàn。《现代汉语词典》在异读词注音上严格贯彻《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规定,并采取研究的态度,该从传统的则从传统,如“载一车土”的“载”读 zài 不读 zǎi;该从习惯

的则从习惯,如“倒戈”的“倒”读 dǎo 不读 dào。《国语辞典》处理文白异读时多偏于传统,而对人民群众的实际语言重视不够。比如“百般、百姓、百褶裙、百叶箱、百发百中、百依百顺、百闻不如一见”等词语中的“百”,《国语辞典》注音为 bó,完全脱离了语言实际。对轻声和儿化的处理,《国语辞典》不加分析,全从北京话,使得轻声词、儿化词过多,不利于国语的普及。《现代汉语词典》对轻声和儿化现象经过调查研究做出选择,把轻声词和儿化词限定在一定范围;并采取一定的灵活性做法,把一些词处理为可读轻声也可不读轻声,可读儿化也可不读儿化。《现代汉语词典》的做法减少了学习普通话的难度,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

四

《现代汉语词典》在收词、释义、注音几个方面都超越了它以前的词典,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绝不是说它可以止步不前了。恰恰相反,《现代汉语词典》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宗旨,《现代汉语词典》的科学精神,都要求它与时俱进,不断攀登新的高峰。《现代汉语词典》要通过不断的修订,完善自己,跟上时代的发展。《现代汉语词典》要向两个方面提高:一是及时反映语言的发展,一是及时吸收语言研究的成果。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而词汇更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新词的产生,旧词的消亡,词义的转移,词的用法的改变,这些情况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现代汉语词典》要通过一次次修订,及时反映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首先是调整收词,把那些已经普遍使用并稳定下来的新词语(包括新意义)

收进词典,把一部分陈旧过时、不再使用、查考价值也不高的旧词语删除。某些词的释义,也要根据词的意义、用法的变化或词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加以修改。比如“倾斜”,《现代汉语词典》原注“歪斜:~度|屋子年久失修,有些~)。”后来又产生了“政策倾斜”的用法,《现代汉语词典》于是在修订时补上了“比喻偏向于某一方”的意义。修改例句也是词典修订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例句除了要正确体现词的意义和用法外,内容也要跟上时代的发展。21世纪的《现代汉语词典》,用“咱穷人都翻了身”作“咱”的例句就太过时了;“车、犁、耙、套、鞭等农具,随牲口合理搭配”(“搭配”的例句),不仅农具落后,还带有农业合作化的痕迹;“在山区安家落户,当一辈子农民”(“安家落户”的例句),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提倡的,今天并不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例句修改的要求应该是:正确体现词的意义和用法,语言自然精练,思想内容积极健康而又贴近生活,有时代感。每一次修订,如果都能够在收词、释义、例句等方面下一番功夫,《现代汉语词典》就会常修常新,永远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现代汉语词典》在修订中还要注意吸收语言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提高学术品位。这里我们要说到词典标注词性的问题。《现代汉语词典》初编时是准备给词(或义项)标注词性的,后来没有做下去。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还在讨论,词类划分标准研究得还不深入,这时词典上标注词性确实有困难。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现代汉语词典》还是为全部虚词和实词中的代词、数词、量词注明了词性(不是用符号,而是把词类名称作为释义的一部分)。名词、动词、形容词虽未注明词性,但在释义行文和例句配合上大都有鲜明的特点,词性实际上是呼之欲出的。到了

20世纪90年代,吕叔湘先生重新提出词典标注词性的问题。吕先生在为一本词典写的序言中谈到标注词性问题时说“做总比不做好”,并说:“万事起头难,只要开了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总有一天会完备起来的。”1992年,吕先生在为另一本词典作的序中写道:“我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前我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初稿的时候曾经试着做而没有做成的两件事。一件事是区别单字能不能单用,也就是分别词和非词……另一件事是在一个词或者一个词的一个义项之后标明词类。”吕先生肯定这部词典做成了这两件事,赞扬词典编纂者表现出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从吕先生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初稿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汉语研究、汉语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以及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等工作都迫切需要词典标注词性。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词典标注词性也已经存在现实可能性。一些词典(包括语言所词典室编写的《现代汉语小词典》)在标注词性上作了有益的尝试。现在应该把标注词性的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实际上是在做当年《现代汉语词典》编写者们要做而没有来得及做成的事。标注词性对于汉语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第一次在《现代汉语词典》上加进这项内容,不可能一下子做到尽善尽美。我们只希望《现代汉语词典》下次修订能在标注词性上开一个好头,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经过后人的不断努力,使汉语词典标注词性的工作像吕先生所期望的那样逐步完备起来。

参考文献

1. 董琨:试谈《现代汉语词典》成功的历史经验。见:《现代汉语词典》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 刘庆隆:《现代汉语词典》编写工作二十年. 辞书研究,1981(3).

3. 吕叔湘:《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序. 见:孙全洲.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4. 吕叔湘: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 见:语文近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5. 潘雪莲:汉语规范型词典的世纪回顾. 辞书研究,2000(4).

6. 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 太原:书海出版社,1996.

7. 赵元任:什么是正确的汉语. 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前 言

《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出版发行于 1973 年 5 月,至今已经三十年了。

195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从 1956 年 7 月开始,先后在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主持下,前后参与编写、修订工作的有 90 多人。经过十六七年的艰苦努力,《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终于在 1973 年以“内部发行”的形式问世,1978 年 12 月经修改公开发行。其后,略加修改,1983 年出版了第二版。1996 年 7 月出版修订第三版。目前,这部词典在内地已经印行三百二十多个印次,发行量达四千多万部,在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还有当地的版本发行。无疑,这部词典已经成为我国流行广泛、影响深远的语文工具书了。

《现汉》出版发行的三十年,是我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三十年,是我国从“文革”后期的动乱、艰难走向改革开放、繁荣发展的三十年。《现汉》同全国人民的命运一样,也经历了令人难以忘怀的悲欢荣辱的岁月。当年,这部词典内部发行刚刚一年多,就遭遇到“四人帮”的扼杀,被扣上“客观主义”、“孔孟之道”、“封资修大杂烩”等大帽子,几乎要被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文革”以后,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全新时期。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现汉》以其科学性、权威性和实用性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获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93年12月,《现汉》荣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4年又荣获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国家图书奖”。《现汉》1996年修订本又于1997年荣获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国家辞书奖”一等奖,2002年还荣获“吴玉章人文科学奖”的一等奖。这一系列的殊荣,对这部词典的编者来说,是很大的慰藉、鼓励,也是有力的鞭策。

《现汉》能够取得显著的成就,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不是偶然的。从大环境来说,有国务院的指示和有关领导单位的指导和关切,有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各方面读者的大力支持;就其编纂工作来说,有高水平的主编和审订委员会把关,有力量雄厚的编辑队伍努力工作,还有极为重要的,就是有贯穿整个编纂工作的一种精神,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现汉精神”。这种“现汉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创新精神。《现汉》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型词典,正像吕叔湘先生所说,“这类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吕叔湘《在〈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在很多方面都是在做创新工作。比如收词区分同音同形词和多义词,区分离合词和非离合词,异形词按不同情况进行整理和规范;释文注意符合被释词的词性,注意用词的封闭性;释义后加“注意”栏目交代词语在语音、语法、语用方面的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收词、释义、举例注重规范性等等,都是以往汉语词典没有涉及过或者没有解决的问题。即使在体例方面,比如对外来词

和离合词的标注,对同形词和异形词的标示,对引申和比喻用例的标示等等,也有其创造性。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关键,只有创新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才能促进事业的发展。

二、与时俱进。《现汉》从开始编写到正式出版,不断修订,一直处在不断完善、不断与时俱进之中。从1956年至1960年,在吕叔湘先生主持下,筚路蓝缕,历尽艰辛,编出“试印本”。1961年起在丁声树先生主持、李荣先生协助下,经过三年多的修改、加工,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1973年内部发行。1974年后,又在丁声树先生主持下经过修改,1978年12月正式出版。这前后的三个版本,体现了词典不断前进的三个阶段。“试印本”收词43000条,“试用本”收词约53000条,正式出版本收词56000多条,单从收词数目的递增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不断前进的脚步了。词典收词的不断扩增,正是社会不断发展、语言中的词汇不断丰富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了《现汉》补编本,90年代中期又对《现汉》进行了修订,2002年还出版了《现汉》增补本,现在又再次进行修订,这些都清楚地记载了《现汉》不断适应社会需要,与时俱进的历史。

三、敬业精神。这部词典开始编辑时,人手生,工作生,时间紧,任务重,正如吕叔湘先生说的,工作人员“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我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间十二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吕叔湘《在〈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丁声树先生在词典室主持工作的十几年时间,同样是没日没夜地工作,节假日也不休息,全部心力都扑在词典上。真可以说是“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正像李荣先

生引用《左传》里的话所说,丁先生在词典编辑室十九年,“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李荣《〈丁声树文集〉代序》)。应该说,从事词典编辑的几十位同事,在词典正式出版前的二十多年里,在既没有名又没有利的条件下,日日夜夜,孜孜矻矻,勾资料,抄卡片,分析整理资料,编辑词条,修改、审订词条,审校稿片,大家都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不少人带病坚持工作,有的人还为校改稿片损害了健康。《现汉》的编者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这种敬业精神实在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的。

四、团队精神,也就是同心协力的集体主义精神。大中型词典的编纂工作是一项既有学术性又带有技艺性的系统工程;编辑队伍的组织和调配工作十分重要。《辞海》的一位负责人曾说过,编纂大中型辞书“三分编写,七分组织”(巢峰《出版论稿》)。像《现汉》这样的中型词典,其组织工作是极为繁杂的。五六万词条,既有语文条目,又有各种专科条目;专科条目中既有科学技术条目,又有哲学社会科学条目。几十位编辑人员投入工作,分成编写小组和编写大组,需要统一风格,统一体例,统一进度。工作中大家必须同心同德,分工协作。每个人都是系统工程的一环,整部机器的一个部件。必须强调团队精神,人人都要有集体观念。每个人既要认真负责,做好本职工作,又要为集体工作尽心竭力,多看,多听,多想,主动为编写工作出谋划策。只有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才能集思广益,做好集体工作。

集体的编辑工作中还要注意不断地总结,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学习和提高。吕叔湘先生很重视编辑人员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在“试印本”完成后,曾将编辑人员分成若干小组总结编写实践并进行深入研讨,分专题写出词典编纂的学术论文。编写人员只有不

断充电,不断学有所成,才能推动整体的编写工作的不断提高。但是,由于编写和修订工作十分紧张,《现汉》正式出版前不可能安排出较多时间让编写人员进行学习、研究,所以在《现汉》修订本出版以前,编者的研究工作比较薄弱,研究成果也不多。只是到了1996年的修订工作完成以后,研究时间才相对地多了一些,编者在词典编纂方面的总结和研究文章也发表得多了一些。

这本论文集选编了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部分年资较高的编辑人员多年来所写的文章。论文的作者一般是结合工作实际,研究有关问题,就自己参与《现汉》编纂、修订工作的某个方面写出自己的体会和经验,或者对有关问题加以阐发,对某种编纂处理办法提出意见。这些作者参加词典编写工作的时间较长,接触到的具体问题较多,所以文章所涉及的问题较具普遍性,所思考的理论问题与编写实际联系较为紧密,所阐述的处理意见较为具体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它们对于辞书编纂同行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应该申明的是,一些文章对《现汉》编写提出的某些见解,只能是作者个人的意见,并不能代表《现汉》主编和其他同事的意见。有的文章由于写作时间较早,观点受时代的局限,所引用《现汉》的材料和讨论的问题,只是针对当时的或以前的版本,可能已经不符合《现汉》后来经过修订的版本的情况了。有的文章持论未见得妥当,自然也不一定是本书编者所能赞同的。为便于读者对比研究,本书所收文章按内容涉及的主要议题分为六组编排:一)关于《现汉》的总体工作;二)关于《现汉》的收词;三)关于《现汉》字头的字形和字音的处理;四)关于《现汉》的词语释义;五)关于《现汉》的修订和条目编排;六)关于对辞书学和词汇学有关问题的进一步研讨。文集的附录部分是请王楠同志编辑的1993年以来发表的评

论《现汉》的文章篇目索引。

这里,有必要对附录部分多说上几句。

《现汉》出版以来,由于发行量大,流行面广,所以影响也较大。广大读者对《现汉》十分关心、爱护,经常给编者、出版者来函、来电话或发表文章提出建议或批评意见。辞书界业内人士也对它从各个方面进行探讨、研究,因此对这部词典的评论文章发表得很多。有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生、研究生也以它为研究对象,写出一些学术论文。研究这本词典俨然成了一门学问,有人称之为“现汉学”。1993年4月为纪念《现汉》出版二十周年,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了这部词典的学术研讨会,会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书后附录了《〈现代汉语词典〉评论文章索引》,收录了会议以前各种报刊发表的评论《现汉》的164篇文章的篇目。从那时到今天,又十年过去了,各报刊发表的有关《现汉》的评论文章比那时候的要多很多。为便于人们了解或研究这部词典,所以本论文集把十年来发表的有关《现汉》的评论文章的篇目以发表时间为序集录在书后。

《现汉》从开始编写到现在整整四十七年了。这四十七年的世事沧桑,实在一言难尽,单是与《现汉》密切相关的人事变化,就令人感慨万千了。词典的后期主编丁声树先生于1989年辞世,前期主编吕叔湘先生也于1998年与我们永别了。词典“试印本”时期的十五位审订委员,现在只有两位先生健在。较早参加这部词典的编辑人员也有好多位与世长辞了。除了两位主编外,词典编辑室的孙德宣、何梅岑、李伯纯、孙崇义、萧家霖、孔凡均、王述达、曲翰章、陆卓元、周浩然、赵桂钧、陈润斋、陈梦华和语言研究所其他研究室的李荣、徐肖斧、范继淹、傅婧、金有景、王立达,这些先生都为《现汉》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逝世,使我们深感哀痛。在词典编辑室成立刚过了半年,协助吕叔湘先生做了很多组织领导工作的词典室副主任赵卓同志,却不幸英年早逝了。还有闵家骥先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几年里曾作为词典编辑室的领导成员做过很多工作,也不幸于1990年英年早逝了。这实在令我们感到无比的痛惜。这本文集选收词典编辑室老同志的文章,既是对《现汉》编辑工作的记录,也是对所有老同事的深切怀念。

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他们先后主编《现汉》,也先后任词典编辑室主任。他们都是著名语言学家,学问博大精深,堪称一代宗师。在多年的词典编辑工作中,他们不仅跟全编辑室人员同甘苦共患难,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编改、审订词条之中,而且比别的任何人都要辛苦得多,肩负的责任更重,承受的压力更大。自然,他们对这部词典做出的贡献也是其他任何人不可比拟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明年,也就是2004年,是吕叔湘先生诞辰100周年,也是丁声树先生诞辰95周年,我们这本词典编辑室老同志的论文集,也编入两位主编的一两篇有关短文,以表示对他们的深深思念和崇高敬意。

这本论文集的收集、编辑和出版,得到语言研究所领导和词典编辑室负责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得到商务印书馆领导杨德炎、王维新、江远和周洪波同志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刘一玲对文章的加工、校对等事项做了大量的工作,倾注了很多的精力,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谢忱。

韩敬体

2003年12月

目 录

《现代汉语词典》的历史地位(代序)·····	曹先擢 晁继周(1)
前言·····	韩敬体(12)
在《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吕叔湘(1)
关于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	吕叔湘(3)
关于编纂《汉语大词典》的若干意见·····	丁声树(6)
《现代汉语词典》编写工作二十年·····	刘庆隆(8)
《现代汉语词典》凝聚了我国一代语文学术大师的智慧 ·····	韩敬体(30)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杂识·····	孙德宣(39)
批判“四人帮”扼杀《现代汉语词典》的罪行·····	韩敬体(53)
词典里如何表现思想性·····	何梅岑 莫衡 吴崇康(62)
《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	单耀海(77)
从比较中认识规范型词典·····	晁继周(85)
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选词·····	孙德宣(93)
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	刘庆隆(107)
《现代汉语大词典》的收词原则·····	晁继周(125)
关于词典的选词工作·····	孙崇义(139)
略谈收词·····	闵家骥(144)

关于汉语规范型词典收词问题的思考·····	晁继周(156)
语文词典中关于词汇重叠形式的处理·····	刘庆隆(168)
科技词条的处理····· 吕天琛 李伯纯 陆卓元	李志江(189)
收录方言词是语文词典的一项任务·····	闵家骥(200)
现代汉语字典词典中的字形处理·····	刘庆隆(209)
异体字及其在现代汉字系统中的处理·····	韩敬体(221)
积极稳妥地整理和规范异形词·····	韩敬体(232)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中的语音规范·····	晁继周(243)
现代汉语字典词典的注音·····	刘庆隆(253)
词典注音的分词连写问题·····	闵家骥(265)
字、词与连写·····	曲翰章(280)
把汉语词典的编写提高到新水平·····	孙德宣(289)
论规范性词典释义的一般原则·····	韩敬体(301)
谈谈《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形式·····	刘庆隆(323)
论释义的科学性·····	孙德宣(344)
训诂研究与《现代汉语词典》词语释义的精进·····	韩敬体(358)
谈语文词典的释义·····	吴崇康(367)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修订举隅·····	晁继周(374)
浅谈多义词的义项划分·····	吴崇康(380)
同义词语及其注释·····	韩敬体(388)
《现代汉语词典》的一种特殊的释词方式·····	韩敬体(403)
词语的比喻用法和比喻义及其在《现代汉语词典》 释义中的处理方式·····	韩敬体(412)

语文字词典中百科词汇的注释问题·····	刘庆隆(420)
《现代汉语词典》科技条目编写和标注外来语问题 ·····	李伯纯(445)
语文字词典的括注形式·····	刘庆隆(452)
《现代汉语词典》用例笔记·····	吴昌恒(468)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概述·····	韩敬体(475)
与时俱进,做好《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 ·····	晁继周(485)
难字·难词·难义——《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丛谈 ·····	舒宝璋(493)
《现汉》修订的重要出发点:促进规范 ·····	晁继周(506)
语文字词典的条目编排·····	刘庆隆(513)
《现代汉语词典》的编排·····	宋惠德(527)
要充分利用词典的版面·····	刘庆隆(535)
关于资料·····	李国炎(540)
把词典编纂与词汇研究结合起来·····	晁继周(551)
辞书编写与研究工作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李国炎(559)
辞书中国化小议·····	闵家骥(577)
语文规范标准与规范型字词典的编写·····	晁继周(584)
语词琐记·····	孙德宣(591)
成语之释义与考订——读《汉语成语词典》小议 ·····	刘洁修(598)
方言词典编写的理论与实践·····	闵家骥(607)
提高辞书质量的若干设想·····	刘庆隆(620)

4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学术论文集

汉语规范型词典编写的历史和面临的问题…………… 晁继周(627)

附录:

1993 年以来有关《现代汉语词典》的评论文章

篇目索引…………… 王楠(636)

在《现代汉语词典》 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吕叔湘

召开《现代汉语词典》研讨会很有意义，会议组织者让我说几句话。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二十周年了，开始编写这部词典已经是三十七年前的事了。编写《现汉》是1956年2月《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下达给语言研究所的任务，目的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

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历尽艰苦，其中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要编好一本词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汉》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综合，工作繁杂，当然十分辛苦。而我们编《现汉》又有一些偶然性增加了工作难度。一是人手生，参加编写的人大都没编过词典，要边干边学。二是工作生，这类的

* 这篇文章是1993年4月在浙江宁波召开《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的前夕，吕叔湘先生口授、本论文集编者记录，再由吕先生修改定稿的。后由本论文集编者在研讨会开幕式上代为宣读。原文无标题，1996年编入《〈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时编者加上了标题。

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辞源》《辞海》都是百科性的辞书,《康熙字典》只适用于文言。三是时间紧,要在一两年内完成四五万条的编写任务。词典编辑室的行政领导为赶任务采用当时流行的“插红旗拔白旗”的办法促使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我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间十二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四是干扰多,一次次政治运动耗费不少时间,也使得一部分有关条目难以定稿。“文化革命”一起来,工作就更没法做了。我想,如果没有那些干扰,《现汉》起码可以早出版十年。我们花了几年工夫印出了试印本,丁声树先生又领导词典室花了几年工夫做修改工作。这本书出版以后,适合社会需要,读者反映不错,这使得我们心里感到安慰,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甘”吧。

凡是“现代”词典都要跟上时代,不断地修订,《现汉》正式出版也已经十五年了,需要修订。同时,根据一部分读者反映,《现汉》原来收词有点太严,需要适当放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先编一本《现代汉语大词典》,然后再利用它来修订《现汉》。这样,应该可以满足不同阶层的读者的需求了吧,我想。

祝《现汉》研讨会圆满成功。

关于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

吕叔湘

今天想借学部委员会开会的机会谈谈编汉语词典的事情。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词典这一类工具书是有很大的作用的,编词典应该说是学术工作的重要项目之一。语言研究所最近三年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编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词典,1957年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搜集资料约70万张卡片。1958年上半年进行试编,逐步确定词典体例。1958年6月开始正式编写,到1959年3月底完成初稿,接着就修改,到7月底完成二稿;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修改。从已经收到的各方面的意见看来,缺点还很多。我们的希望是,跟过去的词典比较起来,这部词典确实是提高了一步,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基础再求改进。是否作到了这样,还得等这部词典出版之后,请各位委员、各位同志指教。

编辑这部词典的工作,我们正在从学术方面来进行总结,这个总结试图解决汉语词典编纂法上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个总结不局限于为我们所编的词典作说明,竭力避免作成凡例的详解。我们要充分利用这部词典的材料,包括历次印本和修改片、

* 这篇文章是吕叔湘先生据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写成的,曾发表于《新建设》1961年第1期。

意见片,并利用可供参考的一切资料,包括过去的新旧字典、词典和若干种有代表性的外国词典,我们要利用这些资料,把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个个加以分析和讨论,分列专题写成论文。现在拟定的题目有八个:1. 词典的性质和类型,2. 词典里怎样表现思想性,3. 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4. 汉语词典和汉字,5. 汉语词典中的语法问题,6. 词典里的释义问题,7. 一般词典里的专科条目、人地名和附录,8. 词典的资料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把我们从实践中得来的感性知识提高到理论的水平,为以后修订这部词典以及别人编写同类词典提供参考,也可以说是为我国的词典学建立基础。

《现代汉语词典》是供一般读者应用的一部中型词典,收词四万多条,印成18开本1200页,大约250万字。这样大小的词典还不能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全貌。因此我们准备以这部词典为基础,在若干年内编出一本大型的现代汉语词典。

但是无论中型或是大型,都还是现代汉语词典。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需要有多种多样的词典,光有现代汉语词典还是不够的。汉语历史久长,从最早的文字记载甲骨文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三千多年。用汉语写的书真可说是汗牛充栋,恐怕世界上没有第二种语言有这么丰富的文献了。这里边包含的词汇也是无比的丰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详细记载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汉语大词典。这样一部词典,可以总结前人音韵、训诂、文字研究的成果,推动汉语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也可以对汉族人民历史发展的研究提供语言方面的材料,其学术意义极为重大。从实用方面说,也很需要有这样一部词典。第一,古籍训释常常众说纷纭,散见群书,需要集中整理;其次,中古以后著作中的方言俗语多为旧有字书所

不载,索解为难,有待考释;再拿一般词语说,越是常见的词语,特别是常用的单字,越是意义繁多,如果不了解其源流变化,时代先后,阅读古书极易产生不正确的理解。要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有一部通贯古今的汉语大词典。这部词典同《现代汉语词典》比较起来,收条大概要有十倍,篇幅还可能不止十倍。这种性质的大词典,很多国家都已经编了,或是正在编。我国语言学界在解放以前也已经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1928年就曾经成立“中国大词典编纂处”,搜集了一些资料。但处于反动政府之下,不可能受到重视。现在不同了,人民当家作主,各项事业都突飞猛进,一日千里。汉语大词典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1956年制定科学研究工作远景规划的时候,编纂汉语大词典曾经列入语言学科的规划草案。这次召开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议,在京的语言学科委员商量了一下,把编纂汉语大词典作为一个提案向会议提出。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需要全国语言学界通力合作,还需要哲学、文学、历史等部门乃至某些自然科学部门大力协助。我们认为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由哲学社会科学部出来号召和组织,才能早日实现。

关于编纂《汉语大词典》的若干意见*

丁声树

1. 我们应该积极准备编纂一部《汉语大词典》。这部“大词典”应该包括古今词汇,尽可能顾到汉语的历史发展。但是由于种种限制,这部“大词典”还不可能严格地按照历史原则编纂。(主要因为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尚无显著的成绩,汉语各个时期的历史面貌还不清楚。古代文献未能通解的还不少。许多古书的真伪问题、著者问题、撰作年代问题、文字考订问题,等等,都还需要长期的细致的研究。清代音韵训诂之学偏重先秦经子,汉魏以下成就不多。唐宋以来语言研究,近年才开始。)

2. 《汉语大词典》应该以《现代汉语中型词典》为基础,扩大收词范围,总结古今学者研究汉语的成果,去粗取精,详近略远,贯串厚今薄古的精神。

3. 全书约收 50 万条,大约 5000 万字,分成 15 卷到 20 卷。(这是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的估计,大致不离。在编纂过程中可能还有增减。)

* 这篇文章是丁声树先生 1959 年 12 月写成的。当时,语言研究所筹备编纂一部历史性的《汉语大词典》,由丁声树先生主编。这是丁先生对编纂大词典的初步设想。由于客观原因,这部词典的编纂工作没有启动。丁先生也于一年后调去接替吕叔湘先生主编《现代汉语词典》了。

4. 成书期限。1960—1964年准备资料。1965年开始编写,1975年全部编成。(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要求1980年编成,本所去年所订1958—1967年研究工作计划草案要求1970年编成。)

5. 编纂机构。以本所词典编辑室为基础,适应工作需要,扩充编制,配备力量,网罗专门人材,培养专业干部。

6. 及早整理已有的资料,补充未有的资料。旧有的“中国大词典”卡片和“中山大词典”卡片,应该及早着手整理,去其重复,统为一体。再从经、传、子、史,诗、文、词、曲,小说,笔记,字书、类书、佛藏、道藏等各方面材料加以补充。

7. 开展群书索引工作。设“索引组”,在已出版的“引得、通检”之外,编印古今文献索引。重要著作尚须逐字编成“堪靠灯”,以供词汇语法研究参考。

8. 组织全国力量进行《汉语大词典》所需要的各项专题研究。例如:汉语史的断代研究、某一专书的语言研究,某一著者的语言研究,语音史的研究,语法史的研究,词汇史的研究。语源学的研究,外来语(借词)的研究,古书著作年代的研究,历代典章制度、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礼俗、名物的研究,历代民歌、民谣、成语、谚语、故事、传说的研究,地方志及其他文献中所记方言俗语的研究,现代方言的调查研究。诸如此类。

9. 语言研究所各研究组应该配合《汉语大词典》的任务,制订计划。

10. 哲学社会科学部开办的大学应该为编纂《汉语大词典》培养专业干部。其他有条件的高等学校也应该开设词典编纂专业。

以上只是个人空想所及,不完不备,错误失当之处一定很多,希望大家批评讨论。

《现代汉语词典》编写工作二十年*

刘庆隆

自从1956年开始准备编写《现代汉语词典》到1978年正式出版,前后经过了二十二年。在这段漫长的工作中,从我个人来说,经验没什么,教训却不少。以下几个问题对做词典工作的同志或许有可借鉴的地方,简单地谈谈个人的看法,供参考。

一 明确编写宗旨

使用词典的人大都希望词典无所不包,查什么有什么。但一般词典篇幅有限,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需要查考的问题,而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一部词典能把它所要解决的那部分问题解决好,就应该说是一部好词典了。一部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词典是编写不出来的,即使能编写出这样一部词典,篇幅也会大得不得了,使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更不可能每个人都买一部放在手头。所以,编写一部词典,首先要明确供什么人使用,解决什么问题,宗旨定了,才好进行其他工作。各人对词典的要求是不尽相同的,就是参加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1年第3期。

编写工作的人,看法也会有差异。编写宗旨确定了;没有什么大不妥,就要进行下去,不要轻易变动。否则,筑室道谋,三年无成。

《现汉》编写宗旨是十分明确的,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也就是说,《现代汉语词典》是为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服务的。这个大的方针是不能改变的,要努力使这部词典更好地体现这个方针。我们的工作也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总方针虽然明确了,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还是走了不少弯路,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

比如关于是否收录古汉语词汇和生僻字问题,最初讨论编写方针时就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收录一部分,以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有的为限,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有的就收,没有的就不收。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不收现代汉语中一般不使用的古汉语词汇。正文中也不收现代汉语中不使用的生僻字,为了备查,在附录里酌收一部分,就是《试印本》的样子。

开始编写时就是照这个原则进行的。后来为了备查,收了一些古汉语词汇和生僻字。收录这些古汉语词汇和生僻字,没有范围,也没有标准,信手拈来,很不一致。另一方面,这些词汇和生僻字收的是古汉语的意义和用法,而现代汉语词汇有的也有古汉语的意义和用法的,却没有收,就显得很不协调。

本来《现代汉语词典》是以确定普通话词汇规范为目的的,普通话中不用的古汉语词汇和生僻字,是可以不收的。为了备查,收一部分,实际上解决不了阅读古汉语著作的问题。原因是这类字、词数量非常的大,星星点点地收一点儿,大量的还是查不到,而且收的这一点儿还未必就是常要查的。

常听到说“词典是备查考的”，这句话无疑是对的。但所谓“备考”，也只能是就词典所要解决的那一部分问题，增加一些条目以备查考。比如《现汉》是收录普通话词汇的，应把普通话词汇多收录一些备查；不能把古汉语词汇或其他方面的内容收的更多些，因为即使再多些，也代替不了古汉语词典或者别的词典。反而占了篇幅，挤掉了普通话条目。

二 制定编写细则

一部词典虽然是由若干不相统属的条目组成的，看起来系统性不强，但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一个拼盘。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个严密的系统把全部条目联系起来。这个系统就是根据编写宗旨制定的词典体例，对编写人员来说就是编写细则。有这样一个细则是十分必要的。就是一个人单独编写，有这样一个细则也便于前后一致，整齐划一。对集体编写来说，更是大家共同遵循的准则。这就好比是制造一台机器的蓝图。有了蓝图，每个人都严格按照蓝图制造零部件，把零部件组装起来，就能制成一台所要求的机器。如果每个人不按照蓝图，随意制造零部件，这些零部件是组装不成所要求的机器的。

编写细则根据编写宗旨制定，在各方面都要体现宗旨的精神，尤其是在收词、注音、释义、举例几个重要方面的规定，更要鲜明地反映出编写宗旨的精神。

编写细则要尽可能定得详细具体，不但主要方面要有详细的规定，就是一些符号，包括标点符号的使用，也都要规定好。每项规定都要举些典型的例子，通过例子使编写人员更好地领会规定

的精神。当然,有些规定难以定得太具体,比如收词一项,就不好定得太死。但也不能伸缩性太大,伸缩性太大了,不好掌握,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结果成了无章可循。

编写细则要定得适用,不能提出过高要求,否则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为了定好细则,要先制定草案,通过试编,认真讨论,集思广益,反复实践,逐步充实完备,最后定下来执行。在正式编写中,可能有个别规定不大适用,还需要改动。因为制定细则比较慎重,改动的地方不会太多。凡能不改动的,尽可能不轻易改动。因为每改动一次,就要返一次工;就是改变一个符号,也要把编写好的稿片翻一遍,还可能改之不尽,造成不一致。《现汉》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也没有做好,真是得不偿失。比如“也作×”,先是用“也作×”,后改为“也写作×”,最后又改为“也作×”。这种无关紧要的细节,却花了很大的代价。

三 做好准备工作

编写词典,工作量大,为了争取时间,往往工作一开始就忙着动手编写,其结果,由于基础没有打好,欲速不达,造成返工,挫伤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还得回头补做准备工作,延误了时间。各项准备工作做得好,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编写工作就会进行得比较顺利,结果可能缩短编写时间。

准备工作包括明确编写宗旨、制定编写细则、试编、收集资料等方面,其中收集资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资料是编写的基础,做好收集资料工作就给编写工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资料工作做得不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很难编写出有水平的词典。编写

中最头疼的事,就是苦于资料不足,难下定断。

收集资料工作很简单,要脚踏实地地去做,一点也不能取巧,不花很大力气是做不好的。不会做资料工作的人,编写不好词典。只有熟悉词典业务,又肯埋头苦干的人,才能做好资料收集工作,选取的资料才比较合用。

《现汉》编写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先是研究了国内外一些有代表性的词典和有关词典编写的文章,编写了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从选词、注音、释义、排列等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制定了一些原则。

工作正式开始前,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包括有关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和工作人员的多次讨论会,访问了专家,发表了试编样稿,广泛征求意见。在这个基础上,指定专人根据编写宗旨制定编写细则。组织人力依照细则试编。通过试编,多次修定编写细则,最后确定下来。

正式编写前,组织了力量,根据词典的要求,开展了收集资料工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收集资料卡片约七十万张,连同原新华辞书社的卡片,共约一百万张。

由于时间紧,当时认为准备工作差不多了,资料虽然比设想的少(原设想收集五百万张卡片),也可以勉强对付了。现在看来,准备工作如能做得更细致些,后来的返工会少些。这主要是对试编条目的讨论和总结工作做得不够,使一些分歧没有能够及早得到解决。当然有的返工是难免的,总有一些事先考虑不周的问题。

后来编写时感到资料是很不够的,无论是从数量或质量来说,都满足不了工作的要求。有些很常用的词汇或用法没有资料,结果词典里就漏收了。有些词汇资料太少,对意义和用法不能进行

很好的分析。有的词汇的资料,不必要的重复太多,浪费排比分析的时间。如果资料工作做得更好些,肯定编写的质量会更高些。

四 分工负责,照顾全局

词典涉及的方面很多,一个人精力有限,难以做好。部头大些的词典需要集体来编写,才能众志成城,集思广益,编写出比较好的词典。集体编写词典比集体编写一般的书要难,因为一般的书连续性、整体性强,分章分段写,比较容易写得一致。词典比较零散,比较庞杂,不论是分段编写,还是分科或分类编写,不容易一致,前后常常照顾不周,自相矛盾。就是细则中的规定,执行起来也屡屡发生分歧,认识不同,标准不一。而且有些规定,确实也不好掌握,比如选词的宽严,释义的详略,不大容易划一。但一部词典绝不是拼盘,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要求参加编写工作的人员注意全书的一致性,严格遵照编写细则的规定,照顾全局。从自己担负的工作来看,可以这样处理,但从全书来看,不能这样处理的,坚决不这么办。从自己担负的工作来看,这么做有困难,但从全书来看,需要这么做的,一定要这么做。这样才能保证全书的一致性。

集体编写词典要有明确的分工,每个人要尽力把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做好,使它符合词典的要求。凡不符合要求的,应由自己返工,直到做好为止。前边人的工作要为后边人着想,不要给后边的工作遗留问题。自己负责的工作,自己熟悉,处理起来比较省事,也容易划一。留给后来的人,别人不熟悉,就费事多了。

根据词典的要求,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工。编写的分工一般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时间紧的，可以分段编写，便于齐头并进，流水作业；时间允许的，可以分类编写，便于前后照应，内容划一。虽然有分工，还要彼此照顾。方法可以采取及时联系，共同解决，也可以采取写通知单，将联系事项，转给有关的人处理。

集体工作中，常会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学术问题，见解不同，更是常事。不同的意见要进行讨论，工作讨论会上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尽量发表个人的意见，开展百家争鸣。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下来的事项就要共同遵守，不能各行其是。不同意见可以保留，继续探讨，学术问题，可以研究，也可以发表文章，但不能把这些不同意见带到工作中来。

我们平常习惯个人写东西，不大习惯集体写书。个人写，照自己的意见写就行了，不必和别人商量。集体编写，就得彼此照顾，尊重别人的意见。如果都强调个人的意见，不照顾全局，不遵守共同制定的原则，词典是编不好的。

五 主编负责和群众路线

集体工作既要有坚强的领导，又要依靠群众。只有领导，而没有群众的积极性，就会形成领导的空忙，做不出成绩。没有领导，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也不会做出成绩。词典编写也不例外，既要有主编来主持工作，又要依靠群众，共同完成任务。

一部词典的主编是这部词典工作的主要的业务领导，要总揽全局，掌握编写宗旨，协调各部分的工作。对词典中的重大问题能拿出自己的意见，对词典中的学术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对群众中的不同意见能进行仲裁。主编的主要工作是对整个词典工作的领

导,而不只是看稿、定稿。尤其是大、中型词典,字数较多,主编看全部稿子,最后还要把全部稿子定稿,这是有困难的。主编只能看有代表性的条目,审定疑难条目,集中精力解决关键性问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主编既不要包办看稿、定稿,也不要脱离看稿、定稿工作。包办了,看不过来,会影响整个工作的进程。脱离了,摸不准词典中的关键性问题,难以提高词典的质量。

《现汉》编写工作中,“瓶口细”一直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大家对这个问题意见不少。所谓“瓶口细”,就是全部稿子都要通过主编定稿,几十人编的稿子都拥到这里过不去。主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别人又觉着有力气使不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试印本》最后由四个人分段定稿,《试用本》由一个小组定稿。即使这样,定稿工作仍然是最忙的。

词典编写工作既然是主编负责,参加工作的人员应该服从主编的领导,执行主编的决定,尊重主编的意见。主编也要相信群众,虚心地倾听群众的意见,尤其是一些不一致的意见,更应该慎重对待。这样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把词典工作做好。

主编的意见和工作人员的意见不一致时,不宜简单地做决定,原则问题,应进行充分讨论,最后做出决定,实在无法一致的问题,应以主编的意见为主。非原则问题,也要说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以便工作人员好去照着做,这实际上也是对工作人员的培养。主编对待不同的意见,原则问题要坚持,可此可彼的问题,不一定都强调自己的意见,能按照别人办的,可以按照别人的意见办。主编的意见,不管是业务问题,还是学术问题,要为群众所理解,否则,大家只是跟着干,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工作是做不好的,也无法

发挥大家的创造性。

“文人相轻”的旧习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强调自己的意见,看不起别人的意见,互不尊重,时有发生。处理不好,常常在稿子上形成“拉锯战”,改过来,改过去,抵消力量。严重的,甚至闹对立,争最后看稿,以便把自己的意见作为定稿意见,使词典反映自己的观点。要尽力避免这些情况。

词典涉及的面非常广泛,《现汉》虽然只是一部中型的语文性词典,收了五万多条词汇,但从《试用本》所标的科目来看,就有四十多个学科,实际上还不止这些学科,而是涉及到各行各业。一个人不管学识怎样渊博,也难以把各方面都包下来,只能依靠大家,分工负责,分口把关。

六 内部审读和征求意见

词典内容广泛,涉及各行各业,编写人员,虽非一人,但总的说来,人数还是很少的,而且知识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样样都懂,需要广泛地征求意见,消灭错误,提高质量。过目的人越多,发现的问题也会越多,错误就会越少。《现汉》油印了三次,铅印了三次,其中部分难处理的条目,还另外油印了三次,铅印了三次,分送有关方面,广泛征求意见。编写初稿时,就约请了所内外十几位专家,组成审订委员会审订全部稿子;组织所内其他组室的同志进行全面的或分段、分项的审查。同时把油印和铅印的稿子剪贴成卡片,分门别类地送请有关单位审查。《试印本》整套书送到全国一百四十多所大中学校去征求意见。部分条目送给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去审查。一部《现代汉语词典》麻烦了三百多个单位,还

麻烦了许多专家和读者。如果说《现汉》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也都是大家的努力和各方面的帮助。

在组织外力审查时，编辑室内也组织了部分参加编写工作的人员进行审读。室内同志由于业务熟悉，了解词典的要求，对编写中的问题看出来的比较多，提出的处理意见也比较中肯。但涉及专业知识方面的问题，相对来说，发现的比较少。

《现汉》多次油印、铅印，广泛征求意见，有可取的一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即花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太多。而且，表面上看来组织的人很多，实际上并不能发挥所有人的力量：有的不了解词典工作，不知道从哪里提意见，要提一些什么问题；有的虽然能看出问题，但由于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来做；有的是应付故事。在这些方面，难免只是形式。不如有针对性地约请一些人来进行审查，工作会做得更扎实些。

组织外力审查，送审的条目不宜太多，凡自己能解决的不必送出去，只把自己定不下来的条目，送去审查，请他们协助解决提出的问题。条目多了，工作量太大，一般的专家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审查，就是勉强看了，工作也不大可能过细。当然，有的专家或单位愿意多承担工作，请他们帮助多审查一些，那就更好了。

约请承担审查的人，学术水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热心这方面的工作，并有精力和时间来从事这项工作。不然，可能只是虚有其名，并不能真正提高词典的质量。过去约请的人，多是义务性质的，为了更好地落实审查工作，酌致报酬，效果可能会好些。

对全部稿子的审查，要组织内部力量进行。这样做，有保证，而且效果比较好。因为参加编写的人员，职责攸关，业务熟悉，能发现问题，并能提出中肯的处理意见。由于专业知识不足，不能审

查的专业条目,可以提出来,组织专业力量审查。

审查,就是专为挑毛病。因此,组织人力时,要挑选善于发现问题的人参加。可能有的人编写工作不突出,但眼光敏锐,很会发现问题。心细手勤的人适于做这项工作。

出版前的审查是重要的,出版后,书到了使用者手里,是更广泛的审查。广大使用词典的人,会帮助找出更多的缺点和错误。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些意见,进一步消灭错误,提高质量。收到的意见,要逐条制成卡片,逐条进行核对,结合内部的检查,进行修改。

一部词典一下子就编写得十全十美,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尤其是部头大一些的词典更难做到。必须经过几次修改,才能逐渐完善起来。词典出版后,要组织人力进行检查和加工。虽然出版前经过了多次审查、检查,做了技术加工,但漏洞还会是不少的。这是因为词典印出来以前,随时都会有改动,检查、加工过的,仍会出现新的问题。再者,检查、加工时,稿子还在审修过程中,不能都集中起来,常常有检查不到的地方。词典出版后,有了现成的书,翻检容易,便于前后查对。另外,还会有人陆续发现问题,提供线索。这时组织少数热心这方面工作的人进行检查加工,会事半功倍。

七 条目编写和技术加工

一部词典的编写要经过很多人的手,前后矛盾或是照顾不到的地方,在所难免。但一部词典疏漏之处太多了,也会影响词典的质量,给使用的人带来不便。常见的疏漏是有关的条目注释不一致,甚至彼此矛盾。应该互相照应的地方,没有照应。比如,甲条注明见乙条,而乙条根本没有收,或者乙条收了,但没有收与甲条

有关的意义,或者没有交代与甲条的关系。甲条用乙条作注,而乙条没收,或者收了,而没有收用做甲条注释的意义。这些情形,都会给查词典的人造成困难,甚至造成误解。这里提到的仅是举个例子,词典里的疏漏和矛盾是多方面的,每项工作中都会存在着。

编写条目时,根据编写细则的要求,要尽力照顾到有关的方面,不给后来的工作留下麻烦。

《现汉》编写时曾经做过技术加工,由专人负责,分项检查,凡是检查过的条目,都在底稿上加盖图章,注明“已与某条平衡”,或“已与某条核对”。经过检查的条目,如果再要改动,必须连同有关的条目一同改动。检查时,除专科条目外,把语文条目也分成了若干小类,把同类条目摆在一起互相比照,根据其中处理的比较好的来处理。反义词进行对照处理,比如大、小,多、少,长、短等。这样处理的好处是比较一致,无论是意义的分合,还是注释的方式,同样的情形,出入不会太大。没有这样处理的,有的距离就比较大,比如“打、来、搞、闹”等。

后来修改时,技术加工工作做得就很粗疏了,尤其是1975—1977年这次修改,技术加工工作几乎没有做。再加上后来在校样上多次改动,前后很难照顾到,这就使得《现汉》(1978年本)疏漏之处甚多。

技术加工工作常被忽视,有的认为这是细枝末节,不足轻重。其实不然,技术加工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词典的面貌,而且这些问题是查词典的人随时都可碰到的,读者来信中提到的问题,有不少是属于这方面的,应该把这项工作做好。技术加工工作是很繁重的,很琐碎的,不认真对待,是做不好的。

进行技术加工不能怕麻烦,工作越细越好。各项工作都要有

专人负责,逐条检查,就是词典中使用的符号也要逐一检查。凡是检查过的项目,都要在底稿上做标志,需要加说明的地方,还应该注明,以便后来查对或别人查看。同时还要规定,技术加工过的底稿,如果再要改动,必须连同有关的条目一齐改动,以防造成新的矛盾。

词典稿子很难做到一字不易,在校样上常常还要修改。这种修改,容易造成前后矛盾。因为看校样是流水作业,看到前头看不到后头,看到后头,前头又交出去了,不能同时比照修改。另外,正式稿子经过了好多道手续,好多人过了目,又做过各方面的查对。在校样上修改是急就章,不可能再经过这么多人过目,再做各方面的查对。因此容易出纰漏,顾此失彼。

在校样上改动是不得已的事情,要尽量少,能不改动的,要尽量不改动。非改动不可的,酌改。凡是改动的地方,都应该做记录,交技术加工人员重新检查核对,以免出现新的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技术加工没有白做。否则,费了很大力气的技术加工工作,很可能收不到预期的效果。比如,《现代汉语词典》中“精采”一条,原作“精彩”,1978年本改为“精采”,书中用到的,不少处还是“精彩”,没有能全改过来。

技术加工不是仅就某条检查,而是对全书中有关的条目进行查对。只就一条看,可能看不出问题,把有关条目比照查对就可能发现问题。比如《现汉》(1978年本)80页,“[播幅]垄沟中播种作物的宽度”,724页“[垄沟]垄和垄之间的沟,用来灌溉、排水或施肥”,这两条一比照,就看出问题了。因此,技术加工工作要熟悉业务的心细手勤的人去做。

八 词典编写和科学研究

词典编写和科学研究是密切联系着的,词典要吸收社会上的科学研究成果,反映当时的科学研究水平。科学研究成果越多,词典的质量应该越高。反之,对词典的要求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科学研究水平。当时学术界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不可能要求词典全部解决。经过词典编写人员的努力,能解决其中部分问题,就应该说这部词典有了提高。

《现汉》编写初稿时曾设想解决词汇自由运用和不能自由运用的问题,标注词类的问题。由于存在的问题较多,后来没有做。注音连写,勉强做了,无论理论上,还是具体做法上,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一时还不能完全解决。可以做些试验,不能要求太高。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继续进行研究,力求早日解决,提高词典的质量。

词典编写工作中,有两方面的科研问题:一是词典编写工作本身的科学研究,比如“如何选词”,“如何注音”,“如何释义”,等等。一是词典内容所涉及的科研问题。这方面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跟整个词典编写工作有关系的,如文字学的研究,音韵学的研究,训诂学的研究,词汇学的研究,等等。一是跟个别条目有关系的,如某一事物的研究,某个学科的研究,等等。这些科研工作大量的,不是词典工作者所能全部解决的。我们只能依靠社会上的科研力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正确地反映到词典里来。至于这中间的部分问题,我们可能通过研究获得解决,但不能要求太多。

关于词典编写工作本身的科研问题,只能依靠词典工作者自

已来解决。因为这些问题,词典工作者理解得比较深,资料比较凑手,驾轻就熟,容易出成果。而且这样的科研成果是和编写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来源于实践,上升为理论,再反过来指导编写工作。没有参加过词典编写工作的人,对这些问题体会不深,研究出的理论,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再者,局外人做这方面研究的也非常少,看不到有什么研究成果问世。

跟整个词典编写工作有关系的一些问题,也要进行研究,主要是研究把这方面的科研成果怎样运用在词典里。虽然这些方面的问题跟整个词典编写有关系,但也不能把这些科研成果原封不动地搬到词典里。还需要根据词典的要求,有机地吸收进来。

我国很早就有了字典、词典,但对词典编写的研究,历史却很短,我国字典、词典如果说还不算少,但对词典编写的研究却少得可怜。我们能把词典编写中的问题摆成堆,但有成效的解决办法却不多。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词典水平不高的症结所在。为了尽快解决这种状况,应该大力开展词典编写的研究工作。

在机械化的今天,我们编写词典还完全是手工业方式,这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我们应该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开展利用电子计算机收集资料和编写词典的研究,以期能早日实现利用电子计算机收集资料和编写词典。

《辞书研究》的出版,给我们的词典工作研究创造了条件,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个阵地,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交流工作经验,介绍编写情况。千方百计,进一步促进词典工作的科学研究。

开展词典工作的科学研究,目前困难尚多。首先,我们这支队伍就又小又弱,应付当前的工作都有困难,哪里能匀出时间来进行

科学研究。更何况词典工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的研究,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现汉》编写过程中,曾几次布置进行总结,对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但结果都落了空,基本上没出成果。提出这些困难,希望引起各词典编写单位的重视,逐步创造条件,开展研究工作,以期多出些成果,提高词典的水平。

九 发扬特点和力求一致

各部词典都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要有自己的服务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一部词典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我们要进一步发扬和充实这些特点,使它们能够更好地为使用词典的人服务。

每部词典除了各自的特点外,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的东西应该力求一致。比如字形、注音、查字法等。这些东西不是每部词典的特点,应该一致起来。(至于有的词典照顾的字形、读音多,或有其他方面的说明等,那是另外的问题。)如果把这些东西也作为特点来发扬,一部词典一个样子,只会在客观上造成混乱,给使用词典的人增添麻烦。

《辞源》、老《辞海》的部首和《康熙字典》相同,没有听到有人说《辞源》、老《辞海》抄袭了《康熙字典》,没有自己的特点。《中华大字典》的部首顺序和《康熙字典》不同,尽管有它的道理,但常听到有人说不方便,因为还需要另外记一下《中华大字典》的部首顺序,并没有听到有人称赞这是《中华大字典》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切都要因袭旧的,不能创新。《现汉》(试用本)用了《辞海》(未定稿)的部首查字法和新四角

号码查字法,因为这是当时查字法整理小组制定的。后来听说《辞海》的部首查字法要修改,所以《现汉》(1978年本)就改用了《新华字典》的部首查字法和《新华字典》的四角号码查字法。这是因为《新华字典》发行了二十多年,有若干万册在流传,影响比较大,会使用这种查字法的人比较多。《现代汉语词典》没有另外制定按形体查字的查字法。

解放后在字形、字音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给编写词典创造了一些条件,减少了一些麻烦。当然,这中间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不论是汉字整理,还是审音工作,都有不少问题。这里有工作上的问题,也有认识上不一致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要深入调查研究,提供资料,交流情况,协商解决,求得一致,不宜各行其是,在客观上造成混乱。

《现汉》(试用本)“睥睨”读 bì nì,是和《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一致的,与解放后出版的一些字典、词典也是一致的。1978年本改为 pì nì,是值得斟酌的。“睥睨”,普通话口语里不说,是书面语。这些年已经念 bì nì,就不必再改念 pì nì了。如果为了照顾旧反切,加个旧读 pì nì也就够了。如果是为了纠正不合旧反切的读音,这也不只是“睥睨”一个词的问题,还有不少。《现汉》改了,《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和别的一些字典、词典不改,使用词典的人就不知道应该念哪个音了。写信来问,也很难回答。还有一个“獐”字,有的字典、词典读 zhā,现在有的又改读为 chā 或 chá,常接到来信,问到底应该读什么?这个字见于鲁迅先生的《故乡》,鲁迅先生说是他造的一个字,读如“查”。这个字,别的地方没有看到用过。过去的字典、词典已经读 zhā了,就是错了,已经是积非成是,不必再改。现在一改反而治丝益棼,莫知

所从。

还有没有制定出一定办法的问题,像按形体查字的查字法,这就更需要协商解决。不要一部词典一个办法,使查词典的人,查一部词典就得学一种查字法,这实在是很沉重的负担。我观察过我们这里的同志,大家都查过新《辞海》,但没有一个人熟悉这部词典的部首查字法,都是利用书后的音序检字表查字。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学习一种新的查字法是多么不容易。

为什么不愿意用别的词典的查字法呢,无非是认为别的词典的查字法有缺点。现在用的一些查字法都有一定的缺点,就是新制定的查字法也有缺点。只是自己制定的,自己使用起来熟悉就觉着好些罢了。别人不熟悉,也就仍觉着不方便,还不如使用已经会了的。这不是说没有改进,只是说改进的地方,不一定抵得上使用这种查字法又要学一遍所费的时间。

词典中使用的符号尽可能一致起来,这不是抄袭,不是雷同,是节省查词典的人的精力。各个词典相同的情况都用一样的符号,使用词典的人就可以触类旁通,不用一部词典一部词典地去记了。

凡是应该一致的地方都应该尽量一致起来,前面提到的,只是举几个例子,不是说就是这几方面应该一致起来。

十 词典的思想性

《辞书研究》开展了语文性词典有没有阶级性的讨论,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讨论,是想解决一个长期影响着语文性词典编写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这次讨论能开展得更深入更广泛,不只是简单

地做出结论,有阶级性,还是没有阶级性。而是通过这次讨论,把词典编写中的一个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词典的思想性,找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这次讨论,从结论看,意见好像是截然相反的,一是有阶级性,一是没有阶级性。但讨论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意见还是接近的。认为有阶级性的,大概也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认为没有阶级性的,可能也不认为任何词条的选取、注释、举例都没有倾向性。只是掌握的分寸上有距离,对一些具体条目的处理有不同的认识。

至于主张“地主”就注为“土地的主人”,“妓女”就注为“卖淫的女人”,我看这类意见是少数。正如主张“抗旱”必须要注为“……只有解放后才能进行抗旱”一样,也是少数。

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也要对具体条目进行探讨,把条目分成若干类型,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找出每类条目的恰当的处理办法。

《现汉》在这方面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有的条目,反复改写过好多次。虽然交了学费,但还是没有找到恰当的处理办法。这些年来对《现汉》在这方面的批评,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是批评它是“客观主义”,没有突出政治,一是批评它是“穿靴戴帽”,强加进去了许多政治内容。这两种情形可能是兼而有之,或者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认识,也反映了对词典的不同要求。我们对这些问题要继续探讨,求得合乎实际的解决。

语文性词典是供查考字形、读音、意义和用法的工具书,一部语文性词典要提供这些方面的正确知识,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就失去了作为一部语文性词典存在的价值。所以有人说要编写一部“不像词典的词典”,这是不行的,不能把语文性词典编写成政治教

科书。但词典的注释、举例也得体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体现党的方针政策的精神,不能背道而驰。比如有的词典,“罢工”注为“工人为了表示某种抗议、实现某种要求而联合起来集体停止劳动。是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重要斗争方式。有经济罢工、政治罢工、总罢工等”。这样注释,不符合我国宪法精神。如果要交代“是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重要斗争方式”这句话,前面应该加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句,不能笼统地注为“是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的重要斗争方式”。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发生罢工,这种罢工不能说是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就是这种罢工是对的,也只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其他不合理的事情。如果这种罢工是不对的,那就更不是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了。在语文性词典里,这个注释只留前一句,可能更合适些。再比如反映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里,常出现“太军”、“毛猴子”等词汇,现在的一般词典都没有收,如果收了,也不能只就字面注释。举例也不能只认为语言规范、用法恰当就行了。比如“向”字下举例,可以举“我们要向前看”,不能举“我们要向钱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不能搬到词典里作例。不是语言不规范、用法不恰当,而是内容不健康。

词典不同于报刊,也不能代替时事手册,但语文性词典要收录今天的词汇,就不能脱离今天的现实。比如“土改、斗争、检讨、批判(批判错误观点)、批评(自我批评)、坦白(坦白交代)、控诉(控诉恶霸)”等词或用法,解放前出版的词典没有,解放后出版的词典就收了。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搞得古色古香,像个出土文物,这也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

有些词汇有经典定义,当然要按照经典定义来解释。比如“国家、阶级、剥削”,等等。但有的词汇,经典定义跟实际用法并不完

全相合,过去的词典往往只照经典定义注释,而不管它的实际用法。记得编写《新华字典》时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有的主张要从语言实际出发,赞成照顾实际用法。有的不赞成,怕这样处理,歪曲了经典定义。比如“国,国家”,《新华字典》、《现汉》,“国”都是用“国家”做注的。“国家”注为国家机器的意义,感到只这样注,包括不了“国、国家”在实际语言中的用法,如“岛国”,“多山的国家”等,就加了个注释,“指一个国家的整个区域”。有的不赞成,认为不符合经典定义,有“三要素”之嫌。因此,《新华字典》有的版有这个意义,有的版没有,反复了好几次。《现汉》也是这样,《试印本》有,《试用本》删去了,1978年本又恢复了。“阶级”也只注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意思,而没有照顾“知识阶级”之类的用法。“剥削”注为剥削剩余价值的意义,没有照顾“避免商人中间剥削”的用法。不再多举例了,这类情况还是照顾实际用法较好,像“国家”后来的处理方式。

十一 词典工作人员的培养

现在词典工作人员的队伍太小了,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的工作需要。培养词典工作人员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要千方百计从各种途径来进行培养,在大学设置词典编辑专业,招收青年,开办培训班,提高在职人员的业务水平,等等,都是可行的办法,不拘一格,哪种办法能做到,就采取哪种办法。

在大学设置词典编辑专业,需要别的部门的大力支持,希望词典领导机关,积极跟教育部门协商,争取能早日实现。建立词典专

业,可以有针对性地设置课程,除中文系的基础课外,还要设置词典史、词典资料、词典编写等课程。文字、训诂、语音、音韵、词汇等方面比一般的中文系要多学一些。这样,毕业后就能参加工作,在工作中再继续提高。

招收青年,开办培训班,比较容易做到。培训班的学员,可以先学一些基础课,也学一些业务知识,然后学习和工作结合起来进行,从工作中培养。这样培养的时间虽然长一些,但比较切合工作的要求。给培训班的学员讲课、进行辅导,现有的编写人员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跟当前紧张的工作有矛盾。要从长远看,花这点儿本钱是值得的。

培养在职人员,提高编写人员的业务水平,是当前的迫切任务。磨刀不误砍柴工,现在花费一些时间,将来在工作中是可以得到补偿的。否则,工作质量不高,还得一改再改,花费的时间也不会少。学费总是要交的,迟交不如早交。在职人员的业务学习,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办法。基础比较差的,要补课,缺什么补什么,可以自学,也可以上课。已具备了词典工作的基础知识,但知识面不广的,要多看些书,丰富自己的知识。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要开展一些研究工作,解决工作中的拦路虎,使工作提高一步。

编写词典是苦差事,成年累月地钻在纸堆里,不是做卡片、翻卡片,就是查阅书籍。整天价咬文嚼字,呕心沥血,总是有做不完的工作。工作琐碎繁杂,不但要埋头苦干,多查多记,还得多问多学,广泛地积累知识,十分辛苦。而且工作平平常常,很难一鸣惊人,出人头地。从事词典工作的人,可能终生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这就要求参加词典工作的人,一定要有献身词典事业的决心,甘心情愿地从事这项工作。否则,是做不好词典工作的。

《现代汉语词典》凝聚了 我国一代语文学学术大师的智慧

韩敬体

在1955年10月,我国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提出了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的重大历史性任务。我国当时的语言学家差不多都出席了这次盛会。会上经过深入研讨、论证,确定了尽快编纂出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现代汉语词典的重大课题。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5月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完成这一任务,编写出以确定汉语普通话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语言研究所于1956年7月组建词典编辑室,经批准,将当时我国仅有的专业语文辞书编纂机构新华辞书社和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也合并进词典编辑室,由当时的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任词典编辑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主编,经一年半的搜集资料工作,1958年正式开始编写,1959年10月完成初稿,由郭沫若院长题写书名。为编好这部词典,还组建了由当时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教育家和词典编纂家组成的审订委员会,委员共有丁声树、吕叔湘、陆志韦、王力、魏建功、黎锦熙、

周祖谟、李荣、陆宗达、周定一、叶圣陶、叶籁士、朱文叔、石明远、周浩然等十五位先生，其中前六位都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经过审改、定稿，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排版印制出“试印本”，送有关的高等学校、科研部门四百多个单位广泛征求意见。1961年，丁声树先生调到词典编辑室接任主任和主编，主持《现代汉语》的通读定稿工作，李荣先生协助。经过三年艰苦细致地修改，1965年又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试用本”，送有关部门审看，并再次征求意见。又经过少量改动，1966年初交付出版。由于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而停止了出版工作。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会议以后，《现代汉语》“试用本”在丁声树先生主持下又经过几年修订，1978年底正式出版。这部词典先后由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先生担任主编，前后有八九十位专家参加编写和修订工作，吸取了广大语文学者和语文工作者的意见。它以科学性、规范性、实用性和开拓创新精神将我国的语文规范型词典的编纂工作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在我国的语文教育、语文应用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现代汉语词典》突出的学术贡献、理论创新，受到社会上的广泛欢迎和重视，使得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它对现代汉语词语的解释已被社会广泛认同、使用，25年来，国内发行量累计达四千多万册，是发行量最大的汉语工具书之一，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都有当地出版发行的版本，它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必备工具书。许多现代汉语方面的词典都程度不等地借鉴了它，它已成为不少外汉双语词典（如《汉英词典》《汉俄词典》等）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双语词典（如《汉蒙词典》《汉维词典》《汉语锡伯语词典》等）收词和释义的蓝本。这本词典已是

国内人们使用最多、最重要的一种语文工具书。1993年12月,《现汉》荣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4年又荣获新闻出版署颁发的我国书籍的最高奖国家图书奖。《现汉》1996年修订本1997年荣获了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辞书奖一等奖,2002年还荣获了吴玉章人文科学奖的一等奖。

《现汉》能取得如上所说的成就,正如上面说的,有着各方面的条件,但其中十分重要的是与主编的工作分不开的,是与学术界的支 持分不开的,特别是与词典的审订委员的工作分不开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词典反映了我国当时语文学研究和词典编纂的最高水平,是一代语文学大师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我们不能不对词典的审订委员的学术素养以及他们对词典初稿的审订工作做一简略介绍。

在“试印本”阶段的审订委员中,主编吕叔湘先生是我国学术成就极为卓越的学者,在语言研究、语文教学和语文知识普及工作中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共出版了专著和编译著作二十多种,学术论文和其他类文章六百多篇。这些论著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涉及一般语言学、汉语语法、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写作和文风、词典编纂、古籍整理等众多领域,丰富了我国语言学宝库。他是我国语言学界众望所归的学术泰斗和一代宗师。他主持《现汉》编纂工作四年多,确定了编写细则,完成了“试印本”,为《现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汉》的后期主编丁声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学术研究上以勤奋、广博、严谨、实在、创新而著称。他在音韵、训诂、语法、方言、词典编纂等各门学科中都有很高的造诣,并且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是学术界享有盛名的一代学术大师。他在各

方面的成就,受到了学术界大师们,如胡适、吕叔湘、季羨林、周祖谟、朱德熙、李荣、黎锦熙等的高度赞扬。他主持《现汉》编辑定稿工作十几年,在“试印本”基础上,苦心孤诣地进行修改、完善,将其全部身心都献给了这部词典。

李荣先生协助丁声树先生做《现汉》定稿工作,长达三年时间,为完成“试用本”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也是学问广博的学术大师。他在音韵研究、方言研究、语法研究、词典编纂等各个门类都有很突出的学术建树,他对促进我国语言学事业特别是方言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现汉》审订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大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王力、魏建功、黎锦熙、陆宗达、周祖谟等先生都是终生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著名教授。王力对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历史和现状研究精深,创获甚多,在汉语史、词源学、诗律学方面有突出贡献。魏建功在音韵学和音韵史的研究上卓有成就,对汉语规范、辞书编纂以及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有显著贡献,闻名中外的《新华字典》就是由他主编的。黎锦熙对汉语语法研究有较大成就,在汉字改革和词典编纂方面也有显著成绩,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编辑的《国语辞典》就是在他主持下完成的。陆宗达在音韵、训诂、文字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上都很有贡献,特别在文字和训诂研究方面的成就更为学界称道。周祖谟致力于汉语音韵、训诂和文字研究,对古籍整理和版本目录学也很有贡献。陆志韦从事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语言学的汉语音韵和语法研究上较为突出。周定一是知识广博的语言学家,对汉语史特别是词汇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叶籁士是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对我国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行汉语拼音方

案有所贡献。叶圣陶是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和出版家,在汉语的教学和应用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朱文叔是有成就的出版编辑专家,对我国的语文教育做出了贡献。石明远和周浩然先生,是长期经受革命斗争锻炼的党的科研部门的负责人,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有一定的造诣,石明远先生还著有汉语方言研究方面的专著。季羨林先生和朱德熙先生,都是我国著名的学者,语言学大师,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他们也对《现汉》的编写和审订工作做出了贡献。

正是主编和审订委员们在语言学上的深厚造诣,在《现汉》的编写、审订上齐心把关,才保证了词典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我们在此略举他们对一些词语的审订事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

一、对有些字词是否收录进行斟酌。比如:

怵 王力先生认为,这个字太文,应不收,至少也应注个“书”字。

夫 初稿只注阴平音。魏建功认为:“古代虚词应读阳平”。叶圣陶意见:“文言虚词的‘夫’,我读阳平”。丁声树先生意见:“读阳平,助词用法似应补收”。吕叔湘先生认为:“只收现代词汇,助词用法可否不增。”“试印本”没有收阳平音,不收古汉语用法。“试用本”补收了阳平音,古汉语的指示词、代词和助词用法。

二、对释义内容进行推敲。比如:

伏 ①原注“脸朝下;趴:……”魏建功先生认为“单是脸朝下,不是伏”,后改为“身体向前靠在东西上;趴:……”。

【对仗】原注“(律诗、骈文等)按照字的平仄和虚实做成对偶的语句”,叶圣陶先生将“字的平仄和虚实”改为“字音的平

仄和字义的虚实”。

【夫妻店】原注“旧时夫妻二人自家经营不雇店员的小商店”，李荣先生意见删去“自家”，“试印本”吸收这一意见。“试用本”丁声树先生定稿又改为“由夫妻两人经营的不用店员的小商店”。1978年版，丁先生又定稿为“由夫妻两人经营的、一般不用店员的小店”。

【佛教】原注有“主张一切皆空，众生平等，反对婆罗门教徒的种姓制度。……在亚洲其他国家如锡兰、缅甸、柬埔寨、尼泊尔等国家广泛流传”的话，季羨林先生意见，“主张三条不确切，不如改以历史发展说”，又说“尼泊尔非佛教，此外尚有泰、日、中、蒙、朝、越等，不如不提”，改为“亚洲许多国家”。“试用本”删去了“主张……”的话，并且吸收季先生意见，将后面的话改为“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

符 ④试印本原注“道士所画用来驱使鬼神的东西(迷信)”。魏建功先生意见：用括注“(迷信)”交代不清，画符已成为一种宗教“法术”，比迷信的意义更加扩大了，它对迷信的人有很大的魔力。周祖谟先生意见，注应改为“道士所画用来驱使鬼神、给人治病除灾的形体或线条”。“试用本”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改为“道士所画用来驱使鬼神、给人带来祸福的图形或线条，迷信的人认为它有很大的魔力”。

三、对词语运用语境、限制进行考虑。比如：

【断断】【断乎】原注“绝对”，吕叔湘先生在释义后加括注“(只用于否定式)”。

【浮标】原注“设置在海面上的标志……”，陆志韦先生意见“不一定在海面上”。后改为“在水面上”。

四、对释义文字字斟句酌。比如：

【断口】原注“断口有不同的形状，可以帮助鉴定矿物的种类”，叶圣陶、朱文叔先生将“帮助”改为“利用来”。

【断垄】原来注文的最后一句是“以致形成垄的中断现象”，据叶圣陶、朱文叔的意见改为“这种现象叫断垄”。

【伏天】原注“从夏至后第三个庚日起至立秋后第一个庚日”，石明远先生提出：没有点历法知识的人看了一点也不懂，请注意这类条目的编法。后改为“指三伏时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参考〔三伏〕”。

【服膺】黎锦熙先生意见：注文后加括注“(膺：胸)”。

五、对词语释义的增加、深化和完善。比如：

为 作为副词附加成分的用法，以往的辞书都没有注释出来，直到1977年《现汉》正式出版前，丁声树先生经过考虑才给“为”加上一个字头“为⁴”，并注出两个义项：①附于某些单音形容词后，构成表示程度、范围的副词：大为高兴|广为传播|深为感动。②附于某些表示程度的单音副词后，加强语气：极为重要|甚为便利|颇为可观|尤为出色。

【差点儿】的副词意义过去的词典释义十分简略。《国语辞典》注为“几乎”，而“几乎”也注得很简略。朱德熙先生对这个词进行深入研究，1959年发表《说“差一点儿”》的文章。《现汉》吸收了朱先生的研究成果，“差点儿”注释为：“表示某种事情接近实现或勉强实现。如果是说话的人不希望实现的事情，说‘差点儿’或‘差点儿没’都是指事情接近实现而没有实现。……如果是说话的人希望实现的事情，‘差点儿’是惋惜它未能实现，‘差点儿没’是庆幸它终于勉强实现了。……也说差

一点儿。”比起过去词典的释义，显得深入、准确。

垫 基本义以往辞书的注释简略而不准确，《国语辞典》注为“衬托之使厚而高者”，吕叔湘先生详加考察，细密分辨。《现汉》试印本注为：“①在物件底下放点东西，使加高，加厚或平正：……②在物件上面铺点东西，使加高，加厚或平正：……③在物件上面或底下放点东西，起隔离作用：……”。每个义项都举了三个例子。释义分辨详细而例句丰富。丁声树先生提出意见说，这样编很好，但是类似“垫”的字全书不下三五百个，不能都这么分辨，不如笼统些，也不要分三个义项，这样类似条目就比较办好。吕先生很赞成这一意见。后来《现汉》各种版本都改注为“用东西支、铺或衬，使加高、加厚或平正，或起隔离作用”，变得简洁明了。吕先生1994年夏天，在一个词典编纂讨论会上，他还向与会者介绍此事，要大家注意同类词语释义的统一性和平衡性。

正是由吕叔湘、丁声树两位先生的先后主持，有一批具有顶尖水平的一代语文大家进行审订，贡献才智，词典的整体水平才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收词、注音、释义、用例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开创性的成就。

《现汉》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规范词典，正像吕叔湘先生所说，“这类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在很多方面都是在做创新工作。《现汉》收词方面标准明确，它以现代汉语普通话词语为主体，酌收少部分比较常见的方言词语和文言词语；以语文词语为主，兼收专科词语。在建立词目方面的一项创新，是同形同音而字义、词义无关的条目分立字头或词条，将同形语素和词语与多义语素和词语区别开来。在字头、条目的规

范处理方面,为贯彻或确定语言文字规范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对于繁体字、异体字、同形字、同形词、异形词、离合词等等,词典的处理为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做出了努力。注音方面,词典贯彻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规范,确定了一些字词的读音。多音词注意以连写为原则,起到了区别词与词组的作用。离合词注音中间用双斜线间隔,包含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对轻声字、变读音、儿化音等也都做了适当标示,充分体现为推广普通话服务的宗旨。释义方面,采用加括注的方式增强其准确性,减少偏离词义重心的现象。释文繁简适宜,注意符合被释词的词性。释义注意语义的层次性,用词的封闭性。释义后加“注意”栏目交代该词语在语音、语法、语用方面的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收词、释义、举例注意所用词语的规范性等等,都是以往汉语词典没有涉及过的问题。即使在体例方面,比如外来词和离合词的标注,同形词和异形词的标示,引申和比喻用法用例的标示等等,也有其独创性。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关键,也是辞书编纂事业前进的关键,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走在同时代同类事业的前列,才能促进事业的发展。

正是有吕叔湘、丁声树这样的学术大师做主编,有王力、魏建功、陆志韦、黎锦熙、陆宗达、周祖谟、李荣、叶圣陶、叶籁士、周定一、朱文叔、石明远等一批极有水平的专家、学者做审订委员,荟萃他们的智慧,《现汉》才有了成功的保证,才能够在科学性、权威性和实用性方面达到空前的高度。有高水平的主编,有高水平的专家审订把关,才能编辑出高水平的辞书,这的确是对我们辞书编辑工作的重要启示,也是我们应该记取的宝贵经验。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杂识*

孙 德 宣

过去有人认为编字典或词典很简单,不过搜集一些现成的字书、韵书、词典,剪刀浆糊,剪剪贴贴,再抄撮一些其他的书面材料,东拼西凑,整齐排比而已。这完全是不知个中甘苦的外行话。用那种方式编字典、词典,是旧时书贾、落拓文人投机牟利的行径,谈不到有什么价值。倘若真正对读者负责,编好这种工具书可不那么容易。

一部综合性的语文词典,所收词语包括通语、方言、古语、百科常用词汇等,牵涉的知识面非常广泛,问题错综复杂。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很难独自编好。必须集中许多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人,建立严密的组织,积累丰富的资料,群策群力,惨淡经营,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才能保证质量,克期完稿。正因为中型或大型的字典、词典多由集体编写,所以对编者更应该有严格的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必须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按照规定的编写方针,逐步确立完善的体例。编写中对选词、注音、释义、举例等方面要一一审慎琢磨,反复推敲;对每个词语要重视调查研究、科学分析,不轻凭旧说或臆断;使这部字典、词典虽然出于众手,而能颀若画一,井然有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0年第1期。

条,取舍精当,要言不烦。即使做不到处处无懈可击,也不至于纰缪迭出,贻误方来。这样编字典、词典,才算得对读者负责,才算对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我国解放后集体编写的第一部汉语中型词典,以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为编纂方针。从1956年下半年合并原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及新华辞书社部分人员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词典编辑室,制定规划,商榷体例,次年大规模地搜集并整理资料。1958年2月开始试编,6月起正式编写,次年年底完成初稿,陆续印出油印稿,征求意见。1960年出版《试印本》,广泛征求意见。1965年出版《试用本》,送请有关方面审阅。1973年用《试用本》纸型出版,增加印数,内部发行。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词典修订工作陷于停顿,中遭“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停止内部发行。粉碎“四人帮”以后,《现汉》才获得新生,重加修订,1978年12月出版第一版,正式发行。

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漫长岁月,《现汉》的确走了一段不寻常的道路。按理说,应该很好地总结经验,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为今后进一步修订《现汉》,编写新型语文词典,建立以汉语特点为基础的词典学探索途径。但是我们的人力有限,理论水平很低,工作中谈不到有什么成熟的经验,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对如何进一步修订《现汉》,如何编写新型语文词典,目前还提不出一整套可奉为圭臬的纲领。下面只谈谈个人在参加编写和修订《现汉》过程中对编纂语文词典的一点体会。

一 词典的科学性

词典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注释及编纂方法等方面。综合性的语文词典不同于专科词典和百科全书,每条的注释都必须准确简明通俗,不能洋洋洒洒,下笔不休。注释的方式可以不拘一格,一般是以同义的多音词注单音词;以普通话的词注方言词或古词,或用同义的科学上定名的多音词注口语词或方言词;也可以用同义的单音词注单音词或多音词;用同义的多音词注多音词。但是有一个条件,即用乙词注甲词,又用丙词注乙词,其中必有一个同义词(或近义词)具有下定义的性质,否则一味辗转互训,不仅臃肿累赘,又容易使人茫然不得要领,转了一圈儿,又回到原处,亦非善策。

《同音字典》(1956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是个小字典,它采取简单的注法,如“跑”的第一义项注为“‘跑路’‘赛跑’的‘跑’”,“走”的第一义项注为“走路的‘走’”。这样注法对会说普通话的人不成问题,广东有的方言说“走”等于说“跑”,就会发生误会。《现汉》对这类基本词汇多用下定义的方式。例如:

跑 pǎo ①两只脚或四条腿迅速前进:赛~|~圈儿|鹿~得很快◇火车在飞~。

走 zǒu ①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行~|~路|马不~了◇这条船一个钟头能~三十里。

拉 lā ①用力使朝自己所在的方向或跟着自己移动:~锯|~纤|你把车~过来。

推 tuī ①向外用力使物体或物体的某一部分顺着用力

的方向移动：～车|～磨|～倒|我～了他一把。

越是日常生活中极普通的词儿，下定义越是费斟酌，而且看起来很啰唆。有人就指责这种注法也是烦琐哲学。我们认为词典里把每个词的概念都讲清楚，符合科学的要求，这对推广普通话、进行汉语教学有好处，难道是错误吗？

《现汉》对尽量减少互训一事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

抢(掙)qiǎng ①抢夺：～球|他把书～走了。②抢先；争先：～步上前|大家都～着参加义务劳动。

[抢夺] qiǎngduó 用强力把别人的东西夺过来。

[抢先] qiǎng//xiān (～儿)赶在别人前头；争先：青年人热情高，干什么活儿都爱～儿。

[争先] zhēngxiān 争着赶到别人前头：人人跃进，个个～|大家～发言。

夺(奪)duó ①强取；抢：掠～|～取◇强词～理。②争先取到：～高产|～红旗。……

吞 tūn ①不嚼或不细嚼，整个儿地或成块地咽下去：囫囵～枣|狼～虎咽|把丸药～下去。

[吞食] tūnshí 吞①：大鱼～小鱼。

[迁延] qiānyán 拖延：～时日。

[拖延] tuōyán 把时间延长，不迅速办理：～时日|期限快到，不能再～了。

[延长] yáncháng 向长的方面发展：路线～一百二十里|会议～了三天。

但《现汉》虽然经过多次修订，不少条目仍有释义不确、两两互训及重复等严重缺点。例如：

肢 zhī 四肢：～体|上～和下～。

[法官] fǎguān 旧时称司法和审判人员。

[纯熟] chúnshú 很熟练：技术～。

[熟练] shúliàn 技术纯熟。

驱 qū ③赶走：～逐|～除|～虫剂。

赶 gǎn ④驱逐：～苍蝇。

[赶走] gǎnzǒu 驱逐使离开。

[驱逐] qūzhú 赶走：～出境。

逃(逃) táo ①逃跑；逃走：～匿|～脱。

[逃跑] táopǎo 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

[逃走] táozǒu 逃跑。

“肢”用“四肢”作注不确，应注为：“指人的胳膊和腿或某些动物的腿。”“法官”这个词现在还用，注中不必加“旧时”。“纯熟”和“熟练”，“驱”“赶”“驱逐”和“赶走”循环互训。“逃走”和“逃跑”同义，“逃”字下并用“逃跑”和“逃走”作注，重复。再版时都须改正。

注明词的感情色彩和用法，也属于词典科学性的一方面。不仅虚词需要说明用法，有些实词也需要说明使用范围。《现汉》中例如：

[把持] bǎchí ①独占位置、权利等，不让别人参与(含贬义)。

[滑溜] huá·liú 〈口〉光滑(含喜爱意)：缎子被面摸着挺～。

[老婆_儿] lǎopó_{er} 年老的妇女(含亲热意)。

[老婆子] lǎopó·zi ①年老的妇女(含厌恶意)。

[等候] děnghòu 等待(多用于具体的对象):~消息|~命令。

[环抱] huánbào 围绕(多用于自然景物):群山~。

[充足] chōngzú 多到能满足需要(多用于比较具体的事物):光线~|经费~。

[好意思] hǎoyì·si 不害羞;不怕难为情(多用在反诘句中):做了这件事,亏他还~说呢!

至于义项的排列,一般语文词典可把基本义、通用义排列在前,喻义、引申义、方言义、古义排列在后。成语的意思前后不同的,应该先说明原来的意思,再说明后起的意思。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历史性大词典应该严格按照词义演变的先后排列。

二 词典的统一性及汉语规范化

一部词典是一个整体,有严密的组织,妥善的安排,绝不是一盘散沙,杂乱无章的。在选词、定形、注音、释义、举例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体例和章法。这就是它的统一性。

如在选词方面,有些成套或相关的词,收了甲词,就得收乙词,不可偏废。像二十四节气(“立春”“雨水”等),十二时(“子时”“丑时”等),四声(“平声”“上声”等),四呼(“开口呼”“齐齿呼”等)各词,如果收的话,就该都收,缺一不可(但有例外,如收“星期”“星期日(天)”“礼拜”“礼拜天(日)”,“星期一”“星期二”“礼拜一”“礼拜二”等分别在“星期”“礼拜”条注中交代,不分列条目)。收了“北欧、单杠、淡季、淡月、大乘、上乘、上议院、文官”,就得收“南欧、东欧、西欧、中欧、双杠、高低杠、旺季、旺月、小乘、下乘、下议院、武

官”。

一般语词及百科条目注释中出现的术语、名词等,原则上应该列为条目(专名除外)。如纸的类名繁多,词典不能尽收,《现汉》收了“毛太纸”并且注为:“类似毛边纸而稍薄的纸,略带黑色,多产于福建”,人家要问什么是“毛边纸”,“毛边纸”就应该列为条目。但一般见词明义的词儿,虽然见于注释,也可以不收。如“茶具”条注:“喝茶的用具,如茶壶、茶杯等”。“茶壶、茶杯”可以不收。有些词虽然可以见词明义,但是有喻义,而且喻义用得广泛,如“草包、饭桶、后门、炮筒子”之类,就应该列为条目。

《现汉》在收词方面有不少问题。有人就不同意收“笔帽、笔心、手背、手心”等不须查考的词和“白不吡咧、黑不溜秋”等方言词。这个问题可以展开讨论。《现汉》收词确有顾此失彼、造成疏漏的现象。例如《试用本》收了“自由、博爱”,漏收“平等”。1978年印本收了“必然王国”并且附注:“参看‘自由王国’”,但“自由王国”漏收。收了“五律、七律、七绝”,但“五绝”漏收。

现下汉语还有严重的方言分歧,不仅表现在语音方面,一种东西的叫名也很不统一。写成汉字,同一个词又有各种写法。例如“玉蜀黍”有“玉米、棒头(稭头)、棒子、包谷(苞谷)、包米(苞米)、老玉米”等名称,甘薯有“地瓜、红薯、白薯、芋头、红苕(sháo)、番薯”等名称,马铃薯有“洋芋、土豆儿、山药蛋”等名称,高粱有“蜀黍、稻(tǎo)黍”等名称,煤油有“火油、洋油”等名称,火柴有“取灯儿、洋火、自来火”等名称,太阳有“日头、老爷儿”等名称。为了实现汉语规范化,必须统一名词。词典里把详细注释放在北方话通用名词或科学定名(如“玉米、甘薯、马铃薯、高粱、煤油、火柴、太阳”等)下面,有暗示用这些词来统一叫名的意思(至少在书面上)。把一些

常见的方言异名也收列条目,作为见条,并不是提倡用方言词,而是为了便利方言区的人参照对比,学习普通话。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只能因势利导,不能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取消方言。

汉语词形上分歧也很大。gē·da 这个词,就有“疙瘩、疙疸、圪塔、圪塔、屹塔、疙疸、咯哒、咯嗒”等八种写法。《现汉》以“疙瘩”为主,下面详列词义,异形词下面注明“同‘疙瘩’”,并写出它的另外意思。有些异形同词的词儿在词典里以并列的形式出现,把现时最通用的排在前面,如“耿直、梗直、鲠直”。有时在词条注释后面说明也作某词形。这里面都有规范的意思。

编者注释用词应该严格按照所收条目的词形,以免分歧。《现汉》“板实 bǎn·shi”条第二义是“(书皮、衣物等)平整挺刮”,而 t 母正条作“挺括 tǐng·guā”,显得不一致。在“挺括”词条附上“挺刮”,问题就解决了。

词素可前后颠倒的词儿,如“募化、化募”、“痛苦、苦痛”、“介绍、绍介”之类,应该注释放在比较通用、作为正条的词儿下面,另条即以正条的词儿作注,如“介绍”条下说明它的含意,“绍介”条即用“介绍”作注。这种注法也含有规范的意思。

反义词在注释中应互相照应。《现汉》中例如:

大 dà ①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跟“小”相对):房子~……。

小 xiǎo ①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不及一般的或不及比较的对象(跟“大”相对):~河……。

顺 shùn ①向着同一方向(跟“逆”相对):……。

逆 nì ①方向相反(跟“顺”相对):……。

在注释反义词、同义词时,最好把同组的同义词、反义词放在

一块儿来编写,这样便于统一注释,便于互相照应。但编《现汉》时,只分科编写,科技、哲学社会科学各科的词各指定专人负责编写,语文词条只虚词及语言学名词各有人负责编写,一般词条只按音序分编,不再分工。后来发现注释内容及格式参差不齐,才大搞平衡,对同义词、反义词及各科的词条都详细检查一遍,统一注法,但遗留的问题还很多,特别是对同义词(近义词)的分析处理,做得很差。有些词收了科技义,漏了语文义;反之,收了语文义,漏了科技义。各科语词注释的繁简也很不一致。《试用本》及1978年印本“阴性”条都有两个义项:

① 诊断疾病时进行某种试验或化验结果的表示方法。说明体内没有某种病原体存在或对某种药物没有过敏反应,例如注射结核菌素后并无红肿等反应时叫做结核菌素试验阴性。

② 某些语言里名词(以及代词、形容词)分别阴性、阳性,或阴性、阳性、中性。参看“性”。

但查“阳性”条,却只有语言学上的义项,漏收医学义项。直到1979年春季在编《现代汉语小词典》时才发现。问题出于对词典的统一性认识不足,各搞一摊儿,工作上不协调。

《现汉》的体例,口语中用的词标〈口〉,方言词标〈方〉。但“酸不溜丢,黑不溜秋、白不吡咧”都标〈方〉,“红不棱登、花不棱登”却标〈口〉,显然不一致。

词典注释中出现的某个词具有特别意义时,词典里就该收录这个词的特别意义,不收就是缺点,跟词典的统一性相矛盾。例如“内乱”一词,《现汉》注为:“指国内的叛乱或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辞海》(修订稿)语词分册“内乱”条注释跟《现汉》大体相近。

《现汉》“十恶不赦”条有个括注：“十恶：旧指不可赦免的十种大罪名，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现在借指重大的罪行”。《辞海》（修订稿）语词分册“十恶不赦”条注中也列举了“十恶”十种罪名。“十恶”中的“内乱”指什么呢？查旧《辞海》“内乱”条第二义：“谓失婚姻之正而乱于内也。《周礼·夏官·大司马》：‘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疏》：‘内乱谓家内，若卫宣公上烝父妾、下纳子妻等是也’”（下略）。此正“十恶”中“内乱”之义。《现汉》及《辞海》（修订稿）语词分册都漏收此义。《现汉》不详列古义，还有可说（或在“十恶不赦”条注“内乱”）；《辞海》旧注收此义，新注反而删掉，与“十恶不赦”条注释不相照应，就说不过去了。《辞海》1979年版合订本补入此义，就对了。

三 词典的思想性

词典的思想性就是体现在词典条目注释中的政治倾向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文化领域中的工具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怎样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如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词典的编写工作，使编出的词典符合科学的要求、人民的需要，而是生搬硬套革命导师的理论，滥用革命的词句装潢门面，以为只要注释中贴上阶级分析的标签，就可以获得安全系数，完成出版任务，那就大错特错了。

形而上学极左思潮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才形成的，至少在五十年代后期就有苗头。所谓宁左勿右，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这种说法早就有了。极左的一股风吹到词典领域里，编者为了避免犯政治上的错误，就在某些条目的注释里尽

量套上阶级分析的模式。一些政治性很强的语词如“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等，列为重点条目，历经多次讨论修订，报请审批，莫衷一是。词典之所以迟迟不能出版，这是重要原因之一。请看1960年《现汉》(试印本)几个词条的注解：

[警察] jǐngchá 国家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的武装力量。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的警察，实际上是统治阶级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警察是保护社会主义秩序，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商业] shāngyè 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营利为目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

[银行] yínháng 一种金融机构，它的性质和作用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银行是经营货币资本、充当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中间媒介的资本主义企业，吸收一切货币资本供资本家支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银行是国家的信用机关和财政机关，它有计划地动员国民经济中的闲置资金来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办理国民经济中的结算和支付，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货币监督，并调节货币流通。

[政治] zhèngzhì 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包括一切阶级对国家政权的关系，是各阶级的最主要的切身利益的集中表现。资产阶级的政治以压迫劳动人民，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为目的；无产阶级的政治以推翻剥削阶级，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建成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目的。

照这种模式编下去，“军队、士兵、旅馆、美术”等等，都得分别说明无产阶级如何如何，资产阶级如何如何，势必弄得全书恶性膨

胀,增加读者的负担,浪费他们的精力。但事实上这部词典这类条目没有都这样注,也不可能都这样注。那么我们只能说上列条目的注法不过是装潢门面罢了。1965年《现汉》(试用本)及1978年本《现汉》上列条目的注释已经改过,但1978年本仍有一些条目基本上保持原状。例如:

[博爱] bó'ài 对人类普遍的爱。是剥削阶级用来掩盖阶级矛盾、麻痹被剥削阶级的斗争意志的口号。

[人性] rénxìng 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表现为人的阶级性。

[自由] zìyóu 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随自己意志活动的权利。在阶级社会里,被压迫阶级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认为,语文词典是供读者查阅、明了字音词义的工具书,它的注释不能像专门巨著或百科全书那样曲折详尽,巨细无遗。它不是法令文件、标语口号的摘编,不能代替宣传手册和政治教科书。注释的繁简固然要根据词条的内容和词典规模的大小而有所不同,但是少掺水分,明快利落,不蔓不枝,是一切词典应具有的文风。有的同志主张在“爱”“恨”条的注释中都要加上“在阶级社会里,爱(恨)是有阶级性的”一句,在“刑场”的注释“处决犯人的地方”后面,要加上“革命烈士就义的地方”一句,有必要吗?这类注法未免过于低估读者的能力。把这类注法充类至尽,不知词典要扩大多少篇幅。编词典要惜墨如金哪!

词典的注释要不要有批判的精神呢?我们说,要有批判的精神,但要掌握分寸,不可滥用批判。像对待有关宗教信仰的条目,关系国内外各民族,有政治影响,不可率尔从事。“神”“神权”等条注释前加“迷信的人指”或“迷信的人认为”即可,不必辞费。但对

“天主、上帝、真主、主教、神甫、牧师、阿訇、圣经、可兰经、佛经”等条就只能作客观的注释，什么字眼儿都不要加。

四 词典的稳定性

词典在收词、注音、释义等方面应该反映时代的面貌。编者对不断产生的新词新义，要随时搜集，记录下来。但是词典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对新词新义要观察一个时期，看它是否站得住，是否持续地、普遍地用起来。“文化大革命”中昙花一现的所谓“管卡压”“走资派”“文攻武卫”等语词，应该排除不收。紧跟形势，见词就收，局面一变，就得去掉，词典不比报刊，不能随时改动。

《现汉》在注音方面主要根据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编的《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1963年10月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仅个别的字音有更动。现在北京地区很多人把“酵母(jiàomǔ)”，读为 xiàomǔ，“荨麻疹(qiánmázhěn)”读为 xúnmázhěn，还不能说已经约定俗成，词典里还是照《审音总表初稿》定的音来注音。过去词典里显然注错的音，如佛教“大乘”“小乘”的“乘(chéng)”，《国语辞典》读 shèng；“睥睨(pìnì)”的“睥”，《国音辞典》、《审音总表初稿》、《现汉》(试用本)读 bì，都径加改正。

近年来北京市中小学生常说“盖了”“他画得真盖”，这个“盖”表示“顶好”“好极了”的意思。由于通行面不广，也不稳定，词典里暂不收此义。

总之，语文词典作为语文典范的工具书，在收词、注音、释义等方面都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既不可沿袭过去的错误，以讹传讹，也不可盲目地赶浪潮，把一时还不固定的东西硬塞到词典里。

五 词典的局限性

一部综合性语文词典总要反映当代的语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的科研水平。它所反映的语言现象不可能超出截至当代的范围。它不可能超出时代的科研水平,特别是语言学研究的水平。它不能把各类词典如用法词典、同义词词典、方言词典、各专科词典的作用都备于一身。这就是语文词典的局限性。

但是科学是要发展的,编词典的工作总不会停滞不前。我们既不要满足于现状,也不要求全责备于任何一部语文词典,希望它解决所有的语文问题。要求一部词典尽善尽美而后出版,那就永远没有词典。

《现汉》编者原来设想有两项工作需要作而没有作到。一项工作是标注词类。曾试行标注过,后来觉得在汉语语法研究的现有情况下,普遍标起来会旷日持久,影响本书的出版,决定暂时只标注虚词词类,标注实词词类,留待再版时另议。另一项工作是标明单字或各个字义在现代汉语里的地位——是词还是词素,或是具有某种特殊身分。在草稿里,编者曾经用义项数码上括圆框或方框的形式来区别(括圆框的表示是词,括方框的表示是词素或其他),后来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不得不暂时放弃,也留待将来去解决。

对我们来说,《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只是词典领域里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词典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有许多任务等待完成。让我们加紧语音、语法、词汇、方言及词典理论的研究,为编写新型的规范的汉语词典而贡献力量吧!

批判“四人帮”扼杀 《现代汉语词典》的罪行*

韩敬体

编者按：姚文元直接插手扼杀《现代汉语词典》的事件，是“四人帮”疯狂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全盘否定建国以来语文工作成就的一桩罪证，是他们阴谋篡党夺权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影响极坏，流毒甚广。本文揭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和卑劣伎俩，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对于“四人帮”一伙破坏辞书编纂工作的罪行，必须彻底揭发，深入批判。被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必须予以澄清。

1974年春，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亲自出马，对《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大打棍子。他指使“四人帮”心腹干将迟群，组织人马对这部内部发行、征求意见的词典进行公开批判，蓄意将它置于死地。一部内部发行已近一年的普通词典，为什么竟招致“四人帮”那样深的仇恨？“四人帮”为什么那样兴师动众，拼命扼杀这部词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中国语文》1978年第1期，发表前曾经过词典编辑室全体人员讨论和丁声树先生修改，发表时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者按”为《中国语文》编辑部所加。此次选收略加改动。

典？这个长期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现在内幕已经揭开，真相大白了。这一事件，原来是“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

《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是我室于1958年开始编写的，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经过较大修改，1965年又印出“试用本”送审稿，准备修订以后出版发行。1972年，在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指示下，曾计划修订这部词典。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并应广大读者的急需，决定先利用“试用本”原纸型印一定数量，于1973年5月内部发行。我们在词典前面加了一个“说明”，申明这次印行的目的，并指出它是“文化大革命”前编写的，“不论是政治思想性方面，还是科学性方面，都会存在很多错误和缺点。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多多提出批评意见，尽快寄给我们，以便参照修订成书，正式印行”。广大读者十分支持我们的修订工作，不断寄来信件，从各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热切希望能够尽快修订出版，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词书的迫切需要。

“四人帮”大搞愚民政策，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词书的状况漠不关心。1973年4月，《现代汉语词典》内部发行之前，语言研究所曾给当时主管文教，宣传工作的张春桥、姚文元各送去一部《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并附了信件，请他们提出意见。可是，他们将送去的词典束之高阁，长期置之不理。事情过去将近一年，到了1974年春，“四人帮”却一反常态，对这部词典发生了莫大兴趣，竟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一棍子将这部词典打入冷宫。3月12日，姚文元在专为他提供出版动态的一种内部刊物上，抓住一

篇批判《现代汉语词典》的文章，下了一道批示，胡说什么“此件反映的情况是很突出的”，指名要迟群“阅后转科教组”处理。姚文元越过当时科教组的主要负责同志，竟然直接批示给“四人帮”安插在科教组的迟群，让迟群再转到科教组，这种做法正是耍阴谋、搞帮派的突出表现。迟群接令后，立即在科教组贯彻姚文元的旨意，定下所谓“复辟回潮”的调子，要有关方面立即行动，对《现代汉语词典》进行大张旗鼓的“批判”。他窜到北京大学，指着《现代汉语词典》，要一个搞材料的班子组织“批判”，但由于该班子另有“重任”，就又指使梁效组织人马，搜寻这部词典的“问题”，炮制“批判”文章。迟群还将科教组文件以及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和语言研究所上报的关于词典编辑、出版情况的材料调给梁效，供他们使用。迟群又亲自督促《教育革命通讯》编辑部组织和发表批判这部词典的文章。经过“四人帮”及其干将的紧张布置，以梁效组织的文章（《评〈现代汉语词典〉》（重印本），《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三期）打头阵，几篇批判文章便在公开发行、销售量很大的刊物上抛出，对这部内部发行的词典大肆围剿，制造了一起喧嚣一时的《现代汉语词典》事件。

二

“四人帮”为什么要对《现代汉语词典》大打出手，非把它置于死地不可呢？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卷 512 页）“四人帮”扼杀这部词典绝不是孤立的事件。我们只要看一看这部词典编写出版的有关情况，查一查妄

图扼杀它的历史背景，“四人帮”包藏的祸心就昭然若揭了。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10月，在国务院领导下召开的全国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为了帮助普通话教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遵照国务院指示，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跟语言研究所其他研究组的很多同志一起，于1958年开始编写初稿；审订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和各大、中学校以及全国各有关部门共三百多个单位的大力协助。本定1966年付印，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中止。1972年，出版部门鉴于社会上的迫切需要，提出要我们尽快修订这部词典的建议，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批准。领导同志支持我们的修订工作，明确指示我们要根据《新华字典》的修订经验进行工作。而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正是在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周总理对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词典一事，十分关心，对词书工作极为重视，单是对《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就有一系列的指示，曾多次指示要小改快出，以满足社会上的迫切需要。《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出版的准备工作，正是在周总理对《新华字典》指示精神指导下进行的。

对于上述情况，“四人帮”是很清楚的。他们不早不晚，选择在1974年春天对这部词典下毒手，是早有预谋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里指出：“一九七四年一月，‘四人帮’背着毛主席，也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搞突然袭击，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及时地批评‘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并为纠正他们的错误向全党批发了文件。

‘四人帮’抗拒毛主席的批评，不批林，假批孔，猖狂地大搞批‘周公’，批所谓‘现代大儒’，批所谓‘孔老二徒子徒孙’，在我们的军队里大搞什么‘放火烧荒’，矛头是针对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针对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那时，“四人帮”在台上，到处煽风点火，兴风作浪，搞了一系列阴谋活动，他们那阵子的丑恶表演，我们至今记忆犹新。1月24、25日，他们私自召开所谓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四人帮”大放厥词，恶毒攻击周总理、叶副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2月10日，江青在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制造了耸人听闻的“蜗牛事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负责同志。3月10日，江青给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写信，扬言要揪出科学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通过反对科学院的、同时又是国务院科教组的负责同志达到其大反周总理的罪恶目的。仅仅两天之后，3月12日，姚文元对《现代汉语词典》的批示就跟着出笼了。姚文元在他所批的文件上，特别在“科学院”几个字下面划几道黑线，要迟群亲自处理。很明显，姚文元和江青施展同一个阴险手法，前呼后应、紧密配合，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射出了一支又一支毒箭。姚文元在写批示时，唯恐其爪牙不能全部领会他的险恶用心，就在所批文件的“应广大读者的急需”一语下面，着重地画了一条黑杠，露骨地示意要利用这句话来反对周总理。“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梁效对此心领神会，果然就抓住这句话在“应广大读者的急需”上罗织罪状、大做文章。他们对周总理关于《新华字典》修订出版工作的指示本来非常清楚，却装出批判我们这些词典编写者的架势，异常阴险地说什么“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以‘应广大读者的急需’的名义原版重印，大量发行”。紧接着，他就气势汹汹地质问：“究竟是‘应’哪个阶级‘读者的急需’”，“究竟为哪条路线服

务？”他们指桑骂槐，丧心病狂，影射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真是无耻之极！然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决不是“四人帮”及其爪牙的鬼蜮伎俩所能损害得了的！

三

“四人帮”为了推行其反革命的政治纲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采取的一个卑鄙手法，就是“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他们全盘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特别是把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描绘得漆黑一团，把各条战线的工作全都加以否定。在“四人帮”把持的文教、宣传领域，他们的反党活动尤为猖狂。他们抛出反革命的“两个估计”和“文艺黑线专政”论，严重摧残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四人帮”视《现代汉语词典》为眼中钉，把它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是什么“封资修的大杂烩”，就是要全盘否定十七年来整个词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破坏我国的语文事业。

50年代中期，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指示，党中央、国务院给语文工作提出了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实现汉语规范化三项任务。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国务院交给我们的为语文工作三项任务服务的项目。我们的工作无可讳言地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方针、任务始终是明确的，我们努力照国务院指示去做，工作是有成效的，而且在编纂方法上还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和鼓励。“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硬要否定这一切，把这部词典说成是“在文化教育部门搞

复辟倒退”的产物，把它的出版打成“复辟回潮”的典型事件。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四人帮”的御用工具炮制的文章咒骂这部词典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否定”，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在文化界的尖锐表现”；诬蔑它“为统治阶级开脱”，“替帝国主义掩盖强盗面目”；给它扣上“客观主义”、“尊儒反法”，“反动的政治倾向”、不是“工农兵所需要的社会主义词典，而是封、资、修的大杂烩”等一顶又一顶大帽子。显而易见：“四人帮”决不只是要否定一本普通的词典，而是要否定我们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工作。

“四人帮”及其爪牙，拼命攻击《现代汉语词典》，又找不出一条像样的材料，于是就挖空心思，玩弄一套歪曲篡改、造谣诬蔑、无限上纲之类的卑劣伎俩。从姚文元批示到梁效组织的所谓批判文章，都肆无忌惮地玩弄了这套把戏。

《现代汉语词典》收了“王道”一词，姚文元批道：“日本帝国主义的‘王道乐土’？”在姚文元看来，收了“王道”，就是为帝国主义张目。这样一来，凡是反动派用过的词语就得划为禁区，词典就不能收录，否则就是为帝修反效劳而罪莫大焉。照此逻辑，词典将如何编法？

在姚文元、迟群授意下，梁效组织的文章，攻击这部词典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部词典明明写着“试用本”，它偏要说是“重印本”；明明是内部发行，印数不多，它却硬要说“大量发行”、“销售全国”，明目张胆地歪曲事实，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它给词典安上个“同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唱反调”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词典是“文化大革命”前编写的，1973年5月开始内部发行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什么时候发动的？词典怎么会预料到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而同

运动唱反调？梁效为虎作伥的蛮横霸道嘴脸暴露无遗！

梁效组织的黑文，操着“四人帮”所谓批儒评法的腔调，批判这部词典“尊儒反法”、“大肆颂扬孔孟之道”。词典如何“反法”的呢？它没有谈，其实他根本找不出任何“反法”的词句。在“尊儒”、“颂扬孔孟之道”问题上，它举出一些例子。断言词典“首先吹捧孔老二是‘圣人’，即‘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我们打开词典，“圣人”的注释却是“旧时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如孔子从汉代以后被历代帝王推崇为圣人”。原来为了打棍子，文章竟然删掉我们注释前面“旧时指”三个字，又截掉了后面一句话，于是就在“汉代以后”的“历代帝王”与我们编写者之间画了个等号，指责我们词典是“首先吹捧孔老二是‘圣人’”了。有这种掐头去尾、歪曲篡改的本领，什么罪名捏造不出来呢？“礼”字我们注为“社会生活中由于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为大家共同遵守的仪式”。想不到那篇文章竟在这里狠下功夫。它大谈“礼”就是“奴隶主‘整民’的手段”，“核心是奴隶主贵族专政”，又大谈一通孔老二、林彪如何“克己复礼”，于是就批判词典“完全回避了‘礼’的政治内容和阶级实质”，东拉西扯地写了五百来字。试问，古义与今义，特定义与普通义有无区别？我们今天常用“典礼”、“婚礼”、“礼貌”、“礼宾司”、“以礼相待”、“安全礼让”等词语，但凡能正常思维的人，谁能认为其中的“礼”就是“奴隶主贵族专政”？不顾起码的常识而信口雌黄，这不是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又是什么？

四

“四人帮”扼杀《现代汉语词典》，是他们在文教出版部门推行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具体表现。他们妄图把包括词书工作在内的整个舆论阵地严加控制,为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他们疯狂破坏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文化学术领域实行专制独裁。我们编写的词典,没有受他们控制,没有为“帮”制造舆论,所以就受到扼杀。还有很多书刊,因为同样的理由,遭到排挤和打击,并且连编写、出版的有关人员也受到迫害,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四人帮”制造《现代汉语词典》事件,也搞乱了理论,搞乱了思想,给词书工作者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在一段时间内,词书工作中流行着一些奇谈怪论,什么“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词条”啦,“要把封、资、修词汇赶出词典”啦,努力发掘“法家词语”啦,等等,在词典编纂理论、原则以及编写方法诸方面造成极大混乱,严重破坏了词书编写出版工作,流毒极广,不可轻视。

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系词书工作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推倒他们的诬陷不实之词,砸烂精神枷锁,把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我们决心在党中央领导下,把《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得更好,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做出贡献。

词典里如何表现思想性*

何梅岑 莫衡 吴崇康

本文试图就语文性词典中如何表现思想性这一问题加以初步探讨。我们在编辑《现代汉语词典》的过程中,深深感到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现在根据亲身的点滴经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抛砖引玉,引起大家讨论。

一 词典应该具有思想性

我们认为词典应该具有思想性,而且不可能不具有思想性。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词典只是语文工具书,不是政治教科书,谈不到什么思想性。他们拿斯大林的“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论点作根据,来否定词典有体现思想性的必要。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对词典性质认识不足,对斯大林关于语言的理论的理解也不够全面。是的,词典不是政治教科书,斯大林也确实肯定语言是没有阶级性,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

第一,词典作为语文工具书,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①作为文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中国语文》1960年12月号,此次选收有改动。

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词典也就不能例外,必然要为经济基础服务,必然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古今中外的词典都不能超脱这个圈子。

第二,我们不要忘了斯大林在肯定语言没有阶级性的同时还提醒我们:“……人们、个别的社会集团和个别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②语言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是作为交际和斗争的工具而被人们、个别集团和个别阶级使用时,它就不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词典的任务就是指导人们如何去掌握语言这一武器,如何利用这个武器去宣扬自己的文化,传播自己的思想,从而为歌颂自己和攻击敌人服务。我们编写的词典,应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文化思想,颂扬毛泽东时代的新人新事,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的、丑恶的本质。

从上述两点看来,词典必然要具有思想性。它的思想性主要表现在选词、释义、举例三个方面。

二 词典的思想性表现在选词上

由于词典的性质和任务不同,它的收词范围可大可小,但是不管收词范围的大小如何,在选定词目时,都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一定的思想倾向。当然,词汇中有很大部分具有较大的稳固性,意义变化少,不大带有阶级感情色彩,具有中立的属性,如“山、水、手、脚、走、作、快乐、喜欢”,等等。任何词典对这部分词语是会不加选择地收录进去的。但是整个词汇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其原因是:“由于发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出现了新的国家、新的社会

主义文化、新的社会精神、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添加了一大批新的词和语;有许多词和语的意思改变了,获得了新的意思;有一些陈旧了的词在词汇中看不见了。”^③这些在变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新词语是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它反映现实生活的种种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时代色彩和阶级感情。各种词典对这些词语是不会客观主义地毫无选择地收录进去的。它们一定要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选择它们所需要的表达手段,而排斥它们所不需要的表达手段。例如我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胜利(1933—1946)这一段时期出版的词典中,《国语辞典》收录词条最多,却没有收“抗敌、救亡、民族解放、工人运动、街头剧”等最足以表现时代特征的词语。抗战胜利后,《国语辞典》想在补编中有意识地搜集当时社会流行的反映时代色彩的词语,但是它所收的是什么呢?是“抗战夫人、封面女郎、空中结婚、幸福连索、席梦思床、新生活运动”等只反映极少数人的糜烂、荒淫生活的词语。而当时解放区涌现出来的反映时代主流的词语,如“减租减息、变工、武工队、儿童团”等却完全没有收录。就外国词典来说,被称为法语词典的“权威”的《法兰西学院词典》虽然大量地收录了各科术语,却直到最近的一版(1932年)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收录进去。1957—1959年出版的日本诸桥辙次编的《大汉和词典》竟收录了一些代表极其反动的、疯狂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意识的条目,如“赤化、赤魔、日满议定书”等。1956年出版的《美国大学词典》仍然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词一概不加收录,相反地倒收录了一些反动词语如“铁幕、竹幕、卫星国”,等等。以上事实充分地证明了任何词典在选词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绝不是客

观主义地、不加选择地收录词条。

词典在选词上既然具有思想性,那么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词典,应该如何在这点上表现思想性呢?我们认为除了对具有较大稳固性的词必须收录外,还应当遵循下面两个原则进行选词。第一,要充分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思想体系;第二,要充分反映出毛泽东时代的精神面貌。同时,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还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有选择有批判地选收一些旧的、消极的和反面的词语。

A. 必须充分收录的:

1) 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语,如“剥削、上层建筑、生产力、剩余价值、人民内部矛盾”等。这些都是表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手段,必须充分收录。

2) 反映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精神面貌的词语:第一,反映党的方针政策及其措施的。如“按劳分配、土地改革、总路线、多快好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第二,反映新事物的:如“人民公社、敬老院、服务站、社会主义竞赛、一条龙、丰产方”等。第三,反映人们新的精神面貌的;如“促进派、红透专深、多面手、乘风破浪、移山造海”等。

3) 有关无产阶级的政党、政权机构、军事组织以及革命历史事件等的词语:如“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等。

B. 作为批判对象加以选收的:

1) 表达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思想体系的词语,如“马赫主义、实用主义、博爱、良知”等。这些词语所表达的

思想体系是应该被批判的,词典应当有选择地收录。

2) 反映旧社会旧事物的词语,读者在阅读中可能遇到,不仅需要解释,而且应该加以批判的,应当收录,并且通过注释揭露出它的反动、腐朽的本质,给读者以正确的认识。例如。“八股、八字、包身工、鸨母、礼教、承佃”,等等。

3) 有关反动统治阶级的政党、政权机构、军事组织等的词语,也是读者常常遇到,必须收录而加以批判的。例如“集中营、保安队、挨户团”,等等。

C. 不收或少收的:

1) 敌人对我国或社会主义阵营进行诬蔑的。

2) 帝国主义别有用心而加以歪曲的我国地名。

3) 对劳动人民、少数民族有所轻视和侮辱的。

4) 反映剥削阶级反动思想、腐朽意识和荒淫生活,但不常见,不是非批判不可的。

在考虑从政治思想性选定词目时,还应注意如下两点:

1) 我们虽然强调反映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体系的和反映毛泽东时代精神面貌的词语必须充分收录,但是并不意味着排斥选收消极的词语。因为这些词语可以用来揭露旧社会的黑暗面,例如:“兵荒马乱、阴谋、暴政、赤地、残害、惨毒”,等等。

2) 要联系词典的规范作用和词典的大小来考虑。虽然有些词语是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或者是能反映我们时代精神面貌的,但是由于过专或过土,不符合规范性词典或中小型词典的要求的,也不应收录。如“垫支资本、创业利润”和“文化水”(“文化水平”的简称)等。

三 词典的思想性表现在注解上

(一) 释义中体现政治思想性的原则

词典的中心任务,在于给所收词语作正确的解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词义,揭示词语所代表的事物概念的本质。斯大林说:“阶级影响到语言……有时把同一的词和语理解得各不相同,这是不用怀疑的。”^④在解释词义时,所谓“纯客观”的立场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尽管有很多词典标榜“客观地”注释词义,不带阶级偏见,实际上他们还是站在一定阶级立场上去理解词义的。例如我国古代的字书,从《说文解字》到《康熙字典》,对一些足以反映社会意识的字的解释,内容传承不变,都是“民,萌也”(徐锴《说文系传》:萌,萌而无识也。徐说乃是传承汉儒旧说,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民,瞑也);“妇,服也(也是汉儒旧说,见《白虎通义》)”等。十足地表现了封建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再如我国过去的一些词典对“地主、地租”等词的解释,除用词造句有些差异外,内容实质没有什么不同。例如:

地主 土地所有者(王云五大词典、国语辞典。)

土地所有者曰地主,地主以土地租与农民耕种而已
则坐收利益(旧辞海)。

地租 土地之租税(国语辞典)。

佃户按所租地亩缴纳田主的租税(王云五大词典)。
因使用他人农地而给付之报酬(旧辞海)。

这些解释都掩盖了“地主”和“地租”的剥削本质。再拿一些外国词

典试作比较。例如：

资本家 拥有资本的人。特指拥有大量的资本用在事业、企业等方面的人(美国大学词典)。积累资本的人；把资本有效地用在金融或工业上的人(牛津大词典)。

帝国主义 在人群中的统治精神(法兰西学院词典)

此外,像《韦氏新国际词典》对“资本”一词的解释介绍了几个经济学上的意义和说法,但是就没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是靠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的说明。日本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词典》在“满洲语”条注中,胡说满洲语因同中国本土的汉语混杂而起很大变化,所以其后把汉语也叫作“满洲语”。从这些词典的注解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们的编者并不是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上,也并不是对自己的阶级对自己的社会制度漠不关心的。恰恰相反,他们的阶级立场都是非常鲜明的。

我们编写词典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因此,我们就要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释词义。排除唯心主义、客观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倾向。为此试提出以下几个原则:

1) 对于政治、法律、经济、哲学、宗教、艺术等范围的词语,必须用阶级观点分析阐明,必要时还应当适当地说明党和国家的政策,反映我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面貌。有关宗教的词语,既要照顾科学性,又要贯彻党的政策。词典在处理这类词语时,应当特别慎重。在教育、法律等类条目中,除抽象地注明其一般意义外,还要分别说明某些词在不同社会体制下的特殊涵义,特别要交代出我国的特点。

2) 注释词义,必须全面考虑,要求外延和内涵的周延,既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也不能受少数资料的局限,把词义注得太狭甚至歪曲了词义。例如“扫荡”一词,如果注为“反动或侵略的军队对人民的烧、杀、抢掠(反~|五一大~)”,就显然注错了;因为人民武装去平定叛匪也可以说“扫荡”。“扫荡”原来的意义是指用武力肃清敌人。又如“造反”一词,如果注为“推翻反动统治者或政府”或“企图推翻反动统治者或政府”,也是不妥当的。“推翻反动统治者或政府”是革命和起义的意思,虽然过去封建统治者把农民起义污蔑为造反,我们却不能因此把“造反”当成是“革命、起义”的同义词。我们认为把“造反”注为“发动叛乱”比较恰当。毛主席说过,我们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这里说的“造反”,指的就是不怕资产阶级发动叛乱。此外,在给某些过去和现在都用而意义有所不同的词语作注解的时候,我们主张服从现在的意义,兼顾过去的意义。

3) 注释词义,还应当避免时间观念不清楚或涉及的对象不明确。例如“附庸”一词,如果注为“古代称附属于诸侯大国的小国,今指为强国所支配的国家”,就不妥当。所谓强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呢?帝国主义国家中有强国,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强国。单单说强国是不够的,不仅不明确,而且容易引起误解。我们认为应该把“强国”改为“帝国主义国家”或“殖民主义国家”。从这个例子看来,在给词语作注解的时候,必须明确时间和对象,不能笼统地一般地下定义。

4) 注释中利用时事及其他新闻材料,要经过严格审核,尤其是时事材料,时间性较强,且事情在不断发展变化,随便采入词典是极不妥当的。更要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未经正式公布的材料,不得随便引用。利用时事及其他新闻材料,固然有能反映现实的好

处,但也往往容易发生错误或泄露国家机密。

5) 要从中国的立场出发。例如注解“圆周率”的时候,应该强调指出我国伟大数学家祖冲之在公元五世纪时就已正确算出圆周率的近似值。在给“史诗”作注解的时候,应该指出我国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等篇,以及蒙古族的《格尔斯汗的故事》、彝族的《梅葛》等,都具有史诗性质。言不及中国的倾向是错误的,必须反对。

(二) 释义中体现政治思想性的方式

1) 揭示词语概念所反映的阶级本质,加以简要的批判,反对客观主义。请看下面两组例子:

a) 工头 资本主义社会里,被资本家所雇用来监督工人、加强剥削的人。

把头 旧社会里把持某种行业(如搬运、贩卖牲口),从中剥削工人的坏分子。

风水 旧时的一种迷信,指住宅基地或坟地的形势,根据它来推断这个人家的祸福。

b) 博爱 对人类普遍的爱。

苛政 苛刻地剥削人民的政治。

逆来顺受 对恶劣的环境或无理的待遇采取忍受的态度。

a 组的例子,观点和立场都比较鲜明; b 组的例子,就失去了明确的观点、立场,陷入客观主义的泥坑。“博爱”是资产阶级欺骗人民和模糊人民阶级观念的口号,在阶级社会里,对人类普遍的爱是不存在的。我们应当指出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同样,“苛政”、“逆来顺受”,也应当加以说明和批判。什么阶级实行苛政? 什么人持“逆来顺受”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我们在

注释的时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由此可见,思想性和科学性是分不开的。用客观主义态度注释词义,是绝对不能正确地说明词语的涵义的。

2) 说明某些词语所反映的事物概念是出于哪个时代或社会,是跟哪些人联系的。这可以有两种方式表示。

a) 释义中直接说明:

连坐 反动统治时代,一人犯法,牵连邻家及亲友的处罚办法。

糠菜半年粮 形容旧社会人民生活贫困,一年有很多时候用米糠和野菜当粮食吃。

地狱 佛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所说,人死后灵魂受苦的地方(跟“天堂”相对)。

b) 加括注指明对象、性质或使用范围。

打卦 根据卦象推算吉凶(迷信)。

蠢动 (敌人或坏分子)骚扰活动。

但是,有些事物新旧社会有不同的说法,往往反映新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对这类词,我们不主张简单地以新词注旧词,注前标〈旧〉,或者注为某新词的旧称,这样容易使读者误解为只是新旧名称的不同而忽略了内容实质的区别。例如:

老妈子 〈旧〉保姆。

清道夫 〈旧〉称打扫街道的工人。

像这类词语,我们认为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处理,例如“老妈子”可以注为“旧时称被雇来做家务杂事的女工(含轻蔑意)”。

3) 对新旧社会有不同意义、不同作用的词语,采取两相对照的方式加以说明或者分立义项。例如:

功臣 封建时代称有功之臣,现在沿用着指称对人民革命事业有特殊功劳的人。

4) 释义中反映现实,联系政策,例如:

法制 用法律和法令表现出来的法律制度,它的目的在于保护、巩固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我国法制是属于社会主义法制类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

婚姻法 国家规定的有关婚姻和家庭制度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1950年颁布的。这个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是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保证婚姻自由和男女权利平等。

此外,在注释词义时,还应该注意下面两点。

1) 不能根据敌人污蔑我们的语句来注释词义,例如不能因为敌人骂我们为“赤匪”就在“匪”条下增加敌人辱骂我们的义项。

2) 在注释某些反面词语时,不能只依靠摘录的资料,必须参考原著上下文,体察说话当时的环境条件。特别在引用经典著作时,要注意这一点。如注释“独裁”一词时,不能根据“……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这句话而把“独裁”认为是“专政”的同义词。这句话是承上文“你们独裁”而来的,是作者在辩论中以对方的话反驳对方的一种手法。作者在下文就指出:“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更可证明“独裁”不是“专政”的同义词。

四 词典的思想性表现在举例上

词典的举例,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可以使一个词语活起来。读者通过例句,除了可以更正确地理解词义,掌握词与词的结合规律(语法规律)外,还可以获得真实的语感,掌握词的感情色彩,学会如何表现爱、憎,如何宣扬或歌颂正面的事物,如何更有力地揭露和打击反面事物。在这里就必然要发生思想性问题。有人认为,如果引用原著成文作例句,就不会发生思想性问题。可是有不少外国词典是引用原著成文作例句的,有时每一例句都标明出处,然而并不因此减少它的思想色彩,或使人看不出编辑者的立场。《牛津大词典》的举例,虽然主要目的是在于说明某个词语应用的年代,但仍然很明显地表现出编辑者的立场。如“布尔什维克化”条举例是:“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是世界的最大的危险”(引《每日电讯报》)，“马克思主义”条的举例是:“照我看,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崩溃了”(引威尔斯的话)，“帝国主义”条的举例是引罗兹贝利的话:“我指的是对帝国的更大的自豪,就是被称为帝国主义的……。头脑清醒的帝国主义,区别于我将称之为野猫式的帝国主义,无非就是——更大的爱国主义”这些例句不是很鲜明地表现出思想性和阶级性吗?我们编写的词典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在举例上不能不具有思想性。因此,在选用例句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 要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充分反映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如将消极的、反面的词语用于形容反面的事物和打击敌人,将积极的、正面的词语用于歌颂新生事物和英雄人物。

a. 江山 老百姓的～是枪杆子打出来的。

b. 开刀 黄巢杀人先拿了空～。

a 例句观点鲜明, b 例句违反了上述原则, 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黄巢是反抗封建统治者的英雄人物, 历代反动统治者对他极尽污蔑之能事, 毁谤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匪寇, “开刀”的例句不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的吗?

2) 要正确地反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精神。

a) 奇迹 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可以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的～。

b) 出活 人多才～。

a 例句正确地反应了党的群众路线。b 例句就违反了上述原则。人们鼓起了革命的干劲, 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的活, 人减少了活儿却干得多了, 怎能说人多“才”出活呢?

3) 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用辩证的、唯物的、不断革命论的观点看待事物。

a 和平 我们爱好～, 但也不怕战争。

b 毁灭 战争～了千百万个幸福家庭。

对于战争的看法必须区别正义的与非正义的, 支持正义的战争, 反对非正义战争。a 例是符合这种精神的。b 例句没有区别不同性质的战争。

4) 要注意思想感情的健康, 体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反映毛泽东时代的精神面貌。

a) 召唤 生产大跃进, 把广大的农村妇女从家庭中～出来。

留 把方便让给别人, 把困难～给自己。

b) 莫若 与其坐在家里发闷, ～出去走走。

领情 老兄的好意,兄弟十分~。

a 组的例句思想健康,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b 组的例句表现出消极情绪和庸俗的生活气息,这与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人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大无畏的精神面貌是格格不入的。

此外,举例还应与释义密切配合,避免两相参照时发生政治思想性错误的现象。例如“放逐”一词,注为“古时把罪人驱逐到远方”,同时举例为“屈原被楚王~到江南”。这样一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就成了罪人,使读者对屈原产生错误的认识。

对于处理消极意义的词语的举例,我们提出以下几个办法:

1) 指明时间、地点、对象等使意义明确,不致引起误解。例如:

凄凉 解放前,农村破产,一片~。

2) 加否定词使例句有积极意义。例如:

乞求 和平只能争取,不能~。

3) 采用说明叙述或批判的方式。例如:

居奇 囤积~,扰乱市场,就是犯法。

4) 采取正反、新旧对比的方式。例如:

悲惨 解放后,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完全摆脱了过去的~的命运。

另外提出下面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1) 代表旧事物旧观念的词要不要举例? 因为这样的词如果举例,那一定要举出色彩跟我们当前生活很不调和的例句来。我们的意见是:这类词不需要例句衬托词义的即不举例,如果要举,必须按照上述第一条办法处理。

2) 用成语、词组作例句,不交代时间、地点、行动主体是否容易出问题? 我们认为积极的、正面的词语可以举成语、词组作例

句;对于消极的、反面的词语的举例,也应按上述第一条办法处理。

附 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3年3月,北京第一版。第666页。
- ②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译本,1951年,人民出版社。第10页。
- ③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译本,1951年,人民出版社。第3页。
- ④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译本,1951年,人民出版社。第40页。

《现代汉语词典》和 《现代汉语大词典》*

单耀海

《现代汉语词典》始编于 1958 年,完稿于 1965 年,1973 年出“试用本”,内部发行,正式对外发行则在 1978 年。不算“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编写、修订前后用了十年时间。先后由两位主编: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主持编写,主持修订。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中型语文词典,目的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读者对象主要是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这部词典计收单字和语词共 56000 多条,总字数为 273 万字。词典收各类单字 10609 个,分布情况为:

- A. 现代汉语用字:常用 4217 个,非常用字 1626 个;
- B. 异体字:2693 个;
- C. 古汉语用字:2073 个。

《现代汉语词典》问世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一部较规范的词典,具体体现在词典收词审慎,注释严谨准确,举例简练、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文中所说的《现代汉语大词典》是 1990 年启动的项目,1993 年初因故暂时搁置。

得当等几个方面。自出版以来的十多年间,每年印量一百多万册,累计印量已达两千多万册。不少国家和地区也有印刷、发行,1992年韩国的东亚出版社也印刷、发行了这部词典,对了解汉语语词的文化、发展及使用情况起了积极的作用。我国以及别的国家编辑出版的双语词典有不少种也以《现代汉语词典》作为蓝本。

《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是成功的,达到了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词也随之发展,对语词的认识也起了变化,《现代汉语词典》已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目前正在编写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就是为反映汉语语词的变化、发展和适应读者的需求而编写的。编写宗旨仍然遵循《现代汉语词典》,进一步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写是《现代汉语词典》的继续和发展,“继续”是指继续《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宗旨,“发展”则是指在收词上比《现代汉语词典》有所扩大。两部词典毕竟相隔了30年,今天不可能仍保持30年前的认识。社会发展,人的认识也随之发展、变化。下面谈谈编写《现代汉语大词典》中的几个问题。

一 对“规范”的理解

所谓“规范”,按词典的定义是“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说到词典的规范,简言之,就是在一个多民族而方言又复杂的国家里需要有一种大家都能理解、接受并使用的语言,具体体现在字形、字音和词汇上,记录一代语词,就成了规范词典区别于其他词典的标志。有人把词典划分为两种类型:规范型和查考型。借用这种划分法,《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的主要功能则

是规范型的。当然,规范型和查考型不是对立的,不能据此推论规范型词典没有查考的功能,单纯强调查考是对词典功能片面的理解。所谓规范型词典主要体现在字形、字音以及语词上,收录规范的语词,用规范的语句释义并举例。收录规范语词不是说不规范的一概不收,而是酌收,是指在合乎一定的比例下对某词或某类词决定取舍,在强调“规范”的时候,应考虑到语言事实的客观存在,不能忽略一些语词的发展趋势,在尽量收录普通语词的同时,对其他语词适当放宽收录尺度,不因“过专”、“过文”、“过方(指方言色彩过浓)”、“过俗”而舍弃。适当放宽收录尺度,无悖于规范的宗旨,而且对规范反而是一种衬托或是补充。所以说,单纯强调查考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单纯强调规范也是一种片面的认识。《现代汉语大词典》力求在这一尺度下编写,以补《现代汉语词典》收词不足的缺憾。

二 有关方言词语的收录

汉语方言极为复杂,规范词典不排斥收录方言,哪些收,哪些不收,说适当收录,就存在尺度或标准的问题,说适当放宽尺度是对过紧过严而言的。收录的尺度或标准似只能根据方言语词的流行面和发展的可能趋势予以考虑、斟酌。这一二十年来,某些汉语方言相当活跃,对规范语词可以说是一种挑战,它以极强的生命力在扩大它的使用范围,进而被众多的人使用而成为普通话语词。近些年来有两种汉语方言相当活跃,一种是粤方言,一种是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两种方言的不少语词常见诸报刊、小说、戏剧、电影,影响很大,丰富了汉语语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这么

说,都这么用,如:侃、炒、侃大山、打的、倒爷、切汇、炒股、炒鱿鱼、大款、排档等等,从单字到复合词已经作为普通话语词活跃在实际语言中,当然不能把它们作为方言语词来对待。对有些方言语词,如西南方言,近些年有些文艺作品,或小说,或电影,描写某些人时用了一些方言语词。文艺作品该不该用方言,这是属于另一范围的讨论。但就西南方言的流行面和在实际语言中的使用情况,一部规范性的词典也是可以酌情收录一些的。从另一角度看,适当收录一些方言语词,可告诉读者什么语词不是方言语词,对“推广普通话”来说也是另一种手段。这几年我国出了一些方言词典,有代表性的方言大词典也正在编写中,对于想要更多了解汉语方言的人是很有用的。顺便说一下“港台”语词,这里指的是大陆不见、不用,或偶见、偶用的“港台”语词。这些语词比较复杂,有的是文言语词;有的是大陆解放前就有的,解放后大陆不用,而台湾、香港还沿用;有的是方言,或是闽方言,或是粤方言;有的是从音译来的,如:“扎啤”,一种生啤,散装,论杯出售,是由英语“jar”来的;又如:“恤衫”、“波裤”,“恤”是由英语“shirt”来的,“波”是由英语“ball”来的;再如:“泊车”、“泊位”的“泊”是由英语“park”来的,就这些词的使用情况来看,收录上似应严一些。目前,大陆已出版了几本港台语词词典,我认为还尚未普遍流行的语词由这类词典来收录较为理想,因为这类词典收词对象明确,收录尺度宽,对音译词的不同译法也可兼容,从原则到技术,既明确,又灵活。

至于在极小范围内流行使用的,如行话、切口、黑话、暗语,一部规范性的词典则不应收录。目前还有一些不行也不黑的语词,也应慎重,如,用于钱数的“一吨”、“一方”,“底儿潮”(指有前科),

“雷子”(指公安人员)，“庙”、“宫”(指监狱)，又如，把十元钱叫“一张”，北京说，上海也说，还有把钱叫“分”，“进分”是指来钱，“扒分”是指赚钱，“一张分”指十元钱。这类词有时在报刊上也能见到。尽管如此，未经社会认同，一部规范性的词典暂不宜考虑。书、报上见到，也只是在描述某类人或某类行为时用，和收进词典给它地位是两回事。认为见书或见报就应收录进词典的看法是片面的。

三 关于语词的“稳定”说

所谓“稳定”是指语词在语言中的生命力。一些语词原被使用，一段时间后逐渐少用或不用，有一些语词早就不用，后又重被使用，这种语词的沉浮在语言发展、变化中是常遇到的，但数量不多；而新词新语的产生则是随时有的，对一些新词新语的收录是等经过一段时间稳定后再予以收录，还是有鉴别、有选择地收录。我们认为应该是有鉴别有选择地收录，尺度不应过严，只要不是生造的或有悖构词法的，不妨先收。一部词典经过若干年的使用，就要进行修订，修订的内容无非是在三个方面：增，删，改。语词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一字不易的词典是不存在的。一部词典的增、删、改反映出语词发展、变化的历史痕迹，后人根据词典的不同时期的修订可以推知语词的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所以，编写一部比较全面反映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大型语文性词典，不能囿于“稳定”之说而作茧自缚。开拓对语词的认识，立词有据，不断修订，才能求得稳定的语词。

四 所谓“语文性”

《现代汉语大词典》是一部规范性词典，它又是一部语文性词典，但不是专类的语文词典。一部语文词典主要体现收词、释义、举例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编写方式上的不同可以区分各不相同、功能各异的语文词典，如成语词典、作文词典、同义词词典、反义词词典、文言虚词词典等等，都属语文词典，由于收词的范围和对象不同，注释的手段不同，举例的方式不同，形成各不相同的语文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是一部以记录现代汉语普通话语汇为主的语文词典，这就和上述的各类词典从功能上区分开了。《现代汉语大词典》根据当代的语言实际，通过收录的语词勾勒出当代的语言风貌，从字形、字音的确定和审定，到语词的收录、注释、举例，取舍有据，不因循旧说，也不趋附时俗。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成语不多，熟语更少。其实，成语、熟语在实际语言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它丰富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在语言中的表达手段有着不是一个、两个词或一句、两句话所能替代的作用，简练、形象、生动是它们的特色。如“羊毛出在羊身上”、“皇帝女儿不愁嫁”是人们常用的熟语，在汉语中还很难找到内容相同的相应语词，是正经的语文词语。当然，酌情多收一些，不是不加选择地收录，过于生僻的成语或流行面不是很广的熟语就不在收录范围之内。

加强语文词典的特点除广收语词外，还可体现在“匡正谬误”上。我国当前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用错字，读错音，虽非普遍，也非个别。播音员和演员读错字的现象还不时听到，他们通过的传

媒体影响大,后果也严重。“匡正谬误”既可突出语文词典的特点,也是规范性词典具体的规范。《现代汉语词典》在注释中加上[注意]这一注释手段,[注意]侧重在对某类词在词义和用法上予以揭示,这种做法受到读者的肯定。编写大词典时仍要继承这一特色。此外,对容易用错、写错的字和容易读错的音加以揭示,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加强语文词典语文特色的范围和手段还很多,《现代汉语大词典》这样一部规范性的词典,受体例的限制,不能面面顾及,只好由其他词典或词义辨析之类的工具书来承担了。

语文词典的语文特点还体现在释义后的举例上。从理论上研究语文词典如何举例可以专文探讨,但语文词典需要举例让读者加深对词义(进而对词的用法)的理解,这是大家认同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举例被大家称道的同时,读者也指出举例还不够多。举例引书证好办,但举好例则不容易,或句子过长,或衬托某词的例句不够突出,某词既要简练精当,又要突出鲜明,既要语句规范,又要有文采,有时举例比注释还要难。

《现代汉语大词典》除了上述的几点语文特点外,在语文词的收录比例上比《现代汉语词典》略有增加。《现代汉语词典》收词大致分三类:语文词、哲社词、科技词,这三类词分别占全书的比例为:

语文:72%;

哲社:11%;

科技:17%。

《现代汉语大词典》这三类词条的比例分别为:

语文:82%;

哲社:7%;

科技:11%。

具体数字为:语文词条约9万条,哲社词条约8000条,科技词条约1.2万条,全书约11万条,550万字左右。增加语文词条的比例,也是为了突出语文词典的特点。

上面就《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的关系以及编写方面的一些问题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论述。《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已出版的书,在中国同类词典中是有代表性的,我的前辈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为这部词典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今天编写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将是《现代汉语词典》的继续和发展。这些年来,中国编纂出版了多种词典,有代表性的,百科方面有《中国大百科全书》,语文方面有《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以及多种专类词典,词典的分类编写向细的方面发展。《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是众多词典中的一种。

从比较中认识规范型词典*

晁 继 周

对比研究,是认识事物本质的重要方法。苏联词典学家谢尔巴在他的著名论文《辞典编纂学一般理论初探》中,就是通过对“许多理论上的对立面”^①的剖析,深刻地阐述了词典编纂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本文想通过对规范型词典和其他不同类型词典的对比,使我们对规范型词典的特点得到更深入的了解。

一 规范型词典与历史型词典对比

规范型词典属于现代语言词典,是共时词典的一种,在收词的时间性方面,与历史型词典处于对立之中。规范型词典记录的是现代人们使用的词语。规范型词典的编纂者不是“发明”规范,而是依据语言发展的重要原则——约定俗成——去发现规范,并将其正确地体现到词典中来。规范化是对现代语言而言的,对历史词语谈规范是没有意义的。

历史型词典收词范围是一种语言有文字资料以来(或依据语言发展的阶段性确定某个起点)的全部词语,其释义要阐述词义历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93年第1期,此次选收略加改动。

史演变的全过程。《牛津英语词典》是一部著名的历史型词典,该词典对于历史词语做到有词必录,即使是在所有文献中只出现一次的“罕词”也予收列^②。我国数百名学者参加编写并正陆续出版的《汉语大词典》也是一部历史型辞书巨著,全书共收词语 37 万条,“古今兼收,源流并重”^③,较完备地收录了汉语有文献记载的词语。

规范型词典与历史型词典不仅收词范围不同,在释义和设例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区别。我们以《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分别作为规范型词典与历史型词典的代表,看一看这方面的区别。

释义方面,《现代汉语词典》只解释所收词语现代使用的意义。有些意义,现代口语虽已不用,但在成语等固定词组中还保留着,《现代汉语词典》亦予收列。如“兵”,兵器的意思现代虽已不用,但这个意义还活在“兵不血刃”、“短兵相接”、“秣马厉兵”等常用成语中。《现代汉语词典》收了兵器的意义,并因其是本义而列在第一项。《汉语大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不同,其释义包容了一个词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曾有过的全部意义,而不管这些意义现代是否还在使用。还以“兵”为例,《汉语大词典》在兵器、军队、士兵、关于军事或战争等《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意义外,增加了用兵器杀人、伤害、战死这样三个历史上曾用、现代已不使用的意义。

规范型词典与历史型词典的设例要求也很不一样。历史型词典(其中的历史词语部分)必须引用书证。《汉语大词典》所引例证,一般均标明时代、作者、书名、篇名或卷次章节,并按时代顺序排列。少量以现代通用语作例证的,只出例句本身。查阅《汉语大词典》的每一个词条,我们都能得到该词(或义)的见于文献的最早用例;如果某词(或义)现代已不使用,也可得到其见于文献的最晚

例证。每个词意义或用法的细微演变,都有文献资料提供佐证,源流清晰,一目了然。

规范型词典以规范为准则,它要以例句配合释义,把对词义和用法的合于规范的解释告诉读者。为达到这个目的,规范型词典可以引用书证,也可以根据需要编写例句。《现代汉语词典》在设例上极下功夫。它以百余万张第一手资料为依凭,选取、提炼或编拟了紧密配合释义的例句。例句正确地体现意义,说明用法,而且简洁、自然。看一看助词“了(·le)”的释义和引例:

①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表示动作或变化已经完成。

- a) 用于实际已经发生的动作或变化:他们这个小组受到~表扬|水位已经低~两米。b) 用于预期的或假设的动作:你先去,我下~班就去|他要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也很高兴。②用在句子的末尾或句中停顿的地方,表示变化,表示出现新的情况。a) 表示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某种情况:下雨~|春天~,桃花都开~|他吃了饭~|天快黑~,今天去不成~。b) 表示在某种条件之下出现某种情况:天一下雨,我就不出门~|你早来一天就见着他~。c) 表示认识、想法、主张、行动等有变化:我现在明白他的意思~|他本来不想去,后来还是去~。d) 表示催促或劝止:走~,走~,不能再等~!|好~,不要老说这些事~!

虚词很难注释;即使注准确了,若没有恰当的例句相配合,也很难为读者所理解。助词“了”的例句,与释文配合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不是天然,胜似天然。李荣先生评述《现代汉语词典》的例句时说,定义给读者轮廓,例句给读者全貌。配上合适的例句,整个注释就活了^④。

二 规范型词典与查考型词典对比

规范型词典与查考型词典的对立,是功用上的对立。规范型词典与查考型词典是适应不同需要而产生的。在不同民族的接触中,出现了理解外民族语言的需要;在民族文化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了理解前人文献中疑难词语的需要。这两种需要,直接促使了查考型词典的产生。各种历时性词典、特定内容的词典(如方言词典、成语词典)和以特定人群为读者对象的词典(如各类学生词典)都属于查考型词典。规范型词典的编纂是在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提出的任务。民族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语言使用中的分歧现象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社会交际,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口语与书面语之间,使用的词语出现了不一致,确立民族共同语的任务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编纂规范型词典的任务也随之提了出来。简言之,编纂查考型词典,是为了解决语言使用(阅读、说话、写作)中的疑难;编纂规范型词典,是为了促进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化。

从收词的指导思想来看,规范型词典着眼于民族共同语完整的词汇体系,不因为某些词很少有人查阅就不收。而查考型词典则着眼于使用者的需要,需查阅的则收,不需查阅的则不收。根据读者的需要,查考型词典可以超越“现代”、“规范”的原则,去收录规范型词典不收的词,如学生词典就要收学生在学习或阅读中会遇到的一部分古语词和方言词。

规范型词典常常要兼顾查考的需要。一部词典,如果读者用不着查阅的词收了许多,而读者在语言使用中遇到的疑难词语又

未能收入,这部词典的社会效益就很有有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规范型词典收词范围之外,增收一部分有查考价值的词语,主要是方言词和书面上还使用的古语词,这些词语都冠以特殊的标记(《现代汉语词典》在这类词前分别标示〈方〉和〈书〉)。这样,词典的规范部分“好比是一个盒子装在另一个盒子里面”,“凡是没标记的就可以视为标准描写词典中的‘规范成分’”^⑤。

规范型词典与查考型词典对释义的要求也不一样。查考型词典以使用者具备一定的词语知识为前提,释义时常采用同义词对释的方式或其他简注方式,如“鞋”可以解释为“鞋子”;“走”可以解释为“步行”、“行走”。规范型词典则要求采用下定义的方式解释词语。即使某个词用相关的同义词作注,这个用来作注的词在词典中作为词目时,应得到详细解释。“鞋”《现汉》的释义是:“穿在脚上、走路时着地的东西,没有高筒。”“走”《现汉》的释义是:“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在释义上,查考型词典不求体系上的完整,只要求满足读者查考的需要。规范型词典的收词与释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有意识地采用下定义的方式,改变了以前的词典大量采用同义词对释的作法,在很高程度上避免了(不是绝对避免)同义词互训的现象。《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乃至引例中用到的词,均不超出这部词典自身收词的范围,形成了非常严密的释义系统。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三 规范型词典与描写型词典对比

在同查考型词典的对比中,我们强调了规范型词典收词上的完备性。但是,完备远非兼收并蓄。在这一点上,它同描写型词典

又是严格对立的。

描写型词典主张忠实地描写语言的实际情况,认为词语有用与不用之分,没有高低好坏之别。因此,这类词典对人们使用的词语取“一视同仁”的态度。规范型词典以促进语言规范化为己任,在选词、立义等方面都要体现标准,不能有任何一点随意性。《美国传统英语词典》主编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说:“本书愿忠实地记录我们的语言,这是词典编者的职责所在。然而本书不愿像在今日这个为所欲为的时代里所产生的许多别的词典那样,仅到此为止。相反地,本词典将提供必要的指导。人们常企求词典能给予这种有益的指导,俾便妥帖、正确地运用词语。”^⑥规范型词典正应该这样,既要忠实地记录语言,又通过它的收词、释义对人们使用语言给予正确的指导。

历史词典、方言词典、新词词典比较适于贯彻描写原则。历史词典的情况在本文第一节中已有论述。方言词典不仅重视书面资料,而且重视口语资料,这就使得相当数量的土语成分,包括词形不固定,甚至有音无字的词语,也尽入词典。某些新词词典在新词范围内,也采用描写原则,只要是新词,不管使用范围的大小与出现频率的高低,一律收录。

词典编纂的规范原则与描写原则,在对待新词上有着很不相同的态度。规范型词典收录新词,主要依据普遍性和生命力原则。根据这样的原则,使用地域广,并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在社会交际中有长久存在价值的词,规范型词典才予收录。采用描写原则的新词词典收录新词尺度则要宽得多,凡见诸实用资料并合于汉语构词法则的词,均在可收之列。像“萌醒、迷倦、流学、扩疏、培储、批斥”等词,实用资料很少,仍被收入了新词词典^⑦。还有一种情

况需要说明。同一事物,在开始出现阶段,往往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展销、展售、展卖”三个词就同时在使用。这些同义词中,可以肯定有的迟早会被淘汰。在它们并存的时候,采用描写原则,会在词典中列出全部同义词。采用规范原则,会根据词典编纂者的选择,只收列一个或少数几个,以促进语言的规范化发展。当然,“在语言更为稳定以前,作出这种抉择和规范决定的词典编纂者必须估计到,他的选择可能并不符合每个人的口味,而且语言的实际发展也可能和他的选择背道而驰”^⑥。为了稳妥起见,在几个同义词都使用得比较普遍,难以作出取舍判断的情况下,规范型词典可以把它们同时收录下来(一概拒绝的作法不可取),在社会交际实践中,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作出选择,经过词典的一次或几次修订,最后确定出规范来。

规范性与描写性是两种编写原则的对立,并不与词典的科学性发生直接联系,不存在哪个原则更科学、更正确的问题。规范型词典坚持规范原则,是其促进语言规范化的使命使然。历史词典、方言词典、新词词典等可以采用描写原则,则是由它们备查考的编纂目的所决定。

附 注

① 这些对立面是:学院型词典和查考型词典,百科词典和普通词典,大全型词典(thesaurus)和一般词典(详解词典或翻译词典),一般词典(详解词典或翻译词典)和概念词典,详解词典和翻译词典,非历史型词典和历史型词典。

② 转引自胡明扬等《词典学概论》5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

③ 《汉语大词典·前言》,见《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年。

④ 李荣《丁声树》,载《方言》1989年第2期。

⑤ L. 兹古斯塔主编《词典学概论》,林书武等译 292—293页,商务印书

馆,1983年。

⑥ 转引自李荫华《英语词典初探》17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⑦ 见《汉语新词新义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⑧ L. 兹古斯塔主编《词典学概论》,林书武等译 403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选词*

孙德宣

汉语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之一,它的词汇异常丰富精密。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的篇幅是有限的,不可能把全部的现代汉语词汇都收进去,又不能因陋就简,把应该收的词也不收,使读者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怎样选词是编纂这部词典的一个重要问题。

下面是我们提供关于选词(包括选收词素、词组、成语等)的意见。

1. 现代汉语词典是体现现代汉语规范化的重要工具,它所收的词必须在北方话的基础上选择补充,所收词的读音必须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而每一个词的语法功能必须以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的用法为依据。

2. 现代汉语词典搜集现代普通话口语里广泛应用的词,此外从书面语中取材,应该以“五四”以来的资料(例如:重要作家的文艺作品、全国性的重要报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般论著和学校课本)为重点,因为从“五四”起,中国文化“从思想到形式(文字

* 这篇文章节选自作者和他人合著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初稿),曾发表于《中国语文》1956年第7、8、9期。

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①汉语的词汇和语法都起了巨大的变化,书面语才逐渐摆脱了旧文言的束缚,和口语有了原则上的统一。

一般地讲,词的取舍标准决定于它在现代广大人民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作用的大小,词典里不收过去常用而现在不使用的死词,但在“五四”时期的一般著作中还经常出现的词应该酌量采取。

3. 选词应该从实际的语言出发,以在普通话句子结构中分析出来的“词”为单位,不以汉字为单位。词典里列为条目的包括以下数种。

(1) 能够单独说的词,例如:

人、人民、葫芦、玻璃、我、什么、走、调查、讨论、能、慢、爽快。

(2) 虽然不能单独说,但和其他的词或词素有配合构词的能力,或是放在句子或词组里能表现语法意义的,例如:

很、每、半、几、个、斤、再、由于、和、吧、吗。

(3) 经常独立于句子之外的感叹词和已定形的象声词,例如:

唉、呸、哎哟、喔喔、噗哧、丁当。

单音词后连缀着重叠成分的作为一个单纯词看待,例如:

热呼呼、红通通、孤零零、冷冰冰、绿油油。

4. 现在不能单独使用而富有构词能力的词素,为了便于人们明了它的意义,也应该收进词典,用[]号括起来,表示它跟“词”不同。例如“木”、“机”、“器”、“视”作[木]、[机]、[器]、[视],各列为一条。“老虎”、“老三”的“老”,“第一”、“第二”的“第”,“桌子”的“子”,“木头”的“头”,“工作者”的“者”,“渗透性”的“性”等等,都应

该分别以[老一]、[第一]、[一子]、[一头]、[一者]、[一性]的形式列入词典,表示它们是词头词尾。构词能力非常薄弱的词素不必另列为条目,例如“耿直”的“耿”,“花卉”的“卉”,“马蜂”的“马”,“当然”的“然”,“几乎”的“乎”。

5. 复合词选收的原则如下:^②

(1) 复合词的词素分开来虽然各是独立的词,但是经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需要加以解释,其意义和用法才能明了的,应该列为条目。例如:

- 1) 冷枪、图书馆、爱人、墨守(向心结构)
- 2) 深浅、皮毛、分寸、搬运(并列结构)
- 3) 在行、摊牌、出版(动宾结构)
- 4) 指定、磨灭、说服、提醒(后补结构)
- 5) 眼红、心酸、心疼(主谓结构)

这类复合词不需注解就能明了的,词典里放在它的第一个词素下面作为构词举例性质的附目,不单列为条目,例如“茶壶、茶碗”附录在“茶”条目下,“酒瓶、酒缸”附录在“酒”条目下。但如“饭碗、饭桶、茶包”等除本义而外,还有特殊喻义的词应该单独列为条目。

(2) 一般复合词的词素中有一个是不能拆开来单独使用的,应列为条目,例如“茶具、电木、软木、杯盘、交杯、驼绒、豌豆、火速、饲料、衣架、毕业、投资、示范、不景气、肃清、扩大、议决、改良”等等,但也可以用(1)条的原则,凡意义和用法不注解就能明了的,列为附目,例如“木碗、木桶”之类附在“[木]”条目底下。

有些复合词(特别是动宾结构复合词)中间虽然可以插入其他成分,但其中至少有一个词素在其他场合不能单独使用,仍应作为

“词”收入。例如：

革命(可以说“革了十年命”)

注意(可以说“注点儿意”)

洗澡(可以说“洗了三回澡”)

鞠躬(可以说“鞠了九十度的躬”)

(3) 动词后面紧接着一个形容词性质的成分(拆开能单独使用的)表示结果的后补结构,如果没有特别意义或者中间能加“得很”、“得不”之类,词典里不列为条目。例如“抓紧、分清、站稳、搞好”之类只在“抓、分、站、搞”的条目下面作为举例性质的说明。如果这类后补结构中间不能加“得很”、“得不”之类或者意义用法须加解释,应该列为条目,例如“说明、指明、审定、加强、削弱、加紧、改正”。

动词后面紧接着一个动词性质的成分(拆开能单独使用的)表示结果的后补结构,如果中间是能加“得”或“不”的,词典里不列为条目,例如“摔倒、碰破、熏死、打退”;中间不能加“得”或“不”的列为条目,例如“提升、打消”;中间虽然能加“得”或“不”,但习惯上常不加,并有其特殊意义的,也应该列为条目,例如“打倒、打破、压倒、推翻”。

表示动作趋向的后补结构(例如“写下去、跳起来、抽出、放过、遮住、提起、推开”)不列为条目,只将[一下去]、[一起来]、[一出]、[一过]、[一住]、[一起]、[一开]、[一来]、[一去]、[一上]、[一下]、[一上来]、[一下来]、[一下去]、[一进来]、[一进去]等收进词典里,并举例说明其用法。但是像“豁出去”不能有“豁下去”或“豁出来”等形式的,应该列为条目。

(4) 复音缀的时间词、地位词照下列的原则选收：

1) 中间有不能独立的词素的,列为条目,例如:“今天、昨天、明天、今年、午前、午后、晌午、早晨”。

几个词素固定地结合在一起,不能按照格式替换的,也列为条目。例如:

(甲) 时间词:“早上、晚上、前天、大前天、后天、大后天、大后天、星期、星期日、星期天”等都应该列为条目。“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六”不必列为条目,只在“星期”条目下注解中说明。“上半天、下半天、饭前、饭后”之类,词典里不收。

(乙) 地位词:“上、下、前、后、里、外、东、西、南、北”等单音的地位词固然应该列为条目,它们跟“边、面、头”等字结合在一起的地位词,如“上边、下边、前边、后边、里边、外边、东边、西边、南边、北边、上面、下面、前面、后面、里面、外面、东面、西面、南面、北面、上头、下头、前头、后头、里头、外头、东头、西头、南头、北头”也应该列为条目。

“左、右、旁”这三个词跟“边、面”结合成的复合词,如“左边、右边、左面、右面、旁边、旁面”,也应该列为条目。

“楼上、床下、屋里、门前”之类,词典不收。

2) “上、下、前、后、内、外、东、西、南、北”跟某些虚词结合以后能够单独使用的,列为条目,例如“以前、以后、以上、以下、之后”等;只放在别的成分后头,不能单独使用的,如“之内、之外、之前、之间”等等,不列为条目,只在“[之]”条目下举例说明这种用法。

(5) 有些双音词的后一个成分并非词尾性质的成分而读作轻声,词典里应该把这类轻声词收入。例如:

打手(反动统治阶级所豢养专以武力欺压人民的帮凶,跟“用板子打手”的“打手”不同。)

千万(务必,跟“他有上千万的财产”的“千万”不同。)

鸡眼(脚上的老茧,跟作“鸡的眼睛”解的“鸡眼”不同)。

先生(对师长、年长者及一般人的敬称,跟“先生了一姑娘,后生了一个儿子”的“先生”不同。)

早起(早晨,跟“早睡早起”的“早起”不同。)

干事(职务名,跟“一天到晚不干事”的“干事”不同。)

6. 音义都不相同的两词虽然都用同一个汉字写出来,应该分为两个条目,例如“好”(厂彡)和“好”(厂彡)、“数”(尸义)和“数”(尸义)、“横”(厂亠)和“横”(厂亠)、“地道”(地下的道路)和“地道”(货物来自原著名产区的、真正的)、“生气”(发怒)和“生气”(生命的活力)、“大意”(大概的意思)和“大意”(不经心、疏忽)。

语音完全相同,但词义彼此毫无关系,即使都用同一个汉字写出来,也应该分列两个条目,例如:“我们种的麻长得很高了”的“麻”和“腿麻了”的“麻”,“他会俄文”的“会”和“下午有两个会”的“会”。

从语源上看,虽然意义互有联系,但是词义分化,彼此距离很远,一般人已经不感觉它们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就分列为几个条目。例如“让他把大门”、“把它叫来”、“车把”、“一把刀”、“丈把高”里的“把”应该分为五个条目。如果从常识上能够看得出意义的内在联系,就在一个条目下注解,例如“门板”的“板”和“他的脸板起来”的“板”,“一辆车”的“车”和“农民在稻田里车水”的“车”。

7. “吃的”、“穿的”、“红的”、“长的”、“我的”、“他们的”、“看热闹的”、“骑车的”、“姓王的”等等带“的”的格式可以类推,词典里不收,只在[一的]条目下举例说明它有这种用法。但是像“掌柜的”、“赶车的”、“变戏法儿的”、“打鼓儿的”等等,是表示专门行业人物

的名称的,应该斟酌选收,列为条目。

“同志们”、“朋友们”、“乡亲们”、“弟兄们”等等带“们”的可以不收,但是“我们”、“咱们”、“你们”、“他们”这些表示多数人称的代名词可以收入;“爷们”、“哥儿们”等等有特殊意义的也可以酌量收入,列为条目。

“谈谈”、“唱唱”、“打扫打扫”、“罗罗苏苏”、“干干净净”、“红红儿的”等等重叠格式可以根据“谈”、“唱”、“打扫”、“罗苏”、“干净”、“红”等动词形容词重叠的规律类推,必要时只在未重叠的条目下说明其重叠式;但是只有重叠格式的,就必须列为条目,例如“轰轰烈烈”、“花花绿绿”、“偷偷摸摸”、“婆婆妈妈的”、“悠悠荡荡”。

8. 关于词的定型问题,我们提出两点意见:

(1) 同字异体和同词异字的定型

汉字同字异体的很多,学习和使用都非常不便。词典里对于选收的词、词素、词组、成语以及注解中用的词语应该一律照政府公布的《简化字表》的标准形式书写,例如用“仿佛”、“吻合”、“胆”、“机”、“义”,不用“髣髴”、“彷彿”、“膺合”、“膪合”、“膽”“機”、“義”。但“壹、贰、拾、佰、仟、萬”等字现在还有它的特殊作用(财务凭证上须用繁体数字),应该列为简体的附录。没有规定的字体,词典编者可以选用通行较广的字体,把普遍性略小的异体字附在词条底下,例如“疙瘩”一词,还有“紇縫”、“圪塔”、“屹塔”、“咯嗒”几种写法,以通行较广的“疙瘩”写条目,把“紇縫”等异体字附在下面,用括号括起来。(已规定的字体,其异体字不附在条目底下,可将《简化字表》作为词典后的附录,以便检查。)

词典里关于同词异字的书写方式也适用以上的原则,例如“犹豫”一词还有“犹疑”、“犹与”、“由豫”、“夷犹”、“夷由”等等写法,词

典编者应该选用通行较广的“犹豫”，把普遍性略小的“犹疑”附在“犹豫”条目底下。

(2) 同词而词素颠倒的定型

有一些并列结构双音词的词素次序现在还不很固定，可以前后颠倒而不改变原来的词义和结构，例如“喜欢”和“欢喜”、“泉源”和“源泉”。其中有一部分是古语今语的分歧，有一部分是书面语和口语的分歧，有一部分是普通话和方言的分歧。只要在词义色彩和用法上有些微区别的颠倒词素的复合词（例如“斗争”和“争斗”、“算计”和“计算”、“生产”和“产生”），词典里应该都列为条目。对于词义和用法上完全相同的两种词素颠倒的说法，词典应该本着促进汉语词汇规范化的精神加以选择。选择的原则如下：

1) 用现在已经固定了的形式作条目，不用过去颠倒词素的形式，例如，收“介绍”、“安慰”、“辩论”、“光荣”，不收过去的“介绍”、“慰安”、“论辩”、和“荣光”。

2) 两种词素颠倒的说法如果在书面语和口语里都相当普遍，一般说，语义用法有区别的，词典里应该兼收，例如，“考查”和“查考”、“离别”和“别离”、“显明”和“明显”、“缓和”和“和缓”。

3) 两种词素颠倒的说法，其一见于个别方言，另一个普遍性较大，词典应该用后者为条目，例如，不用方言性较浓厚的“横蛮”、“道地”、“扎挣”而用较通行的“蛮横”、“地道”、“挣扎”。

9. 词典要尽量选收反映社会发展的新词尤其解放以后大量产生的新词，但意义不明确、生制硬造的词，即使出现在著名的书报刊物或个别作家的作品里，都要避免选收，例如：“经练、昂奋、丰奢、协帮、祝愿”等。戏曲中为迁就词的字数或单纯押韵合辙而生造的词也不要收进去，例如“观瞧、闻听、该应”等。

10. 有些古汉语遗留下来的词,到了现在,无论在书面语或口语中都不经常出现,但在一定的场合中又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朝覲”(教徒朝覲圣地)、“陵寝”(成吉思汗陵寝)、“陛下”、“阁下”、“夫人”、“使节”等等应该收入词典。现在实在用不着的文言词不收,例如“璀璨”、“葳蕤”、“弱冠”、“味爽”、“夭夭”。当收的文言词大致以报刊或政论公文中能用的为限,适当地从近代及“五四”以来的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中补充一些。

11. 方言中的词容易为人民所了解,可以丰富普通话词汇的,应该收入词典,例如“垃圾”、“拆烂污”、“陌生”、“扯皮”、“胡同”。有些方言词虽然为个别的著名作家所使用,但不容易为人民所了解,而且普通话有适当的词可以代替的,不收,例如,“唠嗑”(东北话“闲谈”)、“玉菱”(山陕等地称“玉蜀黍”)、“红苕”(四川话“白薯”)、“血锅巴”(陈登科《活人塘》,苏北话“血块”)、“猫”(周立波《暴风骤雨》“猫在那里”,东北话藏躲的意思)。

北京话是北方话的代表。由于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长期影响,它逐渐取得普通话的领导地位。除了“取灯儿”(火柴)、“洋刺子”(玻璃瓶子)、“老爷儿”(太阳)、“肉杠子”(猪肉铺)、“忽喇巴儿的”(无端地、凭空地)、“格涩”(与人不同)已经缩小到只有北京少数人还在使用的土话以外,现代汉语词典对于在北京话里习见于书面的方言词应该从宽收入,在比例上要比任何其他地区方言词多收一些。

有些非常习见于《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著名白话文小说中的方言词,例如“劳什子”、“促狭”、“恁地”等等,没经过详细方言调查之前很难断定在北方方言中已经消失。为了便于帮助读者阅读与普通话的形成有密切历史关系的文学名著,这些非常习见

的历史性的方言词应当破例收入词典中。

12. 北京话里的儿化词选收的原则如下：

(1) 儿化不儿化，意义上大有分别的两个词，都应收入。例如小人儿：小人，信儿：信。

(2) 儿化不儿化，意义上虽相联系，但词类不同的两个词，都应收入。例如盖儿(名词)：盖(动词)，包儿(名词)：包(动词)，错儿(名词)：错(形容词)。

(3) 虽然没有区别意义或词类的作用，但北京话里必须儿化的词，应该注明。例如手腕儿、媳妇儿、桃儿。

(4) 可儿化可不儿化的词，词典里不加儿，例如手儿、酒儿、烟儿、粉儿。

(5) 某些作品里出现的儿化词，北京话根本不说的，不收，例如云儿、月儿、泉儿。

13. 直接借入音译的外语词已经被现代普通话吸收的，收入词典，例如：但书、企业、吨、逻辑、托拉斯、布尔什维克。有些音译的外语词，“五四”前后通用而现在改用意译的，词典里应该把意译的列为条目，音译的附在底下，例如“民主”和“德谟克拉西”、“独裁”和“狄克推多”、“扬弃”和“奥伏赫变”、“水泥”和“水门汀”(江浙话)、“士敏土”(广州话)。音译、音兼意或意译的词有分歧的，词典里取普遍性较大的(例如“生产力”比“生产能力”普遍)、译得确切的(例如译“劳动日”比译“劳动时间”确切)列为条目，其他译名列为附目。两种译名现在都通用的(例如“康拜因”和“联合机”)，都列为条目并注明参见。

不合于汉语发展规律的外语词，如过去“洋泾浜语”的“那模温”(第一号)、“刚白度”(洋行买办)，东北“协和语”的“满员”(客

满)、“荒轧”(粗轧)、“见回”(监工)等等,词典里一概不收。

14. 术语的选择以它在社会上应用范围的广狭为标准,不以它在该科学技术部门中的重要性为标准。那些冷僻的,只有各种少数专家才知道的专门术语,本词典一概不收。在编纂过程中,编者对于专门术语的选收和释义都应该听取各科专家的意见。下面举一些应该选收的术语作例子。

(1) 选自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等方面的,例如:“政体、决算、通货、仲裁、否决权、照会、国书”。

(2) 选自工业、农业、林业、渔业、畜牧业、水利、交通运输、医药卫生等方面的,例如:“刨床、电力网、绿肥、嫁接、母树、水源林、鱼汛、种畜、水文、拦河坝、车次、坡度、针灸、抗生素、血型”。

(3) 选自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方面的,例如:“行星、光年、子午线、气压、海拔、盆地、冰川、矿床、微积分、短波、共鸣、白热化、原子能、饱和、元素、宿主、温床、变种”。

(4) 选自哲学、史学、语言学、文学和艺术范围的,例如:“一元论、世界观、命题、演绎、编年体、通史、标准音、元音、辅音、传奇、乐府、散曲、弹词、单弦、旋律、道具、素描、浮雕”。

(5) 选自军事科学范围的,例如:“桥头堡、制高点、鹿砦、梯队、巷战、战略、战术、游击战、运动战、火箭炮、氢弹”。

(6) 选自体育运动范围的,例如:“田径赛、接力、拳击、举重、摔跤、水球、铁饼、双杠、蝶泳、跳伞”。

15. 现代汉语普通话里仍然使用的汉语历史上最重要的术语,表现各历史时期汉族生活和文化特征的语词及职务名称,叙述重要的世界历史事实的语词,都应该选收,例如:“玄学、清谈、太

学、风水、道家、科举、八股文、扶乩、小篆、状元、钦差、太后、保甲、公社、母权、木乃伊、武士道、轴心国”。

16. 流行较广的与宗教崇拜或宗教生活有关的名词或术语，应该选收，例如：“菩萨、施主、住持、戒律、衣钵、法师、活佛、道场、斋月、阿訇、古兰经、圣经、十字架、教廷、神甫、洗礼、弥撒、圣诞节”。

17. 标识着现代不同的民族首先是国内各少数民族生活特征或职务名称的词，应该选收，例如：“哈达、氍毹、噶厦、代本、堪布、呼拉尔、红军、红场、卢布、卢比、英镑”。

18. 专名除种族、部族或民族的名称以外，姓氏、人名、地名、山名、水名、国名、年号及书名等等，现代汉语词典里不收。朝代名称也不收，但概括性的时代名称应该收入，例如“春秋、战国、两汉、三国、南北朝”。人名、地名中除本身具有人名、地名的意义以外还有其他意义而变为普通名词的，也应该列为条目，例如：“诸葛亮”（例如说“三个诸葛亮”）、“华尔街”（美国财政垄断集团的同义词）、“龙井”（通称该地出产的茶）、“茅台”（通称该地出产的酒）。

关于种族、部族或民族的名称，选收的原则如下：

(1) 选收比较显著的现代种族、部族、民族名称，例如“黑人、印第安人、哈萨克人、乌克兰人、吉卜赛人、犹太人、蒙古人、藏族、维吾尔族、苗族、瑶族、黎族、索伦、鄂伦春、塔塔尔、东乡、仡佬、民家”。有碍于民族团结的旧名称不收。

(2) 在中国或世界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并且在现代史学著作中常被提到的古代种族或部族，例如“匈奴、鲜卑、女真”。

19. 普通话里不同意义色彩或使用于不同文体及语法结构的同义词（此即“近义词”）有丰富语言的作用，应该全部收入词典，例

如：“消灭”和“歼灭”、“违抗”和“反抗”、“把握”和“掌握”、“老头儿”和“老头子”、“药铺”和“药房”、“诞辰”和“生日”、“履行”和“实行”、“便”和“就”。意义色彩的用法完全相同的同义词(即“等义词”)应该在语言里加以规范,以消灭用词的混乱现象,并减轻学习人的负担。词典编者对于等义词当然不能凭主观硬性规定哪些用哪些不用,但是根据语言的实际调查材料选择普遍性较大的作为规范的词,因势利导,扩大影响,那是完全正确的。普遍性较大的等义词在词典里列为条目,使用范围较小的等义词列为附目。例如“教室”和“课堂”、“课室”、“讲堂”是等义词,“教室”的普遍性最大,词典里列为条目,“课堂、课室、讲堂”附在它的底下,表示推荐前者为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词,后者是备参考的等义词(列为附目的等义词也要收入检词表,以便查考)。几个等义词使用都相当普遍的或者一时难以判断普遍性的的大小的,应该一律列为条目,用互见法加以注解,例如“衣服”和“衣裳”,“纸烟”和“烟卷儿”、“香烟”。

20. 有一些名称后来成为缩简的词。假使这些缩简词已经在普通口语里通行并且在政论、法令文件或典范的文学作品里广泛地运用起来了,应该收入词典,例如“少先队”(少年先锋队)、“劳卫制”(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文工团”(文艺工作团)、“中共”(中国共产党)。尚未定型或使用范围很狭小的缩简词不收,例如“匪特”(土匪特务)、“劳保”(劳动保护)、“基建”(基本建设)、“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大学)。

21. 成语典范地表现了劳动人民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它作为流行引用的材料,以一定的组织形式固定在语言里,我们不能随意改换它的组成部分。有些成语是以句子形式表现的(例如“火烧眉毛”、“猫哭老鼠”、“笨鸟先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些

是以词组的形式表现的。词组形式的成分中,有些是“四字对称”格式的(例如“藕断丝连”、“铜墙铁壁”、“三心二意”、“眉飞色舞”、“缩手缩脚”),有些是非对称格式的(例如“家常便饭”、“无的放矢”、“实事求是”)。许多成语起源很早,到今天还有现实的意义,仍然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用,这类成语词典里应该酌量选收。有些不属于成语性质、结合比较自由、表现某些习惯用法的词组,例如“来得及”、“看不起”、“眼前欢”,也可以酌量选收。

古代沿用的成语,其中某些词现代换用了比较通俗的词,词典里如果选收这个成语,就应该用现代通用说法而不用古代的,例如用“拔苗助长”(有指明出处必要时,在注解中说明它的原文),不用“揠苗助长”。

此外,有些固定格式的语法结构(例如“越……越……”、“又……又……”、“非……不……”、“以……为……”、“管……叫……”、“为……而……”)也应该收进词典里,在结构中的第一个词的条目下著录,并引例说明其用法。

附 注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二卷,第669页。

② 关于是非词、词的类型等构词法的问题,语言研究所第二组正进行专题研究,将有报告发表。这里只就几种主要类型的复合词说明选收的原则,挂一漏万是难免的。

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

刘庆隆

收词是编写词典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收词的适当与否直接关系到词典的质量。人们评论一部词典时,常常先提到的就是收词问题。不是说收的哪些词没用,就是说哪些有用的词没有收。当然也还有一些别的意见,但总起来看,以这两方面的意见为最多。就一部词典来说,虽然不少人提的都是这两方面的意见,但具体的要收哪些,不收哪些,各个人并不一定相同,而且还可能是截然相反的。比如对《新华字典》的收字,不少人总觉着收字太少,要求多收一些,所以每次修订都增加了一些生僻字。也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新华字典》是一本普及性的现代汉语语文字典,收六千多字不少了,作为一本为使用普通话服务的字典,收的字足够用了。又比如对《现代汉语词典》收词的意见,有的要求多收古代汉语词汇,有的认为这些不能多收;有的主张不收大家都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用的词语,有的认为这些词语非收不可。可以说是意见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尤其是当字典词典品种很少的时候,各界人士都用一本字典,一本词典,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提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2年1期,此次选收有改动。

出了各种不同的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编写字典词典的人,一方面要广泛地听取意见,一方面也要有自己的见解。这就是根据字典词典的编写宗旨,制定收词原则。凡是符合这些原则的,就要坚持;不符合的,就要修改。不能人云亦云,随风摆动,那样是做不好收词工作的。每本字典词典都有自己的编写宗旨,在收字收词方面也应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千篇一律。我们词典工作者对字典词典的收字收词,一定要根据编写宗旨来衡量,不能从个人的爱好和需要出发。评论别的字典词典的收字收词,也应该本着这样的原则,意见才能中肯。

统计一部词典的收词,往往只是算收作条目的词语有多少,其他方面照顾的词语不计算在内,这是很不科学的。一部词典里收录的词语,除作为条目者外,在其他方面交代的是大量的。比如《新华字典》里收的复合词、短语等,除加方框(“[]”)者外,用“(一子)(一儿)(一头)”、“连”、“叠”等方式和在注释前边。举例里交代的词语,更是大量的,数目要比加方框的多得多,这些也应计算在收词的范围之内。一部词典的收词,不应只考虑到作为条目的,应该有个全面的安排,哪些作为条目,哪些用加前缀、后缀、重叠等方式交代,哪些在注释、举例中交代。根据每部词典的特点,采取合适的方式处理。这样安排,从表面上看,作为条目的,数量不一定很多,但整部词典著录的词语是相当丰富的。每部词典大都是这样做的,只是不是有意识的作为收词的一部分罢了。如果有意识的和收词联系起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一定会使收词工作做得更好。

收词工作牵涉到的问题很多,下面只就现代汉语字典词典的收字收词问题,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对议论较多的几个方面,谈

点儿粗浅的意见。

一

关于《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的收词,这些年来,听到和看到了不少的意见,对这些意见应该很好地消化,提高《现汉》的收词质量,使它更符合国务院的指示精神。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说:“为了帮助普通话的教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在1956年编好以确定语音规范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词典,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写在《现汉》前言里的编写原则指出:“这部词典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在字形、词形、注音、释义等方面,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现汉》的编写,就是遵循着上述原则进行的。总的看来,基本上体现了这个编写原则,但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里也包括收词。

《现汉》的收词应该鲜明地体现出词汇规范,其他现代汉语语言文字词典虽不必都像《现汉》这么强调,但在普通话词汇规范方面,也要起到应起的作用,完全不考虑规范化是不合适的。至于如何体现规范化,各部字典词典可以采取适合自己特点的方式,不必强求一律。

二

《现汉》到现在有五种铅印本,从收词看,可以分三种情形。一、1960年的试印本,二、1965年的试用本送审稿和1973年的试

用本,三、1978年的修改本和1980年的重排本。前两种是内部送审的本子,后三种是发行的本子。

1958年开始编写时,制定的编写细则,其中关于收词的规定有十八条,主要精神是:选录词汇应以普通词汇为主。普通词汇,是普通话的核心词汇。普通词汇里的单纯词必须保证不漏收,合成词和词组是否立专条,看是否需要注释而定。不收一般方言词汇,但已经屡在书刊上出现的,酌量选收,选录的标准从严。选收一部分在现代书刊中经常出现的古代汉语词汇,偶尔一见的,不收。成语只收现代常用的。单字只收现代单用和在合成词或成语中出现的。专科词汇选收常用的,已经进入到一般语言中的。

根据这个收词精神编出的试印本,正文共收词语四万三千条。只见于姓氏、人名、地名的字和一部分较生僻的字,收在检字表内,约三千个。另编人名、地名约五千条,作为附录。

1965年修改成的试用本,为了备查,多收了一些生字,随之而来的,也就多收了一些古代汉语词汇和方言词汇,正文增到约五万条。(前言中说共约五万三千条,数目不确,因为号码机跳号,多数了约三千条。)取消了人地名附录和检字表中的生僻字。

1978年本,条目增到五万六千余条。新增收的条目中,生僻字、古代汉语词汇、方言词汇占的比重较大,造成了生僻字、古代汉语词汇、方言词汇越来越多的局面。《现汉》开始编写时,规定的收词原则是不从古代汉语著作中选词。1978年本在增补词汇时抛开了这个原则,而是以1975年前后的“社会情况”作为收词依据,比如当时搞“评法批儒”,法家的词汇就要多收,从而一定程度地偏离了原来的收词宗旨。这虽是一个小的插曲,但也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出,对词典的收词,非要有一个坚定的宗旨不可,不能随风

摇摆,否则,一定会走弯路。

三

现在以 K 母所收条目为例,比较一下三次铅印本的情况。所以选用 K 母,是因为 K 母居中,比首尾字母出入小些。首尾字母宽严的差距大些,比如 B 母,试印本收单字 377 个,1978 年本收单字 722 个,几乎增加一倍。Z 母,试印本收单字 745 个,1978 年本收单字 1105 个,增加不到二分之一。现将 K 母三种本子的收词情况列表如下:

	试印本	试用本	1978 年本
总条数	1177	1406	1528
单字数	250	372	380
古汉语数	32	94	141
方言数	34	40	55

从上表可以看出,试用本比试印本多收了 229 条,其中单字多了 122 个,古代汉语词汇多了 62 条,方言词汇多了 6 条,这三项共多了 190 条,普通话词汇只多收了 39 条。1978 年本比试印本多收了 351 条,其中单字多收了 130 个,古代汉语词汇只多收了 109 条,方言词汇多收了 21 条,三项共多了 260 条,普通话词汇只多收了 91 条。这个统计可能不大周密,但总的情况没有什么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试用本和 1978 年本增加的条目,生僻字和古代汉语词汇的比重大大增加了。试用本增加了 229 条,生僻字和古代汉语词汇 184 条,普通话词汇 39 条,不到五分之一。1978 年本增加了 358 条,生僻字和古代汉语词汇 239 条,普通话词汇 91 条,只

占四分之一一点儿。

再举几个具体的例子,看看增加的是哪些条目,如:“锴、恺、囟、垵、欬、惕、颞、辘、歆、衍、闾、伉(高大)、榼、匱(古代头巾)、硃、鞞、馐、堀、楛、媵、浚、唵(咽下去)、由、彘、恇、恇、劬、纒、封、戮、騃、跬、褙、鞞、栝(隰栝)、筭、遁、客死、硃硃、倥侗、口语(毁谤的话)、开张(开放;不闭塞)、叩阍、宽假、圪垯、况味、睽异、悃悃、倥偬、劬勩、颞颌、辘轳”等。这些词汇在普通话里是不用的,现在书刊中也难得碰到。如果考虑到阅读古代汉语书籍时可能查考,那又太少了,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何况这些词汇在古代汉语里也没有什么代表性。《现汉》是供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使用的,适当地选收少量的古代汉语词汇是可以的;但是,应该选收那些在古代汉语里经常出现而又需要查考的词汇,不能信手拈来。现在收录的这部分词汇是没有针对性的,是可以不收的,而且也是不应该收的。如果认为《现汉》的词汇太少,还需要增加一些,那也应该首先增收普通话词汇。比如:“开架、开绿灯、开拍、开园、开云见日、炕头儿、烤箱、靠头儿、靠椅、科研、课室、课桌、空调、哭笑不得、枯干、枯焦、苦干、快餐、快件、亏产、愧悔”等。

有的认为,一般读者不可能同时有很多词典,所以使用的人,总希望在一本词典里就能查到所要查找的词汇。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却是难以做到的。一部词典只能收录某方面或某些方面的部分词汇,大型的,可以多收录一些,但总有一部分词汇在某些词典里查不到。如果要求一部词典把所有的词汇收录无遗,包罗万象,那是难以做到的,尤其是像词汇非常丰富的汉语,更是短期内难以做到的。就是能编写出这样一部词典,那篇幅也是非常多的,绝不是一般人都能人手一部,经常翻查的。因此,

每部词典只能收录某些词汇,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是一些负有专项任务的词典,更不能兼收并蓄,这样会两方面都做不好。每部词典篇幅有限,对本领域内的词汇也不能全收,只能选收一部分。如果兼收了其他领域的词汇,势必挤掉本领域里的词汇,这就会成为分内的工作没有做好,分外的工作也做不好,两方面都有欠缺。《现汉》不适当地多收生僻字和古代汉语词汇就是如此。《现汉》是一部以收录普通话词汇为主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就是普通话词汇也不能全部收入,只能选收一部分。多收了其他方面的词汇,就要少收普通话词汇。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普通话词汇,在《现汉》里查不到。其他方面的词汇在《现汉》里查不到,还可以查别的词典,比如生僻字和古代汉语词汇可以去查《辞源》、《辞海》,普通话词汇查不到,到哪里去查呢?常用的普通话词汇在《现汉》里查不到,应该说是《现汉》的收词工作没有做好,古代汉语词汇在《现汉》里查不到,不能算是《现汉》的缺点。因此,每部词典都应该根据本词典的编写宗旨,首先把分内的收词工作做好。

认为《现汉》应该收录古代汉语词汇,还有一种理论根据,就是认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不好截然划分,现代汉语是从古汉语来的,有它的连续性,而且有的古汉语词汇,虽然普通话里不用,但在方言里还使用,因此,应该收录一些古代汉语词汇。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如何划分,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去探讨,从实际工作来看,对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影响不大。《现汉》收的条目,绝大部分是普通话词汇,不是普通话的词汇加了标志,个别的可能处理不当,但绝大多数是没有问题的。上面举的K母的例子,大家也会同意是古代汉语词汇,不是普通话词汇。就是有个别词汇,一时拿不准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收到词典里也不会

有多大问题,何况这些总是少数。古代汉语词汇在方言里还用,这也是方言词汇,对方言词汇的选收,各部词典都有规定,可以照章办事。从这里看,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划分,不致影响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

四

《现汉》收的词汇中有一部分词汇是会说普通话的人比较熟悉的,对这部分词汇是否应该收录,意见比较多,分歧比较大。有的认为这些词汇都是常用的应该收,有的认为这些词汇不需要查,应该不收。这方面的意见在一些人中还是比较尖锐的,说不需要查,可以不收,是客气的。比较不客气的,直截了当地说这本词典对他没有用,他需要查的没有,有的他不需要查。更尖锐的就定为《现汉》的罪状了,认为收词庸俗,像“大哥”、“大粪”、“手心”、“手掌”,不改变这种状况,就不能出版。在一次关于词典的会议上,一个特约的代表的发言,也专批评了《现汉》这方面的收词,结论当然是得大删大砍了。后边的议论不必去说它,这是当时极左思潮的产物。他们根本不了解《现汉》的编写宗旨,更不懂得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精神,认为凡是属于“十七年的”,就必须安个罪名把它打倒。

前面的意见是需要很好地分析的。词典是备查的,不查的词汇收了做什么呢?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不能简单化。所说的“不查”,是就说这话的人说的,还是就所有的人说的?如果所有的人都不查,那当然可以不收。如果只是说这话的人不查,别人还要查,那还是应该收的。实际上所说的备查,只是一部分人,查一部

分词汇,不会是所有的人都去查所有的词汇。比如收两千五百字的《常用字用法举例》和收三千五百字的《简明字汇》,这两本书收的都是常用字,没有生僻字,这也是为了备查的,是供需要这方面内容的人去查的。当然识字多而又不需要这方面内容的人就不会去查。收了三千生僻字的《难字表》,都是收的较生的字,是需要查的,但碰不到这些生僻字的人也不会去查。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去谈“备查”,而要具体地根据编写宗旨去衡量它的收词。如果编一本小学生字典,尽管《难字表》的字是需要查的,但把它都收进去,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不符小学生查字的需要。收进去的倒都应该是一些常用字,因为这是小学生需要查的,虽然对某些人来说,尽管是他们不需要查的。

《现汉》的编写宗旨,是帮助普通话教学,确定(普通话)词汇规范。因此,它应该全面反映普通话的词汇面貌,限于篇幅,它不能把普通话的词汇都收进去,但普通话的基本词汇和部分常用词汇,不能不收进去。会说普通话的人,对普通话的基本词汇和常用词汇,应该说大部分都是熟悉的。但对学普通话的人来说,这些词汇不能说不需要查。实际上学习普通话的人对这部分词汇更是需要很好掌握的,从编写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的手册、双语对照词典等来看,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提这方面意见的人,都是会说普通话的,这是不足为奇的。一位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历史系副教授说,《现汉》对她没用,要查的没有,有的不需要查,这话是可以理解的。这位副教授生长在北京,普通话是会说的,又不从事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的工作,应该说《现汉》对她没有什么用的。但如果客观些,她说话、写文章想完全合乎普通话的规范,想了解某些词汇的意义和某些知识,《现汉》对她还是有用的。

《现汉》的任务是确定(普通话)词汇规范,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定哪些是普通话词汇;二是确定哪些是规范的词汇。不能说只有人们不熟悉的词汇才需要做这两方面的工作,人们熟悉的词汇就不需要,应该说所有词汇都需要做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上越是熟悉的词汇,可能在方言中越分歧,越需要规范。如果把这些熟悉的词汇都排除在词典之外,那么怎样完成确定词汇规范的任务呢?“玉米”、“冰棍”、“太阳”、“保温瓶”等,是大家都熟悉的词汇,但异名很多;“爸爸”、“妈妈”等是大家都熟悉的称谓,但在方言区有许多不同的叫法。这些,词典都应该给它们正名、正音、正义,才能起到规范作用。“柴火”是大家都熟悉的词,但写成“柴禾”的也不少,《现汉》收了“柴火”,没有收“柴禾”,表示用“柴火”较好。又如“盖了”、“逮(dēi)住了”、“撒丫子”、“开瓢儿了”等等,都是北京人所熟悉的词语,《现汉》却没有收,因为它们不是普通话。可见熟悉的词汇不一定是普通话词汇。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词汇,从形、音、义等方面来看,也存在着规范问题。因此,作为确定词汇规范的现代汉语词典不能不收大家都熟悉的词汇。

《现汉》编写细则中规定:“常见的合成词和词组无须特加注释的,可以用来做例。如‘牛肉、锣鼓、搬家、^①思想问题’等。”后来为了节省篇幅,留做例的很少了。这些结构看来都是简单相加,但不能类推,需要多举些例子,便于学习普通话的人掌握这些词汇。比如“鸭子、鸽子、兔儿、兔子、桌子、椅子”,怎么组词,是“鸭子肉、鸽子肉、兔儿肉、兔子肉、桌子腿儿、椅子腿儿”,还是“鸭肉、鸽肉、兔肉、桌腿儿、椅腿儿”,哪是规范词汇,词典里没有照顾,学习普通话的人搞不清楚。这是《现汉》收词方面的不足。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应该顾到词汇的规范,不能不管,更不能背道而驰。

五

《现汉》收的词汇,基本上反映了我们现在使用普通话词汇的情况,就是近些年来出现的许多的新的词汇、新的意义和新的用法,也大都收入词典了。平时习以为常,不觉着有什么新鲜,但如果跟过去的词典对比一下,就会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不小的。现在拿《现汉》和《国语词典》中“劳”和“社”两个字头下的词汇做例,稍做比较,就可以看出大概的情形了。

《国语辞典》(以下简称《国语》)是解放前的“国语推行委员会”为推行国语编辑出版的一部词典,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卷本。解放后对它进行了删节,出版了简本,对比的词汇用的是这个简本,《现汉》用的是1978年本。

《现汉》“劳”下收词汇45条,《国语》收词汇35条。其中两部词典相同的词汇22条,不同的《现汉》有23条,即“劳保、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劳动对象、劳动二重性、劳动法、劳动节、劳动力、劳动模范、劳动强度、劳动权、劳动日、劳动生产率、劳动手段、劳动者、劳动资料、劳方、劳改、劳民伤财、劳模、劳师动众、劳役地租、劳作”;《国语》有13条,即“劳费、劳烦、劳倦、劳心、劳形、劳瘵、劳症、劳人、劳人费马、劳民(使役人民)、劳民(抚慰人民)、劳来、劳苦(慰问)”。“社”下《现汉》收词汇27条,相同的7条,不同的20条,即“社会存在、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分工、社会工作、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社会科学、社会民主主义、社会青年、社会形态、社会意识、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所有制、社评、社戏、社学、社员”;《国语》收词汇20条,不同的13条,即“社

饭、社土、社会现象、社会心理、社祭、社稷坛、社稷臣、社交性、社鼠、社日、社仓、社友、社燕”。

仅从上面的例子,已可以看出这两部词典收词有一大部分是不同的。《现汉》收的反映现在工农生产、学习、日常生活的词汇多,《国语》收的反映过去的事物的词汇多。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些词汇,如“土改、斗争、检讨、批判(批判错误观点)、批评(自我批评)、坦白(坦白交代)、交代(交代罪行)、交通(跑交通、交通员)、交流(交流经验)、交心、管制、政委、政协、蹲点、跑面、片儿会、偏激、偏离、控诉(控诉恶霸)”等,还有现在常说的“端正态度”、“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关系到群众的利益”等等用法,解放前出版的词典都没有收,《现汉》都收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编写的词典,收的词汇是不同的,都反映了当时的语言情况。现在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收词应该把握住现代这个特点,新词新义和新的用法,要尽量收到词典里,使它符合今天的需要。

现在社会发展非常快,每天都有许多新的事物出现,同时也就有许多表示这些事物的新的词汇产生。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不能一成不变,需要经常进行补充,使它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六

现在我们编写的一般现代汉语语文词典,除语词外,都收录了一部分专科词汇,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词典根据自己的编写宗旨和特点,对这部分词汇收录的数量和侧重面虽有所不同,但为了反映社会主义新的政治、经济面貌,都注意收录了一部分哲学、社会科学词汇。一般语文性词典的收词原则,对合成词、

词组的收录是比较严的,一般语词词组收的很少。反映政治、经济的词汇虽然大部分是词组,但为了适应现在读者的需要,收的比较多。当然也不能把这些词汇都收到语文词典里,或者收的过多,那就不是语文词典了。这些应该留给新名词词典或专科词典去解决。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词汇的选取和处理,各词典都是采取积极慎重态度的,收录的词汇,经过了反复对比,多次平衡。在整个编写修改过程中用的精力,比用于语文词汇的大得多。各语文词典大都是这样做的,《现汉》也不例外。只是由于《现汉》负有“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的使命,对各科词汇的收取和安排,花了更多的心思,进行了更多的尝试。但由于在编写修改过程中受到了种种干扰,遗留的问题不少。

1973年《现汉》试用本内部发行后,受到了“严厉批判”,定了很多“罪名”,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收词的,一篇文章中说,“一部词典的编辑思想,既反映在词义的解释上,也反映在收什么词、不收什么词,特别是收不收标志社会变革的新的政治词汇上”。然后指出《现汉》没有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接着就下了结论,“收词上的这种表现是一种反动的政治倾向”,“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随着就出现了一阵狂风,什么要“多收法家词汇”呀,什么“要把消极词汇赶出无产阶级词典”呀,不一而足。现在再看到这些,觉着好笑了,没有人再这么提了,毋庸再去说它。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极左思潮的流毒并没有完全消除,它对词典收词的理论仍有影响。

语文词典收录哲学、社会科学词汇,势必涉及词典的思想性和倾向性问题。我们现在编写的词典,在这方面的编写原则,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处理收词

和释义的,从根本上反映社会主义制度新的结构和面貌。现在编写的语文词典是有明确的思想性和倾向性的,《现汉》也是这样。

语文词典的思想性和倾向性应该体现在词典的整体上,体现在词典的思想体系上。评论词典的思想性和倾向性也应该从词典的整体来看,从词典的思想体系来考虑,不能简单化,枝枝节节地挑出几个问题就下结论。更不能以收了哪几个词语和没有收哪几个词语为依据,就断定它是革命的倾向或反动的倾向。当然不能说收词和倾向性毫无关系,但也不能简单地以收什么词汇和不收什么词汇划线,尤其是不能以个别词汇的收否来论断全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就是收词有倾向性,也应该从收词的总体来看,不能以个别词汇的收不收来概括全书。因为即使收词观点正确,也可能有少数的收取不当,这只是个别错误,不能否定整体。任何一本好的词典,不当之处总是难免的。

词典的思想性和倾向性不能绝对说和收词无关,但主要是由注释和举例表现出来。比如现在我们编写的语文词典里收录了“宗教”、“鬼”、“神”等唯心主义的词汇,但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的,使人们知道这是唯心主义的词汇,它所反映的事物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应该说仍然是唯物主义倾向。反之,解放前出版的词典,有的也收录了“无产阶级、共产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但是照资产阶级的观点解释的,这样的词典仍然是资产阶级倾向。所以,前几年有人曾经提出“把消极词汇赶出无产阶级的词典”,是不正确的,也是行不通的,就是由于把收词简单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两部倾向性完全相反的词典,收录了同样的一些带有政治倾向的词汇,而是解释不同。

收词看来很简单,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收不收一个词,是由多

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否需要收,二、符合不符合本词典的收词原则,三、有关的词汇怎么处理,四、全书收词的平衡,五、注释有无把握,六、出条目还是在有关条目下照顾,等等。因此,有的词汇出不出条目要从多方面去考虑,不能简单地就认为是有某种倾向。更不能像批判《现汉》的文章,因为没有收“总路线、大跃进”等,就说是编辑思想的“反动的政治倾向”,编者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其实《现汉》试印本收了这些词汇,试用本抽掉了,1978年本又收了,1980年重排本又抽掉了。编辑思想是一贯的,编者的立场也没有变,绝不是一会儿革命了,一会儿反动了,始终是从这些词汇在《现汉》里怎么处理为好来考虑的。对一些词汇一时不知道怎么处理好,或者注释没有把握,为了慎重起见,暂搁一段时间,应该是可以的。不能因此就认为是有何倾向或顾忌。收一些注释没有把握的词汇,造成错误,贻误读者,还不如不收。

评论语文词典收词的倾向性,往往只是就政治思想性来谈,很少联系语文词典的任务和它的特点。这样,就难以谈得全面,谈得中肯。今后应引以为戒。

七

现代汉语语文词典收的条目,有词、词素、词组、成语等,而以词为主。词典,顾名思义,当然是收词的,不是词的可以不收。但在目前,除有特殊用途的以外,一般语文词典,不宜这样做。一来,做不到,因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分清词与非词,现在这一点还解决不了。二来,这样做也不符合现在使用词典的需要,因为出现在读物中的是许多方块字,读者不见得一下子就能把词分析得很

清楚。在这一点上不像字典,读者不会去查半个字,也不会去查几个字的一团,但查词典,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读者需要查的也不只是词,还有词组、成语等。从编写方面来说,也需要把词、词素、词组、成语等都收,才能把汉语词汇反映得更全面些,问题解决得更好些。有些词素理解了,由它构成的复合词也可能就理解了,词典里不必把这些复合词都收作条目,事实上也不可能都收作条目。实际上,为了备查,一般语文词典把连词素也不是的构成多音单纯词的表音成分也都收作条目了,比如“玻璃”的“璃”、“孑孓”的“孑”、“蝌蚪”的“蚪”等。也收了少量较长的结构,例如“山雨欲来风满楼”、“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等。这类条目,一般语文词典应不应该收作条目,还可以探讨。比如《现汉》试印本,正文里就没有收多音单纯词的表音成分,而只收在检字表里。长的结构,作为例句也可以照顾,《大汉和辞典》作为附条,也是一种办法。

各部词典的编写宗旨不尽相同,因此,各自的收词范围也不会一致。过去出版的《词典精华》就表明了别的词典不收较长的结构,像“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它就收。普通词典一般不收俗语,《大众辞林》却收罗了不少,这是它的特点。《现汉》原考虑不出条的复词,用来做例,后来为了节省篇幅,收的较少,条目下收的词组(短语)也比较少。一些外语词典条目下收的词组(短语)就比较多,内容很丰富,这是值得借鉴的。如果词典篇幅能容得下,多收一些需要查考的词组(短语),不仅不会影响词典的质量,而且对读者是有好处的。因为有些词收了,读者理解了,但由这些词组成的词组(短语),读者不一定理解。比如懂得了“画”、“圈”、“文”、“山”、“会”、“海”、“窗口”、“行业”等,不一定懂得“画圈儿”、“文山、会海”、“窗口行业”等,把这些结构

放在词条下做例加括注,对读者是很有用的。

《现汉》编写之初,曾设想收词汇三万五千条,试印本收四万三千条,试用本收五万条,1978年本收五万六千条,后两种本子中有部分词条是否应收,前边已提过。从这三种本子的收词看,规定收词汇少些,标准就严一点,规定收词汇多些,标准就宽一点,这种宽严是收录词汇数量所决定的,还不是收得越严,质量就会越高,收得越宽,质量就会越差。因为汉语词汇非常丰富,现在的词典只是从中选取一部分。只要选取适当,不会多收了,质量就差,少收了质量就高。当然收了许多不应当收的词汇,会影响质量,但许多词汇当收而没有收,同样会影响质量。

八

词典篇幅有限,汉语词汇非常丰富,应该从更好地利用词典的篇幅出发,考虑条目的安排。《现汉》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对不同情况,做了不同的处理。但不一致的地方还很多,需要进一步调整。汉语中异名、异体词(指字的写法不同的词汇)、异形词(指颠倒字序、改变个别字的词语)很多,有反映汉语词汇丰富的一面,也有增加汉语词汇混乱的一面。对反映词汇丰富的,多收一些,对增加词汇混乱的,尽量少收。《现汉》异体字、异体词,只收了经常见到的,备查,不常见的没收。像“柴火”写作“柴禾”的虽然不少,但考虑到这样写不合适,也没有收。(这一类也可以收了备查,注中指明不要这样写,应写作××。)收了的分三种形式处理,例如“[仿佛](彷彿、髣髴)”、“[订购][定购]”、“[单方]……也作丹方。”前边的是正条,后边的做“见条”。前边的是推荐用的,后边的是不用

的(加圆括号的)或者最好不用的。关于异名、异形词,《现汉》酌收了一部分,例如收了“玉米”,照顾了“玉蜀黍、老玉米、玉茭、玉麦、包谷、包米、棒子、珍珠玉”等,收了“保温瓶”,照顾了“暖瓶、暖壶、暖水瓶、热水瓶”等,收“一发千钧”、“虎踞龙盘”,照顾“千钧一发”、“龙盘虎踞”,收“筋疲力尽”、“黔驴之技”,照顾“精疲力竭”、“黔驴技穷”。前者是正条,后者是“见条”。这类条目,数量很大,不收,读者查不到,收了又占篇幅。让这类条目多占了篇幅,势必挤掉别的词汇,两相比较,还是少收较好。常见的,影响大的,照顾一些;不常见的,读者可以触类旁通的,一般可以不收。像《现汉》中的“玉米”、“保温瓶”、“冰棍儿”等的异名,不必照顾这么多。四字格可以颠倒的很多,读者一般能够理解,如果用法、修辞色彩没有什么不同的,可以不照顾或不另出见条,像“千钧一发”、“龙盘虎踞”等。“步谈机”下照顾了“步话机”、“步行机”,“断编残简”下照顾了“断简残编”、“断简残篇”。这类条目第一个字相同,也可以不另出见条。《现汉》在这方面处理的是不一致的,出见条的,不出见条的,都有,一般是相隔的远的就出见条。

前面提到的收词素,用不出条的复合词做例,也是为了多照顾一些词汇,又可以少占篇幅。异体字放在正字后面,繁体字放在简化字后面,都不再单独出条,也是从节省篇幅考虑的。以上的处理方式,对读者也有一些不方便,只是两弊相权取其轻罢了。

附 注

① “锣鼓、搬家”,因为有泛指和比喻义,后来收为条目。

《现代汉语大词典》的收词原则*

晁继周

一

语文词典就其功用而言,可以划分为两大类:规范型词典和查考型词典。规范型词典是为促进民族共同语规范化服务的词典,它的规范作用,体现在收词、释义以及通过释义和举例所体现出来的对词的语法功能的规定上。查考型词典是为解决阅读和语言使用中的疑难而编纂的词典。各种历时性词典(如《辞源》《汉语大词典》)、特定内容的词典(如各种方言词典、成语谚语词典)和以特定人群为读者对象的词典(如各类学生词典)等,都属于查考型词典。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应该对规范型词典给以特殊的重视,因为只有规范型词典才能反映某一现代语言词汇系统的全貌。著名苏联词典学家谢尔巴强调指出,从纯语言学观点来看,只有规范型词典才是“科学的”词典,因为这种词典的对象是具体的、实际的语言——某一语言统一的词汇体系。查考型词典则总是一种根据一定原则挑选出来的词的汇集,这种汇集本身不可能构成某种具体的、实际的语言材料的统一体,它不过是该统一体的某种剪辑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中国语文》1992年第3期,此次选收作者变动标题并在文中加了一条注释。

而已。^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基本上属于规范型词典,正在编写的《现代汉语大词典》也是循着规范型词典的标准进行编写工作的。本文拟结合这两部词典的编纂实践谈一谈规范型词典的特点和收词原则。

二

规范型词典具有三个重要特点:

一是共时性。共时性即断代性。共时性词典的编纂目的是描述一种语言在其发展中的某个阶段的词汇材料,而不是像历时性词典那样阐述词的历史演变。语言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可以看作是共时的,根据需求和可能,可以编写出反映各个阶段语言面貌的共时性词典。规范型词典是共时词典中的一类,它以描述一种语言当代的词汇材料为自己的任务。当然,“共时”的概念也是非常相对的,这是因为语言在不断地变化,作为词典编纂工作基础的全部材料,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说不可能是绝对共时的。但是,这种相对性丝毫不会减弱编写共时词典的实际应用意义。一般说来,反映历史上某一阶段语言面貌的共时词典,由于材料搜集较为困难,应该允许年代跨度大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共时”的概念更模糊一些。如《宋元语言词典》阐述的是上起五代、宋初,下迄元末、明初大约 500 年中间的词汇材料。而以反映当代词汇面貌为特点的共时词典,语言材料的处理要求精细一些,准确一些,共时性标准掌握得更严格一些。

二是规范性。这种规范性体现在收词、注音、释义(包括举例)

各个方面。规范型词典的编纂者必须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一种以促进语言规范化为目的的工作,在收词、注音和释义中都不允许有任何一点随意性。词典编纂者在对待语言规范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是墨守某些陈旧的规范法则,而漠视语言的发展,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已经习用的词语或用法长时间地得不到承认;另一种倾向是把界限划得太宽,把某些超出规范的用法也当作规范的一部分。这两种倾向都是应当防止的。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资料的问题。词典编纂必须以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为依据。不依据资料,只是东抄西抄,是“编”不出像样的词典的。另一方面,对资料也要加以分析,见诸资料的词语或用法不见得都是规范的。近些年来,汉语普通话中广泛使用着一个词:“干警”。从构词法上来说,这个词属于联合结构,不同于“民警、刑警、法警、乘警、交警、户籍警”(均属偏正结构)。《现代汉语词典(补编)》对“干警”作的解释是:公安干部和警察的合称。这是确当的。“干警”是个集合名词,相似于“指战员”。“广大公安干警”的说法就很恰当。在“干警”的资料中,有不少“一位干警”“干警小李”等用法,若以这些资料为依据,《现汉(补编)》的释义就要加以修正。词典编纂工作者以严肃的科学态度看待资料,不被数量虽多而用法不规范的资料牵着鼻子走,坚持了规范性的原则。

三是完备性。查考型词典从读者查考的需要出发来编写,不求完备。规范型词典则不然,民族标准语的全部语汇,都属于它的收词范围。像“棉衣、棉鞋、棉毛衫、上班、上课、上工、好看、好听、好玩儿”这类词语,一般查考型词典都可以不收,因为很少有人需要借助词典去求得这些词的解释。而《现代汉语词典》这类规范型词典,则必须收录这些极普通的词语。试想,如果数以万计的这些

普通词语不予收录,规范型词典如何能反映语言的全貌呢?它的推广标准语、促进语言规范化的作用如何发挥呢?当然,一部词典无论规模怎样大,要把一种现代语言所使用的全部词无遗漏地收录进来,是绝对不可能的。这里也有一个如何选词的问题。选词的标准,主要是看它使用范围的大小,出现频率的高低,同时也要考虑词典所收词语层次上的平衡。虽然如此,与查考型词典相比较,规范型词典完备性的特点仍然是值得强调的。

三

下面,我们以《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大词典》为例,谈一谈规范型词典的收词原则。

(一) 如何对待新词新义

近些年来,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词语,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形:1. 反映科技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新事物。科技方面如:硬件、软件、录像、集装箱、软包装、立交桥、机器人、航天飞机、试管婴儿。社会生活方面如:展销、离休、个体户、专业户、万元户、电视剧、国库券、农贸市场。2. 更准确、更精炼地表达思想。过去用很多话才能表达清楚的事物或现象,现在用一个词准确地表达出来,如:人际、代沟、反思、钉子户、关系户、土政策、老大难、热身赛、第三者。3. 新的简称大量出现,如:知青、环保、家电、彩电、彩卷、电大、四化、五讲四美。

有些词,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意义。比如,“同步”和“反馈”原来都是科技术语,现在大量用在语文意义上。“同

步”指互有关联的事物在进行速度上协调一致,如“常州教育设施与住宅建设同步进行”(《光明日报》)，“铁道部组成强有力的指挥领导系统,使各部门、各地区的配套工程,做到同步安排和建设”(《人民日报》)。“反馈”指消息或信息等返回,如“市场销售情况的信息不断反馈到工厂”(《文汇报》)，“一个人应该从一切方面去了解自己,从反馈中认识自己”(《十月》)。“持平”原是形容词,义为公正或公平,可以说“持平之论”;现又作动词,义为数额上与相比较的对象相等,如“职工今年可得奖金大体和去年持平”(《北京日报》)，“本市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完成情况良好,累计收入与去年同期持平”(《文汇报》)。

如何对待汉语中大量出现的新词、新义,哪些应当收,哪些不应当收,这是编写汉语规范型词典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规范型词典对新词新义要取积极的态度。《现代汉语词典》定稿于20世纪60年代初,后来虽做了一些修订工作,但条目增加不多。将近30年的时间,汉语词汇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不能把已经取得普通话资格的大量新词语收进来,规范型词典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它的价值。反过来说,一个新的词语被收进规范型词典,也标志着它的标准语资格得到了承认。《现代汉语大词典》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才能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现代汉语大词典》对新词、新义也不能兼收并蓄,而应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四项:1. 普遍性原则。一个词语,全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说,它的涵义在大多数人中有共同的理解,这个词语就应该得到承认。有些新词,只在部分人中或狭小的地区使用,未得到全社会的认可,规范型词典不应该接受它们。如在北京

地区,一部分人管十元钱叫“一张”,一百元钱叫“一棵”,一千元钱叫“一吨”,一万元钱叫“一方”,这里的“张、棵、吨、方”所表示的“新义”规范型词典是不必理会的。尚未在全民社会中普遍使用的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部分停止了使用;另一部分在社会交际中不断扩大使用范围,以至最终得到全民社会的承认,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规范型词典才能把它们接纳进去。

2. 生命力原则。所谓生命力原则,是说收入规范型词典的词语,不能是昙花一现、瞬息即逝的,而应是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在社会交际中有长久存在价值的。“文革”期间有许多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使用的词语,随着运动的结束,不再使用了。这类词语,规范型词典可以不收。当然,“文革”期间那些特有的词语还是值得汇集一下的,因为它们毕竟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东西,而且在描述那段历史的作品中还会再现,把它们汇集起来用正确的观点加以诠释和说明,无论是从研究语言的角度看,还是从研究社会历史的角度看,都是有必要的,但这不是规范型词典的任务。

3. 必要性和明确性原则。必要性是说一个词由于它的特定意义或特有的表现力而在语言中没有另一个词能够代替它。拿“团伙”这个词来说,它与“集团”一词义近,但又有明显的不同。在规模上,“集团”可大可小,“团伙”一般较小;在感情色彩上,“集团”是中性词,而“团伙”是贬义词,常与“犯罪”“流氓”等词搭配。也就是说,“团伙”和“集团”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能够互相替代的。像“团伙”这样的词,就符合必要性的原则。有些词意义完全相同,使用场合也没有区别,这样的词同时存在只会徒然加重使用者的负担。像展销、展售、展卖,实在没有并存的必要。至于留哪个,去哪个,则要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由人们在使用过程中自然地作出选择(语言发展过程中,经

常进行这样的选择)。明确性是词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条件。一个词,表示什么意思,所指什么事物,应该明白无误,不能既可作这样的理解,又可作那样的理解。旧有的词,由于约定俗成,不存在理解上的问题。“白菜”不会理解为白色的菜,“钢笔”不会理解为钢铁制成的笔。新词也应该具有明确性。“微机”是个新词,指的是微型电子计算机。说到“微机”,人们不会理解为微型电机、微型飞机,或者微型的其他什么机。可见它是符合明确性原则的。有些“新词”则缺少明确性。像“创意*、额度*、缔创、释化”一类明显的生造词,除说话人自己外,恐怕很少有人懂得它们的确切含义。一些滥用的简称也缺少明确性,如“储源、超验、五四三活动”等,听起来不知所云。缺少明确性的词语,影响语言社会交际作用的发挥,规范型词典不宜收录。

4. 构词法原则。词的构成,是依照一定法则的。“解放以来新词产生了很多,但新词里并不发现新的结构类型。”^②我们对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汉语新词词典》收录的1564个复合词的结构类型作了分析,所得数据是:偏正式766个,联合式431个,动宾式228个,补充式31个,主谓式19个,附加式24个,简称65个。合于规范的新词,必须是符合汉语构词规律的,这样的词才会被接纳为现代汉语词汇大家庭的新成员。不符合汉语构词法的生造词,是不会被全民社会接受的。

以上四项原则,最重要的是1、2两项,即普遍性和生命力原则。这两项原则,实际上是“约定俗成”原则的具体体现。一个新词(或新义),在刚刚产生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它“面孔”生,意义不

* 语言发展的事实说明,“创意、额度”两个词不属于生造词,《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已经收录它们。——作者注

明确。及至使用时间长了,使用地域扩大了,全民社会接受了它,它就成了语言大厦中不可缺少的砖或石。

(二) 如何对待古语词

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而且中间从未出现过间断。因此,对于汉语来说,现代语言与古代语言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为数甚多的古语成分还活在现代语言中。在口语中,古语词多已被与之同义的现代词所取代。但是在特定的场合,为了表示庄严、隆重或典雅的色彩,或者为了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古代生活时用来创造真实的气氛,古语词还常被使用。对古语词的使用,不同年龄层次、文化层次的人常常表现出很大的差别,不同的作品形式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凡书面上还在使用的文言词语,都应看作汉语中有生命力的部分,汉语规范型词典不应该拒绝它们。让我们举两个很古老的而现代书面语中还在使用的词为例。“归宁”,义为回娘家看望父母,最早见于《诗经》。《周南·葛覃》:“害澣害否,归宁父母。”两千年后的今天,这个词书面上还在用。“我妻到故乡去作长期的归宁,把两个小孩子留剩在这里,交托我管。”(丰子恺《缘缘堂随笔·晨梦》)一句很白的话,出现这个文言词,读者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可接受。“拾(shè)级”,义为逐步登阶,最早可以追溯到《礼记·曲礼上》:“拾级聚足,连步以上。”这个词现代书面语中使用得更为普遍。曹靖华《飞花集·风物还是东兰好》:“她穿云钻雾,拾级而上。”梁衡《晋祠》:“无论什么时候拾级登山都会心旷神怡。”例子不胜枚举。“归宁”收入了《现汉》,“拾级”收入了《现汉》补编本。《现代汉语大词典》在这方面的尺度还可以放宽些,凡见诸现代资料(引文除外)的文言词

语大抵均可考虑收录。这些词语在词典中仍应标示〈书〉的符号，以有别于现代词语。

（三）如何对待方言词语

方言词语是指流行于个别地区而没有在全民社会中普遍通行的词语。方言词语与全民语言词汇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全民语言中有相当一部分词语就是从方言词汇里吸收进来的。可以说，方言词汇是全民语言词汇的丰富源泉之一。

规范型词典对方言词语不应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现代汉语词典》对一部分在全民范围内较通行的方言词语分别情况作了三种不同的处理：1. 对通行地域广、已被全民社会接受的方言词语，承认它们的普通话地位，如摆设、鼓捣、腰包、二流子、垃圾、尴尬、货色、把戏。2. 有些方言词语已进入全民社会，但主要用在口语中，《现汉》收录时标示〈口〉的符号，如过年（明年）、哈腰、害臊、寒腿、花消、洋车、见方、见天。3. 有些方言词语收入词典时标示〈方〉的符号，如今儿、今朝、头口、毛窝、人客、菘菜。《现代汉语大词典》对方言词语应继续取这种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原则，主要看它们流行地域的广狭和使用频率的高低，依据的资料应以在全国较广大的地区发行的书籍报刊为主。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提供的方言资料很值得重视，因为他们的作品读者面广，影响较大，如老舍、曹禺、邓友梅、刘绍棠、浩然等人作品中的北京方言词语，鲁迅、茅盾、周而复等人作品中的江浙方言词语，郭沫若、巴金、李劫人、沙汀等人作品中的四川方言词语等等。北方方言词语，特别是北京方言词语，在编纂规范型词典时应更加重视。

(四) 如何对待港台词语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台湾、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人社会使用的汉语词汇(简称港台词语)与内地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1. 继续使用旧词语,如塑料称塑胶,圆珠笔称原子笔,幼儿园称幼稚园。这些词过去在汉语中普遍使用过,解放后大陆改用了新称。2. 同一事物使用不同称说,如出租汽车称计程车(香港称的士),导弹称飞弹,录像称录影,宇航员称太空人,立交桥称交流道,立体声称身历声。3. 不同的新造词。台湾地区使用而大陆未使用的词语,如:侦办、研商、研拟、研判、坦承、殷望、亮丽。4. 外来词的不同。台湾经历了几十年的“日据时期”,又一直是个较开放的社会,台湾汉语中的外来词明显多于大陆。日语直接借用词如:坪(面积单位)、看板(广告牌)、便当(盒饭,快餐)。英语音译词如:巴士(公共汽车)、雷射(激光)。英语音译兼意译词如:迷你裙(超短裙)、作秀(表演)。

随着近些年来海峡两岸交往日渐频繁,通过人员的接触,电影、电视、书籍、报刊的交流,原来只在台湾、港澳及海外华人社会使用的词语,在大陆逐渐流行开来。这是这一阶段汉语词汇发展中特有的现象。对港台词语,汉语规范型词典应根据不同情况作出恰当处理。在台湾地区已普遍使用,在全民社会也逐渐流行的新造词,可以收入《现代汉语大词典》,与大陆近年来产生的新造词一起推广使用,接受社会交际实践的检验。同一事物港台与大陆称说不同的,港台用词可以作为普通话原有词语的同义词看待,收入词典。例如,计程车,可以释为出租汽车,并说明“因按里程计价而得名”;电算机,可以释为电子计算机;耕耘机,可以释为拖拉机。

“计程车”“的士”与“出租汽车”可以在词典中并存,经过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最终存优汰劣,约定俗成。有些词,只在港台地区使用,在全民社会尚未流行,它们处于方言词语的地位,可以收入《现代汉语大词典》,但须作出〈方〉的标示。只在港台等地区使用的音译外来词,在全民社会尚无影响,而普通话中已有相应的意译词的,一般可不再收入《现代汉语大词典》。这里应该顺便说到的是,有些现在港台地区还使用的词或义,《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时加了“旧时”“旧指”“解放前”等限制性说明,在编写《现代汉语大词典》时应视情况加以修改。

(五) 如何对待外来词

借用外语词是丰富本民族语言词汇的重要手段之一。根据借用的方式,研究汉语词汇学的学者把汉语外来词分为借词(音译词)、仿译词(意译词)和形译词(直接借用日语中用汉字书写的词语)三类^③。仿译词和形译词与汉语原有词汇界限不很分明,在讨论词典收词问题时不必予以特别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借词——音译词。这类词是把别的语言里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是“最地道的外来词”^④。借词在汉语里所处的地位呈现出很复杂的情况。有些借词已经被汉语完全同化了,一般人已经把它们当作汉语固有的词而不觉得是外来的了,像塔、葡萄、苜蓿、玻璃、琉璃、幽默等。有些外来词只有音译词而没有意译词,如沙发、蒙太奇、苏维埃等。这类外来词进入汉语规范型词典是不存在争议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外来词,音译与意译并存,如:莱塞—激光,盘尼西林—青霉素,梵哑铃—小提琴,德漠克拉西—民主,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等等。

按照汉语发展规律,音译与意译并存的外来词,音译词一般会逐渐被意译词所取代。上述各例中,激光、青霉素、小提琴、民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最后通牒等词已明显呈现出取代相应音译词的优势。规范型词典应该记录和反映这种语言现实。就是说,当音译词已经被意译词完全取代时,音译词不应再在规范型词典中保留位置。反之,如果音译词与意译词呈现并存局面,或者音译词在使用的普遍性上还占有优势,规范型词典可以把它们当作相关的同义词,同时收入词典,而用意译词去解释音译词。《现代汉语词典》在处理上述列举的各组词时采取了同时收入的作法,一是反映了词典开始编写时(距今 35 年前)的语言实际,二是照顾到查考的需要,因为有些外来词的音译形式在解放前的出版物中曾普遍使用过。把少数今天已经不使用的音译词收入词典,对于规范型词典来说,是一种兼顾查考需要的变通作法。

汉语中的音译外来词,一般用汉字表示外语词的近似读者,如坦克(英语 tank)、咖啡(英语 coffee)、沙龙(法语 salon)、布拉吉(连衣裙,俄语 платье)等。近些年来,直接用外语字母表示借词的情形多起来,如 X 光、CT 扫描、B 超、BP 机、T 恤衫、卡拉 OK 等。以前这类词只是偶见,《现代汉语词典》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如不收“X 射线”,而收“爱克斯射线”。现在,直接用外语字母表示的外语词越来越多(科技术语更明显),这类词应被看作是汉语词汇的有机组成部分,词典编纂者必须考虑这些词在规范型词典中应据有的位置。《现代汉语大词典》无疑应该收录这些词。至于条目排序上的具体问题,可以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四

词典的类型划分具有相对性。规范型与查考型是从功用角度对语文词典作的分类,规范型词典并不排斥词典的查考作用,恰恰相反,任何一部规范型词典,都力求较好地兼顾词典作为工具书的查考作用。一部词典,如果完全忽视了查考作用,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存在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规范型词典,它以“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为己任,这一宗旨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但是,从收词范围看,《现汉》也较好地兼顾了读者查考的需要。它所收条目,除“一般语汇之外,也收了一些常见的方言词语、方言意义,不久以前还使用的旧词语、旧意义,现在书面上还常见的文言词语,以及某些习见的专门术语”^⑤。对口语词语、方言词语和文言词语,分别标示〈口〉、〈方〉和〈书〉,以表明它们区别于标准语的特殊身份。这样做,增强了这部词典的实用性,又不影响它的规范性。从《现代汉语词典》到《现代汉语大词典》,规模扩大了,但规范型词典的编写方针不能变。

一部规范型词典应该具有一定的典范性和权威性。这绝不意味着写进词典的东西就一成不变了。语言(特别是词汇)是在发展变化的,规范型词典若不能比较及时地反映这种变化,它就将逐渐失去规范性和完备性。把哪些词语收进规范词典,对它们作出怎样的解释,表示词典编纂者今天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社会交际实践的检验,情况会有变化。在词典的每次修订中,该增的增,该减的减,该改的改,从实际出发,把确定的编写原则坚持下去,这是从事规范型词典编纂的学者们应有的态度和应负起的

责任。

附 注

① Л. В. 谢尔巴《词典编纂学一般理论初探》，载《词典学论文选译》15—1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②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册 230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③④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95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⑤ 《现代汉语词典·前言》，载《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

关于词典的选词工作*

孙崇义

选词工作是词典编纂的基本工作,在今天,更可以说是汉语规范化工作在词汇方面的具体表现。现在先介绍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在这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后提出在工作中得到的一些体会和接触到的一些问题,来向大家请教。

首先要提到的是《国语词典》(1937—1945年出版,1948年重版)。《国语词典》是“国语运动”的产物,是一部在当时做了一些新的尝试的词典。它在当时要作为“中国语文普通单词、复词或习用成语的总汇”(本书黎序),所以收词范围是今古新旧兼收并蓄的,总量约十万条。它在选词上做的工作,我们可分两项来谈:

(一)判断什么是一个“词”什么不是一个词,这本来是语法学者不容易彻底解决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词典工作者,因为工作上的要求,对此可总得有个决定的态度,否则,他就无从组织起一部词典来。《国语词典》对于单音词的选取,大体还承袭着过去一般字书,再加上了新的解释,对于复音词就不能不费些斟酌了。当时大致是拿能不能独立运用,能不能作一个意义单位来做取舍标准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

的。一些动宾结构、动补结构的词，结合得太自由的都未收，例如“打人”“打狗”不收而“打把式”“打耙”收；“打死”“打伤”不收而“打倒”收。对一般向心结构的词大体都是如此处理的。

(二) 开始著录了以前词书从未著录的北京口头语词。根据的资料以清末民初的北京白话报刊、白话小说为主，还有一大部分是编辑同人随时采录的日常生活里的口头语词。这种办法，好处是记录了活生生的语词，缺点是没有系统，不够全面；而且所记的难免有通行面狭窄的北京土话。总括《国语词典》的选词工作是搜集得较广，但缺乏科学的计划，所以多而有漏；编辑时又未能做精密分析，所以各词的时差、地差等等都没有做详细的交代。

在《国语词典》之后，大辞典编纂处编的是几部字典，但是我们在字典工作中是向词本位的方向去努力的，比方《学文化字典》的注解就不拿一个个汉字做本位。例如“瘡”字注“瘡子……”，“痙”字注“痙挛……”这标志着一般趋势，新华辞书社的《新华字典》更进一步地标志了这种趋势，罗常培先生和吕叔湘先生的报告^①里已经提到。还有《简明字汇》的举例，《同音字典》的语汇，目的不同，但都关系着选词工作，起记录了“现在通行”的词汇的作用。

本年度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试编一个《现代汉语通用词汇长编》(初步底稿)，预定年内完成。这个工作是为《现代汉语通用词汇》(《现代汉语词典》的基本词目)搜集资料，打基础的。它的定词标准大致在语音上看是否成为一个起讫的段落，在语法上看是否能做一个意义单位，总起来说还是看它是否能独立运用。另外把作为词根而构词能力很高的词素，比较有独立意义的词组、成语，也暂为列入，问题较多的作为附例。收词范围是：说北京话的人口头常说的，报刊上常见的，有广大读者的权威著作和文艺作品上常用

承继着过去而不是同过去割断的。现代汉语的学术新词大半按文言的构词规律造成,这自然因为在现阶段我们用的文字还是方块汉字,另一方面也未必不因为文言的构词方式凝固性较大,正像现代科学上专名术语欧美各国多用拉丁文。例如在现代语言里我们用“没”来表示“不存在”,而“无缝钢管”并不叫“没缝钢管”;“锯树”、“锯木头”是现代语,林业上用的可是“伐木场”、“伐木工作”。这种现象在规范化工作上应取什么态度,这是应该注意的。

(四) 现代汉语有不少的外来语词,其中大部分已和汉语融合成一体。对此我们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过去外语音译有许多是照闽广语的音直译过来的,北方人和原文对照,往往莫名其妙。今后希望科学院对此作一决定(已通行的译名不必改)。第二,汉语语法和外语语法,不一定完全对应。在外语是个“词”,翻到汉语里也许成为“词组”,比如“集体农庄”“五年计划”在俄文都是词,在汉语里都成为“词组”,选词时对此应考虑如何处理。

(五) 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大部分的语词当然来自北方话。但是现代汉语的另一源泉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而那时的作品并不完全拿实际的语言作基础,其中有大部分继承着旧诗词曲的文艺语言。“云儿”“月儿”之类今天还时常在书面上出现,究应如何处理?再则,戏曲、说书等由特殊规律构成的语词,在现代汉语里应占什么地位?

另外还有许多和语音学、语法学交叉的问题,像轻音重音、儿化、词类等,这里不多谈。

总之,我们在选词方面虽然由于工作上的必要,接触了一些问题,也试想解决一些问题,但缺乏理论指导,一直是“暗中摸索”。如果说有些许经验,也没有作科学的总结。以上提出的不过是这

个问题的发端,希望引出大家的宝贵意见,解决一些困难问题,给将来的词典编辑工作打好基础。

附 注

① 罗常培、吕叔湘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

略谈收词*

闵家骥

任何一种语言,它的词汇就像海洋,一般很难统计出一个精确的数字。语言愈发达,它的词汇也就愈丰富。词典是收集词汇加以解释供人检查参考的工具书,但一般词典篇幅有限,它不可能收录所有的语言词汇,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因此,词典就有该收哪些词和不该收哪些词的问题。收词是词典编纂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它直接关系到词典的质量。词典是供人备查的,如果需要查的词没有,而不需要查的词相反很多,这样的词典对于读者有什么意义呢!目前出版的词典愈来愈多,对于如何收词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还很少交流。为了抛砖引玉,现就《现代汉语词典》(简称《现汉》)有关收词情况,谈谈自己在工作中的体会,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

《现汉》是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编写的,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1年第3期。

语规范化服务的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的一部中型的语文词典。它的收词范围大致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一)《现汉》主要记录普通话语汇,以利于普通话教学。词汇来源主要选自五四以来重要作家的文艺作品、全国性的重要报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般论著和学校课本;也选录一些口语词汇。口语词汇指普通话里口语色彩较重,除剧本、小说对话等口语体文字外在书面上不大用的,如:挨个儿、花消、兜底、急茬儿等等。

(二)《现汉》要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但它毕竟不是教科书,而是供人们检查参考的工具书。所以,在收词上除了记录普通话语汇外,还酌收了一些文言词语和方言词语。

文言词语主要选录一部分在现代书刊中还常见的,如:等闲、体魄、光大、鼎力等。对于文言词语一般来说收录从严,但为了备查,也酌收了一些现在已不常见的文言词语,如:窳惰(yǔduò,懒惰)、倂张(zhōuzhāng,欺骗;作伪)等。

方言词语主要收录一些常见的,如:啥子(什么)、红果儿(山里红)、挺括(硬而平整)等。北京话也是一种方言,但是地位比较特殊,变成普通话语汇的机会较多,《现汉》收录北京话语汇也就较宽。

关于专科语汇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自然科学专科语汇主要选录一部分中学课本、通俗读物里出现、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社会科学专科语汇主要选录一般政治书籍和报刊上经常出现的在政治学习、文化学习上有用的部分。专科语汇有些已经在一般文章和口语中出现,一般人已经在使用,应该认为已经进入普通话语汇。自然科学方面,如:牛、金、扳子、彩色片;社会科学方面,如:法庭、教材、工资、人生观等。

为了备查,《现汉》也选收了一些不久以前还使用的旧词语,如:堂会、茶房、哀启(旧时死者亲属叙述死者生平的文章)、关防(旧时政府机关、部队用的印信)等。

(三)《现汉》是词典,不是字典。但汉语里一个字,也常常就是一个单音节词,所以除了收录词、词组、成语、熟语等外,还收了大量的常用单字。另酌收了一些用于地名、人名、姓氏等方面的字和现代不常用的字。也收录了一些具有构词能力的单字,如:侷(促)、齷(齷)等。

《现汉》所收条目包括字、词、词组、熟语、成语等,共约 56,000 余条,其中语文条目约占 75%,科学技术条目约占 15%,哲学社会科学条目约占 10%。

二

《现汉》主要记录普通话语汇,但不是全部收录,只是选择其中一部分具有检查参考价值的普通话语汇收入词典。例如以“田”字领头的词语,掌握的资料共有 116 条,只收录 24 条,占 21%。

《现汉》收哪些词不收哪些词,有一定的原则:凡收入词典的,在字形、词形上必须符合汉语词汇的规范。由于汉语的历史发展以及用汉字造词的方便,现代汉语中同义语繁多的现象极其突出。这有其丰富的一面,也有其混乱的一面。凡是足以丰富普通话语汇的,一般尽量收录;凡是徒然滋长混乱的,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澄清。对于各类语汇的处理,根据《现汉》1978 年版,它的取舍标准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一)词义不容易理解而需要解释的列为条目,如:豁达(性格

开朗；气量大）、窥探（暗中察看）、况且（连词，表示更进一层）等。

（二）超出字面意义而具有引申和比喻意义的列为条目，如：田间（田地里，有时借指农村）、天地（天和地，比喻人们活动的范围）、阎王（阎罗，比喻极凶恶的人）等。

（三）只包含一个词素的单纯词列为条目，如：葡萄、徘徊、朦胧等。

（四）一般复合词的词素拆开来不能两两单独成词或其中一个词素不能单独成词的列为条目，如：肌体、饲料、毕生、其间等。词素拆开来两两能单独成词又没有引申和比喻意义的一般不收，如：酒壶、猪肉等。

（五）词素（包括可以单独成词的）之间关系结合紧密、表示一个完整概念的列为条目，如：田地（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地步）、了不起（不平凡；优点突出）等。有一些关系结合不太紧密，中间可以插入别的成分的离合词，一般也列为条目，如：洗澡、革命等。动补结构的复合词中间可以插入别的成分而字面意义又比较清楚的一般不收，如：站稳、搞好、填平等。形容词修饰名词的，如果认为是词组的一般不收，如：白纸（白的纸）、大树（大的树）。

（六）重叠式列为条目的：

1) 单字不能单说，必须重叠用的；或虽可单说而重叠式与原来单字意义有别的，如：茫茫（没有边际看不清楚）、每每（副词，表示同样的事情不只发生一次）、宝宝（对小孩儿的爱称）等。如果重叠式可以自由推广的，不列为条目，如：慢慢、推推、逛逛等。

2) 带重叠词尾的形容词，如：绿油油、慢腾腾、懒洋洋等。

3) AABB式 AB不能单用的，如：花花绿绿、轰轰烈烈、婆婆妈妈、密密麻麻等。AABB式而能用AB的不收，如：规规矩矩、整

整齐齐等。ABAB式也不收,如:许许多多、冰冷冰冷等。

(七)儿化的词列为条目的:

1) 书面上有时儿化有时不儿化,口语里必须儿化的,如:今儿(今天)、压根儿(根本;从来)、烟卷儿(香烟)等。

2) 儿化不儿化有区别意义的,如:鸭子儿(鸭蛋;鸭子是鸭)、花子儿(供观赏的花草的种子;花子是乞丐)等。

(八)一般常用的简称列为条目,如:土改(土地改革的简称)、水工(水利工程的简称)、理疗(物理疗法的简称)等。

(九)文言词语常见于书面的列为条目,如:田畴、田猎等。过于生僻而书面上不常见的古词语一般不收,如:掎克(póukè,聚敛贪狠)等。

(十)已经进入普通话或书面上常见的方言词语列为条目,如:尴尬、里手、像煞有介事等。俚语不收,如北京话里的“撒丫子”(放开步子跑)、狗屁着凉(死)等。

(十一)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专科术语列为条目,如:法人、辩证法、田径赛、田间管理等。太专门的专科术语不收,如:社会成层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一种观点,把社会划分成各种层次)、逻辑原子论(企图用纯演绎的形式逻辑方法来说明世界的结构的一种哲学学说)等。

《现汉》基本上不收的,除了上面顺便已经提到的外,还有下面一些:

(一)人名、地名不收,只有个别情况才列为条目:

1) 有比喻义的人名,如:诸葛亮(三国时蜀汉政治家,……一般用来指称足智多谋的人)、武松(《水浒传》中人物之一,……一般把他当做英雄好汉的典型)等。

2) 照顾个别字读音的地名,如:监利(jiàn lì,不念 jiān lì。县名,在湖北)等。

(二)属于生造的词语不收,如:丰奢、协帮、但却、盛旺等。

(三)属于串讲句子性质的不收。如:何其相似乃尔、跨黄河过长江(口号)等。

(四)基本式和重叠式都有的形容词,一般收基本式,不收重叠式,如收“颤悠”,不收“颤悠悠”、“颤颤悠悠”。如果词义有细微差别,基本式和重叠式都收,如收“悠荡”,也收“悠悠荡荡”。基本式如果不及重叠式常用,则收重叠式不收基本式,如收“满满当当”,不收“满当”。

三

从“田”字领头的词语选录的情况来看,《现汉》收词是比较谨严的,特别注意了词汇的规范。没有收入词典里的词,有些是字面意义比较清楚而不需要解释的,如:田边边、田禾、田径选手;有些是书面上和口语里不太通用的,如:田房、田假、田税;有些是不合乎词汇规范的,如:田陇(应为田垄);有些是属于太土的方言词,如:田唇(田埂);有些是现在书面上不常见的文言词,如:田田、田祖;有些是人名不属于《现汉》收录范围的,如:田军(萧军)、田文(孟尝君);有些是不能作为词收入词典的,如:田地里、田野上。这些取舍基本上符合《现汉》收词的基本原则。但是,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也不难发现一些问题,例如:收了“堤岸”、“海岸”,没有收“田岸”,收了“房产”、“地产”,没有收“田产”;收了“红花草”、“紫云英”,没有收“田菁”等。还有:田坂、田基、田家、田舍郎、田主等,是

否收录也是可以考虑的。我们认为,词典收词太滥,徒占篇幅,有损于词典的科学性。但是反过来,收词过严,读者需要查的词词典没有,也是不可取的。《现汉》收录单字和词语共 56000 余条,对于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阅读报章杂志和一般著作基本上够用,但并不是尽善尽美,读者需要查而词典没有收录或读者不太需要查而词典收录的,也不在少数。这涉及词典普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高收词质量,使词汇的收录更合理,更符合实际的使用。下面是《现汉》在选词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由于认识上的不完全一致,对《现汉》收词有一定的影响,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对提高《现汉》收词质量有直接的意义,对于一般语文词典的收词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方言词语的收录,在现代汉语性质的语文词典里占多大比重比较合适?《现汉》方言词语收录比较严,以 A 母为例,收录的方言词有:阿(ā)、艾子、碍难、爱人儿、庵堂等共十三条,只占 A 母全部条目的 3%。而以“阿”(ā)字领头的方言词语,我们掌握的资料就有:阿哥、阿公、阿猫阿狗、阿木林等,这些《现汉》都没有收录。我们认为,推广普通话并不排斥或消灭方言,相反,丰富普通话语汇,方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来源。普通话里有许多词我们已不觉得它是方言词,其实都来源于方言,如:搞、垃圾、吃不消等。所以,只要不是太土或通行面极窄的方言词,如:鹅头(江浙一带方言,傻瓜)、触火(四川方言,倒霉)、谣哈(安徽方言,谣言)等,词典暂时可以不收外,一些书刊和文艺作品里经常出现的方言词都应考虑选录。收一些方言词,注上和它对应的普通话词语,不但不影响推广普通话,相反有助于普通话的教学,尤其目前还没有一本全国性的方言词典的情况下,语文词典多收一些方言词显然是必

要的。

(二)现代汉语性质的词典要不要收古代文言词?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可能不会有多少分歧,一般都认为可以酌量收录一些,但收录多少这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就《现汉》收录文言词的情况来看,凡是强调《现汉》的主要任务是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一般倾向于少收;强调《现汉》主要供读者备查的,一般倾向于多收。这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哪一种意见比较可取,这就需要很好研究。从理论上说,现代汉语性质的词典不应该收录过多的文言词,但从读者使用的角度上来考虑,多收一些文言词也是很需要的。问题是,任何一部断代性质的词典能否同时解决阅读古代、近代和现代作品的问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现代汉语性质的词典不应该收录过多的文言词。可以酌量收录一些,是指那些五四以来常见于书刊中的文言词语。这些常见的文言词语很多实际上已经进入现代汉语,成为普通话语汇的一部分,如:败绩、庇佑、版图、暴政、奔驰等。这些文言词,在《现汉》(试用本)里都没有标〈书〉,无疑是作为普通话语汇来处理的。不常见于现代书刊中的生僻的文言词,可以在所收录的单字下适当照顾,如“酩酊”,《现汉》是这样处理的:酩 máo 𠃉[酩酊](máotáo)大醉的样子。

(三)见词明义的词,词典收不收?《现汉》没有把见词明义作为不收的标准,收了许多词义比较容易理解的词,例如收了“大拇指”、“演戏”等。但是,在处理上也有不太平衡的地方,例如“挨”(ái)字领头的“挨打”、“挨饿”、“挨整”、“挨揍”等,一条也没有收。可见,见词明义无形中对《现汉》收词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收“太甚”,不收“太狠”;收“吃零嘴”,不收“吃零食”等。所以,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探讨。见词明义一般说不能作

为词语不收的标准,因为什么样的词一看就明白,常因人而异,很难有一致的认识。词典是供备查的,词义容易理解的词,读者翻查的机会显然少于词义难解的词,词典无疑应该优先收录那些词义比较难解的词。名物词如“白菜”“萝卜”等虽然都懂,但词典还是要收录的。至于词典收“一”、“二”、“三”、“四”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些条目是作为常用单字或者说是作为基本词汇收入词典的。

(四)解放以后出现的和政治生活、社会变革有密切关系的新词、新义怎样收录? 1958年《现汉·凡例》说:“本书所收语汇,主要是五四以来口语里和书面上通用的,对解放后的新词、新义更着重选录。”但是实际上《现汉》对于新词新义的选择一直是比较严的。这不仅语文词典是这样,百科性的词典也是这样。下面所列的表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词典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部分词语的收录情况。

词目	现代汉语词典(1978)	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	辞海(1979)	新华词典(1980)
革命委员会	√	×	√	√
赤脚医生	√	×	√	√
赤脚教师	×	×	×	×
红卫兵	×	×	×	×
红小兵	×	×	×	×
五七干校	√	×	×	×

照例词是没有阶级性的,只要符合该词典规定的收录范围和选词标准,一般来说都是可以考虑的。但这类条目显然不一样,从表上所举的几个例子来看,有些是已经收入词典而后来又删去的,可见对于这类条目的取舍非常明显地带有编者的一定的政治倾向性,这就是词典阶级性在收词上的表现。要收什么词,总是和这个

词所代表的涵义一起来考虑的。词典收录词汇并不是它的最后目的,词典收词是为了解释这些词语,以供读者检查参考。收词的阶级性就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的,并不是说词有什么阶级性。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同是全民的词,为什么这类反映政治比较敏感的词词典收录时要这样的谨慎。收词谨慎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到底怎样处理这类词比较合适、妥当。有些词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当然可以不收,但有些新词已常见于这一时期的书刊,如果词典都不收,这就值得研究。我们认为,每一部词典不一定都收,但总需要有词典记录这些词汇。也许收录这些词语对现阶段意义不十分大,这些词大家都熟悉,不太需要查词典。但是,过一个时期,不明白这些词的词义而需要检查参考的人,肯定会愈来愈多。所以,词典记录这些词语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四

最后,就如何做好词典的收词工作以提高收词质量,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向大家请教。

第一,收词要合理。我们常听到有的读者说:“你的词典我要查的词没有,不要查的词全有。”这是批评词典没有收录他所需要查的词。那末,是不是多收一些词就解决问题了呢?也不是,因为后一句是说“不要查的词全有”。可见,读者也并不认为收词多就好,收了一些无用的词,势必徒占篇幅,挤掉有用的词。这个要求实在很高,但是词典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做到收词合理。所谓合理,就是要严格按照所规定的收词原则收词,尽量把应该收录的

词收入词典。

第二,收词要规范。收入词典里的词要合乎约定俗成的原则,不收哪些谁也不懂的生造词。词汇规范化应该是词典收词的一条重要原则。但生造词如果在书面上和口语里已经通用,词典还是应该考虑收录,如:满员、昂奋等。

第三,收词要宽严一致。这一般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尤其是集体编写词典,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识不一致,就必然会出现收词宽严不一的问题,例如《现汉》收了“货源”、“财源”、“资源”、“水源”,但没有收“兵源”、“病源”。又如收了“说明书”、“保证书”,但没有收“申请书”、“挑战书”。所以,集体编写词典更要掌握好收词宽严的尺度,以保证词典的质量。

第四,收词要有特色,要自成体系。编词典一般都希望词收得全一些,生怕漏掉,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办不到。一部词典不能包打天下,不可能解决古今中外语言上所有的问题,而只能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词典收词要有特色,要自成体系。有人认为《现汉》不是语文性的,而属于小百科。这种看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现汉》收录的哲社和科技条目,两项加起来约占全书的25%,作为语文词典这个比例是否合适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

第五,收词要平衡。所谓平衡,就是在属于收词范围内的同一平面(或层次)上的一些词,词典里基本上都要照顾收录。应该收而没有收,属于漏收;不应该收而收了,属于误收。漏收、误收都是在平衡上出的问题。例如“自由”、“平等”、“博爱”,是属于同一平面上的一组词,《现汉(试用本)》收了“自由”、“博爱”,没有收“平等”,就是漏收。又如“绪论”、“引言”、“导论”也属于同一平面上的

词,《现汉》收了“绪论”、“引言”,没有收“导论”,也是漏收。漏收是指那些必须收而没有收的词,可收可不收的词没有收不算是漏收。

第六,收词要分清词和非词的界限。词典收录的范围虽然不限于词,兼收词组等,但它毕竟以收词为主,如果不注意分清什么是词,就会把一些不该收的词组作为词收入词典。这一点,《现汉》很注意。如收“新书”、“旧书”,不收“新床”、“旧床”。因为前者是词,“新书”指将出版或刚出版的书;“旧书”指古书。中间不能插入别的成分。但“新床”、“旧床”中间可以插入“的”,显然是词组,同时它又没有其他特殊的意义。

第七,收词要照顾释文中出现的词语。凡词典里出现的词,一般都应作为条目收入,特别是以词注词的那个词,否则读者查了半天会仍不知道他所要查的词是什么意思。《现汉》一般来说很注意这一点,但也有疏忽的地方,例如“吃零嘴”、“吃嘴”均注为:吃零食。但“吃零食”没有收。如果读者不懂“吃零食”是什么,查了也等于白查。所以“吃零食”也应该列为条目,可注为:吃正常饭食以外的零星小吃。又如“搅乱^②”注为:弄乱。《现汉》没有收“弄乱”。“弄乱”不仅从词义上说应该列为条目,而且从语音上说也很需要,例如吴方言区的人就可能读作 lònɡluàn,不读作 nònɡluàn。在注文中,一般用来叙述的词也需要照顾到。又如,“拜^③”注为:用一定的礼节授与某种名义。但查“授”下没有“授与”,只有“授予”。“授与”是否同“授予”读者就不清楚,所以从收词的科学性上来说,这样的词应该列为条目。

第八,收词要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第一手的资料。编词典没有大量资料等于搞无米之炊。只有大量占有资料才可以有选择的余地,而提高收词质量,则更主要的是靠第一手资料。

关于汉语规范型词典收词 问题的思考*

晁继周

苏联语言学家和词典学家谢尔巴曾把词典分为规范型词典(又称学院型词典)和查考型词典两类,这是从功用上对词典所作的分类。规范型词典是按规范原则编写的当代共时性词典,它以一种实际存在的具体语言的词汇体系为描述对象,其编写宗旨在于推广标准语,促进语言的规范化。查考型词典是为满足某种查考需要而编写的词典。所有的历时性词典和以历史上某一阶段的词汇为描述对象的共时性词典都是查考型词典。现代共时性词典中,为某些专业服务的专科词典,为某些特定人群服务的词典(如学生词典、农民词典等),记录方言特殊词汇的方言词典,专门收录、解释新词新义的新词词典,都属于查考型词典的范畴。完全按描写原则编写的现代语言词典也属于查考型词典。规范型词典并不排斥查考需要,人们为了正确地理解和使用某种语言的词汇,就要从这种语言的规范型词典里寻求指导和帮助。规范型词典与查考型词典的不同,首先表现在它特有的收词原则上。

以确定汉语词汇规范为目的而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以下作《现汉》)是我国第一部汉语规范型词典。本文拟结合这部词典

* 这篇文章曾收入《中国辞书论集·1999》。

的编写和修订,谈谈对规范型词典收词问题的认识。

一

任何一部规范型词典,都要反映某种具体语言的词汇体系的全貌。对汉语规范型词典来说,就是要全面反映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词汇面貌,这就要求它在收词上必须具有完备性。只要是普通话词汇,不管它们难易程度如何,有无查考需要,都属于汉语规范型词典的收词范围。普通话中有大量习见常用的词,一般人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到词典中去寻求解释。对单纯以释疑解难为编写宗旨的查考型词典来说,这样的词确是可以少收或不收的;而对规范型词典来说,这样的词却是非收不可的。我们以“麻”、“棉”两个字为例,比较一下《现汉》(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和《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汉语学习词典》(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的收词情况。

《现代汉语词典》里“麻”字领头的字共 40 条,它们是:麻包、麻痹、麻布、麻袋、麻刀、麻捣、麻豆腐、麻烦、麻纺、麻风、麻花¹、麻花²、麻黄、麻黄素、麻将、麻酱、麻秸、麻经、麻雷子、麻利、麻栎、麻脸、麻木、麻木不仁、麻雀、麻仁、麻纱、麻绳、麻绳菜、麻酥酥、麻线、麻药、麻蝇、麻油、麻渣、麻疹、麻织品、麻子、麻醉、麻醉剂。

《新华词典》里“麻”字领头的词有 11 条,它们是:麻痹、麻刀、麻风、麻黄、麻将、麻木不仁、麻雀战、麻仁丸、麻沙镇、麻疹、麻醉。其中麻雀战、麻仁丸、麻沙镇是《现汉》没有的。

《汉语学习词典》里“麻”字领头的词也是 11 条,它们是:麻痹、麻烦、麻风、麻利、麻乱、麻木、麻木不仁、麻钱、麻酥酥、麻疹、麻醉。

其中麻乱、麻钱是《现汉》没有的。

“麻”字领头的条目,《现代汉语词典》大大多于《新华词典》和《汉语学习词典》。《现汉》收而《新华词典》和《汉语学习词典》未收的词,一部分是习见、常用、易懂的词,一部分是依据构词规律可以推知意义的词。《新华词典》和《汉语学习词典》比《现汉》多收的词,则都是这两部词典根据查考需要增加的。《新华词典》是语文兼百科词典,因而收了麻雀战(游击战战法)、麻仁丸(中成药)、麻沙镇(地名,南宋时印书业中心,所刻本世称“麻沙本”)。《汉语学习词典》是主要为中学生学习语文知识使用的词典,所收的麻乱、麻钱都是中学语文课本上出现的词,有查考需要。

“棉”字领头的条目情况大致类似。《现汉》“棉”字下共收合成词 33 条,而《新华词典》只收 5 条,其中 3 条与《现汉》同,另外 2 条棉黄萎病、棉枯萎病为专科条目;《汉语学习词典》只收了棉絮 1 条。《现汉》收而另外两部词典不收的词,多是常见易懂和见字明义不太需要查考的词。

从以上列举的情况可以看出,《现汉》收词着眼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完整的词汇体系,而其他查考型词典则着眼于读者查考的需要。

收词完备与查考需要并不矛盾。首先,即便是习见、常用的词,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准确理解,正确使用,仍需要词典给予指导。其次,一个词是否习见、常用也是相对而言的。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人觉得好懂,另一地区、另一行业的人却可能觉得不好懂。比如农具和作物名称,农村人都懂,城市人就可能不懂;反之立交桥、斑马线等城市人司空见惯的事物,农村人却有可能要通过词典去了解 and 认识。还有一点,中国是一个方言分歧严重的国度,

很多普通话词语,方言地区另是一种说法。像上午、下午这样的极普通的词,方言中就有前半天、后半天,前半晌、后半晌,前晌、后晌,上昼、下昼等多种说法。规范型词典全面收录普通话语汇,有利于方言地区的人学习普通话,对推广普通话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规范型词典全面反映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对一种语言的词汇作全面的科学的研究,离不开一部描述该语言词汇的规范型词典。《现汉》就给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人提供了充分而科学的依据。词汇是语言诸要素中变化最快的,通过规范型词典的编写和适时修订,可以留下词汇发展变化的轨迹,这对语言学,特别是词汇学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正因为如此,谢尔巴强调指出:“从纯语言学观点来看,只有学院型词典(规范词典)才是‘科学的’词典,因为这种词典的对象是具体的、实际的语言——某一语言统一的词汇体系。查考型词典则总是一种根据一定原则挑选出来的词的汇集,这种汇集本身不可能构成某种具体的、实际的语言材料的统一体,它不过是该统一体的某种剪辑而已。”(谢尔巴:《词典编纂学一般理论初探》,《词典学论文选译》15—1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二

普通话词汇总数是无法数计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数量巨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词汇总量巨大,而词典规模有限,规范型词典怎样反映语言词汇的全貌呢?我们说,规范

型词典所收词汇是语言全部词汇的缩影,而不是部分。就像一幅地图,它的尺寸要比它所表现的地理区域小得多,但它的准确性应该毋庸置疑。规范型词典规模有大小之别,它们在记录语汇的数量上会有区别,但它们在对语言词汇体系的反映上都应该是全面的,均衡的,而不应是支离破碎的和失去平衡的。这也像地图,比例尺大,它表现的地理状况更精细些;比例尺小,它表现的地理状况稍简略些,在轮廓和准确性上,它们是没有区别的。质言之,规范型词典是一种语言完整词汇体系的缩影;而查考型词典要么是根据某种需要而截取的该体系的一部分,要么是超体系的,如兼收历史词或方言词等等。

规范型词典要成为一种语言词汇体系的缩影,在收词上就应该以科学的词频统计为依据。从理论上讲,一部规范型词典的收词总数,应该与词频统计中的排位相一致。比如词典收5万条词,这些词应该占词频统计的前5万位;若收10万条,则应该占词频统计的前10万位。当然,在词典编纂实践中,是不需要也不可能做到这样精细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词频统计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开展。词频统计的科学性,取决于材料选取的科学性(包括材料的时间性和各种题材、体裁的合理分布)。所用材料不同,得出的词频统计结果也必然有异。我们可以拿两次较大规模的词频统计结果做个比较。第一次1979年开始,1985年完成,编成《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以下简称《频率词典》),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第二次1981年开始,1986年完成,编成《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以下简称《词频词典》),由宇航出版社出版。《频率词典》列出

16593 个词的使用频率(使用度大于 2),《词频词典》列出 46520 个词的使用频率(统计频度大于或等于 5)。我们把这两部词典的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按频率排列的前 20 位分别做一下比较。单音节词《频率词典》前 20 位是:的、了(•le)、是、一、不、我、在(介)、有、他、个、这、着(•zhe)、就(副、连)、你、和(介、连)、说、上(名)、人、地(•de)、也;《词频词典》前 20 位是:的、在、是、一、和、了、有、中、这、上、不、个、也、就、之、他、到、而、时、说。双音节词《频率词典》前 20 位是:我们、主义、他们、什么、自己、人民、起来、革命、时候、工作、这样、没有(副)、社会、同志、可以、知道、问题、这个、出来、怎么;《词频词典》前 20 位是:我们、可以、他们、没有、人民、这个、就是、问题、国家、革命、自己、不能、由于、所以、因此、作用、一般、什么、情况、方法。(“中国”一词在《词频词典》中排位第 10,因为是专有名词,本文统计时未计入。)可以看出,由于统计材料的不同,所得出的词频统计结果也会不同。单音节词中,两部词典排在前 20 位的有 15 个是重合的,有的甚至连排序也一致,如“的”同属第一位,“是”同属第三位,“一”同属第四位。不重合的是少数,而这少数不重合的词如果放在更大范围内看,则仍会重合。双音节词出入更大一些,前 20 位中重合的只有 9 个。但如果把我们的观察由 20 个扩大为 200 个,乃至 2000 个,那么两部词典统计结果的差异就会缩小。

80 年代完成的两次词频统计工作,主要是为对外汉语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而做的。为适应汉语规范型词典编写的需要,我们应该尽快着手进行新的词频统计工作,统计出使用频率的词语应不少于 10 万条。

三

词典需要不断地修订。规范型词典尤其需要不断地修订。它的每一次修订,除修正错误、完善体例外,最重要的是反映语言的发展,促进语言的规范。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新词的产生,旧词的消亡,词义的变化,都应该及时地反映到规范型词典中来。

在规范型词典的每一个修订周期中间,都会有新词产生,也会有旧词消亡,而新词产生的速度要比旧词消亡快得多。7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汉语中随之出现了许多反映新事物、新概念、新思想的词语。吕叔湘先生1984年撰文说:“新词新义每天都在出现,不留意不觉得,一留意吃一惊。”他称自己做了一件“有点傻气的事情”,把1983年5月15日和26日的《文汇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查出来有32个词语是《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的。(见《辞书研究》1984年第1期)这32个词语中,至少有5个属于1978年8月《现汉》定稿以后出现的新词,它们是:待业、余热、特区、展销会、集装箱。同一种报纸两天中出现5个新词,速度确属不慢。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有一个新词新义新用法课题组,一直从事新词新义研究工作。根据他们的统计,汉语中新词语“每年以数百条乃至上千条递增”(《文汇报》1998年8月27日:《面对新词语的丰富世界》)。如果按新词增加与旧词消亡的自然比率修订词典,词典每经过一次修订,篇幅就会扩大一次。但是,一般说来,一部有影响的词典的篇幅是不宜无限膨胀的。这就要求词典修订中在增加新词的同时,必须对原有的收词

作相应的调整。

一方面要增收新词,另一方面要删除一定数量的原已收录的旧词(不见得全是已经消亡的),在这个调整中,如何保持规范型词典收词的适度与均衡,这是词典工作者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处理这个问题时,要综合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以词频统计为基本依据。规范型词典考虑收词的时候,首先应该选收那些在语言使用中出现频率高的词。《现汉》50年代开始编写的时候,电脑还没有被广泛应用于语言学研究,还无法对词频作出精确统计。90年代修订《现汉》,已经有部分词频统计材料作参考。对词频统计的结果也要加以分析,因为词频统计所使用资料的时间性和分布的合理性直接影响着词频统计的结果。在《频率词典》中,“主义”占双音节词第二位,“手榴弹”占三音节词第一位,现在看来都不很恰当。任何时候,词典工作者的语感和语言学素养在正确选词中都起着主导作用。在词典修订中,我们还应该借助电脑做另一项统计工作,那就是统计规范型词典已收的词有哪一些一段时间(如2~3年)以来未在报刊上出现过,这个数据可以为修订词典时删减条目提供参考。

其次是注意词汇内部的系统性。浩如烟海的现代汉语词汇并不是一盘散沙,不同的词语单位之间通过相互制约、相互依赖以及同义、反义等关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词汇的系统性中,与规范型词典收词有密切关系的是相关类、同义类和反义类。相关类如:上游—中游—下游,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二十四节气,亲属称谓等。这类词是成“套”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同义类如:吝啬—小气,凉爽—凉快,空旷—空阔,窥测—窥伺—窥探等。这类词之间的联系,虽不如相关类密切,但由于词典中常采取用同义词

释义的方法,用来释义的词不出条,会使被释词的解释没有着落。反义类(包括对义类)如:强大—弱小,安全—危险,奇数—偶数,提高—降低,具体—抽象,北—南,内场—外场等。这类词在使用中常对举,释义时也常有“相反”或“相对”的提示,因而同组词中的某个词漏收,会使读者明显察觉词典收词上的缺失。词典在增删条目时,一定要注意到词汇内部的系统性,要“瞻前顾后”,保证收词的全面、均衡。

第三是适当照顾查考的需要。规范型词典收词,主要着眼于词频,但也不能忽视查考的需要。从国外情况来看,规范型词典有两种类型,一种以法国的《法兰西学院法语词典》为代表,该词典只收现代法语的规范词语,只有两万多条,法语教师把它当作经典,而普通读者买的不多,因而社会影响并不太大。另一种以英国的《简明牛津现代英语词典》为代表,它除了收录现代英语的规范词语外,还收了在阅读中可能遇到的旧词、古词、方言和专业词语等,都分别加上了各类词语的特殊标记。《简明牛津现代英语词典》是一部具有很高权威性的英语词典,由于能满足读者查考的需要,几乎家家必备,社会影响很大。我国的《现汉》大体上走的是《简明牛津现代英语词典》的路子,它“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又从查考需要出发,“收了一些常见的方言词语、方言意义,不久以前还使用的旧词语、旧意义,现在书面上还常见的文言词语,以及某些习见的专门术语”。(《现汉·前言》)方言词语、文言词语加了特殊标志,使它们与词典的主体——普通话词语不相混淆,从而使推行规范与照顾查考需要很好地结合起来。事实证明,《现汉》的做法是成功的。

以上这三点,对规范型词典来说,其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词

频统计是规范型词典收词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依据。词汇内部系统性不能破坏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掌握的原则。而照顾查考需要是在收词受篇幅限制时才变通运用的。规范型词典的规模不同,贯彻上述原则的侧重点也有不同,大型的可以特别强调词频原则,而小型的可以适当强调查考需要,这种小型的词典已经具有某种查考型词典的性质了。

四

当前,汉语规范型词典收词上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如何对待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所使用的词语,一个是如何对待外来词语。

世界上说汉语的不但人多,而且地域很广,除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外,还有广大的海外华人社会。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人社会使用的汉语词汇存在着某些差异。香港城市大学邹嘉彦教授曾对上海、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五地各选一种中文报纸进行用词频率的统计比较。他对上海《新民晚报》、台湾《中央日报》、香港《明报》、澳门《华侨报》、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1996 两年的全部用词进行统计,发现有显著的不同。以上海《新民晚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相比,前 100 个词中相同的词有 66 个。在新加坡报纸上,6000 个词可以覆盖 90%;而在上海报纸上,1 万个词才可以覆盖 90%。可以看出,中国大陆所使用的汉语词汇,要比海外华人社会丰富得多。但是也有些词语只在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使用而不在中国大陆使用。笔者手边有两部友人赠予的词典,一部是《港台语词词典》,

另一部是《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仅就这两部词典所反映的情况看，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所使用的有别于中国大陆的词语为数相当不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区间交往日益频繁，原来只在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使用的词语，在大陆逐渐流行开来。这是这一阶段汉语词汇发展中特有的现象。对这些词语，汉语规范型词典应根据不同情况作出恰当处理。在大陆以外地区普遍使用，近些年在大陆也逐渐流行的词语，可以收入规范型词典，有的则需要加上方言的标志。《现汉》1996年修订本已经吸收了一部分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使用的词语。比如，在收“出租汽车”的同时，也收了“计程车”和“的士”，后两个词加了方言标志。普通话中原有“卷铺盖”一词，比喻解雇或辞职；现在“炒鱿鱼”又从香港等地区“引进”，而且大有取代“卷铺盖”之势，《现汉》修订本让它们并存，在使用中接受选择。

借用外语词是丰富本民族语言词汇的重要手段之一。汉语借用外语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音译，一种是意译。音译与意译并存的外来词，音译词一般会逐渐被意译词所取代。近些年来，汉语中音译外来词呈上升趋势，有些词甚至直接以外文形式出现。完全用汉字的如黑客、迷你、伊妹儿；部分用汉字部分用外文的如B超、BP机、AA制、T恤衫；完全用外文的如CT、DNA、UFO。我们认为这是汉语发展中的正常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中国走向世界，必然会出现这种不同语言语汇的互相渗透。一种新的科技成果传入中国，有时人们还来不及给它起汉语名字，甚至还来不及把它的外文名字音译成汉字，就已经广泛应用起来。这时，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直接用外文原名称呼它。而当意译的名称姗姗来迟的时候，它们的外文名字已经被人们普遍

接受并认可了,它们的中文名字反倒成了多余的了。比如中国的普通百姓都懂得到医院去做 B 超和 CT 检查,如果一定要他们改说“B 型超声诊断”和“X 射线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不但是舍简求繁,而且是行不通的。既然属于汉语词汇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汉语规范型词典就应该在经过认真选择之后,给它们一席之地。《现代汉语词典》1996 年修订本在词典正文后面附列“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语文词典中关于词汇 重叠形式的处理*

刘庆隆

词汇重叠在汉语里是很普遍的现象,有许多词汇可以重叠,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在口语里,重叠形式尤其丰富。普通语文性词典里把一部分书面上常用的,原基础形式一般不单说的重叠词汇,作为条目收录。比如“纷纷、脉脉(眇眇)、云云、彬彬”等。其他大部分重叠形式,一般都不著录,对口语里的词汇的重叠形式,就更不予以理睬了。个别词典收录的多些,普通话中常说的,收录了一部分。这也只是举例性质的,不全面,不系统。总的说来,词典里对词汇的重叠形式,照顾的是很不够的。读者只能从词典里检查到个别重叠词汇,不能够从词典里了解到词汇重叠的全貌。为了帮助读者学习普通话,词典里应该比较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

讲语法的书,讲词汇的书,大都谈到词汇的重叠形式,这是必要的。人们学习了这些书,可以明了词汇重叠的规律和形式,并能了解一些词汇重叠后意义、用法、感情色彩等方面的变化。但这对学习普通话的人来说,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看到哪些词汇可以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语文研究》1985年第3期。

这样重叠,哪些词汇重叠后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变化。这就需要有一本收录较全的重叠词汇词典,至少有个较全面的词汇表。现在还缺乏这样的工具书,一般语文词典,尤其是推广普通话的词典,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

词汇的重叠形式数量很大,都作为条目收录,一般词典没有这么多篇幅。另一方面也不必要,像“你去看看、听听音乐、绿绿的叶儿、红红的花儿、快快走、举得高高的、好好儿商量商量”等中的重叠形式,不必作为条目收录。这些只要把规律说清楚了,并告诉读者哪些词汇可以这样重叠,读者是能够掌握的。

一

在普通话里,重叠有两类情形。比如:“大哥,大哥你就听听大家的吧!”“你们快去,快去,快去帮帮忙!”“来来来,咱们好好儿商量商量!”“他远远地招着手说:再见!再见!”这里的“大哥,大哥”,“快去,快去,快去”,“来来来”,“再见,再见”等,是一类情形。“听听、帮帮、远远、好好儿、商量商量”等,又是一类情形。前者,口语里重叠之间可以停顿,书面上可以用标点符号分开。不但可以重叠一次,有时可以重叠两次,甚至几次。而且读音、形态、意义、用法等也没有什么变化。后者,一般重叠一次^①,说时中间不停顿,有的读音发生变化,像“看看、听听”,第二个字读轻声。有的可以加词尾“儿”,像“好好儿、乖乖儿”,有的意义用法也有某些变化。词典里要照顾的是后一类,前一类可以不管,这不是词汇问题。

“圈圈儿(quān//quānr)、板上钉钉(dìng//dīng)、心心相印、官官相护”等等之类用法,也不是词汇重叠,词典里不作为重叠形

式来处理。

词典里照顾的重叠形式,是就一般常用的词汇重叠来说的,至于在特殊场合偶然一用的,可以不照顾。比如:“人家说你小气,你就不能大方大方?”小儿语中的“吃包包,喝水水”等也不照顾。

这里讨论的范围是就普通话说说的,至于古汉语或方言中的重叠情况,也不在讨论之列。个别例子有的来自方言或古汉语。

重叠形式涉及的词汇比较多,包括名词、指代词、方位词、数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象声词、量词等,只有连词、介词、助词等不重叠。虽然重叠形式涉及许多词汇,但也并不是这些类的词汇都可以重叠,只是其中一部分词汇可以重叠。有的词类可重叠的多,像动词、形容词,有的词类可重叠的少,像数词、指代词。动词、形容词的重叠形式类型多,其他词类的重叠形式比较单纯。不管单纯或复杂,各类重叠形式都不能简单类推。这就要求词典里不但要交代规律,还要在条目里表示出来。正如标注词性一样,既要交代总的原则,又要逐条注出。

二

下面先按词类简略地、概括地叙述一下各类词汇的重叠情况,然后再探讨根据各种不同情况,在词典里如何分别进行处理。

a) 名词虽然很多,在普通话里可以重叠的不算太多。单音节名词(或名词性成分)的重叠形式是AA, A·A, A·A_儿, 像“村村、社社、队队、县县、省省”(AA式),“本本^②、框框、娃娃、猩猩、蛛蛛”(A·A式,第二个字读轻声),“道道_儿、朵朵_儿、蚰蚰_儿、圈圈_儿(quān·quanr)”(A·A_儿式,第二个字轻声儿化)。还有一些亲属

称谓也作 A·A 式重叠,比如“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等。A·A 类和 A·A_儿 类,在普通话里不多,有的方言里比较多。现在普通话里说的,有的也是才从方言里吸收来的,比如“本本、框框、杠杠、条条_儿”等。

AA 类,含有“遍指”的意思,这一类数量较多,如“人人、家家^③、户户、世世、代代、山山、事事、校校、厂厂、楼楼、院院、树树、字字”等。

还有 A·AB, ABB, AABB 的重叠形式。像“毛毛雨、滴滴金、泡泡纱、娃娃生、窝窝头、猩猩草”(A·AB 式),“艾窝窝、叫哥哥、水咕咕、小九九”(ABB 式,还有汗津津、火辣辣一类,在形容词内讨论),“山山水水、风风雨雨、枝枝节节、世世代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头头脑脑、花草草、虫虫蚂蚁、坛坛罐罐、家家户户”(AABB 式)。A·AB 类和 ABB 类,数量不多, AABB 类数量较多。AABB 式中有的含有“泛指”、“遍指”的意思,像“世世代代、昏昏晃晃、角角落落、家家户户、花草草、坛坛罐罐”等。有的 AABB 式的原基础形式不说,比如“家家户户、坛坛罐罐、须须爪爪、坑坑洼洼、星星点点、风风火火”等^④。还有一部分 AABB 式,读音、用法一如形容词 A·ABB 式,比如“婆婆妈妈、风风火火、疙疙瘩瘩、疤疤痢痢”等。

b) 数词可以重叠的不多,有“一一、万万、三三两两、三三五五、千千万万”等。还有一部分成套的形式,像“一 X 一 Y、一 X 半 Y、三 X 两 Y、三 X 五 Y, 七 X 八 Y、千 X 万 Y、X 千 X 万”等。数词重叠后(或成套的形式)不表示确切数目,一般表示数量少(如“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数量多(如“千千万万、千军万马”)或不确定的数目(如“三三两两、三三五五”)。

c)单音节量词一般可以重叠,含有“遍指”的意思,有的可以带词尾“儿”。比如“支支、匹匹、件件、桩桩、棵棵、粒粒、筐筐、车车、斤斤、尺尺、个个儿、块块儿、回回儿、串串儿”等。只用在“一”后的量词,像“写一手好字、好一派北国风光、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等等,这样用法的量词不重叠。并列的量词重叠形式是AABB,像“颗颗粒粒”。有的单音节量词,平常用时不并列在一起,重叠后可以并列,像“桩桩件件、口口声声”等。双音节量词不重叠,也不用重叠形式表示“遍指”的意思。

d)代词一般不重叠,口语里有时出现,像“说话要有礼貌,不能这么你你我我的。”

指别词个别的可以重叠,像“某某”,多数不重叠。“某某”和“某”意义用法没有什么差别。

e)方位词一般单用不重叠,“上”和“下”可以重叠,用法像形容词,例如“上上等、下下策”。并列的方位词有的可以重叠,“像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等。这类重叠形式含有“泛指”的意思。

f)动作动词一般可以重叠,重叠后含有“连续”、“尝试”的意味,口气比较缓和委婉。有的动词不重叠,像“是、有”等,以及助动词、趋向动词等。单音节动词重叠后,第二个字读轻声,有的可以带词尾“儿”,比如“看看、听听、说说、唱唱、写写、画画、算算、想想、走走、跳跳、坐坐儿、歇歇儿、等等儿”。这一类重叠中间可以加“一”,比如“看一看、想一想”,意思、用法一样。双音节动词的重叠,一般是ABAB式,像“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商量商量、商议商议、斟酌斟酌、指点指点、指导指导”等。有一部分双音节动词可以作A·ABB式重叠,比如“指点→指指点点、指画→指指画画、比

画→比比画画、商量→商商量量、对付→对对付付、敷衍→敷衍敷衍、勾搭→勾勾搭搭、晃荡→晃晃荡荡、哆嗦→哆哆嗦嗦、摸索→摸摸摸索、磨蹭→磨磨蹭蹭、将就→将将就就、拼凑→拼拼凑凑、遮盖→遮遮盖盖、来往→来来往往、抄写→抄抄写写、缝缝连连、洗洗涮涮、吞吞吐吐、哭哭啼啼”等。

从上边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么几方面的情形。一、动词有A·ABB重叠形式的,原基础形式多是并列结构,结合得越松散的,越容易组成A·ABB重叠形式,像“指指点点、比比画画、拼拼凑凑、来来往往、抄抄写写、遮遮盖盖、洗洗涮涮、吞吞吐吐”等。二、有一部分A·ABB式常用,原来的基础形式少用或不用,像“缝缝连连、哭哭啼啼、写写画画、颠颠跑跑”等。三、有不少单音节动词,平常用时,两个词不并列在一起,但重叠后可以并列,像“耕耕耩耩、铤铤刨刨、切切剁剁、蹦蹦跳跳、打打停停”等,这类情形很多。这种并列形式没有ABAB式重叠。四、A·ABB式可以做谓语,比如“我就会抄抄写写,不会打字。”“他一边指指点点,一边大发议论。”可以做定语、状语或补语,比如“洗洗涮涮、缝缝连连的活儿”,“他比比画画地说着”,“让风刮得晃晃荡荡的”。五、语气比较缓和,多含有“泛指”的意味,比如“缝缝连连、”“洗洗涮涮”,泛指“缝补”、“洗涤”一类的事情,不具体指缝补、洗涤哪一件衣服被褥。有的意义、感情色彩有某些变化,像“他做活儿摸摸索索的”,这里“摸摸索索”的意思是“慢,不麻利”,跟“摸索”的一般意义不同。“商商量量”含有褒义,“指指点点、指指画画、比比画画”有“指手画脚”的意思,含有贬义。“缝缝补补、来来往往”等是中性的。六、有的动词有ABAB和A·ABB两种重叠形式,像“商量→商量商量、商商量量,将就→将就将就、将将就就”等。有的动词的ABAB式和

A·ABB式是不同意义的重叠形式。比如：“磨蹭”有“摩擦”、“纠缠”等义，重叠形式是ABAB，还有“缓慢地向前行进”和“比喻做事动作迟缓”的意思，重叠形式是A·ABB。“对付”有“应付”义，重叠形式是ABAB，还有“将就”义，重叠形式是ABAB和AABB。“摇晃”有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两种用法，前者可以说，“把瓶子摇晃摇晃”(ABAB)，后者可以说，“一个醉汉摇摇晃晃地走来”(A·ABB)。“指点→指点指点”(ABAB)，是褒义，“指点→指指点点”(A·ABB)，是贬义。词典的注释笼统、概括，一个意义里就可能有两种重叠形式，像上边的“摇晃”。如果意义、用法分析得细，不同的重叠形式就会出现在不同的意义里。七、有少量动宾式动词，作A·ABB式重叠，像“合式→合合式式”等。八、个别作A·ABB式重叠的动词，还可作A·里AB式重叠，像“哆嗦→哆哆嗦嗦、哆里哆嗦，晃荡→晃晃荡荡、晃里晃荡”等。七、八两类重叠形式，用法有如形容词的A·ABB式和A·里AB式。

g)形容词一般可以重叠。单音节形容词能够单说的，重叠后口语里常带“儿”尾，像“高高儿的、远远儿的、好好儿的、快快儿的、薄薄儿的”；不单说的不带“儿”尾，像“皑皑、纷纷、茫茫、蒙蒙”等。双音节形容词重叠，一般作A·ABB式，第二个A读轻声，像“干干巴巴、干干净净、冷冷清清、漂漂亮亮、满满当当、亲亲热热、大大方方、客客气气”等。A·ABB式中有的只用重叠形式，原基础形式一般不用，像“满满登登、慢慢腾腾、密密麻麻、羞羞答答”等。有些单音节形容词(或形容词性成分)，平常用时，两个不并列在一起，但重叠后可以并列用，像“花花绿绿、红红绿绿、郁郁葱葱^⑤、郁郁苍苍、浑浑噩噩^⑥”等。

形容词还有ABB式重叠，像“沉甸甸、黄澄澄、热乎乎、矮墩

墩、光秃秃、酸溜溜、冷清清、赤条条”等。这一类比较多，口语里和文艺作品中大量地使用。还有少量单音节名词、动词加双音节后缀，组成 ABB 式，用法一如形容词的 ABB 式。比如“汗津津、火辣辣、金灿灿、水汪汪、血淋淋、眼巴巴、醉醺醺、笑嘻嘻、乐呵呵、颤巍巍、病歪歪”等。ABB 式口语里常说的，BB 一般读阴平、像“沉甸甸 chéndiāndiān、黄澄澄 huángdēngdēng”。口语里不大说的，有的照原字音读，像“黄灿灿 huángcàncàn、红艳艳 hóngyànyàn、白皑皑 bái'ái'ái”。

还有 BA 一类形容词，是由单音节形容词前面加上一个修饰性成分构成的，像“碧绿、雪白、油亮、荫(yìn)凉、滚圆、飞快”等。这类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是 ABAB，如“瓦蓝瓦蓝的、锃亮锃亮的、滚烫滚烫的”。有少数还作 BBA 式重叠，像“进进脆、梆梆硬、笔笔直”等。

还有少量并列形容词，像“干冷、细长、短粗”^⑦等也作 ABAB 式重叠，比如“干冷干冷的、细长细长的、短粗短粗的”。这两类重叠形式不修饰动词短语，其他用法跟一般形容词的重叠形式相同。

有些双音节形容词有 ABAB 式重叠，像“到屋里暖和暖和”，“请您多辛苦辛苦”，“端正端正态度”，“健全健全制度”等，这是动词义的重叠形式。如果形容词、动词义分别列义项，这两种重叠形式就自然地分属在不同的意义下了。普通话里形容词有动词用法的越来越多了，因此，双音节形容词有 ABAB 式重叠的也就更多了。

双音节形容词还有 A·里 AB 的重叠形式，“里”也有用“了(勒)”或“而”的，“里(或了、而)”读轻声，像“啰唆→啰里啰唆、马虎→马里马虎、糊涂→糊里糊涂、慌张→慌里慌张、邋遢→邋里邋遢”等。双音节形容词作 A·里 AB 重叠的，一般也可作 A·ABB

式重叠,像上边的例子。有的多用A·里AB式,不大用A·ABB式,像“古怪→古里古怪、怪气→怪里怪气^⑧、娇气→娇里娇气、老气→老里老气、流气→流里流气、傻气→傻里傻气、俗气→俗里俗气、妖气→妖里妖气、洋气→洋里洋气、呆气→呆里呆气”等。A·里AB式重叠一般是贬义的。还有少量名词、动词也有这种重叠形式,像“疙瘩→疙瘩里疙瘩、嘎巴→嘎里嘎巴、哆嗦→哆里哆嗦、晃荡→晃里晃荡”等,用法像形容词的A·里AB式。个别的可以带“儿”尾,含褒义,像“哆里哆嗦_儿”。

还有A·不BB一类重叠形式,“不”读轻声,BB读阴平,像“酸不唧唧、滑不溜溜、臊(sào)不答答、白不拉拉”等。这种重叠形式多用作谓语。

非谓形容词一般不重叠,个别的可以重叠,像“四方→四四方方”。“四四方方”可以作定语和谓语,比如“四四方方一座城”,“这个盒子四四方方的”。

形容词重叠形式可以修饰名词性成分、动词短语,也可用作谓语或补语。例如“高高的个_儿”,“干干净净的衣裳”,“乐呵呵地说”,“慌里慌张地走了”,“他一天到晚高高兴兴的”,“这葡萄酸不唧唧的”,“洗得雪白雪白的”,“地冻得梆梆硬”。

形容词中还有一类,是单音节形容词加多音节后缀,组成A·XY式或A·XYZ式^⑨,X读轻声,Y或YZ读阴平,一般含贬义,有的可以带“儿”尾,“儿”化后含褒义。一般表示轻微程度,个别的表示程度深,多用作谓语。比如:“胖得乎、臊(sào)不答、酸咕嚙、酸不唧、酸不唧溜、酸不溜唧、酸不溜丢、傻不棱登、黑不溜秋、黑咕隆咚、白不吡咧、臊(sāo)了咕唧”,“胖得乎_儿、肥得噜_儿、美不滋_儿、甜不唧_儿、酸不溜_儿”。“臊(也可换成“脏、臭、腥、苦、黑”等)了咕

唧”还可以说“臊了呱唧、臊了各唧、臊了巴唧、臊了不唧”等，其中的“了”也可以说成“里”或“而”。字也有多种写法，比如“唧”，还有的写作“咕”、“叽”或“济”。总之，这类口语里的词汇数量不少，说法活，写法多，词典里要做适当的安排，以利规范。

h)单音节象声词一般可以重叠，像“哈哈大笑、马蹄得得、鼓声咚咚”等。双音节象声词一般作 ABAB 式重叠，像“钟摆嘀嗒嘀嗒地响着”，“心里扑通扑通直跳”，等等。有的也可作 A·ABB 式重叠，像“嘀嘀嗒嗒、丁丁当当、乒乒乓乓、噼噼啪啪、叽叽嘎嘎、叽叽喳喳”等，“叽叽嘎嘎、叽叽喳喳”等的原基础形式不大用。ABAB 式和 A·ABB 式，两种重叠形式用法差不多。比如：“车铃丁丁当当响个没完”，“车铃丁当丁当响了一路”。

象声词还有一类重叠形式，是前两字的韵母相同，后两字的韵母相同，比如“唏里哗啦、丁零当啷、噼里啪啦、叽里咕噜、嘀里嘟噜”等。用法跟前两种重叠形式差不多。

i)单音节副词有的可以重叠，像“偏偏、刚刚、常常、往往、渐渐、每每、恰恰”等。双音节副词，个别的可以重叠，有 ABAB 式，像“非常非常好、特别特别快、千万千万要注意”等。也有 A·ABB 式，像“的确→的确的确、着实→着着实实、实在→实实在在、时刻→时时刻刻、三三两两”等。“三三两两”，原基础形式不说。副词重叠形式跟原基础形式的用法差不多，含有强调的意思，表示程度加深。

j)还有 AXAY 和 AXBX 两类重叠形式，例如“不偏不倚、百发百中(zhòng)、大红大绿、非驴非马、假仁假义、可此可彼、毛手毛脚、难兄难弟、问寒问暖、有条有理、无法无天、载歌载舞”等，以及“好说歹说、买空卖空、一了百了、千难万难、左推右推、就事论事、

随乡入乡、将计就计、以讹传讹、有意无意、解铃系铃、出尔反尔、大书特书”等。这两类是两字相同,另两字相对称或有关联,交叉组成。还有相仿的一类,是两组双音节的词汇相交叉,组成 AXBY[®]式,比如“大同小异、千差万别、东拼西凑、有头无尾、欢天喜地、千奇百怪、思前想后、左顾右盼、说长道短、真心实意、虚情假意”等。有的,其中一组虽不是现成的词,但意义相近或有关,像“千方百计、惊涛骇浪、空前绝后、精疲力竭”等。这类词语音节整齐,生动精练,数量较多。

三

根据上面的简略分析,一般语文性词典对词汇的重叠形式,可考虑作如下安排。这里所谈的一些办法,只是举例性质的。不是说每本词典都要按照这个模式做,每本词典可根据自己的特点,采取合适的办法来安排。

1. 在凡例中交代词汇重叠规律。如果凡例比较简单,关于词汇重叠宜作较详细的叙述的,可以作为附录附在书后。凡例中只作简单交代,并注明详见附录 X。

2. 正文里分两类来处理,一类作为条目来收录,此类数量不多。一类在有关的条目下交代,绝大部分要这样来处理。

a) 单音节名词(或名词性成分)不重叠不单说的,重叠的形式作为条目收录,像“本本、框框(kuāngkuang)、娃娃、猩猩、蛛蛛、道道儿、朵朵儿、蚰蚰儿、圈圈儿(quānquanr)”等。常说的亲属称谓,多用重叠形式的,也收作条目,像“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伯伯、叔叔、姑姑、舅舅”等。单音节名词能单说的,重叠形式没有特殊意义

的,不作为条目收录^①,在注释后用“(叠)”表示,像“棍棍、苗苗”等。单音节名词重叠后含有“遍指”的意思的,也不作为条目收录,在注释后用“(叠,遍指)”表示,像“人人、村村、事事、字字、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等。这些都照顾常用的,不常用的可以不管。

“(叠)、(叠,遍指)、(叠 AABB)”等,适用于全部意义的,放在义项号码前边,适用于个别意义的,放在有关的义项注释后头。比如:“[漂亮]……(叠,漂漂亮亮) ①好看;美观……。②出色:……。”“人……②每人;一般人(叠,遍指):~手一册|~所共知|~~为我,我为~。”“村……①(~儿)村庄(叠,遍指):一个小~儿|工人新~|~~都办了夜校。”^②

AAB式和ABB式的名词,词典里需要照顾的,作为条目收录,如“毛毛虫、娃娃鱼、猩猩草、泡泡糖”和“艾窝窝、叫哥哥、水咕咕、小九九”等。“书本本、竹棍棍、山丹丹、树苗苗”等,虽然书面上有时见到,普通话词典里可以暂时不照顾。

名词的AABB式重叠,原基础形式不用的,词典里需要照顾的,收作条目,像“坛坛罐罐、家家户户、虫虫蚂蚁、须须爪爪、婆婆妈妈、风风火火”等。临时并列的,可不照顾,像“村村社社、乡乡队队”。重叠不重叠,词性、意义不同的,原形式条目下不便照顾的,可以收作条目。比如“疤痢、疙瘩”等出了条,“疤疤痢痢、疙疙瘩瘩”等还可以收作条目,因为两者的词性、意义不同。这一类可以根据每部词典出条和立义的情况处理,出条少的词典,可以仿照《新华字典》必须重叠的办法,分立一个义项,也未为不可。比如:“[疙瘩]……①……⑥〈口〉(叠,疙疙瘩瘩,疙里疙瘩)不平滑:路上净是石头子儿,疙疙瘩瘩的,差点儿绊倒。⑦〈口〉(叠,疙疙瘩瘩,疙里疙瘩)比喻不顺利:这事情疙里疙瘩的,办得很不顺手。”表示重

叠的标志,必须重叠的放在注释的前边,可重叠可不重叠的放在注释的后边。

AABB 式的原基础形式可以单说的,重叠后意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或只是含有“泛指”或“遍指”意义的,不另收作条目,在原形式条目下交代。比如:“[风雨]……比喻艰难困苦(叠,风风雨雨):……。”“[世代]……②好多辈子(叠,世世代代,遍指):……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头脑]……③〈口〉首领(叠,头头脑脑,泛指):今天来的都是头头脑脑的。”

b) 数词可以重叠的不多,重叠形式可以作为条目收录,像“一一、三三两两、三三五五、千千万万”等。“千千万万”也可以在“千万”条下交代,不另出条,比如:“[千万]……①比喻数量多(叠,千千万万):……。”成套的形式,可以照三下 j 项的方式处理。

c) 单音节量词,重叠后含有“遍指”的意思,这一类不另收作条目,在原形式条目下交代。比如:“件……①量词,用于个体事物(叠,遍指):……。”“亩……地积单位。……(叠,遍指)……。”这一类重叠形式都含有“遍指”的意思,可以类推^③,在凡例或附录中交代清楚,条目里也可以不加“(叠,遍指)”,只交代例外不重叠的。或者只加“(叠)”,不加“遍指”。

并列量词 AABB 式重叠,可在原形式条目下交代,像“颗颗粒粒”。原基础形式不说的,需要照顾的,收作条目,像“口口声声”。

d) 代词一般不重叠,在个别场合有时重叠的,词典里可以不照顾。认为需要交代的,可以在原形式条目下举例。

指别词个别的可以重叠,像“某某”,可在“某”下加“(叠)”表示,不必另立条目。

e) 方位词一般不重叠,“上”和“下”可以重叠,“上上”和“下下”

可以收作条目。少数并列的方位词可以重叠,像“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等,可在原形式条目下交代,用“(叠 AABB)”表示,不另出条目。

f) 动词的一般重叠形式不作为条目收录,在原形式条目下交代,单音节的用“(叠)”表示,双音节的一般的用“(叠 ABAB)”表示。重叠后读音、意义不同的,作为条目收录,比如“吵吵 chāochao、嚷嚷 rāngrang”等。AA 式重叠,中间可以加“一”,不能加“一”的,可以收作条目,像“痒痒、哼哼”等。

双音节动词有的还可以作 AABB 式重叠,意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在原形式条目下交代,用“(叠 AABB)”表示。例如:“[缝补]féngbǔ”缝和补(叠,缝补缝补,缝缝补补):……。”“[比画]bǐhua 用手……做出姿势……(叠,比画比画;比比画画,多含贬义):……。”“[商量]shāng·liáng 交换意见(叠,商量商量;商商量量,多含褒义):……。”ABAB 式和 AABB 式是分属不同的意义的,分别放在不同的意义下。比如:“[对付]duìfu①应付(叠,对付对付):……。②将就(叠,对付对付,对对付付):……。”原基础形式不大用,常用重叠形式的,仍以原基础形式出条,照顾重叠形式,举重叠形式的例,使读者知道哪个常用,哪个不常用。比如:“[吞吐]……②有顾虑,想说又不说(多叠用吞吞吐吐):他说话吞吞吐吐|有话直说,别那么吞吞吐吐的。”“[缝连]fénglián 缝补(多叠用,缝缝连连,泛指):拆拆洗洗,缝缝连连,她都能做。”原基础形式不说的,重叠形式收作条目,像“沸沸扬扬、磕磕绊绊、颠颠跑跑、病病殃殃、歪歪扭扭”等。临时并列在一起而意义没有什么变化的,可以不照顾,像“耕耕耩耩、蹦蹦跳跳”等。重叠不重叠,词性、意义不同的,原形式条目下不便照顾的,可另立条目,也可仿照 a 项下

必须重叠的方式处理,像“摸索”和“摸摸索索”。

个别动词的 A·里 AB 式重叠,也可照 AABB 式处理,比如:“[哆嗦]……身体颤动(叠,哆嗦哆嗦,哆哆嗦嗦,哆里哆嗦):……。”^④“[晃荡]huàngdang 向两边摆动(叠,晃荡晃荡,晃晃荡荡,晃里晃荡):……。”如果意义分析得细些,不同的重叠形式就可分列在不同的意义下。比如:“[晃荡]huàngdang①向两边摆动(叠,晃晃荡荡,晃里晃荡):……。②使晃动(叠,晃荡晃荡):……。”

g)形容词的一般重叠,不作为条目收录,在原形式条目下交代。比如:“矮ǎi①身体短(叠):~个儿。②高度小的(叠):……。”“[漂亮]piàoliang(叠,漂漂亮亮)①好看;美观:……。”原基础形式不单用的,重叠形式,需要照顾的,收作条目,像“纷纷、脉脉、历历、满满登登、慢慢吞吞、纷纷扬扬、羞羞答答”等。两个单音节形容词(或形容词性成分)一般不并用,重叠后可以并列,常用的收作条目,像“红红绿绿、浑浑噩噩”等。不常用的,可以不照顾,像“傻傻茶茶、昏昏悠悠”等。

形容词的 A·里 AB 式重叠,意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不作为条目收录,在原形式条目下交代。比如:“[慌张]……心里不沉着,动作忙乱(叠,慌慌张张,慌里慌张):……。”原基础形式不说的,重叠形式,需要照顾的,收作条目,像“怪里怪气”。

BA 类形容词,作为条目收录的,如果还有 BBA 式,意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可在注释末用“(也说 BBA)”交代。未收 BA 条的,BBA 式可以出条。BA 类重叠形式,在注释末用“(叠 BABA)”表示。比如:“[碧绿]……青绿色(叠,碧绿碧绿):……。”“[邦硬]……很硬(叠,邦硬邦硬,也说邦邦硬):……。”

ABB类形容词,常用的收作条目,像“白茫茫、沉甸甸、冷飕飕、香喷喷”等。单音节名词或动词加后缀BB构成的词汇,像“汗津津、水汪汪、醉醺醺、颤巍巍”等,常用的收作条目。

形容词AB,ABB,A·ABB(包括A·里AB)三种形式都有而意义没有大的变化的,AB收作条目,其他在AB条目下交代。以“冷清”为例,“[冷清]……形容冷落、凄凉、寂寞(叠,冷冷清清,也说冷冷清清):……。”AB虽然也用,但不如ABB式常用的,仍以AB作为条目,注释末交代“(多用ABB)”。比如:“[光秃]……(多用光秃秃):……。”如果AB不说的,只有ABB式和A·ABB式的,哪个常说,就作为条目,另一条用“(也说XX)”交代。比如:“[慢腾腾]……形容缓慢(也说慢慢腾腾):……。”“[密密麻麻]……又多又密(多指小的东西。也说密麻麻):……。”

形容词因有动词用法,而有ABAB重叠形式的,重叠形式在原形式条目下交代,动词用法单独列义的,放在动词义下。比如:“[亲热]……亲密而热情(叠,亲亲热热,亲热亲热):……让他们小姊妹在一起亲热亲热。”“[端正]……①……不歪斜;…(叠,端端正正):……。②……。③使端正(叠,端正端正):……。”

ABB类,BB构词能力强的,可以作为条目收录,把用它构成的词汇列在下边作例,一般不必另出条。比如:“[呼呼]hūhū(～的)形容词后缀,一般含贬义,“呼儿呼儿”含褒义:胖～(含贬义)|胖呼儿呼儿(含褒义)|圆～|热～|黑～|臭～|潮～|稠～|急～|辣～|烂～|毛～|面～|黏～|气～|软～|傻～|湿～|油～|乱～|晕～|脏～。”仿此,“得乎、不唧(也说不唧唧)、了呱唧(也说了咕唧、了各唧、了巴唧)、不棱登”等,也可这样处理。构词少的后缀,不必出条,需要照顾的,就以组成的词汇作为条目,如“猛孤丁、黑咕隆咚、

酸不溜丢”等。

形容词的 A·不 BB 式重叠,常用的可以收作条目,像“滑不溜溜”。A·不 BB 类大都还能说 A·不 B,如果 A·不 B 已收作条目,A·不 BB 式不另出条,在 A·不 B 条注释末用“(也说 A·不 BB)”交代。比如:“[臊不答]……羞惭的样子(也说臊不答答):……。”

非谓形容词,个别的可以重叠,意义没有什么不同的,在原形式条目下交代。比如:“[四方]……像正方形或立方体的样子(叠,四四方方):……四四方方的一块地|这个盒子四四方方的。”

h)象声词的重叠形式,一般在原形式条目下交代。比如:“哈……②象声词,……(多叠用):……。”嗒……象声词,(叠):……。”“[扑通]……象声词,……(叠,扑通扑通):……。”“[嘀嗒]……象声词,……(叠,嘀嗒嘀嗒,嘀嘀嗒嗒):……。”只用重叠形式的,常用的重叠形式,可以作为条目收录,像“嘿嘿、唻唻、噉噉喳喳(qīqīchāchā)、叽叽喳喳(jījīzhāzhā)”等。

前两字的韵母相同、后两字的韵母相同的一类象声词,常用的,可以作为条目收录,例如“叽里咕噜、唏里哗啦、噼里啪啦、丁零当啷”等。

i)副词的重叠形式,意义、用法没有大的变化的,在原形式条目下交代,像“白白、常常、刚刚、渐渐、偏偏、每每、非常非常、特别特别、千万千万、的的确确、着着实实、时时刻刻”等。单音节的用“(叠)”表示,双音节的用“(叠 ABAB,强调)”或“(叠 AABB,强调)”表示。比如:“恰……②正好;正(叠):~如其分|~~相反。”“[千万]……②务必(表示恳切叮咛。叠,千万千万,强调):……。”“[的确]díquè 完全确实;实在(叠,的的确确,强调):……。”原基础形式不用的,重叠形式收作条目,像“往往、乖

乖儿”等。重叠形式与原基础形式意义不全同的,收作条目,像“单单、慢慢”等。

j) AXAY 和 AXBX 两种重叠形式,常用的收作条目,像“非驴非马、一心一德、左说右说、解铃系铃”等。“A…A…”组成的词语比较多的,可以收“A…A…”作为条目,把由它组成的 AXAY 形式的词语作例。通过解释“A…A…”,组成的词语就能明白的,不另出条。需要进行解释的,可以另外出条或加括注。比如:“[大…大…]…分别用在名词、动词或形容词前面,表示规模大,程度深:~风~浪|~模~样|~声~气|~是~非|~手~脚|~鱼~肉|~包~揽|~拆~卸|~吵~闹|~吃~喝|~吹~擂|~喊~叫|~轰~嗡|~说~笑|~摇~摆|~明~摆|~慈~悲|~红~绿|~红~紫。”“大轰大嗡”等也可单独出条。AXBX 类也可照这样处理,但“…X…X”不是第一个字,为了便于检查,收作条目的可以宽些。比如:“[…说…说]…反复地说;用各种方式说:大~特~|东~西~|好~歹~|花~柳~|千~万~|一~再~|左~右~。”“好说歹说、花说柳说、左说右说”等还可以单独出条。

AXBY 类,可以仿照 AXAY 和 AXBX 式处理,像“[千…万…]……①形容非常多:~仓~箱|~重~层|~仇~恨|~家~户|~军~马|~秋~岁|~年~载|~山~水|~头~绪|~丝~缕|~言~语|~岩~壑|~刀~刷|~叮~嘱|~恩~谢|~呼~唤|~变~化|~思~想|~辛~苦|~红~紫|~差~别。②表示强调:~稳~妥|~真~确|~难~难|~错~错。”“[…前…后]…表示前后的次序;或前或后;以前以后:一~一~|饭~饭~|村~村~|年~节~|房~屋~|颠~跑~|赶~错~|思~想~|瞻~顾~。”其中需要解释的,还可以单独收作条目,像“颠前跑后、瞻前顾后”等。

以上三类组成的词语不多的,不必出[A…A…]、[…X…X]、[A…B…]、[…X…Y]条。需要照顾的,就以组成的词语作为条目。词典里收录的,以组成的词语出条的是多数,[A…A…]等形式的条目是少数。收录[A…A…]等条目,可以节省篇幅,也可以使同一字下的条目不致太堆砌。以上边的“千 X 万 X”为例,这些条目形式一样,注释的行文也差不多。如果都在“千”下列为条目,就会显着叠床架屋,累赘不堪。作[A…A…]形式处理还可以多照顾一些词语,也不会显着累赘,并能使读者多了解一些词语。[A…A…]、[A…B…]形式,首字“A”的条目还是排在“A”下,检查起来没有多大不方便。[…X…X]、[…X…Y]形式,条目不排在首字下,检查起来有些困难。读者知道词典里有这种格式,熟悉了,也可以掌握。现在有了按末字排列的词典^⑤,按词语的末字检查,[…X…X]、[…X…Y]格式,也是按末字集中的,可按末字排检。再者,需要解释的,还出了条,不致影响使用。

上边讨论的在条目下交代的重叠形式,意义稍有变化,或用法不同的,应举例表明,如仍不甚清楚的,还可在例中加括注说明。成套处理的条目,其中有的条目意义、用法不是一望而知的,可酌加括注。通过上述安排,再加上这些辅助办法,读者是能够掌握这些词语的。

上边用的一些格式,只是举例性质的,根据每部词典的需要,可选用合适的形式。比如:“(叠 ABAB)”,可以写成这样,也可以把 ABAB 写成本字,还可以用符号^⑥代替。“(叠)”也可以专刻一个字,如叠,等等。总之,形式可根据需要去创制。

词典里交代词汇的重叠形式,虽然多用了一些篇幅,多费了一些精力,但总的说来是很值得的。做这样的工作是事半功倍的。

一、条目下交代重叠形式,有的还要举例或加括注,固然占一些篇幅,但比起作为条目来收录,篇幅还是省了许多,版面也显着简洁干净。二、交代重叠形式,不但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知识,而且可以借此检验词典的义项和注释。我们的词典的义项和注释还是比较粗的,通过交代重叠形式,可以验证这些条目,注释是否跟词性相适应,意义分析概括的是否得当,用法照顾的是否全面,等等。这样做,费了一些精力,但对提高词典质量,是大有好处的。

附 注

- ① “最最最”的用法,算作例外。
- ② “本本”,《现代汉语词典》注 běnběn。
- ③ “家家”等,有的作为量词重叠。
- ④ 就一般情况说的,有的偶然也出现,像“坑洼、风火”等。名词 AABB 重叠式,有的兼有形容词性用法,像“坑坑洼洼、风风火火”等。
- ⑤、⑥ 《现代汉语词典》第二个字不注轻声。
- ⑦ 有的把这一类也划到 BA 类中,但“雪白”等不能说成“又雪又白”,“细长”等,可以说成“又细又长”。
- ⑧ “怪气”,普通话里不说,有的方言里说,意思和“奇怪”差不多,跟“怪里怪气”不大一样。
- ⑨ 这一类虽不是形容词的重叠形式,但跟形容词的重叠形式一样,都是形容词的生动化形式,所以也放在这里,一并讨论。
- ⑩ 这一类虽不是重叠形式,但跟 AXAY 和 AXBX 很相近,词典里可采用相仿的处理形式,所以在这里一并讨论。
- ⑪ 意义不同的,可收作条目,下同。
- ⑫ 举的例,多是就《现代汉语词典》的注例,加以改动的,下同,不再一一注出。
- ⑬ 语法书里讲的量词多,词典里很多的不注量词义,像“准量词(或叫自主量词)、临时量词(不重叠)、容器量词”等,一般只注名词义。
- ⑭ 还有“哆里哆嗦儿”,意义不尽相同,如照顾,宜收作条目。

⑮ 过去的《佩文韵府》、《诗韵大辞典》等,收录的词语,就是按照末字排列的。

⑯ 可用DV代表ABAB式,DA代表AABB式,D·A代表A·ABB式,DAL代表A·里AB式。

科技词条的处理*

吕天琛 李伯纯 陆卓元 李志江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大量的科技词汇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日常生活词汇。作为以著录书面语和口头语为主的语文性词典,所选收的条目中科技词条的比重日益增加,这是世界各国语文性词典面临的必然趋势。在一部语文性词典中,科技词条的收录和注释怎样处理比较好,确是一个值得悉心研讨的问题。这里仅就《现代汉语词典》中科技词条的编写,谈谈我们的认识。

一 资料和收词

根据《现汉》宗旨,我们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主要取自中小学教科书,包括算术、常识、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农业基础知识等科目;同时大量收集各类科普报刊和专题论述的通俗读物。通过普遍勾乙,抄写卡片十几万张,成为我们选词、收词和注释的基础。

因为收集的资料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所以,词汇出现的频次就有些民意测验的味道。我们掌握的一般原则是,出现频次高的尽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1年第3期,署名柯琦。

量选收；反之则舍弃。有些词汇虽出现频次不高，但与同类词条平衡后也选收进来。由于各个学科与人类日常生活的关系疏密不同，所以各科词汇在以上范围的资料中出现频次当然不一样。例如地质、古生物、天文等学科的词汇就不如医学、农业、动植物等学科的词汇出现的数量多、频次高，选收的可能性也不如后者大。

在选词、收词中，我们着重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1. 照顾单字，适当补充一些普勾词表中并未出现的字或词（大多为动植物名和中医、中药用字等），例如：

蠚(nì, 中医指虫咬的病。)

臑(nào, 中医学上指自肩至肘前侧靠近腋部的隆起的肌肉。)

獾狍(huànjiāpí, 一种哺乳动物。)

鳁鸟(jiānniǎo, “鳁”是鱼类, “鳁鸟”是鸟类。)

还有“猓(jīng)”、“蛭(jié)”等字，都是为了照顾单字才收录的。

2. 虽属习见科技词汇，但注释中要涉及较多专业术语或公式，否则很难说明白，而本词典又不能将这些专业术语全部收录，因此这类词暂时不收，如中学代数课本中出现的“行列式”就没有收（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

3. 由于古今时代不同，各地方言不同，科技名物词的异名往往很多，尤其是在农业、动植物、中药方面，各地叫法不同。如玉米，有玉蜀黍、老玉米、玉茭、玉麦、包谷、包米、苞谷、苞米、棒子、珍珠米等不同名称和写法；又如甘薯，通称红薯或白薯，也叫番薯、山芋、地瓜、红苕等。这些异名收录的尺度是什么呢？我们以为，凡是使用范围相当广泛的，都应该收，如上述两例。否则不收。但是，有时为了照顾单字的用法也有意选收某个方言区的异名。例如：

苕 sháo 〈方〉甘薯。也叫红苕。(另有 tiáo 音)

狍 hān 〈方〉驼鹿。

4. 科技词条的特点之一是不断出现新词新义,因此必须不间断地补充新资料,增补新词新义,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满足读者的需要。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学生一般很少接触到或还未出现的科技词现在已经很普及了,如:航天、遥控、激光、集成电路、编码、溅落、氯纶、腈纶、涤纶、卡那霉素、庆大霉素、更生霉素等。假如 1978 年版的《现汉》再不收录这些,读者恐怕就要提意见了。

5. 注意收录科技语文词。在现代汉语中,有些词汇就词义来讲是语文性用法,但只用于科学技术中,它们不能算作科技术语,只能说是带有科技色彩的语文词,我们称之为科技语文词。这类词汇在专科词典和过去的汉语词书中都较少见到,因此在收词上容易遗漏。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补收工作也动手较晚。如在“定性处理”、“定性分析”前补收了“定性”一词的第一义项“测定物质包含哪些成分及性质:~分析”等,但是还遗留了一些问题需要解释。如“激励”一词中的科技义就还未照顾;“定向培育”、“定向天线”前未收“定向”(①按照一定方向进行的:~爆破|~培育。②确定方向。)一词,等等。

据粗略的统计,《现汉》收录科技词条 9700 多条,约占全书的 17% 强。

二 注释及其他

1. 科技词条的注释,应强调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在处理这两者的关系上首先力求注释准确无误,其次才是通俗易懂。有

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词条,注释要求准确而又使一般读者也能看得懂,确实有困难。因为这类词条往往需要更多地使用一些专门术语来解释,但注释中的专门术语用多了,除了造成难懂外,还形成“滚雪球”似的无限扩大收词范围(按体例规定,凡注释中用过的词应另出条),客观上不允许。要避免滚雪球,就应力求不用或少用专门术语作注。对确实不用专门术语或公式就注释不清的,我们宁可暂时不收。例如:“导数”注为:

“函数 $y=f(x)$ 中,当自变量 x 的改变量 Δx 趋向于零时,如果应变量 y 的改变量 Δy 和这对应的 Δx 的比 $(\frac{\Delta y}{\Delta x})$ 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就是这个函数在点 x 的导数,写成 $f'(x)$ 或 $\frac{dy}{dx} = \lim_{\Delta x \rightarrow 0} \frac{\Delta y}{\Delta x}$ 。”

这里涉及“自变量”、“改变量”、“应变量”等专科术语,又必须使用公式才能说明问题。几经周折后,只好暂时把它删去了。又如“二阶行列式”,注为:

“二元一次方程组 $\begin{cases} a_1x + b_1y = c_1 \\ a_2x + b_2y = c_2 \end{cases}$, 当 $a_1b_2 - a_2b_1 \neq 0$ 时,

它的解为:

$\begin{cases} x = \frac{c_1b_2 - c_2b_1}{a_1b_2 - a_2b_1} \\ y = \frac{a_1c_2 - a_2c_1}{a_1b_2 - a_2b_1} \end{cases}$, 把 a, b, c, d 四个数排成 $\begin{vmatrix} a & c \\ b & d \end{vmatrix}$, 用来

表示 $ad - bc$, 式子 $\begin{vmatrix} a & c \\ b & d \end{vmatrix}$ 叫做二阶行列式。”

这个注释完全是从公式到公式,不理解“二阶行列式”的读者

也看不懂注释,所以一直没有收录。

对于科学定名以外的名称,需要收录时,我们采用了“通称”、“俗称”、“有的地区叫”等不同提法,以示区别。如“结球甘蓝”通称圆白菜、洋白菜,不同地区有卷心菜、包心菜等名称。这里的“通称”虽然不是科学上的定名,但在官话区使用范围广,大家都这么叫。“有的地区叫”则指有的方言区这么叫,有一定的影响,只是范围小些。“俗称”是指不符合科学含义的名称,但人们这么叫了,大家都懂,生活中常出现。如“鲸”俗称鲸鱼,实则不是鱼,而是哺乳动物。“乌贼”俗称墨鱼或墨斗鱼,实际上也不是鱼,而是软体动物。“阑尾炎”俗称盲肠炎,“斑秃”俗称鬼剃头,等等,都是这个道理。

2. 科技词条的注释同样应注意稳定性。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不断涌现,日新月异。因此,在注释中不必宣传某些时间性较强的东西。例如在编写初稿时,在注释一些机械装置、零件、器物的条目时,常加上“用……做的”。这虽然向读者介绍了一定的知识,却也容易使自己陷于被动,因为科学技术发展了,材料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如不少零件改用塑料做了,而原来用塑料做的又改用别的什么材料做了。“潜水衣”一条,初稿注作:“……用橡胶、布料或金属制成……”修订时把这一段删去了。看来删去是对的,很难断定潜水衣一定要采用什么材料,从注释的稳定性看,这方面的内容可以从略。另外,对于某些过时的东西,我们认为,也不必急于从词典中删除,原因是它往往代表着一定历史阶段的科学技术状况。比如“飞艇”,曾有人在修订时建议删掉,因为它太落后,也基本上不用了。可是最近,一些国家对飞艇的研究又“热”起来了。如果我们当时删了这

条,就显然不够妥当。但是,“以太”一词,初稿本中收了,而由于“以太”被证明是不存在的,试用本中就删去了,应该说是个遗憾。

科技词条的稳定性往往和政治思想性相关连。《现汉》中“人造卫星”一条,初编时注释中有“×年×月××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句话。其实,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其某一具体成果而言,都有首先发明的国家、组织或个人,而只注明这一条,不能不说是受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后来删去了。又如“火药”的注释,初稿中指出是“我国首先发明的”,这是事实,但通盘考虑,也可不提,修订时删去。但是在“黑色火药”注中还保留了“是我国唐明时发明的”一句,看来必要性也不大。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十年浩劫中,《现汉》修订稿曾收录了“新医疗法”一条,注解是:“广大医务人员、赤脚医生、红医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努力发掘祖国医药遗产和流传在民间的各种医疗方法,通过实践创造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医疗方法。广泛地应用于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新医疗法包括新针疗法、耳针疗法、头针疗法、推拿疗法等”,约一百多字。后改为:“结合中西医学而成的新的医疗方法,如新针疗法、电针疗法等。”最后把这一条删了,因为实际上就是新的医疗方法,根本没有必要收录。

3. 科技词条的注释应力求简洁,少而精,犹如画速写,几笔勾画出所画对象的特点,使人一看就能认出是某人或某物。与此同时给读者提供一些必要的知识,但又不应该像专业书籍那样论述得过于详尽。我们把《现汉》的科技词条与同类型的国外词典相比较,从随便抽出的几条来看,《现汉》字数偏多。尤其是动植物,《现汉》较多地描述了生态、形态和经济价值。如植物可以入中药的很多,在外文词典中许多都不提及或只说可以入药就行了。试比较

以下几个词的注解：

【猫头鹰】

《现 汉》：鸟，身体淡褐色，多黑斑，头部有角状的羽毛，眼睛大而圆，昼伏夜出，吃鼠、麻雀等小动物，对人类有益。也叫鸱鸺(chīxiū)，有的地区叫夜猫子。

《牛 津》：*night-flying bird that lives on small birds and animals. eg mice.* (附插图)〔夜间活动的一种鸟，以捕食小鸟和老鼠等小动物等为生。〕

《拉鲁斯》：*Nom général des oiseaux de proie nocturnes, particulièrement de ceux qui ont des aigrettes, comme les ducs. (Les hiboux sont très utiles parce qu'ils détruisent quantité de rats, mulots et souris.)*〔Cri :

【甘 草】

多年生草本植物，茎有毛，花紫色，荚果褐色。根有甜味，可以入药，有镇咳、祛痰、解毒等作用。又可做烟草、酱油等的香料。

(*plant from whose root is obtained a) black substance used in medicine and sweets.*

〔植物名，从其根中可提制出一种黑色物质，供制药品和糖果用。〕

(*du gr. glukurrhiza, racine douce*) Genre de papilionacées dont la racine est employée en médecine pour composer des boissons rafraîchissantes. || Jus de cette plante à saveur sucrée et qui a des propriétés adoucissantes.

le hibou hue](附插图) 〔〔由希腊文 *glukurrhi-*
〔夜间活动的某些猛禽 *za* 而来,义为“甜根”〕蝶形花
的统称,特指某些具有 科的一种植物,根供药用,又
角羽的猛禽,如角鸮。 可制清凉饮料。||这种植物
(猫头鹰对人类有益,因 的汁,味甜,有镇痛作用。〕
其能捕食大量鼠类。〕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现汉》科技词条的注释还可以稍略。如果有选择地加上部分插图,将有助于注释简略,而读者参看图也就一目了然了。1959年的初稿本中曾有插图约800余幅,后因故删去。另外,汉语中不少动植物的方言名多而又不得不照顾,也是增加注释字数的原因之一。

4. 对科技书刊中常用的语文性词语应尽量按照语文词的注释方式注释,照顾词性,能注成动词的,不按专科名词注解。例如“失眠”注:“夜间睡不着或醒后不能再入睡。”至于引起失眠的原因等,这里就不提了。“运行”注:“周而复始地运转(多指星球、车船等)……”再加举例。其他如“牧放”、“捕食”、“间作”、“防治”、“绝症”等,我们都以同样方式处理。例如“降温”这个词,现在注:“①降低温度,特指用喷水或喷冷空气等方法使高温厂房和车间等温度降低。②气温下降。”在1959年的初编定稿本中第①义项注为:“采取某些措施使高温厂房和车间的温度降低。一般是把车间里产生热的部分用石棉或云母等遮住,或者在炉前装置遮热的水幕,也可以用冷空气直接吹向工人,同时给工人喝盐水、冷饮料,以降低工人的体温。”这种注法,就字数来看显然太多,从注释的内容看,修改稿比较适合语文性词典的需要。

由于这类词接近普通语文词,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提高,可

以不再归入专科性词语的范围。但与此相反,有的词条本来只有语文义,后来逐渐作为专门术语使用,从而增加了科技义,却不能作为一般引申义处理,而必须按科学术语的要求下定义。例如“激发”一词,原只有“刺激使奋发”一义,修订时增补了第②义,注为“使分子、原子等由能量较低的状态变为能量较高的状态。”又如[吻合],现注为:“完全符合:意见~。”而在医学上指把组织的两个断裂面缝合起来,和语文义显然不同。其他如[程序]、[激励]等都需要补上科技义。

在照顾语文性用法方面,我们还特地增加了部分植物名称的第②义项。例如:

[牡丹] ②这种植物的花。 [甘薯] ②这种植物的块根。
[木棉] ②木棉种子表皮 [花椒] ②这种植物的种子。
上的纤维。

5. 科技词条也存在如何定音的问题。最明显的例子是“荨麻疹”,我们按 qiánmázhěn 注音,但实际上从医生到病人说 qiánmázhěn 的几乎没有,一般都说 xúnmázhěn,又如“榴霰弹”注 liúsǎndàn,“霰”字原稿中只有 xiàn 的音,sǎn 的音是根据军事科学院审稿意见增加的。既然如此,“荨麻疹”加一个 xúnmázhěn 的音,似也未尝不可。

化学上的新名称,我们一般按规定的名称注音,但也和语言实际有矛盾。如“腈”(jīng)字,在“丙烯腈”这个词上可能都念 jīng,但遇到“腈纶”时就都说 qínglún 而不说 jīnglún 了。

至于“唛”(mà,壮族对某些植物名称的用字,如唛瑶)、“榿”(shē,杧果的地方名)等字,在收录时只能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协助定音,有的一时无所依据,就暂不收录。

6. 科技词条是否标科的问题也曾有过争论。1958年《现汉》编写细则规定“较专门的术语,一般人看起来很陌生的,应该标出科目”。当时共分为23科。因此,1959年的定稿本是标了科的。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边缘学科增多,许多科技术语各学科交叉使用,在用法上有的大同小异,有的不尽相同,造成注释上的困难。如果分科注解,一词多义,需要重复叙述的内容多,注解繁琐,篇幅加大;如果归纳后笼统作注,就不便标科了。如“扫描”,1959年定稿本中标“〈电〉”,注:“电视机和示波器的荧光屏上的图像是由阴极射线管内的电子束按一定次序极快地移动而产生的,电子束的这种移动叫做扫描。”以后医学、冶金工业等均普遍使用这个词,而且并不限于电子束。激光扫描、超声波扫描等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下要分科逐一注释就很繁琐,只能笼统作注(《现汉》修订本中[扫描]的释文还需修改)。又如“机制”,1959年定稿本中标“〈医〉”,现在改为:“[机制]¹——用机器制造的:~纸|~煤球。[机制]²——①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如计算机的机制。②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如动脉硬化的机制。③泛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和某些自然现象的物理、化学规律,如优选法中优化对象的机制。||也叫机理。”

因此,《现汉》修订本的科技词条一律不再标科,只对极少数可能使读者产生误解的词加注“中医上指”、“化学上指”、“物理学上指”等词语,以明确该词的使用范围。如“根”的第④义项注“化学上指带电的基:氨~|硫酸~。”[耦合]加“物理学上指……。”[阿的平]加“药名,……。”

7. 科技词条编写后的送审工作是不可缺少的。《现汉》的编辑人员绝大多数要编写和修订语文条目,科技方面的专业干部很

少,而且要求少数几个人把科技方面几十个学科的词条都编写无误,是很难做到的。所以,1959年初稿编成后,就在当时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分送各个自然科学研究所,组织专家审查定稿。与此同时,我们还分送各有关研究单位、医院、高等院校等审查,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又着重做些文字上的加工和平衡工作,以求各科注释的繁简程度大致统一。即使这样,也难免还有疏漏之处。

收录方言词是语文词典的一项任务^{*}

闵家骥

方言(Dialect)是一种语言的地区、时间或社会的变体。通常所说的方言是指语言的地区性变体,即通常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就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书面语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从目前发展的趋势来看,方言在不同程度上向着普通话集中,普通话也在不断地从方言中吸取有益成分来丰富自己。总的趋势是两者之间的差别在逐渐缩小,这一点很明显地反映在词汇上。大力推广普通话后,一些普通话词汇取代了当地的方言土语,而普通话本身也吸收了大量的方言词汇,以致普通话跟方言在词汇上的界线有时就很难划分。例如“便当”一词,《小说词语汇释》认为是吴语(注为:便利),《现代汉语词典》里则没有标“〈方〉”,认为是普通话。又如“把头”,《现代汉语词典》认为是普通话,注为:旧社会里把持某种行业(如搬运等)从中剥削的人。《汉语方言概要》认为“把头”一词,可能是“从上海一带传来的”吴方言词。划分普通话和方言上的困难,从另一方面人们在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交流思想时,不可能绝对地避免使用方言词。特别是文学作品中,使用方言土语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2年第6期。

是塑造人物的一种手段。所以,随着创作的繁荣,书籍报刊上出现的方言词是大量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语文词典要不要把收录方言词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从我国辞书编纂的历史来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例如在汉代成书的《尔雅》,就是一部“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的词典。“方俗之殊语”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如“淀谓之蛭”。郭璞注:“滓淀也,今江东呼蛭。”“蛭”是古代江东一带方言,在今天吴方言里沉淀物还是叫蛭,如水锈叫水蛭。古代韵书是为审音辨韵而编纂的,但也供查字义用,所以一般也收方言词。但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词典不仅要释疑解难,作为语文词典还要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所以收不收方言词以及怎样收录已成了语文词典编纂中讨论的一个问题。

重视不重视吸收方言词,从目前出版的一些语文词典来看,认识还不统一。我们认为,方言不同于阶级习惯语,方言作为语言的地区性变体,是服务于某一地区的全体人民的。某一方言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决定于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条件,而不是决定于某一方言的优劣。作为民族共同语分支的方言都有许多有生命力的词语,方言也正是用这些词语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民族共同语。词典记录方言词汇,有助于普通话吸收方言中有益成分,以促进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语文词典重点记录普通话语汇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排斥方言词汇。语文词典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和酌收方言词,两者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相促进的。也许有人会提出,每部语文词典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方言词的收录不能同样要求,有的可以多收,有的可以少收,方言词主要由方言词典来收。这话有一定道理。但语文词典收多少方言词和是否重视方言词收录这是两个问题。语文词典和方言词典的确可以有个

分工,但语文词典很难做到不收方言词:第一,普通话词和方言词,有时界线不十分清楚,绝对地排斥方言词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第二,方言无时不在以它的一些有生命力的词语丰富着自己的民族共同语。那些已经进入和即将进入普通话的方言词,语文词典是无法拒绝收录的。第三,现代汉语是包括它的方言在内的,一部反映现代汉语词汇基本面貌的词典,不可能没有一定数量的方言词汇。所以,词典之间的分工,不能理解为收词上的绝对排斥,即使有了《现代汉语方言词典》,语文词典仍应收录一些常用的方言词,正如我们虽然有各种专科词典,但一些习见常用的专科条目,一般语文词典还是照收。

近几年来出版了一些中、小型语文词典,初步满足了读者的需要。大型语文工具书的编写已提到日程上来的如《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大词典》等等。这些大型辞书的编写都有一个如何对待方言词的问题,因而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讨论清楚。试以编写《现代汉语大词典》为例,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从收词数量上体现一个“大”字。中型《现代汉语词典》收条目五万六千余条,大型《现代汉语大词典》该收多少,这虽然很难说,但至少总得在十万条以上。从汉语词汇如此丰富来说,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实践证明,要增加这么多条目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词典收词有一定的原则,不是凡是词语都能收入词典的,如一般词典收“正月”,不收其他月份;收“星期日”,不收“星期一”至“星期六”。这就大大减少了可收词的数量。再看《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情况,可说普通话里常用的语汇遗漏的并不很多,没有收录的多数是因为容易理解而不需要解释的或结构松散不宜收入词典的,遗漏的大部分是些一般的语汇。所以,要在《现代汉语词典》基础上,扩

大成一部收词在十五万条左右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将会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有一个发掘词汇来源的问题。当然，可以大量收录进入日常使用语言中的科技词汇，可以增收人名、地名等。但就语文词典来说，发掘方言词汇更符合语文词典性质和特点。但对方言词应当如何吸收、如何保证收词质量呢？从已出版的语文词典看，收录方言词的数量一般都很少，照理掌握应该是很严格的，然而问题倒不少：其中有些方言词很“土”，有些只是因为某个作家用过就加以收录的。词典如果大量收录那些十分“土”的方言词，确是有一个推广普通话还是推广方言的问题。我们主张语文词典适当收录方言词，是指那些已经进入普通话或有可能进入普通话以及在书籍报刊上经常出现的或在某些大方言区里常用的方言词。至于只在狭窄范围内使用的十分“土”的或不常用的方言词，还是以不收为宜。这样是不是没有多少方言词可供词典收录了呢？不是的。汉语方言是个宝库，看我们如何去发掘。目前辞书编纂机构一般来说在方言资料的建设上比较薄弱，可供选收方言词的天地不大。改善目前的这种状况，就一定能够提高方言词收录的数量和质量。

第一，要加强方言词汇的调查工作。全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七个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粤方言区、闽方言区。做好方言词选收工作，首先要对这七个大方言区的词汇面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具体做法，可以在七个大方言区各找出一个有代表性的地点方言作为该大方言区的代表，进行重点调查。如吴方言区可以上海话为代表，适当照顾苏州话、绍兴话、温州话，这样基本上就能勾画出吴方言词汇的大致面貌。词典机构做这项工作，应该不同于一般为推广普通话而作

的方言调查。为词典编纂作方言调查,重点要放在书面材料的调查上,从用方言写作的作品或虽用普通话写作但中间夹杂较多方言词汇的作品中去发掘方言词汇。当然,我们也要充分利用现有方言调查的成果。过去方言调查虽然重点放在语音的调查上,但在词汇方面的资料也是不少的。如《现代吴语的研究》、《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汉语方言概要》等就记录了大量的吴方言词汇。这些材料对于在选收方言词上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在调查的基础上,做好方言词汇的分类工作。方言词汇就它使用的范围和频率来说,都不是在一个平面上,而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的层次。分类工作做好了,方言词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也就有了一个大概的眉目。例如,在我们对吴方言区几个重要地点方言词汇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收词的需要,可以把吴方言词汇大致分成以下十类:

1. 已经进入普通话的,如:

[老板] 私营工商业的财产所有者。

[瘪三] 指无正当职业而以乞讨或偷窃为生的游民。

2. 常见于一般书籍报刊的,如:

[亭子间] 旧式楼房中的一种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间,狭小黑暗。

[拆烂污] 比喻不负责任,搞坏了事情。

3. 常见于用吴方言写作的作品的,如:

[日脚] 日子;日期:(我)约了日脚去看伊(《杂格咙咚集》)。

[场化] 地方(dìfang):这蟹壳里仙人既是一团好意,也该说明个场化(《何典》第八回)。

4. 口语里常用而不限于吴方言区的,如:

[今朝] 今天(也见于广州话)。

[信壳] 信封(也见于昆明话)。

5. 跟普通话词义不完全一样的,如:

[白话] 说话(普通话指不能实现或没有根据的)。

[馒头] 包子(普通话指一种用发酵的面粉蒸成的食品)。

6. 古汉语还保存在方言里的,如:

[束脩] 无锡有的地区旧时称私塾学费(见于《论语》)。

[夜来] 夜间(见于孟浩然诗《春晓》)。

7. 比较粗俗的,如:

[屁精] 平湖等地称油头粉面的男青年:相公们不知,近来奈河桥上出了一个屁精(《何典》第八回。)

[老蔬菜] 苏州等地骂老年人的话:却又说的是苏州话,只听得老蔬菜、杀千刀两句是懂的,其余一概不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四回)。

8. 太土的,如:

[挨依从头] 顺着次序:生活挨依从头做起来。

[零碎伯伯] 俗称小孩儿。

9. 现在已不太用的,如:

[田墩狗] 称农村中富裕的人家。

[踏穿镬盖] 俗称奸情败露。

10. 有音无字或词形没有把握的,如:

[线牵] 动个不停:~糊猻。

[济] 左:济手(左手)。

以上十类词一般可以确定:一、二、六类原则上可收;三、四、五

类可以收一部分；七、八、九、十类基本上不收。但具体掌握上还会有许多困难，因为有许多词可收可不收，界线并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在选词时还得有个标准，作些规定和限制。我们认为，凡属于以下情况的方言词语，可以考虑从宽收录：

1. 有可能进入普通话的；
2. 在普通话里没有相应合适的词能替代的；
3. 不限于某一个大方言区使用的；
4. 通行面虽窄，但在某个大方言区有较大影响的，如宁波话中的“阿拉”；
5. 属于补充方言义的，如“绽”（普通话义：裂开，如皮开肉绽。吴方言义：子实饱满，如豆荚绽）。

但属于下列情况的，应从严掌握：

1. 不宜推广的，如捧卵子过桥（见于《何典》第一回，比喻小心翼翼）。
2. 普通话里已有相应合适的词，如普通话里已有“顽皮”，就不必再收“蛮皮”。
3. 一词多形的，在不太有把握的情况下，以不收为宜，如表示躲藏同一意思的，有写作“伴”、“畔”、“盘”、“叛”，如果都属记音字，可不收。
4. 生僻少用的方言义也以不补为宜，如“意识”，在平湖话里有怪僻的意思：格个人蛮意识。但使用面窄，可以不补。

第三，要提高方言词收词质量，还必须处理好方言词在音、形、义三个方面的问题。

1. 关于方言词注音。为了推广普通话和便于普通话吸收方言词，词典可以注普通话读音，不必注方音，现在的词典也都是这

样处理的。方言词注普通语音有两种方法,一是按方言字在普通话里的读音注,如“日头”(太阳),上海念[niəʔ, drʔ,《现代汉语词典》注为:rì·tou。相应地,“日脚”(日期;日子)可注为:rìjiǎo。一是适当照顾方言读音,如“挺括”(较硬而平整),“括”在普通话里有念kuò和guā,但在吴方言里都念[kuaʔ。],所以《现代汉语词典》注为:tǐng·guā。相应地,“括皮”(抠门儿)可注为:guāpí。这两种方法互为补充,我们认为基本上还是可取的。

2. 关于词形的处理。由于方言内部语音上的分歧,根据各地方音记录下来的表达同一概念的词,在词形上往往不一致,如缝衣服用的“针”,在吴方言区就有“引线”、“现线”、“腻线”等。有的虽属同一个地点方言,但由于记本音和记变调的不同而出现一词多形,例如都是表示“捉弄”意思的,有记作“弄松(鬆)”、“弄怱”、“弄耸”、“弄送”。根据上海话,“松(鬆)”和“怱”、“耸”、“送”是不同调的,但按连读变调,第二个字都读成中平调,变成了同音。词典容许一词多形,但必须以有利于促进汉语规范化为前提,上面所列举的似都不宜兼收并蓄,应有所取舍。“玩儿”在苏州附近各县有写作“薄相”、“孛相”、“白相”等,《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一律记作“白相”,我们认为是可取的,这样有利于普通话的吸收。

3. 关于释义。方言词一般可用相应的普通话词语注,以便于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如《现代汉语词典》“奶娘”注为:〈方〉奶妈。“事体”注为:〈方〉事情。如果词义稍有差别,一般可加括注,如“开洋”,《现代汉语词典》用“虾米”注,另加括注:多指较大的。方言词在普通话里没有相应的词,可以采用一般词的注释方法,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采用下定义的方式,如“痢痢头”注为:〈方〉①长黄癣的脑袋。②指长黄癣的人。

另外,在方言词的处理上要从宽,用得比较普遍的方言词少标〈方〉,使更多有生命力的方言词有机会进入普通话。标〈方〉的方言词,应尽可能注明使用的范围和地区。《辞海》收录的方言词有一些注明使用的范围和地区,这对于读者是很有用的,如“脚力”注为:吴方言称奥援为“脚力”,有靠山为“有脚力”。“冇”注为:粤方言。没有。“里手”注为:湖南方言,内行的意思。要注明方言使用的范围和地区是有不少困难的,但关键还在于词汇的调查工作做得怎样,如果对各大方言区词汇面貌有个基本的了解,那么困难就会小得多。

现代汉语字词典中的字形处理*

刘庆隆

一 语文性字词典要为语文规范化服务

1. 现在编写语文性字词典大都有意识地担负起了为语言文字规范化服务的使命,使编写的字词典在语言文字规范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现在的字词典用标准字形,注标准音,用普通话注释,这是语文性字词典编写的一大进步。

2. 解放后,在语言文字规范化方面,尤其是在文字方面,上下都做了很多工作,有关领导机关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以下简称《异体字表》)、《简化字总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以下简称《字形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以下简称《通用字表》)等文件,使文字规范化有了标准可依。各字词典编写单位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使字词典里的文字规范化。《辞海》动员上海的力量,刻制了一套标准字形字模。好多字词典都是用这套字形印制的。

3. 新闻出版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1992年7月发布了《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1992年8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月1日起施行。制定这个规定是为“使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等出版物使用汉字规范化,消除用字不规范现象”。《规定》中指出:“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等出版物的报头(名)、刊名、封皮(包括封面、封底、书脊等)、包装装饰物、广告宣传品等用字,必须使用规范汉字,禁止使用不规范汉字。出版物的内文(包括正文、内容提要、目录以及版权记录项目等辅文),必须使用规范汉字,禁止使用不规范的汉字。”同时并指出:“违反本规定,由省级以上(包括省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以责令改正、警告、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规定》对出版物中汉字的使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就是对字词典中字形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字词典中的字形不规范或者处理不当,会影响千千万万的读者正确使用这些字。哪些是规范字,哪些是不规范的字,读者不一定都能分辨清楚,要靠文件和字词典。有的文件中的规定也需要字词典加以具体化,使群众能更清楚地理解和正确使用。因此,字词典在文字规范化方面的任务更重了。

4. 字词典里字形规范化,依据有关文件大部分的字是可以处理好的。但个别问题(比如类推简化字类推的范围)和一小部分字还不够明确,各人的理解不同,处理起来难免有分歧。因此,字词典编写者非常希望有关领导机关对这些不甚清楚的问题,能给以明确的指示和解释。

这种希望短期内未必能实现。但字词典的编写还须进行,不能等待。提出一些字形方面的问题和处理办法,以期经过讨论,求得共识,减少分歧,有利于规范化,方便读者。

二 现代汉语通用字词典应收录的字形

《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中指出：“规定所称规范汉字，主要是指1986年10月根据国务院批示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所收录的简化字；1988年3月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所收录的汉字。”“规定所称不规范汉字，是指在《简化字总表》中被简化的繁体字；1986年国家宣布废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1955年被淘汰的异体字；1977年淘汰的计量单位旧译名用字；社会上出现的自造简体字及1965年淘汰的旧字形。”通用语文性字词典里规范的字必须收，使读者知道这是现在使用的字。不规范的字也要收，使读者知道这些字是现在一般不使用的字，同时也解决了读者碰到的问题。这两类字在字词典里要明显地区分开，以便读者能分辨清楚，并能正确使用。其他现代汉语字词典应使用规范字形。

1. 标准字形和旧字形

a) 1962年3月间，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了统一铅字字形，共同成立了汉字字形整理组，就印刷通用汉字范围内的铅字字形加以整理，确定每一个字的一定的笔画结构和笔画数，以使用作统一铅字字形范本。汉字字形整理组经过反复研究，于1964年5月间编成《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此项字形表包含印刷通用的宋体字6196个（不包括排印古籍及其他专门用字）。这个字形表报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批准，由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给出版、印刷、字模制造等

有关单位,遵照执行。字表上的字,就是常说的标准字形。现在的字模大都按这些标准字形刻制的,一般出版物也大都使用了这些标准字形。《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及根据这个标准制成的汉字卡、激光照排系统等也都使用了这些标准字形。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关于发布〈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联合通知》中说:“《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依据《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确定的字形标准,规定了汉字的字形结构、笔画数和笔顺。字表发布后,印刷通用汉字字形即以此为准。”这就是说《通用字表》上的字即现在的字形标准,字词典中可以遵照办理。

b)《字形表》对字形整理的原则是:一、从现在出发,不完全根据文字学的传统。比如“赖”字,从“束”从“负”,不从“刺”从“贝”。二、同一个宋体字有几种不同的形体,挑选常用的,便于辨认的,便于书写的形体。比如取“骨”,不取“骨”;取“吴”,不取“吳”等。三、同一个字宋体和手写楷书笔画结构不同的,宋体尽可能接近手写楷书。比如“羽”作“羽”,“半”作“半”,“尙”作“尚”,“示”字旁作“衤”,“瓦”作“瓦”等。四、挑选笔画少的字(也减少了一些字的笔画),比如“郎”作“郎”,“爭”作“争”,“印”作“印”,“象”作“象”等。五、字形的规定,注意到便于按形排检。比如“感”作“感”,“鼯”作“鼯”等。《字形表》没有的字,字词典里可以根据这些原则和参照《字形表》上的字来选定字形。

一般字词典中超出《字形表》的字,大都是照上述原则处理的,像新《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第一至第五辅助集、新制定的 G. B. 13000 (即国际标准 ISO-IEC10646 字符集)等超出《字形表》的字,也都

是照这些原则确定的。

c)《字形表》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文章已经谈到。比如:上下半包的字,愿、磨、赓、腐、鹰等半包,辱、感、惑、盛等分为上下两段;汉、坚、权—邓、鸡、劝,两边的“又”字不同;顷—颖、颖,两边的“匕”字不一致;等等。这类问题牵涉的字多,只能把意见送给有关部门,字典里照样处理。关于《字形表》中的个别字,可以说是错误的,字典里似宜改用正确的字形。比如“耨”字,《字形表》里“辱”为上下两段,“溥、蓐”等为半包,“耨”应是半包,作“耨”。《通用字表》中作“耨”。

现在的字模或汉卡,虽然是照标准字形做的,但有的不规范,排印字典要仔细校对,纠正不规范的字形。由于字模或汉卡有不规范的字形,所以字典上也有不规范的字形,像“瘰”、“鰈”,“瘰”与“鰈”的“眾”不同。

d)现代汉语通用字典,一般附繁体字和异体字,不附旧字形,而附一个新旧字形对照表。这个对照表给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细心的读者根据这个对照表,可以把一些标准字形折合成旧字形,或把旧字形折合成标准字形。但对照表也有一定的缺欠,字太多了,难记住,少了照顾不全;构成偏旁的结构便于折合,但适用的字少;结构分得小些,适用的字多,但折合起来容易发生错误。比如:頁→頁→敢,矣→矣→侯,工→工→敢、侯;攸→攸→修,彳→彳→務,夂→夂→修、務。不搞文字的人,对文字的结构比较生疏,只有对照表不一定都能解决问题,还是附上旧字形,便于读者检查。旧字形数量多,现在缺少铅字,排印有一定的困难。似可附上有代表性而读者又需要检查的字。比如:奂、爭、呂、蚤、盜、骨等。

e)《字形表》和《通用字表》都是“按汉字的笔画数排列,同笔

画数的字以笔顺‘横、直、撇、点、折’为序”。这就是说标准字形的笔画数和笔顺已经有了规定，字词典里可以依此排列。

2. 简化字和繁体字

a) 现代汉语通用字词典应该以简化字为正字，后附繁体字。使用简化字是文字规范化的要求，附上繁体字便于读者检查。五十岁以下的人对繁体字已经不熟悉，碰到繁体字要查字词典。如不附上，读者就查不到，解决不了遇到的问题。有的字词典只附一部分繁体字，部首(如貝、見、車等)类推简化字不附繁体字。这对现在的年轻的读者仍不方便，而技术处理上有的也有一些问题，不如全附上繁体字。

b) 字词典里偏旁类推的简化字收多少，现在还是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尤其是这几年意见更分歧。《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第二辅助集和第四辅助集共收字 21019 字，在这个范围内该简化的字都简化了，这是现在简化字最多的一个文件。新制定的 G. B. 13000(即国际标准 ISO-IEC10646)字符集(共收 20902 字，大陆字 17000 个)只用《通用字表》里的简化字。现在出版的字词典，《实用汉字字典》、《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收的字该简化的都简化了，有的只收《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收一万多字的中型现代汉语字词典(包括大型现代汉语词典)，该简化的字都用简化字比较合适。现在一般书报都使用简化字，超出《简化字总表》的字，该简化的也都用简化字。因为整本书、整张报纸都用简化字，突然出现个别繁体字很不谐调。中型现代汉语字词典(包括大型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字是现代汉语使用的，应该全用简化字。

同一本字词典里该简化的字有的字简化，有的字不简化，在技

术上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现在类推简化字使用的范围不同,本字典超出《简化字总表》和《通用字表》的类推简化字,似可加个标志,以便读者识别。

c) 现在有时看到“三裏地”、“海澱区”、“人民代錶”等等写法,觉着有些奇怪。这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把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对应关系搞清楚造成的。有一部分繁体字和简化字不完全相同,只跟简化字的部分意义相同,字典里要把这种关系表示清楚,比如在繁体字前边加上相应的义项号码。像“錶”只是“表”的“钟表”意义的繁体字,就在“錶”前边加上“表”的“钟表”意义的义项号码。

d) 《简化字总表》里有些简化字加了说明,这对于编写字典是有帮助的。比如“干(乾)”下注明,“乾坤、乾隆的乾读 qián(前),不简化。”“征(徵)”下注明,“宫商角徵羽的徵读 zhǐ(止),不简化。”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同音代替的简化字,只代替同音的部分,音不同的部分仍用原来的字。“伙(夥)”下注明,“作多解的夥不简化。”“借(藉)”下注明,“藉口、凭藉的藉简化作借,慰藉、狼藉等的藉仍用藉。”这类例子表明同音代替的简化字,原来不通用的意义,不简化。但有的没有加说明,人们便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因此,在字典里的处理也就有了分歧。比如“蘋果”的“蘋”简化为“苹”(píng),作田字草解的“蘋”(pín),是简化成“苹”,还是简化为“蘋”呢?《简明汉语字典》两个意义都用“苹”,《实用汉字字典》“蘋_㊦‘苹_㊦’的繁体字。㊦(píng)植物名。亦称‘四叶菜’、‘田字草’。……。”《新华字典》(1980年本,下同)“蘋果”的“蘋”,简化为“苹”,作田字草讲的“蘋”(pín),简化为“蘋”。《新华词典》“蛤蟆”条下“也作蝦蟆”。《简明汉语字典》作“虾蟆”。“蘋”似可仿“乾”处理,“蝦”简化为“虾”,是新造的简化字,似应包括 há, xiā 两个音。

《简化字总表·第三表》中有些类推简化字似是特例,比如:“鸟”下有“鳧、岛、搗、泉”,“纟”下有“辮(辮)”,“车”下有“轂(轂)”,等等,似不能仿此类推。因此,“颯、穀、類”等能否类推为“颯、颯、類”等,有分歧。简化偏旁是“纟(纟)”,不包括“糸”,依此,不宜类推。如仿“辮(辮)”,可以类推。但“辮(辮)”似不符合偏旁类推原则,应是特例。有的字词典“穀”,类推为“穀”,没有仿照“穀”类推,说明大家认识到“穀”是特例。《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第二和第四辅助集“颯、穀、類”的“糸”没有简化,“穀”作“穀”。

注中交代的“宀”、“鬥”等也不够清楚。“宁(寧)”的注释中说:“为避免此宁字与寧的简化字混淆,原读 zhù 的宁作宀。”没有说明“宀”是类推偏旁。但第三表中“贝”下有类推简化字“贮”,《通用字表》中有“苙”、“纒”。字词典里也是这样类推的。“宀”可以看做是类推偏旁。“闹(鬧)”等的注释说:“鬥字头的字,一般也写作門字头,如鬧、鬪、鬪写作鬧、鬪、鬪。因此,这些鬥字头的字可简化作门字头。”从注释开头的话看,好像是从鬥的字可以写作从门的字,但有些从鬥的字,未见写作门字头的字,也未见其他字类推作门。似可只限于表上的字。

e) 《简化字总表》有的简化字没有把相应的繁体字都附上,为了便于读者检查,字词典里还是都附上为好。比如:饥(饑),“饥”也是“飢”的简化字,要附上“飢”;证(證),“证”也是“証”的简化字,“証”也应附上,等等。

f) 附的繁体字,用新字形还是用旧字形,过去认识不甚一致,字词典上曾有过分歧。《简化字总表》和《字形表》附的繁体字都是新字形,字词典里照此处理就行了。

3. 正字和异体字

a) 汉字的异体字,数量是很大的。《汉语大字典》收字 54678 个,后边的异体字表共有 11900 组,每组少的一个异体字,多的二十五个,估计异体字比正字多,这些异体字不仅不能丰富语言,而且造成文字使用的混乱,增加人们学习的负担。各字词典都做了一些整理工作。1955 年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共 850 组,精简掉 1055 字(后恢复 28 字,不再作为异体字)。

b) 文化部和文改会《关于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联合通知》中说:“从实施日起,全国出版的报纸、杂志、图书一律停止使用表中括弧内的异体字。但翻印古书须用原文原字的,可作例外。”“停止使用的异体字中,有用作姓氏的,在报刊图书中可以保留原文,不加变更,但只限于作姓用。”《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中把《异体字表》中的异体字列为不规范的字。这就是说《异体字表》中的异体字一般不再使用了。各字词典整理的异体字,只是建议不要用,不能算是不规范的字,不能用。因此,这两类异体字要区分清楚,以免引起误解。最好只把《异体字表》中的字附在正字后面,本字词典整理的异体字,仍出字头,注中表明是异体字。如果附在正字后,一定要加标志表示清楚,这是本字词典整理的异体字。

为了方便读者,附在正字后的繁体字、异体字、旧字形,要区分清楚,可以像《简明汉语字典》用不同的括号来区分,也可以加标志来表明,比如繁体字在前,圆点(·)后是异体字,三角(△)后是旧字形,等等。

c) 有的异体字跟正字的意义不完全相同,可以仿照繁体字的处理,加相应的义项号码。如果异体字有的意义是正字没有的,宜另出字头,交代这些音义。比如:斤(勛),只是作为量词的意义,

“勹”是“斤”的异体字，“斧斤”的意义，“勹”没有这个用法，附在“斤”后的异体字“勹”，前面要加相应的义项号码。但“勹”还同“筋”，“斤”没有这个意义，“勹”应另出，注明同“筋”。“釐”是“厘”的异体字，但“釐”另有 xǐ 音，同“禧”，应另出字头交代。

有姓氏义的异体字，宜另出字头，注明姓氏义。（参看二. 3. b）比如：麴（麴），“麴”是姓，除作“麴”的异体字外，另独立出条，“麴（麴）Qū 姓。”綫（線），“線”是姓，除作异体字外，也要另外出条，“线（線）Xiàn 姓。”

d) 《简化字总表》、《通用字表》等恢复了 28 个《异体字表》中的异体字为正字，不再作为被淘汰的字。这些字字典词典里要作正字处理，单独出字头。（这 28 个字参看二. 3. g）

e) 《异体字表》加了第一批，说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等，但迄未发布，这就使得《异体字表》显着不完备，遗留了一些问题。比如：《异体字表》有“朵（朶）、塚（塚）、蹠（蹠）”，没有“躲（躲）”、“剝（剝）”，照《异体字表》处理，躲、剝不附（躲）、（剝），在字典词典里显着不一致，读者也会有疑问。这一类标准字形与《异体字表》的正字一致，《异体字表》的异体字也是旧字形，似可把旧字形“躲”、“剝”附上，也就整齐划一了。有的可作为本字典词典整理的异体字处理。比如：《异体字表》有“札（劓劓）”、“咩（咩 咩）”，没有把“劓”、“咩”列为异体字，字典词典里如收“劓”、“咩”，可把它作为本字典词典整理的异体字处理，不要简单地作为正字。

f) 《异体字表》发布时无论是正字还是异体字都是旧字形，正字在《字形表》里都成了标准字形，但异体字除了恢复为正字的，其他字《简化字总表》、《字形表》、《通用字表》都没有收录。这些异体字用什么字形，前些年出版的字典词典，标准字形和旧字形都有。近

几年出版的字词典大都用标准字形了。用标准字形比较合适,因为有些字还用作姓氏,也有一些字,还有别的用法,如前边举的“舫”、“鳌”等,就是其他字也可能会用到。如果用到这些字,也须是标准字形。否则,全篇都是标准字形,单这个别字是旧字形,也不谐调。用旧字形排检也不方便。

g)《异体字表》发布后,曾进行过修订,但未发布。后来《简化字总表》等改动了《异体字表》中的一些字,未加说明。《通用字表》在联合通知中提到“增收 854 字,其中包括尚需使用的《异体字表》中淘汰的异体字 15 个”。“《异体字表》中的 15 个字也将作相应调整”。未说明是哪 15 个异体字。

《语言文字规范手册》(增订本)(1992 年版)中刊载的《异体字表》,前面加了个《说明》。“一、根据 1986 年 10 月 10 日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确认《简化字总表》收入的‘沂、讫、晔、蓄、诃、鳙、绌、划、鲑、诤、鲢’11 个类推简化字为规范字,不再作为淘汰的异体字。二、根据 1988 年 3 月 25 日……‘关于发布《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联合通知’中的规定,确认《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收入的‘翦、邱、於、澹、骼、徬、菰、溷、徽、薰、黏、桉、愣、暉、凋’等 15 个字为规范字,收入《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不再作为淘汰的异体字。”《异体字表》内容似未大动,好像只把“坂(阪坂)”改为“坂(坂)”、“鏗(剡挫)”改为“鏗(剡)”、“諡(諡)”改为“諡(諡)”、“佇(竚佇)”改为“佇(竚佇)”(“佇”组的改动,未必妥当)。

《简化字总表》中还把一些异体字提出来简化了,像“謚(溢)”、“寶(宝)”、“墻(墙)”等,《通用字表》中还收了异体字“伫”等,这些《说明》中都没有提到。联合通知中说的“《异体字表》中的 15 个字也将作相应调整”,1992 年版的《语言文字规范手册》(增订本)中

的《异体字表》中还未调整。大家非常希望《异体字表》作相应的调整,以便遵照执行,或领会调整的精神,处理字词典中相类似的问题。现揣度着分三类来处理:一、恢复为正字的异体字,独立出条,像“挫”、“愣”等。二、调换原来正字与异体字的位置,像“寶”、“牆”等。但“佇”与“伫”不作调换位置处理,“佇”作为“伫”的繁体字。“鬧”与“鬧”等作为两个繁体字。三、“彷彿”读 páng,独立出条;读 fǎng,仍宜作异体字处理。否则,彷彿 fǎng 为正字,佛为异体字,彷彿,不好处理。

三 在凡例中交代字形的处理

本字词典对字形的处理,应该在凡例中交代清楚,便于读者掌握。现在的字词典的凡例中大都不交代本字词典字形的处理,常引起误解。比如《辞书研究》1983年第二期有篇文章谈到《新华字典》“宴(②讌、醺)”,认为《新华字典》的处理是:“讌”,只适用于“宴”的②义,“醺”,适用于“宴”的全部意义。这种情形,由于凡例中没有说明,引起了误解。《新华字典》的这种处理,是表示“讌”和“醺”都只适用于“宴”的②义。如果是适用于全部意义的,就放前边了,像“摆(擺、⑤擺)”。从这里,可以看出说明的重要性了。

就是前边说的适用于全部意义的,也需要加以说明。这里说的全部意义是指本字词典里收的全部意义,不一定是这个字的全部意义。至于这个字的意义,本字词典没有收的,可能适用,也可能不适用。因此,不同的字词典收的意义不同,适用的范围也可能不同。

异体字及其在现代汉字 系统中的处理

韩敬体

一

异体字就是跟规定的正体字同音、同义，写法不同而能够被正体字所取代的字，王力先生说：“异体字跟古今字的分别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的意义完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代替。”（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上册）异体字的存在是汉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异体字的使用、流行，给语言文字的学习和应用都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因此，整理异体字是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一项重要很重要的任务。

由于汉字特有的造字原则和结构体制，创造和使用的人口众多并且分布的地面十分广阔，加之汉字已有四千年以上的发展历史，因此，它所产生的异体字类型多、数量大，是理所当然的。

就异体字类型来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划分。比如从汉字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分类，汉字经过四千多年发展，其形体有过甲骨、金文、篆、隶、行、楷多次嬗变，每个字都可能在不同字体的差异，形成历时性的异体（当然，一些后起的字异体会少一些）。而在同一个时代、同一类形体系统中同一个字出现的异体就形成了共时性的异体。我们通常所说的异体字，就是指的共时性的异体

字。只有共时性异体字,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代替。就异体字与正体字的形体结构不同而言,又可以分成若干类。著名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就把“狭义异体字”划分成八类,它们是:加不加偏旁的不同(兒—貌、凳—櫈)、表意和形声等结构性质的不同(泪—淚、豔—艷)、同为表意字而偏旁不同(尠—尠、塵—尘)、同为形声字而偏旁不同(杯—盃、迹—蹟)、偏旁相同但配置方式不同(鵝—鶩、猓—翹)、省略字形的一部分跟不省略的不同(雖—虽、聲—声)、某些比较特殊的简体跟繁体不同(頭—头、對—对)、写法略有出入或因讹变造成的不同(弔—吊、呪—咒)。我们从字的形音义的关系方面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与正体字音义全部相同的异体字(如前面所举出的异体字)及与正体字音义部分相同的异体字,而在与正体字音义部分相同的异体字中又有三种情况:1)异体字的字义全等于多义正体字的一个或几个义项,但少于正体字的义项,从而为正体字所包容(游—遊、岳—嶽、果—菓);2)异体字只能与正体字在特殊用法或者在组成个别词语上相同(働—动、慫—勤、傢—家);3)异体字与正体字在某种音义上相同,而各自又有相互不同的字义(有的还有字音),它们存在一种交叉关系(仇—讎、鋤—鋤、闲—閒)。与正体字音义全部相同的异体字,有人称之为狭义异体字(裘锡圭)、有人称之为完全异体字(曹先擢),有人称之为典型异体字(高更生),有人称之为单纯异体字(陈抗),也有人称之为全同异体字(程荣);异体字音义为正体字包容或仅与正体字组成的个别词语相同的,又称之为包含式异体字(裘锡圭)、包孕异体字(高更生)、包容型异体字(陈抗)、专同异体字(程荣),异体字音义与正体字存在交叉关系的,又称之为交错式异体字(裘锡圭)、交叉异体字(高更生)、选择型异体字(陈

抗)、半同异体字(程荣)。自然,我们还可以从别的角度划分类别。不过,就文字学学术研究的角来说,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异体字就是与正体字音义完全相同的字,因而才能为正体字所代替。这也正是专家们所说的狭义异体字、典型异体字或单纯异体字。至于所谓的广义异体字、交叉异体字、选择性异体字、包含式异体字等等名目,只是由于1955年12月公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以下简称“整理表”)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庞杂,远远超出异体字范围,专家们为了研究、分析这个“整理表”而分出的一些类别,并给它们起了相应的一些名称。

异体字的数量是十分惊人的。如所共知,我国古代收录汉字最多的字典是《康熙字典》,这部字典收字有47035个(有人统计,其中有上百个字在不同部首内重出),它所收的异体字有9300多组,每组异体字又往往不止一个,可以说这部字典所收异体字多达一万多个,占全书收字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当代收字较多的权威字典是《汉语大字典》,共收汉字54000多个(本字典《前言》中说收字五万六千左右,但有人统计这本字典实际收字是五万四千六百多个,《前言》统计有误),异体字就有11900组,其中有的组异体字多达20多个(如“灵、斋、魅、难、迂、炒、杀、国、乱”等组),如此看来,《汉语大字典》所收异体字当在20000个左右。如此庞杂的异体字,对语文的学习、运用,信息的处理确实带来很多的困难。

二

由于异体字的存在给人们的学字、认字、用字造成困难,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信息交流和社会生活,所以历史上总是不断地对

异体字进行规范、整理。最著名的是秦朝的“书同文”，以秦国通行的小篆作正体，废除了许多的六国异体字。汉代对隶书的规范、唐代对楷书的规范以及古代编写的一些字典，都对当时存在的异体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范。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有计划地进行汉字的规范、整理工作。1955年12月公布了“整理表”，以后又公布有关简化字、通用字等字表，整理了上千的异体字，《简化字总表》规范了两千多个简化字，在字形方面也进行了整理。这些规范工作的社会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异体字的整理工作必须依据正确的原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同音同义用法相同的字中，要确定正体字和异体字，我们认为应该考虑以下几条原则：

通用性，或者叫普遍性。指一个字在使用的广泛和经常的程度。我们可以在充分收集材料的基础上，统计字的使用频度来判断其通用性。通用性强的自然被选用为正体字的概率就大。

理据性，或者叫科学性，指要研究一个字的形体结构的起源、流变与它的音义关系及其在学理上的价值，有理据者或理据性强者宜于选用为正体字。

系统性，指一个字在整个文字体系及相关的文字系统中的规律性。比如一个字跟其他的一批字有共同的形旁或声旁。文字有较强的规律性、系统性，便于学习、记忆和运用。

稳定性，指一个字在社会文字运用的实践上使用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被国家语文管理部门选用为规范字已为社会接受，流行时间比较久，不宜轻易变动。

简易性，指一个字笔画的多少及书写的难易程度，一般说来，笔画少者较为简易。简易，一般说来学习、书写起来比较便捷，效

率较高。

明确性,又叫区别性或分辨性,指一个字形体跟别的字区别明显,易于辨识。字所表达的意义明确,与别的字区别性大,不易混淆,实用效率就比较高。

这几条原则前三条较为重要,但一般需要统筹兼顾,综合考虑。既不可不讲理据,无原则地从俗,也不可不顾通用、死抠学理地一味泥古;既不可只求简易而导致形体容易混淆、破坏应有的系统性,也要切忌为了系统性、明确性而置繁难、不便通用于不顾。

这里有必要谈几种汉字类聚之间的关系问题,它们的概念有时会混淆不清。

繁简字和异体字。字体繁简是指字的笔画是多或是少,书写起来是简易还是繁难。一般是一个字演变中的笔画多少的不同形式。如果扩大范围从性质上来说,繁体字和简体字的不同也是一种异体字,但它与通常我们所说的整理异体字是从不同角度说的。特别是简化字,与异体字并提,专指汉字简化确定的规范字,所废除的相应的繁体字不必再称之为异体字。繁简字和异体字关系,打个比方,正如人名、地名或其他称谓的简称与别称一样,简称一般说来是正式称谓或全称的简略或简化形式,它与全称有形式上的显著联系,会有相同的字词,而别称则不然,一般在形式上与正式称谓或全称没有相同的字词。比如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的简称云、贵、川,都是全称中的一个字,而其别称滇、黔、蜀,尽管也很简略,但与其全称形式上没有共同的地方。简体字一般是繁体字减少笔画的形式,与繁体字在形式上联系较为明显,而异体字在书写形式上一般却与正体字差别较大。

古今字和异体字。古今字是就字的源流说的,指某个字在使

用若干时间后,又出现一个字分担了先前那个字的部分字义、用法,甚至比原先那个字在这部分字义、用法上更为常用,以至排除原先的字成为专用字。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在《说文释例》称之为“分别文”,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教科书中称之为古今字,后来在《同源字论》中称为“区别字”,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称之为“分化字”,高更生称为“包孕字”。比如“反—返、共—供、夫—伙”之类就是。应该说,古今字就是异体字中的异体字的音义为正体字包容的一类,但是,从现代汉字系统出发,古今字中有的音义早经分化,不必再看作异体字;有的还是异体字关系,但是还有个选择哪个为正体的问题,由于是包容关系,异体能不能废除需要研究。如古字为异体,由于字义大于正体,也就是说在另外的音义上仍会是正体,当然是不可废除的。

通假字和异体字。通假字与古今字一样,就汉字本身划分的类别。但是它们的角度不同,古今字从字的产生、发展划分的,表现一种纵向的、历时的关系,通假字是就同一个时间平面划分的表现一种横向的、共时的关系。通假字指古代人在用字过程中,忘记或者不会写应该用的字,写了个音同或音近的另一字来代替,实际上是写了个错别字。后代的人迷信古人,不敢指正古人写错别字,却说古人用了音同或音近而义通的字,名之为通假字。这种音同、音近的替代字,有的通用范围极其有限,它们的经常用法不同,比如“信—伸、共—恭”之类,不可看作异体字。有的通过同音替代,构成了部分字义相同的异体关系,比如“苏—甦、后—後、纹—璠”之类,就应该把它们看作异体字。

新旧字形和异体字。1965年1月文化部和文改会发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对选收的6196个通用汉字确定其笔画、笔画

数、笔顺、结构方式和笔形次序,其中在笔形方面,有部分的单字和部件有所连接、省略或改变,形成了所谓新旧字形的不同。新旧字形对比中,不少是笔形、笔画上的差异,比如部件草字头、走之儿新字形比旧字形少了一画,兔、炯字旁的新旧字形差了两画,八字头、爪字头等部件改变了笔形。从性质上说,这种笔形笔画变化也是一种异体字关系,《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的异体字与正体字部件笔形有变化或相差一两画的情形并不少见,比如朵、塚、躲与其异体字的部件不同,况、决、泯等偏旁与其异体字偏旁之间也就差那么一点。所以,将因新旧字形形成的字归并入异体字并无不妥。当然,差异微小的新旧字形不并入异体字而单独另外列表也不失为一种简便易行的办法。

异形词和异体字。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异形词是语言中词汇方面的术语,是指音同义同而写法不同的词,也就是一个词的不同书写形式。有人也称之为异体词。我们整理异形词时,要确定选用词,淘汰异形词,比如,“耿直、梗直、鯁直”,我们选用“耿直”,淘汰另外两个形式“梗直、鯁直”。但是,异形词与异体字不同,异体字相对于正体字而言,确定了正体字,异体字即被淘汰。而异形词所含有的字,比如上面提到的“梗、鯁”,并不是异体字,不能淘汰。如前所说,异体字指的是同音同义不同写法的字,是文字方面的术语。裘锡圭先生认为异形词这一术语很不科学,混淆了语言和文字的界限。当然,二者虽然不同,又有密切的联系,文字是表现词语的,单字异形词就与异体字基本上一致,而多字异形词中的不同的字却未必都是异体字关系。但是,我们整理异体字时,应该同时考虑异形词的整理问题。如果二者不联系起来考虑,就会产生顾此失彼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

三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国务院指示编写的我国建国后的第一部规范型词典,其宗旨是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它开始编辑于1958年,对异体字进行整理,也是这部词典的一项重要工作。它依据“整理表”,但又不局限于“整理表”,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加以修正和大量补充。

《现汉》列在大字头后面括号中的异体字有1217个,“整理表”所收异体字是1055个。这两个数字好像差不太多,实际上,《现汉》与“整理表”相差很不小。它们相同的,也就是说《现汉》完全依从“整理表”处理的只有622字,不过只占它整理的放在大字头后括号中的异体字不到百分之六十,还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不相同的。

“整理表”里的异体字有430多个《现汉》没有作为异体字列在正体字后面,其中有270多个由于过古、过俗或者有误《现汉》没有收,如“年(秊)”“亩(畝晦)”“骂(馮)”等;另有158个由于与“整理表”规定的相应的正体字音义不完全相等,《现汉》立为大字头,如“呆(駮)”“仿(彷彿)”“剪(翦)”“案(桉)”“渺(淼)”“嗔(瞋)”“雕(凋)”“淡(澹)”等。《现汉》选定的正体字,也有个别的与“整理表”不同,如“整理表”作“粘(黏)”,在读nián音时,也选“粘”为正体字,《现汉》则选“黏”为正体字,而在“粘”下注“同‘黏’”,“整理表”作“趟(蹚)”,《现汉》则选“蹚”为正体字,而在“趟”下注“同‘蹚’”。有的异体字意义被正体字所包容,其用法只相当于正体的某一个或某

几个义项,就在括号中异体字前标示出那一个或几个义项号码。也有极个别的异体字只是在几个词语中与正体形成异体字,很难标示出某个义项,《现汉》不得已只好个别处理,为那些极个别的异体字出大字头。比如“傢”之于“家”,“働”之于“动”,“懃”之于“勤”等。《现汉》还收了“整理表”异体字以外的字有 590 多个作为异体字放在正体后的括号内。如“沉(沈)”“收(収)”“算(祿)”“傻(僂)”等。

《现汉》对异体字的整理和处理,大多数是正确的,有的为后来的规范字表所吸收,调整了“整理表”原先的处理办法。当然,也有可以修正的地方,如“搬(般)”“唬(虎)”,看来不必将“般”和“虎”作为“搬”和“唬”的异体字。应该对《现汉》异体字的整理及其处理办法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其经验,以作为今后进一步整理异体字的重要参考。

四

对异体字的进一步整理问题,这里只是提出几点意见,有些意见专家们早就论及过。

一、依据通用性、科学性、系统性、明确性、稳定性原则,对《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进行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对音义全等的和正体字包容异体字的所谓狭义异体字应该肯定下来,而那些音义不全等的所谓交叉异体字应该进行研究,采取适当方法处理。比如:

1. 为弥补该字表缺欠,后于字表发布的关于恢复“阪、挫”二字规范地位的通知、《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都有纠正或补充字表的有关规定,这些规定如无不

妥,可以继续执行。

2. 字表中有些音义不全同的正异体关系应进行更为明确的处理,如“发(髮)、岳(嶽)、拈(撚)、咤(吒)、偷(媮)”等字。为表意明确,可考虑异音异义分化,使某些原定异体字恢复其规范字地位。

3. 确定整理范围,范围外的死、僻、讹、罕见字可以不列入表。整理范围又不宜过小,要能覆盖 GBK20902 字符集,才便于实用。自然,范围也不必太大,弄进很多死字、讹字、僻字也没必要。

4. 考虑有些姓氏用字和某些多用于地名、人名的字不要轻易地处理为异体字。

二、进一步整理字表,完善汉字规范工作,需要强调全局性和前瞻性。汉字有一个完整系统,所以,在整理异体字时应该与繁简字、异读词、新旧字形等的整理统筹规划,通盘考虑,进行综合治理,避免以往那种各自为政、分散整理,相互参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仍然捉襟见肘的教训。要有全局性和前瞻性,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重,必须考虑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华人社区的用字习惯,减少相互间的差别和繁简转化的麻烦,对有关的繁简、异体定位存在问题的要加以调整。

三、继续整理社会使用已约定俗成的异体字。要注重《现汉》已推行多年的情况,其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正异体关系,可以作为进一步整理异体字的参考。比如“鬢—髻、挨—捱、抻—揷、捂—搗、咨—谿、傻—儇、丛—叢、貂—貂、棧—樞、箝—箝、解—解”等等,应该都可以明确其正体、异体关系。

四、可考虑将部分新旧字形作为异体处理。前面谈新旧字形与异体字关系时已经说过,不再赘述。

五、整理工作必须周密计划,稳步进行。一时还没有研究清

楚的,不要匆忙决定。要给学术界预留充分的研讨空间,待问题解决了,或者已经弄清楚了,再作新的补充规定。必须认识到,语言文字的规范或标准,应该是动态而有弹性的,随着社会前进和语言文字使用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不断修订及完善的,不能期待搞出的规范是尽善尽美甚至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应该做到制定规范或标准时,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尽最大的努力,少留下些遗憾,少存在一些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问题,既要对前人负责,也要对后人负责。无愧于国家交给我们的这项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 王 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78。
- 王 力《同源字论》,《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
- 曹先擢《关于异体字的两个问题》,《辞书研究》1983年2期。
- 刘庆隆《现代汉语字词典中的字形处理》,《〈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
- 陈 抗《评〈现代汉语词典〉对异体字的处理》,《〈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
- 李道明《异体字论》,《〈汉语大字典〉论文集》,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
- 黄仁寿《从几个部首谈〈汉语大字典〉对异体字的处理》,《〈汉语大字典〉论文集》,1990。
- 高更生《谈异体字的处理》,《语文建设》1991年10期。
- 傅永和《谈规范汉字》,《语文建设》2001年10期。
- 王凤阳《汉字的演进与规范》,《语文建设》1992年4期。
- 于立君《制定新标准字表 理顺形音义关系》,《语文建设》2001年9期。
- 程 荣《规范型汉语辞书的异体字处理问题》,《语文建设》1998年6、7期。
- 伍宗文《文字通假与字典编纂》,《汉语大字典论文集》,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

积极稳妥地整理和规范异形词*

韩敬体

一

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01 年 12 月 19 日发布了《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选取普通话书面语中经常使用、公众的取舍倾向比较明显的 338 组异形词进行整理，规定了每组异形词的推荐使用词形，也就是推荐性规范词形。文件中对异形词的概念做出了界定，说是“普通话书面语中并存并用的同音（本规范中指声、韵、调完全相同）、同义（本规范中指理性意义、色彩意义和语法意义完全相同）而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

如所周知，汉语书面语在运用和发展中，由于各方面的因素（比如语音演变、词汇变化、语用变化、汉字运用的变化等）起作用，出现了不少同音同义用法相同而字形不同的词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异形词语。这些词语中有不少本来就是一个词语，只是使用的字不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同而已。这类词语的存在，给汉语语文学习和运用、语文信息处理等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适时整理、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光明日报》2002 年 6 月 18 日的“理论周刊”，此次选收有改动。

规范异形词语一直是促进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这种异形词有单音节的,也有多音节的(包括双音节的),其中单音节的异形词,所谓的异形形式就是异体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进行的异体字整理和汉字简化,以单字为本位进行处理,也就是在做单音节异形词的整理和规范工作。不过,后来我国学术界所说的“异形词”或“异体词”,不包括单音节的,只是指多音节的。学术界一般认为,对异形词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开始于殷焕先先生发表于《中国语文》1962年第6期上的《谈词语书面形式的规范》一文^①,这篇文章主张从词语的角度处理汉语书面形式的规范问题。高更生先生在《中国语文》1966年第1期上发表《谈异体词整理》一文,明确提出“异体词”术语及其整理问题。其实,这只是从发表出的学术论文的角度看问题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语言学界已经着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实际整理工作。

在1955年10月,我国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提出了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的重大历史性任务。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指示,要求尽早编写出确定汉语普通话词汇规范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并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完成这一任务。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汉语语文的应用情况跟今天的情况是有很大不同的,那时《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刚刚发布,《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普通话异读词审音都还没有施行,社会上用词用字的混乱现象是可想而知的,异形词语的使用更是积重难返。确定词汇规范就是要从形、音、义、用法诸多方面确定词汇的实用标准。当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组织全所的专家、学者以及所外著名专家投入工作,收集了各方面的大量的语言文字

材料,进行反复的、充分的探讨、整理,其间对异形词语的整理也给予了高度重视。1956年《中国语文》7、8、9三期连载了郑奠、孙德宣等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初稿)》,其中的第一章8节的第一条,就是论述的“同字异体和同词异字的定型”,文中就说到了“疙瘩”、“犹豫”的选用词形问题,并提出通用性或普遍性的原则。两年后,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中也讲到了这个问题。《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从“试印本”到“试用本”再到正式出版本,其《凡例》中,都专门设立一条有关“不同写法的多字条目”处理和体例问题,这也正是异形词的收录和规范问题。

二

词是语言中音和义相结合的可以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其中读音是物质外壳,是形式,词义是音所表达的内容。在有文字的语言里,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书写形式。所谓“异形词”的名称,其中的“形”,是指语音形式,或是指书写形式,就不够明确。词的语音形式,是语言领域的概念。书写形式,是文字领域中的概念。人们所讨论的异形词,实际上只是指在书面上有不同写法的词。《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前言”中开宗明义说:“本规范规定了普通话书面语中异形词的推荐使用词形”。但是,什么是普通话书面语,异形词指书面语言中的词,还是一个词的不同书面形式,并没有交代清楚。高更生说:“词语的书面形式中有一种并存并用的现象,……这类同音同义而异形的词语可以叫做异体词。”^②杨春在《现代汉语异形词的规范问题》一文说:“异形词又叫异体词,指

的是一个词在书面上有几种不同的形式”。^③人们所说的书面上的形式,或者叫做书写形式,就是写法,是属于文字层面的;而“异形词”或“异体词”,按一般语言常识,应认为是一种词的名称,是属于语言层面的。这样,异形词的定名,就混淆了语言和文字不同的领域,裘锡圭先生在1988年出版的《文字学概论》一书中对这一术语就提出了的批评。他在2002年11月20日的《语言文字报》上发表《谈谈“异形词”这个术语》一文,重申了他的意见。他认为“异形词”、“异体词”的术语,混淆了语言和文字的不同层面,同一个词的不同书写形式,称“异形词”则名不副实。裘先生认为这一术语“不合乎语言习惯和语言学学理”,称之为“词语异形”或“多形词”较为适当。《现代汉语词典》有“不同写法的多字条目”的说法,还有的人主张称之为“异写词”。不过,异形词这一说法尽管不太理想,但是它比较流行,而且已经见诸规范文件,我们还是不反对使用它吧。

我们认为异形词应该是读音和词义、用法相同,可以相互替代的词语,其实应该说它们是不同的写法的同一个词语。这里面有四个要素:音同、义同、用法相同、在书面语言中可以相互替代。比如“交代、交待”就是有两种写法一个词,“梗直、耿直、鯁直”就是有三种写法一个词。它们就是双音节异形词。还有很多单音节异形词,在文字层面说,就是可以表达一个词的异体字。当然还有三音节或更多音节的异形词或异形语。

异形词必须有上述四个要素,不然,就不是异形词。但是,有的人把这类词范围划得很大,又有什么“狭义异形词”、“广义异形词”、“泛义异形词”的名目。我们不赞同把这类词语范围扩大的意见。由于构词语素位置颠倒形成的等义词,如“介绍、绍介”,“比

较、较比”，“芬芳、芳芬”“海拔、拔海”，“地老天荒、天荒地老”，“零敲碎打、零打碎敲”，“断编残简、残简断编”，“手疾眼快、眼疾手快”，“风餐露宿、餐风宿露”，“落花流水、流水落花”之类；因某个音近字不同形成的同义词，如“时兴、时行”，“投生、托生”；还有某个义近字不同形成的同义词，如“此起彼伏、此起彼落”，“无精打采、没精打采”，“品头论足、评头品足”，“天壤之别、天渊之别”，“五色缤纷、五彩缤纷”；同物异名，如“消音器、消声器”，“汞、水银”。这几类词语因为语音不同，都不是异形词。它们是同义词，但比起一般同义词来它们另有特点：词义相等，在语言运用中可以相互替换。外语的同一词语的不同的音译形式，也是一种特殊情况，如果在语言中可以相互替代，则可视为准异形词也可以称为准异写词。

三

《现汉》把现在所谓的异形词称之为“不同写法的多字条目”，它们是现代汉语中并存并用的语音、语义、语用相同而写法不同的词语。《现汉》收录这类词语时，经过整理，确定出推荐的词形，业内称之为正条，带有详细释义。而其异形词语，视其不同情况，采取了层次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出见条或称副条，有的就出不了条。《现汉》编写时收集的异形词语比较多，经过爬梳、整理，最后表现在《现汉》中的就减少了很多。对它们的处理方式大概有六类。

1. 《现汉》试用本和1978年、1983年的版本将较为流行的异形词并列出条，把更为通行的放在前面，后面的异形词还另出见条。1996年修订本则改为选用更为通用的为正条，释义后加“也作××”，异形词语“××”作副条出条，注为“同正条”。如[弘

扬]……也作宏扬,[宏扬]同“弘扬”。[宏图]……也作弘图、鸿图,[弘图]同“宏图”,[鸿图]同“宏图”。

2. 选用较通用的为正条,释义后加“也作××”或不加“也作××”,异形词语“××”作副条出条,用正条条目做注。[岔流]……也作汉流,[汉流]岔流。[关联]……,[关连]关联。

3. 选用通用的出条,释义后加“也作××”,交代出不同形式,但异形词不出副条。如[粗鲁]……也作粗卤,“粗卤”不出条。[差池]……也作差迟,“差迟”不出条。这一类都是在同一字头下,出条的话,也是紧挨着的。

4. 选用通用的出条,异形的字(语素)可形成一系列的异形词语,只在异形的字下解决,不出它组成的异形词语。如只在“采”下注“同彩”,“喝彩、喝倒彩、光彩、色彩、精彩、丰富多彩、五彩缤纷”之类不再出异形词语。

5. 选用通行的词形出条,认为它是约定俗成的形式,不出过去有过的现在已很少用或不用的异形词语。如只出答复、复信、担心、简练、装潢,不出答覆、覆信、耽心、简炼、装璜等。

6. 由词典已处理成的异体字、繁体字形成的异形词语不再出条。

有人曾经对《现汉》的异形词做过统计,由于认识不尽相同,得出的数据不一致。比如有的统计为 900 多组^④,有的统计为 600 多组^⑤,有的统计为 885 组^⑥,有的统计为 992 组(胡大柳硕士学位论文,未刊)。不难看出,他们的统计只包括上文所说的《现汉》处理异形词的六种方式的前三种,后三种因异形词不出条目,无形式上的标示,就难以统计。如果我们把后三种处理过的异形词语也统计在内,那么涉及的词语,当要多出许多。《现汉》涉及异形词在

1000 条以上。

《现汉》对不同层次的异形词语采取的六种处理方式是建立在语文应用实际的基础之上的。其中第六类, 因是由不规范字造成的, 不必再承认其异形词语的资格。第三四五类, 确定下通用词形, 不出异形词语, 引导性的通用词形绝大多数已为广大群众接受, 如再写出异形词语一般会被认为写了错别字。至于一二类, 推荐性的正条也一般为群众接受, 仅有个别的因为有的还在发展变化之中, 有的甚至已有逆向变化需要重新确定, 这些只是极少数的词语。据《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起草组负责人介绍, 这次公布的整理表选取推荐的规范词形就有 95% 与《现汉》所定的推荐的正条一致, 这充分说明了三四十年前出版的我国第一部规范性的语文性词典《现汉》在整理、规范异形词语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 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的, 并且为现在进行异形词规范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四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 规定了整理异形词的主要原则。它们包括通用性原则、理据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其中的通用性原则最受重视。所谓通用性原则, 是“根据科学的词频统计和社会调查, 选取公众目前普遍使用的词形作为推荐词形。把通用性原则作为整理异形词的首要原则, 这是由语言的约定俗成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即使少数词频高的词形与语源或理据不完全一致, 但一旦约定俗成, 也应尊重社会的选择。”所谓理据性原则, 是“某些异形词目前较少使用, 或词频无显著性差异, 难以依据通用

性原则确定取舍,则从词语发展的理据性角度推荐一种较为合理的词形,以便于理解词义和方便使用。”所谓系统性原则,是“词汇内部有较强的系统性,在整理异形词时要考虑同语素系列词用字的一致性。”文件还说,“以上三个原则只是异形词取舍的三个主要侧重点,具体到每组词还需要综合考虑决定取舍。”

学界对异形词规范的标准,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如前所引,《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提出通用性、理据性和系统性三原则,而把通用性原则作为整理异形词的首要原则。2002年初,在《现代汉语词典》新修订本的审订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王宁等专家就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理据性更为重要,不能一味地从俗从众,作为规范性的法规和词典,应具有“匡谬正俗”的作用。过分强调通用性的做法值得商榷。^⑦杨春提出了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应遵循五个原则:理据性、系统性、单音性、通用性、通俗性。认为“这五个原则地位不同,首先应考虑理据性原则,其次考虑系统性原则,再依次考虑单音性原则、通用性原则和通俗性原则。”但在特殊情况下,不必一定按照上面的顺序规范。^⑧苏宝荣将异形词整理和规范的基本原则归纳为分类的原则、引导的原则和动态的原则。分类的原则是说“应当通过异形词的研究,认识汉语构词的特点和规律,分门别类,区别对待,按照汉语与汉字的发展和使用规律确定规范原则,分别采取合并、并存、分化的不同的整理与规范方法。”引导的原则是说“语言文字的规范不仅是靠单一的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发布引导性意见也是一种整理和规范的方式,而且可能是一种更积极、更稳妥的方式。”动态的原则是说“汉语异形词的整理与规范不可能一劳永逸,而只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⑨

所谓通用性原则,《第一批异形字整理表》说是“根据科学的词

频统计和社会调查,选取公众目前普遍使用的词形作为推荐词形”。杨春则说“所谓通用性原则指的是选取使用频率高的书写形式”。^⑩事实上,都是以一定语料中的词频统计作为标准的。这里首先就有一个语料的客观性和完备性问题。正如在《现代汉语词典》审定委员会会议上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第一批异形词整理的主要依据的词频统计比较薄弱,采用全部语料的只有五六年的《人民日报》,时间似嫌太短,有些组的词频统计是0:0,没有参考价值。只有用广泛的充分的语料进行科学的词频统计,得出的数据才真实可靠,才据可信度。我们选用语料,要能充分反映语言实际,既要有一定的普遍性,也要有一定的稳定性。特别要区别典范和品位,切不可将规定得未必合适的东西让群众广泛使用,再对它们进行所谓词频统计。如果是那样,就不能客观地反映人民群众的使用习惯。比如1986年以前,“树阴、林阴道”中的“阴”,社会上普遍都写成“荫”,但是1985年12月27日三部委发布《关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通知》,规定不能再使用带草字头的“荫”,只能用“阴”,不然,就是差错;而且“荫”只能读去声,不能读阴平。于是慑于有关部门的质量检查、评奖或被指责为违背规范,书籍、报刊的编辑出版者只能照改。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用1986年以后的书面语料,统计“树阴、林阴道”的词频,当然就会得出用“阴”的占多数的结论,这确实是一个时期的社会用字事实,是在特殊情况下形成的,但这种情况并不一定能反映群众约定俗成的用字习惯,这种词频统计得出的结论及判定哪种形式通用性大,其可靠性是值得考虑的。

对异形词的整理和规范,是词汇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问题。我们认为,汲取以往发布语文规范的经

验,采取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区别对待、分批整理的工作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如前所说,当前学术界对异形词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一些理论问题比如什么是异形词,它与异体字有什么关系,它的范围如何界定,异形词整理的原则应该有哪些,它们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等等都还需要认真探讨。甚至连异形词这一术语也有很不相同的意见。有位教授说现在异形词规范的理论准备不足是有道理的。即如现在公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的338组异形词来说,研制者打包票说绝无问题,实际上问题却还存在,所依据的语料及所做的论证就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收集尽可能全面的、充分的语言材料对现在的异形词语进行深入研究,依据通用性、理据性、系统性等标准划分出不同类型,进行不同梯次的处理,把异形词语分成已经约定俗成取此舍彼的、虽无确定取舍但通用势力相当悬殊的以及彼此通用势力接近的等不同类别,区别对待。《现汉》整理异形词处理的方法、成果和经验,会给这一次异形词规范的研制工作带来方便。正像前文说过的,《现汉》是国家指定编写确定汉语普通话词汇规范的词典,对异形词的处理做了不少工作,更应引起注重。至于《汉语大词典》、《辞海》情况就不同。前者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历史性大词典,且以繁体字立目,它的正体字与异体字不受现代的异体字规范约束,以它判定异形词是需要细心研究的。后者以收百科词汇见长,所收语文词语又以古汉语为主,所以使用时也必须认真考虑。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指出:“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重在引导,尽可能不用强制手段”。这次异形词的整理规范,采取引导推荐试行的办法,是十分必要而正确

的。希望通过试行使用,广泛听取语文研究者和语文工作者的意见,在广大群众的语言文字应用实践中进行检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把异形词规范工作做好。

附 注

① 见苏新春《异形词规范的三个基本原则——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草案)〉》,《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2 年 2 期 25 页注①;苏宝荣《关于异形词整理和规范的理论思考》,《辞书研究》2002 年第 4 辑;裘锡圭《谈谈“异形词”这个术语》,《语言文字周报》2002 年 11 月 20 日。

② 高更生《谈异体词整理》,《中国语文》1966 年第 1 期。

③⑥⑧⑩ 杨春《现代汉语异形词的规范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四辑,商务印务馆 2001 年 11 月出版。

④ 高更生《〈现汉〉修订本的异体词整理》,《语文建设》1999 年第 1 期。

⑤ 苏新春《异形词规范的三个基本原则》,《厦门大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

⑦ 《〈现代汉语词典〉审订委员会 2002 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侧记》,《中国语文》2002 年第 2 期。

⑨ 苏宝荣《关于异形词整理和规范的理论思考》,《辞书研究》2002 年第 4 辑。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中的语音规范*

晁继周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作为一部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词典,非常注重语音规范。《现汉》对有异读的词的注音,依照的是60年代初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1982年起,重建的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进行修订,修订稿经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及广播电影电视部审核通过,于1985年12月以《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下简称《审音表》)的名称公布。《现汉》原来的注音,出现了个别与《审音表》不一致的地方。为了贯彻语音规范的原则,《现汉》这次修订,在有异读的词的注音上,基本依从了《审音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以下做法:

(一) 第一种情况,依照《审音表》改注读音

臭 有 chòu、xiù 二音,《审音表》规定 xiù 音用于“乳臭”“铜臭”。《现汉》“铜臭”原读 tóngchòu,现改为 tóngxiù。

堆 原有 duī、zuī 二音, zuī 音只用于“归里包堆”。现据《审音表》删去 zuī 音,“归里包堆”改注 guīlibāoduī。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语文建设》1995年第9期。

妨 原有 fáng、fāng 二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fāng 音。“不妨”改注 bùfáng；“何妨”改注 héfáng。

幅 《审音表》规定统读 fú。原《现汉》①、③义有括注：～儿，读 fūr。修订本删去“读 fūr”。

葛 有 gé、gě 二音，原《现汉》名物义和复姓“诸葛”中的“葛”读 gé，单姓读 gě。现据《审音表》把复姓中的“葛”改注 gě。“诸葛亮”一条也连带改注。

骨 原有 gǔ、gū、gú 三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gú 音，“骨头”改注 gǔ·tou。“骨头架子”“骨头节儿”也连带改注。

过 《审音表》规定除姓氏读 guō 外，其他情况都读 guò。《现汉》“过费”“过福”“过逾”等词中的“过”原读 guō，现一律改注 guò。

汲 原读 jī，现据《审音表》改 jí。

绩 原读 jī，现据《审音表》改 jì。

迹 原读 jī，现据《审音表》改 jì。

嗟 《现汉》原注 jiē，又 jué；现据《审音表》统读 jiē，删去“又 jué”。

卡 有 kǎ、qiǎ 二音。《现汉》“卡 kǎ”分为“卡¹”“卡²”，“卡¹”为动词义（～住敌人退路、～脖子），“卡²”为卡路里（热量单位）的简称。“卡 qiǎ”有动词义（鱼刺～在嗓子里）和名词义（发～、税～）。《审音表》“卡 kǎ”下例词为：～宾枪、～车、～介苗、～片、～通；“卡 qiǎ”下例词为：～子、关～。根据《审音表》例词所体现的原则，《现汉》修订时对“卡”的音、义作了调整。“卡 kǎ”分为 4 个义项，均为外语音译：①卡路里的简称。②卡片：资料～|年历～|病历～。③录音机上放置盒式磁带的仓式装置：双～录音机。[英

cassette] ④ 卡车：十轮～。原《现汉》“卡¹”所属义项读音改作 qiǎ，并入“卡 qiǎ”条。

框 原有 kuàng、kuāng 二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kuāng 音。

擂 原有 léi、lèi、lēi 三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lēi 音。“擂鼓”的“擂”原读 lèi，现据《审音表》改为 léi。“擂台”“打擂”中的“擂”仍读 lèi。

潦 (潦倒、潦草)原读 liǎo，现据《审音表》改 liáo。

芒 原有 máng、wáng 二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wáng 音。“麦芒”改注 maimáng。

祢 原有 mí、nǐ 二音，现据《审音表》只保留 mí(姓氏)，删去 nǐ 音及相关义。

眯 (沙子～了眼)原读 mǐ，现据《审音表》改 mí。

摸 原有 mō、mó 二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mó 音及相关义。

酿 原有 niàng、niáng 二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niáng 音，“酒酿”改注 jiǔniàng。

槭 原读 qī，现据《审音表》改注 qì。

嵌 原有 qiàn、kàn 二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kàn 音。

绕 原有 rào、rǎo 二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rǎo 音，“围绕”“环绕”“缠绕”“缭绕”等词中的“绕”改注 rào。

啥 原读 shà，现据《审音表》改注 shá。

谁 原读 shuí，又 shéi；现据《审音表》改注 shéi，又 shuí。

往 原有 wǎng、wàng 二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wàng 音，相关义(介词义)并入“往 wǎng”。

忘 原有 wàng、wáng 二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wáng。wáng 音原只用于“忘八”，现删去这一词形，只留“王八”一种写法。

霰 原有 xiàn、sǎn 二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sǎn 音，“霰弹”“榴霰弹”中的“霰”改注 xiàn。

哮 原读 xiān，现据《审音表》改注 xiào。

寻 原有 xún、xín 二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xín 音，“寻思”“寻死”等词中的“寻”改注 xún，并入“寻 xún”下。

驯 原读 xún，现据《审音表》改注 xùn。

沿 原有 yán、yàn 二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yàn 音，相关义并入“沿 yán”条。

掷 原有 zhì、zhī 二音，现据《审音表》删去 zhī 音。

转 “运转”原读 yùnzhuàn，现据《审音表》改注 yùnzhuǎn。

卓 原读 zhuō，现据《审音表》改注 zhuó。

有些字、词，根据《审音表》改注音后，用括注方式标明旧读某音。

橙 原有 chéng、chén 二音，现据《审音表》统读 chéng。“橙子”改注 chéng·zi，加括注：旧读 chén·zi。

从 原有 cóng、cōng 二音，现据《审音表》统读 cóng。“从容”改注 cóngróng，加括注：旧读 cōngróng。

呆 原有 dāi、ǎi 二音，现据《审音表》统读 dāi。“呆板”改注 dāibǎn，加括注：旧读 ǎibǎn。

盟 原有 méng、míng 二音，现据《审音表》统读 méng。原 míng 音表示的意义现为“盟²”。加括注：旧读 míng。

嫫 原读 mā，现据《审音表》改注 mó，加括注：旧读 mā。

曝 原读 pù，现据《审音表》分为 pù、bào 二音。“一曝十寒”的“曝”读 pù；“曝光”（摄影术语）的“曝”读 bào，加括注：旧读 pù。

荨 原读 qián，现据《审音表》分为 qián、xún 二音。“荨麻”

的“荨”读 qián;“荨麻疹”的“荨”读 xún。“荨麻疹”条注音后加括注:旧读 qiánmázhěn。

帧 原读 zhèng,现据《审音表》改注 zhēn,加括注:旧读 zhèng。

(二) 第二种情况,依照《审音表》改注读音,附加某些说明。

厕 原有 cè、sì 二音,现据《审音表》统读 cè。在例词“茅~”后加括注:方言中读 máo·sì。

萎 原有 wěi、wēi 二音,现据《审音表》统读 wěi。原 wēi 音表示的意义(衰落)归入“萎 wěi”下为②义,加括注:口语中多读 wēi。

凿 原有 záo、zuò 二音,现据《审音表》统读 záo。原 zuò 音表示的意义(明确、真实;卯眼)分别列为“凿²”“凿³”,均加括注:也有读 zuò 的。由“凿²”“凿³”构成的复合词,注音后也加括注。

指 原有 zhǐ、zhī、zhí 三音,现据《审音表》统读 zhǐ。“指甲”改注 zhǐ·jia,加括注:口语中多读 zhī·jia;“指头”改注 zhǐ·tou,加括注:口语中多读 zhí·tou。

作 原有 zuò、zuō、zuó 三音,现据《审音表》除“作坊”的“作”读 zuō 外,其余都读 zuò。在依从《审音表》注音的同时,《现汉》修订本用括注方式指明某些词的口语读音。“作弄”注音 zuònòng,加括注:口语中多读 zuōnòng;“作死”注音 zuòsǐ,加括注:口语中多读 zuōsǐ;“作揖”注音 zuòyī,加括注:口语中多读 zuōyī;“作践”注音 zuò·jian,加括注:口语中多读 zuó·jian;“作料”注音 zuò·liao,加括注:口语中多读 zuó·liao。

(三) 第三种情况,出于某种考虑,有些字的注音在执行《审音表》的规定时略有变通。

这样的字一共有 20 个,分别说明如下:

凹 原有 āo、wā 二音,《审音表》规定统读 āo。“凹”在秦、晋等地方言中有 wā 音,义同“洼”,用于地名,如陕西的王石凹,山西的核桃凹、赤泥凹。《审音表》审订的是普通话的读音,对用在地名中的方言读音不能“一刀切”。地名中的“凹”,既不能读成 āo,又不能改写作“洼”,只能把 wā 音保存下来。《现汉》修订本保留了“凹”字 wā 的读音,标上〈方〉,指明它的方言地位。

徊 原有 huái、huí 二音,huái 音用于“徘徊”,huí 音用于“低徊”。“低徊”同“低回”,是文言词,《现汉》标注〈书〉,指明了它的文言性质。修订本把 huí 音保存下来,只用在“低徊”一词中。

俱 原有 jù、jū 二音,《审音表》规定统读 jù,但 jū 音作为姓氏在《现汉》修订本中还是保留了。

括 原有 kuò、guā 二音,《审音表》规定统读 kuò。guā 音只用在方言词“挺括”中。《现汉》修订本在“挺括”这个加了方言标志的词中把 guā 音保留下来。

掠 原有 lüè、lüě 二音,《审音表》规定统读 lüè。“掠 lüě”是方言词,义为“顺手拿”(~起一根棍子就打),《现汉》中加了方言标志。修订本在指明它的方言地位的情况下保留了这个读音。

秘 《审音表》规定除“~鲁”读 bì 外,都读 mì。《现汉》修订本依从《审音表》,“便秘”原读 biànbì,现改注 biànmì。但作为姓氏,仍读 bì 音。

娩 原有 miǎn、wǎn 二音,《审音表》规定统读 miǎn。在“分

婉”义中，“婉”读 miǎn；在文言词“婉婉”中，“婉”应读 wǎn。《现汉》修订本在加了〈书〉的标志的“婉婉”一词中保留了 wǎn 的读音。

恁 原有 nèn、nín 二音，《审音表》规定统读 nèn。“恁”在元、明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用如“您”字。《现汉》修订本保留了 nín 的读音，加括注：多见于早期白话。

澎 原有 péng、pēng 二音，《审音表》规定统读 péng。《现汉》修订本依从《审音表》，“澎湃”改注 péngpài。但方言中“澎了一身水”的“澎”（溅义），读 pēng，仍保留下来，标上〈方〉。

期 原有 qī、jī 二音，《审音表》规定统读 qī。古汉语“期年”（一周年）、“期月”（一整月）中的“期”，仍应读 jī。《现汉》修订本在标〈书〉的情况下保留了 jī 音。

踮 原有 qiàng、qiāng 二音，《审音表》规定统读 qiàng。文言词“踮踮”（形容行走合乎礼节）应读 qiāngqiāng，修订本在标〈书〉的情况下，保留了 qiāng 音。

瞿 原有 qú、jù 二音，《审音表》规定统读 qú。“瞿”作为姓氏读 qú，而文言动词义（惊视）则应读 jù。《现汉》修订本标〈书〉后保留了 jù 音和动词义。

揉 原有 ruó、ruá 二音。ruó 为文言义，揉搓；ruá 为方言义，纸、布等皱或快要破。《审音表》规定统读 ruó，《现汉》修订本于 ruó 音之外，在标〈方〉的情况下保留了 ruá 音。

胜 原有 shèng、shēng 二音，《审音表》规定统读 shèng。这一规定是要把“胜利”的“胜”与“胜任”“数不胜数”的“胜”（旧读 shēng）读音统一起来。这两个“胜”字都是“勝”的简化字。有机化合物胜（即肽）的“胜”字不是“勝”的简化字，也不能读作 shèng。

《现汉》修订本在化学名称意义上保留了 shēng 的读音。

螫 《现汉》音 shì, 文言词, 义同“蜇 zhē”(蜂、蝎用毒刺刺人、畜)。《审音表》规定“螫”文读 shì, 语读 zhē。从“螫”的音韵地位上看, 不应有 zhē 的读音。而汉字中又早有“蜇 zhē”表其义(《玉篇·虫部》: 蜇, 虫螫也), “螫”增加 zhē 音就显得多余了。《现汉》修订本“螫”只有 shì 音, 未增加 zhē 音。

唯 原有 wéi、wěi 二音, 《审音表》规定统读 wéi。“唯”又是文言中表示答应的话, 音 wěi, 可组成成语“唯唯诺诺”。《现汉》修订本在标〈书〉的情况下保留了 wěi 音。

屹 《审音表》规定统读 yì。“屹”在“屹立”的意义上读 yì, 而在“屹塔”(gē·da)一词中只能读 gē。《现汉》修订本于 yì 音外保留了 gē 音。

荫 原有 yìn、yīn 二音。《审音表》规定统读 yìn, 并说明:“树~”“林~道”应作“树阴”“林阴道”。“荫”的 yīn 音和树阴义古已有之(《集韵》於金切)。由“荫 yīn”构成的词语也很多, 如“荫蔽”“荫翳”“浓荫”“绿荫”等, 这些词语中的“荫”一律改为“阴”未见得恰当。《现汉》修订本在 yìn 音外仍保留了“荫”字 yīn 的读音和相关义。

咱 《现汉》原列 zán、zá、•zan 三音, 《审音表》规定统读 zán。《现汉》“咱家”(zájiā)一词, 标注“多见于早期白话”;“咱 zan”用在“这咱”“那咱”“多咱”中, 是“早晚”的合音, 标注〈方〉。修订本未作变动。

召 原有 zhào、shào 二音, 《审音表》规定统读 zhào。《审音表》的规定, 是针对有些人把“号召”“召唤”的“召”读为 zhāo 而作出的。而作为周朝国名和姓氏的“召”则仍应读 shào, 《现汉》修订

本在这个意义上保留了 shào 音。

以上这些字,凡保留了统读音以外读音的,大抵属于方言、文言或早期白话、姓氏义或地名义。这几种特殊情况在词条中都有所标示,因而实际上并不影响《审音表》有关规定的贯彻。

(四) 关于轻声字的处理

轻声是普通话语音中一种重要的音变现象。普通话里轻声词汇占有一定数量,如果为每一个在句中或词中读轻声的字都标出轻声读法并反映到字典、词典的单字条目里来,那就会显得非常繁杂,而且没有必要。《现汉》为轻声字立条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助词。语气助词如:啊·a、吧·ba、呗·bei、啦·la、哩·li、咧·lie、喽·lou、吗·ma、么·me、哟·yo;时态助词:过·guo、了·le、着·zhe;结构助词:的·de、地·de、得·de。

(2) 词尾、后缀一类成分,如:们·men、头·tou、子·zi。

(3) 只有轻声而没有本调的字,如“靺鞨”的“鞨”(·la)、“饴饬”的“饬”(·le)、“犴犴”的“犴”(·lu)、“榼榼”的“榼”(·po)、“肋臑”的“臑”(·te,又·de)、“苜蓿”的“蓿”(·xu)。

(4) 有的字虽然轻声以外另有读音,但两音相去甚远;或只是同用一个字,而意义上毫无关联。如“胳膊”的“臂”(·bei)、“萝卜”的“卜”(·bo)、“寒伧”的“伧”(·chen)、“疙瘩”的“疽”(·da)、“屈戌”的“戌”(·qu)、“衣裳”的“裳”(·shang)、“骨殖”的“殖”(·shi)、“钥匙”的“匙”(·shi)、“多咱”的“咱”(·zan)。“多咱”的“咱”是“早晚”二字的合音,它与人称代词“咱”没有意义上的联系。

除以上四种情况外,在复合词中读轻声的字《现汉》只按该字本调立条,只是在给复合词注音时为其标注轻声。《审音表》审订

了若干复合词中的轻声字,如“胳膊”的“膊”(bo)、“宽绰”的“绰”(chuo)、“打点(收拾,贿赂)”的“点”(dian)、“撺掇”“掂掇”的“掇”(duo)等。应该说,该表审订的只是普通话轻声词汇中的很小一部分。《审音表》审订的轻声词,《现汉》注音时大都已经体现了。《现汉》与《审音表》个别不一致的地方,修订本中作了更动,如“荃蓝”,《现汉》原注 piě·la,修订本改为 piě·lan。

现代汉语字词典的注音*

刘庆隆

现代汉语通用字词典,也就是普通话字词典,都要为推广普通话和现代汉语规范化服务。因此,字词典里收的字词都要注出标准音,使读者查到需要的字词,能够正确地掌握普通话的音。

语文性字词典的注音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读者学习一个字词就需要掌握它的形、音、义,缺一不可。读者查找普通话的字词,不仅是为了写,也是为了说。如果字词典没有注音,或者注音不正确,不规范,就满足不了读者在读音方面的需要,甚至还会贻误读者。这样的字词典就不是一部好的字词典,也不能说是一部为推广普通话和现代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字词典。因此,字词典的注音必须做好,不能掉以轻心。有的词典为了节省篇幅只注单字的音,复合词不注音。这样的词典,复合词中的生字、多音字和有异读的字,也要注音,方便读音,有利于规范化。现在有些词典这样做了,带了个头儿,希望别的词典都能跟上,包括专科词典。没有这样做的词典稿子,希望出版社把关,提出要求,或帮助编者做好。

旧的字词典的注音,大都是注传统的读音,把过去的反切搬来就是了。比如《康熙字典》:“侦,《广韵》丑贞切,《集韵》、《韵会》痴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贞切,《正韵》丑成切,并音怪。”“缚,《广韵》符纛切,《集韵》、《韵会》伏约切,又《广韵》、《集韵》、《韵会》、《正韵》并符卧切。”对当时的音不甚重视。(参看二、9 峻嶒)后来的字词典(个别的除外)虽然搬的旧反切少了,但还是不著录当时的音。现代汉语字词典虽然也重视传统读音,但更应重视现代。就是现在编的古汉语字词典,尤其是古今兼收的,要古为今用。交代传统读音,也要顾及现在的音。

使用现代汉语字词典的人多,情况不大相同,注音方式要灵活,要多样化,适应各方面读者的需要。现在的字词典都用汉语拼音注音,是必要的,但并不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根据各字词典的不同对象,除用汉语拼音注音外,还须增加读者能利用的别种注音方式,以便利读者。字词典只注汉语拼音,会有一部分读者无法使用。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一部普通话词典,它是为推广普通话和现代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在字形、词形、注音、释义等方面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因此,在注音方面也做了一些考虑。

一、在北京话里有些词有异读,一般选一个音。跟过去的字词典把几个异读音都罗列出来,让读者自己去选择的办法不同。因为那样做,不利于规范化。对异读词的音的选取,考虑了以下几条原则。

1. 有些词有语音和读音,比如:白 bái(语)、bó(读),雹 báo(语)、bó(读),避 bèi(语)、bì(读),隔 jiē(语)、gé(读),等等。现在语音用得广,读音读书也不念的,取语音,不取读音,像白 bái,雹 báo。现在读音用得广,语音有局限性的,取读音,不取语音,像避

bì, 隔 gé。

《现汉》的注音没有分“语”、“读”两个系统。虽然还有少数字收两个音(如薄 bó, báo; 削 xiāo, xuē 等),已作为一般多音字处理了,不同的音用于不同的词汇。如果经过若干年,大家都趋向读某个音,另一个音也就淘汰了。

2. 一个字、词的异读都比较通行的,取跟大部分北方方言相合的,或合乎北京语音发展规律的。比如:酵,取 jiào,不取 xiào; 波,取 bō,不取 pō。有的异读音虽然不合乎北京语音发展规律,但在北方方言里用得很广泛,也可采用。比如:危,取 wēi,不取 wéi; 期,取 qī,不取 qí。

3. “开、齐、合、撮”的读法,一般采用符合北京语音发展规律的。比如:淋,取 lín,不取 lún 或 lùn; 理会,取 lǐhuì,不取 lǚhuì。但个别用得很普遍的,也可采用。比如:嫩,取 nèn,不取 nùn; 吞,取 tūn,不取 tēn。

4. 古代清音入声字在北京话的声调,有异读的,假如有一个是阴平调,原则上采用阴平,因为阴平在北方方言里通行的面比较广。比如:芟,取 jī,不取 jí; 锡,取 xī,不取 xí。

5. 一个词中读轻声的字有异读的,取本音的轻声。比如:伙计,取 huǒ·ji,不取 huǒ·qí; 炊帚,取 chuī·zhou,不取 chuī·zhu 或 chuī·chu。

为了确定异读词的读音,中国科学院聘请熟悉北京话的语言文字学家和有关方面的权威人士组成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共审订了第三批异读词,编成了《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有异读的词,已经审订的,《现汉》就照审订的音注音。没有审订的,就参照前边的几条原则和审订的词来注音。

二、《现汉》是一部共时性的词典，它以确定普通话词汇规范为目的，注音着重现代。

1. 《现汉》主要收现代汉语用的字词，一些字词典中收的古代汉语音义，基本不收。比如：

不 bù 副词。……。不收 fōu, fū 等音义。

蕉 jiāo 指某些有像芭蕉那样的大叶子的植物：香～|美人～。不收 qiāo 等音义。

一些字、词典不收的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音义，《现汉》尽量收录。比如：

解 xiè〈口〉懂得；明白：～不开这个道理。

铺 bù 铺子。

2. 现在通行的音，跟过去或传统的读音不合的，《现汉》照现在通行的音注音。比如：

驷 chǎn……。不注 zhàn。

矿(礦) kuàng(旧读 gǒng)……。不收 gǒng 音，交代传统读 gǒng。

滑稽 huá·jī……。交代在古书中念 gǔjī。

扞(擗) xián 撕；取；拔(毛发)；拉……。不注 xún。

褪色 tuísè……。不注 tùnsè。

娃 wá①小孩儿。②〈方〉某些幼小的动物。不注 wā。
《康熙字典》：“娃，《广韵》、《集韵》、《韵会》并於佳切，音洼……。”不从①。

隗 Wěi 姓。隗 Kuí 姓。现在姓 Wěi，姓 Kuí 的都有，不是一姓。

照现在通行的音注音，跟过去或传统读音不合的，酌加“旧读

‘X’”，以便读者了解读音的情况。比如：癌 áí(旧读 yán)，[长物] chángwù(旧读 zhàngwù)。有的不便简单注“旧读”的，就用注释的方式交代。比如：

石 dàn……(在古书中读 shí，如‘二千石、万石’等。)

《现汉》里“旧读”加的不多，也不大一致。像产、矜、贞等都可以加上。

现在有的读音，通行面不广，《现汉》未从，仍注通行面广的传统读音。比如：

臀，注 tún，不注 diàn。

塑，注 sù，不注 suò，塑料，注 sùliào。

券，注 quàn，不注 juàn。

《现汉》为了备查，收了个别俗用字的音。如：

桔 jú ‘橘’俗作‘桔’。

肖 Xiāo 姓(‘萧’俗作肖)。

原来收录时，考虑这两个字可能成为正式简化字。后来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有这两个字，现在《二简》已经宣布停止使用，这两条似可再斟酌。

3. 有的字、词普通话不说，方言用，如收，照方言折合成北京语音注音。比如：

箐(大竹林)，注 qìng，不注 qiàn。与云贵方言相合。

埡，注 yā，不注 yà。与四川方言相合。

碛(地名用字)，注 bèi，不注 péi。符合当地的音。

4. 为了有利于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普通话词汇基本上没有收又读音。古汉语词汇收了少量的又读音，像焘 dào，又 tāo；陆 diàn，又 yán 等。注又音，有的是照顾一下现在的用法，如

焘,现在的人名多读 tāo,有的是一时难以决断,像酩(醴)shī,又 shāi。

5. 减少多音字的音,有利于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因此,在过去或古代汉语里有区别,普通话里不再区分的音,《现汉》只取现在通行的音。比如:

胜(勝)(胜任、不胜等),注 shèng,不注 shēng。

骑(坐骑、铁骑、车骑等),注 qí,不注 jì。

听(聽)(听便、听凭、听任等),注 tīng,不注 tìng。

长(长物、冗长等),注 cháng,不注 zhàng。

枕(枕藉、枕戈待旦等),注 zhěn,不注 zhèn。

这一类在古汉语字词典里可能分注两音。

6. 《现汉》收了少量古汉语字、词,音义从简,音能合并的合并。比如:

禺 yú 古书上说的一种猴。未注 yù。

怫 fú〈书〉形容忧愁或愤怒。未分 fú 和 fèi 两音。

7. 《现汉》收的古汉语字、词,有的有异读,一般选取跟现代相同或相近的音,或便于推广的音。比如:

眴,有 miàn(莫甸切)和 miǎn(弥殄切)二音,《现汉》注 miàn,又 miǎn。因为广东方言是去声。

璘(璘),《现汉》取 jìn,不取 jīn。因为“璘”读 jìn,“璘”同“璘”,取 jìn 比较合适。璘多用于人名,《晋书音义》人名的璘,多读 jìn。读 jìn 比读 jīn 便于推广。

8. 《现汉》的注音,不一定取《康熙字典》的第一个音,而重视古书的注音,《康熙字典》的注音跟一些古书注音不同的,取古书的注音。比如:

佛，《康熙字典》：“佛，《广韵》扶沸切，《集韵》父沸切，并音费姓之费……。又《集韵》芳未切，音费耗之费……。又《玉篇》、《广韵》符弗切，《集韵》、《韵会》、《正韵》符勿切，并音佛……。”《庄子·德充符》：“我佛然怒。”注：“佛，扶弗反。”《庄子·天地》：“则佛然作色。”注：“佛，符弗反，郭敷谓反。”《现汉》取 fú。

匱，《康熙字典》：“匱，《韵会》、《正韵》并邬感切，音闾。”引《新唐书》和杜诗作书证。《龙龕手鑑》苦合切。《新唐书·杨再思传》：“阿匱取容。”《新唐书释音》：“匱，苦合切。”杜甫诗：“马头金匱匱。”《杜工部草堂诗笺》：“匱，口答切，匱，作答切。”山西省的地名——匱河，历史上读 kē，现在也读 kē，古今相合。《现汉》注 kē，不注 ǎn。

9. 旧字书的反切折合成普通话的音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但有的反切可以有几种折合，例外也不少。《现汉》采用跟现在相合的音。比如：

擗，恪八切，可以折合成 qiā，也可以折合成 kā。比如：“客”（苦格切）读 kè，“耕”（古茎切）读 gēng 等。擗，北京语音说 kā。《现汉》注 kā，不注 qiā。

甌，蒲口切，按一般规律应折合成 bōu，但普通话没 bōu 的音节。《现汉》注 bù。厚韵的字，在北京语音里有的读 u，像“母、亩、牡”等读 mǔ。

峻嶒，《现汉》注 léngcéng。取《集韵·登韵》的音。《广韵·蒸韵》：“峻，力膺切。”“嶒，疾陵切。”《集韵·登韵》：“峻，鲁登切。”“嶒，徂棱切。”峻嶒是叠韵连绵词，同在一个韵，在蒸韵的韵母对应过来同是 ing，在登韵的韵母同是 eng。因此，

或同取 ing 注 língqíng, 或同取 eng, 注 léngcéng。不宜取 língcéng 或 léngqíng。《康熙字典》：“峻，《广韵》力膺切，《集韵》间承切，并音陵。按《韵会》、《正韵》庚、蒸韵，增字俱注峻增，阙峻字不载。一说峻当与柎稜、威稜之稜同音。”“增，《广韵》疾陵切，《集韵》慈陵切，并音层。”“层，《唐韵》胙稜切，《集韵》、《韵会》、《正韵》徂稜切，并音曾。”《康熙字典》的处理并不合适，照它引的反切，增与层不同音。可能当时已念 léngcéng 了，找不到根据，峻下还加了按语。如果峻、增都用《集韵·登韵》的音，就顺理成章了。

10. 字词典注释中用到“通‘某’”和“同‘某’”的很多，尤其是古汉语字词典用“通‘某’”更多。在这方面分歧比较多，各字词典之间有分歧，一部字词典内部也不统一。“通‘某’”有同音的，也有不同音的。不同音的，有的独立出音，有的不出音。不出音的，读者难以掌握读什么音，不利于字音规范。比如：

果，一本字典注（一）guǒ 古火切⑩通“裹”。⑪通“媠（wǒ）”。女侍。（二）luǒ《集韵》鲁果切通“裸”。裸露。（三）guàn《集韵》古玩切通“裸”。裸祭。

一本词典注（1）guǒ 古火切⑨通“裹”。（2）wǒ《字汇》乌果切通“媠”。侍女。（3）luǒ《集韵》鲁果切通“裸”。赤露。（4）guàn《集韵》古玩切通“裸”。灌祭。

另一本词典注 1. guǒ…… 2. wǒ《字汇》乌果切，音媠女侍，侍候。3. luǒ《集韵》鲁果切赤露。通“裸”。

挑，一本字典注（一）tiǎo 吐彫切，又徒了切⑫通“佻（tiāo）”。轻佻。⑬通“翟（dí）”。

一本词典注（1）tiǎo 徒了切，又吐彫切⑭通“翟”。（2）

tiāo《字汇》他彫切⑥通“佻”。(1)轻佻。(2)窃取。

另一本词典注 1. tiāo 吐彫切④偷薄；轻薄。通“佻”。

禺，一本字典注(一)yù……(二)yú 遇俱切③通“愚”。愚笨。……⑥通“偶(ǒu)”。

另一本字典注 ǒu 通“偶”。

一本词典注(1)……(4)ǒu“偶”的古字。

另一本词典注 1. ……4. ǒu 偶；对。

字词典里用“同‘某’”，也有不同。有的音义全同的注“同‘某’”，也有的义同音不同的，也注“同‘某’”。《现汉》没有用“通‘某’”，用了“同‘某’”，在现代汉语里音同义同的注“同‘某’”。采取这种注释方式的字、词，可以说是广义的异体字或异形词，是不推荐使用的。

《现汉》在注音方面花了一定的力量。首先把普通话中有异读的词收集起来，把每个异读词的不同读音和过去字典的注音以及传统的反切整理出来，编成送审资料，送审音委员会审订。后来发现了新资料，再送审音委员会审订。有的音进行了改动。比如地名——洪洞，根据普遍的说法，审订为 Hóngtóng。后来经过反复调查，并请山西搞方言的同志，实地考察，证实当地“洞”并不读 tóng(阳平送气)，而是浊声字，读仄声也送气。“洞”在地名——洪洞中并不是特殊读音，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洪洞仍应读 Hóngdòng。后来再审音时把这一条去掉了。不少姓和地名是经过调查的。有的个别字的音，很费了一番工夫。比如：匱为了证实读 kē 合适，翻了不少古书，抄了很多资料。匱字编好后，丁声树先生就这些资料写了一篇《说“匱”字音》，发表在 1962 年《中国语文》第 4 期上。叶(葉)是否收 shè 音，翻检了唐以前有关的书，没

有找到叶(葉)读 shè 的注音,到后来才有了 shè 的读法,《康熙字典》:“葉,《唐韵》与涉切……又式涉切,音掇。”式涉切,未引出处。《汉语大字典》53243 页“葉(一)yè《广韵》与涉切……(二)shè《广韵》书涉切。”85043 页《上古音字表》只有与涉切。shè 的读法出现比较晚,现在叶(葉)县和姓叶(葉)的叶(葉)都念 yè,所以就没有收 shè 音。碯洲,因为产碯砂而得名。那么为什么过去叫碯洲 Gāngzhōu 呢?查了一些古书,找到了碯砂有二十多种写法,碯砂也是其中的一种,证明“碯”也是“碯”的一个异体字,“碯洲”即“碯洲”,应读 Náo zhōu。

《现汉》每个条目都注了音,也搞了注音连写。这项工作看来简单,费的力量却不少,先是把全部条目都制成卡片,根据《汉语构词法》的原则分类,确定每类的连写规则,按着规则连写。做出的结果不大理想,吕叔湘先生又拟定了《〈现代汉语词典〉注音连写、大写、隔音暂用条例(附说明)》。根据这个条例又重新搞了一遍,以后又陆续调整了几遍。现在看来,问题不少。好在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公布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现汉》修订时,可按这个规则进行调整。

为了适应汉语的发展,《现汉》改变了一些字、词过去或传统的读音,也增加了一些字、词以前没有的读音,也合并了一些字、词的读音。

《现汉》的注音虽然考虑了一些办法,花了一定的力量,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

a) 屏(②摒)bǐng②除去;排除。

摒 bìng 排除。

这两条矛盾。

b) 大模大样 dà mó dà yàng

怪模怪样 guài mó guài yàng

以上两条不一致。

c) 霰 sǎn[霰弹]sǎn dàn

桔 jú‘橘’俗作‘桔’。

这一类走得有些快了。

这些具体问题处理起来不难,但牵涉到一些原则问题。a类例子是属于异体字、词的收录和注音问题。这个问题《现汉》里还没有解决,有的作异体字、词处理,有的作同义字、词处理。b类例子是多音字、词,用得少的音向用得多的音靠拢的问题。c类例子是前面二、2.的处理问题,界限有的不好掌握。个人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相对地说保守些好。

《现汉》有的注音做过一些调查,但有的音还不落实。比如:蚪,姓,《现汉》注 tǒu,是传统的读音,北方出版的《百家姓》有的注 dǒu。到底现在姓蚪的,念 tǒu? 还是念 dǒu? 或者 tǒu, dǒu 两个姓都有,还说不清楚。

有些科技条目,注音也存在着分歧。比如:

[大藻],《现汉》dà piáo,《新华字典》dà piāo dà piáo(又)

[嘌呤],《现汉》piào lìng,《新华字典》piào líng

獐,《现汉》měng,《新华字典》méng měng(又)

科技条目有规定的音的,照注。没有规定的音的,要经过讨论,定出个办法,共同执行,减少分歧。

字典的注音存在着一些问题,仅就《现汉》所涉及的方面,简略地谈了谈个人的认识。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兴趣,大家来探讨研究,使字典的注音工作做得更好些。

附 注

① 《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1页 wá 阳[娃]小儿。注：“广韵平声佳韵，‘娃’於佳切，训‘美妮’，与今谓小儿曰‘娃’无关。小儿曰‘娃’，大概是由‘童牙’的‘牙’来的。后汉书崔骃传，‘甘罗童牙而报赵’，李贤注，‘童牙谓幼小也’。集韵平声麻韵有‘孺’字，牛加切，与‘牙’同音，注云：‘吴人谓赤子曰孺孺’。”

词典注音的分词连写问题*

闵家骥

一

词典注音分词连写上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缺乏一套合乎实用的词的连写规则,因此在拼写上存在着十分混乱的现象。例如“共产主义青年团”可以有五种不同的拼写法:

gòngchǎnzhǔyìqīngniántuán

gòngchǎnzhǔyì qīngniántuán

gòngchǎnzhǔyì qīngnián tuán

gòngchǎn zhǔyì qīngniántuán

gòngchǎn zhǔyì qīngnián tuán

词典注音的分词连写,目前还是尝试性的,所以难免有不一致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不是玩儿的”,有的词典写作 *bùshì wánrde*,有的词典写作 *bù shì wánr de*。又如“资产阶级”,有的词典连写,写作 *zīchǎnjiējí*,有的词典分写,写作 *zīchǎn jiējí*。类似这样的问题不少。《现代汉语词典》是采用注音分词连写的一部词典,它在什么是词以及如何拼写上作了尝试性的探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具体分词连写上,个别条目也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0年第3期。

地方。例如双音节的主谓结构,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的,按全书来看应该分写,但事实上对这类条目的处理很不一致。例如“心急”“心浮”“心烦”是一组结构相同、意义相近的同义词:

【心急】 心里急躁。

【心浮】 心里浮躁,不踏实。

【心烦】 心里烦躁或烦闷。

但有三种不同的拼写法:“心急”分写作 xīn jí;“心浮”中间加双斜杠,表示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写作 xīn // fú;“心烦”连写作 xīnfán。又如“新石器时代”“新文化运动”结构方式和意义结合的紧密程度完全一样,但“新石器时代”写作 Xīnshíqì Shídài,而“新文化运动”写作 xīn wénhuà yùndòng。再如四字格,其中两字成词的,按全书来看,两字应该连写,但事实上有的连写,有的分写。例如“名列前茅”写作 míng liè qiánmáo,但是“明察秋毫”写作 míng chá qiū háo。其实“前茅”“秋毫”都是词。四字两两重叠的,整个结构应该连写,但书中也是有的连写,有的分写。例如“花花绿绿”写作 huāhuālǜlǜ,但是“心心念念”写作 xīnxīn niànniàn。

为什么在同一部词典里会出现这种在拼写上的不一致现象呢?主要是所遵循的分词连写规则不够严密,因此在具体处理上容易出现矛盾,这也是采用分词连写的词典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

二

分词连写的不一致,主要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一) 对什么是词的概念不太明确,因此什么是词不是词,有

时候分不清楚。收入词典里的条目不全部都是词,还有词素、词组。这就有一个划分词和词素、词组界线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英语是 socialist revolution,很清楚是两个词,但在汉语里是词还是词组却成了问题。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有三种拼写法:

shèhuìzhǔyìgémìng (词)

shèhuìzhǔyì gé mìng (词组)

shèhuì zhǔyì gé mìng (词组)

这些都涉及什么是词的问题。而什么是词,又是大家理解很不一致的。有的着眼于意义,认为词是“语言的最小意义单位”(王力《中国现代语法》);有的着眼于语法,认为“词是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初中课本《汉语》);有的认为这些定义都不能真正揭示词的本质特征,于是从意义和语法两个方面给词下定义,认为“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上册);也有从语音和意义两个方面给词下定义,认为“词是语言建筑材料的单位,它表达一个概念,而有一个语音的形式”(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对此,大家也并不满意。于是又有别的什么定义,其结果是各说各的。那么是不是如有的人所说的“词是一个无法下逻辑定义的简单概念”呢!当然不能苟同。词并不是那么神秘而不可捉摸的。词是可以下定义的。问题是过去所有关于词的定义不管着眼于哪一方面,都是为了分析语法结构、划分词类等,而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定义能不能解决一个个具体的词的划分,以致今天我们收入词典里的条目哪些是词,哪些不是词,有些就说不清楚。外国的词典一般都注明词性,我们的词典有些词没有注明词性,就是为了回避矛盾,但一旦注音分词

连写,就必须回答什么是词的问题。所以关于什么是词,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从实际语言出发,概括出一个合乎科学的定义来,这不仅是语言学家的事,从事词典编纂工作的也有责任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弄清楚什么是词,对于词典收词、释义等方面都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在还没有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关于什么是词的定义之前,已有的定义对于词的划分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分词连写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区分两个音节以上的组合是词还是词组的问题。下面我们谈谈对于合成词的一些认识。我们认为每一个语言片段(不包括单音节的)必须具备下列这些条件,才能获得词的资格。

1. 要有特定的涵义,所指明确。例如“露水”“花露水”我们认为都是词。它们都具有特定的涵义,而不是简单的字面意义,而且所指明确,一看就知道它们所代表的是什么概念。“露水”是指“凝结在地面或靠近地面的物体表面上的水珠”。“花露水”是指“稀酒精中加香料制成的化妆品”。但是“花水”,涵义就不明确,不知所指,显然不是词。如果从字面理解为“用花浸泡的水”,那是词组,不是词。

2. 词形要定型化,中间不允许插入其他成分。例如“铁树开花”的“铁树”不同于“铁壁铜墙”的“铁壁”。“铁树”已经定型化,指苏铁,一种观赏植物,不是“铁树”,所以是词。“铁壁”中间可以加“的”,理解为“铁的壁”,是词组。所以,可以离合的词,严格说是词组,而不是词。例如“存款”作为“存在银行里的钱”讲,它中间不允许插入其他部分,所以是词。但作为“把钱存在银行里”讲,它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如“他存了一笔款”,所以是词组。不过为了拼写上的方便,一些离合词我们还是主张连写,只有当它们具有区

别意义的作用,如“存款”之类,我们才主张分别连写或分写。

3. 可以充当句子的某种成分。这一点明显地不同于词素。例如“鱼肚”,作为一个词的时候,可以作主语或宾语:“鱼肚很好吃”或“我不爱吃鱼肚”。但是在“鱼肚白”里,“鱼肚”是“鱼肚白”一词的构成成分,不是词,不能单独作句子成分,所以我们可以说:“天边现出了鱼肚白”,但不能说:“天边现出了鱼肚”。

4. 必须是语言里最小的可以独立运用的单位。例如“简谐运动”里的“运动”,它虽然是由两个可以单独成词的词素构成的,但从作为“物体的位置不断变化的现象”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仍然是语言里一个最小单位,并能独立运用,而自由地和别的词搭配,构成各种短语和句子,所以是词。但是“简谐”不能单用,不能独立作为语言里的一个单位,它只能和“运动”搭配,构成“简谐运动”,所以不是词。

(二) 对词的界线的划分没有统一的认识,各有自己的分词原则,所以显得很混乱。所谓划分词,其实就是把词同词素和词组区别开来。一头是区别单独成词的词素和单独不成词的词素,一头是区别什么样的词素组合是词,什么样的词素组合不是词而是词组。词是介于词素和词组之间的一个语言单位。词素是构成词的材料,是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有的词只包含一个词素,如“鱼”“玻璃”;有的包含两个或更多的词素,如“计划”包含“计”“划”两个词素;“海岸线”包含“海”“岸”“线”三个词素。词组是两个或更多的词的组合,如“不要紧”、“高等教育”、“蚂蚁啃骨头”、“人民内部矛盾”等。在汉语里,词素、词、词组三者之间的界线大体上是清楚的,所以大部分词一般都能判别。但也有一些界线并不很清楚,再加上认识上的不一致,这就增加了划分上的困难。例如“新

书”，如果解释为“崭新的书”，可以看作是词组；如果特指“将出版或刚出版的书”，无疑应该是词。一般说，词素和词的界线比较容易区分，因为汉语里大部分词素都能单独成词，不能单独成词的数量很少。但也因为汉语里大部分词素都能单独成词，所以词和词组的界线有时就比较难于区分。例如“怠惰”，“怠”“惰”都不能单独成词，这样的组合一定是词。又如“铤铳”，“铤”不能单独成词，“铳”能单独成词，但“铤铳”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词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不错”情况就不一样了。“不”和“错”既是词素，又都能单独成词，“不错”是词还是词组就成了问题。一般词典是这样处理的：作为“对，正确”讲，是词组，如“不错，他是这么说的。”作为“不坏，好”讲，是词，如“庄稼长得挺不错。”这种从意义上着眼来划分词和词组的界线不失为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例如“心怀”作为“心中存有”讲是词组；作为“心意，心情”讲是词。“上水”作为“给火车、轮船等加水”讲，是词组；作为“上游”讲，是词。这种区分不完全是根据意义，还包含了结构上的因素：一是看它们结合的紧密程度；二是看它们中间能不能插入其他成分。“心怀”属于第一类；“上水”属于第二类。其次音节的多少对于划分词和词组的界线也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词典对于四音节以上的条目，倾向于分写的多，例如“人民公社”语法上可以认为是一个词，但词典里一般分写作 rénmin gōngshè。下面我们提出的分词连写规则，就是从结构方式、意义结合紧密程度以及音节多少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的。

三

目前词典分词连写还属于注音性质的，但如果通过讨论，词典

注音分词连写能够逐步趋于一致,并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那么这不仅有助于词典编写质量的提高,而且对于今后汉语拼音文字的制定将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我们认为,分词连写规则主要是一个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只要能自圆其说,合乎实用,拼写方便,就是一个很好的分词连写规则。下面根据一般词典收词情况,提出一个关于如何注音分词连写的初步设想,向大家请教(以下引例如果词典一般不会收的,用方括号标示):

(一) 一般条目的拼写法

1. 双音节的一般连写,例如:

良心 liángxīn 丰收 fēngshōu
胡闹 húnào 其余 qíyú

中间可以插入别的成分的离合词原则上连写,例如“洗澡”写作 xǐzǎo(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中间加双斜杠,写作 xǐ//zǎo)。如果中间已插入其他成分的则分写,例如[洗了一个澡]可写作 xǐle yī gè zǎo。

但属于下列情况的分写:

a. 整个主谓结构(包括三个音节以上的)是形容词性、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的分写,例如:

手快 shǒu kuài 心急 xīn jí
见识广 jiànshi guǎng 眼皮子浅 yǎnpízi qiǎn

b. 修饰成分和中心成分都能单用、意义结合不紧密、中间能插入其他成分的偏正结构(包括三个音节以上的)分写,例如:

(蚍蜉撼)大树 dà shù
新名词 xīn míngcí

(注意:意义结合紧密,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的连写,例如

“大学生”，指年岁较大的学生分写作 dà xuésheng，但指“在高等学校读书的学生”就不是“大的学生”，所以应该连写作 dàxuéshēng)。

c. 带“不”的双音节(包括三个音节以上的)如果是对后面中心成分的否定则分写，例如：

不合 bù hé 不妙 bù miào

不要紧 bù yào jǐn 不好意思 bù hǎoyìsi

(注意：“不曾”是“曾经”的否定，不是对后面中心成分的否定，所以应该连写作 bùcéng；“不等号”也应该连写作 bùděnghào；“不成文法”是跟“成文法”相对，所以也应该连写作 bùchéngwénfǎ)。

2. 三音节的一般连写，例如：

基本功 jīběngōng 随风倒 suífēngdǎo

胃下垂 wèixiàchuí 绿茸茸 lǜrōngrōng

但属于下列情况的分写：

a. 单音节动词性成分带宾语的分写，例如：

见世面 jiàn shìmiàn 卖人情 mài rénqíng

b. 各个成分并列的(包括四个音节以上的)分写，例如：

逼供信 bī gòng xìn

衣食住行 yī shí zhù xíng

c. 组合的各个成分之间结构松散、关系不清楚的分写，例如：

不二价 bùèr jià 一半天 yī bàn tiān

3. 四音节的原则上按段分写：

a. 分段后两两成词的按词分写，例如：

简易师范 jiǎnyì shīfàn

牵强附会 qiānqiǎng fùhuì

b. 分段后两两不成词的按词素分写,例如:

又红又专 yòu hóng yòu zhuān

劈头盖脸 pī tóu gài liǎn

c. 分段后其中有一段不成词,但整个结构是名词性的(包括五个音节以上的)中间加短横连写,例如:

软体动物 ruǎntǐ-dòngwù

本初子午线 běnchū-zǐwǔxiàn

但属于下列情况的连写:

a. 不能两两分段而整个结构是名词性的(包括五个音节以上的)连写,例如:

高压区 gāoqìyāqū

记事本末体 jìshìběnmòtǐ

b. 四音节两两重叠的连写,例如:

花花绿绿 huāhuāliǜliǜ

慢慢腾腾 màn màn tēng tēng

c. 无法分析的连写,例如:

花里胡哨 huāli húshào

黑咕隆咚 hēigūlōngdōng

4. 五音节以上的中间一般有停顿,所以原则上分写,例如:

天文望远镜 tiānwén wàngyuǎn jìng

辩证唯物主义 biànzhèng wéiwù zhǔyì

如果中心成分是单音节名词性成分,分段后,后段加中心成分成词的,后段和中心成分连写,例如:

火焰喷射器 huǒyàn pēnshèqì

原子反应堆 yuánzǐ fǎnyìngduī

5. 其他

a. 助词“了、着、过”一般和动词谓语句连写，例如：

赔了夫人又折兵 péile fūren yòu zhé bīng

(注意：[他赔了钱了]的最后一个“了”应该分写，写作 tā péile qián le)。

[吃过饭再走] chīguo fàn zài zǒu

[打着红旗反红旗] dǎzhe hóngqí fǎn hóngqí

b. 星期×，一般分写，例如：

[星期一] xīngqī yī

[星期六] xīngqī liù

但“星期日”有它特定的涵义，一般定为休息日，在星期六的下一天，也说“星期天”，简称“星期”，应连写作 xīngqīrì。

c. “这个”“那个”，作“这东西”“那东西”讲，连写。例如“你问这个吗？”，写作 ní wèn zhège ma。作“这一个”“那一个”讲，分写。例如“这个孩子真乖”，即“这一个孩子真乖”，写作 zhè gè hái zǐ zhēn guāi。

(二) 文言语句的拼写法

文言语句(包括成语)一般分写，例如：

独善其身 dú shàn qí shēn

如堕五里雾中 rú duò wǔ lǐ wù zhōng

但如果其中两字合成一词，两字可连写，例如：

贻人口实 yí rén kǒushí

依样画葫芦 yī yàng huà húlu

(三) 数词的拼写法

1. 表示数目的数词,按个十百千万的单位分写,例如:

七十二(行) qīshí èr

十万八千(里) shíwàn bāqiān

但“十一”至“十九”连写,例如:

十三(经) shísān 十八(罗汉) shíbā

2. 有特殊意义的数词连写,例如:

六六六(一种杀虫药剂) liùliùliù

一六零五(一种农药) yīliùlíngwǔ

3. 数词和数词之间表示日月的中间加短横连写,例如:

九一八(指九一八事变) Jiǔ-yībā

4. 数词加名词性成分,数词在十位以下的连写,例如:

四郊 sìjiāo 五洲 wǔzhōu

但属于专名的分写,例如:

四书 Sì Shū 五岳 Wǔ Yuè

数词在十位以上的分写,例如:

十三辙 shísān zhé

二十四节气 èrshí sì jiéqì

5. 数词加量词加名词的分写,例如:

一席话 yī xí huà

一次方程 yī cì fāngchéng

十八般武艺 shíbā bān wǔyì

但有特殊意义的连写,例如:

一条龙(工作方式的一种比喻说法) yītiáolóng

6. “第”加数词,“第”和数词分写,例如:

第一 dì yī

(四) 前缀、后缀和类似成分的拼写法

一般连写,例如:

前缀:老虎 lǎohǔ、阿姨 āyí。

类似前缀的成分:半导体 bàndǎotǐ、非生物体 fēishēngwùtǐ (五音节以上的,类似前缀的成分和紧挨的词连写,中间加短横,例如:半无产阶级 bàn-wúchǎn jiējí、非金属元素 fēi-jīnshǔ yuánsù)。

后缀和词尾:木头 mùtóu、工业化 gōngyèhuà、咱们 zánmen、这么着 zhèmezhe。

类似后缀的成分(包括儿化):掌案_儿的 zhǎng'ànrde(注意:“不是玩_儿的”应分写作 bù shì wánr de)、拿出来 náchulai, náchūlái(注意:[拿出钱来]应分写作 ná chū qián lái)、什不闲_儿(一种曲艺)shíbùxiánr(注意:儿化的“儿”写作“r”,不写作“er”,例如“子儿”写作 zǐr,“儿子”写作 érzi)。

(五) 简称和合称的拼写法

一般连写,例如:

简称:土改 tǔgǎi、安理会 Ānlǐhuì。

合称:教职员 jiàozhìyuán。

如果合称关系不清楚的,修饰成分之间加短横,和中心成分连写,例如:贫下中农(贫农和下中农的合称)pín-xiàzhōngnóng。

合称属于专名需要分写的,两个名词的代表字之间加短横,例如:

南北朝 Nán-Běi Cháo

马列主义 Mǎ-Liè Zhǔyì

(六) 外来语的拼写法

1. 音译的连写, 例如:

罗曼蒂克 (romantic) luómàndìkè

2. 音译兼意译的, 音译和意译部分原则上分写, 例如:

坦克车 (tank) tǎnkè chē

安那其主义 (anarchism) ānnàqí zhǔyì

3. 意译的, 按一般条目的拼写法拼写, 例如:

联合收割机 (combine) liánhé shōugējī

(七) 专名的大写和拼写法

以下各类是专名。专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分段的专名, 每一段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1. 人名分写, 例如:

孙中山 Sūn Zhōngshān

诸葛亮 Zhūgé Liàng

鲁 迅 Lǔ Xùn

姓或名前加修饰成分的也分写, 例如:

[老陈] Lǎo Chén

阿斗 Ā Dǒu

2. 地名连写, 例如:

大庆 Dàqìng

南泥湾 Nánníwān

地名前加修饰成分的分写, 例如:

南欧 Nán Ōu

北美洲 Běi Měizhōu

3. 山水名分写, 例如:

泰山 Tàì Shān

珠穆朗玛峰 Zhūmùlǎngmǎ Fēng

黄河 Huáng Hé

黑龙江 Hēilóng Jiāng(注意:作为地名连写,“黑龙江(省名)”写作 Hēilóngjiāng)

4. 国名分写,例如:

中国 Zhōng Guó(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写作 Zhōnghuá Rénmín Gònghéguó)

不带“国”的简称连写,例如:

美利坚 Měilìjiān(“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时分写作 Měi Guó)

5. 朝代名分写,例如:

汉朝 Hàn Cháo

三国 Sān Guó

朝代名前加修饰成分的也分写,例如:

南齐 Nán Qí

后唐 Hòu Táng

6. 学说名分写,例如:

马克思列宁主义 Mǎkèsī-Lièníng Zhǔyì

毛泽东思想 Máo Zédōng Sīxiǎng

米丘林学说 Mǐqiūlín Xuéshuō

7. 语文名连写,例如:

汉语 Hànyǔ

英文 Yīngwén

8. 民族名连写,例如:

汉族 Hànzú

维吾尔族 Wéiwú'ěrzú

9. 年号连写,例如:

天宝 Tiānbǎo

太平兴国 TàipíngXīngguó

10. 宗教名连写,例如:

佛教 Fójiào

伊斯兰教 Yīsilánjiào

11. 地质分期连写,例如:

寒武纪 Hánwǔjì

第三系 Dìsānxì

12. 节日名分写,例如:

劳动节 Láodòng Jié

国际儿童节 Guójì Értóng Jié

13. 街道名分写,例如:

白厅(英国伦敦的一条大街) Bái Tīng

华尔街(美国纽约的一条街) Huá'ěr Jiē

14. 历史事件分写,例如:

北伐战争 Běifá Zhànzhēng

八一南昌起义 Bā-Yī Nánchāng Qǐyì

15. 书名,按一般条目的拼写法拼写,例如:

论语 Lúnyǔ

毛泽东选集 Máo Zédōng Xuǎnjí

二十四史 èrshí sì shǐ

字、词与连写*

曲翰章

通常认为英语和日语是表音文字,汉语是表义文字。这三种文字在英语指的是 *alphabet*(字母);在日语指的是かな(假名);在汉语指的是方块字。虽然通常都叫字,内容却很不同。英语的 *alphabet* 相当于汉语的拼音字母,日语假名是音节字母,汉字多数情况下一个字即一个词。英文字母主要起标音作用,由两个以上字母构成词,单独一个字母基本上没有意义。如 26 个字母中有 12 个字母: B、E、F、G、H、K、N、Q、S、W、Y、Z 在《牛津英语现代高级词典》中只代表字母的顺序,没有任何意义。日语假名和英语字母不同,日语实际使用的 47 个假名不是单独具有词汇意义,就是具有语法意义。如か(蚊)、き(木)、て(手)、み(身);め(目)都有词汇意义,类似汉语的单音词。另一类如は、が、に、へ、を、と等则是具有语法意义的助词。但假名的主要作用还是标音,如上述有词汇意义的假名在下列词中只起标音作用,而不起表义作用,如むかい(向い)、さき(先)、はてる(果てる)、みちる(満ちる)、やめる(止める)。这一点又类似英文字母。

汉字和英文字母、日文假名不是同一性质上的字,就像用墙和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1 年第 3 期。

砖相比一样。因为汉语是从单音节词发展来的,每个汉字用拼音表示的话,都是由几个字母组成,几乎都有或实或虚的词义。并可单独成词,所以汉语有专解释字的字典。英语不需要有专解释 26 个字母的字典而只有词典(有的把 *dictionary* 解释成字典,是泛指辞书而言)。当然,日语也没有必要有只解释五十音图假名的字典(或假名典),日语虽有“字典”这个词,主要也是指解释汉字和字音词(音读汉字的总称,区别于日语固有的和语词汇)的汉语意义上的字典。

“词”这一概念来自于英语的 *word*,连普通的英国人都能指出什么是词,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有按词分写的书写方式,从幼年教育开始在学完 26 个字母之后,就是以词为单位进行教育的。而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按句连写,中国人自幼年教育开始是以字为单位进行的,这是造成汉语断词困难的一个原因。

断词困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汉语词汇缺乏词形标志和语法标志。如:

① *Do you like singing and dancing?*

② 君は歌とダンスが好きですか?

③ 你喜欢唱歌和跳舞吗?

第一个英语句子,对于粗通英语的人,只要知道按词分写规则,就能马上分辨出词来,可以分成:

Do|you|like|singing|and|dancing?

第二个日语句子没有分写,从形式上不易分解出词来,但对粗通日语的人,知道了句中表示语法关系的助词は、と、が、です等的作用,体言和用言也能很容易分出来,作为句子主要成分的体言习惯多用汉字表示,用言多用汉字词干加假名词尾表示。可分成:

君|は|歌|と|ダンス|が|好き|です|か?

可是第三个汉语句子的单从句子的表面形式无法分出词来,只有在了解了汉字或词的意义后才能分解成:

你|喜欢|唱歌|和|跳舞|吗?

汉语词汇既无表示词性的词形标志,也无表示语法功能的语法标志,这给断词造成困难。

此外,由于汉语词汇的基础是单音词,这种单音词有两个特点:一是独立运用能力强;二是互相黏合成词的能力强。实际这是一个特点的两个方面,它使字和词的界限、合成词和自由词组的界限不易分辨。如把英语的 *like* (喜欢)、*singing* (唱歌)、*dancing* (跳舞) 分解成一个个字母(也就是字)就毫无意义了,把日语的和语词汇 *うた* (唱歌)、*ダンス* (跳舞) 和 *すき* (喜欢) 分解成一个个假名(相当于字)也毫无意义,字和词的界限是分明的。但把三个相当的汉语“喜欢”、“唱歌”、“跳舞”分解成字:喜、欢、唱、歌、跳、舞,却仍有词汇意义。如:

喜:大喜、报喜、有喜。 欢:跳得欢。

唱:唱一支歌。 歌:一首歌。

跳:跳过墙。 舞:跳一场舞。

英语作为一个词无论多长也要连写,如肺尘病一词为:*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koniosis*,竟达45个字母之多。英语的派生词和合成词,除结构松散的要加短横外,一律连写。合成词的词素之间常发生一定的形态变化,有的要在两个词素之间加-s-,有的要加-o-,如 *helmsman* (舵手), *speedometer* (速度计),这就成了独立词的标志。英语有些合成词虽然从词形上可以分析出来源,如 *Fatherland* (祖国) 由 *Father* (父亲) + *land* (土地) 组

成; *headache*(头痛)由 *head*(头)+*ache*(痛)组成。但有时却不能望形生义,如 *season*(季节)却并非由 *sea*(海)+*son*(儿子)组成;*peacock*(孔雀)也不是由 *pea*(豌豆)+*cock*(雄鸡)组成。由于英语是表音字,年代湮远,词形语音发生很大变化,对于许多词单从词形上常判断不出其意义,尤其英语在古代吸收了大量拉丁语和希腊语词汇,即使说英语的人现在懂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人也很少,短期学习也不会奏效。美国一个语言学家曾对七个人做了试验,要他们通过下列词表想象出它们的意思来,这十个单词是:

- | | |
|-------------------------------|---|
| 1. <i>predella</i> (祭坛的阶梯) | 6. <i>glacis</i> (斜堤) |
| 2. <i>porphyry</i> (斑岩) | 7. <i>mangonel</i> (古代军用射石机) |
| 3. <i>agnomen</i> (古罗马人第四个名字) | 8. <i>chalcedony</i> (玉髓) |
| 4. <i>chiaroscuro</i> (明暗对照法) | 9. <i>transsept</i> (侧廊) |
| 5. <i>mantlet</i> (防弹盾牌) | 10. <i>architectonic</i> (<构造、知识上的>体系的) |

这是从达·芬奇著作中选出的十个有关美术和建筑的术语,结果,七个人能推测出意思的只有第3个和第10个词。

可见这些词已变成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了,很难再进行分析。

日语的单纯词多是和语词汇(有的用汉字表示,采用训读),多数是两三个音节,四个音节以上的不多,读法固定,容易分辨。派生词有的带前缀,加お花、ご立派、全国民等;有的带后缀,如寒い、春めく、甘さ、科学的等;有的带前后缀,如おとうさん。这些也都容易分辨。日语中的汉字多用做合成词的词素,作为独立词干的极少。但日本人划分汉字、词的界限不像中国人那么严格,如“众议院产业公害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东京大学”、“东京大学文

学部国语研究会”都各是一个词。日语形容词有两种：イ形容词（词尾为い）和ナ形容词（又叫形容动词），动词词尾都在五十音图的ラ段上，都有词形标志，有些合成词的词素也要发生形态变化，如かく（書く）和ことば（言葉）组词时要把かく变为连用形かき，成かきことば（書言葉）；有的要发生音变，如本＋箱⇒ホンハコ，而要把“ハ”变为浊音“バ”，成为ホンバコ（书箱）。这就成了新构成词的标志。日本人通常给词下的定义是：“具有完整意义的语音音流单位，其本身不能继续分割。”按这个定义划分字音词和惯用型就有困难。如寺村秀夫在他的《日语语法·上》中说，英国人不会对“*I have to go*”（我必须去）中什么是词感到迷惑，但问日本人“行カナケレバナラナイデショーネエ”是由几个词组成的，十个人就可能有十种回答。

汉语没有类似英语或日语那种词形标志或语法变化标志，构成合成词的词素也不随语音的变化而发生形态变化，依旧保持原字形、没有可做为区别词与词组的形态标志。如问“唱歌”和“跳舞”是词还是词组？答案未必一致。如果各看成一个词，那么组成这两个词的成分：唱、歌、跳、舞就各是一个字；如把它俩各看成一个词组，那么上述各组成成分就各是一个词。《现代汉语词典》收了“跳舞”，但未收“唱歌”，显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反映了大多数人的看法：“跳舞”是词，“唱歌”是自由组合的临时词组。可是从我们一开头引用的句子看：你喜欢唱歌和跳舞吗？“唱歌”和“跳舞”在句子中担负同样的句子成分，都是动宾结构，都是动词，又都有名词作用，结构的紧密程度也相同，可以说“跳一场舞”，也可以说“唱一支歌”。那么为什么会把“跳舞”看做动宾结构的词，而把“唱歌”看做词组呢？这里很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条明显的界限。

反之,如果把“唱歌”也当做词收入词典,那么以此类推,又可能把大量结构松散的词组,如“吃饭”、“喝酒”、“挑水”、“砍柴”等等收入词典,从而使词典变得芜杂。

本来,汉字是表义字,由汉字组成的合成词很难以意义为单位来划分。意义或者说概念,有大小,有交叉。汉语的“早饭”可以看做词组,英语的 *breakfast* 是一个词(虽然是由 *break* + *fast* 构成),而俄语的 *завтрак* 相当于汉语“吃早饭”三个字,整个是俄语的一个词。虽然都是一个单词,概念大小却不同,西方语言的词汇都以固定的词形来最后加以规范。

《现汉》试用本在修订过程中也遇到按意义划分词汇结构的困难。词典注音工作我想不外乎三个目的:一、标明字、词读法。这一点一般词典都能办到。二、揭示词条的内部结构。因为汉语的字和词,词和词组的界限不容易搞清,这个目的不易达到。三、提出一套书写文章和句子的拼写规则,实际是文字拼音化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单纯是语言文字学的问题,涉及社会各方面问题,起码在目前是词典工作所难以胜任的。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

在修订《现汉》试用本的过程中,对拼音做过一些修正,目的在于尽量避免自相矛盾,但修订后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一些结构相同的词或词组、成语,拼法却不同。

三纲五常 sāngāng wǔcháng

三姑六婆 sāngū liùpó

与下列矛盾:

三教九流 sān jiào jiǔ liú

三灾八难 sān zāi bā nàn

此外,矛盾的还有:

春风化雨	chūnfēng huà yǔ
暴风骤雨	bào fēng zòu yǔ
仙山琼阁	xiānshān qiónggé
木牛流马	mù niú liú mǎ
冰消瓦解	bīngxiāo wǎjiě
烟消雾散	yān xiāo wù sàn
八仙过海	bāxiān guò hǎi
百川归海	bǎi chuān guī hǎi
半劳动力	bànláodònglì
半无产阶级	bàn wúchǎn jiējí
三级跳远	sānjí tiàoyuǎn
三岔路口	sān chà lùkǒu

所以结构相同而拼法不同,有的是毫无道理的,如“冰消瓦解”与“烟消雾散”。有的是考虑到词结合的紧密程度,如“八仙”与“百川”,“八仙”内容具体。“半劳动力”的“半”字因后部中心词短,故未分,“半无产阶级”因中心词“无产阶级”分解成两部分,只好将“半”分开拼。类似“半”的前缀成分如“不”、“非”、“全”等也都存在这一问题。

就四字格成语的拼法来说,不外三种拼法,一是四字全分,二是两两相连,三是四字相连。四字全分的拼法,从成语来自古汉语的角度讲,较为合理,较少矛盾,但不便书写。两两相连的拼法容易把不是词的词组连写起来,如“冰消瓦解”,“瓦解”在今天可以看做词,但“冰消”很难看做词,但结构上是相同的。四字相连的拼法便于书写,但对于一些类似成语的四字格不好处理。就揭示词的内部结构角度来说,把词分解得越细越好,但就便于拼写行文来

说,则应尽量连写。特别有些四字格的词,分解开来,有的字对整个词义并没有很具体的意思的,就更应连写,如“乱七八糟”、“黑咕隆咚”、“甜拉巴叽”、“胡里胡涂”等。《现汉》对于成语中本词典已收录为词的一律连写,因“春风”已收条,故在“春风化雨”中连写。“暴风”因本词典未收条,故在“暴风骤雨”中分写,如果将来“暴风”收做词条,就也应连写了。“疾风劲草”也是如此。“疾风”收入词典,所以连写,而“劲草”未收条,故分写,如果将来收条,也应连写。这里颇有一意为之的味道。有的类似结构,不收则已,收则不胜收,如“风”字,除“春风”、“疾风”外,还有“夏风”、“秋风”、“冬风”、“寒风”、“暖风”、“晓风”、“晚风”、“骤风”、“微风”等等。

由于词既不能按意义大小来划分,汉语又没有词形和语法变化的形态标志,加上自古以来没有按词分写的书写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汉语学家给词所下的一切定义都相形见绌。唯一的办法是全国统一制订一份规则简单、使用方便的汉语通用词表。规则必须简单易行,面向十亿人口,规则越繁琐越难统一掌握。连语言学家之间都争论不休的问题,怎么可能要十亿人民一体遵照执行。并且应从初小教育开始,语文教学就应按词表以词为单位进行拼音书写练习。

当然,这样一部词表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它不可能规定人们使用词汇的范围。限定使用词汇范围,等于限制人们创造性地使用词汇去表达丰富细腻的思想感情;等于削足适履,会造成语言贫乏、枯燥单调。反过来,不限制使用词汇,就不能限制汉字,人们仍可能利用汉字构词力强这一特点随意遣词造句,仍然会产生一些无法断定的词语。

另外,虽然没有人对拼音化道路公开表示异议,实际上语言学

界存在两种相反的意见,文字改革不单纯是语言文字学本身的问题,还涉及全社会和政治、历史、艺术、科学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在一个民族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部分地区过早地实现拼音化,造成文字上的隔阂,并不见得是件好事。无可否认,汉字在今天仍然是维系海内外中华民族的一条重要的心理纽带。这些轻重利弊的重大问题不解决,很难下定拼音化的决心,实行起来也是困难的。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在目前制订一部汉语通用词表去统一词典的注音工作是可行的。

把汉语词典的编写提高到新水平*

孙德宣

前些年跟我们搞“三结合”修词典的一个工人说：“凡会说汉语的人都会编汉语词典。”话说得太绝对，实际办不到。会说汉语的人如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并通过一段学习历程，是可以参加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但是随便找来一个会说汉语的人让他来从事这项工作，肯定难以胜任。

东汉末刘熙在他的《释名》序里说：“名之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这话是就每一个词语的意义来源说的。即使不探求语源，单就辨析词义而论，也不是人人都能辨析得恰到好处。由于语言的发展，词语的意义、用法日趋复杂，变化多端，特别是一些常用词更是这样，例如“打”“来”等。连初学识字的人都认得的“一”字，《现代汉语词典》^①（以下简称《现汉》）在其条目下就分列了八个义项，另外还单列了民族乐谱上表示记音符号的“一”，更何况其他的动词、形容词、虚词等等。

《现汉》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准备资料，连同接收过来的，共积累了百多万张卡片。1958年开始编写，次年底完成初稿五万数千条，打印出来“油印本”，分送一百多单位征求意见后进行修改。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60年出排印的“试印本”，广泛征求意见，继续修改。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内部发行，继续征求意见。1973年起又反复修改，改排付印，而且在付印过程中，还不断在校样甚至清样上修改，直到1978年才正式出版发行。编这部词典，在语言研究所出版的著作中，占用人力之多，历时之长，是前所未有的。它在编纂体例、注音连写、注释词义，特别是注释虚词等方面都有很多创新独到之处。但是里面的缺点和错误，仍然不少。许多同志撰文批评指正，提出不少宝贵意见。其中北京语言学院王还教授的意见很有启发性。原文如下：

《现代汉语词典》关于“危险”一词的注解是“有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很显然这种注解并不错。但是有人偏要讲：“赛前，新加坡教练说：‘中国队最危险的人物是古广明。’”（1984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照词典的注解套，古广明岂不成了“可能遭到失败的人物”了吗？然而实际上并不会产生这种疑问。因为，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语感去弥补词典的不足。至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这种句子就会使他头疼了。所以好的词典注释要尽力做到谨严科学，不能让读者凭自身语感去弥补损失。^②

王还教授所指出的“不能让读者凭自身语感来弥补词典注释的不足”这一点很重要，是词典编者应该注意的原则性问题。根据她所举的例句，“危险”一词在词典里应该补充一个义项：“形容使竞争对手感到很难对付的（人）”。

《现汉》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它不仅给说汉语的人使用，也要供国内外学习汉语的人参考。鲁枢元同志说：“中国汉语言的歧义性，常常会弄得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莫名其

妙。”^③他这句话兼指汉语的词语和句子说的。其实,单就汉语词义的灵活性、复杂性或模糊性来说,不但会使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弄得莫名其妙,就是国内不会讲汉语的少数民族学习起来也会莫名其妙。如果对这些错综复杂的词语歧义,编词典的人熟视无睹或摒弃不录,让读者凭自身语感去体会,那么这部词典可以不编;即使编了,也是徒有其名,不能满足读者对工具书的需要。

我们可以再举一些例子说明《现汉》编者对王还教授所提出的原则性问题重视不够,注释中有时注意到了,有时又忽略了,很不一致。下面分一般词语和科技词语两方面来谈。

一 一般词语

[吃] “吃馆子、吃食堂”的“吃”,我们说汉语的都不会误解为“吃掉馆子、吃掉食堂”而是凭语感理解为如《现汉》所注:“在某一出售食物的地方吃。”这说明编者并不因为人凭自身语感能识别而不列入注释。另如下面的例子:

问其所以,县里主管部门说:“吃洛阳。”……发展乡镇企业,也并非都是城里人投资。外来资金毕竟有限,要用在刀刃上。这是孟津吃洛阳的另一个体会。^④

“孟津吃洛阳”的“吃”既不是“吃掉洛阳”,也不是“到洛阳去吃”,而是“依靠洛阳以图自身的发展。”此义也许勉强可归到《现汉》“吃”条的第三义项:“依靠某种事物来生活”下,只须对原注略加补充修改。但如下个例子:

由于这个行业专业性强,商贩大都专攻一门,有的专吃钻石,有的专吃象牙等等。^⑤

这里“专吃钻石”“专吃象牙”的“吃”是“攻(致力研究)”的意思。而“吃透文件精神”的“吃”有“领会”“琢磨(zuó·mo)”的意思。《现汉》“吃”条的注释没有照顾这种用法。可补义项:“致力研究;琢磨(zuó·mo)”。

“吃钻石”“吃象牙”还有另外的意思,即“靠钻石为生”“靠象牙为生”,也就是《现汉》“吃”的第三义项:“依靠某种事物来生活”。正如“有人专吃《红楼梦》”(甚至说“专吃曹雪芹”)这句话的“吃”同样有歧义:一是靠《红楼梦》为生,一是专攻《红楼梦》。

“吃”本来表示口部进食的动作,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却逐渐产生了若干抽象化的派生义。“啃”和“咬”也同样,例如说“啃书本”“咬文嚼字”。从“吃”的这些用法可以看出汉语词义的灵活性、复杂性。

[凶狠] 《现汉》注“(性情、行为)凶恶狠毒。”据此,“凶狠”是个贬义词,但实际上不尽如此。看下面的例子:

整个比赛,埃及队拼抢凶狠,特别是射门凶狠。尽管全场射门的次数不多,但每次射门都凶狠有力,对澳队威胁很大。^⑥

“凶狠”的这种用法跟“危险人物”词组中“危险”的用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倘照《现汉》的注解去套,埃及队员岂不都成了“凶恶狠毒”的人吗?为了使学习汉语的人不致发生误解,可补一义:“形容不顾一切地用力气;凶猛:足球队员拼抢~|射门~。”

[比肩] 《现汉》注:“(书)并肩:~作战。”“并肩”注:“①肩挨着肩:她们顺着河滩~走去。②比喻行动一致,共同努力:~作战。”按下面句中的“比肩”与注解不合:“(新加坡)街上的华文招牌和广告,同英文比肩,随处可见。”^⑦拟补文:“比喻并列”。

[庇护] 《现汉》(1978年本)注：“包庇；袒护。”“包庇、袒护”，据《现汉》的注解都是贬义词(包庇：“袒护或掩护(坏人坏事)”。袒护：“对错误的思想行为无原则地支持和保护”)。可是1982年12月第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二条分明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庇护的权利。”这一条里的“庇护”显然不是贬义词。《现汉》1983年本改注为“包庇；袒护；保护”，也不恰当。应改为：“①包庇；袒护。②保护。”并补充例句。

[步伐] 《现汉》注：“指队伍操练时脚步的大小快慢：～整齐。”现在常说“加快改革步伐”，这个“步伐”的意思跟注解不合。《现汉》凡例中说：“例中用的是比喻义，前面加‘◇’(释义中如已说明‘比喻……’，举例即不加‘◇’)”。举例“加快改革步伐”前面，可加“◇”，也可以单列一义：“比喻前进的速度”。

[沉没] 《现汉》注：“没入水中。”“夜间火车一出站就沉没在黑暗中”，句中的“沉没”是比喻义，举例前可加“◇”，也可以另立义项：“隐没”。

[抖擞] 《现汉》注：“振作：精神～|～精神。”按“急忙将床上被褥抖擞干净”^⑧“著履当先抖擞”^⑨两句里的“抖擞”，是《现汉》“抖搂”第一义项的意思。应补：“②抖搂①”。

[回归] 《现汉》注：后退。按“香港将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句中的“回归”为“返回；归还”义，应补。

[清亮] 《现汉》注：“〈口〉清澈。”按“嗓音清亮”的“清亮”为“清晰响亮”义，应补。

[扫荡] [扫射] 《现汉》[扫荡]注“①用武力或其他手段肃清敌人。②泛指彻底清除：只要是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

射]注：“用机关枪、冲锋枪左右移动连续射击。”但下面句中的“扫荡、扫射”均为“扫视”义：

她的眼光，在房间里扫荡一周之后，落在桌后那张单人床上。^⑩

她的眼光继续在房间里扫荡，此刻落在窗台上。^⑪

自负的金山不肯轻易放弃了发言权：“谁有话谁说！”圆眼睛马上向巡警们扫射，好似向他们挑战。^⑫

句中“扫荡、扫射”的用法可能有人认为不规范，但作为一种喻义似乎也说得过去，况且大作家老舍也这么用“扫射”，词典里不妨过而存之，以备检查。当然，编词典时对于个别人某些词语的特殊用法要认真对待，不可造次。像“因为他周身乏力，睡意葱茏，而且很快就入睡了”^⑬句中的“葱茏”似是“蒙胧、朦朧”的误用，可暂不考虑。

[通商] 《现汉》(1978年本)注：“(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现在报纸常报道：政府主张跟台湾先实现三通(通商、通邮、通航)。照注解岂不正中台独分子的下怀？1983年本已改为“(国家或地区之间)”。

[团圞] 《现汉》注：“形容月圆：一轮~的明月。”按“团圞”不限于形容月圆，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剧三折：“荷叶似花子般团圞。”可改注为“圆形的；圆”。

[妥协] 《现汉》注：“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或争执。”按《红楼梦》十五回：“(来旺儿)假托贾琏所嘱，修书一封，连夜往长安县来，不过百里路程，两日工夫俱已妥协”此“妥协”为“妥当、妥帖”义，旧时习见，可补，并标“〈书〉”。

[问世] 《现汉》注：“指著作出版跟读者见面。”按“问世”不限于著作，如云：“这些制品已成批生产，即将问世”“万元珍品五粮

液问世”。原注后可补“新产品跟顾客见面。”

[香] 《现汉》“香”条下列八个义项,但如“他俩交往密切,香得不得了”句中的“香”指“人与人感情好”,未涉及,可补。

[萧萧] 《现汉》注:“〈书〉象声词,形容马叫声或风声:马鸣~|风~兮易水寒。”据关汉卿《温太真玉镜台》剧一折:“还有那苦志书生才学广,一年年守选场,早熬的萧萧白发满头霜”,可补:“②稀疏”。

[淫] 《现汉》注中列三义,拟补:④淫秽:~书|~画。

上面说的是一些注释不全面、不准确的例子,还有一些注释是错误的。如“不动声色”条注为:“不说话,不流露感情。形容态度很镇静。也说不露声色。”注中“不露感情”是对的;“不说话”是错误的。可改为:“在特殊情况下,说话和神态跟平时一样;不流露感情。形容态度很镇静。”^⑭

又如“狼狈”条注:“传说狈是一种兽,前腿特别短,走路时要趴在狼身上,没有狼,它就不能行动,所以用“狼狈”形容困苦或受窘的样子。”按这种说法见于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苏鹗《苏氏演义》等书。已故郭在贻教授说: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狼狈是联绵词(亦称连语),本来写作刺𤝵,《说文》卷二上𤝵部:“𤝵,足刺𤝵也。”亦作狼踎。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八《僧祇律》第三四卷“狼踎”条下云:“狼踎犹踎踎也。”亦作𤝵踎,《龙龕手鑑》足部:“𤝵踎,行不正也。”又作𤝵踎,见《集韵》去声十四泰韵。”^⑮

郭氏说是可信的。“犹豫”的“犹”“豫”,“狐疑”的“狐”,旧说是兽。清人黄生、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等都曾指出“犹豫”“狐疑”是联语,不能望文生训。《现汉》“犹豫”“狐疑”条的注解没有盲从旧说,

独于“狼狈”条仍从旧说，以讹传讹。但是“狼狈为奸”这个成语里的“狼狈”跟传说有关，不能作联绵词解释。建议“狼狈”条注简为“形容困苦或受窘的样子。”把“传说……行动”一段注释放在“狼狈为奸”条注首。

又如“风马牛不相及”条括注：“风：雌雄相引诱。”“风”解作雌雄相引诱，本于汉代的贾逵、服虔。这种解释也是有问题的。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三：“牛走顺风，马走逆风，故楚子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俞琰《席上腐谈》卷上：“牛，顺物，乘顺风而行则顺；马，健物，溯逆风而行则健。”中央民族学院贾敬颜教授到牧区实地调查，又经过考证，反驳“风马牛不相及”“风”的旧说，提出方向说，他说：

马和牛在刮风天是相互逆方向行走的。马是逆风而行，风愈急，马愈是迎风奔驰，曾有“胡马依北风”的诗句，而牛却是顺风而行，所以草原上火灾多烧死牛。^⑩

这种说法是经过调查研究而得的结论，较为可信，应该引起词典编者的注意。

二 科技词语

科技词语特别是科技术语，一般都有严格的定义，不会有歧义。但随着科学的普及，一些科技词进入日常生活，改变了它的专业性质，取其核心意义，派生为一般语词，如“同步、反馈”之类。在语文词典里，科技词这种派生的意义最好单列义项，不宜采用像语文词注释中在例句前加“◇”的办法。因为科技词的注释比较长而且专门化，后面放着个普通例句，不但使读者不易领会而且显得不

伦不类。《现汉》科技条目往往漏列含一般词语意义的义项。例如：

[沉淀] 《现汉》注：“①溶液中难溶解的物质沉到溶液底层。②沉到溶液底层的难溶解的物质。”但如“那多年来沉淀在心头的压抑和阴郁，瞬时间被这和煦的春风吹得荡然无存了”^①句里的“沉淀”就不能用原注来解释，应另立义项。

[力度] 《现汉》(补编本)注：“指曲谱或音乐表演中音响的强度。从弱到强，可分为最弱、更弱、中弱、中强、强、更强、最强等。”应补：“②泛指强度：少数民族地区要加大改革开放～，增强经济发展活力。”^②

[浓缩] 《现汉》注：①用加热等方法使溶液中的溶液的溶剂蒸发而增强溶液的浓度。②泛指用一定的方法使物体中不需要的部分减少，从而使需要部分的相对含量增加：～铀|～食物。但如“整部影片没有停留在国庆节这一天的活动，而是浓缩了我国历史并展现了祖国未来光辉灿烂的前景”^③句中的“浓缩”也不好原注来解释，应另立义项。

[同步] 《现汉》注：“科学技术上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随时间变化的量在变化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相对关系。”“同步”这个词作为一般词语经常出现在书面上。例如：

作家，深入现实生活，与人民同心，才能与时代同步。^④

有些产品还不适销对路，产销不同步，经济效益还很不好。^⑤

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基本同步。^⑥

教育设施与住宅建设同步进行。

很显然，“同步”已做为普通的动词来用。《现汉》(补编本)已补义。

[移植] 《现汉》“移植”条有两个义项(文繁不录),均为科技义。据“去年他们创作、改编、移植,恢复了的剧目就有八出”句例,应补一般动词义。

[窒息] 《现汉》注:“因外界氧气不足或其他气体过多或者呼吸系统发生故障而呼吸困难甚至停止呼吸。”应补义:“抑制使不能存在或发展;阻碍;阻止;封建主义糟粕~着我们民族的生机。”

我们列举以上的例证,说明《现汉》注释的缺失,并不意味着贬低《现汉》。《现汉》的成绩是主要的,它在编纂体例、注音连写、注释词义特别是注释虚词等方面都有不少创新独到的地方。但是社会在进步,语言在发展,新词新义不断产生。我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改革开放定为国策,编词典也不可满足于现状,要放眼世界,弃旧图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请听一听群众的呼声吧!王秉玺同志说:

词典是不说话的老师,其功能是为人们释疑解惑,增加知识。然而近来查询词典,有的不但未能解惑,反而增加了不少困惑。困惑之一是新词汇查不到。像“市场经济”“关贸总协定”“集团公司”“信用卡”这些使用率很高的词汇,不仅常用词典未列词条,就是中科院语言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也查不到。困惑之二是旧词汇有歧义。笔者为写一篇通讯稿,涉及“当铺”一词,查阅中国大陆解放后出版的十几种词典,诠释竟然基本雷同:“旧社会专门收取抵押品、放高利贷的店铺。”迄今为止,大陆开办当铺已逾200家,显然与词典定义不合。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新词不断增加,词书编纂工作理应跟上时代步伐,尽快补充修订。

是的,词典编纂工作理应跟上时代步伐。我们要解放思想,打破旧框框,尽最大的努力,编出符合广大群众要求的现代化的汉语词典。随着现代汉语研究的深入,在词典里如何解决区分词与词素、标注词类、辨析近义词、详解用法等问题,必将提到日程上来。《现汉》必须成为具备标准字形、标准字音的规范词典,释义要科学、要严谨,例句要丰富多彩。

附 注

① 本文凡引用《现汉》注释的地方除标明“1978年本”或“补编本”外,均为“1993年本”。

② 1985年4月30日《光明日报》4版“语言文字”第五期,王还:《汉语词典现代化刻不容缓》。

③ 1983年4月7日《人民日报》5版,鲁枢元:《“生意”的歧义》。

④ 198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2版。

⑤ 1984年7月16日《北京日报》2版。

⑥ 1981年10月2日《体育报》4版。

⑦ 1993年1月30日《人民日报》7版。

⑧ 《歧路灯》736页。

⑨ 佛典《大比丘三千威仪》。

⑩ 《当代》1985年1期107—108页。

⑪ 同上,108页。

⑫ 《老舍小说集外集》127页,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⑬ 《收获》1985年1期250页。

⑭ 参看《北方论丛》1982年6期,富金壁:《关于〈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几个问题》;李一华、吕德申《汉语成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⑮ 郭在贻:《训诂丛稿》243页,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⑯ 1992年6月14日《人民日报》8版转载5月30日《周末》。

⑰ 1993年4月4日《人民日报》5版,毛毛《缅怀胡子叔父》。

⑱ 1993年4月2日《人民日报》3版。

⑲ 1984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3版。

- ⑩ 1990年3月13日《人民日报》6版。
- ⑪ 1991年8月28日《人民日报》2版。
- ⑫ 1992年5月4日《人民日报》2版。

论规范性词典释义的一般原则*

韩敬体

词典的释义就是对词典所收词语的含义所作的解释。在一部词典中,释义是极为重要的。有人说,“辞书的释义,是辞书的中心,是决定辞书质量的最重要的关键”;^①也有人认为,“释义是词典的核心”;^②还有人提出,“释义是词典编纂的灵魂”。^③也许人们不一定认可把释义称为词典的“中心”“核心”“灵魂”之类,但是众所周知,词典是供人们查检以释疑解难的工具书,它的主要任务一般是由释义承担的,也就是说,释义是词典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一部词典的释义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部词典的质量。所以,在词典编纂者的心目中,释义在辞典编写中占有重要地位。要编写一部词典,要准备充分资料,确定应收的词目,然后进行的释义工作则是很繁重因而也是很费功夫的事情,词典编写者不得不把很多的时间、精力用于释义方面。《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编写工作当然也不例外。

词典种类很多,无论形式或内容都不完全一样,其释义的一般原则和要求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前者可以说是共性,后者也可以称为个性。释义原则的共性是由词典的一般性质所决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93年第5期。

定的,个性则是由一部词典编写宗旨、读者对象、成书规模等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现汉》是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项目,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的《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明确下达了给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现汉》的任务。这部词典要编成现代汉语规范性的中型语文性词典,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它有一个极其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要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它要将这种方针贯彻到编写工作的各个方面,释义自然是个重要方面。《现汉》的编写方针决定了《现汉》释义工作的原则和要求,这种原则有的体现了断代语文词典的一般性,有的则表明了《现汉》的特点。

下面我们对《现汉》释义的一般原则简要地进行论述。

一 释义客观正确

词典对词语意义的解释首先要求正确。要对语言材料进行认真、客观地分析,以科学的观点揭示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或意义。释义不正确,不符合语言实际,就背离了词典供人查考以释疑解难的宗旨,甚至徒增混乱,贻误读者,就像市场上的伪劣商品假酒假药一样,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词义是客观的,是没有阶级性的。但进行释义的词典编纂者,由于受时代、观点、思想方法等方面的制约,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释义带有主观片面性,不能正确地解释词义。

《说文解字》是我国古代第一分析汉字结构、推究汉字本义及声音训诂的字典,有很大的创造性和学术价值,是一部权威性的

辞书,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有这么几个条目:

神 天神,引出万物者也。

鬼 人所归为鬼。

祸 害也,神不福也。

这些解说当然是基于那时的迷信观点,许慎生活的时代距今近两千年,由于时代限制,他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认识,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于他。就是现代的词典,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的也并不罕见,现就“命”“命运”比较几部词典的说法。

命 ② 天所赋之穷通得失、非人力所能为者。 (《汉语词典》)

命 天所赋之穷通得失,天然注定的运气,吉凶祸福,不是人所能做到。 (《东方国语词典》)

命 ② 命运① (《现汉》)

[命运] 命② (《汉语词典》)

[命运] 人的祸福穷达得失,非人力所能左右的。

(《东方国语辞典》)

[命运] 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迷信的人认为是生来注定的)。 (《现汉》)

显然前两部词典释义反映着宿命论观点,《现汉》的释义是比较正确的。

另外一种情况,受极“左”思想影响,生拉硬拽地对词义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强调所谓“政治性”,“落实无产阶级专政”,也会使释义产生错误,甚至会出现十分荒唐的说法。比如“文革”中有个编词典的机构就有人说什么“太师椅”是封建官僚的用具,“八仙桌”是迷信者的用具,在辞书界被当作笑料;当时出版的《哲学小辞典》

《学生字典》就是在极“左”观点影响下编写的：

[仁政] 封建时代儒家的反动政治思想，即所谓爱人、仁爱的政治。（《学生字典》）

[杀身成仁] 为正义而牺牲生命。反动统治阶级鼓吹杀身成仁，是要人们为其效忠卖命。（《四角号码新词典》1977年本）

[卖命] 指劳动人民处在被剥削的压迫下，为维持生活不能顾惜性命地干。（《现汉》试印本）

这种对“仁政”“杀身成仁”“卖命”的解释，显然是成问题的，是强加阶级分析造成的。

《现汉》编写的年代，同样是“左”的思想流行的时期，加上修改于“文革”后期，受极“左”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发行的本子释义“穿靴戴帽续尾巴”的错误倾向也是容易见到的。

[大兵] 旧时指士兵。

[奖券] 旧时金融机关为了骗钱而发售的一种带赌博性的证券，上面编着号码。……

[暗无天日] 形容反动统治下的社会极端黑暗。（《现汉》1978年本，1983年重排有改动）

[西崽] 旧时指欧美殖民主义者在我国开设的洋行、西式餐馆等行业所雇用的男仆。

这样的例子可找出一些，《现汉》释义中加“旧时”“反动统治”等字眼的及进行批判限制的词语，需要认真修改。

释义正确不仅是观点要正确，还要符合语言实际，无论历史的或是现代的，词语反映的事实要如实表达，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以意为之，望文生义，歪曲事实。请看下例：

[娘子军] 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曾组织妇女成军,帮助作战。……(《辞海》)

[不毛之地] 不生长草木的地方。(《东方国语词典》)

上引二词语的释义并非只是这两本词典特有的,而是因袭旧说,成了《现汉》以前一致的说法。其实它们的解释是有背实际的。先说“娘子军”,首先此语所指的军队出现和存在之时,李渊还没有当皇帝,他的女儿未称公主。其次,那支军队由妇女组成并无历史根据,只能是望文生义。再说“不毛之地”,说是不生长草木的地方只能是沙漠或大片石坂,这也不符合此语所指称的实际。《现汉》将这两个词目分别释为“隋末李渊的女儿统率的军队号称娘子军,……”“不长庄稼的土地或地带。形容土地荒凉、贫瘠”是符合语言所反映的客观实际的,是较为正确的。

由于收集资料不够,或者对资料分析片面等原因,《现汉》也还存在释义不正确的现象。

二 释义完备

词语的含义随语言运用、发展是不断变化的,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义到多义,这种现象极为多见。一部大中型语文性词典释义时应如实表现出词语的全部含义,不可缺漏。如前所说,词典因性质、对象、目的不同,对词义收录也有不同的选择。《现汉》是现代汉语规范性语文词典,它对收古汉语义、方言义、专科义选择比较严格,不全收,不详列,但对现代通行的词义,特别是派生义、新义是绝不应遗漏的。比如[后进],《汉语词典》注为“犹后辈①”,只有一个意义。《现汉》释义就增加了新的含义“进步比较慢、水平比较低

的人或集体”。再比如“登峰造极”，《汉语词典》释为“喻造诣精绝”，只说好的事物(造诣)，其实人作恶也会“登峰造极”，《现汉》释为“比喻达到顶点”就比较完备。“风情”《现汉》1978年版本释为“①关于风向、风力的情况。②流露出来的男女相爱的感情(常含贬义)。”而这些年常用的“风土人情”的意义没有收录，1983年重排本补了进去。

《现汉》一些词语缺漏义项的情况还是不少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扳] 使位置固定的东西改变方向或转动。

“扳”很常用，像《现汉》举例和收的词语，“扳闸、扳枪栓、扳着指头、扳道”等都是《现汉》所释的意义。但“扳”有常用的引申意义，《现汉》收了方言词“扳本”，其中“扳”的意思是由《现汉》所释的那个意义引申的，用得较多，“病”也可“扳”，普通话中下棋、球赛中“扳回一盘”“扳回一局”“扳回几分”的说法也较常用。应该补收词义。

[持平] 公正；公平：～之论。

[失误] 由于疏忽或水平不高而造成差错(多指打球、下棋)。

[筛选] 利用筛子进行选种、选矿等。

现在在相比较的数额、价格相等时常使用“持平”，这种意义应该补收。“失误”使用范围扩大了，不只是“多指打球、下棋”了。“筛选”现在还用于“精心挑选”的意思。

《现汉》“端正、丰富、活跃、严肃、整齐”等词收了使动义，这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意义已用得很普遍了。但还有一些词，如“完善、严格、严明、涣散”等也具有使动义，并且使用的例子也不少见，也

需要补收。

《现汉》收录现代姓氏义,但遗漏很多,应该补收。

释义完备,重要前提是资料齐全、充分,不仅有书面的,也要有口语的,有来自书本的,也有来自实地调查的。材料缺乏,释义是不可能不缺漏的。《现汉》姓氏义缺漏较多,正是调查资料不够而造成的。

三 释义概括

词义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反映是概括、抽象的,它只能反映事物的一般特征,正如列宁所说,“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概括性是词,也是词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因此,在释义时,必须在众多具体的语言材料中抽象出词义的基本特征,即一般意义。

词语在语言运用中总不是单独存在的,它离不开一定的语言环境,脱离不开前言后语,它的具体意思也会跟着特定上下文发生变化。词典释义时,就要分析具体语言环境中词语的特定含义,从而综合出普遍意义,这种意义要能涵盖词语涉及的同类型的所有语言材料。不可把上下文语词的意思全拉入要解释的词语意义,也不可只解释词语在某个例句中的特定含义。那样就变成了随文作注或随文生训。随文作注,罗列例句、词义,好像是条分缕析、义项纷呈,实则是堆砌材料,茫无头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莫过人们常说的动词“打”了。

“打”在现代汉语中,用法极多,有人称之为“万能动词”,有人称它为“泛义动词”。它在许多具体场合有特定的含义。

六十七年前语言学家刘复发表《打雅》一文,列举出“打”的101种说法,后来竟又补充到几千种,随例生义,十分繁琐又难以穷尽,连他自己也只得哀叹“打”是“意义含混的混蛋字”。这就是在众多的具体用例面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罗列具体意义,完全违背词典释义概括性原则。《现汉》“打”的动词义概括为24个,《汉语大词典》概括为34个,尽管某些意义可以研究,但概括释义既便于人们查检,又显得条理清晰,易于掌握,比起随文作注,一例立一义的办法来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释义要概括,就要防止释义太狭窄、不周延的情况。《现汉》在编写、多次修改中重视了这个问题。比如:《试印本》《试用本》“敷设”一词注为“铺(轨道):~铁路”,释义就嫌狭窄,管道、水雷、地雷都可敷设,同书“水雷”的释义就是“敷设在水面或水中的炸弹”。后来就修改为“铺(轨道、管道等)”和“布置(水雷、地雷等)”两个义项,释义较为完备。“明星”一词1978年本注为“旧时称有名的电影演员或交际场中有名的女子”,但近些年运用面扩大了,运动员、杂技和歌唱演员都有了明星,甚至还出现了“抗癌明星”。重排本稍加改动,概括性加强了。

尽管《现汉》注重了释义的概括性,但由于收集资料 and 人们认识的限制,释义狭窄的情况还是有的。

[承接] ①用容器接受流下来的液体。②接续:~上文。

[起步] 〈方〉开始走:车子~了。

“承接”常用的“承接业务”“承接来料加工”的意义没能概括进去。“起步”普通话已吸收,比喻事业开始进行的意义已经使用得很广泛了。

四 释义确切、严密

词语成千上万,丰富多彩,它们的意义除了极个别的等义词、异义词外,也是千差万别、各具特色的。释义要求能体现词语最本质的特征,能使词语之间的区别表示出来。这就是释义的区别性,它与前面说的概括性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概括性要求突出词语表达事物的一般特征,区别性要求表现词语的具体意义。它们相互联系,又相互渗透。概括性注重于词语的内部关系,区别性着眼于词语外部联系。词义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释义要概括也要具体。概括要求释义适用面广、周延,具体要求释义严密、确切,避免太宽泛,不准确。

释义要确切,必须从充足的语言材料入手,深入分析,反复琢磨,进行科学的归纳、抽绎,将词义准确地表示出来,切忌空泛和笼统含混。还是以“打”为例。有人认为《现汉》注得太细,没有进行高度概括,除前两个意义外,其他的可以概括为“表示动作”(如《汉语词典》注)也就行了。我们觉得“打”的问题较为复杂,不能像《打雅》那样随文作注,必须进行概括。但与动词“搞、弄”一类词也应该有个平衡,比较起来,《现汉》“搞”没分义项,似乎太概括了。不过“搞”是刚从方言进入普通话的,用法不能与“打”相比。再看下例:

- [保重] 注意身体健康。 (《汉语词典》)
 谓爱护身体,注重健康。 (《汉语大词典》)
 对于身体的保护珍重。 (《东方国语词典》)
- [忍心] 狠心,犹言无不忍之心。 (《汉语词典》)

昧着良心,硬着心肠。 (《汉语大词典》)

残忍。 (《东方国语词典》)

[包涵] 宽容。 (《汉语词典》)

宽容,原谅。 (《汉语大词典》)

宽容。包庇涵容。 (《东方国语词典》)

上述三个词,三部词典的释义都显得笼统。在语言实际中,“保重”用于希望别人注重健康,“忍心”用于能硬着心肠做不忍做的事,“包涵”用于请别人原谅。《现汉》释义注意到了这些词义的特性,就比较准确。

另一方面,语言还有个模糊性的特点,词义同样具有模糊性,释义也要体现这一点。比如“大雨、小雨”,气象部门有具体的定义,那是专科术语的意义。在生活中,人们说大雨、小雨概念并不具体,指的就是雨量大或雨量小的雨。“天亮”“黄昏”都只能是模糊的概念,不能定死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天色亮度达到什么程度。词典释义表现词义的模糊性,与严密、准确性并不矛盾。只有注出这种模糊性,也才能体现释义的准确性,确切地反映语言实际。

在释义的严密、确切方面,《现汉》有两点颇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特别论及。

第一,采用多种提示、附注手段,增加释义的附加内容,表示词语的语义、语法、语用等方面的特点。如:

[进击] (军队)进攻;攻击。

[上升] ②(等级、程度、数量)升高;增加。

[下达] 向下级发布或传达(命令、指示等)。

这些条目释义的附注,表示了词义的适用对象及词语搭配关系。再如:

[贵庚] 敬辞,问人年龄。

[鄙意] 谦辞,称自己的意见。

[永眠] 婉辞,指人死。

[叨教] 客套话,领教……

[守财奴] 指有钱而非常吝啬的人(含讥讽意)。

[竖子] ②小子 (含轻蔑意)。

[文抄公] 抄袭文章的人 (含戏谑意)。

[嘴脸] 面貌;脸色(贬义)。

这些条目释文中的提示或附注表明了词义的适用范围或感情色彩。还有不少词语在释义的附加内容中标出了词类,注出了在句子中的作用,表示出词语的一些语法特点。也有不少词语,释义前后标出〈书〉〈方〉〈口〉,或某方面的用语,从而表示出词语的语用风格。

第二,在虚词和代词、数词、量词的释义上既不像一些辞书那样罗列书证,随文作注,茫无头绪,又不像一些辞书那样简单疏陋,不切实用。比如:

[了] 同“嘞”。嘞 语助词。 (《汉语词典》)

[了] 语尾助词:表示动作完了。……语尾助词:表示决定的意思。 (《东方国语辞典》)

“了”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助词,上述两本词典注释未免过于简略。《现汉》则把“了”的语法意义分为两个:“①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表示动作或变化已经完成。②用在句子的末尾或句子停顿的地方,表示变化,表示出现新的情况。”根据语法作用,它们又分别分成几个小的义项,并配上适当的例句,整个释义简明而清楚。再如《现汉》对“为”的虚词用法释义:

[为]² 介词,被(跟‘所’字合用):……

[为]³ 〈书〉助词,常跟‘何’相应,表示疑问:……

[为]⁴ ①附于某些单音形容词后,构成表示程度、范围的副词:……②附于某些表示程度的单音副词后,加强语气:……

《现汉》对“为”的虚词用法解释得简洁明确,条理清楚,与同时或以往的辞书很不一样,特别是“为⁴”的意义是以前辞书上没有提到的。

李荣先生指出,《现汉》“意义分析周到妥帖,虚字用法提要钩玄”,^④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由于词典的性质、规模不同,释义确切也不能一概而论。大中型词典、详解词典,与小型的、普及性词典当然不能同样要求。小型字典、词典不能求全责备。但有的走入极端,像“文革”期间出版的《学生字典》,对常见的“人”“打”等不进行释义,“大”注为“大小的大”,“小”注为“大小的小”,哪些字如此处理,也说不出什么道理。

《现汉》尽管注意了释义的准确问题,但也存在不少释义不准确的地方。

[接见] 跟来的人见面。

[捏造] 假造事实。

[沉迷] 深深地迷惑。

[困扰] ①围困搅扰。②被某种事物搅扰而摆脱不开:这几天被一种莫名的烦乱所~。

[穿小鞋] 比喻暗中刁难或打击。

“接见”注释太宽泛,它使用的场合、对象应有限制;“捏造”不应该

将“事实”阑入；“沉迷”与“迷惑”用法相差太远。“困扰、穿小鞋”是《补编》本条目，“困扰”②以被动性与①区别，从例子上看不出来，“穿小鞋”的释义是“给穿小鞋”或“给小鞋穿”的意思了。

五 释义的系统性

一个语言的词汇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系统，词汇的意义即词义同样是有系统性的。词义与词义，无论是同一个多义词语的，还是不同的词语的，彼此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或者是纵向的，或者是横向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词典的释义，就要努力表现出词义系统。从而使自己也具有系统性。

释义的系统性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某一个词语的释义，一是不同的词语的释义。

一个词语主要是多义词语的释义，要表现出各个意义之间的关系，比如古义、今义，普通话义、方言义，本义、派生义等等。义项分合排列，注释方式方法都要表现出系统性。比如《现汉》对“闭塞”“翻身”的释义。

[闭塞] ①堵塞。②交通不便；偏僻；风气不开。③消息不灵通。

[翻身] ①躺着转动身体。②比喻从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下解放出来。③比喻改变落后面貌或不利处境。

“闭塞”①是本义，②比喻义，是由①派生的，③比喻义由②派生。“翻身”①是本义，②③两个比喻义由①派生。“闭塞”的词义是连续派生关系，“翻身”词义是放射派生关系。这两种关系是一个词语词义系统的基本形式，如果词义更多，关系自然更繁杂。尽管共

时性词典与历时性词典的释义排列原则不尽相同,但编写者在释义时应该清楚词义之间的关系。

词语与词语之间的系统性,表现为词语横向的相互联系,如同义、反义、同类、同形、异体等等。相关联的词语的词义也有相应的关系。词义之间或相通,或相对,或依存,或补充,构成了词义的同—性或相应性。相关词语的释义就要表现出平衡、相应的关系。相关的或同一类的词语释义方式,要尽可能一致,释义内容和措辞要相互照应,义项分合、排列也要平衡。比如数字、干支、爵位、五行、八卦、四季、节气、颜色、方向、五官、度量衡、二十八宿,标点符号、亲属称谓、同类器皿等等。这些有关词语的释义一定要平衡处理,相互协调,不可轻重失调、详略悬殊,更不可互相抵牾、自乱其例。《现汉》编写中是注意了释义平衡的,但也有不少同类词划分义项不相应的情况。比如前面提到过,较为多用的“打”字释义较详,而同样使用较多的“搞”注为“做;干;办;弄”就只有一义。“搞”与“打”有相似特点,可以代替各种不同的动词,常随不同的搭配词语表示出不同的意义,如搞对象、搞关系、搞电影票、搞材料、搞活动等。“木”字头下“木头”和“用木料制成的”分立了义项,后义例有“~器、~犁、~板”,而“石”并没有分出“用石料制成的”义项,例子“~器、~板、~碑”与石头的意义合在了一起。另外,还有用同义词语释义带来的问题,比如:

[适当] 合适;妥当。

[妥当] 稳妥适当。

[饱满] ①丰满。②充足。

[丰满] ①充足。②……

[遏抑] 压制。

“适当”用“妥当”注，而“妥当”注中又有“适当”，形成互训。“饱满”注两义，“丰满”“充足”有区别，而“丰满”用“充足”注，又相通了，相互矛盾。“遏抑”用“压制”注，“压制”出了两条，此处应有标志。

还有同类条目释义措辞相应问题。比如：

[倚马千言] …… 比喻作文敏捷。

[投鞭断流] …… 后用来比喻人马众多，兵力强大。

[夜郎自大] …… 后来用以比喻妄自尊大。

[一蟹不如一蟹] …… 后来比喻一个比一个糟。

这四个典故，都在释义的前部分引述典故注明出处，后面注出比喻义。但在比喻义前用的措辞很不一致。“倚马千言”，“比喻……”前没有用别的词；“投鞭断流”，“比喻……”前用“后用来”；“夜郎自大”用“后来用以”；“一蟹不如一蟹”用“后来”。四种措辞，各不相同，其实并没有好多道理可说，应该一致起来。

六 释义规范

《现汉》编写宗旨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所以，规范性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

释义的规范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收录词语的合乎规范的意义，表现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词义系统。第二，对不规范的词义、用法根据词典编写宗旨有选择地收录，以规范词义为标准给以解说或另加标志。第三，释义的语言要规范，使用现代汉语白话文。

为表现现代汉语普通话词义系统，《现汉》释义着眼于收录符合规范的词义。对早已不用的古代意义、很冷僻的方言词义及太

专门化的专科词义一般不收。比如《汉语词典》收录的几条：

[刘] ①杀。②兵器名，斧属。③姓。

[行李] ①谓行旅所携带之装囊。②谓行人，使者。

[甜] 甘。

《现汉》只收“刘”的姓氏义，不收另两个古义。“行李”也只收现代义，注为“出门时所带的包裹、箱子、网篮等。”不收指“行人，使者”的古义。《汉语词典》的“甜”，释义为“甘”，这是古今相同的词义。《现汉》除收了此义（注为“像糖和蜜的味道”）外，又收了一个现代义“形容觉睡得踏实。”有的字已死亡的古义偶然还见于成语，《现汉》也只在成语释义中加括注对那个字的古义进行简要注释，而不在字头下收录此义。如：[不名一文]一个钱也没有（名：占有）。

只在某个方言中使用的词义，《现汉》根据流行情况选择收录，数量不太多。对较偏僻的就不收，比如有的方言为避讳“蛋”，将同音的“淡”说成“甜”（如菜的“咸淡”说成菜的“咸甜”），“甜”有了个“淡”义。还有的地区把表演说成“秀”（如个人秀、歌厅秀、联合秀等），《现汉》就没有收。

《现汉》对收录的数量有限的古义、方言义也要给以醒目标志，古义标〈书〉、方言义标〈方〉。

释义行文用现代白话，我们比较前面引用的“行李”“甜”的释义可以看出《现汉》与《汉语词典》释义语言很不一样。《现汉》释文要求规范，不用古词语、方言词语和生造词语，语法也要合乎规范。不使用一般辞书释义中常用的文言搭头词或训释用语，如“谓、状、貌、犹、亦、即、喻、犹言、之谓”之类。

七 释义简明

释义文字要求简洁、明快,这是任何一部词典都应该做到的。词典释义不是写论文,不能进行充分论证,也不能旁征博引进行考据,更不能空泛议论,不着边际。释义切忌掺杂水分,啰嗦、冗长。释文能浓缩的就要浓缩,能精简的一定精简,能用一句话说明的就不用两句话,能用同义词、短语注明的就不用句子。要做到以恰切的语言表达出合乎要求的信息,使释文不可增减一字。简洁,能节约读者查检时间,当然也会节约词典的排印成本和读者的负担。另一方面,释义还要明白。不能为简而简,要精简而不疏漏,明确而不含混。释义的简明性,明应是第一位的,简要服务于明。简而不明,疏漏、晦涩,以己之昏昏使人之昏昏,读者查阅、猜想,浪费了宝贵时光,其结果与繁琐、冗长没什么不同。

为行文简洁,释义在不少情况下采用同义词作注的注释方式,这是我国辞书释义一个传统方式,它简洁明快,但也会出现循环互训问题。古代辞书且不必说,就是现代辞书这方面的问题也屡见不鲜。比如《汉语词典》对四组词的解释:

[跳] 跃。

[跃] ①跳。

[依赖] 犹言依靠。

[依靠] ②依赖。

[依据] 犹言根据。

[根据] 凭依。

[凭依] 依据。

[猜想] 犹猜度。

[猜度] 犹言料想。

[料想] 猜想,测度。

[测度] 料想猜度之谓。

很显然,前两组互训,后两组辗转互训。《现汉》在用同义词语释义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作注的几个同义词中必有一个有定义或描写说明式的详细释义,从而避免循环互训的弊病。比如上面四组词语,《现汉》对“跳”有详细释义。“依赖”①注中用了“依靠”,而“依靠”则注为“指望(别人或事物达到一定目的)”。“依据”“凭依”都用“根据”注,“根据”则另有详细释义。“猜想”“猜度”“料想”用“猜测”注,“猜测”用“推测”注,“推测”则另有详细释义。

为行文简洁,多义词的几个义项因在一个词目下,安排一定顺序,后面的有的可以承前省略一些文字。如动词、形容词本义派生的使动义,释义可采用“使××(词目)”的形式,不必再重复本义内容:

[活跃] ①行动活泼而积极;气氛蓬勃而热烈。②使活跃:~部队生活|~农村经济。

[纯洁] ①纯粹清白;没有污点;没有私心。②使纯洁:~组织。

再如后面义项释文有时用“上述”“这种”字样代替前义重复的部分。[暖气]①详细注明“管道的蒸气或热水叫做暖气”。②注为“通常把上述的设备也叫暖气。”[木工]①注出木工工种工作的主要内容。②则注成“做这种工作的工人”。

为行文简洁,释义搭头的字眼“指、泛指、表示、形容、比喻”之类能不用的尽量不用。释义中“叫(词目)”、“叫做(词目)”尽量少用。

[拜天地] 犹言拜堂。 (《汉语词典》)

拜堂。 (《现汉》)

[拜年] 谓新年行礼庆贺。 (《汉语词典》)

向人祝贺新年。（《现汉》）

为了明白,注释要用含义明确的词,行文要合乎现代汉语语法规范,避免含混的甚至会有歧义的词语或结构。比如“烧灼”,《现汉》原先注为“火烧;火烫”(试用本),而“火烧”《现汉》只收食品的意思,“火烫”收二义,又把烫发义放在第一义。这样不明白“烧灼”义的人查阅时就可能误解释义。后来《现汉》将释义改为“烧、烫,使受伤”,就比较明确了。也有人提出,《现汉》“罗织”“报喜”释义用的动宾短语,也可理解成偏正短语,会造成歧义。^⑤也值得我们注意。

陈原同志说:“《现汉》的释义特点是简明扼要。简明,这是很重要的特点。”^⑥《现汉》的这一特点,是与编写者始终注重释义的简明性原则分不开的。

八 释义通俗易懂

词典因编写宗旨、服务对象及规模不同,在释义的要求上也不能一样,在释义的语言风格上也不好求其一致。《现汉》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是一部现代汉语规范语的中型语文词典,释义的语言要求规范化,用语要合乎规范,语法要合乎规范,语言风格要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释文不仅规范,文从字顺,还要讲究修辞,生动流畅,避免单调僵硬,令人生厌。当然这里说的生动流畅,还要以准确、规范为前提,而且涉及整个释文,包括例句。

有人指出,“从特定意义来说,词典其实也是做一种通俗论述的工作,如果词典中的释文比专门论文还要艰深,还要难懂,那么,

这样的词典就只配束之高阁，它起不到传播知识的作用。”^⑦如前所说，各种词典释文的通俗性要求是相对的，不能一概而论。《现汉》是把释义通俗性做为原则贯彻的。其实，释义通俗化，深入浅出又谈何容易。一般说越是常用的人们似乎很明白的词语，要准确释义又要通俗易懂却是极不容易做的事情。比如“跳”，《汉语词典》释为“跃”，而“跃”又释为“跳”，循环论证，等于没有说出真正意义。《学生字典》也采取这种办法，“跳”释为“蹦，跃”，而“蹦”“跃”又都释为“跳”。《汉语大词典》“跳”释为“跳跃”。“跳跃”释为“跳动腾越；跳越”，结果使“跳”的“①跳跃。②跳越”义又合二而一了。《现汉》释为“腿上用力，使身体突然离开所在的地方”，比较明确，易懂。再如“撑船”的“撑”，《汉语词典》释为“以竿进舟”，用文言注释，比“撑”难懂得多。《汉语大词典》注为“用篙行船”。《现汉》释为“用篙抵住河底使船行进。”

《现汉》以前的辞书，注文用文言或文白杂糅，更早的不必说，就是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国语词典》还是如此。比如它对下面词语的注释：

[小意思] 微忱，又多用为赠人财物之谦词。

[打马虎眼] 故意作敷衍态度希图赖账或其他类似情形之谓。

[头疼脑热] 谓患微恙。

[甜言蜜语] 谓甘言。

本来，要解释的几个词语都是习惯用语，不难理解，而《国语词典》却在对它们的释义中用了“微忱”“敷衍”“希图”“之谓”“微恙”“甘言”之类词语，远比词目难懂。《现汉》释义是：

[小意思] 微薄的心意（款待宾客或赠送礼物时的客气

话):……

[打马虎眼] 〈方〉故意装糊涂蒙混骗人。

[甜言蜜语] 为了讨人喜欢或哄骗人而说的好听的话。

“头疼脑热”《现汉》未收,《补编》本收了此词,注“指一般的小病”。很显然,《现汉》释义用的是白话文,通俗易懂,与《国语词典》大异其趣。《现汉》释义用白话、通俗易懂的特点,李荣先生曾不止一次指出:《现汉》“用白话解释白话,突破前人用文言解释白话的框框”,这是我国辞书史上值得特别提到的。^③

上述几个方面的释义原则问题,并非都是《现汉》的特色。释义的客观性、概括性、准确性、完备性、系统性等,一般视为科学性的内容;而规范性、简明性、通俗性等一般是实用性的内容,《现汉》在准确性、规范性、简明性、通俗性等方面做得比较突出。在释义方面,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许多专家多年的琢磨、修改,自觉贯彻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宗旨,在划分多义词词义界限、普通话和方言词界限,确定每条词语的意义特点、语法特点、语用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释义基本上达到了要求。《现汉》问世二十年来,受到了社会的欢迎,不少读者也热情地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现汉》编者将吸收合理意见,做好修订工作,使词典释义更为完善。

附 注

- ① 杨祖希《词典学试论》,《辞书研究》1979年1期。
- ② 汪耀楠《语文词典的义项》,载《辞书编纂经验选萃》,上海辞书出版社。
- ③ 赵振铎《有关释义的几个问题》,《辞书研究》1991年2期。
- ④ 李荣《丁声树先生》,《中国语文》1989年4期。
李荣《方言词典说略》,《方言》1992年4期。

- ⑤ 张立茂、陆福庆《词性标注与释文结构》，《辞书研究》1983年5期。
- ⑥ 陈原《辞书和信息》18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 ⑦ 陈原《辞书和信息》2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 ⑧ 李荣《丁声树先生》，《中国语文》1989年4期。
李荣《方言词典说略》，《方言》1992年4期。

谈谈《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形式*

刘庆隆

词典的注释是词典的主要部分,词典注释的好坏,对整个词典的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每部字词典都在注释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做了许多工作。尽管每部字词典的注释还不能令人满意,存在着不少问题,包括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毕竟是费了许多心血。《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的注释虽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改进提高,但在编写工作中还是做了一些新的尝试。这些尝试可能是不成功的,或是有欠缺的,应该继续摸索。想就个人的体会,探讨一下《现汉》的注释。因为牵涉的问题比较多,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说明白的,先就注释形式谈点儿粗浅的认识。

《现汉》的注释主要是采取说明或定义的方式,对过去常用的注释形式(比如“互训、拆字注释”等),有选择地有限制地使用了一部分,对过去注释中的习惯用语(比如“犹、谓、犹言”等),基本上没有使用。

《现汉》的各种注释形式,根据不同类型的词汇分别使用。哪些词汇使用哪种注释形式,编写工作开始时做了大概的规定,在编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语文研究》1982年第2辑。

写修改过程中,又经过修改补充,逐渐加详,成为今天的样子。这些注释形式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分别简述于后。

一、互训注释形式

《现汉》开始编写时规定,一般不单独使用互训注释形式。如果使用这种注释形式,要注意两种情况。一、用作互训注释的词语,本身要有说明或者定义形式的注释,避免简单的互训(即“甲,乙也,乙,甲也”)。二、用作互训注释的词语应该是大家都熟悉的,一般都理解而不会发生歧义的。

互训注释形式,简单明白,直截了当,用的合适,不会影响词典的质量。过去的字词典使用互训注释比较多,有一部分是使用得恰当的,比如“舟,船。”“巨,大。”查字词典的人,通过这样的注释,可以理解要查的字词的意义。但有不少是使用得不当的,再加上根本不管上边提到的两种应当注意的情况,结果,造成了许多简单互训或有歧义的注释。还有的用得滥,把一些意义距离较大的字词,加上“犹、犹言、犹谓”等搭头字,作为互训注释。这样一来,查字词典的人,查到这样的注释,不能帮助理解字词的意义,甚至绕了半天的圈子,越绕越糊涂。互训注释成了字词典注释的一大弊病,使人望而生厌。

《现汉》为了较好地利用互训注释方式,避免重复过去字词典的弊病,有条件地使用了这种形式,在使用时还注意了前边提出的两种情况。

a) 用作说明或定义注释的辅助手段。因为说明或定义的注释,往往看了还需要经过一番思考,不是一眼就能明白的,提供一个同义词或近义词做注释,可以起点提示作用,便于理解。比如“接续,接着前面的;继续:……。”“联合,①联系使不分散;结合:

……。”“生意 shēngyì 指商业经营；买卖：……。”^① 这种形式，用字不多，对理解词语的意义有帮助，看来是可行的。《现汉》里这样的注释，分号前后的两段，表示一个意思，不是表示这个词语意义上的差别或使用的不同。个别条目，不是这样，那是属于没有处理好的。

《现汉》一般不只简单地用否定词加反义词做注释，像“坏”用“不好”解释，而有时把这种方式作为辅助手段，像上面说的用同义词或近义词做注释一样。比如“光滑，物体表面平滑；不粗糙。”“松气，降低紧张程度；不再用劲。”“生硬，^①勉强做的；不自然；不熟悉：……。^②不柔和；不细致：……。”“生硬”^②的注释，是处理得不好的，《现汉》里还有一些这样的注释，应该设法解决。如果组成一句话，其中用到了否定词加反义词，可以勉强凑合。比如“柔和，温和而不强烈；软和：……。”“粗枝大叶，比喻不细致，做事粗心大意。”

b) 单音词跟复音词互训。单音词跟由这个单音词组成的某些复音词，意义相同或相近，为了避免注释重复，用复音词作为单音词的注释。因为一般复音词的意义比较明确，单音词意义往往比较多，单用一个字做注释，不够清楚。比如“刺，^⑤讽刺：讥～。”“簿，簿子。”“仓，仓房；仓库：……。”个别的，单音词用得少，复音词用得多，就用单音词做复音词的注释。比如“擦拭，擦^②：～武器。”“售卖，卖^①。”用做注释的复音词或单音词，都有说明或定义形式的注释，一般都比较明确。

c) 一组词语，意义相近，注释不能表示出彼此的差别的，《现汉》采取了互训的办法。选一个常用的词，做说明或定义形式的注释，其他词语就用这个词做注释。这不是说这些词语意义上没有

差别,只是说这些词语在《现汉》里的注释还区别不出这些差别来。如果在注释文字上做一些变化,但仍不能区别出这些词语的差别,还不如用相同的注释好,免得查词典的人白费心思,空绕圈子。比如“悲伤,伤心难过。”“哀戚、哀伤、哀痛、悲、悲戚、悲怆”等都用“悲伤”做注释。这不是好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汉》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多的,有的没有采用这种方式,采取分别注释的办法,结果是绕圈子而不能解决问题。比如“细致,精细周密。”“精细,精密细致。”“精密,精确细密。”“细密,①精细仔密。”“周密,周到而细密。”这一组词的注释,文字虽然不同,但这些词义的差别,并没有区别出来,只是在文字上兜圈子,而且不适当地使用了拆字注释形式。

d) 用普通话词语对译古汉语词语。古汉语今天大家已经不熟悉了,用大家熟悉的普通话词语去对译古汉语词语,是比较合适的。比如“疴,〈书〉病:……。”“蹴,〈书〉①踢:~鞠(踢球)。”“拊掌,〈书〉拍手:……。”“芙蕖,〈书〉荷花。”

e) 用普通话书面通用的词语对译口语词语。口语的一些词语,有的方言区可能不大熟悉,用通用的书面词语来对译,一般都能了解。比如“蝌子,〈口〉蝌蚪:蛤蟆~。”“枪子儿,〈口〉枪弹。”“四周围,〈口〉周围。”“死活,②〈口〉无论如何:我劝了他半天,他~不答应。”

f) 用普通话词汇对译方言词汇,比如“磕巴 kēba〈方〉口吃。”“砢砢 kēchen〈方〉寒砢。”“壳郎猪 kēlangzhū〈方〉架子猪。”“炉桥,〈方〉炉算子。”

g) 用一般结构的词汇对译译音词,比如“密斯,小姐(多见于早期翻译作品):……。”“摩托,内燃机。”“布尔乔亚,资产阶级。”

“狄克维多,独裁者。”但科学定名用译音词的,详注在译音词下,比如“米²,公制长度的主单位,……。”“苏打 sūdá 无机化合物,……。”

h) 用科学正式名称、术语注释非正式名称、术语(包括口语、方言、异名、通称、俗称、旧称等),比如“老鸱 lǎogūā<口>乌鸦。”“棒子 bàngzi②<方>玉米。”“荷¹hé 莲。”(异名,78年本大都改为见【××】,改得不大一致,比较混乱。这种改动,实在是自找麻烦,不但无益,而且有害。)“烤电,透热疗法的通称。”“洋灰,水泥的俗称。”“矽肺,硅肺的旧称。”

《现汉》虽然规定了不用简单互训,但由于多次改动,前后检查不细,仍然存在着不少这样的毛病。还有简单地使用否定词加反义词做注释,也形成了简单互训。这样的问题,认真查对,是可以解决的。

二、拆字注释形式

拆字注释形式,过去的词典里用得不少。这种形式简单具体,用得合适,不失为一种办法。但这种形式不能多用,过去的词典用得太多,形成简单互训。查词典的人查到这样的一些有关条目,就会感到这些条目的注释用词,翻来倒去,连环重叠,好像文字游戏。不但没有弄清楚要查的词语的意义,反而像进了迷魂阵。

合成词的意义,一般的都不等于原来词素意义的简单相加,而已经形成了新的意义。拆字注释,往往把合成词拆得支离破碎,不能确切地反映合成词的意义。而且这种注释,不够概括,只能适合一个词的个别用法,而不能适合大多数的用法,常常造成因用法立义,随用法注释。《现汉》原则上不使用拆字注释,只在下列情况可以使用。

a) 复合词的意义,确是由两个词的意义组成的。比如“整洁,整齐清洁。”“松软,松散绵软。”“高大,①又高又大:~的建筑|~的身材。”“老少 lǎoshào 老年人和少年人:男女~齐上阵。”“厚意,深厚的情意。”“后患,以后的祸患。”“候车,等候乘车:……。”“心灵 xīnlíng 心思灵敏:~手巧。”如果复合词的意义,已超出字面的意义,不能用拆字注释。

b) 由两个词紧缩构成的词(包括略语、简称等),意义没有改变的。比如“整训,整顿和训练。”“语文,①语言和文字:~程度……。”“指战员,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合称。”“镇反,镇压反革命。”“劳改,劳动改造。”“土改,土地改革的简称。”“金汤,‘金城汤池’的略语:固若~。”

《现汉》里拆字注释形式也用滥了。比如“悲伤,伤心难过。”“悲切,悲痛。”“悲痛,伤心。”“悲哀,伤心。”“悲苦,悲哀痛苦。”“痛苦,身体或精神感到非常难受。”“悲辛,悲痛辛酸。”“辛酸,……比喻痛苦悲伤。”“悲酸,悲痛心酸。”“心酸,心里悲痛。”这些词的注释,文字虽有不同,但注释文字的意义是一样的,就是“精神上感到难过”,“痛苦”也是偏指精神上的。既然注释区别不出这些词义的差别,注文的不同,只能是增加查词典的人理解词义的困难。《现汉》在这方面的问题是需要努力解决的,一时如果解决不好,宁可采取一组词互训的办法,这倒比较实事求是。

三、定义或说明形式注释

《现汉》里的注释用定义或说明形式的比较多,专科词汇的正条一般都使用定义或说明形式注释,语文词语的注释,为了避免简单互训或拆字注释,也比较多地使用了这种形式。定义形式注释并不能完全避免互训,注释里的中心词还会是互训的,只是不是简

单的互训罢了。中心词前后有衬托,联系到的同义词或近义词也比较多,这些都对理解词义有帮助。查到一个词语的注释,联系到自己对这个词语或有关的词语的理解,通过个人看到的实用例句和词典中的例句,几方面结合起来,一般对词语的意义就明白了,所以对这样的注释也就不明显地感到是互训了。举一组《现汉》的例子,以见一斑。“规章,规则章程:……。”“规则,①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章程 zhāngchéng 书面写定的组织规程或办事条例。”“制度,①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规程,对某种政策、制度等所做的分章分条的规定:……。”“条例,由国家制定或批准的规定某些事项或某一机关的组织、职权等的法律文件,也指团体制定的章程。”“准则,言论、行动等所依据的原则。”“原则,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法则,②〈书〉法规。”“标准,①衡量事物的准则。②本身合于准则,可供同类事物比较核对的事物:……。”“规定,①对某一事物做出关于方式、方法或数量、质量的决定:……。②所规定的内容: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法规,法律、法令、条例、规则、章程等的总称。”“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法令,政权机关所颁布的命令、指示、决定等的总称。”从这一组例子,可以看出定义或说明形式注释中互训的一般情况。这一组例子,有的词没有注释好,可以改得稍好些,但互训还是避免不了的。

定义或说明形式的注释,容易产生浮泛不贴切的毛病。尤其是定义,弄得不好,有时像谜语。《现汉》为了使定义或说明形式的注释,便于着笔,有的放矢,避免不着边际地空发议论,注释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也摸索了一些方法,根据这些要求和方法也

就形成了一些方式。

a) 注释要跟词性一致。《现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虽然没有标注词类,但注释和举例要照顾到词性。从注释的行文能够看出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比如“肥,①含脂肪多(跟‘瘦’相对,但通常不用来形容人):~猪|~肉|马不得夜草不~。②肥沃:土地很~。③使肥沃:~田粉|草灰可以~田。④肥料:底~|绿~|化~|积~。⑤由不正当的收入而富裕。⑥肥大①(跟‘瘦’相对):棉袄的袖子太~了。”①②⑥是形容词,③⑤是动词,④是名词。②④⑥是用复合词做注释的,这些复合词都有较详细的注释。⑥用“肥大”来注释,不大确切,一般说“衣服肥”,只是指宽,不包括大,所以可以说“衣服又肥又大。”“肥沃,(土地)含有适合植物生长的养分、水分。”后边应有个“多”字。⑤试印本的注释是“富裕(由不正当的收入而富裕)”,有动词和形容词用法的例句。后来注释化简,例句取消。注释似可仿试印本,改为“富裕(由于有不当的收入)”,“肥缺”、“损公肥私”之类的用法,可做这个意义的例句。《现汉》因为没有标注词类,对于兼类,有的是分开注释的,有的是合在一起注释的。分开注释的,注释行文对词性的照顾就明确些,像“肥”②和“肥”③。合在一起注释的,注释行文就笼统些,像拟改的“肥”⑤的注释。再比如“保障,①保护(生命、财产、权利等),使不受侵犯和破坏。②起保障作用的事物。”名动分为两个意义,注释照顾了词性。“痛,①疾病创伤等引起的难受的感觉:头~|肚子~|伤口很~|~痒相关。”这一条不同的词性没有分开,注释也就含混一些。

b) 注释跟词语的结构相照应。《现汉》一般不用拆字注释形式,但解释时联系词语的结构。比如“产销,生产和销售。”(并列结

构)“常情,一般的心情或情理:……。”“畅行,顺利地通行:~无阻。”“灼勺,炒菜用的带柄的铁锅,形状像勺子。”(偏正结构)“尝新,吃应时的新鲜食品。”(动宾结构)“手巧,手灵巧;手艺高。”(主谓结构)注释时注意词语的结构,避免误解词义,使注释更确切些。像上边举的例子,“炒勺”和“尝新”都是“动词”加“名词”,但结构不同,注释形式也应该有差别。

c) 利用某些事物的大家熟知的特点来注释某些词。比如“黄,①像丝瓜花或向日葵花的颜色。”“红,①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酸¹,②像醋的气味或味道:……。”“甜,像糖和蜜的味道:……。”一些不大好注释的词语,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但选取的事物,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提到这个东西,大家就能知道它的特点,因而联系到被注释的词的意义。如果选的事物是大家不知道的,也就无从知道被注释的词的意义了。

d) 某些词是利用某些事物的部分特点(如形状、作用等)构成的,《现汉》对这部分词就利用这些特点进行注释。比如“桃红,像桃花的颜色;粉红。”“雪亮,像雪那样明亮。”“火热,火似的热:~的太阳◇~的心|……。”“林立,像树林一样密集地竖立着,形容很多:……。”对这些词素意义的注释,就采取“像原事物某点”来做注释。比如“耳,②形状像耳朵的东西:木~|银~。”“流,⑦像水流的东西:气~|暖~|寒~|电~。”“盘,③(~儿)形状或功用像盘子①的东西:磨~|算~|字~|棋~◇地~。”“腿,②(~儿)器物下部像腿一样起支撑作用的部分:桌子~|椅子~。”“胶(胶),③像胶一样黏的:~泥。”“雪,②颜色或光彩像雪的:~白|~亮。”这些意义,过去的字词典一般都不照顾,《现汉》收了一部分常见的。因为这些用法已跟原来的意义不同了,应该照顾。

e) 有些意义是另一个意义的扩大或缩小,《现汉》就利用这个特点进行注释。比如“材,①木料,泛指材料①:……。”“饱和,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溶液所含溶质的量达到最大限度,不能再溶解。也泛指事物达到最高限度。”“米¹①,稻米;大米。②泛指去掉壳或皮后的种子,多指可以吃的:……。”“米饭,用大米或小米做成的饭。特指用大米做成的饭。”“命驾,〈书〉吩咐人驾车,也指乘车出发。”《现汉》作为基本意义的,只是现在用的比较广泛的,不一定是原始的意义。比如“面²(麵、麪)”,原始的意思是指小麦磨的面,后来扩大为指一切粮食磨的粉。《现汉》用这个扩大的意义作为基本义,指小麦磨的面,就成了特指(缩小范围)。“米”原始的意义是指粟实,就是北方说的谷子。现在大米多了,人们一说米,首先想到是大米(在北方农村说米,是指小米)。《现汉》把大米作为①义,指小米、黄米、高粱米等就成了泛指(扩大范围)。“米饭”一条,把大米饭作为特指,正好跟“米”的处理翻一个过儿。从这两条的处理可以看出,以使用的广泛与否作标准,不够科学。“米¹”的处理可以跟“面²”一致,大米义作为特指。还有的地方用“专指”,比如“菜,②专指油菜:……。”不必用“专指”,必须用的,可用“特指”,像“菜”②可单用“指”。

“也指”、“特指”、“泛指”等,有的独立成义项,像“米¹”②,有的跟前边的意义连在一起,后边有例的,用逗号隔开,后边没有例句的,用句号隔开。跟前边的意义连在一起,后面的例句分不清是哪个意义的,不如都干脆单独立义,单独举例,比较清楚。还有“形容×”、“比喻×”的注释也有类似的情况。前边如果只是为了说明来历,现在已经不用了,可以跟后边的“形容×”、“比喻×”连在一起。如果现在两个意义都用的,以分开为好,比较清楚。

f) 有的意义是比喻意义或是形容某些事物,注释就用“比喻×”或“形容×”。比如“捋虎须,捋老虎的胡须,比喻冒险。”“闷雷 mèn léi 声音低沉的雷。比喻精神上突然受到的打击。”“马拉松,①指马拉松赛跑。②比喻时间持续得很久(多含贬义):……。”“喜滋滋,(~的)形容内心很欢喜:……”“风刀霜剑,寒风像刀子,霜像剑一样刺人肌肤,形容气候寒冷。”

g) 两个意义有关联,前后两义注释有一大部分相同的,后边的注释利用前边的注释,不重复相同的文字。比如“苹果,①落叶乔木,叶子椭圆形,花白色带有红晕。果实圆形,味甜或略酸,是普通的水果。②这种植物的果实。”“保障,①保护(生命、财产、权利)等,使不受侵犯和破坏。②起保障作用的事物。”“导演,①排演戏剧或拍摄电影时,组织和指导演出工作。②担任导演工作的人。”

h) 形容词有及物动词用法的,另立义项,用“使×”注释。比如“密切,②使关系接近:进一步~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丰富,②使丰富:通过实践~自己的工作经验。”

i) 开头概括地注释一句,说明这个词属于哪个方面,是什么,下面再较详细地说明。比如“烹,②烹饪方法,先用热油略炒,然后加入酱油等作料迅速搅拌,随即盛出:~对虾。”“缲(𦃟), qiāo, 缝纫方法,做衣服边儿或带子时把布边儿往里头卷进去,然后藏着针脚缝:~边儿|~一根带子。”“打坐,僧道修行的方法,闭目盘膝而坐,调整气息出入,手放在一定位置上,不想任何事情。”“电疗,物理治疗的一种,利用电器装置发热或电流刺激来治疗疾病。”“粤剧,广东地方戏曲剧种之一,用广州话演唱,主要流行于说粤语的地区。曲调由皮黄、梆子等演变而来,并吸收了一些民间小

调。”这种注释方式,主要是说明事物,专科词汇的注释,使用这种方式比较多。但这种注释方式,往往对词性照顾不够。

j) 定义和说明相结合,开头一句是简单的定义,后边再做些补充说明。比如“商品,①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重性。商品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体现着不同的生产关系。”“锻铁,用生铁精炼而成的含碳量在0.15%以下的铁,有韧性、延性,强度较低,容易锻造和焊接,不能淬火。……。”这种方式,多用于专科词汇注释,便于说明较复杂的事物,后边的说明部分,可多可少,比较灵活。

k) 有时为了注释措辞方便,采用“×叫×”或“×叫做×”的方式。比如“脆骨,动物的软骨作为食品叫脆骨。”“打横,围着方桌坐时,坐在末座叫打横。”“打诨 dǎhùn 戏曲演出时,演员(多是丑角)即兴说些可笑的话逗乐,叫做打诨。”“月经,①生殖细胞发育成熟的女子每二十八天左右有一次周期性的子宫出血,出血时间持续三天到七天,这种生理现象叫做月经。”这种形式显着累赘,如果不用这种形式能说清楚的,最好不用。像上边举的前三例可以不用。

l) 有的词语单独很难注释,就注释经常结合在一起的词语。比如“起见,‘为(wèi)……起见’,表示为达到某种目的。”“阙,què,②b)分两段的一首词,前一段叫上阙,后一段叫下阙。”“娘胎,某个人尚未出生,说‘在娘胎里’,已经出生,说‘出了娘胎’。……。”“聊赖,多用于‘无聊赖’、‘百无聊赖’,是无所凭借、无以为生或无所寄托的意思。”这类情况在《现汉》里比较少,是不得已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是举例说明,局限性很大。

m) 有些字只用于人名、地名,就注为“人名用字”、“地名用字”。

人地名用字的注释,概括起来,可分为两类,只见于人名或地名,本身意义不明的,可以注“人名用字”或“地名用字”。只见于一个人名的,这个人名如果见于史传或传说,人们不陌生的,可以注出人名。见于一个或几个人名的,如果都是不知名的,只注“人名用字”。如果几个人都是知名的,可注为“人名用字,如××(××)、××(××)。”(××)是简单地交代一下,这个人是什么时代的人,干什么的,就像《现汉》里人名的注释。见于一个或几个地名的,前加“地名用字”。某些字词虽然有意义,但现在多见于人名、地名,注释了意义后,可以在括注中交代一句,“多用于人名”或“多用于地名”。

n) 对古书或古代传说中的东西,现在没有而又没有弄清楚的,就注为“古书上说的××”或“古代传说中的××”。比如“鸕鶿 jīāojīng 古书上说的一种水鸟。”“凤凰,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羽毛美丽,雄的叫凤,雌的叫凰。……。”

o) 注释开始注明了量词、象声词的,后边一般说明用法。比如“束,②量词,用于捆在一起的东西:一~鲜花|一~稻草。”“匹²(②疋),量词。①用于马、骡等:两~骡子|三~马。②用于整卷的绸或布(五十尺、一百尺不等):一~绸子|两~布。”“张,⑥量词。a) 用于纸、皮子等:一~纸|两~画|十~皮子|三~铁板。b) 用于床、桌子等:一~床|四~桌子|七~犁。c) 用于嘴:一~嘴。d) 用于弓:一~弓。”“唧唧,象声词,形容虫叫声。”“丁当,象声词,形容金属、瓷器等撞击的声音:……。”个别的有加注释的,或用同义词、近义词解释。比如“帧,量词,幅(用于字画等)。”“阙 què②量词。a) 歌曲或词一首叫一阙:弹琴一~|填一~词。”这样的比较少,有的也不必要。像“阙”②a) 仍可照一般量词注释。

p) 连词、副词、介词、助词、叹词、代词、指示代词等,一般注明词类,从语法方面说明用法。比如“而且,连词,表示进一步,前面往往有‘不但、不仅’等跟它呼应:不但战胜了各种灾害,~获得了丰收。”“很,副词,表示程度相当高:~快|……。”“在,⑦介词,表示时间、处所、范围等:事情发生~去年|……。”个别的有用同义词或近义词做注的,比如“而已,助词,罢了:如此~,岂有他哉。”

q) 有些词语的意义不好确切地注释出来,就用相当的词语来表示,前边加“表示”二字。比如“光景,③表示估计:a)一般的情况:今天太闷热,~是要下雨。b)时间或数量(用在表时间或数量的词语后面):半夜~起了风|里面有十几个小孩子,大都只有五六岁~。”“来¹,④跟‘得’或‘不’连用,表示可能或不可能:他们俩很谈得~|这个歌我唱不~。”“相当,③表示程度高,但不到‘很’的程度: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把³bǎ加在‘百、千、万’和‘里、丈、顷、斤、个’等量词后头,表示数量近于这个单位数(前头不能再加数词):个~月|百~块钱。”

r) 有好多词汇是成套的。《现汉》对于成套的词汇,采取同样形式的注释。比如“称谓”、“天干”、“地支”、“五音”、“工尺”、“二十八宿”、“爵位”、“朝代”、“年号”、“节气”、“动物”、“植物”、“元素”、“剧种”等。每套词汇拟定一种注释形式,统一按照这种形式注释,便于照应,比较一致。《现汉》这类条目中,个别不相照应的也有,这是由于多次改动,有的没有照顾到。这种方式,在工作中有方便之处,解决好一条的注释,可以解决一类。但工作比较繁琐,每改动一条,就要牵动全套的条目,偶有疏忽,就会造成不一致。虽然是一套条目,但每个词语在使用中,并不一定完全一样,注释时要注意到它们的一致性,也不能忽略它们的差异。

这里简单地归纳了定义或说明形式注释,前两条是就注释的要求说的,后边的十六条是就注释的方法说的。根据这些要求和方法来注释,自然也就形成了这么多方式。这些方式是词典注释常用的,《现汉》里使用得也不少。只是由于缺少整体的考虑,不是有计划地有意识地使用这些方式,系统性不强,不一致的地方太多。应该把这些方式深入地做些研究,留下适用的,剔除不适用的。把要使用的方式,摸索出它们适用的范围。编写修改词典时,有计划地有针对性地使用这些方式,词典注释会做得好些。

四、括注形式

词典里的括注形式,就是正式注释外,用括号括起来的补充说明。括注是需要交代,而又不是词语意义的部分。如果是词语意义的一部分的,就应该放在注释中,不应该放在括注里。

《现汉》有些词语注释得不够清楚,有些同义词或近义词注释没有能够区别出它们的差别,利用括注做些补充交代,弥补注释的不足。另一方面,把注释中不是词语意义的部分用括号括起来,作为括注。

为了便于说明,把《现汉》里的括注归纳成以下十七个方面。分法可能不恰当,有的界限不清楚,有的比较牵强。

a) 交代反义词,作为辅助注释手段。比如“近,①空间或时间距离短(跟‘远’相对):……。”“远,①空间或时间的距离长(跟‘近’相对):……。”“近因,直接促成结果的原因(区别于‘远因’)。”“女儿,女孩子(对父母而言)。”

b) 在注释前或在注释后,表示搭配关系(就语法关系说)。比如“出轨,①(火车、有轨电车等)行驶时脱离轨道。”“巡弋 xúnyì (军舰)在海上巡逻。”“敷设,①铺(轨道、管道等):~铁路。②布

置（水雷、地雷等）。”前两例表示主谓关系，后例表示动宾关系。如果词语的意义包含了主语、宾语的意思，注释中提到的主语、宾语，不要括起来。比如“自愿，自己愿意：……。”“酌情，斟酌情况：～处理。”

c) 在注释前或在注释后，表示适用的对象（就使用范围说）。比如“殉职，（在职人员）为公务而牺牲生命。”“好听，①（声音）听着舒服；悦耳。②（言语）使人满意。”“恍惚，（记得、听得、看得）不真切；不清楚：……。”“谴责，（对荒谬的行为或言论）严正申斥：……。”“回锅，重新烹调（已熟的食品）：……。”“补正，补充和改正（文字的疏漏和错误）。”这一类有的形式上跟前一类一样，如前两例和后两例，也可以表示出搭配关系，但主要是就在哪些方面使用说的。前一类除了表示搭配关系外，也可以表示出使用范围。这两类虽然有的形式相同，但稍加考察，可以看出它们的重点是不同的。

d) 在注释前，个别的在注释后，表示用什么东西或方式。比如“撮 zhǎn（用松软干燥的东西）轻轻擦抹或按压，吸去湿处的液体：……。”“慰问，（用话或物品）安慰问候：……。”“欢送，高兴地送别（多用集会方式）：……。”但词语的意义里包含着使用的东西或方式的，不要括起来。比如“火攻，用火攻击敌军的战术。”（的战术，可不要；敌军，可以括起来。——引者注）《现汉》里注释中使用什么东西或方式，多没有括起来。这是词典注释中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个问题。

e) 在注释后，从语法方面说明使用情况。比如“枪支，枪（总称）：～弹药。”“吾，①〈书〉我，我们（多做主语或定语）：……。”“慌 huang 表示难以忍受（用做补语，前面加‘得’）：……。”“好意

思 hǎoyìsi 不害羞;不怕难为情(多用在反诘句中):……。”“好气儿,〈口〉好态度(多用于否定式):……。”

f) 说明跟某些词语的搭配,多在注释后。比如“取决,由某方面或某种情况决定(后面多跟有‘于’字):……。”“偏¹,③客套话,表示先用或已用过茶饭等(多接用‘了’字):……。”“消,④〈方〉需要(前面常带‘不、只、何’等):……。”“恍,②仿佛(与‘如、若’等连用):……。”“介意,把不愉快的事记在心里;在意(多用于否定词后):……。”

g) 在注释后,说明使用场合。比如“会见,跟别人相见(多用于外交场合)。”“男方,男的一方面(多用于有关婚事的场合)。”有的放在注释里,比如“小姐 xiǎojiě②对未出嫁的女子的尊称,现在多用于外交方面。”这类情况,还是放在括注里较好。

h) 在注释后,说明使用范围。比如“湛蓝,深蓝(多用来形容天空、湖海等)。”“挂齿,说起;提起(常用做客套话):……。”“刮¹,②在物体表面上涂抹(多用于糨糊一类稠东西):……。”“汇编,编在一起的文章、文件等(多用做书名):……。”“召唤,叫人来(多用于抽象方面):……。”“无孔不入,比喻利用一切机会(多指做坏事)。”“无比,没有别的能够相比(多用于好的方面):……。”

i) 在注释后,说明文体。比如“高大,②(年岁)大(多见于早期白话):……。”“恁 nín 同‘您’(多见于元曲)。”“晚安,客套语,用于晚上道别(多见于翻译作品)。”“分解,⑤解说(章回小说用语):且听下回~。”“查收,检查后收下(多用于书信):……。”“万寿无疆,永远生存(祝寿的话)。”《现汉》里关于语别文体等方面的说明,有三类处理方式,一类是作为标志,放在注释前边,像〈口〉〈方〉〈书〉〈古〉等。一类是用括注形式,放在注释后边,像上边举的

例子。还有一类是作为注释的一部分,放在注释的开头或注释的后尾,像“婉辞、敬辞、谦辞、尊称、公文用语、商业用语、佛教用语”等。这些形式用得比较乱,注释中的说法和括注中的说法,大约有三十来种。看来用不到这么多形式,也不需要这么多说法。用得多的,作为标志,放在注释前面,用得少的,作为括注,放在注释后边。括注中的说法,概括为几种也就够了。

j) 在注释后,说明修辞色彩。比如“无底洞,永远填不满的洞(多用于比喻)。”“万死,死一万次(夸张说法),形容受严厉惩罚或冒生命危险:罪该~|~不辞。”“万水千山,很多的山和水(形容路途遥远险阻):……。”《现汉》里“多用于比喻”,一般放在后边,作为注释,意思就是“比喻×”。“形容×”,一般也放在注释里。

k) 在注释后,说明意义色彩。比如“百出,形容出现次数很多(贬义):错误~|矛盾~。”“百依百顺,形容在一切事情上都很顺从(多含贬义)。”“戏子,旧时称职业的戏曲演员(含轻视意)。”“无尽无休,没完没了(含厌恶意)。”“万事通,什么事情都知道的人(含讥讽意):……。”“呜呼哀哉,旧时祭文中常用的感叹句,现在借指死了或完蛋了(含诙谐意)。”“滑溜 huáliu〈口〉光滑(含喜爱意):……。”“位,⑤量词,用于人(含敬意):……。”意义色彩跟说话的口气、场合有很大的关系,这些《现汉》里没有交代,只对轻重的程度,在括注行文里略有表示。

l) 在注释前,表示原因、条件等。比如“还席,(被人请吃饭之后)回请对方吃饭。”“着眼 zhuóyǎn(从某方面)观察;考虑:……。”“忘我,(为了人民的利益)忘掉自己;不顾自己:……。”“会账,(在饭馆、酒馆、茶馆、澡堂、理发馆等处)付账(多指一人给大家付账)。……。”

m) 在注释后,表示目的、结果或衔接的动作。比如“相²xiāng 亲自观看(是不是合心意):~亲|……。”“问,⑤向(某方面或某人要东西):我~他借两本书。”“务求,必须要求(达到某种情况或程度)。”“陷入,①落在(不利的境地):~重围|……。②比喻深深地进入某种境界或思想活动中:~沉思。”“即景,〈书〉就眼前的景物(作诗文或绘画):……。”“扶病,带着病(做某件事)。”“会同,跟有关方面会合起来(办事):……。”

n) 在注释后,补充说明词义。比如“肖像,以某一个人为主体的画像或照片(多指没有风景陪衬的大幅相片)。”“五短身材,指人的身量矮(四肢和躯干短小)。”“复试,有些考试分两次举行,第一次叫做初试,第二次叫做复试(一般是第一次考普通科目,及格后再考专门科目)。”《现汉》里这类情况有的没有括起来。比如“相思,彼此思念,多指男女因互相爱慕而又无法接近所引起的思念。”像这样的还是括起来好。上边举的“复试”的括注,可以作为注释的一部分。

o) 在注释中间,举例、补充说明或解释注释中的词语。比如“回请,被人请后(如请吃饭等),还请对方。”“回收,把物品(多指废品或旧货)收回利用。”“万历,明神宗(朱翊钧)年号(公元1573—1620)。”“枪手 qiāngshǒu ①旧时指持枪(古代兵器)的兵。”

p) 在注释中附注外文,比如“勃郎宁,手枪的一种,可以连续射击,因设计人美国的勃郎宁(John Moses Browning)而得名。”《现汉》的一般借词,附注外文,放在最后。比如“米突,米²的旧称。〔法 mètre〕”《现汉》附注外文,主要是为了表明这是音译词,不是为了考源。

q) 放在注释后,解释词语里个别字词的意义。比如“杯水车薪,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着了火的柴,比喻无济于事(薪:柴火)。”“不差累黍,形容丝毫不差(累黍:微小的数量)。”《现汉》例句中需要注解的,也用括注形式注释。比如“悲愤,悲痛愤怒:~填膺(悲愤充满胸中)。”“白头,指年老:~偕老(夫妇共同生活一辈子)。”

r) **注意**大部分是交代词语的使用情况和跟同类词语的比较,也可以归到括注一类。比如“俩 liǎ〈口〉①两个:……。②不多;几个:……。**注意**‘俩’后面不再接‘个’字或其他量词。”

以上简单地罗列了《现汉》括注形式,总的看来,这种方式是可行的,能弥补部分注释的不足,又灵活简便,容易措辞。《现汉》里的一些括注是有用的,而且不错。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不一致,不系统。

《现汉》括注形式除了上面罗列的外,还有注释前头的一些标志,如〈口〉〈方〉〈书〉〈古〉等,还有表示专科词汇的学科标志(《现汉》(试用本)标注了学科,78年本取消)。这些标志也可以算做括注一类,因为这些标志也可以改为括注,前边罗列的括注,有的也可以改为标志。

《现汉》标的〈口〉〈方〉〈书〉〈古〉等,虽然还有一些问题,标注学科也存在着困难,但总的说来,问题不算突出,困难也不算大。这些标志对读者是有用处的,读者可以根据标志去理解词汇的意义。免得读者去猜测这些词是属于哪一类,注释是什么性质的,是语文意义?还是专科意义?

更重要的是读者知道这些词语的性质,可以正确地使用。比如“齿、牙、牙齿”,“齿”是专科词汇,“牙、牙齿”是普通词汇,专业书

籍中可以单用一个“齿”字,但一般不单说,普通话说“牙”或“牙齿”。加上标志,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区别。

为了便于了解《现汉》的注释情况,把《现汉》中的注释形式很粗略地分了四个方面,简略地摆了每种方式的一些不同的情形。从这里可以大概地看出,《现汉》的注释是用了很多工夫的,摸索了一些形式,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当然,这些工作还是初步的,存在的问题不少。有的地方互训或拆字注释使用不当,有的定义或说明不够明确,括注用得不统一。总之,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不少。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有工作安排上的,也有词典编辑理论上的。词典工作参加的人多,改动次数多,相关条目照顾不够,容易出现不一致。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词典编辑理论的研究不够,注释中不少问题还没有在理论上得到解决。如何注释词义,缺少理论指导,只能零敲碎打,一个一个地去对付,没有系统性。这样,自然就会出现不一致。

基于以上原因,加强词典编辑理论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目前,还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大幅度提高词典质量是难以实现的。

附 注

①引的例子,没有特别指明出处的,都是根据《现汉》1978年本。为了节省篇幅,有些例子没引全。

论释义的科学性*

孙德宣

语文词典释义的科学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正确,即注释准确无误。一是完整,即注释完备,不漏掉重要义项。

综合性的语文词典,顾名思义是备人查考一般语词的工具书,在注音、释义、举例各方面都要起规范的作用。而释义的正确与否,尤其是衡量词典优劣的重要标志。

所谓释义正确,又包括两方面。一是观点正确,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词典的编写工作,注释词义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是概念准确,符合客观实际和语言规律。前者涉及词典的思想性问题,可以另作专题讨论,本文着重谈后者。

一 怎样做到释义正确

从语文的角度出发,要做到释义正确,我们认为要注意下列两点。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1年第3期。

1. 实事求是,勿穿凿附会

解释词义,特别是对于古代的一些词语,要从形、音、义几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既不可墨守旧注,一成不变,也不可以凭空臆测,望文生义。

例如,“人偶”这个词,本是汉代的俗语。贾谊《新书·匈奴》:“时人偶之。”《仪礼·聘礼》:“公揖,人每门,每曲揖。”郑玄注:“每门辄揖者,以相人偶为敬也。”贾公彦疏:“云以相人偶者,以人意相存偶也。”又《礼记·中庸》:“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孔颖达疏:“仁谓仁爱相亲偶也。”“人偶”也作“人兮”。扬雄《方言》卷十:“沅澧之原,凡言相怜哀谓之喷,或谓之无写,江滨谓之思,皆相见驩喜有得亡之意也。九疑湘潭之间谓之‘人兮’。”戴震《疏证》:“此言人兮,与古语所谓相存偶,义亦相近。”

章炳麟《艾如张》、《董逃歌》诗序:“宙合皆含血,生于其洲而人偶其洲,生于其国而人偶其国,人之性然也。”文中用“人偶”显然是“亲爱”或“怜惜”的意思,合乎古义。但近人《章太炎诗文选注》把章氏这段话注为:“偶,同类。四句意为:世界上到处都有人,他们生在哪个洲就在那个洲有同类。生于哪个国家,就在那个国家有同类,人们的本性就是这样。”^①注者由于误解“人偶”这个词,把四句话的意思都弄拧了。词典里如果这样解释“人偶”,那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太大了。

用现代的话解释古代词语,得花点儿力气,仔细推敲,才能注准确。要了解古代的词语,不能不参考前人的注释,但前人的注释有的是过于简略,有的是异说纷纭,叫人捉摸不定。

例如“重足而立”,见于《汉书·汲黯传》:“令天下重足而立,仄

目而视矣。”颜师古注：“重累其足，言惧甚也。”颜氏所谓“重累其足”是什么意思？请看下列几种词典“重足而立”、“重足”的注解。

【重足而立，侧目而视】重足：一只脚踩着另一只脚，不敢迈步。……（《汉语成语小词典》^②）

【重足而立，侧目而视】重足：双脚并拢，不敢移动。并拢脚站着，不敢前进，……（《汉语成语词典》^③）

【重足而立】后脚紧挨着前脚，不敢迈步。形容非常恐惧。（《现代汉语词典》^④，以下简称《现汉》）

【重足】迭足而立，不敢前进，形容非常恐惧的样子。……（《辞海》^⑤）

其中《辞海》的条目是“重足”，注的却是“重足而立”。《现汉》对于“重足而立”的注释也不一定好，编者的想法不妨谈谈。当时编写这一条的时候，参考了有关的资料，同时也注意到古代还有“累足”的说法。《诗·小雅·正月》：“谓地盖厚，不敢不踏。”《毛传》：“踏，累足也。”《说文解字》：“踏，小步也。”段玉裁注：“累足者，小步之至也。”按“累”不仅指上下重叠，也可以指两个个体前后紧挨着。《晋书·阮籍传附阮咸传》：“咸闻之，遽借客马追婢，既及，与婢累骑而还。”“累骑”指阮咸和婢女同骑一匹马，两个人在同一匹马上前后挨着骑。把“重足”的颜师古注和《毛传》《说文》“踏”字注联系起来看，可以说“重足”就是“累足”，也就是段氏所谓“小步之至”，也就是后脚紧挨着前脚。在极端恐怖的情况下，浑身打哆嗦，如果叠足而立的话，就得把全身的重量集中到一只脚上。这样，哪怕站一会儿也是不行的。因此，我们把“重足而立”解释为“后脚紧挨着前脚，不敢迈步。”这样注释是不是穿凿，请读者评论。

也有些古代词语，前人虽有注释，但是可靠性成问题。现在举

“望洋”为例。

“望洋”始见于《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经典释文》作“眈洋”，注云：“眈，莫刚反。又音旁，又音望。本亦作‘望’，洋音羊。”又云：“司马、崔云：‘眈洋犹望羊，仰视貌。’”伪《孔子家语·辩乐解》：“旷如望羊。”注：“望羊，远视也。”字亦作“望阳”、“望佯”。《论衡·骨相》：“武王望阳。”《释名·释姿容》：“望佯，佯，阳也，言阳气在上，举头高，似望之然也。”刘熙《释名》用声训法，以“望佯”之“佯”为指阳气，纯属臆测。郭庆藩《庄子集释》纠缠于字形，以“望洋”、“望羊”之“洋”、“羊”为假借字，谓正字当作“阳”，指太阳，“望洋”是“言望视太阳也”，说亦迂曲难通。

按“望洋”的“望”微母字，明微古声类同，故“望洋”亦可作“茫洋”。柳宗元《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⑥”。又孙樵《骂僮志》：“忽怵乎若病醉之未醒，茫洋若痴人之瞑行^⑦。”从“望洋”有“眈洋”、“望羊”、“望阳”、“茫洋”等写法看来，可以证明它是一个不可分解的复音词，等于一个语素。从各家的用例看来，它有“视觉模糊”或“迷茫”的意思，如言“武王望阳”、“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又有“茫然（茫然自失）”的意思，如言“茫洋若痴人之瞑行”、“望洋向若而叹曰。”

词典编者对于某些词语传统的注释，在没有定论之前，有时要采取过而存之的态度（如释“望洋”为“仰视貌”）。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解释，宁可暂时存疑，不注录在词典里。

《现汉》没有单收“望洋”，收了“望洋兴叹”条，它是这样注释的：

本义指在伟大的事物面前感叹自己的藐小，今多比喻要

做一件事而力量不够,感到无可奈何。

这里不引《庄子·秋水》篇,对“望洋”未做具体解释。如果读者理解为“望着海洋”,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注文说“本义指在伟大的事物面前”,同时“望洋兴叹”跟“仰屋兴叹”格式相同,也很容易联想在一起。再说一个成语用起来以后,也许会产生跟原义毫不相干或截然相反的意思。例如“难兄难弟(nánxiōng-nándì)”,原先用来形容兄弟都非常好,现在多反用,讥讽两人同样坏。“甚嚣尘上”原来是“甚嚣,且尘上矣”^⑧,意思是敌军喧哗纷乱得很利害,而且尘土也飞扬起来了,后来用“甚嚣尘上”形容对传闻之事议论纷纷。现在多指反动言论十分嚣张。“大而化之”见于《孟子·尽心下》:“大而化之之谓圣”,现在常用来形容人大大咧咧、马马虎虎。例如:

王二爸平时大而化之,经常把草帽抓错,因此王二娘在王二爸的帽带上,特别用红线挑了个“王”字,以作记号。^⑨

就不但全家人奇怪,就是西门博士也奇怪,就凭他这大而化之的一位太太,在一月之间哪里去弄一笔外汇?^⑩

由此看来,现在有人把“望洋兴叹”理解为“望着海洋兴叹”,是无可非议了。但是请注意,词典里“望洋兴叹”条注释中如果引了《庄子》“望洋向若而叹曰”这句话,把它解释为“望着海洋兴叹”,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庄子》原文说:“顺流而东行,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是说河伯向东看大海,望不到边,才回过脸来向海神兴叹,不是望着海兴叹。而尤其重要的是“洋”字,因为海洋的意思起源很晚。《说文解字》:“洋,水,出齐临朐高山,东北入钜定(大徐音似羊切)。此“洋水”为河流名。叠字“洋洋”有“盛大”、“广大”等义。《诗·卫风·硕人》:

“河水洋洋。”《毛传》：“洋洋，盛大也。”又《诗·陈风·衡门》：“泌之洋洋，可以乐饥。”《毛传》：“洋洋，广大也。”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初，注《庄子》者数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卒。”向秀为魏晋间竹林七贤之一。《秋水》篇的撰述，即使不在先秦，至迟也在魏晋之前无疑。萧统《文选》载木华《海赋》，通篇没有出现海洋的“洋”字。《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洋”字第二义：“海洋（后起意义）。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黑水～，即北海～也。’^①”“洋”的海洋义，是否还有更早的例证，待考。总之，《庄子》的“望洋”肯定是不能解释为“望着海洋”的。

2. 核对原书，勿轻信间接资料

词典所依据的资料，种类繁多，往往瑕瑜互见，纯驳不一。其直接采自原书，制成卡片者，曰直接资料或第一手资料。其采自字书、韵书、词典等，剪贴制卡者，曰间接资料或第二手资料。编者必须善于鉴别真伪，去粗取精。有关人物、地名、数据、典章、史事、书证等项，必须精心核对，勿轻信辗转传抄的第二手资料。引书要注明篇章卷数，以便检查。《国语辞典》引《史记》、《汉书》，但云“见《史记》”、“见《汉书》”，不足为训。

词典中的注释，往往由于不严格核对原书，造成谬误。例如旧《辞源》“皮里阳秋”条注为：

晋褚裒，字季野。桓彝目之曰：“季野，皮里阳秋”，言其无所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晋简文后讳春，故晋人谓春秋为阳秋。

另有“阳秋”条，注为：

晋简文帝郑后讳阿春，故谓春秋为阳秋，如孙盛《晋春秋》曰《晋阳秋》，桓彝谓褚裒皮里阳秋是也。

按《晋书》卷三十二《后妃传》下,明明记载简文帝的母亲(称简文宣郑太后)讳阿春,非简文帝郑后讳阿春。自从旧《辞源》搞错以后,旧《辞海》的“阳秋”条,解放后编的《辞海》(未定稿)和《汉语成语词典》的“皮里阳秋”条的注释都沿袭旧《辞源》的错误。

《现汉》(试用本)“皮里阳秋”条注云:“‘阳秋’即‘春秋’,晋朝避皇后讳改称……”,亦不确。简文帝母郑氏生时为元帝夫人,帝崩,始称建平国夫人。死后,在明穆皇后时,追号为会稽太妃。孝武帝太玄十九年上尊号为简文太后。1978年出版的《现汉》才改注为“‘阳秋’即‘春秋’,晋简文帝(司马昱)母郑后名阿春,避讳‘春’字改称。……”1979年出版的《辞海》“皮里春秋”条也改正了旧《辞海》“阳秋”条注释的错误。从1915年出版的《辞源》到1978年出版的《现汉》,前后相隔63年,这个小小的错误才得到纠正。

又如“八斗才”这个典故,旧《辞源》、《辞海》都引“《南史·谢灵运传》:灵运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实则《南史·谢灵运传》并无此记载,新出版的《辞源》、《辞海》改引宋无名氏《释常谈》为是。

二 《现汉》释义不确举例

从词典的正确性来看,《现汉》的注释还有不少问题。为总结经验教训起见,除略举尚未改正的释义以外,也兼举在编写中有争议的或已经改正的释义为例,分项说明如下。

1. 注释与事实不符

【长安】汉朝和唐朝的都城,在今陕西西安西北。

按 西汉建都长安,东汉迁都洛阳。汉唐长安故城,据考古学家调查,不在今陕西西安西北。应改为:西汉、隋、唐等朝的都城,在今陕西西安一带。

泾 ①泾河,发源于甘肃,……

按 泾河发源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山东麓,“甘肃”应改为“宁夏”。

【俳句】日本的一种短诗,以十七字为一首。

按 俳句不是十七字为一首,应改为“以十七个音为一首。”

2. 本书注释自相矛盾

【频率】物体每秒振动的次数,单位是赫兹。例如人能听到的声音的频率是从16—20,000赫兹,……

【声波】能引起听觉的振动波,频率在20—20,000赫兹之间,……

按 “频率”条的16应改为20。

【棍棒】①棍子和棒(总称,武术器械)。

棒①棍子:木~|炭精~。

【棒子】①棍子。

【棍子】用树枝、竹子截成,或用金属制成的圆长条。

按 从“棒”、“棒子”、“棍子”的注释看来,三者本无区别,但“棍棒”的注释却是“棍子和棒”,自相矛盾。

【数典忘祖】春秋时晋国的籍谈出使周朝,他回答周王的问题时没有答好,事后周王讽刺他‘数典而忘其祖’,意思是籍谈说起国家的礼制掌故来,把自己祖先的职守(掌管国家的史册)都忘掉了(见于《左传》昭公十五年)。后来就拿数典忘祖比喻忘本^⑩。

按 本条注释最后一句,粗看问题不大,可是一查《现汉》,“忘本”条是这样注的:“境遇变好后忘掉自己原来的情况和所以能够得到幸福的根源。”这个注释显得窄了些,完全是现代意义的“忘本”,与籍谈“数典忘祖”的“忘本”毫不相干。因此,1978年出版的《现汉》把“数典忘祖”条注释的最后一句改为:“后来就用数典忘祖比喻忘掉自己本来的情况或事物的本源。”“忘本”条也应该酌量改注。

3. 注文跟词性不符合

【惨淡】②在困难的境况中艰苦地进行:~经营。

按 “惨淡”②注成了动词,拟改为:“形容(筹划、构思等)艰苦:~经营。”或“形容苦费心力的样子:~经营。”

【机灵】聪明伶俐,有机智。

按 应删“有”字。

4. 注释不周延

【明星】②旧时称有名的电影演员或交际场中有名的女子:电影~|交际~。

按 应改为:“称有名的电影演员、运动员等,旧时也称交际场中有名的女子:电影~|足球~|交际~。”

5. 注释阑入词外之义

【矫枉过正】纠正偏差做得过了分。

按 这一条的注释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现汉》在1976年三结合修订过程中,有人根据毛主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⑧这句话,在本条注末硬要加上一句:“马列主义者认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注文已经说明了矫枉过正的含义,至于矫枉是不是必须过正,那是另一码事。再

说,两千年前董仲舒也说过“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⑨,注文加上增补的话,反而成问题。

【居安思危】处在平安的环境中,要想到可能会出现困难危险。

按 注释中的“要”字是多余的。全注应改为:“处在平安的环境而想到会出现的困难危险。”

6. 应分立义项或词条

【妄想】狂妄地打算;不能实现的打算。

按 动词、名词两个用法,应分立义项。

【远志】①远大的志向。②多年生草本植物,……

按 应分立为两个条目。

三 怎样做到释义完整

1. 广积资料,不断补充

词典注释要完备无遗,必须有丰富的词汇资料。世界著名的词典如《牛津英语大词典》、《韦氏英语大词典》、《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以及正在编写的《法语宝库》都是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然后进行编写的。《现汉》在编写前收集的资料不过百余万张卡片,其中还有一小部分是剪贴的各种字典、词典等第二手资料。有些词语仅有寥寥几张卡片,给后来的注释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的发展,一切事物在变化,新词新义层出不穷。词典编者必须随时补充新的资料。新旧资料可以互相对比,互相印证补充。例如“风情”这个词本来有“风采”、“意趣”、“男女相爱的感情”及“关于风向、风力的情况”等义,近年来报刊上

常出现“港澳风情”、“欧陆风情”等说法,指的是风土人情。词典里还没有收入此义。又如“青皮”这个词,《现汉》注为“〈方〉无赖:~流氓|~光棍。”最近报纸上报道:“海南岛上一条二十五公里长、四百米宽的青皮林带,最近被划为自然保护区。青皮学名油楠,又称青梅,是热带龙脑香科具有代表性的树种之一。木材坚硬沉重,百年不腐,是造船、造桥、建筑、制作家具的优良用材”^⑤。作为树名的青皮,也见于《中国树木分类学》、《简明林业词典》等书,《现汉》没有收。它跟作“无赖”讲的“青皮”同形同音,意义上没有联系,将来是否收入《现汉》,要参考有关资料再做决定。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随时补充资料、丰富词汇、词义的重要性。

2. 初稿、审稿、定稿并重

《现汉》的凡例:“分析意义以现代汉语为标准,不详列古义。”《现汉》不同于《辞源》等词典,不应该要求它详列古义;如果较多地漏收了现代广泛使用的词义,那就不能不说是缺憾了。

有些条目《现汉》漏收了词义,倒不是由于资料中缺少某个词义的用例,而是由于初稿编者疏忽,忙于赶任务或相互间协作不够造成的。初稿编者大多是要翻查原资料的。但后来审稿的人任务紧迫,往往只能看初稿,很少有时间逐条核对原资料,因而缺乏感性认识,不易发现漏洞。所以许多条目虽然历经审订,有的义项终告阙如。可见词典每个条目的编写,初稿是关键,不可等闲视之。初稿义项一漏,补也难。编初稿的人和审稿定稿的人要互相协作,都要一丝不苟,拿出浑身解数,如狮子搏兔,须用全力,不可各自为政,畸轻畸重。

四 《现汉》漏收词义举例

【残余】在消灭或淘汰的过程中剩下来的人或事物、思想意识等：封建～|剥削阶级思想～。

按“残余”有谓词用法，应补义项：“余留；遗留：有些干部还～着一些官僚主义，办事疲塌不力。”

【惨变】悲惨的变故。

按“惨变”有谓词用法，应补义项：“（脸色）因惊慌、悲痛、病患等情况而有异常的改变。”

【沉陷】地面或建筑物的基础陷下去。

按 应补义项：“比喻深深地进入某种境界或思想活动中：他～在无涯际的痛苦里。”

【抖擞】dǒusǒu 振作：精神～|～精神。

按 应补另条：“**【抖擞】**dǒu·sou ①振动；抖动②：群雁在霞光中～着翅膀，从草地上飞起|～掉棉衣上的雪。②〈方〉摆威风：瞧吧，看他还能～几天！”

【对口】①相声、山歌等的一种表演方式，两个人交替着说或唱：～相声|～山歌。②（～儿）互相联系的两方在工作内容和性质上相一致：工作～|专业～。

按应补另条：“[对口]² 适合口味：他吃这个菜不～。”

【跟随】跟②：他从小就～着爸爸在山里打猎。

按 应补名词义：“旧指跟随人员。”

【诡譎】〈书〉①奇异多变。②离奇古怪：言语～。

按 应补义项：“狡猾：～的心计。”

【过时】过去流行现在已经不流行；陈旧不合时宜：他穿着一件～的长袍。

按 应补义项：“过了规定的时间：～不候。”

【机心】〈书〉诡诈的心思。

按 应补另条：“[机心]² 钟表内部的构件：统一～。”

【流气】流氓习气。

按 应补义项：“轻浮不正派：举止～|这个人很～。”

【烙印】在牲畜或器物上烫的火印，作为标记，多比喻不易磨灭的痕迹：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

按 应补动词义项：“用火烧铁在牲畜或器物上烫成痕迹，比喻深刻地留下印象：这些艺术形象将～在小观众的心头，长时期起着教育作用。”

【飘荡】在空中随风摆动或在水面上随波浮动：红旗迎风～|小船在水中～。

按 应补义项：“漂泊：弃家避难，四处～”。

【稳当】慎重妥当：办事～。

按 应补义项：“稳固①：把梯子放～。”

【凶险】（情势）危险可怕：病情～。

按 应补义项：“凶恶阴险：～的敌人。”原注“情势”后补：“、地形”，并补例：“地势～”。

【油皮】〈方〉（～儿）皮肤的最外层：擦破一块～。

按 应补另条：“[油皮]²〈方〉（～儿）豆腐皮①”。

【嘴尖】说话刻薄。

按 应补义项：“指品尝食物味觉灵敏；吃东西爱挑剔，不将

就：这孩子～，不合口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吃。”

语文词典释义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以上仅就释义的科学性方面阐述了个人粗浅的看法，其实也是老生常谈。《现汉》释义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同义词互训就没有解决好，须有另文讨论。文中所谈注释疏漏舛误之处仅系举例性质，作者借此抛砖引玉，希望广大读者多给《现汉》提意见，指正缺失，以便这部词典能够继续修订，提高质量。

附 注

- ① 《章太炎诗文选注》上册，3页，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② 《汉语成语小词典》（第三次修订本），1972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 ③ 《汉语成语词典》甘肃师大中文系编，197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 ④ 《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197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 ⑤ 《辞海》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 ⑥ 《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三十一，涵芬楼景印元刊本。
- ⑦ 《孙樵集》卷十，涵芬楼景印明刊本。
- ⑧ 《左传》成公十六年。
- ⑨ 1973年8月12日《四川日报》三版。
- ⑩ 《魍魉世界》下，682页。
- ⑪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1979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 ⑫ 《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197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 ⑬ 《毛泽东选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⑭ 《春秋繁露》卷一《玉杯》篇，商务印书馆缩印武英殿聚珍版本。
- ⑮ 1981年2月14日《光明日报》一版。

训诂研究与《现代汉语词典》

词语释义的精进

韩敬体

在一个字典出版座谈会上，一位多年从事训诂研究近年又编写了几部词典的语文学者，深有体会地说，研究训诂和编写词典完全可以相得益彰，编写词典要解决的有许多是纯粹训诂研究理解不到的东西。我们知道，词典、字典编纂与训诂研究是相通的，我国古代，辞书学或词典学还没有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人们一般是把辞书编纂和古书注疏一样看作传统的训诂工作。字书、辞书都是训诂方面的著作，我国古代辞书的最早的代表作《尔雅》、《说文解字》正是我国训诂学的基石和经典著作。现在辞书学或词典学尽管已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但它与现代的词义研究及传统的训诂学关系仍然是密不可分的，词汇研究和训诂研究成果是词典编纂的基础，也是检验词典释义的标准；而词典编纂则是词汇研究和训诂研究成果的集萃和概括。我们现代要编纂古代汉语辞书，固然与训诂和训诂学研究息息相关，就是编纂现代汉语语文辞书，也离不开训诂和训诂学研究。有一篇题为《现代汉语辞书呼唤训诂学》的文章说得好：“现代汉语辞书无论是单字、复词还是词组，都有可能涉及训诂问题，辞书编纂者和使用者在各条目有关古字义、词义、

语义的训释中,有关沿用古词语结构、用法以及所蕴含的古代历史文化内容中需要接触并呼唤训诂学。”^①训诂学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辞书编纂者准确、透彻地注释词语的意义,有助于将辞书的释义处理得更为完善。如果没有训诂研究方面的深厚基础,要编好语文辞书是难以想像的。

《现代汉语词典》是1956年2月国务院指令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其宗旨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它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一部规范性语文词典,自1978年正式出版以来,已发行四千多万册,而且在韩国、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还有当地的版本发行,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这部词典对词义的处理受到人们的称道。这部词典的成功也正是与其两位主编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以及词典的审定委员们的训诂研究的功力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吕叔湘先生主要是从事语法研究的,但他十分重视语法中的训诂研究。他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释“勿”“毋”》,就是训诂方面的力作,后来还写了《近代汉语指代词》、《文言虚字》等著作,既是语法研究,也包含有训诂研究。丁声树先生,解放前是一直注重并从事训诂研究的,后来又进行语法研究、音韵研究和方言研究。他发表的论文《释否定词“弗”“不”》、《诗经“式”字说》、《诗卷耳芼苜“采采”说》、《论诗经中的“何”“曷”“胡”》、《“何当”解》、《“早晚”与“何当”》等等都是训诂研究的重要著作,在上世纪我国训诂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在《现汉》试印本的十五位审定委员中,除了两位主编外,陆宗达先生、周祖谟先生是著名的训诂和词汇研究的专家,在我国训诂学界占有重要地位。王力先生、魏建功先生、黎锦熙先生、陆志韦

先生、李荣先生、周定一先生等都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在训诂或词汇学研究中做出了突出成就。

由于《现汉》两位主编和其他审定委员在训诂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对词汇有深入的研究,能够吸收传统的训诂研究成果,借鉴训诂研究的方法,研判一些词语训释的得失,所以在对词典词语释义的分析、考证和处理上处处表现出大家的风范。在不少词语的释义上精益求精,力求准确、周到,不少含有文言语素或语言成分的词语,不仅得到了精确解释,而且对于其古义或来源加以特别注明,以便于对现代语义和用法的透彻理解或准确把握。在词语释义的许多方面,比起以往的辞书都有所继承,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一、为了确切地释义,创造性地使用括注形式。括注有在释义前面的,有在释义后面的,也有在释义中间的。比如,在释义前面,指出词语适用的对象或范围:

[铺叙](文章)详细地叙述。(为节省篇幅,引例只限于词目及其释义,注音、例句等略。下同)

[出轨](火车、有轨电车等)行驶时脱离轨道。

[提前](把预定的时间)往前移。

[提纲](写作、发言、学习、研究、讨论等)内容的要点。

在释义后面,指出词语适用的对象、搭配的词语或补充说明词义:

[铺设]①铺(铁轨、管线):修(铁路)。

[灰蒙蒙]形容暗淡模糊(多指景色)。

[肖像]以某一个人为主体的画像或照片(多指没有风景陪衬的大幅相片)。

在释义中间,表示举例、说明或注释释义中的词语:

[回收]①把物品(多指废品或旧货)收回利用。

[打诨]戏曲演出时,演员(多是丑角)即兴说些可笑的话逗乐,叫做打诨。

括注还有的指出词语的感情色彩,如“含敬意”“含喜爱意”“含厌恶意”“含轻视意”“含讥讽意”等等。有的说明词语的修辞色彩,如指出词语是“夸张说法”“多用于比喻”等等。有的指出词语的文体色彩,如指出词语“多用于书信”“多见于翻译作品”“多见于早期白话”等等。

二、反映语言实际情况,设置“注意”栏目,阐释词语的语用变化和与有关词语的关系。比如:在“对”下设“注意”简略地比较“对”与“对于”的用法,在“得”的前三个义项下设“注意”指出其否定式,在“不”下设“注意”说明在语用中的语音变化和“有”的否定式。

三、词语释义处理的层次性。比如,可以用于比喻的意义,在“用于比喻”前面加“一般、常、多”等,表现出用法的不同情况;在义项安排上,有的比喻义同本义放在一个义项中,有的分立为不同义项;有的出本义,有的不出本义;有的注出比喻意义;有的只说“用于比喻”或“多用于比喻”,不注出比喻意义;也有的只是举出比喻性用例,前面加菱形号(◇)标示,不注出比喻意义。再如,词语释义后面用括注说明“贬义”色彩的,也有“贬义”“含贬义”“多含贬义”“用于贬义”“多用于贬义”的不同。这些不同用语正是显示出词语意义的层级变化。有助于读者对词语意义细微差别的理解。

四、对词语中文言成分特别注明,以加深读者对词义的理解。比如:

[寻常]平常(古代八尺为‘寻’,倍寻为‘常’,寻和常都是

平常的长度)。

[不速之客] 指没有邀请而自己来的客人(速:邀请)。

[故步自封] 比喻安于现状,不求进步(故步:走老步子;封:限制住)。

[杀人越货] 杀害人的性命,抢夺人的财物(越:抢夺)。指盗匪的行为。

[推襟送抱] 比喻推诚相见(襟抱:指心意)。

五、对前人解说进行正确选择,给词义以明确解释。比如:

睢,注“用于古人名,如范睢、唐睢,都是战国时人。”此条释义特别举出古人范睢、唐睢,并说明他们生活的时代,这是因为范睢,在史书中曾被误写作范雎,清代学者已经将这种误写进行考证,辨清正误。但有的人,甚至现在新出版的词典,仍然沿用从前的误写。《现汉》在“睢”的注文中的举例是有正误的用意的。

[脱颖而出],这个成语中的“颖”字,历来有不同的理解。《辞源》“颖”、“颖脱”下都注出指“锥芒”;《辞海》“颖”下注“尖端。如:脱颖而出”;《新华词典》“脱颖而出”下注“颖:细而尖的东西”,而在“颖”下注“锥子杆儿前端固定针的金属环。也指某些小而细长东西尖端。(例)脱~而出|短~羊毫。”从上下文看,“脱颖而出”中的“颖”也可能是指金属环,但这与同书的“脱颖而出”条注是不同的。如就成语出处原文的意思看,“颖”的意义值得讨论。《史记·平原君列传》:“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文中有两个“末”字,意思是尖端,无可争议。但是就最后的“非特其末见而已”文义上看,应该是更推进一层,才说得通。不然的话,语义重复,又欠通顺。比较起来,《史

记》索隐所引的汉代郑玄注“颖，环也”即固定锥子把上套的环，意为“连锥子上部的环儿也会露出来，岂止光露出个尖儿来！”《现汉》斟酌各类注法，选择将“颖”注成金属环的注法是较为恰当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也采用了这一种释义。

[鞭长莫及]，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原文为“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过去人们对原文的理解就有不同，从前出版的成语词典有的把原文理解为“虽然鞭子很长，也打不到马的肚子上”。这种理解不合情理，鞭子长了为什么就打不到马的肚子上呢？又为什么要用鞭子打马肚子呢？看来晋代杜预注“言非所击”，还比较有道理。《现汉》采用了这种说法，注为“原来是说虽然鞭子长，但是不应该打到马肚子上，后来借指力量达不到”。

[重足而立]，此语见于《汉书·汲黯传》，颜师古注：“重累其足，言惧甚也。”其中的“重累其足”各家辞书理解不同。《辞海》、《辞源》都收“重足”条，释义大致相同，前者注为“迭足而立，不敢前进”、后者注为“叠足而立，言惧甚不敢稍移动”；《汉语成语小词典》（北大中文系编）注为“一只脚踩着另一只脚，不敢迈步”；《汉语成语词典》（甘肃师大中文系编）注为“双脚并拢，不敢移动”。《诗·小雅·正月》：“不敢不蹠。”《毛传》：“蹠，小步也。”《说文解字》：“蹠，小步也”段玉裁谓“累足者，小步之至也。”把“重足”、“累足”、“小步之至”联系起来，《现汉》注为“后脚紧挨着前脚，不敢迈步”，应该更合乎实际一些。不然，人非常恐惧的时候，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上，大概是不容易站立的。

六、对一些不正确解说予以廓清，进行纠错正误、匡谬正俗。
比如：

[螟蛉]，《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蜾蠃常

捕捉螟蛉存放在窝里,把卵产在它们身体里,卵孵化后就拿螟蛉作食物。古人误认为蜾蠃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因此用“螟蛉”比喻义子。古代注释都误认为蜾蠃喂养螟蛉为子,《国语辞典》也只是注“古人谓蜾蠃养螟蛉为己子”,没有指出古人误认的实际情况。《现汉》明确地注出古人误认的具体情况。

[娘子军],1979年版以前的《辞海》及其《语词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2月出版)注释为:“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曾组织妇女成军,帮助高祖作战。《新唐书·诸公主列传》:‘主(平阳公主)引精兵万人与秦王会渭北。绍(柴绍,平阳公主丈夫)及主对置幕府,分定京师,号称娘子军。’后因泛称由妇女组成的队伍为娘子军。”当时和以前的一些辞书,也有这样释义的。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根据历史记载隋末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建立的数万军队并不是由妇女组成的,那时所以称“娘子军”并不是像现在指的是“组织妇女成军”,而是指由女子率领的军队。其二当时称“娘子军”时,李渊和李世民刚起兵反隋,李渊还没称帝,更没有他死后才有的庙号唐高祖,自然,他的女儿也不可能有平阳公主的称号。所以《现汉》“娘子军”的释义改作“隋末李渊的女儿统率的军队号称娘子军,后用来泛称由女子组成的队伍。”这样才完全符合了“娘子军”源流的实际情况。

[昙花]、[昙花一现],现在我们见到的昙花,夜间开花,数小时即凋谢,正好与“昙花一现”相吻合,有的词典就简单地附会解说,使读者产生误解。其实“昙花一现”中的“昙花”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昙花。这个成语起源较早,唐代前已经通过翻译佛经产生了。成语中所说的昙花原是佛经中优昙钵花的简称,它还简称为优昙。《现汉》为避免读者的误解,在释义后加上了括注。

[望洋兴叹],这条成语中的“望洋”二字,现在一般人会像对“望文生义”、“望子成龙”中的“望文”、“望子”一样,看成动宾结构,理解为“望着海洋”,而且根据这个成语又仿造出“望天兴叹”、“望江兴叹”、“望书兴叹”之类的四字格。其实“望洋兴叹”语出于《庄子·秋水篇》,其中的“望洋”只是个联绵词,不是动宾词组,在古书中它还可以写成“望阳”、“望羊”等形式;“洋”字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海洋”的意思。《现汉》尽管没有引证出处,还是在这条成语的释义后加上了一个括注,注明“望洋:抬头向上看的样子”,这对于纠正一些人的误解,防止望文生义应该是有益的。

[不毛之地],以往有的词典收词条“不毛”,注为“不生长草木五谷”,有的收“不毛之地”,注为“不长草木的地方”。实际上,根据历史典籍中的用法(如诸葛亮《出师表》“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只是说那里极为荒僻,没有人烟,并不是说那里就不长草木,相反,那里可能草木长得十分繁茂。所以,《现汉》注为“不长庄稼的地方”。

还有相当数量的从文言传承下来的词、熟语、成语,以往的注家或辞书或者众说纷纭,或者谬说流行,相沿成习。《现汉》对前人的解说,尊重而不盲从,必定严加考订,择善而从。对一些有问题的说法,不仅不拘泥成说,而且还十分注重对其失误的匡正。对一些易被流俗讹误的音义给以特别注明,加以纠正。

[中山狼],以往的辞书都把出处引为宋代谢良的《中山狼传》,丁声树先生查遍有关的古籍,找不到他们所注语源的根据,于是,《现汉》就改变其出处所在,注出人们最易见到的出处明代马中锡的《东田集·中山狼传》。

[皮里阳秋],这条成语中的“阳秋”原为“春秋”,东晋时是为避

一位名叫郑阿春的皇帝生母讳而把“春秋”改为“阳秋”的。旧时一些影响较大的词典,如《国语辞典》、1979年以前的《辞海》及其《语词分册》和旧时的《辞源》,所收的“阳秋”、“皮里春秋”都疏于考证,以讹传讹地把郑阿春误作晋简文帝的皇后,实际上郑阿春是简文帝的母亲,生前并没有皇后的名分,死后曾被追号为太妃,直到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才被上尊号简文太后。

此外,“匱”字的音义,以往的词典都以《康熙字典》为圭臬,依照它处理。丁声树先生详加考订,写出了《说“匱”字音》一文,《现汉》则做了全新的处理。他如“叶公好龙”中的“叶”字,以往的辞书多注音读为 shè,[大乘]、[小乘]、[上乘]、[下乘]中“乘”字,以往辞书多注音读为 shèng,丁声树先生都下了一番考证功夫,确定了它们的读音。

以上所举仅仅是《现汉》精心考证资料,准确注释词义,对现有辞书释义或流行说法匡谬正俗的点滴例证,这样的情况还可以举出很多。正像李荣先生所说的:《现汉》“突破了前人用文言释白话的框框,意义分析周到妥帖,虚字用法提要勾玄,可以说是训诂学上的一项成就。”^②正像《现代汉语辞书呼唤训诂学》一文所说:“实践证明,提高现代汉语语文辞书的质量,训诂学起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③

附 注

①③ 祝鸿熹《现代汉语辞书呼唤训诂学》,《辞书研究》1998年第6期。

② 李荣《丁声树先生》,《中国语文》1989年第4期。

谈语文词典的释义*

吴崇康

近年来,由于“四人帮”的鼓吹,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因此,在词典工作中,也出现一些奇谈怪论。有些人否认语言里绝大多数的词和语都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个客观事实,认为语言里根本不存在中性的语词,所有的语词都是含有“政治内容和阶级实质”的。从这个荒谬的观点出发,他们鼓吹注释词义必须贯彻“阶级分析方法”。在这种谬论的影响下,词典的注释,不是像列宁所要求的那样做到“简明”,而是变成了写政论文章,不论对什么样的语词,统统都要做一番牵强附会的“阶级分析”,发一通不伦不类的议论。比如注释“英雄”一词,要说明各阶级都有自己的英雄标准,资产阶级英雄是什么样的,无产阶级英雄又是什么样的,等等;注释“刑场”,要说明既是处决犯人的地方,也是革命者就义的地方;注释“犯人”,还要分别说明什么阶级把什么人当成犯人,等等。如果不这样做,就要被指责为“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或者是犯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错误。词典就不能出版。

这些谬论,一度很时兴。据说只要按照这个“理论”去做,就能彻底打破“封、资、修词典的旧框框”,编出“新型的社会主义的词

* 这篇文章曾发表在《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典”。然而,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所谓最新的词典理论根本行不通。原因就在于这种理论是直接违反语言客观实际的。

大家知道,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词汇,其中绝大多数的词和语以及它们的含义,对社会各阶级来说都是共同的,也是没有阶级性的。虽然斯大林曾经指出:“阶级影响到语言,并且把自己专门的词和语加进语言中去,有时也对同一个词和语有不同的理解。这是不用怀疑的”,但是,斯大林接着就指出:“这种专门的词和语,正如语义上的差别一样,在语言中是极少的,未必能占全部语言材料的百分之一。”^①然而,有些人却硬要词典去对绝大多数没有阶级含义的语词做什么“阶级分析”,这又怎能不到处碰壁呢?

我们认为,要做好语文词典的释义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语言事实,一切从语言的客观实际出发。这就是要充分占有语言资料,从其中分析、概括语词本身存在的客观含义,并用简明的语言把它准确地注释出来。除此之外,还要不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说,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没有阶级性的基本观点出发的。

列宁说:“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②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语词的含义是概括的含义,它指的是普遍的东西,而不是特殊的、个别的东·西。比如“英雄”一词,它指的是中外古今所有的英雄,而不是专指某个具体的英雄。它的概括含义是指“才能勇武过人的人”。“英雄”的这一概括含义,是为社会各阶级的人所共同理解和承认的。因此,它具有社会性,而不具有阶级性。根据语词的这种特性,词典的释义只要注明

语词的概括含义就行了,是无需再作什么“阶级分析”的。我们认为,语言里绝大多数的词和语都可以而且应该采用这种科学方法来加以注释。可以说,概括地注释语词本身存在的客观含义,是语文词典最主要最基本的注释方法。

这是不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呢?完全不是。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主义,它在论证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时候,有意歪曲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其特征是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际。而我们主张客观地注释语词本身存在的含义,是从语言的客观实际出发的,是在如实地反映语言词汇发展变化的面貌,这既谈不上歪曲语言,也谈不上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它和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语言词汇中的确存在着极少数的阶级习惯语和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理解的语词,只有注释这类语词,才需要指出它们特有的阶级含义,并给予必要的分析批判。不过,应当指出,这类语词在语言中是极少的,而且还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有些原来是阶级习惯语或同行语的语词,在语言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它们的含义往往会发生变化,变为全民语言的一般语汇。比如“来龙去脉”一词,原来是旧社会看风水的人说的行话,意思是指山形地势像龙一样连贯着,后来却变为比喻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的一般语汇了。又例如“慧眼”、“不二法门”等,原是佛教用语,后来也都变成了一般的语词。可见,确定某个语词是否是阶级习惯语,也要从语言的客观实际出发,考察它的含义是否已经有了变化。汉语里究竟哪些语词属于阶级习惯语或属于不同阶级有不同理解的,这需要 we 掌握充分的语言材料,经过认真的研究来确定它们,切不可主观随意地

扩大这类语词的范围。有人把“足下”、“令尊”、“寒舍”、“高雅”等语词都看成是这类语词,这是极不妥当的。过去,就有人把“扫荡”一词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专门用语,在释义的时候加了许多说明和批判。可是,后来《人民日报》却在“扫荡西藏叛匪”的标题中使用了这个词。最近,华国锋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使用了“扫荡”这个词。由此可见,随意把一般语词当作阶级习惯语来处理,不仅不符合语言的客观实际,而且还往往可能因此而引起严重的政治性错误。这样的例子还不是很个别的,是值得词典工作者重视的。

词典的释义要重视政治思想性,这是完全应该的。我们所说的政治思想性,是指释义必须要有正确的观点。这主要是表现在注释百科性语词特别是和意识形态有关的语词上面,诸如哲学、政治、经济等的名词术语。注释这类语词,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正确的解释。例如注释“国家”一词,除了注明它的一般语文学义之外,还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指明国家的阶级实质,说明它是统治阶级施行统治的强力组织,主要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不能采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把国家说成是什么“一个民族的总和”或“政府”之类的东西。又如注释“人性”一词,就要指明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表现为人的阶级性。这样的注释,既解释了词的含义,又有正确的观点,真正做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完全应当采用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反对“四人帮”那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有的人总是牵强附会地把一般语词的含义提高到哲学的、政治的高度去批判或解释,有时又把一般语词的含义和革

命导师关于某个具体问题的论述混为一谈,以为这就是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加强释义的政治思想性。

在这种做法的影响下,比如注释“理论”一词,就不能说理论是“人们由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或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而一定要拿毛主席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理论的论述来作为“理论”的定义。又如注释“学风”,也不能说学风是指“学校的、学术界的或一般学习方面的风气”,而要把毛主席关于学风的论述拿来作为“学风”一词的解释。这种不从语词本身含义出发的错误做法,首先就失去了释义的科学性,哪里还能谈得上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我们知道,毛主席只是说什么是真正的理论,并没有说与其相反的理论不叫“理论”。毛主席在这里是在具体地论述一个问题,而不是在给“理论”一词下定义。理论可以有正确和错误的,学风也可以有好的和坏的。但作为“理论”和“学风”这两个词的含义来说,它们是包括了所有的理论和各种不同学风在内的。怎么能够拿一种理论的标准和一种学风的表现来代替“理论”和“学风”的概括含义呢?

在“四人帮”谬论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一种更为错误的做法,那就是要对“一字一词的思想内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批判,所谓要对每个语词表态。例如注释“尽善尽美”,就不能仅仅说它是“形容事物完美到没有一点儿缺点”,而必须说它的含义是反唯物辩证法的,不符合毛主席关于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教导。又例如注释“太平”一词,也不能说是指“社会平安;安宁”,而要说在阶级社会里,充满了阶级斗争,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太平,这个词的含义是在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美化反动统治,麻痹劳动人民等等。“四人帮”一伙对这类的所谓释义特别欣赏,认为这是在

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很强的政治思想性。这种所谓加强释义政治思想性的庸俗做法,我们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我们认为,词典释义所要求的政治思想性,只能表现在同哲学、政治、经济等意识形态有关的语词的注释上面,而决不能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拿来随便附会一般语词的含义。这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首先是个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四人帮”用混淆语言 and 文化的形而上学方法,还在什么是语词的阶级含义问题上制造了很大的混乱。在有些人看来,语词的阶级含义不是存在于某些语词的本身(即前面提到的阶级习惯语和少数不同阶级有不同理解的语词本身),而是通过“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出来的。例如“杀身成仁”这个成语的含义,本来是指“为正义事业而牺牲生命”,但因为林彪反党集团曾经使用过这个成语,有些人用“阶级分析方法”一分析,就说这个成语的含义变了,不能再作上述那种解释了。不然,就是在“美化”林彪,把他们所干的事也看成是“正义事业”了。这就是一些人坚持要对语词进行“阶级分析”的所谓理论根据。

我们说,这是在歪曲语言的本质。斯大林说:“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却是交际的工具,永远是全民的,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③人们的思想观点,是属于文化的范畴,而表达思想观点的语言,却不是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它是全民的交际工具。既然是全民的交际工具,语言的词汇及其含义就是为全民所共同理解和承认的,不可能因人们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不同而发生不同的变化。“杀身成仁”这个成语,资产阶级可

以用它,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它,而且都是在同一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的。至于林彪一伙能不能算得上“杀身成仁”,那是另外一回事。正如他们自称“革命”而实际上是反革命一样,并不能改变“革命”和“反革命”的原来含义。如果不是这样,无产阶级说“渺小”,资产阶级理解为“伟大”;无产阶级说“正确”,资产阶级理解为“错误”,一切语词的含义都是相反的,随时变化的,没有一个社会各阶级所共同了解的共同含义,那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不能用同一种语言来彼此交际了。把什么看成是“伟大”、“正确”,这是要由人们的阶级立场来决定的,但作为“伟大”、“正确”这两个词的含义来说,各阶级的理解却是共同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反动派用过“伟大”去形容过并不伟大的东西,就要把“伟大”的含义分析为“渺小”或其他什么别的含义,甚至在词典的释义当中为它另立一个义项。如果是这样来分析语词的所谓阶级含义,那词典还怎么能够编得下去呢?很显然,这种做法我们也是要坚决反对的。

附 注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1 年,30—31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306,303 页。

③ 同①。14—15 页。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修订举隅*

晁继周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经过修订,即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这次修订,除增收一定数量的新词外,对原有词语的释义也作了审慎的检查,对有些条目的释义作了补充或修正。

《现汉》初编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65年以“试用本”的形式印行。从那时到这次修订,已经过去了30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人们重要交际工具的汉语,主要是其中的词汇,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现汉》这次修订,经过认真的考察,把某些词语意义、用法方面的变化反映到词典中来。

另外,毋庸讳言,《现汉》的编写虽然获得很大的成功,其权威性得到社会和广大读者的认同;但它也绝非十全十美,一些词语的解释,原来就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这次修订,通过对大量语言资料的考察和重新认识,使原来释义中不完备处得到补充,不准确处得到订正。

下面分三个方面,各举若干例,谈一谈《现汉》释义修订的情况: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96年第2期。

(一) 更动义项或修正注文

“仇恨”一词,《现汉》解释为“因利害矛盾而产生的强烈憎恨”,为名词性。但“仇恨”还有动词用法,如: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毛泽东选集》)

纯朴的人们,往往仇恨汉奸超出仇恨日本鬼子。(《苦菜花》)

想起耻辱的往事,仇恨那个叫她没脸见人的朱暮堂。

(《上海的早晨》)

据此,《现汉》修订时,把“仇恨”分为动词和名词两个义项:“①因利害冲突而强烈地憎恨:热爱人民,~敌人。②因利害冲突而产生的强烈憎恨:民族的~。”

“口子¹”《现汉》分为两个义项:“①量词,指人:你们家有几~?②对人称说自己的爱人:我们那~整天很忙。”②义值得商榷。首先,②义概括不全面。“你们那口子最近忙什么呢?”“他们那口子一年到头闲不住。”可见,“口子”不仅用来“对人称说自己的爱人”,也用来称说别人的爱人。其次,②义到底该不该立?“口子”是专用于人的量词,因而有时可以代指人。“我们那口子”、“你们那口子”、“他们那口子”中的“口子”,都是指人,本身并不具有“爱人”的含义,“爱人”的意思是从特定的语境中得到的。“口子”是这样,“位”也是这样。例如:

我走啦,我们那位在楼下等着我呢,拜拜!(《虚证》)

如果为“口子”立一个“对别人称说自己的爱人”的义项,“位”不是也应该增加这样一个义项吗?这显然是不妥当的。这次修订,把“口子¹”的②义取消了。

“胴体”，《现汉补编》释为：“躯干，特指牲畜屠宰后，除去头、尾、四肢、内脏等剩下的部分。”《汉语大词典》对“胴体”的解释是：①躯干。特指家畜屠宰后的躯干部分。②借指某种机器或其他物件的主体部分。“胴体”一词这些年用得多了起来（先见于港台作品，后也见于大陆作品），但意义不同于《现汉补编》和《汉语大词典》的注释。例如：

我们所贩卖的是虚饰过的姿态和胴体，谁去注意那些设计精巧的衣服呢？（台湾《自立晚报》）

我们也可以看到女性面对男性的心情：有对本身胴体的自信夸示，有求爱的乞请……（台湾《自立晚报》）

如果林晨有意显露胴体的线条，穿紧身毛衣实在优美不过了。（《红岩》杂志）

根据词义的发展，《现汉》修订本对“胴体”一词重新作了解释：①（《现汉补编》原注）②指人的躯体。

“逗趣儿”一词《现汉》的解释是“说话或行动有趣，使人发笑”，为形容词性，实际上应为动词性。请看资料：

一个通讯员见他这样，故意逗趣说：“你神气什么？……”（《万古青春》）

刘彩琴故意这样逗趣着，他们哈哈大笑。（《金桥》）

他像小孩子似的逗着趣，小马也高兴地笑了。（《珍贵的果实》）

癞痢头手持着竹条正有一下无一下地鞭打着张举人逗着趣。（《蒋光慈诗文选集》）

以上资料表明，“逗趣”确是动词，后两例“逗着趣”显示出它是可以离合的，其动词性更为明显。《现汉》修订本改注为：逗乐打趣。

“诗情画意”《现汉》的注文是“富有诗画的意境：这里是一派田园景色，充满～。”“诗情画意”是由“诗情”和“画意”两个名词性成分组合成的体词性结构，在《现汉》所举的例句中，“诗情画意”处在宾语的位置上，其体词性是很明显的。而《现汉》的注解却是谓词性的，显然不妥。这次修订，把注文改成体词性：诗画一般的美好意境。

最后看看“执著”。《现汉》释义为：“原为佛教用语，指对某一事物坚持不放，不能超脱，后来泛指固执或拘泥。”

这里有三个问题。首先是词形，是写作“执著”，还是写作“执着”？从语言资料看，两种写法都有，但《现汉》对“执着”的写法没有照顾。其次是注音，“著”《现汉》只有 zhù 音，没有 zhuó 音（读 zhuó 时是作为“着”的异体字看待的），而“执著”又读为 zhí zhuó，这是个明显的矛盾。再次是释义，按《现汉》的解释，“执著”略带贬义，而从语言资料看，“执著”现在常用于褒义。例如（词形照原文）：

在黑暗的旧中国，纵有“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但他总是执着地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人民日报》）

他所以常写不懈，是因为他勇敢地、痛苦和执着地面对现实，极力从混乱和矛盾中去寻找和把握真理，去发现祖国的前途。（《人民文学》）

他们或是执著地追求人类美好的生活理想，或是继续从事人世间当时当属无望获胜的斗争。（《人民日报》）

根据以上情况，这次修订时对“执著”一词作了“全方位”处理。《现汉》修订本以“执著”为正条，“执着”为副条。“著”除 zhù 音外，增加了·zhe 和 zhuó 两音。“执著”的释义也作了修改，并配以例

句。修订后的注文是：“原为佛教用语，指对某一事物坚持不放，不能超脱。后来指固执或拘泥，也指坚持不懈：性格古板～|不要～于生活琐事|～地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也作执着。”

(二) 分化多义词与同音词

《现汉》首创了同音词与多义词分化的原则，把“大白¹”（白垩）与“大白²”（完全清楚），“燃点¹”（点着）与“燃点²”（物质开始燃烧时所需要的最低温度）区别开来，当作不同的词看待。此次修订，进一步贯彻这一原则，把该分化的词分化出来。考察一个语言单位是多义词还是同形同音词，主要看意义之间有没有联系。比如“通经”，原《现汉》分为两个义项：①中医指用药物、针灸等使月经通畅。②旧时指通晓儒家经典。“通经”①、②两义，既非同源关系，又无本义与引申义的联系，它们实际上是同形同音的两个词。《现汉》修订时把它们分化成了“通经¹”和“通经²”。又如《现汉》中的下面几个词条：

【偏食】 ①日偏食和月偏食的统称。②只喜欢吃某几种食物的不良习惯。

【小节】 ①指与原则无关的琐碎的事情。②音乐节拍的段落。

【展期】 ①把预定的日期往后推迟。②展览的时期。

根据同音词与多义词分化的原则，上面几个词条的①、②两个义项，都应该当作两个不同的词来看待。《现汉》修订时作了相应的处理。

(三) 完善例句

例句与释义密不可分。《现汉》的设例是成功的，绝大部分例句能够正确地体现词义，说明用法，而且简洁、自然。个别与释义

配合不当的例句这次修订时作了改动。比如“劳苦”，解释为“劳累辛苦”，例句有三个：劳苦大众、劳苦功高、不辞劳苦。其中“劳苦功高”作例是不合适的。“劳苦”一词是并列结构，而“劳苦功高”中的“劳苦”与“功高”对举，是主谓结构，义为做事勤苦，这里的“劳苦”与“劳苦”一词，从意义到结构完全不同了。因此，《现汉》修订本在“劳苦”条中删去了“劳苦功高”一例。

《现汉》成书于六七十年代，有些例句的内容不可能不受那段历史的影响。这次修订，对那些内容上有错误的或过于陈旧的例句作了修改。有的例句只是一个时期的政治口号，修订时改换成贴近生活的或内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语句。有的例句内容上虽然没有错误，但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落后于现实了，修订时也作了改动。比如“里外里”一词，《现汉》原例是：“这个月省了五块钱，爱人又多寄来十五块，里外里有二十块的富余。”这个例句明显带有50年代的特点，那时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五块、十五块、二十块钱还值得说一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不落后于时代，修订本把此例改为：“这个月省了五十块钱，爱人又多寄来五十块，里外里有一百块的富余”。再如“出手”一词，《现汉》原例是“一出手就给他两块钱”。从语气上看，是说人出手大方；但今天看来，两块钱实在拿不出手。这次修订，把“两块”改成了“两千块”。

浅谈多义词的义项划分*

吴崇康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一部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在普通话语汇中,多义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做好多义词的释义工作,对提高词典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汉》在编写过程中,通过对大量语言资料的分析比较,在义项划分方面是颇费了一番概括提炼功夫的。大家知道,多义词的不同含义是客观存在的,但要准确地揭示这些不同的含义却又是相当困难的,没有大量的语言资料,不下一番分析研究的功夫,是难以将这些不同含义通过适当的义项划分来加以揭示的。在这方面,充分占有语言资料,是保证义项划分能够做到较为完备的最重要的一环。

所谓义项,就是词义的分项。这里说的词义,包括词素义、词义、词组义;在虚词条目里,则是指语法义。我们在这里讨论多义词义项划分问题,只就现代汉语语义范围来说,不包括古代汉语的词义。

那么,多义词的义项划分,应当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察呢?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一) 考察语词的本义、引申义

一个语词,存在多个含义,主要是在语言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引申义而形成的。词义的引申,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是以一个含义为中心,引申出若干不同的含义,呈放射形。有的是由一个含义引申出另一个含义,再由这个引申出来的含义进一步引申出别的含义,呈链条形。有的时候,上述两种不同的引申方式还可能同时出现,互相交错在一起。作为词典的编者,着重点当然不是去研究词义的引申方式,而是要把这些不同引申方式引申出来的引申义通过义项划分揭示出来。

词义的引申,总是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的,或特征上相似,或性质上接近,或作用上相同,因而引申出不同的含义。例如“唱”,本义是“口中发出(乐音);依照乐律发出声音”。但在“唱名、鸡唱三遍”这类用法里,它就由唱歌的含义引申出“大声叫”的含义了。另外,唱歌得有歌曲和唱词,于是“唱”又引申出一个名词义,指歌曲或唱词,如:小唱|《穆柯寨》这出戏里,杨宗保的~儿不多。又例如“后卫”一词,原是指“军队行军时,派在后方担任掩护或警戒的部队”,后又用来指“篮球、足球等球类比赛中主要担任防御的队员”。这都是因为词义在性质、作用或特征等方面有某些相似之处而形成的。

有的语词,因为适用的对象或范围不同,因而含义也就有所不同。例如“矮”,用于人时指“身材短”;用于修饰具有高度的事物时,有“高度小的”含义,如:矮墙|矮凳;用于地位、级别时,则具有“低”的含义,如:他在学校时矮我一班。多义词的不同含义,有时要依靠具体的语言环境和上下文来加以区分。所以,在分析多义词时,必须考察语词所处的上下文和语词出现的具体语言环境。

例如“破坏”一词,在“破坏桥梁”“破坏设备”这类用法里,有“使建筑物等损坏”的含义;在“破坏名誉”“破坏家庭关系”这类用法里,是“使事物受到损害”的含义;而在“破坏协议”“破坏规章制度”这类用法里,则又是“违反”的意思。所以,应当分别建立三个义项。又如“严密”一词,出现在“瓶子盖得很严密”“这篇小说的结构很严密”这样的语言环境里,是指“事物之间结合得紧,没有空隙”的意思,出现在“消息封锁得很严密”“严密注视形势的发展”这样的语言环境里,则又是“周到;没有疏漏”的意思。再如“好”(hào),它是“喜爱”的意思,跟“恶”(wù)相对,如:好学|好动脑筋|他这个人好表现自己。但在“刚学会骑车的人好摔跤|他好感冒”这样的句子里,再把“好”作“喜爱”解就有点说不通了。刚学会骑车的人是不会喜爱摔跤的,任何人也不会喜爱感冒。再说,出现摔跤和感冒这种情况,也不是由人的感情、愿望来决定的。显然,这里的“好”,是“常容易(出现某种情况)”的含义了。

有的语词,除了本义之外,还有跟本义相联系的指代义。例如“花卉”,本义是指“花草”,但又可用来指代“以花草为题材的中国画”。又例如“便衣”,原义是指“平常人的服装(区别于军警制服)”,但又可用来指代“身着便衣执行任务的军人、警察等”。这类指代义,也应单列义项。

有些语词,有泛指和特指的区别。有的是从个别到一般,有的是从一般到个别。例如“江北”,原是指“长江下游以北的地区,就是江苏、安徽两省靠近长江北岸的一带”,后来“泛指长江以北”。又例如“东西”,它可以“泛指各种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如:他买东西去了|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咱们写东西,要用普通话,但有时又“特指人或动物(多含厌恶或喜爱的

感情)”,如:老东西|笨东西|这小东西真可爱。这类具有泛指和特指的语词,一般也都应分别单列义项。

有些语词,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词义还会产生扩大或缩小的现象。例如“枪”,原是指一种旧式兵器,在长柄的一端装有尖锐的金属头,如红缨枪、标枪。后来又指口径在2厘米以下,能发射枪弹的武器,如手枪、步枪、机关枪。进而又指性能或形状像枪的器械,如发射电子的电子枪、气焊用的焊枪。又例如“笔杆子”,原是指“笔的手拿部分”,后来扩大到指整个的笔,又进而引申为“能写文章的人”。词义缩小的例子如“批评”,原是“指出优点和缺点”的意思,后来“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再如“女性”,原是指“人类两性之一,能在体内产生卵细胞”。这是指所有的女性而言,没有年龄方面的限制。但是,当我们说某人是“新女性”时,这里的“女性”,词义显然是缩小了,它指的只是已成年的妇女。所以,《现汉》将“女性”分了两个义项,而与之相对的“男性”,却没有这种词义缩小的现象,当然也就无需分列义项了。

还有一些语词,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因其含义的特征、性质或作用比较突出,经常被用来作为比喻,因而产生了比喻义。这种已经约定俗成,为社会成员所公认的比喻义,词典里也应当单独列为义项。比如“动力”一词,本义是指“使机械作功的作用力,如水力、风力、电力、畜力等”。但是,人们又常常用它来“比喻推动工作、事业等前进和发展的力量”。又例如“冻结”一词,本义是“液体遇冷凝结”。液体是可以流动的,遇冷凝结之后,当然就不能再流动了。根据这一特征,人们就把“冻结”用来“比喻阻止流动或变动(指人员、资金等)”。词典收录比喻义,只能收录已经成为固定词义的比喻义,而不能将某些临时的比喻用法当作比喻义收入词典。

例如,人们常把党比作母亲,但“党”并没有“母亲”的含义。这类比喻用法,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比喻义,是不能作为比喻义收做义项的。

以上所述,属于词义引申和词义变化发展的一般情况,词典的编者在分析词义和划分多义词的义项时,是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

(二) 从语词的词性方面进行考察

划分多义词的义项,首先要从词义方面着眼,而不是根据词在句中担任的职务来划分义项。例如“鸟飞走了”的“飞”和“飞鸟”的“飞”,尽管它们所担任的职务不同,但词义却是相同的,只能属于同一个义项。但是,在“飞奔、飞跑”和“飞灾、飞祸”里,“飞”含有“形容极快”和“意外的;凭空而来的”意思,这里的“飞”已不是动词意义上的“飞”了,所以应当另列义项。我们强调分析词义,首先要从意义上着眼,并不是说可以完全不管语法方面的变化。实际上,有许多语词,因为词性发生变化,词义也会跟着发生变化。例如“药”,是名词,指“能防治疾病、病虫害等的物质”,但是,当它带上宾语,作动词用时,却是“用药毒死”的意思,如:药老鼠|药虫子。又如“平定”,是“平稳安定”的意思,是形容词,但在“平定叛乱”中,它可以带宾语,成了动词,含有“用武力镇压”的意思。再如“定准”,它的意思是“确定的标准”,如:工作要有个定准,不能各行其是。显然是名词。但在“过几天我定准来接你”这样的句子里,“定准”成了副词,含有“一定”的意思。尽管《现汉》不标注①义是名词,②义是副词,但其不同的含义却是应当加以区分的。

在汉语里,一个语词属于不同的词类是很常见的现象,有时一个词甚至可以属于三四个不同的词类,如拿锁把门锁上,用犁犁田,前一个“锁”和“犁”是名词,后一个“锁”和“犁”则是动词;“把住

舵”的“把”是动词，“一把刀”的“把”是量词，“车把”的“把”则是名词。另外，有些形容词，它们还有使动用法，如“安慰”“动摇”“坚定”等。因为词性不同，它们的含义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在划分多义词义项的时候，考察语词的词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区分语文学义和专科义

有些语词，除了具有一般的语文学义之外，还具有专科术语的含义。例如“矛盾”，《现汉》一共列了四个义项，其中的①义和④义是语文学义，②义和③义则是专科义。又如“能”，《现汉》也列了四个义项，其中有一个是专科义：“度量物质运动的物理量，一般解释为物质做功的能力。能的基本类型有：位能、动能、热能、电能、磁能、光能、化学能和原子能等。一种能也可以转化成为另一种能。能的单位和功的单位相同，也叫能量。”像这类专科义，语文性词典也应当分列义项。

（四）区分普通话和方言、文言义

《现汉》虽然是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一部词典，但它对在文艺作品或报刊杂志上经常出现的方言词或方言义，和一部分文言词或文言义，还是要酌情收录的。这跟推广普通话不但不矛盾，而且有助于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比如“马蹄”，普通话指“马的蹄子”，而有的方言则用来指“荸荠”。词典收了这个方言义，可以让不懂这个方言义的人知道“马蹄”就是普通话所说的“荸荠”，也可让说这种方言的人学说普通话，把“马蹄”改说成“荸荠”。

又例如“范围”一词，在普通话里，它指的是“周围界限”，如：地区范围|工作范围|活动范围。但在文言里，它却是“限制；概括”的意思，如：纵横四溢，不可范围。

上面提到的方言义、文言义，《现汉》都分列义项，并加标志

〈方〉和〈书〉。凡有这种情况,在划分义项时都是应该加以区分的。

义项的建立是否齐全合理,一方面取决于语言资料是否详尽完整,另一方面取决于编者的分析概括能力。因为资料缺乏,往往就有可能遗漏义项。因为编者的分析概括不当,义项划分就有可能失之粗疏或烦琐。

《现汉》的义项划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合理和完备的,因而得到了读者的好评。但在有些条目里,也有处理不当的地方,例如在“人”字条里,立了一个“指某种人”的义项。许多读者认为,“工人、军人”的“人”,仍然是“人”的本义,似乎没有必要另立一个义项。又例如在“木”字条里,立了一个“用木料制成的”义项,举例是木器|木犁|木板。但在“布”“铁”等条目里,却没有为“布鞋”“布衣”的“布”和“铁器、铁板”的“铁”立类似的义项。再如,《现汉》在“文”字条下,立了一个指“文言”的义项,举例是:半文半白|这句话太文了,不好懂。但在“白”字条下,却没有立“指白话”的义项。其实,“半文半白”“文白杂糅”中的“白”,指的就是“白话”义。为什么“文”字立“文言”义,而“白”字不立“白话”义呢?好像也没有多少道理可说。

应该承认,在如何确立义项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比如上面提到的“人”字的“指某种人”的义项,目前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不当立,有人却认为应该立。《现汉》在“良”字条里,立了一个指“善良的人”的义项,有人认为“良”字本身并无此义,不应该建立这么一个义项。但是,在“除暴安良”“逼良为娼”“良莠不齐”等词组里,“良”确有指“善良的人”的意思,据此立一义项,似乎也还能说得过去。最近,我们还看到一部词典甚至给“牌”字立了这么一个义项:〈形〉为纪念受到尊

敬的人而树立的[memorial]。如：牌坊；牌位。这就更叫人难以理解了。

这类问题，到底如何处理才算恰当，恐怕还需要根据汉语的特点，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以逐步求得共识。

同义词语及其注释*

韩敬体

现代汉语里存在着大量的同义词语,这也正是使现代汉语词汇丰富多彩、表达严密精确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汉语词典》在收录、注释同义词语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同义词是指“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本文所说的同义词语,除包括同义词之外,还包括同义成语、熟语、惯用词组等。同义词语的意义(即它们对客观事物、现象、状态、关系等的概括反映)完全相同或相等的是少数,这样的同义词语有人称之为等义词语;而绝大多数的同义词语是意义相近而又有某些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差别,有人又称这种同义词语为近义词语。同义词语在意义上的细微差别主要表现在范围大小、深浅轻重方面。同义词语之间还有色彩、用法上的区别,这主要指地方色彩、感情色彩、修辞色彩、文体风格色彩、语法作用、与其他词语配搭关系等方面的程度不同的差别。《现汉》中虚词和一些实词(如代词、量词)一般是标注词性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虽没标明词性,注释行文一般还是注意词性的,用同义词语作注,也是限于词性一致的词语。因此,我们考察《现汉》收录、注释同义词语问题,指的是词性相同的同义词语。至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1年第3期。

于词性不同的词语算不算同义词语,我们暂不讨论。

下面,我们从意义出发,将同义词语分为相同的和相近的两大类,每一大类别又根据色彩、用法划分为若干小类,就《现汉》对它们的注释情形略加分析。

一 意义相同的同义词语

1. 色彩和用法相同,在日常言语活动中一般可以相互替换运用的。我们根据其组成词素的异同把它们分为三种情形。

a. 一部分由相同词素或词组成,因排列次序不同而形成的同义词语(有人把这种词语称为并列式同素异序同义词语,但意义、用法、色彩上都相同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敏锐—锐敏、商洽—洽商、金迷纸醉—纸醉金迷、千钧一发—一发千钧,等等。

b. 一部分由相同词素或词加同义词素或词形成的同义词语。同义词语中很大一部分是相同词素或词加同义词素或词形成的,而意义、色彩、用法都相同则是很少的一部分。如:包票—保票、跳级—跳班、立脚点—立足点、助桀为虐—助纣为虐、精疲力尽—精疲力竭、赶鸭子上架—打鸭子上架,等等。

c. 由相同词素加不同词素或由完全不同的词素形成的同义词语。这种情况多为同样流行的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如暖瓶—暖壶、版口—页心、词组—短语,等等。这一类有的需要加以规范,有的已经有了科技命名或规范了的名称(科技命名、规范定名与不规范的通俗名称之间的同义关系不属这一类,详见下文)。

《现汉》对这一类同义词语的注释,一般是选取一个更为习见的词语用定义或说明、描写式注释给以详注,注文末尾用“也说”、

“也叫”字样带出同义词语，同义词语另出条目时，注“见”详注的同义词语或直接以详注的同义词语作注而不用“见”。在习惯上，我们把详注的词语称为正条，把用“见”同义词语注释的称为“附见条”或“见条”。

[缩减]紧缩减少。^①——[减缩]缩减。

[土话]小地区内使用的方言。也叫土语。——[土语]土话。

[左道旁门]指不正派的宗教派别，也借用在学术上。也说旁门左道。——[旁门左道]见左道旁门。

[助桀为虐]比喻帮助坏人做坏事。也说助纣为虐。……——[助纣为虐]见助桀为虐。

例中“缩减”采用说明式、定义式详注，而它给其同义词“减缩”作注。其他例子，都是正条有定义或说明式详注，注后用“也说”、“也叫”引出同义词语，同义词语出见条用“见”正条或径用正条来作注。

如果这一类同义词语同在一个大字头下（即它们的第一个字相同），若都出条目彼此相距很近。为节省篇幅，一般只在详注条下用“也说”、“也叫”带出同义词语，而同义词语不再另出见条。如：

[报道]①通过报纸、杂志、广播或其他形式把新闻告诉群众。②用书面或广播形式发表的新闻稿。||也说报导。

[灵丹妙药]灵验有效的奇药。……也说灵丹圣药。

“报导”、“灵丹圣药”就没有再出见条。

另外一种情况，同义词语不在一个大字头下，条目注释又不太长，《现汉》为节省读者的查找工夫，就将同样的注释分别注在同义

词语下面,不采用出正条与见条的办法,如:

[敏锐](感觉)灵敏;(眼光)尖锐。——[锐敏](感觉)灵敏;(眼光)尖锐。

[洽商]接洽商谈。——[商洽]接洽商谈。

由于体例上统一平衡工作不够精细,《现汉》这一类注释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见条注“见”其同义词语,其同义词语即正条注后一般应交代与见条的关系,即写明“也叫”或“也说”什么(“也叫”一般用于名物词,“也说”用于动词、形容词等)。但也有的正条没交代与见条关系。如:

[牧放]把牲畜放到草地吃草和活动。——[放牧]见牧放。

[词序]词在词组或句子里的先后次序。……——[语序]见词序。

《现汉》注释用“见”某词语作注,即见条,并不都是同义词语关系,还有异体词语关系、词语互相关联关系等。正条注释应有所交代。此外,这一类同义词语的注释,有的出正条和见条,有的见条注“见”同义词语,有的不写“见”,还有的同义词语分别注同样的详注,这些形式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2. 色彩和用法有某方面的不同,在日常的言语活动中一般不能相互替换运用的。这一类大都因有不同的来源而形成的,尽管意义相等,但在色彩、用法上存在差别。这一类又可分成以下几种不同情况。

a. 普通话词语与方言词语,后者具有地方色彩。如:太阳—日头、路费—盘川、背心—马甲、玉米—包米,包谷,棒子,珍珠米,等。

b. 现代汉语一般常用词语和书面上用的带有文言色彩的词语。如：边境—边陲、喂养—哺养、迎接—迎迓、过失—不韪，等。

c. 现代汉语普通话口语、书面语都常用的词语与一般只用于口语和口语色彩浓的文体中的词语。如：角落—犄角、匿名信—黑信、星期—礼拜、闲谈—聊，等。

d. 现代通行词语与旧词语、来自早期白话的词语。如：公历—西历、邮递员—邮差、赋税—课、突然—猛可、强盗—强人，等。

e. 科技命名、专门术语、规范名称与其通俗称呼。如：乳齿—奶牙、汞—水银、门齿—门牙、银河—天河、报社—报馆、乙醇—酒精，等。

f. 通用正式名称与其别称、简称。如：词—长短句、上海—沪、劳动模范—劳模、化学工业—化工，等。

g. 汉语词语与外来语。一般指较早出现的音译词，后来又产生出相同意义的由汉语词素造成的词语。如：连衣裙—布拉吉、小姐—密斯、青霉素—盘尼西林、民主—德谟克拉西，等。

《现汉》对这一类同义词语注释，一般以现代汉语普通话规范词语出正条详注，而用这种词语加符号标示、括号附注或注文中说明等方式去注同义词语。凡是用规范的普通话词语注释其同义的含方言色彩、书面文言色彩或口语色彩极强的词语时，一般在注前面加〈方〉、〈书〉或〈口〉的标志。如：

[边境]靠近边界的地方。——[边陲]〈书〉边境。

[旅馆]营业性的供旅客住宿的地方。——[旅舍]〈书〉旅馆。

[倒霉]遇事不利；遭遇不好。——[背兴]〈方〉倒霉；背

时。

[帽徽]安在制服帽子前面正中的徽章。——[帽花]〈口〉帽徽。

用正条词语注释其同义的旧称、通称、俗称、别称、简称，一般在注文中直接说明。如：

[报社]编辑和出版报纸的机构。——[报馆]报社的俗称。

[阑尾炎]病，多由于病菌、寄生虫或其他异物侵入阑尾引起。……俗称盲肠炎。——[盲肠炎]阑尾炎的俗称。

[曲]①一种韵文形式，……。——[词余]曲①的别称。

[皖]安徽的别称。(按：《现汉》不专收地名，所以地名别称没有正条相应。)

[感觉器官]感受客观事物的器官。……简称感官。

[感官]感觉器官的简称。

来源于早期白话及外来语的词语，一般在同义词语注后加括号说明，外来语指明语别，有的标注原来的外文形式。

[突然]在短促的时间里发生，出乎意外。——[猛可]突然(多见于早期白话)。

[刚才]指刚过去不久的时间。——[适才]刚才(多见于早期白话)。

[连衣裙]上衣和裙子连在一起的女装。——[布拉吉]连衣裙。[俄 платье]

上述“e”类情况，《现汉》以规范的专科术语(包括科技命名)为正条，进行详注，注中一般交代其口语、方言、通俗运用的同义词语，这些词语出见条，注为“见”专科术语或注为专科术语的通称、

俗称,或用专科术语加〈方〉注释,与正条相照应。《现汉》“试用本”的专科条目有科目标志,1978年版全部删去。

《现汉》对这类意义相同,色彩、用法有区别的同义词语的注释还存在着欠缺,有的正条与见条失于照应,科学术语有的有通称、俗称、方言叫名,比较复杂,情形就较突出一些。如:

[诊脉]……有的地区说号脉。——[号脉]诊脉。

[天理教]……又称八卦教。——[八卦教]天理教的别称。

[暖水瓶]……有的地区叫暖壶或暖瓶。——[暖壶]暖水瓶。[暖瓶]〈方〉暖水瓶。

[中风]zhòng//fēng……也叫卒中。[中风]zhòngfēng……也叫卒中。——[卒中]见中风。——[痰气]〈方〉②指卒中①。

“号脉”注前标上〈方〉,才能与“诊脉”注中的“有的地区说”相应。“天理教”正条注“又称八卦教”,而“八卦教”条却注为“天理教的别称”,互相不合。“暖壶、暖瓶”应都标〈方〉,才能与“暖水瓶”注相应,然而却一个标一个不标。“痰气”用“卒中①”注令人莫名其妙。“卒中”没分义项,只注见“中风”,而“中风”却出了两个条目。这一类型的问题,《现汉》中还可找出一些来。

二 意义相近的同义词语

这类同义词语意义上有细微区别,有的在色彩、用法上也有不同。它们正是符合语言细密、确切地表情达意的需要而形成的,因此其作用比起前一大类就更为积极。这类词语要比前一大类多得

多,同义词语间关系也复杂一些,因此在辨别和注释上难度要大些。我们从意义范围、轻重、感情色彩、修辞色彩、词语搭配等方面,将这一大类分为五种情况。

1. 意义范围的大小、宽窄不同。

[计划]①工作或行动以前预先拟定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规划]比较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

[表扬]对好人好事公开赞美。——[表彰]表扬(伟大功绩、壮烈事迹等)。

“计划”意义范围比“规划”宽,“表扬”适用的面比“表彰”要大。这类情况还可举出不少,如:食物—食品、事情—事件、典型—典范,等。

有些同义名物词语所表达事物有一般与个别之分,有的既可用于事物的个体,也可用作集体,而有的只用于集体,这也可以算作意义范围上宽窄的区别。如:

[船]水上的主要运输工具。——[船只]船(总称)。

[树]①木本植物的通称。……——[树木]树(总称)。

“船、树”可以指个别的,也可以指集体的,而“船只、树木”只能指集体的,不能指个体的。这种情况还有不少,如:灯—灯火、报纸—报章、枪—枪支,等。

2. 语意程度上的深浅、轻重不同。

[知道]对于事实或道理有认识。——[了解]①知道得清楚。

[请求]①说明要求,希望得到满足。——[恳求]诚恳地请求。

“了解”比“知道”意义程度上深些,“恳求”比“请求”语义重些。

这种情况还可举出：揭露—揭穿、讨厌—厌恶、轻视—鄙视，等。

3. 感情色彩上的差异。人们用词语评定事物、表情达意有时带有不同的感情和态度，这样就使一些词语含有感情色彩，有的多表示赞许、褒扬，有的多表示反对、贬斥，而大多数又是所谓中性词语，无所谓褒贬色彩。

[面貌]①脸的形状；相貌。——[嘴脸]面貌；脸色（贬义）。

[名声]在社会上流传的评价。——[名望]好的名声。

这里“面貌、名声”是中性词，而“嘴脸”是贬义词，“名望”是褒义词。这种中性与褒贬不同的同义词语还有不少，如：保护—庇护、技能—伎俩、打算—企图、首领—头子，等。

4. 修辞色彩上的差异。有的词语常用来表示谦恭、委婉、尊崇、轻蔑、客套、诙谐、比喻、夸张、避讳等意味，以一定的修辞色彩而与相应的同义词语相区别。

[归还]把借来的钱或物还给原主。——[奉还]敬辞，归还。

[消瘦](身体)变瘦。——[清减]〈书〉婉辞，消瘦。

[发胖]身体变胖。——[发福]客套话，发胖(多用于中年以上的人)。

[死亡]失去生命。——[玩儿完]〈口〉……；死亡(含诙谐意)。

[失火]发生火灾。——[走火]③指失火(含避讳意)。

5. 与其他词语的搭配关系不同。这是同义词语用法差别的一个突出方面。搭配关系不同正是词语适用的对象不一样。

[实行]用行动来实现(纲领、政策、计划等)。——[执行]

实施；实行（政策、法律、计划、命令，判决中规定的事项）。

[操纵]①控制或开动机械、仪器等。——开⑥发动或操纵（枪、炮、车、船、飞机、机器等）。

搭配关系不同常跟词义范围不同相关联，“实行、执行”义有细微差别，搭配词语也就不完全一样。“开、操纵”也是如此。《现汉》中词语搭配关系多是通过举例来表现的，而且仅是一部分词语注出了这方面的情况。

这一大类同义词语，《现汉》为区别其细微差别采取了各种注释形式，有的同时都用定义或说明式注释加以详注，有的用同义词语注并给以括注说明，有的注中表明其特殊色彩。但应用得最为普遍而突出的是用同义词语注释的方式。

我们知道，用同义词语给词语作注，是古今中外语文辞书广泛运用的一种传统方式，在我国，从两千多年前的《尔雅》、《说文解字》直到今天的字典、词典，差不多都把这种注释方式放在重要的地位。人们对这种方式给以不同的名称，有的叫它做“同训”，有的称之为“对释”，有的称它为“同义互训”，等等。这种以同义词语注释的办法有着明显的长处，它释文简短精练，节省篇幅，也便于读者对有关的同义词语进行联系理解。然而这种方式又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对词语注释的精确度不高，不能表现出同义词语间的细微差别。滥用这种办法，会出现以难注易、以生僻注习见、以多义注单义的现象，使读者难以理解和使用。更有甚者，还会形成同义词语之间循环互训的现象，不能给词语以真正科学的注释，起不到为读者解难释疑的应有作用。《现汉》开始编辑时，考虑到了这种注释方式的局限性及其流弊，采取了一些办法，以使这种方法能够扬长避短，更加切合实用。

1. 在一组同义词语中,选取一两个词语做定义式或描写说明式较详的注释,其他词语可以只用已有详注的词语注释。如“承担、承当、担当、担负、担任”一组词,注释是:

[担当]接受并负起责任。 [担任]担当某种职务或工作。[担负]承当(责任、工作、费用)。 [承当]①担当。

[承担]担负;担当。

“担当”有较详注释(注中“接受”一词另有详注)，“担任”用“担当”加上补充说明作注，“承当”用“担当”注，“担负”用“承当”加括注运用的对象作注，“承担”用“担负;担当”作注。这种办法旨在截断可能会出现循环互训的链条,拆出一两个环节分析详注,消除互训的现象。

2. 用同义词语作注时,在注文前后附加标志、限制语或补充说明的词句、括注,以显示出同义词语之间的重要差异。这种情形前文举例颇多,如恳求、名望、作古等条目注释就是如此,不再列举说明。

3. 做注释用的同义词语一般选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常用的中性词语,用它给不太常用的、书面文言的、方言、口语的以及带有其他风格色彩的同义词语作注。这一方面是《现汉》担负的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任务所要求的,另一方面,也以此避免以难注易、以生僻注习见的弊病。如“推测、推度、推想、猜测、忖度、揣测、揣度”一组词,处理为:

[推测]根据已知道的事情来想象不知道的事情。

[推度]推测。 [推想]推测。 [猜测]推测;凭想象估计。

[揣测]推测。 [揣度]〈书〉估量;推测。 [忖度]推测;揣度。

即选取“推测”详注，用它给其他词语作注。

4. 做注释用的词语一般选用单义的，如是个多义的，也是取它的基本义给同义词语作注，不是基本义的要标注出义项号码，避免让人确定不了被注词语的意义。如：“[支付]付出(款项)”，是单义词，“开”是多义词，其中用于“开工资、车费”时与“支付”同义，但这不是“开”的基本义。所以《现汉》用“支付”注“开”的第12义项，不是倒过来用“开⑫”去注“支付”。

一般说来，现代汉语中合成词单义的多，而单音节词多义性较强。所以如果一个单音节词或词素与一个两个以上音节的合成词同义，通常选取合成词详注，用合成词给单音词或词素作注。如“开”与“支付”注释就是如此。但如果单音词更为习见易懂，还是要在单音词下详注，用单音词注合成词语。如“胖(人体)脂肪多，肉多……”详注，用“胖”去注“肥胖”。

科技命名和专科术语规范性强，有明确的概念，所以《现汉》对它们一般是进行详注，用它们加以标志或说明来给其通俗的同义说法或叫名作注。

5. 同义词语作注，跟简略的定义或说明式注释相互补充，可更好地确定被注释的词语的意义。如：

[拜扫]到墓前祭奠；扫墓。 [彼此]那个和这个；双方。

[消退]减退；逐渐消失。

6. 用几个同义词语同时给一个词语作注，或用同义词语与反义词的否定式或括注反义词互相补充为一个词语作注。如：

[端方]〈书〉端正；正派。 [分手]别离；分开。 [笨拙]笨；不聪明；不灵巧。 [缓慢]不迅速；慢。 明①明亮(跟暗相对)。

由于采取这些补救办法,《现汉》对同义词语的注释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对一些同义词语的比较分析不够,同义词语注释分组照应平衡工作做得不充分,加之编排技术、排校工作上的失误,对意义、用法上都有细微差别的同义词语的注释方面,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1. 循环互训问题。

[偿命](杀人)抵命。——[抵命]偿命。

[驱逐]赶走。——[赶走]驱逐使离开。

[适当]合适;妥当。——[妥当]稳妥适当。

[争斗]①打架。——[打架]互相争斗殴打。

2. 由多义词语或存在同形词语的词语作注引起的混淆。

[按捺]抑制。 [按压]抑制。

[饱满]①丰满。②充足。 [丰满]①充足。②……

[遏抑]压制。 [出言]说话。 [端量]端详;打量。

“抑制”是多义词,第一义项是科技术语,是“大脑皮层的两种基本神经活动过程之一”。第二义项是语词意义:“压下去;控制”。用“抑制”注“按捺、按压”显然只是用的第二义项。“饱满”有两义项,一是“丰满”,一是“充足”;而“丰满”也是两义,一义正是“充足”,“饱满”将“丰满、充足”对立为二义与“丰满”注矛盾。“压制”、“说话”、“端详”,因同形词或词素结合能力或读音不同都分成了两个条目,用它们分别去注另一个词,人们就搞不清楚到底用的哪个条目的意义了。

3. 《现汉》不少词语只采取一个同义词语注释,不能表示出注词与被注词的差异,释义准确性不够。

[恰当]合适;妥当。——[适当]合适;妥当。

[着手]开始做;动手。——[动手]开始做;做。——[入手]着手;开始做。

[结实]①坚固耐用。——[牢固]结实;坚固。

“恰当”、“适当”注释用同样的两个同义词,其实并不完全一样,“恰当”有恰如其分的意味,程度上比“适当”要深些。“着手、入手、动手”用法并不一样,“结实”和“牢固”也有不同之处。

比较起来,前两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互训问题,可将其中一个词语改成定义式或说明式注释,注中避开用它去注释的词语。义项交叉,多义词作注,只要标明作注的同义词语义项序号即可解决。而第三个问题却不大好办,它不是体例或技术处理可以解决的,它涉及用同义词语注释方式本身的问题以及辞书的性质、任务问题。

用同义词语作注,是以词语注解另一个词语。上文说过,完全相同或相等的词语是很少的,绝大多数同义词语之间相同的仅是某些方面,而所不同的地方有的又十分细微。同义词语相注,仅能取它和被注词语的“公约数”部分,而又不能明白表示出来。即使附加上限制、补充说明,也远不能将其差别都表示出来。不仅如此,即使不用同义词语注释,全改换为定义式详注,同义词语间的细微差别问题也未必能够完全解决。不少常用词语本身就很难下定义,有的下定义甚至得用上比它要艰深难懂的概念和词语,使人难以理解。一些同义词语间的细微差别用定义也是难于表达的。如果硬要做出别扭费解的定义,好像很科学严密了,实际上并不符合读者的实用。我们认为,细致全面地辨析同义词语,表示出其间的异同,这远不是《现汉》这类一般性语文辞书所能胜任得了的,这种任务只能由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宗旨的同义词词典去完成。同义

词词典可以将同义词语分组收录,从语义、色彩、用法等各个方面加以分析比较,从而找出同义词语间的异同来。遗憾的是,目前我国还缺乏这种词典,而这类词典对语文学习和教学,语词研究和运用都是很有意义的。一般性语文辞书,同义词语仅是它所收条目的一部分,它跟同义词词典性质、任务不同,注释方式也就有所不同。它只能在同义词语方面尽量作细致的工作,将同义词语之间重要差别告诉读者。至于注释方式,对一般性语文辞书来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能很好地用定义或说明、描写式详注解决同义词语问题当然很好,如果这种详注难以做出或挖空心思做了出来却使人费解,倒应该考虑采用同义词语作注的传统办法。这种办法有不足之处,但可设法予以补救。《现汉》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其得失利弊还要经过群众实践的检验。《现汉》在这方面的的工作还是很不完美的,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分析、研究、解决,以求取得更好一些的效果。

附 注

①《现汉》中的举例(例词、例句)对注释有衬托、补充等重要作用。本文只讨论注释问题,因此引用的条目,注音、举例都从略。有的注释文字过长,引用时酌予删减,见条注中鱼尾号省略。

《现代汉语词典》的 一种特殊的释词方式*

韩敬体

词典中词语的释义,就是要解释词目所标示的词或短语的含
义。一般说来,词语释义,要确切、周延,既不可过于宽泛,又不要
过于狭窄。释义时,要区别开词和语(短语),不能混淆词义和短语
义,词义不能阑入那个词与其他词组成的短语义,短语义也不可等
同于组成短语的某个单词义。形象地说来,以释语代替释词,是小
题大做,而以释词代替释语,则是大题小做,二者都是文不对题,为
词书编写者的大忌。

我们翻检《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时,却不难发现
一种以释语代释词的非同寻常的释义方式。例如:

[耳光]用手打在耳朵附近的部位叫打耳光◇事实给了造
谣的人一记响亮的~。

[耳性]受了告诫后,没有记在心上,依然犯同样的毛病,
叫做没有耳性(多指小孩子)。

* 这篇文章曾收入《中国辞书论集·2000》,标题是《语词兼释,小题大做——谈〈现代汉语词典〉的一种特殊的释义方式》。此次选收略加改动,标题有变动。

[响头]磕头磕出声音来叫磕响头:叩了一个~。

[非命]遭遇意外的灾祸而死亡叫死于~。

上面四个词的释义,所释对象就不是直接针对词目表示的词,而是包含有那个词的短语。“耳光”释文所释的是“打耳光”,“耳性”释文所释的是“没有耳性”,“响头”释文所释的是“磕响头”,“非命”释文所释的是“死于非命”。十分明显,词的释义成了由词和其他的成分组成的短语的释义,以释短语代替了释词。

这种以释语代释词的反常做法,在《现汉》中并非极个别的现象,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比如:“响指”释文所释的是“打响指”,“回合”释文所释的是“一个回合”,“包票”释文所释的是“可以打包票”,“长假”释文所释的是“请长假”,“倒好儿”释文所释的是“喊倒好儿”,“海口”释文所释的是“夸海口”,“空房”释文所释的是“守空房”,“连裆裤”释文所释的是“穿连裆裤”,“脑汁”释文所释的是“绞脑汁”,还有很多,都是以释短语义代替释词义的例子。

这种以释语代释词的方式,因为有短语和词两种语言单位,又存在不同情况,所以在《现汉》中出条释词的情况又有不同。

一、词和短语分别出条,就是说词和包含词的短语都出条,释义又有两种情形:

1. 词和短语都带释义,二者基本一样。词的释义最后有“叫”或“叫做”包含该词的短语。

[海口]漫无边际地说大话叫 [夸海口]漫无边际地说大话。

夸海口。

[脑汁]费脑筋叫“绞脑汁”。 [绞脑汁]费思虑;费脑筋。

[空房]丈夫外出,妻子一人 [守空房]指丈夫外出,妻子一

住在家里,叫守空房。 人住在家里。

[连裆裤]互相勾结、包庇叫穿连裆裤。
[穿连裆裤]〈方〉比喻互相勾结、包庇。

[非命]遭受意外的灾祸而死亡叫死于非命。
[死于非命]遭受意外的灾祸而死亡。

[开口饭]旧时把以表演戏曲、曲艺等为职业叫做吃开口饭。
[吃开口饭]旧时以表演戏曲、曲艺等谋生叫做吃开口饭。

2. 词只注见短语,短语带释义。

[长斋]见[吃长斋]。
[吃长斋]信佛的人长年吃素,叫吃长斋。

[黑锅]见[背黑锅]。
[背黑锅]比喻代人受过,泛指受冤枉。

[过场]③见[走过场]。
[走过场]②比喻敷衍了事。

[偏饭]见[吃偏饭]。
[吃偏饭]在共同生活中吃好于别人的饭食,比喻得到特别的照顾。

[偏手儿]见[拉偏手儿]。
[拉偏手儿]指拉架时有意偏袒一方。

[小差]见[开小差]。
[开小差]①军人私自脱离队伍逃跑。②比喻思想不集中。

[后悔药]见[吃后悔药]。
[吃后悔药]指事后懊悔。

[冷板凳]见[坐冷板凳]。
[坐冷板凳]比喻因不受重视而担任清闲的职务。也比喻长期候差或久等接见。

[闭门羹]见[吃闭门羹]。
[吃闭门羹]被主人拒之门外或

主人不在,门锁着,对于上门的人叫吃闭门羹

[点滴]③见[打点滴]。

[打点滴]利用输液装置把葡萄糖溶液、生理食盐水等通过静脉输入病人体内,叫做打点滴。

[哑巴亏]见[吃哑巴亏]。

[吃哑巴亏]吃了亏无处申诉或不敢声张,叫吃哑巴亏。

[夜车]②见[开夜车]。

[开夜车]为了赶时间,在夜间继续学习或工作叫做开夜车。

[夜作]见[打夜作]。

[打夜作]夜间工作。

释义分两种情况,实际上没什么不同。这一类,单词释义依附于短语释义,为查检方便,单词与短语都出条,短语的惯用语性较强。如果单词释义对短语释义依附性不太强,它与短语都可以单独释义,释义中不指出二者的关系。这种情况,《现汉》中也不乏其例。

[鬼胎]比喻不可告人的念头:心怀鬼胎。

[怀鬼胎]比喻心里藏着不可告人的事或念头。

[帽子]②比喻罪名或坏名誉。

[扣帽子]对人或事不经过调查研究,就加上现成的不好的名目。

[亏空]②所欠的财物。

[拉亏空]欠债。

[冷风]比喻背地里散布的消极言论。

[吹冷风]比喻散布冷言冷语。

[冷枪]乘人不备暗中射出的枪弹。 [打冷枪]藏在暗处向没有防备的人突然开枪。

[冷战]因寒冷或害怕浑身突然发抖。 [打冷战]因寒冷或害怕身体突然颤动一两下。

[把势]①武术。 [打把势]①练武术。

[闲篇]〈方〉与正事无关的话。 [扯闲篇]谈与正事无关的话；闲谈。

二、只出单词，以短语释义作注，不出短语。

[长假]旧时机关或军队中称辞职为请长假。

[耳光]用手打在耳朵附近的部位叫打耳光。

[耳性]受了告诫之后，没有记在心上，依然犯同样的毛病，叫做没有耳性(多指小孩子)。

[倒好儿]对艺人、运动员等在表演或比赛中出现差错，故意喊‘好’取笑，叫‘喊倒好儿’。

[回合]旧小说中描写武将交锋时一方用兵器攻击一次而另一方用兵器招架一次叫一个回合。

[响头]磕头磕出声音来叫磕响头。

这一类单词独立性稍强，而所组成的短语定形较弱，不能看作固定短语或惯用语，所以没有出条。

三、只出惯用语，不收其中的名词。

[喝闷酒]烦闷时一人独身饮酒叫喝闷酒。

[睡懒觉]指人贪睡，不爱起床(多指早晨晚起)。

[吃闲饭]指只吃饭而不做事，没有经济收入。

[敲边鼓]比喻从旁帮腔；从旁助势。

[敲竹杠]利用别人的弱点或借某种口实抬高价格或索取

财物。

[放空炮]比喻说空话;说了不能兑现。

[守活寡]已婚妇女的丈夫长期外出不归,叫守活寡。有的地区也叫守生寡。

这一类短语是惯用语,其中名词独立性差。

短语及词出条情况,基本上决定于短语固定化程度和其中名词的独立性,自然与词典收词规模也有很大关系,大中型词典收词多,出条从宽,短语和词就出得多,中小型词典,收词少,收词从严,自然短语与词就出得少。

《现汉》这种以释语代释词的释义办法,与一般词语释义原则大不相同,可以说是有点“小题大做”,看来是有些背理。但是我们再深入研究一下,不难看出这种释义方式有其特殊之处。

一、从形式上看,这种释义方式中对词的释文的最后一般要用“叫”、“叫做”等词引出包含词目词的短语,如“叫夸海口”、“叫磕响头”、“叫做没有耳性”等等。正是用了这种具有标志性的词,才十分明显地告诉读者,释文所释的就是包含词目词的短语。

二、用这种释义方式注释的,一般是一个名词或名词性短语,而释文所释的是包含词目的短语,以动宾结构居多,词目做宾语,如“打耳光”、“磕响头”、“没有耳性”、“喊倒好儿”之类就是如此。动宾结构中,名词前还可以加数量短语修饰或限制,如“磕一个响头”、“打一记耳光”等。

三、用这种方式注释的词,本身意义一般较难注出来,即使注出也会显得勉强或费解。如“脑汁”,《国语辞典》注为“脑筋①”,“脑筋①”注为“脑神经”,较为费解。“耳光”,《汉语大词典》注为“用手掌击人面颊的动作”,在现代汉语中,这种释义所解释的其实

正是“打耳光”。

四、这种释义方式注释的词目词,在现代汉语中独立运用的情况较少,较多地是以跟别的词组成的短语形式出现。比如“耳光”以“打耳光”说法多用,“倒好儿”以“喊倒好儿”形式常见,“响头”以“磕响头”形式多说。这些短语使用情况较多,形式相对稳定,有的就变成了惯用语了。我们知道惯用语是一种固定短语,其意义一般为整个短语字面的引申义或比喻义,不同于组成它的单词意义相加。释义时自然也不能拆词相释。比如拍马屁、抬轿子、吃闲饭、刮地皮、告枕头状、喝西北风等,短语义与组成短语的词义相加截然不同。“打耳光、磕响头、喊倒好儿、吃闭门羹”之类是不是惯用语还可讨论,但释义时以释短语义为好。

五、这种释义方式所释词目,尽管常以短语方式出现,这些短语与惯用语相类,但又与典型的惯用语有区别。词目词本身有相对独立性,短语中结合的词不太固定,如“响头”既可以说“磕响头”,也能说“叩响头”;“耳光”不仅说“打耳光”,也可说“挨了一记耳光”。再如“一个回合”、“没有耳性”、“被戴上红帽子”之类,更不能算作固定短语,人们也不可能用它们做词目出条,所以只能以其中的词出条了。还有,前面没有举过的“起见”,这个词很难单独使用,所以《现汉》对它的释义是“‘为…起见’,表示为达到某种目的”。“为…起见”是一个格式,尽管条目释义用的是它的释义,但是却只能以“起见”出条。

如上所述,《现汉》所使用的以释短语代释词的释义方式,看似悖谬,不合常理,但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不容否认的操作价值。但是哪一种情况适宜于这种出条释义,以及各种出条释义的不同类型的优劣得失等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

实例,总结经验,进行更为深入地探讨。这种以释短语代释词的释义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词语用法的发展和人们对它们的认识的不同,释义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娘胎”、“聊赖”等词,《现汉》的前后不同的几个版本中的释义方式就不相同。“试印本”只是对词释义,而“试用本”和1978年、1983年本都采用了释短语义的方式释义,但是1996年修订时释义方式又有所变化。试比较:

[聊赖]依托(只用于否定式)。(1960年“试印本”)

[聊赖]多用于‘无聊赖’、‘百无聊赖’,是无所凭借、无以为生或无所寄托的意思。(1965年“试用本”和1978年、1983年本)

[聊赖]精神上或生活上的寄托,凭借等(多用于否定式)。(1996年修订本)

其实,“无聊赖”和“百无聊赖”,在《现汉》中都另外出了词条,也有各自的释义,“聊赖”条下再以短语“无聊赖”、“百无聊赖”释义的为释义,且与短语条目下的释义有参差,这种处理办法明显存在问题。所以,1996年修订时,“聊赖”改变了以前“试用本”和1978年本、1983年本的释义方式,注出词的释义。

[娘胎]母亲的肚子(指怀孕时)。(1960年“试印本”)

[娘胎]某个人尚未出生,说‘在娘胎里’,已经出生,说‘出了娘胎’。(1965年“试用本”)

[娘胎]某个人尚未出生,说‘在娘胎里’,已经出生,说‘出了娘胎’,生来就具有某种特征,说‘从娘胎带来的’。也用于比喻。(1978年、1983年本)

[娘胎]怀着胎儿的母体。人尚未出生,说‘在娘胎里’:已

经出生,说‘出了娘胎’:生来就具有某种特征,说‘从娘胎带来的’。(1996年修订本)

从“聊赖”、“娘胎”释义的不同处理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释义方式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以大释小的释义方式是可以改用别的方式的。应该区别不同的情况,对不同的释义方式,择善而从。

现在看来,使用这种以释短语代释词的释义方式的不止《现汉》一部词典,还有别的一些词典也采用了,只是《现汉》使用这种释义方式比较早,比较突出,也较有影响,所以值得我们更为重视而已。至于《现汉》在这种释义方式运用中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相关条目释义的平衡问题,体例的一致问题等,也需要不断地进行改进和完善。

词语的比喻用法和比喻义及其在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中的处理方式*

韩敬体

一

词语的比喻用法和比喻义,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

比喻,是极为常用的一种修辞方式,是把话说得鲜明生动的一种语言运用艺术。一般说来,它是用某种事物来比方另一种有相似点的事物。比如,说某个人强壮得像头牛,就是说那个人在体格强壮上跟牛有相似之处。说某个人像老虎一样凶猛,就是说那个人在性情凶猛方面同老虎有类似之点。但是用于打比方的事物与被比方的事物之间的类似之处,总是限于表面的直观的形象的相似,并非本质方面的相似。说牛、老虎与某种人相似,只就体格强壮或性情凶猛而言,绝不是说他们本质上相同。比喻是临时的语言运用手法,用什么事物去比喻别的什么事物并没有确定的、一成不变的规则。同一种事物就其不同之点可以比喻不同的事物。比

* 这篇文章曾收入《词汇学理论与实践》论文集。

如,牛可以比喻体格强壮的人,又可以比喻性情倔强的人,也可以比喻饭量很大的人,也可以比喻埋头苦干、忍辱负重的人。再如,狼可以比喻凶残成性的人,又可以比喻身体很瘦的人,也可比喻忘恩负义的人。离开具体语言环境,只说某人像牛一样或像狼一样,就难以理解他指的是哪一方面的特征。反之,不同的事物又可以从不同相似点去比喻同一种事物。比如说某一个人,可以说他脸黑得像锅底,瘦得像狼,脾气倔得像牛。用于比喻的事物及表示该事物的词语,在比喻中临时被赋予了被比喻事物的某类特征,赋予某种比喻意义,但这种比喻含义一般是临时的,不稳定的,比如除了具体的比喻用法,“狼”不一定就具有凶残、消瘦、忘恩负义的意义,“牛”也不一定就有体格强壮、食量大的含义。当然,人们说话中使用的比喻并不限于人和物,也包括事物的性质、状态、变化等等。修辞中用于比喻时词语获得比喻意义还不是词语固定的词义,只是一种临时的比喻含义,有人称之为言语义。

词语的比喻义,一般说是词语通过比喻用法产生的稳定语义。比喻义一般是借助于词语的字面义或本义所指的某种形象特征经常地去指称与这种形象特征有类似点的另一种事物而形成的含义,是人们约定俗成地将比喻义固定在用于比喻的词语上的。比如,“火坑”比喻极端悲惨的生活环境,“魔爪”比喻凶恶的势力,“末班车”比喻最后的一次机会,等等。比喻义是词语具有的稳定的语义,一般不随着具体语境的改变而随意变化。这与修辞上的比喻赋予某个词语的比喻含义不同,有人叫它为词语的语言义。

比喻用法是词语在语言运用中得到的一种功用,因而也取得了比喻意义。而比喻义则是词语固定的比喻性意义。前者是语用范围的问题,后者是语义范围的问题。比喻用法依附于语言环境,

脱离具体环境,其含义就消失或难以确定。比喻义则是稳定的语义,对具体语境依附性较弱。由此看来,词语的比喻用法和比喻义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但是,词语语义不能离开语用,语义的形成和发展变化都是由语言运用决定的。比喻用法有偶用、活用、多用或常用的不同情形,偶用、活用,词义难以固定,而多用、常用,就可能约定俗成产生语义了。比如牛的固执、骄傲,虎的勇猛威武都由比喻用法的多用常用而成为比喻义。比喻义因与词语字面义、本义关系有直接、间接之别,含义本身也有明显、隐晦,独立性强弱不同,所以比喻义表现出不同情况。有些词语,如“风波、卷铺盖、炒鱿鱼”之类,字面义在语言运用中并不使用,使用的只是其比喻义。有些词语如“风浪、摔跤、后遗症”之类,有本义,又有比喻义,比喻义稳定,独立性强。也有些词语如“宝座、航向、滚雪球”之类,比喻义更常用,但独立性不强。还有些词语,如“当家、交锋、带头”之类,常用的是本义,但也有比喻用法,但明确性、独立性就更差一些。可以说比喻用法中临时的活用形不成词语比喻义,而多用常用就会形成比喻义。不管本义引申出的比喻义是什么样的情况,一般都是词语本义的比喻用法形成的。因此,比喻用法和比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

比喻义是语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释义中处理好比喻义也就成了词典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如前所述,词语用于比喻的情况不同,比喻义与字面义、本义的关系以及比喻义的独立性都有不同情况,词典释义就需要反映出这些区别。《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我

国第一部规范性语文词典,对比喻义就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力图反映出比喻义和比喻用法的不同的层次及不同的情况。

《现代汉语词典》对词语比喻义和比喻用法的处理大致有三种形式:

一、不注本义,只注比喻义。词语的字面义不使用,不构成词义,一般只有比喻义。这又有两种情形(以下举例一般只出词目和释义,不出例句)。

1. 只注比喻义,不对字面义进行解说。如:

[风波]比喻纠纷或乱子。

[牛马]比喻为生活所迫供人驱使从事艰苦劳动的人。

[下马]比喻停止或放弃某项重大的工作、工程、计划等。

[痛痒]①比喻疾苦。②比喻紧要的事。

[背黑锅]比喻代人受过,泛指受冤屈。

[眼中钉]比喻心目中最痛恨、最讨厌的人。

[做文章]比喻抓住一件事发议论或在上面打主意。

[鸡毛蒜皮]比喻无关紧要的琐事。

[铁石心肠]比喻心肠硬,不为感情所动。

[斩草除根]比喻彻底除掉祸根,不留后患。

另如“火坑、心潮、砸锅、战云、出气筒、卷铺盖、穿小鞋、狗咬狗、刀山火海、马不停蹄、叠床架屋、照猫画虎”等等,词典中不注这些词语的字面义,它们在语言运用中只用比喻义。

2. 先对词语字面义略加提示或说明,再注出比喻义。如:

[风雷]狂风和暴雷。比喻气势浩大而猛烈的冲击力量。

[眉睫]眉毛和眼睫毛,比喻近在眼前。

[粪土]粪便和泥土,比喻不值钱的东西。

[炎凉]热和冷。比喻对待地位不同的人或者亲热攀附，或者冷淡疏远。

[鱼水]鱼和水。比喻彼此亲密。

[雨露]雨和露。比喻恩惠。

[渊海]深渊和大海，比喻内容广而深。

这类词释义中先说明字面义，是为了沟通字面义与比喻义，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比喻义，字面义在语用中并不使用，不成其为词义。

二、出本义后再注出比喻义。又分两种情形。

1. 先注本义，再注比喻义，单独立义项。如：

[风浪]①水面上的风和波浪。②比喻艰险的遭遇。

[倒流]①向上游流。②比喻向跟正常流动相反的方向流动。

[跌跤]①摔跟头。②比喻犯错误或受挫折。

[做戏]①演戏。②比喻故意做出虚假的姿态。

[马拉松]①指马拉松赛跑。②比喻时间持续得很久久的。

[四不像]①麋鹿。②比喻不伦不类的东西或情况。

[捉迷藏]①儿童游戏，一人蒙住眼睛，摸索着去捉在他身边来回躲避的人。②比喻言语、行为故意迷离恍惚，使人难以捉摸。

另如“翻身、低潮、陷阱、心脏、园丁、走火、末班车、后遗症、夜猫子、主旋律”等等，这类词语比喻义与本义相比，关系清楚，意义明显，独立性较强，词典中就单独立义项。

2. 注出本义，紧接着注出比喻义，不分立义项。如：

[捷径]近路。比喻能较快地达到目的的巧妙手段或办

法。

[僵尸]僵硬的死尸。常用来比喻腐朽的事物。

[饭桶]装饭的桶。比喻只会吃饭而不会做事的人。

[蹦跶]蹦跳,现多比喻挣扎。

[疯狂]发疯。比喻猖狂。

[印把子]指行政机关的图章的把子。比喻政权。

[招兵买马]组织或扩充武装力量。也比喻扩大组织或扩充人员。

[走投无路]无路可走,比喻处境极端困难,找不到出路。

另如“死路、王牌、问津、腰斩、夜叉、症结、枝蔓、饮鸩止渴、众口难调、作茧自缚”等等,这类词比喻义常用,与本义关系直接,独立性较弱,词典不单独立义项。

三、只注出本义,说明或标示出有比喻用法,不注出比喻义。这又有两种情形。

1. 注出本义后,说明用于比喻或多用于比喻。如:

[过关]通过关口,多用于比喻。

[巨轮]①巨大的车轮,多用于比喻。

[幕后]舞台帐幕的后面,多用于比喻。

[航向]航行的方向。也用于比喻。

[葬身]埋葬尸体,多用于比喻。

[亡灵]人死后的魂灵(迷信,多用于比喻)。

[阴魂]迷信指人死后的灵魂(今多用做比喻)。

另如“宝座、春雷、毫毛、小将、招魂、滚雪球”等等,这些词语多用或也用于比喻,跟本义关系明显,但比喻义不太明确,缺乏独立性,所以注出本义后,只说明有比喻用法,不注出比喻义。

2. 注出本义加“◇”列出比喻用例,不注出比喻义。如:

[当家]主持家务:……◇人民~作主。

[带头]首先行动起来带动别人;领头儿……◇~学科。

[交锋]双方作战:……◇这两支足球劲旅将在明日~。

[解冻]①冰冻的江河、土地融化:……◇两国关系开始~。

[面孔]脸:……◇这些产品样式陈旧,一副老~。

[外衣]穿在外面的衣服◇披着正人君子的~。

[阵地]军队为了进行战斗而占据的地方,通常修有工事:……◇文艺~|思想~。

[先行官]戏曲小说中指指挥先头部队的武官◇铁路运输是国民经济的~。

另如“产儿、攻势、接轨、净化、出战、奠基、套路、阴风、阴影、战表、准星”等等,这类词本义常有某种比喻用法,运用范围较窄,释义中只列出常用的比喻用例。

语言随社会发展而发展,词语的比喻用法和比喻义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因此反映词义变化的词典在其编写、修订的不同时间,对比喻义处理方式就会有不同。《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于1978年,1983年重排过一次,1996年进行较大规模的修订。修订本与正式出版本对一些词语的比喻义处理就有不同。比如“败阵、高举、交战、沉没”等词,1983年版本义后面没有带“◇”号的比喻用例,1996年修订本就增加了比喻用例。“搏斗、创伤、倒流、掉队、回响、解剖、冲决、倒胃口”等词语,1983年版只有带“◇”号的比喻用例,没有出比喻义,1996年修订本就单独立出比喻义项。还有一些词,如“黄金”等,1996年本直接增加了比喻义。再如“包

装、盲点、盲区、夕阳”等词 1996 年本没有出比喻义,2002 年增补本就补收了比喻义,“错位、下岗”等词,1996 年本只有带“◇”号的比喻用例,没有出比喻义,2002 年增补本就立出了一个独立的词义。这些比喻义的不同处理方式,正表现出词语比喻用法和比喻义的发展变化。此外,不同的人对词义的理解和分析不尽一致,因此不同的人编的词典,对同样词语的比喻义处理,比如是否注出比喻义,是否分立义项等也不尽相同,这是十分自然的,无需赘述。

参考文献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
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吕叔湘全集》十二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符淮青《词义的分析与描写》,语文出版社,1996。
周荐《词语的意义和结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应雨田《比喻型词语的类型及释义》,《中国语文》1993 年 4 期。
史锡尧《名词比喻造词》,《中国语文》,1996 年 4 期。
张培成《关于汉语比喻词的几个问题》,《汉语学习》,2000 年 4 期。

语文字词典中百科词汇 的注释问题*

刘庆隆

一 过去语文字词典中百科词汇的注释情况

我国语文字词典中的百科词汇的注释,可以说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百科词汇的注释比较简短,跟语文词汇的注释没有什么差别。后来虽然内容逐渐增多,介绍一些知识,但内容还是传统的百科知识。

翻翻《尔雅》、《说文解字》、《玉篇》、《广韵》、《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过去有代表性的字书,这种情形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尔雅》、《说文解字》中百科词汇的注释,一般比较简短,跟语文词汇没有什么差别。也有个别词的注释比较详细一些,像《说文解字》中“玉”的注释,就交代得比较多。《广韵》中百科词汇的注释,情形大致差不多,唯独关于姓氏的义项交代得突出的详细,这跟一般字词典很不相同。《康熙字典》中百科词汇的注释,一般比较详细,除解释词义外,还介绍一些传统的知识性的东西。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中国语文》1982年第6期,署名文大生,此次选收略有修改。

《中华大字典》虽然出版比较晚,但在百科词汇的注释方面,主要是继承传统,没有什么创新。现在举一组例子,以见一斑。

桃 果也。从木,兆声。徒刀切。(《说文解字诂林》2377页。标点是引用者加的,下面三个例子也是。原书中的繁体字,一律改为简化字,下同。)

桃 达高切。毛果也。(泽存堂本《玉篇》中 14 页)

桃 果木名。《邺中记》:“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又,姓。……(商务印书馆印巾箱本《广韵》第二卷 36 页)

桃 《唐韵》、《集韵》、《韵会》、《正韵》并徒刀切,音陶。《说文》:“果也。”《尔雅·释木》:“旄,冬桃。榘,山桃。”(十三经注疏本《尔雅》“榘”下有“桃”字——引用者注)《礼·月令》:“仲春,桃始华。”《内则》:“桃曰胆之。”〔疏〕:“桃多毛,拭治,令青滑如胆。”又,桃诸,王肃云:“诸,蒞也,今之藏桃也。”又,《典术》:“桃,五木之精,仙木也。”《礼·檀弓》:“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茷执戈。”《左传·昭·四年》:“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后汉·礼仪志》:“为桃印,施门户,以止恶气。”又,舍桃,樱桃也。《尔雅》作楔。又,桃氏,攻金之工也。《周礼·冬官·考工记》:“桃氏为刃。”(十三经注疏本《周礼》“刃”作“剑”——引用者注)又,胡桃,《名物志》谓之羌桃。……(中华书局 1980 年印《康熙字典》辰集中 17 页)

桃 徒刀切,音陶,豪韵㊀果也。见《说文》。〔按李时珍曰。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故字从木兆。品甚多。生长甚速。老死亦速。其寿鲜有至十年者。春末开花。色白或绯。果实秋初始熟。体圆而顶微尖。仁可入药。别有夹竹桃。花似桃。叶似竹。故名。〕(中华书局 1981 年印《中华大字典》已

集 254 页)

第二个阶段,是从《辞源》开始,在词典编辑方面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对百科词汇的注释也做了新的尝试。仿照百科词典中的注释方式,来注释语文字词典中的百科词汇,不过内容比百科词典简单些。《辞源》正编 1915 年出版,续编 1931 年出版,合订本 1939 年出版,改编本或叫简编 1949 年出版。几种本子,在百科词汇方面,有条目加多,注释加详的倾向,简编虽然条目减少,但有的百科条目的注释,反而更加详细。

《辞海》1936—1937 年出版,分上下两卷,1947 年出版合订本。《辞海》百科词汇注释比《辞源》更详细,更系统,在语文字词典中对百科词汇的注释,在当时达到了一个高峰。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所以 1958 年三词典分工时^①,确定《辞海》向百科词典方向发展。新修改的《辞海》,语词减少,百科条目增多,注释加详,已是百科词典的形式了。

《国语辞典》1937 年出版四卷本的第一卷,1944 年出版八卷本,1947 年出版四卷本,1957 年出版简本,改名《汉语词典》。整部词典,注释都比较简短。百科词汇的注释,虽然比《辞源》、《辞海》简略,但在本词典里仍然是比较繁的。这些注释的体系,也是百科词典的形式。

解放前虽然还出版了一些字词典,但大都规模不大,在百科词汇注释方面,或是照抄老的字书,或是仿照前边的三部词典,而简略一些,没有什么新的办法,就不一一介绍了。

现在举两组例子,可以看出大概的情形。

桃 [驼敖切,音陶,豪韵]⊖落叶亚乔木。高丈余。叶椭圆而大。春时开花。色有红有白。果夏熟。味甘酸。⊖姓。

……(《辞源》1915年本,辰129页,1939年合订本763页,注释相同。)

桃 [驼敖切,音陶,豪韵] ⊖ 学名 *Prunus persica* 英名 Peach。蔷薇科。落叶小乔木。叶椭圆而长。春时开花。色有红有白。果夏熟。味甘酸。供食用。原产中国。自此分布于全世界。有变种甚多。可大别为食品与观赏品二类。⊖ 姓。……(《辞源》1950年改编本350页)

桃 驼敖切,音陶,豪韵。⊖ 植物名,(*Prunus Persica*, var. *vulgaris*,) 蔷薇科。落叶亚乔木。高丈余。叶互生,披针形,有锯齿。春日先叶开花,花有红白等色,又有单瓣重瓣之别,单瓣者皆五瓣。实为核果,外面生毛,熟则带红色,大自寸许至二寸余,味甘酸,供食用。⊖ 姓也。……(《辞海》1938年本辰集146页,1947年合订本693页,注释相同。)

桃 去么 taur 滔 ⊖ [植] 落叶亚乔木,叶椭圆而长,春时开花,白或红色,果味甘酸。⊖ 姓。(《国语辞典》1947年本,一卷,724页,1957年简本209页,注释⊖相同,注释⊖姓,删去。)

[商品] 商人陈列市肆。以待客购买之物。(《辞源》1915年本,丑73页,1939年合订本294页,注释相同,1950年改编本,没有这一条。)

[商品] 凡以买卖为目的之物品,总称商品。分三种:一、原料品,乃天然生成未加人工之物品,如五谷、木材等;二、半制品,为稍加人工,略变原态之物品,如棉纱、生丝等;三、制品,亦称精制品,系充分加以人工,完全变更原态之物品,如纺织物、装饰品等。(《辞海》1938年本丑集86页,1947年合

订本 278 页,注释相同。)

[商品] 尸尤夕 | ㄣ shāngpǐn [经] 凡以买卖为目的之物品,总称商品,约分原料品、半制品、制造品三种。(《国语辞典》1947 年本,三卷,3143 页,1957 年简本 903 页,删去[经],注释相同。)

从前边的两组例子,可以看出,这三部词典里的百科词汇的注释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详略有所不同。《国语辞典》对百科词汇标注了学科,这是一个进步。对“商品”的注释,这几部词典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做注的。

解放后出版的一些语文字词典,对百科词汇的注释,在形式上跟解放前的差不多,从几部有影响的字词典看,基本上都是按照百科词典的注释形式注释的,详略有所不同。有的字词典略有一些改进。内容方面有些条目有了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变化更大。解放前的字词典,对哲学社会科学词汇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观点注释的。解放后的字词典都是依据马列主义的原则注释这些词汇的,内容一般都比过去的字词典更加详细了。

《新华字典》是 1953 年出版的,这本小字典在编写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突破了过去字典的框框,从语言出发,不以字为对象。在注释方面也做了一些改进,如“用普通话注释,不滥用互训”等。但在百科词汇的注释方面,形式上还是照《辞海》等的样子,只是内容比较简略。哲学社会科学词汇的注释,是按照马列主义观点注释的。

《现代汉语词典》1973 年出版,在百科词汇的注释方面跟《新华字典》差不多,比《新华字典》更系统,更详细些,照顾了一些语言中的用法。

《汉语小词典》1979年出版,收录语词和百科词汇,百科条目偏重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这方面的收词和注释都是向百科词典靠拢的。

《新华词典》1980年出版,对百科词汇的注释,是有它的特点的。在形式上虽然也是采用百科词典的注释方式,但有些自然科学条目,不做系统的描述,着重叙述跟人的关系,如用途、经济价值等,还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哲学社会科学条目,一般注释都比较详细,进行政治教育的内容比较多。

新修订的《辞源》已经是一部古汉语词典,不收录现代百科词汇。新修订的《辞海》,虽然收了一部分语词,但主要是百科条目,也不是一般的语文词典了,这里就都不再讨论了。

下边举两组例子,供做比较。

桃 táo ㄊㄠˊ ①桃树,落叶乔木,春天开花,白色或红色。果实叫桃子或桃儿,可以吃。②(一儿)形状像桃子的:棉花~儿。(《新华字典》1965年修订重排本419页)

桃 táo ①桃树,落叶小乔木,品种很多。小枝光滑,叶长椭圆形,花单生,粉红色,果实略呈球形,表面有短绒毛,味甜,是一种常见的水果。核仁可入药。②(~儿)这种植物的果实。③(~儿)形状像桃儿的东西:棉~。④指核桃:~酥。(《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本1110页)

桃 ①落叶乔木,春季开花,白色或红色。果实叫桃子,可食或制蜜饯。核仁和花供药用。花供观赏。品种很多。变种“蟠桃”,果实扁圆,也供食用。②形状像桃子的果实。例 棉桃。(《汉语小词典》1979年本477页)

桃 táo ①桃树。落叶乔木。果为核果,味甜多汁。原

产我国。②形状像桃子的东西。[例] 棉桃。(《新华词典》1980年本 822 页)

[商品] 为出卖而生产的产品。(《新华字典》1965年修订重排本 379 页)

[商品] shāngpǐn ①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重性。商品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体现着不同的生产关系。②泛指市场上买卖的物品。(《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本 991 页)

[商品] 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商品是在一定经济条件下产生和存在的,是社会分工和产品属于不同所有者的结果。商品在不同社会里体现不同的生产关系。(《汉语小词典》1979年本 424 页)

[商品] 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有使用价值,能够用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有价值,凝结了一般人类劳动。价值的表现形式是交换价值,即不同商品相交换的量的关系和比例。交换价值的基础是价值。所以,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它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人们按照价值互相交换商品,实际上是互相交换各自的劳动。因此,商品不是物,而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商品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体现不同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成了商品,连人们的劳动力都成了买卖的对象。社会主义社会仍然保留有商品,但其范围已受到限制。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商品才会完全消亡。(《新华词典》1980年本 732 页)

“桃”，《新华字典》除交代了“桃”是一种什么树木之外，还交代了“桃树”和“果实叫桃子或桃儿”。《现代汉语词典》对“桃”也指果实，另立了一个义项。《汉语小词典》对用途交代得多些，还交代了“蟠桃”。《新华词典》的注释比较简单，对生态形态都没有描述。“商品”，《新华字典》的注释比较简短，像一般的语文词注释。《现代汉语词典》交代了“商品”的主要特性，另立了一个义项，照顾语文意义。《汉语小词典》比《现代汉语词典》略详，多交代了一个特性。《新华词典》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商品”的几个特性，注释的繁简跟新《辞海》差不多，但比新《辞海》纯理论性的内容更多更深。

从上边的例子可以看出，自然科学词汇的注释，形式上差不多，内容繁简有所不同，但相差不远。字词典规模大小不同，注释详略应该有差别。哲学社会科学词汇的注释，形式虽然都是采取专科词典注释方式，但内容出入很大，观点上的不同，前边已经说了，文字的繁简，通俗的程度，相差甚远。

二 语文字词典中百科词汇注释的设想

这些年来，百科词汇的注释形式，好像已经定型，都照百科词典的方式来注释，只是根据字词典规模的大小，内容繁简有所不同。按照有的文章对综合性词典的解释，是“指兼收专科术语、专有名词和普通词语即兼具专科词典和语文词典的功用的词典。它对普通词语作‘语词性解释’，对专科术语和专有名词作‘百科性解释’，不强求两者之间风格和体例的一致”。照这样看，好像现在编写的语文词典都是综合性词典。所以有的文章把新《辞源》、《现代汉语词典》等都叫做综合性语文词典。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语

文词典中都收了一部分百科词汇,而这些词汇又都是按照百科词典注释方式注释的,一般都不照顾在语言中的使用情况。

我们既然说语文词典,当然在大家心目中是有这么一类词典,但这类词典不是谁规定出了一个模式,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每部字典词典都有自己的特点,它们之间有着千差万别。反过来说,它们都叫语文字词典,那么也一定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字典词典内容和编辑上的特点,由收词、注音、释义、举例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语文词典前边提的四项一般都有,百科词典注音、例句一般没有。两类词典都有的两项,收词和注释也有很明显的差别。这是因为两类词典的出发点不同,语文字词典是从语言出发的,百科词典是从知识出发的。

百科词汇也是语言的一部分,所以一般语文字词典都收一部分百科词汇。根据每部词典的不同编写目的,对百科词汇选收的标准是不完全相同的,有的多收一些,有的少收一些。尽管每部语文词典选收百科词汇的多少是不同的,但收词的原则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是语文字词典不论收语文词汇,还是收百科词汇都是从语言出发,照顾科学知识。这个关系不能颠倒过来,颠倒了这个关系,就不是一般说的语文字词典了。因此,语文字词典收百科词汇,跟百科词典收百科词汇,原则是不相同的,尽管两者收的词汇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比如“桃”、“商品”,语文字词典、百科词典都会收的,但像“本质和现象”、“偶然性和必然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三个法宝”、“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等,百科词典可以选,语文字词典就不宜收。当然语文字词典会收“本质”、“现象”、“偶然性”、“必然性”、“矛盾”、“法宝”等。这里是顺便提一下收词问题,因为它跟注

释有关系。

语文字词典和百科词典所收的词汇,尽管词目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但对这些词汇的注释,二者应有明显的不同。我国20世纪以前的字词典,大家不感觉语词和百科词汇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这是因为注释都比较简单,在叙述方式上也没有显著的差异。20世纪以来的字词典,有些有了明显的不同,注释繁简有很大的差别,叙述方式也不一样了。这就使人感到现在只有综合性词典,没有语文词典了。因此,应该在注释方面把它们区别开来。做这样的区别,不是有所褒贬,而是各有所需。

近些年来编写的语文字词典^②,在百科词汇的注释方面,已经开始摸索怎样表现出语文字词典的特点。比如:《新华字典》对“桃”的注释,开头就交代了“桃树”,这是因为现在指这种植物,在专业书里可以单用“桃”,但在普通话里一般说“桃树”。就是组词,有用“桃”的,如“桃木、桃胶、桃花、桃红、桃色、桃核_儿、桃仁_儿”等,也有用“桃树”的,如“桃树叶_儿、桃树皮、桃树枝、桃树根、桃树地”等。用单字构成的词,多是就这种植物的某一部分而言,不是指这种植物的整体。比如:“桃红、桃色”的“桃”,是指桃花,“桃核_儿、桃仁_儿”的“桃”,是指果实。在现代汉语里,这种植物的果实叫“桃_儿”或“桃子”,所以《新华字典》在注释里就交代了这么一句。《现代汉语词典》就又列了一个义项,“②(～_儿)这种植物的果实。”另立一个义项比较清楚,只交代果实叫“桃子”或“桃_儿”,不够,因为单“桃”字也指果实。过去的字词典,有的虽然注释得更详细,但都没有照顾这一点。这主要是过去的字词典,只从百科词汇考虑,而没有从语言出发,《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注意到了这一点。这说明现在的语文字词典对百科词汇的注释正进行新的探索,有

了改进。尽管如此,总的看来,还是很不够的。因此,仍然使人感到是综合性字词典,不是语文性字词典。下边谈几点怎样注释语文字词典中百科词汇的粗浅的想法。

1. 要用普通话注释,改变文言腔、翻译腔、行话腔。过去语文字词典里的百科词汇注释,大都是采用专科词典的注释而加以简化,不是消化后重新编写的。所以在使用这些注释时,把专科词典里的一些不应该照搬的东西也搬来了。致使“文言气太浓”,“翻译味儿太重”,“行话太多”。改变文言腔并不难,只要稍加注意就行了。但有的认为文言简练,注释里用文言可以少占篇幅,这是不可取的。应该用普通话注释,力求精练。个别条目的翻译腔,有的不大好改,怕不符合原来的意思。这样的条目,应该消化后重写,使它符合汉语中这个词汇的意思。少说行话,应该是语文字词典注释的一条原则。在专科词典的注释中多用一些行话,问题不大。因为专科词典里收的专科词汇多,能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本词典一般能解决本词典里的问题。语文字词典里收不了这么多专科词汇,注释里用的行话太多,查字词典的人查到了也看不明白,这是应该考虑的。有的条目,怕不用行话注释不确切,所以提出“科学性第一,通俗性第二”。这对专科词典来说,或者是可以的,对语文字词典是大可斟酌的。因为大家都看不懂,那就失掉了语文字词典编写的意义。像前边举的“商品”的例子,注释中用的专业术语太多,没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看不明白,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到语文字词典里查“商品”解决什么问题呢?为了使人能看得懂,语文字词典的注释,应该尽可能少用行业语。

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字词典工作者的重视,不少字词典里都存在着这种毛病。虽然这不是重大的缺点,但作为典范的字词典,

使用语言也应该是典范的。一部字词典里语文词汇的注释都用普通话,只在百科词汇的注释里夹杂一些文言、行话、翻译句子,显得很失调。一部字词典在使用语言上应该保持风格的一致性。

2. 注释应该简练。现在语文字词典中百科词汇的注释,一般都失于过繁。当然,百科词汇是介绍知识的,不能只简单地说明词义就行了,像注释“桃”,只说是“一种果树”,应该交代一些必要的知识。但字词典里收的条目,很多的都可以写一本书,或者是写一大部书。字词典的篇幅有限,无论如何,容纳不了这么多内容,只能选最需要交代的内容,交代一些。比如一部中型词典,语文条目,一个意义的注释,少的只有一两个字,多的也不过一二十个字,一条百科词汇,一个意义的注释,多的有一千多字。相差这么悬殊,实在不协调。何况就是再多一些字,内容也交代不完,还是只能交代重要的。语文字词典中的百科词汇是供一般人看的,只能提供一个简单概念。像提到的“桃”,主要是使人知道“桃”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果树。如果想经营桃园、研究桃树,查一本中型语文字词典是解决不了他所需要的知识的。因此,语文字词典中的百科词汇的注释,不能过繁。就是综合性词典,两者的注释也不能相差太远,只能是略微详细一些罢了。

近年来编写的一些语文字词典,为了突出思想性,进行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对一些百科词汇注释较详,这是可以理解的。字词典的注释应该体现马列主义观点,体现党的方针政策,但字词典的注释不同于标语口号,也不同于政论文章。因此,字词典的注释在这个方面应该有个适当的尺度,否则,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比如有一部中型词典,“中国共产党”的介绍在词典里占 16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介绍占 23 行,党的一位领袖的介绍占 68 行,“彭

德怀”的介绍占 21 行，“黄继光”的介绍占 20 行，“刘胡兰”的介绍占 9 行，“鲁迅”的介绍占 43 行，“郭沫若”的介绍占 33 行。相差悬殊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就不多举了。从这些例子来看，注释详略，出入很大。“中国共产党”的介绍只占 16 行，党的一位领袖的介绍占 68 行，“黄继光”的介绍占 20 行，“刘胡兰”的介绍占 9 行。这样安排，轻重过于失当。重大条目的注释，严重不平衡，本身就是问题。

进行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在注释的行文中体现出来，不宜专文交代，尤其是不宜专用一大段话来交代。比如在一本中型词典中，“胰岛素”一条，注释有 9 行，正式注释只占 4 行，说明政治意义的部分占了 4 行多，而且在这部分交代中又给使用词典的人提出了新的问题——生命起源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本词典没有收这么一条，在“生命起源”一条中，只交代了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的看法，没有提到辩证唯物论者的看法。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看了也不明白，有这方面知识的人，也就用不到看这个注释了。还有“陨星”一条，注释有 15 行，正式注释只占 5 行多，交代我国早就有陨星的记载占 1 行多，交代我国吉林降陨石雨占 8 行，几乎是条目内容的注释只占 $\frac{1}{3}$ ，而额外的交代却占 $\frac{2}{3}$ 。这样注释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但结果是很值得考虑的。使用字词典的人殷切期望的，是在有限的篇幅里，多收一些条目。

上边只举了两个例子，实际上这类情况是比较普遍的，现在出版的字词典几乎都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牵涉的条目不少，只是有的突出些，有的不那么突出就是了。为了更好地利用字词典的篇幅，这类注释应该大力削减，像“胰岛素”、“陨星”的注释，额外交代

的部分都可删去。如果“胰岛素”要保留这方面内容的话,只有一句,“我国在 1965 年首先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晶体”,也就够了。

至于前一时期阑入到字词典注释里的“穿靴戴帽”和牵强附会的东西,都应该剔除,这里就不多讨论了。不过这几年出版的字词典里,这类东西还有遗留,有的字词典里还有不少。应该看到,这些东西不仅是额外的负担,有些是曲解了词义,歪曲了词汇的用法。删除这类东西,在今天一般都会同意的,那为什么有的字词典还遗留的不少呢?这说明了,一个时期内形成的某些东西,要彻底清除,还不是那么容易的,必须认真对待才行。

3. 打破百科词典注释程式。百科词典的注释,一般都比较繁,它要系统地介绍科学知识,不可能太简单。语文字词典中的百科词汇,如果按照这个程式去注释,也不会注得简练。比如“桃”的注释,按照百科词典注释,把学名、门、纲、目、科、属、种都交代一遍,再把根、茎、叶、花、果实等都描述一番,然后再介绍分布情况,跟人的关系,等等。这样注,怎么也简短不了。如果打破这种程式,画龙点睛地注释,使注释既符合现代科学,又不像专科词典那样系统地介绍知识,而是有选择地介绍知识,这样就能注得简短些。《新华词典》对动植物等的注释,就不做系统的描述,而把跟人有关系的内容多交代一些。语文字词典里的自然科学词汇的注释,打破程式,精练内容,是不难做到的,只要做出一些规定就行了。哲学社会科学词汇的注释,怎样做到观点明确,内容恰当,文字简练,困难多些,但应向这方面努力。

由于一个时期的错误批判,语文字词典里的哲学社会科学条目,或跟政治思想沾边的语词,注释越来越多。翻开手头常用的一些字词典,这类例子是很不少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是因为

总怕注释得不清楚,观点不鲜明,割裂了经典定义。因此,就尽量地引用经典著作,或用经典著作中的一段话或者一段话的意思做注释,不管是否跟语文意义相合。比如:“爱”,《新华字典》(1965年本)注为“①喜欢,对人或事物有好感:~祖国,~人民,~劳动。……”后来有的字典就注为“①对人或事物有深厚的感情。在阶级社会中,爱是有阶级性的。毛主席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矫枉过正”,《现代汉语成语词典》(1959年出版)注为“纠正错误作得太过分,仍然不正确。……”《现代汉语词典》(1973年本)注为“纠正偏差做得过了分。”《汉语成语小词典》(1979年印本)注为“……原意是纠正错误超过应有的限度。旧时有人常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要人们只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允许完全破坏旧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的理论。”《现代汉语词典》修改稿还在后面加了“马克思主义认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有的怕战斗性不强,加一些壮声势的词句,有的怕爱憎不鲜明,添一些褒扬或贬抑的词语。总之,注释越来越多。比如:“安家落户……现常指干部、知识分子长期扎根在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朝气蓬勃地干革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现比喻不怕牺牲,敢于同一切貌似强大的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文恬武嬉……文官安闲自得,武官游荡玩乐。指反动官吏只知贪图安逸享受,吃喝玩乐。……”“文人相轻……指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这是旧知识分子的一种恶习。”这类例子不少,不多举了。

语文字词典的注释,应就语文的特点来考虑,凡是能用语词的

注释方式解释明白的一般词语,不要按照专科词汇的注释方式来解释,强加进一些不是语文意义所具有的东西,像前边“爱”、“矫枉过正”等的注释。语文词语的注释应紧紧扣住词义,跟词义无关的东西,不要放到注释里。前边的几个例子中,都有一些与词义无关的语句。

从前边的例子可以看到,语文字词典里有的注释引用经典著作,或者用一段经典著作的话或一段话的意思做注释,以为这样做是突出政治的保险办法,而实际上字词典中这样引用经典著作,倒可能出现断章取义、歪曲经典著作的问题。这是因为字词典的篇幅有限,引文不能太长,意思可能不完整,不全面。再者,经典著作里的一段话,一般不是为字词典的定义写的,而是讲某一方面的问题的,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字词典的注释里孤立地引用几句话或一段,没有了上下文,脱离了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相对的成了绝对的,把对个别问题讲的话,成了普遍的规律,这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前边举的“矫枉过正”的注释。这个注释是仿照《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写的,但没有全用。《毛泽东选集》注释,后边还有这么几句话,“毛泽东同志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毛泽东选集》注释说得很清楚,这段话是针对某个问题说的,而在词典的注释里,却成了马列主义的普遍规律,这不正是割裂了经典著作,歪曲了马列主义吗?而且这样注释也不符合语言中的使用情况。比如有一本讲修钟表的书上说,如果安轴的孔太大了,就修小一些,但不能矫枉过正。假如矫枉必须过正,把孔修得小小的,结果轴安不进去了,这不是荒谬的吗?语文字词典中的哲学社会

科学词汇的注释,既要观点正确,还要顾及语言实际。

语文字词典里的哲学社会科学词汇不能注得太详细,越详细牵涉到的问题越多,给读者带来的困难也越多。像前边举的“商品”的例子,一部词典比一部词典介绍的内容多,一部词典比一部词典的难点多,没有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很难看得明白。注释中的问题,读者还得查词典,同一部语文字词典中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还得去查政治经济学词典。由此可见,这类词汇注释长了,不一定对读者有多大帮助,倒可能成为读者的负担。

从上边的讨论可以看出,语文字词典的注释是比较简短的,百科词汇的注释虽然稍为详细,但还是比较简略的。因此,语文字词典中的百科词汇,不能像专科词典那样,全面地、系统地介绍专业知识。只能根据语文字词典的要求,做到观点正确,基本概念清楚,不求全,力求简练。凡可以不说的话,一定不写,可以不介绍的知识,一定不介绍。不怕专家说浅薄,不怕内行说简陋,要使读者感到适用。

4. 从语言实际出发,考虑百科词汇的意义分析和注释。前边提到《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对“桃”的注释,提出了果实,这是对的,但还不够。就拿“桃”来说,除了“植株”和“果实”外,还指“花”和“木料”。比如:“桃红”、“桃色”、“桃李争春”等的“桃”,是指“桃花”;“桃符”、“桃剑”、“桃弧棘矢”等的“桃”,是指“桃木”,这些也应该照顾。当然,这四种用法也有差别,前两种可以单用,也可以组词,后两种只组词,不单用。平常说“竹”或“竹子”,有的场合的意思是指这种植物,像“竹笋”、“栽了很多竹子”,有的场合是指用这种植物做成的材料,像“竹竿”、“竹床”、“竹筷子”等。后边的用法,字词典都不照顾。再比如“茶”,《辞海》(1947年合订本)

只交代了植物名称这一个意义,《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本)除收植物名称意义外,还照顾了“②用茶叶做成的饮料。③某些饮料名称:……杏仁~。④指油茶树:~油”。有的字词典还提到“山茶”。在现在的字词典中,关于“茶”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算是收义项比较多的了,但如果从语言来分析,还是不够的。比如“采茶”的“茶”,是指“茶树的叶子”;“花茶”、“绿茶”、“红茶”的“茶”,是指“茶树的叶子做成的饮料原料”;“枣茶”、“柿叶茶”、“桂花茶”等的“茶”,是“泛指用某些植物的嫩叶、花、果等做成的饮料原料”,或是“用这样的饮料原料做成的饮料”;“儿茶”、“消肥茶”等的“茶”,是指“某些药或某些药用饮料”,还有“茶晶”、“茶镜”、“茶青”等的“茶”,是指“像茶汁的颜色”,等等。人们用某些动植物的名称来指称它们的某一部分,在语言里是很常见的,除上边提到的外,还有很多。如用某些动物的名称,来指称它们的毛皮,像“狐(狐裘)、水獭(水獭领子)、灰鼠(灰鼠大衣)、海龙(海龙帽子)”等。用某些植物的名称,来指称它们的果实或种子,像“梨、杏、核桃、栗子、苹果、葡萄、香蕉、葫芦、西瓜、谷子、高粱、大豆”等。用某些动植物的名称,来指称它们供食用、药用的部分,或供其他方面使用的部分,像“鸡、鸭、蛤蜊、蛭子、萝卜、土豆、芋头、香椿、贝母、半夏、甘草、檀香、箬(箬帽)、荆(负荆)、麈(麈谈)”等。过去的字词典,没有从语言的运用出发,在这方面分析得不细,应该弥补这个缺欠。

关于度量衡名称,有的字词典只注市制,像“尺”注为“市尺的通称”,“升”注为“市升的通称”,“斤”注为“市斤的通称”。这是很不够的,语言里说“尺”、“升”、“斤”等,不限于指“市尺”、“市升”、“市斤”等。比如:“公尺”、“英尺”、“营造尺”、“裁衣尺”的“尺”,就不是“市尺”的意思。就是“市尺”的“尺”,也不是“市尺”的意思。

说早些年的事,提到“尺”,像旧小说里说的“身高八尺”、“膀大三尺”等,也都不是“市尺”。因此,“尺”应该注为“①长度单位,十寸是一尺,十尺是一丈。②现在一般指市尺”。“升”、“斤”等一系列度量衡名称,都应当这样处理。

《新华字典》“电”字,①是平常说的“电”的意思,②是“打闪”的“闪”的意思。现在有的字词典,不收“闪”的意思,据说是因为“闪”也是“电”,是一回事。这是不对的,虽然从物理方面来说,二者是有关系的,但不能等同起来,正如“雷”,也不等于电。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二者更是不同的。像“雷电交加”、“迅如闪电”、“风驰电掣”等的“电”,都是“闪”的意思。从语源来说,“电”的比较早的意思是“闪电”,后来才有物理学上说的“电”的意思,所以字词典里应该收这个意思。

有些词语,既是普通语词,又是专科词语。过去的字书,不分语词和专科词语,当然都按语词注释了。近代编写的词典,吸收了现代科学知识,就照着专科词典的注释注了,一般不管语文用法。现在的字词典有三种情形,一是照语词注释,并举例;二是照专科词汇注释,不举例;三是既有语词性注释,又有百科性注释,举例或不举例,两种注释有的合在一个义项内,有的分为两个义项。从语文字词典来说,第二种形式不大合适,一、三两种形式都可以,但只用第一种形式,人们可能感到不满足,用第三种形式比较好。当然,这些词语也不完全一样,像“风”、“雨”等,按照现代科学注释,写得通俗些,简短些,跟语词注释没有什么矛盾。如果写得太专太长,就显着不协调了。像“水”、“白”等,完全按照现代科学注释,不加语文注释,跟一般用法就不一定相合。比如《现代汉语词典》注释的“水”,是科学上说的“水”,跟我们用的“水”不一样。老《辞海》

对“白”的注释,符合科学定义,但跟一般用法不合,现在的字词典大都没有这么注。现在的注释,跟“白”的名词义相合,跟形容词用法还不完全相合。“大风”、“大雨”一类词语,语文用法跟科学定义不完全一样,一般说“大风”、“大雨”是个模糊的概念,气象学上说的“大风”、“大雨”是有确切的含义的。《现代汉语词典》“暴雨”分为两义,“①大而急的雨。”②指气象学上的暴雨。新《辞海》没有分义项,而交代了这两方面的意思。“大雨”,新《辞海》也是这样注释的。这样处理比较合适。《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本)“大雨”只交代了气象学上的意义,没有照顾一般用法,1983年本就加上了。

哲学社会科学词汇,同样应该照顾语文用法,但现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比如:“剥削”,字词典里只注释“凭借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的意义,不管“泛指通过某种手段侵占别人的钱财”一类意义。“商品”只注释“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的意义,不管“泛指市场上买卖的物品”一类意思。“价值”只注释“体现在商品里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意思,不照顾“用途、积极作用、重要性”等一类意思。“国家”只注释“国家机器”的意义,不照顾“指一个国家的领土”的意思。还有“科学”、“经济”、“道德”、“人道”、“官僚”、“教条”等,现在都有形容词的用法,这些都应该作为语文意义,收到字词典里,否则,就解决不了人们使用语言时所遇到的问题。

语文字词典中多是用举例的方式照顾词语的修辞用法,百科性注释一般都较长,后边不好再举例,这样,很多修辞用法就照顾不了。这是个损失,可考虑适当地加比喻义来照顾。

编写老《辞源》、《辞海》时,科学知识不大普及,一些词语用百科性注释来注,像“水”、“白”等,灌输现代科学知识。人们感到新

鲜,有一定用处,乐于接受。现在科学知识已较普及,许多知识已经成了常识,人们不觉着有多大需要了,查语文字词典,倒希望多知道一些语文意义和用法。这也就是现在对这些词语,凡用百科性注释的,都要加语文性注释的原因了。从上面的讨论来看,一般词语要尽量少用百科性注释,必要的科学知识可融合到语文性注释中,像“风”,可注为“空气流动形成的气流”。必须用专科定义的,可仿“暴雨”注释。

5. 百科词汇的注释,要结合语言的使用。语文字词典中的百科词汇注释,要符合现代科学,但不要照专业书那样去描写,而要结合语言的使用来介绍知识。比如注释“鲸”,虽然现在说“鲸鱼”,但不能注释为“生活在海洋里的一种鱼”,应该注释为“生活在海洋里的胎生哺乳动物,形状像鱼。”后边结合语言的使用介绍知识,比如“种类很多,大的有三十来米长,头大嘴宽,吞食鱼类等”,使人容易了解“鲸吞”的意义。顺便说一下,语文字词典中的“鱼”,如果是按专科词汇意义注释的,还应该加一项语文意义,“泛指水里的某些动物”,照顾鲸鱼、圆鱼、墨鱼、章鱼、鲍鱼等。

前面提到的“桃”,可注为“桃树,常见果树,落叶小乔木。春天开花,粉红色。果实略像球,顶端稍尖,可以吃。旧时迷信,认为桃木能避邪”。这样注,是从“桃”在语言中的使用情况考虑的。交代花开的时间,是因为“桃汛”、“桃李争春”等,跟花开的时间有关系。交代花的颜色,是因为“桃色”、“桃红”等,跟桃花的颜色有关系。像“杏黄”、“橙黄”、“橘红”、“枣红”、“苹果绿”、“橄榄绿”等,结构虽然跟“桃红”一样,但后者是就果实的颜色说的,这些都应该在本条内交代。说“棉花桃”、“桃形”等,是跟桃树果实的形状有关系,所以要交代果实的形状。旧时迷信,认为桃木能避邪,用“桃”组成了

一系列词语,现在一般不用了,在书面上还能看到,可以交代,如果就现代汉语考虑,不交代也可以。其他方面,在语言里不大用到,就不必交代了。

再比如“铁”,可注为“化学元素,常见的金属,纯铁灰白色,质地坚硬,可以制造兵器、器物等,用铁做的器物比较坚固。”因为语言里说“铁青”、“铁骢”等,是就“铁的颜色”说的。说“铁拳”、“铁蚕豆”、“铁面无私”、“铁石心肠”等,是就“铁的质地坚硬”说的。说“铁人”、“铁汉”、“铜墙铁壁”、“铁打江山”、“铁板一块”等,是就“铁这种材料质地坚固”说的。说“铁甲”、“铁锅”、“铁锨”等,是就“铁这种材料”说的。“手无寸铁”、“铁血主义”等,是就“铁做的兵器”说的。因为语言里常用到这些方面,所以选这些作为铁的注释。

“角儿 juér”,现在语文字词典,一般只注“①演员。②剧中人物。③戏曲演员专业分工的类别”。《国语辞典》(简本)注为“谓戏剧演员之著名者,又引申为露头角者之称”。现在字词典中宜加“(多指主要演员或剧中主要人物”之类的意思,便于读者理解平常说的“是个角儿”等用法。

“龙套”,一般注为“传统戏曲里扮演兵卒等角色的统称”,还应该交代“是戏曲里需要有而又不重要的角色”一类意思,使查词典的人便于理解现在说“跑龙套”、“当个龙套”等的比喻意义。

“菩萨”,可注为“①佛教指修行到了一定程度、地位仅次于佛的人。佛教徒认为观音菩萨是慈悲的化身,救苦救难的神。”这样注,人们看到“菩萨心肠”、“菩萨低眉”等就容易明白了。

“阎罗”,注为“佛教对管地狱的神的称呼。也叫阎罗王、阎王、阎王爷”。“阎王”,可注为“①阎罗。迷信的人认为阎王管人生死,十分严厉。……”使查词典的人便于明白“见阎王”、“活阎王”等

说法。

现在语文字词典中,对百科词汇的注释,只是就专科词汇意义注释,不考虑语言中的使用情况。因此,一些词的语文用法看不出跟它们所从属的专科词汇意义的关系。上述各例的注释,就是想把它们联系起来。这样注释,主要是从语言的角度着眼的。如果从专科词汇来考虑,显然是有缺欠的,比如“不完备,不系统,交代的跟语言有关的内容,在专科词汇里不是重要的部分”,等等。这些不能两全的方面,只能以语文为主。

6. 语文字词典中的百科词汇要标注学科。语文字词典中的百科词汇,标注学科是十分必要的,对查字词典的人很有用处。标注了学科,可以使查字词典的人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词语,注释是就哪方面的意义注的。因为有些词语,是语文词语,还是专科词语,注释的是专科意义,还是语文意义,不是一眼就能看明白的。比如:“蚤(蠹)xiǎng 知声虫,也叫‘地蛹’。”乍一看像个专科词,其实现在专科书里不用,还是语文词。书中标了学科,这类词不标,就比较清楚了。还有一些词,既是专科术语,又有语文用法。对这类词语意义的收取,各部字词典是不完全相同的。有的字词典只收专科意义或语文意义,有的字词典两种意义都收。比如“星”,《新华词典》收了专科义:“①天空中发射或反射光的天体,分为恒星(如太阳)、行星(如地球)、卫星(如月亮)、彗星、流星等,口语通称星星。”《汉语小词典》收了语文义:“①天空中除太阳和月球以外肉眼看到的发亮的天体。[例]恒星|行星|卫星。”《现代汉语词典》两者都收了:“①夜晚天空中闪烁发光的天体:~罗棋布|月明~稀。②天文学上指宇宙间能发射光或反射光的天体,分为恒星(如太阳)、行星(如地球)、卫星(如月亮)、彗星、流星等。”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前边提到的《国语辞典》对“商品”一词的处理,1947年本跟1957年本注释相同,但后者取消了〔经〕。这是因为1947年本的注释,是作为专科词汇的注释,所以标了〔经〕。1957年时再用这个注作为专科词汇的注释,就不合适了。因此,取消了〔经〕,作为一般词语处理。1957年简本主要是保留了语文词汇,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词汇基本上都删去了,所以这一条也没有加作为政治经济学术语的意义。

区分语文词汇和百科词汇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有些专科词语在语言里的使用,跟一般语文词语不同,标注了学科,可以让使用字词典的人更好地使用这些词语。比如“柿”和“柿子”,专业书里可以单用“柿”,指这种植物或这种植物的果实。但在普通话里一般说“柿子”,不能单说“柿”。“院子里有棵柿子”,“摘了几个柿子”,都不能说“柿”。“柿”标上〔植〕,知道这是专科词语,“柿子”没有标学科,是一般词语。再比如“箨”,专科术语用,古汉语里也用,但普通话里一般不用,只注作“竹笋上一片一片的皮”,就不清楚,读者可能误用。如果标注〈书〉或〔植〕,读者知道了使用范围,就可以避免误用。还有一些词语,像“鱼”、“星”、“暴雨”、“商品”等,有专科意义,也有语文意义,二者很相近,但所指的范围不同,标注学科,可以帮助读者区分得更清楚,避免误解误用。这些,对语言规范化是大有好处的。

这些年来编写的语文字词典,收录的百科词汇大都不标注学科,《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标注了学科,1978年本又把标注的学科删掉了,实为憾事。倒是《汉英词典》、《汉俄词典》等标注了学科,这说明了标注学科并不是做不到的事,只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罢了。今后编写的字词典应该补上这一课。

附 注

① 三词典分工,指的是《辞源》(修订本)、《辞海》(修订本)和《现代汉语词典》的分工。当时议定,《辞源》修订成古汉语词典,《辞海》向百科词典发展,《现代汉语词典》编成一部记录普通话词汇的词典。这三部词典就是按照这个精神编纂修订的。

② 本文谈的近些年来语文字词典的情况和所举的例子,都是来自《新华字典》(1965年修订重排本)、《学习字典》(1975年本)、《汉语常用字典》(1973年本)、《工农兵字典》(1978年增订本)、《古汉语常用字典》(1979年本)、《四角号码新词典》(1977年修订重排本)、《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本)、《汉语小词典》(1979年本)、《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年本)、《新华词典》(1980年本)、《辞海》(1979年版、1980年缩印本)、《辞源》(1979年修订本)等,文中就不一一指出了。

《现代汉语词典》科技条目编写 和标注外来语问题*

李伯纯

《现代汉语词典》(简称《现汉》)是一部中型语文性词典,服务对象是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目的是为了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这一点是从事《现汉》编纂工作者深知而铭记的准则。另外,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大量科技词语进入日常生活用语,诸如:雷达、乙肝、中雨、冷锋、低压槽、频道、飞播、滑坡、软件等等,而且有些科技词已派生出来语文用法,例如:滑坡、曝光等。语文词典收录科技词条显然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收词的范围和注释的详略必须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否则,语文性词典与百科性词典或者专科性词典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笔者从事《现汉》科技条目编纂工作二十余年,本文拟结合个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谈谈一些体会。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科技收词范围不要以某一学科整个体系的全套词汇为标准,换言之,不要求全责备,必须从语文角度衡量,常用者多收些,不常用者少收乃至不收。举例来说,植物学上的叶形、花序就不一定都收全,与语言或文字有关的酌收,语文上罕用者不收。这个原则很明确,但编写词条时,往往受专业参考书(专业词典或专业论著)以及专业单位审读意见的影响而偏离语文性的原则。外国的一些语文性词典,如:英国的 C. O. D: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法国的“Lexis”和“Littré”等著名词典,科技条目绝非广收详注,其收词、注解与该国出版的百科词典显然不同。

语文词典中科技条目的注释,力求简明易懂,只要不违反科学性,力求通过词典的注释,使不懂该学科的读者,能够大致了解所查条目的主要概念,这就够了。不要求注解得像专科词典那样精确详尽,更应尽量避免用专科术语来注释专科术语,否则,懂该学科的人不必在语文性词典中去查该词,而不懂该学科的人查了词典,还是不懂,甚至于本来只是一个术语不懂,查完词典之后,一连串的专科术语都不懂,使读者感到困惑。笔者曾有过《现汉》科技词条应与百科词典相抗衡的错误想法,无形中使《现汉》的语文性和通俗性受到影响。经验证明:语文性词典中科技条目的注释似应采取绘画中速写或素描的手法,只消几笔就勾勒出某人或某事物的大致轮廓或特点。使读者一目了然,知其梗概,试以《现汉》植物条目为例,注释每条都把生态(一年生,二年生,多年生等)、形态

(根、茎、叶、花、果实各部分)、经济价值等逐一罗列。这样注释,似嫌过专、过繁。实际上,绝不会有读者用《现汉》的植物注释来当检索表去鉴别几种不同的植物,更不会有读者根据《现汉》医药条目来诊治疾病。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现汉》在当时国务院大力支持下得到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当时语言所属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研究院、地质科学院、农业科学院等许多专业单位大力协助审稿,使得《现汉》受益匪浅。有少数有问题而难以解决的科技条目,笔者曾亲自拜见有关专家、教授当面请教,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如天文学家李剑澄先生,医学专家林巧稚大夫、张安大夫、张孝骞大夫、任应秋大夫,植物学家胡先骕教授、夏玮瑛教授,鸟类学家郑作新教授,鱼类学专家张春霖教授等等,他们对我提出的问题都逐一详细回答,从而提高了词典注解的质量。对于这些专家学者迄今由衷感激。

有些科学名称与通用的商品名称相异,作为语文性词典宜尽量把它们联系起来,如果只依据科学专著的说法,置通用的名称于不顾,就会使一般读者困惑不解。例如:“海龙”一词,根据《脊椎动物名称》也叫杨枝鱼,是一种鱼,笔者请教动物研究所某专家,他认为“海龙”就是一种鱼,也叫杨枝鱼,不可能是一种毛皮兽。然而事实上,笔者在高级帽店里看到价格昂贵的皮帽,放在小玻璃匣内展售,标签上明明写的是“海龙皮帽 4800.00”。专家认为“海龙”就是“杨枝鱼”。鱼怎么能做皮帽子呢?商业上用“海龙”一词想必有所依据。带着这个问题,笔者亲自请教了畜产公司裘皮组有关专家。其答复是:“海龙”就是“海獭”,产于北美阿拉斯加,我国不产此毛皮兽,海龙毛皮珍贵,常以黄金计价。笔者翻查了《美国动物

学》，该书所说 sea otter，其形态、生态、产地、经济价值等均与畜产公司所说相同。根据以上材料，《现汉》做了综合处理：[海龙]①〈口〉海獭。②鱼，身体细长，表面有环状的骨片……也叫杨枝鱼。[海獭]哺乳动物，身体圆而长，前肢比后肢短，趾有爪，尾巴短而扁，毛深褐色。生活在近岸的海洋中，毛皮很珍贵。通称海龙。于此可见，多方面的调查和咨询是词典工作的重要环节。

二

本文所说的“外来语”，指本民族语言以外的语言。对于汉语来说，不仅从英语、法语、俄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语言借入的词语看作是外来语，就是从满语、蒙语、藏语、维吾尔语等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借入的词语也同样看作是外来语。这里外来语的“外”字是“语种”的概念，而不是国籍的概念。

外来语的特点在于通过音译基本上保持了原来词语的读音特点，例如：雷达、沙发、沙龙、萨其马、敖包等。由于是译音词，不论是从单个汉字来看，还是从汉字组成的词形来看，都难以正确理解该词所指的事物。因此，在语文词典中，就有必要标注外来语，使读者对这些词的词义和用法有正确的理解。否则，读者很容易从字面上猜测而产生误解。例如：有人竟然把“纳粹”与“国粹”联系起来理解词义，把“雷达”与“马达”相提并论，岂不荒唐可笑！

应该指出的是：有些词语，虽然是从其他语言借入的，但年深日久，在本民族语言中长期使用，根深蒂固，不再有异种语言的语感，例如：葡萄、狮子、菠菜等，这类词汇在一般语文词典中就不再看作是外来语了。

《现汉》条目标注外来语的原则如下：

1. 与字、词来源有关的，特别是与语音有关的译音词；或者是与符号来源有关的外来词；或者是与注解中有关的外国人名，一般都标注外文，而且尽量注出词语或者符号来源的外文。例如：

[沙发]……[英 sofa]

[蒙太奇]……[法 montage]

[按蚊]……[按，新拉 Anopheles]

[锰]……符号 Mn [manganum]

[弥撒]……[拉 missa]

[纳粹]……[德 Nazi,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artei) 的缩写]

[伏特]……这个单位名称是为了纪念意大利物理学家 Alessandro Volta 而定的。

[哗叽]……[法 beige]

[波尔卡]……[捷 polka]

[沙丁鱼]……[沙丁，英 sardine]

[卡车]……[卡，英 car]

[盖世太保]……[德 Gestapo, 是 Geheime Staatspolizei (国家秘密警察)的缩写]

2. 来源为梵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波斯语等都用英文转写。例如：

[菩萨]……[菩提萨埵之省，梵 bodhi-sattva]

[佛陀]……[梵 buddha]

[阿拉伯人]……[阿拉伯，阿拉伯语 Arab]

[阿门]……[希伯来，āmēn]

[阿訇]……[波斯 ākhūnd]

3. 有些词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词,对于这些词则不用英文转写,只注明是哪个民族的语词。例如:

[萨其马]……[满]

[哈什蚂]……[满]

但有些词在注释一开头就已经说明了是我国哪个民族的事物,读者一目了然,注释最后就不附民族名称了。例如:

[敖包]蒙古族人民做路标和界标的堆子……

[哈达]藏族和部分蒙古族人民表示敬意和祝贺用的长条丝巾或纱巾,……

克⁴ 藏语容量单位,一克青稞约二十五斤。也是地积单位,……

4. 与条目注释音译来源或者注解内人名、地名、符号来源无关的外文一概不注。例如:

[人类学]一词不注[英 anthropology]

[频率]一词不注[英 frequency]

[青霉素]一词不注[英 penicillin]

但在[盘尼西林]一词下却注明[英 penicillin]

[金霉素]一词不注[英 aureomycin]

但在[巴龙霉素]一词下却注明[英 paromycin]理由是[盘尼西林][巴龙霉素]与音译有关而[青霉素][金霉素]与音译无关。

另外,与汉译名有关者则尽量注出语源外文如[奥陶纪]……由英国威尔士北部古代的奥陶族(Ordovices)而得名。

[哈雷彗星]……英国天文学家哈雷(Edmund Halley)在

1705年计算出它的轨道……故名哈雷彗星。

[有加利]桉。[英 eucalyptus]

[獾狓狓]……[英 okapi]

[苦迭打]‘政变’的音译。[法 coup d'État]

综上所述,《现汉》标注外来语的原则与百科词典或专科词典原则不同。

语文字词典的括注形式*

刘庆隆

翻开近些年出版的一些字词典,经常会看到在括号里交代一些什么,从字形、词形、注音、释义以及“见×页”等都有,真是广泛得很。这是因为字词典里需要交代一些内容,而又不要跟正式的字头、注音、注释等混杂起来,于是就广泛地使用了括号,括号也就成了在字词典里多方面使用的符号了。

在括号里附注一些什么,当然也应该算是括注了,但这里讨论的括注注释形式不包括字头、词形、注音之类的括注。因为像“爱(愛)”、“也叫露板(版)”、“……檄(xí 习)”等,不复杂。就是词形虽然形式多些,包括“(～儿)、(～子)、(～头)、(～的)、(叠)”等,也不算复杂,所以这里就不多讨论了。

这里讨论的主要是跟语文字词典注释有关的括注。为了讨论的方便,分成四类。一是注释中需要交代而又不是词语意义部分的括注,二是注释行文需要有而又不是词语意义部分的括注,三是一些附带说明的括注。四是标志语。

近几年出版的字词典对括注的使用逐渐多了起来。像《新华字典》、《学习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汉语小词典》、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2年第3期,署名文大生。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新《辞源》等,都使用了括注,而且大多是用来弥补注释的不足。当然,括注的使用还在摸索阶段,问题不少,需要研究提高。不过,在目前整个字词典注释问题还没有在理论上很好地解决,括注问题也不可能有什么飞跃,只要做到使用得合理些,系统些,一致些,就不错了。

目前,字词典注释中还有一些方面不容易做好,像区分同义词或近义词,不滥用简单互训和拆字注释,确切注释词语的意义,表明它们的用法和色彩,等等。这些都可以借助括注,弥补一些不足之处。括注形式,灵活多样,能起到别的注释形式起不到的作用。但这种形式,绝不是灵丹妙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还要看到这种注释形式是一种辅助手段,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用滥。用滥了,不但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会成为累赘,白占篇幅。

字词典注释,应该简单明确,不能用字太多。注释和例句,一般能表明词义而不会使人发生误解或用错,就不必另加括注。要求注释面面俱到,滴水不漏,那是做不到的,就是一条注释加上几条括注也不行。因此,凡能不加括注的一定不加,非加不可的才加。现代汉语的字词典,为了推广普通话或汉语规范化的需要,可以适当地多加些括注,但也不宜过多。

过去的字词典注释中不大用括注,凡是交代的東西都一股脑儿放在注释里。不分哪些是词语注释的部分,哪些是附带的说明,让查字词典的人自己去辨析。查字词典的人往往不得要领,弄不清主次。现在的一些字词典里使用了括注形式,想把字词意义的解释跟一些附带的说明区别开。但现在的一些字词典大都新旧办法兼用,一部书里自己就不一致,不同的书里出入就更大,甚至有些方面是相反的。比如:“跟‘×’相对”或“跟‘×’相反”,《新华

字典》作为注释,《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括注。“见×页”,《新华词典》加了括号,《汉语小词典》没有加括号。这里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实际情况比这个要复杂得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理论方面的,也有技术方面的。这里举的例子主要是技术方面的。技术方面造成的不一致,容易解决。同一部书的,前后多查对查对就能统一起来了。不同的书,为了查字词典人的方便,不必各立门户,技术方面的统一,不会抹杀各部字词典的特点,都从这方面考虑,就不难一致起来了。理论方面的不一致,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还得做很大的努力。

加括注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使注释清楚,把词语意义的解释跟附带的说明区别开。根据这个要求,当然,词语意义解释以外的附带说明都应该括起来。但括注太多了,显着累赘,不发生混淆的,像“见×页”、“参看××”之类,似可不加括号。当然文字应写得使人能看明白。

一 注释中需要交代而又不是词语意义部分的括注

这类括注,是注释中需要交代而又不是词语意义的部分,这一点一定要掌握住。掌握好这一点,下面的三个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1. 什么是括注,什么是正式注释? 2. 要分清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词语意义的一部分,或者不是词语意义的部分。是词语意义的部分,就应该放在注释里,不是词语意义的部分,就作为括注。由于对这个界限掌握得不好,两方面的失误都有。例如:“穷人,穷苦的人,多指旧社会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逸事,世人不知道的关于某人的事迹,多指不见于正式记载的。”“老太太,②尊称别人的母亲(也对人称自己的母亲或婆婆)。”“球儿,②特指小孩儿玩的玻璃球儿(也有用石头做的)。”^①前两例的末句,都应该放在括号里,因

为这不是词义的一部分。“穷人”的末一句不要,也许更好。后两例的末句,不应该放在括号里,因为这是词义的注释。“老太太”条的括注应列一个义项。3. 这条注释中是否需要加括注,先要弄清楚哪方面需要补充说明。弄清楚了需要补充说明的方面,就可以确定是补充注释,还是加括注,同时也解决了加什么样括注的问题。反之,找不出需要补充说明的方面,自然就不必加括注了。比如:“裹足不前,停步不进(多指有所顾虑)。”“温和 wēnhé, ①(气候)不冷不热:气候~……。②(性情、态度、言语等)不严厉,不粗暴,使人感到亲切。”“温和 wēnhé,(物体)不冷不热:~水……。”“格杀勿论,旧时指把行凶、拒捕或违反禁令的人当场打死,不以杀人论罪。反动统治者常以此为托词肆意屠杀人民。”“文集,把作家的作品汇集起来编成的书(可以有诗有文)。”“裹足不前”、“温和”等的意义虽然解释了,但用在哪些方面还不清楚,加个括注就明确多了。“格杀勿论”的末一句,作为注释是多余的,作为括注也没有必要。“文集”,是注释没有写好,如果注释改为“把作者的诗文等汇集起来编成的书”,就够清楚了,不必再补充解释,也无须加括注。

哪一部分应该括起来,不能只就形式看,应该从词语的意义来判断。像“窜扰,(股匪或小股的敌军)骚扰”,“窜改,改动(成语、文件、古书等)”,“慰问,(用话或物品)安慰问候:~信|~灾区人民。”这些括起来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动词的意义,不包括主语、谓语或状语。像“自愿,自己愿意:……。”“酌情,斟酌情况:……。”“枪杀,用枪打死。”这些就不应该括起来,因为这些动词的意义,包括了主语、谓语或状语。

这一大类括注,主要是弥补注释的不足,常用的可归纳成以下

几个方面：补充说明注释，交代词语搭配关系、使用范围、意义色彩、修辞色彩、文体等。这些括注是跟注释紧密相连的，有的括注中文字跟注释连为一体，像“出轨，①(火车、有轨电车等)行驶时脱离轨道。②(言语行动)出乎常规之外。”“补正，补充和改正(文字的疏漏和错误)。”“置之度外，不(把生死、利害等)放在心上。”“置身，把自己放在；存身(于)：～于群众之中。”有的括注中文字自成起讫，像“授意，把自己的意图告诉别人，让别人照着办(多指不公开的)。”“指靠，依靠(多指生活方面的)。”“求救，请求援救(多用于遇到灾难和危险时)。”“穷酸，穷而迂腐(旧时用来讥讽文人)。”前一类括注的位置，随文字的地位而定。后一类括注的位置，一般在注释后。

上边提到的一些方面，并不是说一定都要作为括注，只是需要的才加。如果注释里已经表示明白了的，一定不要再加括注。比如：“讼棍，旧社会里唆使别人打官司自己从中取利的坏人。”就不要再加括注“(贬义)”，因为注释中已表明了。

把这类括注分成上面的一些方面，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并不是说这一类只表示这种关系，就不能再表明别的方面的关系了。实际上往往是一个括注，可以表明几方面的关系。比方前边举的“窜扰”，这个括注可以表明搭配关系，“窜扰”这个动词，前面用“股匪或小股的敌军”一类意思的词汇做主语。还可以表明使用范围，“窜扰”这个动词，一般用在股匪或小股敌军进行骚扰方面。这个括注也表明了意义色彩，用在“股匪或小股的敌军”方面，联系起下面的骚扰，当然是贬义，而且也表明了是小规模的，不用在好的方面，也不用在土匪或敌军的大规模行动方面。

前边提到的括注的几种作用，也常常是一个括注起几方面的

作用。还拿前边的“窜扰”做例,这个括注表明了“窜扰”和“骚扰”的区别,“窜扰”是“股匪或小股的敌军进行小规模扰乱活动”,“骚扰”就不限于这个范围了。“窜扰”用于敌对的方面,“骚扰”就没有这个限制,可以用于我方。括注弥补了“骚扰”做“窜扰”注释的不足,因为“骚扰”不等于“窜扰”,括注表明了这一点。这样,这个用字不多的括注就起到了几方面的作用,使“窜扰”的注释比较清楚。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括注都有这么多用处,但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使每个括注起到应起的作用。

现在按照上面分的几个方面分析一下括注。

a. 补充说明词语意义的括注:1. 直接补充说明词语意义,如:“上书,给地位高的人写信(多陈述政治见解)。”“沧海,大海(因水深而呈青绿色)。”“火镜,指凸透镜(因为可以用来取火)。”“外国语,外国的语言(包括文字)。”“风,②借风力吹(使东西干燥或纯净):~干|晒干~净。”这一类中如果能直接放在注释中的,还是放在注释中好,不必作括注。如:“南胡,二胡(乐器),因原先流行在南方得名。”“香槟酒,含有二氧化碳的起泡沫的白葡萄酒,因原产于法国香槟(Champagne)而得名。”上边的“沧海”、“火镜”,仿照“南胡”等注释,不加括注为好。2. 在注释中间,补充说明或举例表明,或解释注释中的词。比如:“草标儿,集市中插在比较大的物品(多半是旧货)上表示出卖的草棍儿。”“回请,被人请后(如请吃饭等),还请对方。”“枪法,①使用长枪(古代武器)的技术:……。”上边“南胡”注释中的“(乐器)”,也是这一类。3. 放在注释里,解释条目中个别字词的意义,如:“差强人意,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差:稍微)。”“恃才傲物,依仗自己的才能而骄傲自大,轻视旁人(物:众人)。”这类括注能融合到注释里的,应该尽可能融合在注释

里。必须作为括注的,以放在后边为好。

b. 表示搭配关系的括注:1. 用一般注释,表示出语法上的搭配关系,如主谓关系、动宾关系、偏正关系等。比如:“巡弋,(军舰)在海上巡逻。”“校阅,审阅校订(书刊内容)。”“去¹,⑤过去的(时间,多指过去的一年):~年……。”2. 直接说明跟某些词语搭配,如:“分说,分辩(多用在‘不容、不由’等否定语之后)。”“符,③符合(多跟‘相’或‘不’合用):……。”“胜(胜),③比另一个优越(后面常带‘于、过’等):……。”“名义,②表面上;形式上(后面多带‘上’字)。”

c. 表示使用范围的括注:1. 从语法方面说明使用范围,如:“鬼,⑤恶劣;糟糕(限做定语):~天气。”“久久,许久;好久(用做状语):……。”“爷儿,〈口〉长辈男子和男女晚辈合称,如父子、叔侄、祖孙(后面常带数量词:……)。”“插脚,①站到里面去(多用于否定式):……。”“马匹,马(总称)。”2. 用一般注释,表示出适用范围,如:“细腻,(描写、表演等)细致入微。”“制定,定出(法律、规程、计划等):……。”“全数,全部(可以计数的东西)。”“全权,(处理事情的)全部的权力:……。”3. 说明使用的场合,如:“久仰,仰慕已久(初次见面时说)。”“女方,女的方面(多用于有关婚事的场合)。”有的放在注释中,作为注释的一部分。比如:“阁下,敬辞,称对方,从前书函中常用,今多用于外交场合:……。”“保驾,旧指保卫皇帝,现在多用于开玩笑的场合。”这些还是放在括注中为好。4. 说明使用的方面,如:“树立,建立(多用于抽象的好的事情)。”“大肆,无顾忌地(多指做坏事):……。”“集锦,编辑在一起的精彩的图画、诗文等(多用做标题):……。”“细工,精密细致的工作(多指手工)。”5. 说明用在某些文体,如:“蹿房越脊,跳上房顶在上面飞快地走

(多见于旧小说)。”“头领,首领(多见于早期白话。”“恹 xiān,高兴;适意(唐宋诗词常用)。”“怎生,怎样;怎么(多见于诗词和早期白话)。”“火急,非常紧急(函电用语):……。”关于语体、文体等方面的说明,现在的字词典里有的作为括注,放在注释后,也有的作为标志语,放在注释前边。比如:《现代汉语词典》用的多的,像“口语、方言、古汉语”等,用“〈口〉〈方〉〈书〉”等标志语表示,放在注释前边。用的比较少的,用括注形式表示,放在注释后面,像前边举的例子。还有一些,作为注释的一部分,如“婉辞、敬辞、谦辞、客套话、敬称、尊称、谦称、通称、俗称、简称、旧称、公文用语、佛教用语、印刷用语”等。这些方式虽然都可以用,但不宜花样太多,显着凌乱,读者不好掌握。关于语体、文体等的表示,可分为两类,常用的,用的多的,作为标志语,放在注释前边,像“〈口〉、〈方〉、〈书〉、〈客〉”等;不常用的,用的少的,作为括注,放在注释后边,像“(多见于诗词)、(多见于早期白话)”等。还有一部分,可融合在注释里,像“××的通称”、“××的俗称”等,但不要把“通称”、“俗称”等单独成句。这些区分,不要分得过细,标志语过多,像“客套话”,可以包括敬辞、谦辞等。

d. 用括注说明意义色彩,如:“小鬼,①鬼神的差役(迷信)。②对小孩_儿的称呼(含亲昵意)。”“功败垂成,快要成功的时候遭到失败(含惋惜意)。”“粉墨登场,化装上台演戏,今多比喻登上政治舞台(含讥讽意)。”“小子 xiǎozǐ,②人(用于男性,含轻蔑意):这~。”“报销,③从现有的人或物中除掉(多含诙谐意):我们两面夹攻,一个班的敌人很快就~了。”“无与伦比,没有能比得上的(多含褒义)。”“惯技,经常使用的手段(贬义)。”有的字词典里把一些含有爱憎情感的词汇,从注释中表示出来,不加括注。比如:“宝宝

bǎobao,对小孩儿的爱称。”“鬼子,对侵略我国的外国人的憎称。”这样处理,也未为不可,但本书内要求得一致。这种处理方式,局限性比较大,不如括注灵活,适应性强。

意义色彩,跟说话的场所和语气有很大的关系,有时使用的是反面的意思,这些在括注里都不大好表示出来。现在字词典的注释中大都没有交代,有的在例句中有所表示,可以体会出这层意思。有些词汇的意义色彩,轻重程度也有所不同,这些可以在括注中表示出来。比如含贬义的词汇,可以用“贬义,含贬义,多含贬义,一般含贬义”等来区别它们的不同情况。

e. 用括注说明修辞色彩,比如:“大踏步,迈着大步(多虚用)。”“万死,死一万次(夸张说法)。”“小将,古时指带兵打仗的年轻将领(现多用于比喻)。”一般字词典对修辞用法大都不照顾,个别字词典照顾了一部分,像《现代汉语词典》,但照顾的不多。关于修辞用法,《现代汉语词典》一部分在注释中,用“多用于比喻”交代,一部分在举例中照顾。这样的例句前边有一“◇”符号,表示后面的例句中的本词语是这个意义的修辞用法,跟注释不完全相合。比如:“小卒,小兵,多用于比喻:无名~。”“闯将,勇于冲锋陷阵的将领,多用于比喻。”“汇合,(水流)聚集;会合:……◇人民的意志~成一支巨大的力量。”“培育,培养幼小生物,使它发育成长:……◇~社会主义一代新人。”修辞用法在语言里是大量的,是很生动的用法,详解语文字词典,应该尽量多照顾一些,可以多举一些这样的例句。需要解释的,可加括注稍做解释。

f. 用括注说明使用某种东西或方式 1. 如:“慰问,(用话或物品)安慰问候。”“攒射,(用箭或枪炮)集中射击。”“欢送,高兴地送别(多用集会方式)。”但使用的东西或方式,是词义的组成部分的,

不放在括注里。比如：“说服，用理由充足的话使对方心服。”“函购，用通信方式向生产或经营的单位购买。”一般字词典的释义里，多把使用的东西或方式作为注释的一部分来处理，不管词义里包含不包含这种义素。这样处理，不够细密，还是区别对待为好。

用做辅助注释手段的“跟‘×’相对”、“跟‘×’相反”、“区别于‘××’”、“对‘××’而言”、“就‘××’而言”等，如果看做注释，可以不放在括号里。但这些究竟跟一般注释不同，还是放在括号里，做括注为好。《新华字典》有的条目用“跟‘×’相反”做唯一的注释，当然不能放在括号里。不过，这种注释方式，不宜单独使用，应该另有注释。

二 注释行文中需要有而又不是词语意义部分的括注

按照词典注释的要求，词语意义的解释，不应该把词语使用时上下文的意义包括到注释里，也不应该把不是词语意义的部分包括在注释里。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应该作为括注。这类括注，行文是跟正式注释合为一体的。这就是这里说的注释行文需要有而又不是词语意义部分的括注。这类括注在括注注释形式中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这一类目前还难以做好。原因是词典注释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譬如：“注释词义时，不要把这个词语使用时的上下文的意义，作为这个词的意义注出来。”这是一条经常谈到的注释原则，字典词典编写者注释词义时，一般都注意了这条原则。但不少注释中还是把上下文的意义带了进来。这有时是为了说明的方便，更多的是条目本身的问题。例如：“捆，①用绳子等把东西缠紧打结：～行李|～麦子。”还可以说“把柴火捆好，用车拉走。”“割谷子，随割随捆。”从这些例子看，“捆”的意义里包含了“用绳子等。”但如果说“用绳子把柴火捆好”，“割下来的韭菜，都用马

连捆成捆儿”，那么，“用绳子等”又是上下文的意思了。还有动词的目的性，算不算词义的组成部分，应不应该包括在注释里，有的一时也不好确定。比如：“着想，(为某人或某事的利益)考虑。”“出卖，②为了个人利益，做出有利于敌人的事，使国家、民族等受到损害……。”“买通，用金钱等收买人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收买，②用钱财或其他好处笼络人，使受利用：～人心。”从上边的例子可以看到，有的把目的性放在了括注里，有的作为注释的一部分。这种种情形，字词典里是不少的。过去的字词典里大都作为注释的组成部分，现在分辨不清楚的，仍可作为注释的一部分。

注释动词时，动词本身包含了主语、宾语、状语或补语的意义，注释里应该注出来，像“自愿、酌情、枪杀、打通 dǎtōng”等。如果动词本身不包含这些意思的，注释里不应该注出来。若是注了出来，就应该用括号括起来，作为括注。但有时注释行文需要把某个成分带出来，不然，句子不明白或不通顺。例如：“兜，②做成兜形把东西拢住：……。⑤承担或包下来。”《新华词典》“刺 cì，①用针或有尖的东西穿入。……”“捆，①用绳子等绑起来。……”“住”和“下来”，“入”和“起来”，都不应该注出来，因为这是这些动作要达到的，但未必能达到。如果不注出来，这些注释的行文就站不住，意思也不清楚，用括号括起来也不合适。这类注释，或者如此，或者改变注释的行文，避开末尾表结果的词语。

上边只是举动词的注释做例子，其他词汇的注释，有的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这些不好注释的词汇，可采用说明注释形式，不加括注。

三 一些附带说明的括注

这类括注包括的方面比较多，但都跟正式注释不是紧密连在

一起的,有的跟正式注释没有直接关系。

a. 说明词语来源,见于什么书的括注。如:“识时务者为俊杰,……(语本《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守株待兔,……(见于《韩非子·五蠹》)。”

b. 说明跟注释有关事项的括注,例如“注见××”、“另音×,见×页”、“参看××”、“图见××”等。这一类不发生混淆的,可不加括号。

c. 引书或例句中的括注。1. 引书,离开原文脉络或意思不清楚的,补一些文字使头绪清楚,或解释引文的词句,或交代引文中的问题。比如:新《辞源》“内子,卿大夫的嫡妻。《左传》僖二四年:‘(赵姬)以叔隗为内子,而已下之’。”“伊河,……《汉书·地理志上》‘弘农卢氏(县)’注:‘熊耳山在东,伊水(即伊河)出东北,入雒,……’。”“入赘,……元高明(则诚)《琵琶记》三八《张公遇使》:‘我相公如今入赘牛丞相府里。’(李卓吾评本,新刊元本作赘居。)……”2. 解释例句或例句中词语,如:“大锅饭,……:吃~(生活待遇一律不分高低)。”“达官,……~显宦(职位高而声势显赫的官吏)。”

d. 附带说明一些事项的括注。1. 说明注意事项,如:《新华字典》“抵 zhǐ……(‘抵’与‘抵’(dǐ),形音义都不同。)”2. 附带交代一些知识,如:《新华词典》“硃洲岛,……(‘硃’字旧误作‘硃’,误读作‘gāng 刚’)。”“华(華) huà, ②姓(近年也有读 huá 的)。”有的字词典中的[注意][辨]等也可以作为这类括注,比如:《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但,……[注意]在古汉语里,‘但’字不当‘但是’讲。‘但是’的意义用‘然’或‘而’来表示。”“赤,……[辨]赤,朱,丹,绛,红。五个字都表示红色,按其由深及浅的不同程度排列,应是绛、

朱、赤、丹、红。到后来‘红’和‘赤’没有区别。”

这一类括注，比较松散，跟正式注释关系不紧密，可多可少，可以根据字词典的编写目的而定。

四 标志语

前边(一 c5)谈语体、文体的括注时，谈到了标志语，有的用括注形式交代，像“(多见于早期白话)”等，有的用标志语表示，像“〈口〉、〈方〉、〈书〉”等。现在字词典里，对语体、文体、词性、百科词汇等的交代，可以归纳为三种形式。一、用标志语表示，如“〈口〉、〈名〉、〈哲〉、〈数〉”等；二、用括注形式交代，像一 c5 中谈的；三、在注释中交代。

现在的字词典里，在这些方面用标志语表示的不多，仅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用“〈口〉、〈方〉、〈书〉、〈古〉”等表示“口语、方言、古汉语”等，《现代汉语八百词》、《汉英小词典》等用标志语表示词性，《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用“〈测〉、〈地〉、〈地质〉、〈电〉”等表示“测绘、地理、地质、电工”等专科词汇(1978 年本取消了专科词汇的标志语)。有的字词典把这些作为括注，或把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括注。现在比较多的字词典把这些放在注释里来交代，形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融合在注释中，像新《辞海》“质库，当铺的旧称。……。”“暴盲，中医学病名。……。”“智龄，即‘智力年龄’。智力测验创始人比纳首先采用的术语。……。”“质测，明清之际方以智用语。……。”一类是单独作为一句，放在注释前头。比如：《汉语小词典》“轧 gá，方言。……。”“尕 gǎ，西北方言。……。”“钆 gá，化学元素。符号 Gd。稀土元素之一。……。”《简明同义词典》“爱戴，敬爱，同 动词。……。”新《辞海》“量变，哲学名词。……。”“暑邪，中医学名词。……。”“智力常态分配，心理学智力测

验名词。……。”“智商,心理学智力测验术语。……。”“量感,‘造型艺术’术语。……。”

从上边的例子,可以看出,字词典里对这些方面的处理比较分歧,各部字词典不同,一部书里也不一致。为了方便读者使用,至少一部书里应该一致起来。这三类形式,都是可以用的,各有短长。用标志语的形式,比较简便醒目,但使用这种形式,全书就得较比划一,做到这一点,须花些精力。放在括注或注释里,比较灵活,变化多,稍有出入,不甚显眼,但随意性大,花样多,难以一致,使人感到缺少系统性。从各部字词典中的分歧情形,不难看到这一点。

字词典里加标志语,对读者是很有用处的。现在编写的字词典,收的词汇是多方面的,有现代汉语,也有古代汉语;有普通话,也有方言;有通用的词语,也有多用于口语或书面的词语;还有专科词汇,有些词汇既是普通词,又是专科词;有些词汇,语文用法跟专科词汇意义不尽相同,等等。这些区别,不加标志语,读者不一定都能分辨清楚。用标志语把它们区分开,可以使读者省许多精力,还可以少发生误解。否则,读者就是花费了精力,也难免理解错,用错。比如:《新华辞典》“财富,①即物质财富。指社会所拥有的物质资料的总和。它包括一切积累的劳动产品(如生产工具、原材料、消费品等)和用于生产的自然资源(如土地、矿山、森林等)。②泛指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加标志语,分不清①义是语文义还是专科义,从形式看,像专科词汇的注释。①义既是指物质财富,②义就是指精神财富了,那么常说的“增加财富、创造财富、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等,算是哪一个义的法呢?一下子看不清楚。再比如:新《辞海》“大风,①我国气象观测规定:瞬时风速等于

或大于 17.0 米/秒,或风力达 8 级或以上者称‘大风’。②风力大到对生产、生活有影响的风。造成大风的原因很多,主要是低气压的发生、发展和冷空气南下以及台风影响所致。”“暴雨,一般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我国气象上规定:(1)……。我国暴雨主要出现在夏季,……。形成暴雨的原因很多,主要是低气压的发展、长时间的锋面活动、强烈雷雨以及台风影响等。……。”“大风”和“暴雨”,在语言里有一般的用法的意义和气象学上的定义,二者虽是同一个意义,但不完全一样。一般说法的意思是模糊的,只是指“很大的风”,“又急又大的雨”,气象上的定义是有严格的界限的。“大风”有两义,①义有‘气象观测规定’字样,“暴雨”注释有两段,第二段有“气象上规定”字样,好像“大风”的②义和“暴雨”注释的第一段是语文学义。但两者的注释,专科词汇的意味很浓,再加上“大风”②的注释,大部分是讲形成的原因,很像专科词汇的注释,不加标志语,是难以分辨清楚的,可能都会被认为是专科词汇的意义。由此看来,纵使语文用法跟专科词汇分为两义,但由于两者意义接近,不加标志语,读者仍不一定能明白,一是语文学义,一是专科词汇义。还有些专科词汇,几个学科都用,有的意义接近,几个注释并列,不加标志语,读者也不容易分辨清楚。因此,字词典里加标志语是有它的必要性的,而且也是字词典科学性的体现。

现在字词典里用的三类形式,应该简化,用的多的,作为标志语,放在注释前头,用的少的,作为括注,放在注释后边,在注释中交代的一类,可以取消。

加标志语,会碰到一些困难,比如: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界限,普通话和方言的界限,各专科词汇的界限,标与不标的界限,等等。从现在来说,这些方面都有一些难处理的问题,会有一些标志

语加的不当,甚至发生错误,这些都在所难免。不过,处理的不好的,总是少数,绝大多数是能够解决得比较好的。纵有少数不妥,也不会影响整部字词典的科学性和它的规范作用,更何况以后还可以进行修改呢。

加标志语,虽然增加了一些工作量,但不论对编者和读者都是有益处的。对读者的好处,前面已经提及。对编写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可以根据加的标志语,更好地安排义项的分合编排,注释的方式和行文,词语用法的体现等。编写条目时,如果对词语的性质有所疏忽,加注标志语,可以提醒编者对词语性质的认识,借以避免注错。标志语像个标杆,可以时时提醒各道工序的工作人员,注意使注释举例以它为准。参加编写的人员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就可以使字词典减少疏漏。

附 注

①引的例子,没有注明出处的,都是引自《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本。为了节省篇幅,有些例子没有引全。有的稍有改动。下同。

《现代汉语词典》用例笔记*

吴昌恒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依循汉语字书辞书韵书传统,对例句(或从不同角度称书证等)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我国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往往在说解字义、分析字形、辨识读音后,引据书证,如“紊,乱也,从系文声,商书曰有条而不紊”^①这引例就是《尚书·盘庚上》说的“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段玉裁在《说文注》里说“凡引经传,有证义者,有证形者,有证声者”^②,上述紊字,是引经传证义者。据统计,《说文》仅引用儒家典籍就不下千条。《现汉》也像其他许多辞书韵书一样,继承了这个千年传统。百余年前,法国的《小拉鲁斯辞典》也曾有引文说:“一部没有例证的辞典只是一堆枯骨。”由此可见,无论古今,无论中外,人们的文化既有各自的传统,又有广泛的共识。

用例,对字书辞书来说,可说是与生俱来,这自然有它的道理,因为缺例,虽然有时可以理解 and 体谅,有时则是不可想像的。如旧时某《字汇》有注如下:

[养] ①长,育,畜 ②……

[沮] (jǔ) ①止。②败。③坏。^③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列二字是用单字或分别用几个单字去注释某字的某义,而且概不用例。假如一位年幼的读者遇到“默默而沮”“欲沮贰师”或“风颓教沮”之类的语句来查阅该《字汇》“沮”字求解,恐怕就难于对号入座了。反之,如果用上述三语句分别补作三个义项的例句,可能会有助于年幼读者理解“沮”义,解决疑难。《现汉》尽量避免这类不足。一是释文力求细致些,一是选用浅近明白的例句。《现汉》的“沮”字考虑到侧重现代义而收注如下:

[沮] jǔ ①〈书〉阻止:~其成行。②(气色)败坏:~丧。

关于用例的作用和要求。五十年代中期,《中国语文》发表了语言研究所几位先生写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初稿),继而又发表了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的《现代汉语词典凡例》(征求意见稿),其后室内又制定了《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未发表),都对词典用例的作用和要求有所论述。进入八九十年代,辞书大繁荣,有关辞书用例的论述也大为可观。有书综合多方论述作出集句,曰:“体现源流,提示用法,辅助释义,提供知识”^④。这种概括,或许可说既是用例的作用,又是用例的要求。《现汉》的用例,基本上实现了初衷,也相合于后来人们的概括。

《现汉》用例,在需要与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体现某词或以某词为主构成的短语的用法,如“深”字,“深”分八个义项,共用二十例,分别显示其多种功能。它可以做谓语,如“这院子很深/两人的关系很深”;可以做定语,如“深山/深秋”;可以做状语,如“深耕/深绿/深表同情”;可以做宾语,如“这里的河水有三尺深”;可以做主语,如“这间屋子宽一丈,深一丈四”;还有例“夜已经很深了”,显示其同“了着过”的关系。此外,“深”可用做补语,如“洞挖得很深/他们谈得很深”;可以叠用,如“请接受我深深的敬意/他深深地叹了

一口气”等,都未能举例。据《现汉》而压缩改编的《现代汉语小词典》,由于规模的限制,只好再作割舍,留下了十三例。至于多字条目,更难于表现其多方面的用法了。好在专门化的用法词典方兴未艾,可以弥补其不足。

《现汉》利用例句,补充释义的不足。词典释义的准确性是相对的。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指出:“应该知道词义不能离开上下文而孤立,词书或字典里的解释是不可靠的。”^⑤罗先生是对旧时的词书、字典而言的,而且也并不是全面否定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主要是说离开了上下文的词语的解释,很难万全。而用例正好是反转过来,置词语于上下文之中。《现汉》“轨”字释文如下:①路轨①。②轨道①。③比喻办法、规矩、秩序等。这注法也算是较为简明,但猛一看来,总觉得不太满足。下面照录《现汉》“轨”字注释带有例句的原文:

[轨] guǐ ①路轨①:钢~|铁~。②轨道①:出~|无~电车。③比喻办法、规矩、秩序等:常~|越~|步入正~。

有了例句的搭配,看起来就顺畅了。又如“地道”(dì·dao)一词,《现汉》分列三个义项,或许还可以分得更细,有的注家则概括为一个义项。比较看来,无论义项分析粗细都宜有例,甚至可以说分析越细,越要用例子作补充,《现汉》里的“地道”是每义一例:

[地道] dì·dao ①真正是有名产地出产的:~药材。②真正的;纯粹:她的普通话说得真~。③(工作或材料的量)实在;够标准:他干的活儿真~。

这三个义项如果都不用例,读者查阅起来,怕也“难分难解”。

《现汉》利用例句衬托词义。如

[漂亮话]说得好听而不兑现的话:单是说~没有用,做出

来才算。

[说破]把隐秘的意思或事情说出来:这是变戏法儿,一~就没意思了。

[冷清]冷静而凄凉:……冬天游人少,园内后山一带更加~。

前例是句日常口语,但对比强烈。漂亮话没用,是只供说的,是说给人听的,不是留做的;反之,做了才算,做了就是老实话或实在话之类了。次例倒也算的当,无疑世上戏法儿最怕说破,而《现汉》就是把这个水火不相容的事与理编织到一个例句里。末例瞄准“冷”而且“清”。冬天,在一个不是人人必到的公园,本来是而且必然是游人少,再加上又是后山一带,这样的时地条件合而为一,给人提供了一个很容易联想到的“冷清”的境地。

《现汉》的用例,理所当然的主要来源于现代生活和资料,编者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现代社会的步伐。《现汉》的用例留意了时代的足音。试比较[林立]一词的用例在每版本里的变化。

[林立]1960年试印本例:古碑~|工厂~。

1965年试用本例:烟囱~。

1978年发行本例:郊区工厂~。

1983年重排本例:高楼~|郊区工厂~。

1960年本的注文是:〈书〉像树林一样密集地竖立着。其后诸本除删去〈书〉外,注文大同小异,这里只说例。1960年本里有“古碑林立”,过了五年,到1965年,一扫古色古香之气,改为“烟囱林立”,使人感觉到厂矿的发展,但高耸的烟囱未被歌唱多久,就被视为污染之源了,因而又回复到工厂林立,并且是郊区工厂林立,继而再加上高楼林立。或许九十年代可以改例作:“立交桥畔高楼林立”

了呢。又如口语词[明儿],有一个义项的释文是“不远的将来”,其例是“哥哥对弟弟说,等明儿长大了你也学开拖拉机”。它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年轻人的一种想望和追求。当然,现在该是当宇航员或做大款了。至于70年代前期“三结合”编词典期间,为《现汉》附加上的应时例句,好在1978年发行本上就基本上清除干净了。

《现汉》用例力求平实无华,有益于人们身心,或起码无害吧。如下列诸例:

[损坏] 糖吃多了,容易损坏牙齿。

[满] 满招损,谦受益。

[利于] 忠言逆耳利于行。

[史实] 《三国演义》的故事,大部分都有史实根据。

[憧憬] 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

[得胜]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这类例句固然平平淡淡,但倒也实实在在。如果句句是训诫话,处处是哲理名言,一则怕是没有那么多,再则是读者也未必买账。当然也有的例句,彼一时用了,此一时可以适当调整的。如[压倒]例:东风压倒西风。本来可以两面说的话,以留有余地为好。就以东风、西风而论,有“东风夜放花千树”(辛弃疾),也有“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毛泽东)。林黛玉用其比喻义说得周全:“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不过《现汉》以此作例也不见佳,何况也嫌长些了。

《现汉》用例,尽可能跟词头的文体相和谐。如:

[阁下] 大使阁下。

[供认] 供认不讳。

[后生] 〈方〉②他长得后生,看不出是四十岁的人。

[卧榻]〈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原括注：比喻不许别人侵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跻]〈书〉使中国科学跻于世界先进科学之列。

外交辞令、法治习用语、方言、书面语使各各得其所哉。书面语“跻”居然是嵌在一句大白话里，但使用者写来顺手，听者、阅读者倒也觉得顺耳顺眼。后来补编的条目里也采用了少量文白杂糅的例句。如：他夙夜想望做一名医生（“夙夜”例）她在敌机扫射下翼护过伤员（“翼护”例）。这类语句，在当前的文字材料里还占有一定的席位，而且还会在相当时间里存在下去。但总嫌生涩了些。

《现汉》用例一律不标出处。许多辞书的使用例，标其出处，显其源流，证其释义，洋洋洒洒，丰富多彩，大为可观。《现汉》之所以不录例句出处，是跟它负有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任务有关。为了这个任务，例句起码应该贴切、规范和精练，而这诸点必须集于一例之中。然而任何人的言语或文字都不是为词典而发，都不会去理会词典特别是《现汉》的需要和篇幅的限制。因而往往无法直接拈来作例，而只得改编或自撰，不提出处。又如下面几段文字，虽然出处明确，但不便照录作例。

这个事要是吵嚷开，被刘四知道了呢？刘四晓得不晓得他女儿是个破货呢？假若不知道，祥子岂不独自背上黑锅。（老舍：《骆驼祥子》）

瑞珏：（回望着他，焦灼而怜悯地）好好地，为什么又皱起眉头？这个人像永远过着秋天，可怜，心里不知藏满多少忧愁！（巴金：《家》）

忠诚人民教育事业。（毛泽东题词）

前一段粗犷生动，次一段细腻抒情，但用作任何词语的例句，对《现

汉》来说都嫌较长,而又不便截取,即使截取下来,也嫌不够典型。末一段语气有力,但用法不同于一般。它非常别致地在“忠诚”后剔除了习用的介词“于”字。

用例的作用和要求还有可说的,可议的,可记的,但也不是说每个词语都非举例不可。有些词语解释后已可完全明白,也就不必强求一致,硬是加例。如专门术语“盐酸”,历史上名物制度“井田制”“世袭”以及绝大部分成语、谚语等可不举例。一般日常用品,如“一品锅 十滴水 百宝箱 千斤顶 万年历”等也可不举例。即使举例,也只列短语即可,如[筷子]可举“象牙筷子”之类。当然,如果硬要举,倒也不难,比如说“吃一品锅 买十滴水 锁上百宝箱 借个千斤顶 看下万年历”。如此举例,也嫌絮叨。此外,标〈书〉的词语,缺例的着实不少,不过那不是本书的重点,有的也难于选例,算是情有可原吧。

《现汉》所用例句,除一小部分摘引自第一手资料外,大部分是改编或自撰,但又不能是些无关痛痒的应酬话、可有可无的套话,或什么家训教本之类的语句,也不能采用什么固定格式。然而做到既得体,又丰富多变,并非易事。在这方面还是有不少改进和提高的余地的。

附 注

- ① 《说文解字十三上》。
- ② 段玉裁《说文注一上》“祝”注。
- ③ 刘庆隆《字词典的举例》。
- ④ 《训诂学》,山东文艺出版社。
- ⑤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概述*

韩敬体

—

1955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论证、确定了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课题。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5月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语言研究所1956年7月组建词典编辑室,当时我国仅有的语文辞书编写机构新华辞书社和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也并入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由当时的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吕叔湘先生兼任室主任和《现汉》主编。1958年6月正式开始编写,1959年10月完成初稿,郭沫若院长题写书名,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现汉》(试印本)。1961年夏天,丁声树先生调到词典编辑室接任室主任和主编,对《现汉》(试印本)进行通读定稿工作,由李荣先生协助丁先生工作。1963年完成定稿,1965年5月又排印出《现汉》(试用本)送审稿。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1996年7月29日的《新闻出版报》,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65年底至1966年初,稍做修改,交付出版社准备排印出版,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未能出版。1975年5月,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会议后,《现汉》又经过修改,于1978年底正式出版。由于印刷版损坏,1980年,《现汉》又开始重排,少数条目略有删改,1983年初发行。

《现汉》编写宗旨明确,收集资料丰富,准备工作充分,编写、修改工作严肃认真,排校工作也较精到,它的出版把我国的语文词典推向了一个新的起点。《现汉》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我国语文教育、语言文字应用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受到了社会的重视和欢迎。《现汉》1978年底正式出版以后,每年平均发行150万册以上,至1995年底,17年时间,国内印行180多个印次,发行总量2500多万册。1993年12月,《现汉》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4年初,又荣获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图书奖。

《现汉》正式出版距今已十七八年。这期间,我国社会生活发展很快,语言特别是它的最活跃的部分——词汇也有了发展变化,一大批新词新义产生了,也有不少原有的词语过时了,字形、字音等方面也有了新的规定。《现汉》不可能反映出这种变化,在规范性、实用性方面很难满足现今的需求。修订《现汉》就成了一项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急迫任务。

二

1993年8月,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开始组织力量,进行《现汉》修订工作。这次修订涉及范围较广,改动幅度较大,历经两年

多时间,可以说是《现汉》正式出版后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修订。

《现汉》是确定词汇规范、为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中型语文性词典。修订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坚持国务院对《现汉》编写的指示,坚持《现汉》的编写方针,要反映出汉语词汇近二十年的发展变化及汉语科研的新成果,要体现时代精神。修订工作主要从词语增删、推行规范、增补修正释义、增补用例、完善体例等几个方面进行。

(一) 词语增删

这次修订,增收词语相当多,其中新词语更为突出。如反映新事物的:歌星、影视、特区、快餐、离休、信用卡、电子琴、复印机、专业户、集装箱、连续剧、立交桥、健美运动等;反映新思想、新观念的:代沟、反思、反差、保鲜、减肥、热点、人梯、脱贫、弱智、安乐死等;反映科技新发展的:微机、联网、硬件、软件、监测、监控、程控、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数字通信、计算机病毒等;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词语:心态、举措、构想、层面、传媒、追思、导向、架构、黑马、精品、误区等;简称:彩电、家电、公关、知青、人流(人工流产)、边贸、环保等;外来语:巴士、的士、托福、热狗、桑那浴、卡拉OK等。除数量可观的各类新词语外,还补收另外一些词语。如《现汉》未收的现代一般词语:极顶、极意、集拢、己见、尖厉、吉言等;方言词语:急眼、架秧子、计程车等;文言词语:际会、际涯、季世、既望等。

在增收词语的同时,也删去了部分词条。数量较多的是过于专门或过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专科条目。比如医学方面的软骨病、肾结核、肾盂炎、急腹症、神经痛、神经性皮炎等疾病名称及人工气腹、人工气胸等医疗术语,化学药品名方面的维生素A、

维生素 B、B₁、B₂、B₅、B₁₁、B₁₂、C、D、E、K、P 等。再如化学方面的乳酸、鞣酸、软脂酸、水杨酸等等,生物学上的柔荑花序、聚伞花序、伞形花序、伞房花序、安哥拉兔、澳洲黑鸡等等。社会科学术语也删了不少,如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世界主义、安那其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王小波李顺起义等。《现汉》原来收入度量衡单位名称较多,其中市制单位在实际语言中多不加“市”,而且附录中又有单位换算表加以详细列举,所以这次就删了不少这类条目。此外,还删了数量较少的一般词语、外来语,如不灰木(石棉的旧称)、潮脑(樟脑)、苦迭打(政变)、苍蝇拍子、德谟克拉西(民主)等等,显然它们都是较为陈旧或者是查考价值较低的词语。

在收词上,修订时增加 9000 多条,删了 4000 余条,修订本共收词条约 6.1 万条。

这里要说明两点,一是这次修订为什么要删去那么多的专科条目,二是对补编本条目的取舍问题。

《现汉》是记录普通话词汇的中型语文词典,主要任务是确定一般词语的词汇规范,专科词汇不可能也不必要收得太多。原《现汉》收录专科词条超过全书四分之一,比例过大些,这是由当时辞书出版及规范工作的情况决定的。《现汉》成书于六七十年代,当时我国辞书出版不多,专科辞典甚少,专科术语规范工作也很薄弱。作为规范性词典,读者要求《现汉》能解决更多的问题,能多收专科条目,规范一些专科术语,承担起百科词典的任务。所以《现汉》收录自然科学专科条目九千余条,社会科学条目也有五六千条。近十几年,我国辞书事业发展迅速,各种专科词典大量涌现,可以满足不同层面的读者需求。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专科术语规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现汉》不必承担它难以承担的专科词典的任务。所以这次修订,根据《现汉》是一部语文性规范词典的性质和要求及辞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一些专科词语作了幅度较大的删减。

《现汉·补编》是1989年出版的,收录词条两万多。这次修订《现汉》,并没有将补编合入正编,而只吸收了它的部分词条。这是因为修订本强调坚持《现汉》的编写宗旨,而补编本在收词上强调备查,与《现汉》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修订本还要保持适度的中型规模。因此对补编本条目只能遵从《现汉》的宗旨进行取舍。

(二) 推行规范

《现汉》编写的目的是确定词汇规范,包括字和词语的读音、形体、用法。《现汉》成书于六七十年代,它依据的是当时的有关规定。比如字音依据普通话审音委员会1963年的《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字形也是根据当时通行的形体及有关的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文字使用不断出现新的情况,语文规范也在不断修正,以适应新情况。如普通话审音委员会80年代初开始修订审音表,1985年底以三个部委名义公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6年10月国家语委又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对某些字音、字形的规范进行了调整,这样一来,《现汉》个别字的形音处理就与现行规定不大一致。这次修订,基本上依据新的规定,推行新的规范。

字形方面,《现汉》原有与《简化字总表》不一致的地方,改从字表。如作“汁水”义的“瀋”,《现汉》原简化为“湔”,《简化字总表》没有此字形,这次修订从字表简化作“沈”。“諮”《现汉》原作“咨”的异体,不单出字头,与《简化字总表》不一致,现依从字表单出字头

并简化为“谿”。“賬”《现汉》原作“帐”的异体,不单出字头,现依字表单立字头,并简化作“账”。“跤”《现汉》原作“交”的异体,不单出字头,现单出字头,这既符合异体字表,又符合实际运用情况。

字音方面,《现汉》注音与审音表不一致的地方,一般都按审音表改动注音。如迹、绩由 jī 改为 jì,驯由 xún 改为 xùn,哮由 xiāo 改为 xiào 等。有的字,《现汉》原有两音,现依审音表改注一音。如呆由 dāi、ái 改读一音 dāi,嗟由 jiē、jué 改读一音 jiē,绕由 rào、rǎo 改读一音 rào,霰由 sǎn、xiàn 改读为一音 xiàn 等。还有的字,《现汉》只注一音,现依审音表改为两音,如曝 pù 分为 pù、bào 等。

由于审音表只审订现代汉语普通话词语,不审订方言词语(包括北京土话)和古代词语,而《现汉》收录了一些较习见的方言词语和文言词语,远远超出了审音表的审音范围,所以修订本在注音方面不能不从实际出发,做一些变通。比如“凹”,审音表统读 āo,但在方言中 wā 音流行甚广,在地名(山西有核桃凹、赤泥凹)、人名(作家贾平凹)只能读 wā;再如“期”,审音表统读为 qī,但文言用在“期年、期月”中仍应读 jī,《现汉》修订本保留原来注音与审音表规定并不矛盾。又如“荫”,审音表统读 yìn,但实际运用中作“树阴”义而读 yīn 的情况较普遍,用于人名(如赵荫棠)、地名(如柳荫街)、戏曲名(如柳荫记)的也不少,修订时对 yīn 音也加以保留。此外,如凿、指等,对原有的不同读音也在注音后加括号作了说明。

《现汉》中的自然科学术语,修订中也推行了有关单位制定的新的规范。如泻湖改以潟湖为正式名称,红血球、白血球改以红细胞、白细胞为正式名称,“梗死”、“梗塞”原来互相通用,现已依据规范分用。

(三) 增补修正释义

近20年,汉语的不少词语在运用中通过比喻、引申等途径有了新的用法,产生了新意义,也有些词语词义发生了变化,也有的《现汉》原来释义不够确切或完善。增补和修正释义也是这次修订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1. 增补释义

如“同步”、“品位”这两个词,《现汉》原来只从科技专科方面释义,而在日常运用中它们产生了另外的含义。这次修订,“同步”增加了一个义项:“泛指互相关联的事物在进行速度上协调一致”。“品位”增加了两个义项,一是新义:“指物品的质量;艺术作品所达到的水平”,一是文言义:“官吏的品级;官阶”。

又如,“热”字头增加近几年习见的用法:“加在名词、动词或词组后,表示形成某种热潮:足球~|旅游~|自学~”。“日”字头增加一个常用义:“泛指某一天:假~|生~|国庆~”。其他如下海、亮相、起飞、机制、持平、新星、反馈等等都增补了义项。

2. 修正释义

“人大”的释义原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简称”,显然不当,“人大”就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简称(另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简称,但《现汉》不收单位名),可以有全国人大,也可以有省、市、县人大,修订中删去“全国”二字。“专科学校”原注中说是“高等学校的一种”,已不符合现实情况,中等专业学校也相当多,修订中删去这一限制语。

由于社会发展变化,有些六七十年代认为是反映旧事物、旧概念的词语又重新出现了,比如拍卖、破产、当铺、收盘、交易所之类,

原有的释义就需要修改,原注前加的“旧时”、“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类限定语必须删去。再如女士、小姐、先生一类称谓,使用范围或风格色彩也发生了变化,释义也必须修正。

(四) 增补用例

《现汉》原有的用例一般是比较好的,精练、规范、自然、流畅。但也存在缺欠,一是用例偏少,二是受时代限制,有的例句不适应现在的情况,个别例句不够自然。补充、修改、更换用例也是修订中的一个环节。

“嚷嚷”两义项均无用例,这次修订都加了一例,①义加例“别~,人家还在休息”,②义加例“这事~出去,对谁都不好”。“忍让”、“任用”、“热肠”三条,原均无用例,这次修订各增加两个词组例,衬托释义,也反映了各自的习见用法。

注音中加“//”的表明是离合词,词素可拆开,在中间插入其他成分。“认账”现在增加的例句“隔了那么久,他能认这个账”,“惹气”增加的例句“没想到因一句话惹了一肚子气”,都是显示词的离合用法的。

由于历史条件限制,《现汉》有些例句现在看来反映的观点有问题或者不合时宜,有的脱离现实生活,修订中都根据具体情况修改、删除或更换了。

(五) 体例、编排等方面的变动

《现汉》体例比较严谨,它吸取了中外辞书的一些优点,并有自己的创新。在多年的使用中,受到读者的认可和好评。但《现汉》在体例、排列等方面还有不易掌握和不便查检的地方,这次修订中

也进行了一些变动。

1. 变动同音的单字头排列方式。原来《现汉》试印本、试用本同音字均以笔画数目排序,正式出版本改为单字头以声旁分组,声旁及同声旁的字依笔画顺序、一、丨、丿、乙的次序排列。由于有的声旁本身有一些变形,加之简化字与括号内繁体、异体声旁不尽相同,一般读者不容易掌握这种原则。修订本同音字头又改为以笔画数排列。同笔画的字再按笔顺一、丨、丿、丶、乙排列,使单字定位较易掌握,笔顺次序也与通行的办法一致。

2. 取消不同写法的多字条并列出条的处理方法,改为每条一律出一个词目,以鱼尾号标示。比如《现汉》原作:

【工架】【功架】戏曲表演时的身段和姿势。

【利害】【厉害】难以对付或忍受;剧烈;凶猛:……

【耿直】【梗直】【鲠直】(性格)正直;直爽:……

现均只保留前一词形,而那些删去的词形原来也在各自首字下出条了,现在仍然出条。这样既能全面贯彻多字条目一律按其首字分列于领头单字头下的原则,又避免了同一词目重复出条的现象。顺便说一下,中间一条《现汉》原版本以“利害”为推荐词形加以详注,而修订本则根据语言应用实际,改以“厉害”为推荐词形加以详注,相同用法的“利害”只注“同‘厉害’”。

3. 凡单字头注“见下”而后面只列一条多字条的,多字条一律改为直接排在单字头条目注文位置,单字条不注“见下”。这样既节约不少篇幅,又与原有这种注释方式一致。

4. 取消“⊗”、“〈口〉”两种符号。《现汉》原标“⊗”的为现代不常用的字,但这种字多为古汉语用字,与原来标〈书〉的古汉语字不易分别。这次修订取消“⊗”,一般改为标〈书〉。《现汉》标〈口〉的

原为北京口语词语,但这些词语一则由于文学作品的语言与口语趋于一致,不少也多见于书面文字,不只限于口语了,再则有些词语使用范围也不好确定。修订中取消了〈口〉,除个别词语改标〈方〉外,一般不加标志。

5. 另见音、参看条、见条标注页码。《现汉》按音序排列条目,另见音及意义相关的参看条过去不注页码,查检起来不太方便,不少读者来信提出标注出页码的要求。这次修订,除同字头下的一些参见条外,另见音、参看条一律注上了页码,以便于读者查检。

6. 现代汉语中有个别以西文字母领头的词语,近年出现得更多,如B超、CT、T恤衫、MTV之类,它们流行较广,使用也较多,应该承认这种语言实际,给它们一定的位置。《现汉》修订本把它们附列于正文后面,不加注音。

三

这次修订开始利用电子计算机做一些辅助工作。除全书用计算机录入、排版外,正文中另见音、参见条标注页码、编排检字表及填写其中的页码、查对参见条目等,也都是由计算机进行处理的,这既减少了大量手工劳动,又提高了工作的准确性。

尽管这次修订时间不短,参加工作的人员也尽了努力,但由于收集材料和吸收新成果方面还有不足,一些问题也还研究得不够,加以水平限制,有些问题还未能得到解决,在收词、释义、举例方面缺点、错误一定不少。我们恳切地欢迎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继续修订,不断提高质量,使《现汉》更好地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

与时俱进,做好《现代汉语词典》 修订工作*

晁继周

《现代汉语词典》始编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原计划在完成编写并征询各方面意见后于几年内出版,但由于随之而来的十年动乱的干扰,一直拖到1978年才正式出版。1980年,编者对词典的部分条目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肃清收词、释义、例句中“文革”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以及改动个别释义不准确的地方,修改后的重排本于1983年出版。90年代初,鉴于词典出版十余年来语言的发展(主要是大量新词的产生),以及80年代几个语言规范标准的出台,《现代汉语词典》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订,新的修订本于1996年同读者见面。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现代语言词典,及时修订是保持其生命力的惟一方法。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映新的事物和新的观念的新词语不断产生;随着某些旧事物的消亡,反映这些旧事物的词语会从语言中消失;有些词的意义和用法也会发生

* 这篇文章为作者2002年6月在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变化。因此,任何一部现代语言词典,如果要继续为指导人们的说话、阅读和写作服务,就要不断地及时修订,以正确反映语言的发展变化。《现代汉语词典》以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为宗旨,如不及时修订,这一任务就不能很好地完成。现在,《现汉》1996年修订本出版已经过去6年时间,新一轮修订工作正在进行中。我把这次修订工作分以下几个方面报告一下。

一 调整收词

《现汉》1996年修订本出版到现在6年中间,汉语中又有许多新词产生。《现汉》新一轮修订,仍应该把增补新词作为一个重点。有些新词虽然并不产生在最近几年时间里,但近几年它们使用得更加普遍,它们的生命力也受到了时间的检验,如果说上次修订时收录它们条件还不够成熟,这次则可以收录了。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现汉》2002年增补本前不久面世。这个增补本共增收新词语1200余条,附在正文的后面。《现汉》修订中增收新词可以在这1200条新词语的基础上略作调整。据现在的估计,这次修订增加新词总数可能会超过2000条。这些年汉语中出现的新词当然远不止这个数字,但《现汉》作为一部规范型词典,在新词收录上应该遵循一定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新词使用的普遍性(排除只在某些地域或某些人群中使用的词),二是新词所具有的生命力(排除某些时事词或昙花一现的临时词)。在这一点上,《现汉》不同于某些新词词典,后者在收录新词上可以更迅速一些,更宽泛一些。《现汉》在收录新词上一方面不能保守,如果不及时把那些已为全民社会普遍使用的新词收入词典,词典的使用价值就

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冒进,如果把那些只在个别地区、个别行业或少数人群中使用的词,以及那些缺少生命力、瞬息即逝的词收入词典,就会影响词典的稳定性,影响词典指导语言使用的规范作用。

在增收新词的同时,修订中还要删去一些《现汉》中旧有的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前言的阐述,《现汉》主要收普通话语词(包括口语和书面语)。除此之外,还酌收常见的方言词语和书面上还用的带有文言色彩的词语,但不收不常见的方言词以及现代书面上已不使用(引文不算)的纯文言词。根据这样的收词原则,《现汉》应该在审慎研究的基础上删去以下几类词:

1. 多字条目中的纯文言词。这里要分清是纯文言词还是书面上还能见到的带有文言色彩的词,鉴别的方法是看这个词能不能出现在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格式中。根据这样测验,屏营、携贰、阉寺、斥卤、匠匠、佞张、耐金等文言词应该删去。匠、佞、耐等字单字已作解释,这几个文言复合词不应该收。

2. 使用地区狭窄的方言词。《现汉》收录方言词应该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使用地域比较广、书报上较常见,二是其中的一部分有可能进入普通话。使用地域狭窄、书面上不常见的方言词,特别是普通话中已有相应的同义词的应该删去。如白相人、炒更、吃讲茶、港纸、撒丫子、开瓢儿等。

3. 过时的音译词。汉语吸收外来词语,一向坚持意译为主的原则。《现汉》初编时期还在一定范围使用的某些音译词,现在已经被相应的意译词所代替。这些已不再使用的音译词应该从《现汉》中删去,如哀的美敦书、爱美的、苦迭打、梵亚铃、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等。这样的词偶尔还会在书上出现,但出现时一般应

该有注释,《现汉》不要为了这“偶尔”的需要而背上越来越重的包袱,并因此而影响《现汉》的规范性。

4. 反映过时的事物、现在已不再使用的词。如厂丝、撤佃、承重孙、辞灶、春试、春闹、秋试、秋闹、打炮(旧时名角儿新到某个地点登台的头几天演出拿手好戏)等。

5. 生造词,如粗浮、催迫、措举等。生造词与非生造词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事实上,有许多当初被语言学家们判定为“生造词”的词,像“流淌、概貌、关爱”等,现在已经是规范的普通话词语。为了便于表述,我们还用“生造词”这个叫法。一个词,如果不是文言词,词典编者又觉得很生,是两个语素的生硬堆砌,这样的词就有可能被归入生造词一类。

收词也要反映社会的发展。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词典对农村事物反映得多而且细,大大小小的农活、农具收得很全。现在我国正在向工业化迈进,向城市化发展,汽车、电脑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在增收反映高科技、新用品的词语的同时,反映已被机械化代替的落后农活、反映过时的旧农具的条目也可以删减一些。总之,通过收词上的调整,《现代汉语词典》应能体现出与时代发展并进的新面貌。

二 修订释义和例句

释义的修订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释义行文必须与标注的词性一致,二是反映语言本身的发展(如新意义、新用法的产生),三是反映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四是吸收语言研究的成果,五是增加一些语用方面的说明,六是改正释义中的错误。吕叔湘先生说过,

词典是语汇研究的成果。我们要通过研究来提高释义水平。“蚕食”释义的修订就是一个例子。83本对“蚕食”的解释是:“像蚕吃桑叶一样,比喻逐步侵占。”96本的解释是:“蚕吃桑叶。比喻逐步侵占。”这次修订改写的释义是:“像蚕吃桑叶那样一点一点地吃掉,比喻逐步侵占。”“蚕食”是偏正结构(状语+中心语),83本逗号前的话意思不完整,只有状语,没有中心语。96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也没有注好,前一句话成了主谓结构。现在改的释义,前一句话是完整的偏正结构,与后一句的结构、意义一致。这样改的结果,也使“蚕食”与相关词语“鲸吞”、“瓜分”的释义行文相一致。虚词研究几十年来不断深入,许多虚词的意义和用法比以前认识得更加精细了,这次修订要适当地把一些学术界已取得共识的意见反映出来,使虚词注释的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对释义修订的影响更加直接。举一个例子。“担架”的释义是:“医院或军队中抬送病人、伤员的用具,用木棍竹竿等做架子,中间绷着帆布或绳子。”这个释义半个世纪前可能没有问题,但现在跟不上形势了。“医院或军队中”限制得过窄,可以去掉。做架子的材料主要不是木棍竹竿,而是金属了。“担架”的释义改为“用金属或竹木等制成的抬送病人、伤员的用具,有的中间绷着帆布,可以折叠”,可能比较妥当。

例句也要跟上时代的发展。《现汉》初稿形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例句内容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迹。80年代初修订时,消除了一些“左”的影响。1996本在例句修订上也做了些工作。现在看来还很不够。例句中反映农村生活的过于集中,到处都是“王老汉、李老汉”,还有“志愿军”、“技术革命”等。例句的思想内容积极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有时代感。“咱穷人都翻身了”这样的例句

就过时了,改为“运动员为咱中国人争了光”是否好一些。“车、犁、耙、套、鞭等农具,随牲口合理搭配”,不仅农具落后,还带有农业合作化的痕迹。“毕业生有一个共同的打算,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个例句内容是理想主义的,它反映的思想即使在当时也不见得是完全真实的。“在山区安家落户,当一辈子农民”,这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提倡的,今天并不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样一些需要修改的例句在《现汉》中并不少见。我们对例句的要求应该是,能正确地体现词的意义和用法,语言自然精练,思想内容积极健康而又贴近生活。例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有所前进,《现汉》才更能体现时代精神。

三 标注词性

吕叔湘先生主持起草的《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中说“本词典暂不标词类”。“暂不标”并不是永远不标,正确的理解,恰恰应该是以后是要标的。大家知道,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还在争论,词类划分标准研究得还很不深入,这时词典上标注词类确实有困难。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现汉》还是为全部虚词和实词中的代词、数词、量词注明了词性(不是用符号,而是把词类名称作为释义的一部分)。名词、动词、形容词虽未注明词性,但在释义行文上和例句配合上大都有鲜明的特点,词性实际上是呼之欲出的。到了90年代,吕先生关于汉语词典标注词性的思想表述得更加明确。90年代初,吕先生在为一本词典写的序言中谈到标注词性问题时说“做总比不做好”,并说:“万事起头难,只要开了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总有一天会完备起来的。”

1992年,吕先生在为另一本词典写的序中写道:“我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前我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初稿的时候曾经试着做而没有做成的两件事。一件事是区别单字能不能单用,也就是分别词和非词……另一件事是在一个词或者一个词的一个义项之后标明词类。”吕先生肯定这部词典做成了这两件事,赞扬词典编纂者表现出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从吕先生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初稿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汉语研究、汉语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以及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等工作都迫切需要词典标注词性。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词典标注词性也已经存在现实可能性。一些词典(包括语言所词典室编写的《现代汉语小词典》)在标注词性上作了有益的尝试。现在应该把标注词性的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实际上是在做《现汉》编写者们要做而没有来得及做成的事。为标注词性,我们做了几年学术上的准备,制订了标注词性的原则和方法。首先明确是为词标注词性,不成词的语素和无意义的字无词性可言,大于词的结构(短语)也不标词性。对如何划分词与非词作了很细的规定。考虑到《现汉》读者面广大,词类划分为通常的12类。为了体现大类中某些词的特殊语法性质,在名词、动词、形容词三个大类中又分出若干小类。标注词性对于汉语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第一次在《现代汉语词典》上加进这项内容,不可能一下子做到尽善尽美。我们只希望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经过后人的不断努力,使汉语词典标注词性的工作像吕先生所期望的那样逐步完备起来。

除了上述几项工作外,这次修订在贯彻语文规范标准、改进体例等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修订,《现代汉语

词典》在规范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方面再向前迈进一步,适应时代的发展,更好地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

难字·难词·难义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丛谈*

舒宝璋

难字难词是指人们在阅读一般书刊时感到困难的字词,或者不识其读音,或者不明其意义,或者于音义均无从知晓。有些字词并不难,但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有时也会成为拦路虎,这就是难义。

《现代汉语词典》是汇集相当数量的字、词、词组、熟语等语言材料,分别提供一定信息量,并按音序编排的,旨在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一部中型的详解语文词典。

美国的《韦伯斯特大词典》,自1828年问世(初名《英语大词典》)以来,修订已达十余次(书名时有更新),收词自七万条,逐渐增至四十五万到六十万条不等(因不同版本而异),至今仍盛行不衰。而1889年问世的《世纪百科词典》,虽亦为美国最有价值的工具书之一,但由于修订不够及时,故而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有限。

《现代汉语词典》在国内外负有盛誉,二十年来,小修过两次,还出过一本《补编》,现在该到了增订的时候了。这是因为这十几年来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语言中的字、词、语也随之出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现了流光溢彩令人目不暇接的景象,读者有不少问题需要从这部中型词典中求得解决,而《现代汉语词典》也应该能够随时分别给读者解开这样那样的疑难。

窃以为:难字、难词、难义是《现汉》修订的一个焦点。

这里仅就难字收录的情况来回顾一下。

《现代汉语词典》始编于1958年,其《编写细则(修订稿)》上说:“太僻的单字,现代既不单用,也不见合成词或成语(或虽有而本词典不收),一概不收,如‘佻’(本词典不收‘八佻’),‘摘’(本词典不收“摘翰”),‘絺’,‘殄’等。但古器物名酌收。”

1960年,封面印有“审读稿件请勿外传”戳记的《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出版。试印本第一至七册为词典凡例、正文和附录,另附《检字表》一册。《检字表·说明》的第一条说:“本检字表中包括两部分字,一部分是正文中所收的字,附注音和正文页码;一部分是正文中未收的补充字,附注音和简单解释。”据《凡例》所说,收入正文的单字共约六千个。另收异体字(包括繁体字)约一千二百个,各标以括号置于有关字之后;正文中未收的补充字共约三千个,不收作条目,但都列入检字表。正文中未收但都列入检字表的字,包括姓氏字、人名字、地名字、文言字、古体字和古器物字等,我们称之为“难字”。在试印本中,难字与常见字之比,大体上为三七开。这说明从一开始,难字就是《现代汉语词典》中一个颇具分量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1965年,主要作为送审之用的《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出版,试用本将原来列入检字表中的补充字(即难字)全部列入正文,当时称为“一条龙”,为的是方便读者。这些列入正文的难字,大都在注解中分别交代,或附加“囟”等标记,以利于读者识别。

1973年,为适应急需,以试用本原纸型付印,在版权页上加“内部发行”四字,以微示有所保留之意。

1978年,经过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正式发行,难字有所增减。如新增了“市(fú)、眈(chòng)”等字,还增加了“辜(zhí)、焮(xìn)、盍(hé)、盍(qiáo)、膀(bàng)”等字;删掉的仅是个别的。

1983年标为第二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虽然是重新排版,而条目总数并未增加,仅稍作修改而已。

198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补编,所增的难字较多,有“赜(ní)、彝(shān)、榭(kā)、燻(kào)、漚(miǎn)、柜(jù)、漚(Gēng)”等232个(含补音释义的,不含单纯补义的)。

难字在词典中的地位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难 字

古人云:凡为文宜略识字。这是说,写文章要尽量多认识一些字,才能准确入微地表情达意。同理,读书看报也应该这样,才能周全细致地接收信息,“读书难字过”是不足为训的。

常听说:“不认识的字,可以查字典嘛!”这里说字典,其实也包括词典。这里既反映了人们对字词典的基本要求,也说明了字词典有帮助人们认识难字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凡在现实生活中或一般读物上出现的难字,《现代汉语词典》都不能置之不理或撇开不管,下边分几种类型,试举些例子来看:

1. 人名字。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前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的杨樵(yǒu)、科学技术界的陶其

嫩(měi)、教育界的甘幼珮(壮族),见于《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学者名录》的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吴钰(zhù)钰、山东中医学院教授张灿珮(jiǎo),见于《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续集)的中山大学副教授有周锡馥,台北市年青女画家郑姪(zhēng)檻(mì)(据台湾《联合报》1992年10月20日第18版);台湾蒋孝武的遗孀蔡惠媚,她有个好友叫王曼婍(huà)(据香港《广角镜》月刊1991年9月号第22页)。还有日本的人名用字,如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lǚ),大馆市市长畠(huáng)山健治郎(见《人物》双月刊1988年第1期第43页)以及70年代的日本自民党议员笹(xiǎo)山茂太郎(见《民主》月刊1992年第9期第21页)。《现代汉语词典》一贯重视人名用字的收集,“蹇(qiǎn)、纛(huì)、畑(tián)”等字已相继收入,即为明证。现代的人名用字,自然是现代汉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必收无疑的。

2. 地名字。《毛泽东书信选集·致文远昌》里说:“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坨(zhūn)诸位兄嫂侄子女们。”(19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0年12月4日致彭德怀、邓华等人的电报,提到了朝鲜的揭隅里、困(yuān)水里等地名。《中国名胜词典》中收有南京市安德门外的[淳(bó)泥国王墓],江西省兴国县城内的[浚(liàn)江书院]和福建省龙岩县雁石乡的[龙硿洞]等条目。《中国地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名索引》中,天津市的糙洵(cāo diàn),江西省的磔(zào)下和广东的潜(pá)江口等处,都缺乏正确的读音,当然更不知道其含义了。若说是地名太小所以不收吧;那么,广东的泮(jǐng)洲,浙江的岙(xué)口,江苏的甬直,以至北京的皇史宬(chéng)和十三陵长陵的祿(líng)恩殿,其中的难字,《现汉》都是收了的。

3. 方言字。广东人称“田产、鱼埗”(见《书品》1988年4期第58页),这“埗”是不是码头的意思?巴金谈到云南个旧锡矿时,说:“我下过矿井在地底下两百米的大坑道里,……用煤石灯照着朝上看,洞子早给封住了,我只能想象当年童工们背着堈(huáng)包,从这里往上爬的情景。”(录自《讲真话的书》第540页;这“堈”是指的矿石吗?《人物》双月刊1988年第2期第51页提到沈从文少年时:“他人小,军中熟人、同事都戏称他为‘躄(lēng)师爷’。”这“躄”字在江西也说,音 lāng,含义上有无差别,不敢说。台湾有一种食用海产叫“花蜆(xún)”(见《中国时报》1993年1月11日第15版),大陆沿海是否有?香港《广角镜》月刊1991年7月号第7页引用李鹏总理讲话的意思说:香港确实需要一个新机场,现有的启德机场已经饱和,中国支持在香港建立新机场,但是这项大型建设应该注意效益,不应给香港市民预(miē)包袱,不应给未来特区造成财政负担(原文未加引号)。“预”字当是方言字,是“背(bēi)”的意思。《广角镜》1992年9月号有篇文章,题为《点只金钱龟咁(gàn)简单!》,《澳门日报》1993年1月6日第10版有条新闻,题为《院线真系咁(gàn)好做?》,看来在港澳,“咁”是“如此这般”或“这样”的意思。江西也有类似的说法,义同而发音小异,但未见之于书面。《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第5条说:“本词典不收一般方言语汇,但已经屡在书刊上出现的,酌量选收,以供查考,选录的标准从严。”我想对于方言字,标准是否可以稍微宽一些?

4. 文言字。鲁迅作于1901年的《惜花四律》之二,有句云:“莫教夕照催长笛,且踏春阳过板桥,只恐新秋归塞雁,兰艘载酒檣经摇。”周振甫注:“艘音双,小船。”徐特立作于1905年的《言志》一诗云:“丈夫落魄纵无聊,壮志依然抑九霄,非同泽柳新稊(tí)弱,

偶受春风即折腰。”“稊”指枯柳再生的枝条。古典诗词中，即使是今人所作，也难免会有难字。都往词典里收，也不一定合适，但于现当代名家之作，似亦当酌量选收。

5. 口语同音异形字。鲁迅有“无名小婢，不在话下”的写法（见《华盖集·“碰壁”之余》），盖指“一个女读者”而言。台湾女作家三毛在她的题为《背影》的文集中，称女性的对方为“妳”，以与“你”相区别，在某些场合有一定作用，不完全是多余的。《背影》集中，还有这样的句子：“下雨吔！”（第242页）“整整两小时完全是自己的嘢！”“回国以来，今天最快乐，连雨滴在身上都想笑起来嘢！”（第255、256页）。这与《水浒传》第十六回《吴用智取生辰纲》里面，“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立在松树旁边，指着这一十五人说道：‘倒也，倒也！’”的“也”字，有何异同？颇值得研究一番，不过这三个字的发音，都应该是(yē)，而其功能都应该是加强某种语气的。总之，《现汉》对这一类语文现象，有必要加以收录。

难 词

见字明义者，不算难词，难词一般不难在字上，而难在对词中每个字的音义都了解，对词的整体含义却无从捉摸。人们查词典，主要就是查这种无从捉摸的难词，下边分几点来谈：

1. 文言词语。像“腹笥”这一类在书面或口头上都屡有出现的词，无疑是应该收的。有的词看似陈旧，到时却又复活了。如严复《救亡决论》云：“王氏窗前格竹，七日病生之事，若与西洋植物家言之，当不知几许轩渠，几人齿冷。”《人物》1991年第6期写顾颉刚与吴徵兰婚后，以吴徵兰名义写成《妇女与革命》一文，发表后，

“先生把文章送给徽兰看，虽知她不尽了解其中涵义，却也得其轩渠一笑。”至于现当代诗词中语，自然也不宜回避；如叶剑英《一九四二年“七·七”悼左权同志》：“敌后坚持，捍卫着自由中国。试看那椽枪满地，汉家旗帜。……”（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选读》）“椽、枪”并星名，象征兵灾。中学语文课文中的文言词，同样有必要关注，如《初中语文》第二册，即选有古乐府《折杨柳歌辞》：“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蹏（bié）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蹏跋，双声词，像马蹄击地声。最足以令人深思的是：《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第七条规定不收的文言词、共举了“涛张、偃蹇、步趋、鄙夫、嬖人、豹变、博洽、苞苴、苞桑、奔北”十个词，除豹变，苞桑至今未收外，涛张早已见之于1965年的试用本，其余七个词在补编中也都能查到。黄炎培20世纪40年代有《苞桑集》，故“苞桑”也是应该收的。

2. “文革”中词语。如“牛棚、臭老九、三反分子”之类的词语，虽然现已不用，但文革期间的书籍报刊俱度藏在馆，那一段历史仍然有人写，反映那些苦难日子的文艺作品将长期流传下去。彻底否定“文革”不等于消灭其语词；它们既已流行过，就成了语言事实。王竹溪《新部首大字典》把第二批简化汉字第一表中的字，均收作字头，注明是“1978年简化字”，而在释文中则概不采用，以示与第一批简化字有别。“二简”已明令废止，但其中的第一表，毕竟也用了半年多，自《人民日报》以至中小学教材，字迹历历，岂能抹去？王氏这样做，洵属有识之举。准此，则《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时，似亦不宜对“文革”中词语一概不加理睬罢。

3. 新起词语。“冰毒”，指去氧麻黄素，以其外观呈白色透明结晶状、外形似冰而得名，是近年来国外毒品市场比较流行的一种

合成毒品(见《江西日报》1993年2月25日第4版)。“小皇帝”是对娇生惯养、目空一切的独生子女的别称,这在出版于1992年10月的台湾《江西文献》季刊的一篇为《危楼今昔》的获奖文章中也有所反映。新词是层出不穷的,有必要随时进行搜集和研究。“炒鱿鱼”比喻解雇,原因何在呢?“邮政编码”的简称,有人主张用“邮码”,因为它与“扫除文盲”可简称“扫盲”相一致;也有人主张用“邮编”,因为它跟“电报挂号”可简为“电挂”相协调。《现汉》修订,有责任进一步研究和解决这类问题。

4. 方言词语。鲁迅的《公民科歌》作于1931年,最后四句说:“公民义务多得很/只有大人自己心里懂/但愿诸君切勿死守我的教科书/免得大人一不高兴便说阿拉是反动。”这“阿拉”是上海话。体操运动员童非新近从美国回来,人们问他,在美国那么些年,最想家乡的什么?他说,想得最多的就是藜蒿炒腊肉。在台湾的江西同乡会,办了个刊物叫《江西文献》,去年4月出版的《江西文献》上,就有一篇短文,题为《好吃的藜蒿》,不胜其忆恋向往之情,颇有些莼鲈之思的味道。这藜蒿其实就是鄱阳湖沼泽地带的一种小草;春夏之时,将其拔出,阴干,然后去其根叶,留下嫩茎,与腊肉炒而食之,鲜美无比,这是江西独有而未尝出口的一种特产,所以自然也就是江西地区独有的一个词了。今年2月,香港警方在铜锣湾搜查了一家与黑社会联手提供男妓服务的“鸭店”,“鸭店”是香港色情业近来推出的新玩意儿,以每月一间的速度出现在香港街头。这是今年3月12日《光华时报》摘自《羊城晚报》的一段报道所说的。可见“鸭店”一词,其源盖出于香港。至于流行于澳门地区的“院线”一词,据《澳门日报》今年1月5日和6日第13版的报道,可组成“东方院线”、“东方多了一条院线”、“电影《霸王别姬》为

该院线打响头炮”，“目前该线的影片已排至九月”、“另一院线……”以及“院线真系咁好做”等语句，真切的含义却不敢肯定，仅知其亦可简称“线”而已。

5. 外来词语。“哈罗、榻榻米、大哥大、卡拉 OK”等早已耳熟能详的词语，当考虑补收。再举几个例子：去年 7 月出版的《江西文献》，从台胞眼中所见的江西抚州市，各类形式的舞训班应运而生，“人们不但对学习国际华尔兹、普鲁斯、探戈、快三、快步舞，非常感兴趣外，对现代拉丁舞和恰恰、伦巴等也趋之若鹜。”抚州是个小城市，这些舞的名称，该不该选收几个？江西省政协出版的《光华时报》，今年 3 月 26 日（第 148 期）的第二、七版中缝，有几句感慨系之的话：“钱，这一经济社会的尤物，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样，不时为社会释放出种种祸患来。”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宙斯让别的神用泥巴制成的地上的第一个女人。既然开放了，这类神话中的著名人物，似乎在词典中，也应该有所反映。台湾《中国时报》今年 1 月 9 日第 7 版报道：高雄市警方在新兴区查获价值新台币一千多万元的安非他命二十一公斤，被捕者之一的杨南山对安毒的来源坚不吐实，现全案正在深入追查侦办中。又，1 月 12 日第 15 版报道：台北警方在贩毒犯李效亮家中搜查，从洗衣机内找出的违禁品有：分装安非他命的塑胶袋 170 包，大麻香烟 73 支及瓦斯喷灯、天平及吸食工具等。这说明台湾自南至北，均有此物，词典中怎可不收？

另有一类以拉丁字母领头的外来词，在某一时期或某些地区颇为流行，如“AB 团、BP 机、T 恤衫、XO 酒瓶”等，词典也不能完全不收。收入后怎么排法？夹在一般条目中，恐枘凿难入；比较可行的，是仿照《辞海》的体例，将此类条目仍以拉丁字母为序，衔接

于全部一般条目之后,作为词典正文的一个尾部。

难 义

1. 字的难义需补者,试举若干例:

炒 ②比喻反复进行(某项投机买卖活动):~买/~卖/~买~卖/~邮/~楼/~股票/~房地产。

揆 ③(国家)最高行政长官:郝~(同上第1版)/阁~(《中国时报》1993年1月10日第2版)/~席(见《现代汉语词典补编》)。

满 ③④之间〈方〉排行在末了的:/~崽/~女/~妹子。

毛 ④⑤之间 黄色;下流:同为“枕头片”,也有~与不~之分(见《南昌晚报》93年2月21日第2版)。

卯² ②紧盯着;穷追不舍:陈水扁~上陈履安。(据《中国时报》今年1月12日第4版报道:台湾向国外购买F16和幻影2000战斗机,未经“财政部”审查,却都已从国防预算中挪用台币83亿元以支付头期款,“立法委员”陈水扁卯定了“国防部长”陈履安,对他说:“在你当上监察院长的一天,我将告发此案,让监察院长陈履安调查违法的前国防部长陈履安。”)

派 ②③之间有气派;气派不凡:大厦一幢比一幢高,商城一座比一座~,北京人飘浮在了七彩霓虹中(《人民政协报》1993年3月6日第2版)。

2. 词的难义需补者,也姑举若干例:

便当(第2字读音不详) ②一种按份供应的饭菜:吃~(见三毛《背影》集第49页)/调理~/午餐~/一个好~荤素的

比例为一比四(并见台湾《联合报》1992年10月20日第15版)。

博士 ②〈方〉木匠:两个~同一伙农友分别抬着两尊松树炮,艰难地爬上崖来(杨佩瑾《霹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杨是江西省文联主席)。

老表 ③江西人的别称:江西~/~崛起的新希望(《光华时报》1993年3月12日第一版/有朝一日,两岸通航了,台湾的~或表嫂们,在台北超市看见了藜蒿,不倾囊抢购才怪(《江西文献》第148期第36页)。也作老俵,表嫂亦作俵嫂。

投入 ②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很~/肯~/小朋友的节目,也值得这么大的人这样认真,这样~,真是……(末例原文如此,见南京市《现代家庭报》1993年3月9日第一版)。

托福 ②对非英语国家的人所进行的一种英语合格考试:考~/~热~/~考试~/~考前辅导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攻~书/在中学生中流行着一种~病(末二例见《广角镜》第228期第85页)。

下海 ④非商业人员全部或部分丢开本职而从事商业性活动:~热~/~者/准备~/已经~/童非~了/童童,~吧(末二例见《南昌晚报》1993年3月7日第1版,童非为著名体操运动员,前几年赴美任体操教练,新近归国,就职于南昌市昌北经济发展总公司)。

需要说明的是:1)以上关于字词难义之可以考虑补编者,仅仅是举例性质,决不限于这一些;2)以上各按音序写出,未一一标音,以省篇幅;3)“释文”并未经周密研究和仔细推敲,仅提供一个坯子而已;4)例证和括注并没有按《现汉》体例来写,总以能说明问题及

其根据为依归。

我们在修订《现汉》时,应从为读者释疑解惑方面多下些功夫,以使《现汉》更加趋于完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至少需做到两点:

1. 广征博采。泰山不辞小土,江海不择细流,收集资料的范围不妨大一些。诸如:全国性报刊,某些颇有语言特色的地方性报刊(含港澳台报刊),党和政府的大型重要报告和文件,现当代重要作家(含港澳台作家)的重要作品,现当代人所作的古典诗词名篇,中小学教材,科技报刊和科普读物,人口普查资料中的人名姓氏用字,地名普查资料中的地名用字,文物考古中新出土的器物名,各地方言词语之已进入普通话者,来自国外及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某些比较通行的词语,《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中的检字表(如“𪛗”。chě字,至今未收)等等,皆应在搜集之列。至于其他字、词典,亦应有所借鉴,目的是为了避其所同和辨其所异,而不是为了取其果实,炒现饭。

广征博采不等于照单全收,有所采,必有所不采。见字明义者不收,如“家课、儿画、文史”;可用作举例者,不另立条,如“吉祥物”可置“吉祥”下作例(《现汉》的“道班”条,即有“道班房”为例);字异而音近者,可考虑不收,如“呃骗”,其实就是“讹骗”的音讹;生造的词语一般不收。《现汉》编写的细则第6条规定:“本词典不收生造词”,并举出“骤急、赞谏、但却”等十六个词为例,可惜守例不严,其中的“闷郁”和“衰残”,又在《补编》上给补上了。

2. 删汰繁芜。有生必有死,有来必有去,有增必有删,此自然之理。凡同义复词,见字明义者,可删,如“开掘、开启、开设”之类;结构松散,似词非词者,可删,如“开饭、开工、开荒”之类;能以“拆

字格”作注者,多可删,如“凋零、果断、寒苦、整洁”之类;例子拖沓,浪费篇幅者,可适当加以删节,如“探”①下,既有“探矿”为例,则“探路”可省,“汤”④举“豆腐汤/菠菜汤”为例,完全可去掉一个,“调和”③的例句云,“他认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前六字不妨略去。上举各例,见仁见智,容有不合,但删汰繁芜的原则,似应该可以成立。

增其所当增,删其所不可不删,改其所宜改者(本文未涉及),不多为篇幅考虑,面主要以是否能适应社会需要为依归,篇幅多寡的控制,只要不离开中型词典这个谱儿,也就庶几乎可了。

编写有中国特色的词典,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现汉》修订时,增收一些港澳台的词语,以增进语言上的了解,这同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也是完全一致的,语言的融合和统一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很难简单地凭主观确定,宜采用何者或排斥何者,语言词典的生命力,就在于充分展现本语言的特殊性。港澳台地区与大陆地区在词语上的某些参差,正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汉语所具有的一种特性,它有权在词典中得到反映。解说是词典的灵魂,例证是词典的血肉,而难字、难词、难义则是汉语词典的脊梁,当然也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的脊梁和特色。

《现汉》修订时,希望能增加几个附录:1)外国国家领导人译名异同对照表。如“布什、布希”,“梅杰、马卓安”,“撒切尔夫人、戴卓尔夫人”之类;2)外国名作家新旧译名对照表,如“翟提、歌德”,“器俄、雨果”,“柴霍甫、契诃夫”之类;3)汉字偏旁笔顺表,如“乃、义、丑、再、母、臼”等字,何笔为先,何笔为次,何笔最后;4)汉字形体辨似录,如“彘、易”,“无、无”“友、发,发”等等。一部词典的附录是否丰富和实用,也是衡量其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现汉》修订的 重要出发点：促进规范*

晁继周

如果把语言比喻成一条发展中的长河，那么规范型词典所描写的应当是长河中“当代”这一段的词汇面貌。随着语言长河的缓缓流淌，“当代”这一段也将渐渐向后推移。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范型词典应该是一潭活水：它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有不断发展变化的一面。正因为如此，规范型词典的适时修订，是一件必不可少而又很正常的事情。

语言不断发展，同时也这就要求不断规范。这也像流淌的河水，它有时会冲出堤岸，需要适当地加以约束。规范型词典的修订，除像其他词典一样包括弥补缺失、修正错误、完善体例等内容外，有两项最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反映语言的发展，促进语言的规范。本文想结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的修订，着重谈一谈促进规范的问题。

《现汉》这次修订，共增收词语 9000 余条，这 9000 余条新增词语中，新词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说到规范，首先是对新词语的规范。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97 年第 1 期。

《现汉》正式出版是1978年，它收录的词语，截止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现汉》出版当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新鲜事物的大量出现，人们思想观念的迅速更新，都促使汉语新词新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发出来。参加编年体汉语新词语词典编写的刘一玲同志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数字：1991年收入词典的新词语共335条，1992年448条，1993年461条，1994年438条。刘一玲说“这个数字也许严了一些”。即使按这偏严的数字计算，这些汉语新词新语的产生，每天平均在一个以上。如果我们完全按描写原则编一部新词词典，收录的词语比这还要多。但如果我们按规范原则编一部词典，对这些词语就应该作审慎的选择，这种选择就体现了规范。在接踵而至几乎应接不暇的新词新语中，不乏来去匆匆的过客。规范型词典的编写者或修订者要根据新词新语存在的久暂决定对它们是收留还是摒除。规范型词典只应把那些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验，证明已经站住脚的新词收录下来。拿这些年出版的新词词典与《现汉》修订本相比照，就会发现被《现汉》修订本吸收的新词只是新词新语中经过严格甄选的一部分。

还有一种情况。一种新事物刚出现的时候，往往有几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去表示它。从语言规范的角度看，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也是不适宜的。在表达同一事物的几个词中，留下哪一个，去掉哪一个或哪几个，应当由语言使用者在实际运用中选择。规范型词典只是把人们选择的结果反映出来。一部权威性的词典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它的导向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比如，“展销、展售、展卖”这三个词，表示的是同一事物。这些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展销”。《现汉》修订时，收了“展销”而没有收“展售”

和“展卖”。这是一种导向,也就是一种规范。今后编《现代汉语大词典》,如果篇幅允许,也有可能把“展售”、“展卖”与“展销”同时收进来。即使那样,三个词的地位也不是平等的,“展销”为正条,“展售”、“展卖”为副条。“展销”详注,“展售”和“展卖”可以直接注为“展销”。这样做,也是一种导向和规范作用。

新词资料中,有一部分值得注意的社会流行语。从来源上看,这些社会流行语起初大多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群体性——它们开始使用时往往局限于一定的区域和一定的人群(一定的行业或一定的年龄层、一定的文化层等)。有些社会流行语甚至与黑话和隐语有关系。规范型词典在增收新词时,对社会流行语一定要取慎重的态度。因为社会流行语被收入规范型词典后,在读者看来,它们就具有了民族共同语标准语的身份;如果词典编者甄选有误,把不该收的词收进词典,就会形成误导,从而影响语言的纯洁和健康。比如把人民币十元称为一“张”,一百元称为一“棵”,一千元称为一“吨”,一万元称为一“方”,就多少带有黑话的味道,《现汉》修订时就没有吸收它们。

收词方面的规范,除了对新词的规范外,还有对方言词、古语词和外来词的规范。这些过去已有文章论及,这次《现汉》修订也不是重点,本文不再赘述。

收词需要规范,释义也需要规范。语言中旧有的词汇,大都具有为人们所共同理解的明确含义。而新词,由于它们产生的历史较短,人们对其意义的理解有的并不一致,甚至连用法也不尽相同。收入规范型词典的词,应该有明确的意义和一致的用法。词典编纂者解释词语的依据,只能是语言资料,也就是该词语的实际使用情况。据笔者所知,几年前,由于对“走穴”一词的理解不同,

曾经引起过一场官司。《现汉》修订本收了“走穴”一词，解释为：“指演员为了捞外快而私自外出演出。”这个解释从三个方面对走穴行为作了界定：第一，为了捞外快（即为私利所驱使）；第二，私自（未经所在单位同意）；第三，外出演出（不在本单位）。《现汉》的解释使这个词的含义明白无误了。

有的新词，其含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模糊不定，词典编纂者需要经过对大量资料的认真考察，才能对其含义作出判断。就拿“干警”这个词来说，从1989年出版的《现汉补编》，到1996年出版的《现汉》修订本，解释就有了变化。《现汉补编》的释义是：“公安部门中干部和警察的合称。”那时我们掌握的资料，大量的是“广大公安干警”、“全体干警”等用法。从资料看，它是个集合名词，用法有点像“官兵”和“指战员”。从结构上看，“干警”是联合式而不是偏正式。但是后来，这个词的用法发生了变化，除了当集合名词使用外，又有了“一个干警”、“干警小李”这样的说法。开始时词典编纂者还把这种用法视为“不规范”，笔者本人还在报纸上撰文对这种用法提出批评。但是语言事实并不以词典编纂者的意志为转移，“干警”一词的“不规范”用法洪水般地涌来，“一个持有正义感的公安干警”、“模范干警崔大庆”一类的说法不绝于耳。忠于语言事实的词典编者不能漠然置之了，在《现汉》修订本中，他们把这个词的释义改成了：“公、检、法部门中干部和警察的合称，有时泛指警察。”注解改了，矛盾还是存在的。主要的矛盾就是词的结构，是联合还是偏正？如果是偏正，也就是说，“干警”的结构与“刑警、法警、乘警、片警”的结构一样，那么，“干警”到底是哪一类警察呢？“干警”现在已经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常用词，收入《现汉》该是没有问题的。《现汉》修订本对它作出的解释有语言事实支持，也

可以认可。但语言毕竟是一种有发展有变化的社会现象,“干警”一词的意义和用法还可以依据今后的语言事实不断地观察和研究,下一次修订时,对它的解释变与不变,都是正常的。

以上说的是《现汉》修订中在收词和释义方面的规范问题。收词和释义方面的规范(这里主要指语文条目),是约定俗成的结果,词典编纂者通过自己的写作,把这种结果反映到词典中来。这种规范虽然不是法规,但由于它是众人在长期使用中约定的结果,又被以“典”的形式肯定下来,人们习惯于遵从它,违反了会被视为错误。

字音、字形的规范,情况不同于收词、释义的规范。字音、字形的规范虽然也体现了约定俗成的原则,但它们常常要由国家通过法规的形式加以规定。秦始皇的“书同文”不是作为他的伟大功绩载入史册的吗?一个正确而又能有效贯彻的法规不是凭空制定的,它是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对现状的考察,对不同方案利弊的比较之后,采取专家、群众和领导部门相结合的方法形成的。关于字音、字形规范的规定一经形成,并由国家有关部门颁布实施后,就具有了法规的性质,成了判断正误是非的标准。规范型词典的编纂、修订必须以这些规定为依据。1995年,我们国家发生了首例语文试题引起的诉讼,几位学生家长因语文试题标准答案有误,致使自己的孩子以一分之差未考入重点中学而状告地方教育部门。那道有争议的考题是给“自作自受”中的“作”字注音。“作”的读音,1985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颁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已作出规定:除“作坊”中的“作”读 zuō 外,其余一律读 zuò;而该地区教育部门仍依据没有来得及修订的词典把标准答案规定为 zuō。这里的问题首先是教育部门对《审音表》学习、贯彻不够。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包

括《现汉》在内的在社会上有一定权威性的词典是否应该更及时地修订,以体现《审音表》的新规定;如果来不及修订,至少也应该在1985年以后出版的词典中附上《审音表》里若干与词典注音不同的新规定,以示对读者负责。这件事着实令人震惊,也引起词典编纂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多方面的思考。

这次《现汉》修订,认真贯彻了《审音表》的规定。这里说的“认真”,是强调了对《审音表》精神实质的理解,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贯彻。国家语委等二委一部在《关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通知》中指出,《审音表》的修订,以符合普通话语音发展规律为原则,以便利广大群众学习普通话为着眼点,采取约定俗成、承认现实的态度。这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审音表》的精神实质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字规定的统读音(如对“指”、“作”读音的规定),与北京实际读音有区别,这主要是考虑符合普通话语音发展规律,便于广大方言区人民群众学习普通话。有的字音改变了传统读音(如“确凿”的“凿”改读 záo,“荨麻疹”的“荨”改读 xún),是约定俗成、承认现实的结果。《现汉》修订中,在依据《审音表》修正注音的同时,附加了一些必要的提示和说明,以避免因为字音的变动而在部分读者中造成不解。《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是对现代汉语普通话语词读音的审定,而《现汉》中保留了字的某些方言义和文言义,也相应地保留了这些意义的特有的读音,这些实际上不属于《审音表》审定的范围。比如“凹”字在晋、陕地名中保留了 wā 音(义同“洼”),“期”字在文言义中保留了 jī 音(用在古汉语“期年”、“期月”等词语中),这样的处理与《审音表》的精神无违。字音审定工作不是一劳永逸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审定过的音,80年代重新审定时就有了变化。审音工作今后

还会不断进行下去,个别字音经过审定还可能有变动,《现汉》要在今后的修订中及时反映。另一方面,词典中对某些字音所加的提示、说明,以及作出的变通处理,对今后的审音工作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在字形方面,1986年国家语委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了《简化字总表》;1988年,国家语委、教委发布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发布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个别汉字的规范字形,在这些文件中作了新的规定。原《现汉》在字形方面与上述文件不一致的地方,这次修订中都作了修正。

总的来说,《现汉》这次修订,从收词、释义,到字音、字形等方面,都向着规范化方向提高了一大步。可以肯定,修订后的《现汉》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将发挥更好的作用。《现汉》作为一部汉语规范型词典,今后还要一次次修订,反映汉语的发展、促进汉语的规范是它追求的永无止境的目标。

语文字词典的条目编排*

刘庆隆

这里所说的条目编排,不着重讨论字词典中的条目排列,像按音排列还是按形排列,按部首排列还是按四角号码排列,等等。而是想对字词典中条目的分合、联系等几个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对这个方面问题的重视。

我国的语文性字词典,在条目编排上,多少年来,变化不大,改进很少。按形排的,就以单字为单位,按照单字的形体排列起来;按音排列的,就按照单字的读音排列起来。字典是这样,词典也是这样,只是词典的单字后边,再附上若干条由这个单字领头或结尾的词语。老的字词典是这样,新的字词典也是这样。小型的字词典是这样,大型的字词典也是这样。看不出每部字词典的特点,也看不出这些年来语言文字的研究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语文性字词典在条目编排上的停滞不前的状况,不能反映语言文字研究的水平,也不能满足读者学习语言文字的要求。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3年第3期。

—

说没有多大变化,并不是说没有一点儿变化,有的字词典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只是这些尝试影响很小,没有在字词典界引起什么反响。像《中华大字典》,就改变了一下过去字典的办法,每个单字都另行顶格排列(这一项大多数字词典都采用了)。每个义项都加上数码,也另行排列,不像《正字通》、《康熙字典》等那样接着排。一个字有几个不同的音义,就出几个字头,意义分列在各个相应的音下。比如“长”字。

“〔长〕直良切,音场,阳韵。⊖……。久远也。……。⊖短之对也。……⊖姓也。……。

〔长〕展两切,音掌,养韵。⊖莖也。……⊖长儿、长孙。均复姓。

〔长〕直亮切,音仗,漾韵。⊖余也。……。

〔长〕知亮切,音障,漾韵。盛也。……。”

这一项大多数字词典都没有采用,按音序排列的除外。《中华大字典》的这种编排方式,比过去的字典笼统地放在一起的做法前进了一步,首先眉目清楚,便于检查。从字词典编写的角度来说也更科学了一些。

老的《辞海》一个字的不同的音义,用〔甲〕、〔乙〕等区别开,比《康熙字典》等清楚了,但没有《中华大字典》科学。这是因为音义不同的词,在语言里是不同的单位,语文字词典里应该区分开。《中华大字典》虽然叫字典,却冲破了以字为本位的传统习惯。老的《辞海》虽然是一本词典,却未能摆脱以字为本位的束缚,从语言

出发来处理字词的分合。

按音序排列的字词典,不同的音义,因为排列的需要,大都分别立条了。有的把异体字放在正条后一并交代。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现代汉语词典》在条目的分合上,比《中华大字典》、《国语辞典》等又前进了一步,不但不同音义的字词分成了不同的条目,就是同音同形而意义不相隶属的条目也分别列条。单字条目,在字的右肩上加1、2等标志,复音条目在方框外右上角加1、2等标志。比如:“苏”sū分为,“苏¹(蘇)sū植物名:紫~|白~。苏²(蘇、甦)sū苏醒:死而复~。苏³(蘇)Sū①指江苏苏州:~绣。②指江苏:~剧。③姓。苏⁴(蘇)sū①指苏维埃:~区。②(Sū)指苏联。苏⁵(嚚)sū见【嚚苏】(lū·sū)。”“干”gān分为,“干¹gān①古代指盾。②(Gān)姓。干²gān①〈书〉冒犯:~犯。②牵连;涉及:~连|~涉|这件事与你无~。③〈书〉追求(职位、俸禄等):~禄|~进。干³gān〈书〉水边:江~|河~。干⁴gān天干:~支。干⁵(乾)gān①没有水分或水分很少(跟‘湿’相对):……。”“麻”má分为,“麻(蔴)má①大麻、亚麻……的统称。②麻类植物的纤维,……。③芝麻:~酱|~油。麻²má①表面不平……。②麻子①:~脸。③带细碎斑点的:~蝇|~雀。④(Má)姓。麻³má感觉轻微的麻木:……”。

《现代汉语词典》一般不收专名,有一般语文意义的字,而又是地名的简称或别称的,收了一部分。这样的条目,意义不相隶属的,分别列条,像上边的“苏³”。还有“广²Guǎng①指广东、广州。……。”“徽²Huī指徽州……。”“冀²Jì①河北的别称。……。”“豫³Yù河南的别称。”意义上有关联的,就不另立条,只列义项,义项号码后在括号里加注音,第一个字母大写,像上边的“苏⁴”的②。

还有“湖……②(Hú)指湖州……。③(Hú)指湖南、湖北:~广。”
“福……③(Fú)指福建:~橘。”“江……②(Jiāng)指长江……。”
“河……③(Hé)指黄河……。”

《现代汉语词典》中姓氏义一般没有单独列条,有专名条的,附在专名条下列义项,像“苏³……③姓。”没有专名条的,附在单字一般义项后,单字分条的,附在“X¹”下,列义项,义项号码后在括号里加注音,第一个字母大写,像“干¹……②(Gān)姓。”单字或“X¹”下有异体字不宜列的,就单独列条或附在“X²”下,像“于¹(於)……于²Yú姓。”“麻²……④(Má)姓。”姓氏义有异体字或繁体字的,根据情况单独列条,像“涂(塗)Tú姓。”

从上边举的例子,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词典》在条目的编排上,地名和姓氏的处理,在原则上是不一样的。地名的处理跟全书的精神是一致的,姓氏的处理跟全书的精神不一致。这主要是因为姓氏收的多,如果照分列条目的原则去处理,分列的条目比较多,多占一些篇幅,所以采取了变通的办法。从全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来说,还是应该分列条目的,另列条目为好。

《现代汉语词典》复音条目,形同音同而意义不相联属的,也分列条目。比如“[地头]¹dìtóu①(~儿)田地的边上……。[地头]²dìtóu(~儿)书页下端的空白处。”“[点播]¹diǎnbō播种的一种方法,……。[点播]²diǎnbō指定节目请广播电台播送:……。”但形同音同,注音形式不同的,不标1、2等,形同音不同的,按音序排列,自然就分开了,也不标1、2等。比如:“[春秋]Chūnqiū①我国古代编年体的史书,……。②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春秋]chūnqiū春季和秋季,……。”“[下水]xià//shuǐ①进入水中:……。[下水]xiàshuǐ向下流航行的:~船。”还有“[下水]

xià · shuǐ食用的牲畜的内脏,……。”

《现代汉语词典》单字注音大小写不同的,标了1、2等,像“苏³(蘇)Sū”。复音条目,注音大小写不同的,没有标1、2等,像“[春秋]Chūnqiū”,两者的处理不同。这类情况,还是一致起来为好。

《中华大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这种编排上的尝试,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应该继续下去,逐渐完善起来。肯定这种编排,是就编排的方式说的,至于个别条目处理得是否妥当,那是另外的问题,这里就不讨论了。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共时的词典,它不溯源,这样编排,困难是很多的,又是草创,白手起家,不妥之处一定是难免的。一些历史性的字词典,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对每个字词都要追本溯源,做这样的编排,条件要比《现代汉语词典》优越得多,成熟得多。如果这些字词典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一定会取得较大的成就,使新出版的字典有个新的面貌。

编写现代汉语字典词典,不探索词源,进行以上的区分,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要做,还是能做的,可以从一些明显的方面入手。

一、从读音方面来区分。有些字词在普通话里几个意义虽然是一个音,但在方言和古汉语里音是不同的。比如“断”,“决断”、“断绝”的“断”,在普通话里读音是相同的,但在某些方言里,“决断”的“断”读阴去,“断绝”的“断”读阳上。“易”在普通话里读去声,但在某些方言里,“难易”的“易”读去声,“交易”的“易”读入声。这些跟古汉语也是一致的。

二、从字形方面来区分。有些字词现在虽然写法相同了,但在过去是不同的字。比如“胄”(zhòu)和“胄”,现在有些字典词典只收一个“胄”字了,但过去的字典词典里是“胄”、“胄”两收的,“甲胄”用“胄”,“贵胄”用“胄”。有的字典词典怕用混了,还

特别加上“冑≠冑”、“冑≠冑”。“沉淀”、“湖淀”的“淀”，现在都用“淀”了，过去“沉淀”用“沉澱”，不用“沉淀”。这种字形上的区别，也体现了意义的差异。三、从异体字方面进行区分。有些字词有几个意义，部分意义还可以写作另外的字，部分意义不能用这个字。比如“注释”的“注”，过去也可以写作“註”，但“灌注”的“注”，不能写作“註”。在古汉语里“注”、“註”音也不同，“注”是章母，“註”是知母。“合并”、“并且”现在都用“并”，过去“合并”可以写作“合併”，但不写作“合並”，“并且”可以写作“並且”，但不写作“併且”。“并”、“並”在某些方言里音也不同，“并”是阴去，“並”是阳上，在古汉语里也是这样。四、从意义的联属方面进行区分。有些字词的几个意义，明显地没有联系。比如“驳”的“反驳”、“斑驳”、“驳船”的意义，彼此之间，看不出有什么联系。“然烧”的“然”，跟“然而”、“虽然”的“然”的意思，“胡须”的“胡”，跟“胡闹”、“胡说”的“胡”的意思，也都没有联系。为了表示意义的区别，“然”、“胡”都又产生了另外的字形。五、从来历方面来区分。编写现代汉语字典词典虽然不溯源，但有些词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来历不同。比如“元旦”的“旦”、“旦角”的“旦”跟“纤度单位”的“旦”；“巴不得”的“巴”、“巴蜀”的“巴”跟“气压压强单位”的“巴”，后者是音译词，来历显然是不同的。根据这些明显的区别，以上的例子，都可以分立条目。

一、五两点，区分的标准明确，比较好掌握。二、三、四三点，只就一方面的区别来断定，可能不把稳，但再结合其他方面的区别，也不难确定下来。前边举的例子，虽然只是放在了某一点下，但从别的方面都还可以找出分立条目的依据。区分的方法，上面分了几方面，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分立条目时，自应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考虑。尤其是碰到难定断的条目，更应如此。

个别实在难以分析清楚的条目,还可以利用语义学方面的一些分析意义的方法。比如把一个词语的每个义项,分成若干义素,进行比较。其中义素相同的越多的义项,关系越紧,义素相同的越少的,关系越远。没有相同义素的义项,可认为义项就没有关系了,可看做是意义不相联属的,分列条目。

过去的字书或一般书籍的注释,凡是字形相同的,尽量把不同的意义拉上关系,有的十分勉强。现在编写字词典,要从语言出发,从语言里已看不出有机的联系的,还是分开为好。上边举的“注”,“灌注”与“注释”的意义,根据旧的注释,也可以拉在一起,但今天看起来,两者的关系比较远了。再者,“注释”的“注”,过去还可以写作“註”。因此,分开立条比较好。

还有一些专名义,凡是跟一般意义一脉相承的,不必强行分开。比如“江”、“河”、“长江”、“黄河”的意义,不必跟“泛指江河”的意义,分开列条。有些专名义跟一般意义,看不出联系的,分列条目比较好。比如“周代”的“周”,跟“周到”的“周”,“晋国”的“晋”,跟“晋升”的“晋”,现在看不出什么联系,可以分开列条。

这里谈的几个方面,是举例性质的。如果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根据字词典编写的要求,还能找出更多的区分办法。

上边谈的分列条目的情况,是就《现代汉语词典》说的,别的字词典可以根据本书的特点,确定分列条目的原则。比如:有的主张词性不同的,也要分列条目,这当然是可以的。只是目前编写汉语词典,是否要这样做,须认真考虑。

我们多年来编写字词典都是以字为本位,从字出发。一个字一个词的不同写法,字词典里都当做不同的条目收录,但写法虽然相同,却是不同的字词的,一般字词典里不分开收录。现在有些字

词典比过去改进了一些,音不同的,在同一条目下明显地区别开来。像《国音字典》、新《辞源》、新《辞海》等,形同音不同的,用⊖
⊖等表示出来,另行排列。这虽然比过去有所改进,但从今天的要求来说,还是不够的。

形同而音义不同的字词,不是一个词,应该在字词典里分开列条。关于这个问题,远的不说,就举几个现在大家熟悉的字词来看看,问题就清楚了。比如“一斗米”的“斗”和“奋斗(鬥)”的“斗(鬥)”,“干(乾)湿”的“干(乾)”和“干(幹)部”的“干(幹)”,“拉纤(縴)”的“纤(縴)”和“纤(纖維)维”的“纤(纖維)”,“叶韵”的“叶”和“树叶(葉)”的“叶(葉)”,“喘吁吁”的“吁”和“呼吁(籲)”的“吁(籲)”,“一只(隻)鸡”的“只(隻)”和“只要”的“只”等,这些都是不同音义的不同的词(或词素),前不久还写作不同的字形,字词典里作为不同的条目收录。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个人要把它们作为一条处理,因为是不同的字词。现在写作相同的字形了,有的字词典里就作为一个条目收录了。这些并不能因为字形相同就成了同一个词(或词素),而仍然是不同的词(或词素)。正如张三、李四是两个人,不能因为张三也改名叫李四,两个人就成了一个人了,仍然是两个人,只不过同名罢了。为了免得发生误解,字词典里更应该把这些字词区别清楚,分开列条。其他同类情形,都应这样处理。

关于音形都同而是不同的字词的,同样应该分开列条的问题,也举几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来看看。“子丑寅卯”的“丑”和“丑(醜)陋”的“丑(醜)”,“更迭”的“迭”和“重迭(叠)”的“迭(叠)”,“干戈”的“干”和“干(乾)湿”的“干(乾)”,“山谷”的“谷”和“五谷(穀)”的“谷(穀)”,“脸面”的“面”和“面(麵)粉”的“面(麵)”,“曲折”的

“曲”和“酒曲(麴)”的“曲(麴)”等,这些都是不同的词(或词素),前不久都写作不同的字,字词典里无例外地都列为不同的条目。这样处理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它们代表的是语言里不同意义的单位,彼此间没有内在的联系。现在写法相同了,有的字词典里就列为一个条目。这是不合适的,字形相同,只是外表一样,它们的实质仍然是不同的。这就如同把烟、茶用同样的包装包起来,烟还是烟,茶仍是茶,烟、茶不会因为包装相同就成为一样的东西。因此,形音虽相同而意义无关联的词(或词素),应该分开列条。

有些字词典里把现在用的“尘”和“塵”,“独”和“獨”,“场”和“場”,“奋”和“奮”,“汉”和“漢”,“鸡”和“鷄”,“猪”和“豬”,“猫”和“貓”,“爭”和“争”,“换”和“換”等,作为一条处理,这是合适的。因为这些不同的字形,在现代汉语里不是代表不同的词(或词素),而是代表相同的词(或词素),应该作为一个条目。按字形排列的字词典,为了备查,把每组后边的字也列为条目,当然也无不可。不过应该把它们从属关系表示清楚,切莫使查字词典的人发生误解,认为是不同的词(或词素)。

过去编写的字词典,从字出发,不管语言,在这两方面恰好是颠倒过来了,把不必分列条目的不同字形,却列为独立的条目,把应该分列条目的不同的词(或词素),却列为一个条目。今后编写的字词典,要扭转这种状况。

二

过去的字词典,形同音不同的字都笼统地放在一起,词典里的复音条目,没有区别的按一定次序统一排列在单字后边。新的《辞

源》、《辞海》进行了一些改革,形同音不同的字,用⊖ ⊖等把不同的音区别开来,另行排列。后边附的复音条目,第一字音不同的,用标志加以区别。属于⊖音的,不加标志,属于⊖音、⊖音……的,就分别标上2、3等,或者注出⊖ ⊖等的音。比如:“长”,有cháng, zhǎng, zhàng 等不同的音义,就用⊖ ⊖ ⊖区别开,⊖ cháng……。⊖ zhǎng……。⊖ zhàng……。下边的复音条目,第一个字读 cháng 的,不加标志,读 zhǎng 的,在第一个字后标2,或注出(zhǎng)音,读 zhàng 的,在第一个字后标3,或注出(zhàng)音。

按音序排列的字词典,形同音不同的字,自然就分别排列了,成了不同的条目。词典里所收的复音条目,就按照第一个字或末一个字的读音的不同,分成了不同的词群,附在了相应的音下。一般按音序排列的词典,都做到了这一步。但这对像《现代汉语词典》之类的词典来说是不够的,因为《现代汉语词典》里形音都同而意义不相联属的字词,也是分列条目的,这样的单字后边所附的复音条目,也应该按照单字的区分,分成不同的词群,附在单字的相应的条目下,像形同音不同的单字的复音条目的处理一样。这样才符合全书分列条目的精神。现在印行的《现代汉语词典》没有做到这一点。第一个字音形相同的一群复音条目,不管单字分列条目与否,一律按音序排列在单字后边,跟一般的音序词典一样。

复音条目的编排,上边说的是一种办法,只要符合分列条目的精神,采取别的方式,也无不可。比如:统一排列,单字分X¹、X²……列条的,先把单字按照1、2……的顺序排列在一起,所附的复音条目,统一按音序排列在单字后边,每个复音条目的第一个字右上方标上相应的单字的号码,无所隶属的条目标“。”,暂时分不清

楚的条目先不标号码。这种处理方式,跟按形排列的词典,对第一个字不同音的复音条目的处理相仿,检查起来也有它的方便之处。

现在语文词典的复音条目,大都是采用“混合编队”的办法,上边谈的是按音排列的,还有按形排列的,像《新华词典》、《汉语小词典》、《辞源》、《辞海》等。先把复音条目按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的顺序排列;字数相同的,第二个字笔画数少的在前,多的在后。还有的不管字数多少,都按第二个字的笔画数排列,少的在前,第二个字相同的,看第三个字,等等。复音条目“混合编队”的办法,虽然排列、检查比较简便,但从条目编排来说,不够科学,把许多有关联的条目都分隔开了,增加了互相照应的麻烦。用单字统属复音条目,本来是为了顾及字词的家族系统,“混合编队”又把它们谱系打乱了。

语文性词典根据词的联属分列条目,不论是从编写来说,还是从使用来说,都是有益的。从编写说,单字和所附的复音条目,绝大多数意义上是有关联的,编排在一起,成为一组,便于参照比较,可以更好地安排各个词语的注释和例句。容易做到注释一致,繁简适当,互相照应,例句不雷同,用法齐备。从使用说,可以明了这些词语的相互关系,加深对词语意义的理解,甚至可以查一知三,触类旁通,多知道一些有关的词语。

三

《新华字典》虽然是一本小字典,但编写时从语言出发,把复音单纯词当做独立的条目,跟字头一样看待。复音单纯词中表音的字,不作为正式字头,只是为了备查,加标志放在字典里,使查字典

的人知道,这些字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复音单纯词中表音的字。《新华字典》的这种编排方式,是汉语字典编写上的一个进步。这里说的是《新华字典》早先的样子,现在印行的本子,这些已经没有了。

过去的字词典以字为本位,把复音单纯词列在单字下,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编写词典从词出发,把复音单纯词编排在跟它没有关系的单字下是不合适的。旧的字词典为了把单字跟复音单纯词强拉在一起,牵强附会,做了许多错误的注释,贻误读者。今天新编的词典,应该从语言出发,清除这些旧的影响,使读者有个正确的认识。把复音单纯词放在单字下,加上过去错误解释的影响,使读者容易发生望文生义的误解,错误地认为复音单纯词是几个词素构成的,意义跟各个单字有关。复音单纯词单独列条,可以直观地告诉读者,这个词跟单字的意义没有关系,不要从单字来理解词的意义。

现在的字词典大都是先列“枇、玻、琉、玛、吗、啤”等单字,下面再列“枇杷、玻璃、玛瑙、吗啡、啤叽”等,这实在是多绕圈子,而且又没有意义。不如直接地把“枇杷”等列条,由“枇杷”等领头构成的词语,附在“枇杷”等后面。像“玻璃”,后面附“玻璃肥料、玻璃粉、玻璃钢、玻璃丝、玻璃体、玻璃纤维、玻璃砖”等。

四

《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初稿)》中曾规定,词(包括单音词和复音词)和词素(加方框表明),一样对待,用同样大小的字排印,都另行顶格排列。词组、成语等,附在相关的词或词素后,退后一

格排列。词组、成语等可以按第一个词排在相同的词或词素下,也可以按重点词排在相同的词或词素下。这样编排,可以突出以词为主的精神,打破以字为主的习惯。词典嘛,顾名思义,应当以词为主。但现在的一般语文词典的条目编排,仍是以字为主,显示不出词在词典里的地位,有些词典,甚至连哪些是词都看不出来。这实在和词典的名称不相称,也跟语文教学树立词的概念不合拍。现在编写的语文词典应该配合语文教学树立词的概念,打破旧的以字为本位的传统。新编的语文词典,如果对上面提出的问题,做一些尝试,就会给词典带来新的面貌。

字典词典编排方面的问题,并不只这么几个,也并不是只有这么几方面值得尝试。这里只是举几个问题做例子来谈谈,开个头儿,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一齐来改变字典词典编排的落后状况。

这些编排问题,看来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字典词典编写的科学体系问题,是要贯彻词典以词为主,改变以字为主的传统观念。

我们编写字典词典这么多年了,在编排上改进很少。有的字典词典就是稍有改进,也并不能为大家所采用,这说明了传统势力是相当大的。

字典词典编排上改进的障碍,主要来自我们编写者,认为作用不大,麻烦不少。麻烦嘛,当然是有的,有的甚至会花相当多的力气,而且还可能出错误,闹笑话。如果照旧的办法,当然省事,也不会出漏子。但这样,我们怎么能前进,为了前进一步,花一些力气是值得的。新的《辞源》、《辞海》,单字有几个音的,下面附的复音条目,第一个字应该读什么音明白地表示了出来。几十个编者花了一些力气,就省了千百万读者的许多精力,而且使读者掌握了正确的念法。如果仍照老的《辞源》、《辞海》的样子,读者就得自己去揣

摩,花了精力而未必能掌握正确的念法。应该算一算这笔账,编者花了一些精力,给读者节省了多少精力?带来了多少好处呢?两者相差太悬殊了,简直不成比例。因此,这种工作的改进,纵使麻烦,也是值得做的。当然,现在没有条件做的,需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不能急于求成。

这些改进,对每部字词典来说,都是新的尝试,经验不足,出现一些纰漏是难免的。纵使经过广大读者鉴定,认为这种办法不可行,需要推翻重来,也不足为怪。就是能行得通,也需要不断的改进才能完善起来,不可能一下子就十全十美。如果要求某些办法完美无缺了再进行,那实际上就会长期拖下去。

进行新的尝试时,常常顾虑到读者使用起来是否方便。这种考虑是应该的,但不要把编者的顾虑就当成读者的意见。往往有些改进,读者并不一定感到不方便,倒是编者感到不习惯。因为字词典编写者对旧的办法已经熟悉了,稍有改变,就感到不顺手,也就认为读者使用起来不方便。其实,读者对旧的一般不大熟悉,新的旧的都要学习,习惯了,也就不觉着不方便了。前面提到的字词典的一些改进,分得比过去细密了,读者乍一接触,可能会感到不习惯。但这种细密,符合科学的发展,读者是会适应的。

对字词典编排的改进,会多占一些篇幅,有时考虑到节省篇幅,就不愿意进行改革。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节约篇幅,但为了字词典编排的科学性,多占一点儿篇幅是值得的。我们现在的字词典,版面利用得不充分,节约篇幅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现代汉语词典》的编排*

宋惠德

—

字典词典的编排,是指按一定的规则把所收录的条目排列起来,形成一个系统。科学的编排能使每个条目都有合理的次第、位置,保证字典词典的质量,方便读者的查检,我国辞书编写有悠久的历史,也按照汉字的特点创造出了各种编排方法,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字典、词典。

一个汉字一般都有形、音、义三个要素,汉语字典词典编排法也不外形序、音序、义序三大类型。各种类型又可分成几种编排法。这些编排法各有长处和用途,但也有不足之处。

(一)形序编排。这是按汉字形体结构排列汉字的方法。当人们阅读中碰到生字、生词,需要了解字的音、义时,适合于查检按形编排的字典、词典。这一类编排法使用较广泛。它又分为四种编排形式。(1)按部首(兼笔画)。如《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2)按笔画(兼部首)。专科词典用这种方法编排的最多,如《中国医学大词典》《简明哲学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词典》《新知识词典》《简明吴方言词典》等。(3)按笔顺。用这种方法编排的字典、词典比较少,如《大众词林》等。这种编排如果按起笔,顺手自然,但对一些字的起笔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分歧较大;如果按末笔,很不顺手,又很费事,所以这种编排形式很少被采用。(4)按号码。如《四角号码词典》《四角号码新词典》等。

(二)按音序编排。这是按字音排列汉字的方法,适合于人们知道读音而查检字形字义的要求。它又可分为两种编排形式。(1)按韵编排。如《广韵》《集韵》《中华新韵》等。(2)按字母(声母)编排。这类排列又分用注音字母编排,如《国语辞典》等;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编排,如《现代汉语词典》等。

(三)按义序编排。这是按字或词的意义分类编排的方法。适合于读者查检与某条同义或同类的条目。它又分为两种编排形式。(1)条目按义分类编排。(2)条目按义集中一个有代表性的词领头,再按音序排列。按义编排的字典、词典大部分用前一种编排方法,如最早的《尔雅》,后来的《分类词源》,近年的《教师百科辞典》《工具书大辞典》等。

以上这许多种编排法,都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部首编排法存在部首不统一,归部原则不一致的问题。笔画编排法存在笔画规范问题。笔顺编排法存在笔顺不统一问题。音序编排法,当读不出字音或读音不准确时无法查检。义序编排法带有较多主观色彩,难以定出人们公认的义类。随着辞书工作的研究发展,这几种排列方法一定也会不断地完善。

二

中国幅员广大,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八大方言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在民族多、方言丰富的中国推广普通话任务相当艰巨。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之前出版的字典、词典大多采用部首、笔画、注音字母等这些方式进行编排。《现代汉语词典》是1956年国务院责成语言所进行编写的,它的任务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批准推行,它是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因此,《现代汉语词典》采用了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顺序编排的方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顺序编排的词典。这部词典从1956年着手编写到1978年正式出版前后有三稿,试印本、试用本、1978年版本。试印本的编排方法是单字条目按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顺序排列,每个字母中再分音节,例如F母:fa fan fang fei fen feng fiao fo fou fu。每音节中按四声排,例如fa: fā fá fǎ fà·fa。同声同调的字按笔画多少排,笔画少的在前,笔画多的在后,例如:乏 fá 伐 fá 伐 fá 筏 fá 闕 fá 罰 fá。笔画数相同时,按起笔“丶丨丿一”的顺序排列,第一笔相同,再依第二笔的笔形次序,余类推,例如矾 fán、钒 fán 这两个字在同声调中同是8画字,“矾”是“一”起笔,所以排在前,“钒”是“丿”起笔,所以排在后。单字条目下的多字条目不止一条的,依第二字的拼音字母次序排列,同声同调的字按笔画多少排,同笔画的字则按“丶丨丿一”的起笔顺序排列,第一笔相同,再按第二

笔,余类推,例如凡 fán 字头下的多字条排列

- [凡尔] fán'ěr
 [凡尔丁] fán'ěrdīng
 [凡例] fánlì
 [凡人] fánrén
 [凡士林] fánshìlín
 [凡事] fánshì
 [凡是] fánshì
 [凡庸] fányōng。

其中[凡事][凡是]音相同“事”是8画排在前,“是”是9画排在后。轻声排在同形的非轻声字后面,例如“家”·jia排在“家”jiā的后面,“地道”dì·dao排在“地道”dìdào的后面;没有同形的非轻声词,视作虚位,仍排在这里,例如“活动”huó·dong排在“活地狱”和“活动分子”之间;没有同形的非轻声字,排在去声音节之后,例如“了”·le“着”·zhe。用上述方法排列的词典,可以使使用词典的人对词的概念有较深刻的认识;熟习汉语拼音方案的体系;能加速语音的规范,利于普通话的推广。

1973年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编排方法基本上与试印本相同。大字头编排的变化主要有两点:(1)试印本把现代词汇用不着的生僻字编入部首检字表里,并有注音和简单释义,正文中不收录,例如亻部“侗”tuō寄托。忄部“怛”dá悲伤;惊惧。女部“姝”shū美丽。月部“腊”xī干肉。试用本把这些生僻字作为条目收录到正文中,对这些字正文中有的加〈书〉表示书面词语的用字,有的用⊗符号表示现代汉语不常用的字,例如t母“侗”tuō⊗委托;寄托。d母“怛”dá〈书〉忧伤;悲苦。s母“姝”shū〈书〉①美好。

②美女。x母“腊”xī凶干肉。(2)试印本多音单词可作领头字,如蝴蝶、螳螂,试用本一律用单字出大字头,不以多音单词作字头。

197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版本在编排上进行了一些改动,总的编排没动,还是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分音节,音节中按四声排列,单字条目下的多字条目的编排也没改动。但同声同调的大字头顺序有所改动,改动原则是按音一排到底,同声同调的大字头不按笔画多少排列,而是按字的声旁排列,具体的编排方法(1)同声同调的字头按声旁归类,不同的声旁字之间按声旁的“、一丨丿一”起笔顺序排列,第一笔相同,按第二笔,余类推,例如gān中有声旁的字的声旁有两个“干、甘”,从起笔顺序看“干”声旁的一组字应排在“甘”声旁一组字前。(2)同声旁的一组字,按形旁的起笔顺序“、一丨丿一”排列,第一笔相同,按第二笔,余类推,例如“干”声旁一组字排列顺序是:杆、玕、杆、酩、研、竿、肝。(3)没有同声旁的单字,按此单字的起笔与有同声旁字的声旁起笔按“、一丨丿一”顺序排列,例如“尴”排在“干、甘”这两组声旁后。举例可以看出试印、试用本与1978年版本在单字排列上的改变。

bèi(试用本):孛 邶 贝 备 背 悖 被 倍 狈
椳 焙 蓓 倍 碚 褫 辈 钹 燻 惫 鞅 鞞 璧

bèi(1978年版本):焙 倍 碚 蓓 孛 悖 鞞
鞅 惫 辈 背 褫 邶 贝 椳 钹 狈 被 鞅 璧

用这种方法编排的词典,可以让人们了解各种同声旁的字在同一声调中有多少。另外这一版本《现代汉语词典》书眉标上了字头,同声旁的字排在一起放到书眉上显得整齐。这种排列方法也有不足之处:形声字的形和声组合很复杂,没有一定的位置,如“蚊”字声旁在右,“期”字声旁在左,“盲”字声旁在上,“草”字声旁在下,

“闻”字声旁在外，“固”字声旁在内。“落”字形声套形声，因此在声旁的取舍上就很困难；从现代汉字的实际看，有些形声字声旁已不能准确地表示字的读音，如“法、错”等；汉字的简化字也改变了形声字的声旁，使形声字用声旁表示字的读音能力减弱，如“聖”简化成“圣”就没有明显的声旁了，“勝”简化成“胜”声旁改变了。另外简化后的“汉、仅、叹、邓、欢、戏”等字，声旁都是用“又”代替，这些字读音各异，“又”表示不了这些字的读音，所以简化后的单字，用声旁归类进行排列很不好办；《现代汉语词典》收单字不多，有的音节同声同调的字很少，所以排列时就不能自圆其说。由于存在上述问题，所以编排上存在着一些字所放的位置不当。现在正在编写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对这样一些问题在编排时会做适当的改变，使其编排更合理，更科学。

三

为了给还没有掌握普通话标准音和拼音字母拼音的读者提供查检的方便，《现代汉语词典》附有非音序排列的检字表。

《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部首检字表部首分为 197 部，并且在部首检字表中收录了三千多个现代汉语词汇不常用的生僻字，字下注出读音，并简要的进行释义。

《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除了部首检字表外，又增加一个四角号码检字表。部首检字表也与试印本的有所不同，这个部首检字表基本上与《辞海》的部首编排法相同，部首分为 250 个，对传统的 214 部进行了调整。其特点是依据字形定部、确定部首位置，一个字具有几个部首的，依照一定次序确定部首，试图弥补传统部首编

排的某些缺点。但由于部首数目较多,一些字的归部与传统归部差别较大。此种检字法推行不广。试用本部首检字表在部首外又另有余类,排在最后,部首无从采取或所在位置不合规定的查余类。

《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版本的部首检字表又不同于试印、试用本,这个部首检字表与《新华字典》一致,对传统的214部进行了调整改进,改为189部。在部首检字表后另附有《难检字笔画索引》备查。部首查字法是大多数群众易于接受的一种查字法,小学生从上小学开始就学习用部首查字的方法。中国幅员广大,民族多,方言多,普通话虽然进行了推广普及,但还有一部分人不能完全掌握普通话标准音,附上部首检字表为这一部分人查字提供方便。在部首检字表中,我们还采取将一个字分收在几个部首内的办法,有人称之为“多开门”,它对查检含有不同部首而难以确定归部的字比较方便,例如“差”“工、羊”部,“東”“一、木”部,“蟲”“虫、皿”部,“累”“田、系”部,“𠂔”“一、尸”部,“兄”“口、儿”部。但一字多部也为汉字教学中分析汉字归部问题带来一定的麻烦。

《现代汉语词典》附的四角号码检字表,采用了新《四角号码查字法》,并附上了《新旧四角号码对照表》,这样人们可以对新旧四角号码的差异有一个了解;字形照《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规定为准。这种查字法目前用的已不普遍,但有一部分人还喜欢用。汉字本身没有号码,号码是人为加上的,所以使用的人就要记号码,记住后也很容易忘。这种查字的另一个困难问题笔形不易划分,划分不清笔形,号码就不容易标上,这样查字就困难,所以这种查字法难以掌握。为了提供查字方便对一些有争议的字采取了一字分收在几个号内的多开门办法,例如“马”字第一角取“1”还是取

“7”的问题,这样有“马”字的偏旁字就放在了两个号内,例如“马”1712₇、7712₇“驱”1111₄、7111₄“驯”1210₈、7210₈“驴”1310₇、7310₇“骑”1412₁、7412₁“驶”1510₆、7510₆“驹”1712₀、7712₀“骈”1814₁、7814₁。

《现代汉语词典》附两个检字表是为人们查检提供方便,因不是编排在词典的正文中,所以部首检字表和四角号码检字表都采用了“多开门”的办法,这种办法优点是查检方便,缺点是给汉字的归部和编号造成一定的混乱,这种办法是否可取,还可商讨。

字典、词典的编排看起来是个形式问题,但一部辞书内容再好,如果编排上不利读者查检,这部辞书也不会受读者欢迎,可是编排问题一向很少为人注意,多年来在辞书编排上比较墨守成规,虽然有些改进,但改进很少。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语言文字的发展,字典、词典的编排也会有所创新,使其更具科学性、让读者使用更方便。

要充分利用词典的版面*

刘庆隆

因为工作的关系,多年来经常翻阅各种字典词典,时常感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出版的字典词典,对纸张的利用不够精打细算,版式的设计,不能充分利用版面。版面上空白很多,不仅浪费了纸张,而且也不美观。旧的字书韵书,在编排上虽然不够醒目,但对版面却是充分利用的。对编排上不醒目的毛病,我们要加以改进,但充分利用版面的长处,还是可以借鉴的。国外出版的一些词典,版面上空白很多的固然也有,但一般的还是编排得比较紧凑的,版面的利用也比较好。

我们出版的字典词典在版式设计上考虑一下,编写者在编排上改进一下,就会省出好多纸张。新修订的《辞海》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比如一个部首里的笔画数目,不单独占行,把笔画数目用阿拉伯数字标在单字旁边,这一项就可以少占几千行,十六开本可以省几十页纸。这样做,不但不会影响读者检查,而且还方便了读者。因为在正文里列笔画数目只列在一处,没翻到这一页就看不见,用阿拉伯数字的办法,每页开头的单字都可以标上,不论翻到哪一页,都可以一望而知。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3年第2期。

另外一部规模相仿的词典,没有在这些方面多考虑,就多用了不少纸。这部词典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没有注意节约篇幅。一、部首通栏排,占五行,这一项就占三千多行。如果部首排一栏,占三行,就可以省出两千四百多行。《新华字典》等,字母只排一栏,占三行,《现代汉语词典》等,字母排通栏,占五行。字母只有二十三个,或者还可以,部首有二百多个,就不能不算账了。二、一个笔画数目占两行,估计要占四千行(没有详细数),照《辞海》办,这四千行就可以全部省掉。就是列笔画数目,也不必这么呆板,有的只有一个字也列一个笔画。字数少的,可以几个笔画数目列在一起,不会影响检查,这是有先例的。三、单字每个注音占两行,如:

制 zhì 征例切,去,祭韵,照。
 \`
 虫

刷 shuā 数刮切,入,辖韵,山。
 尸乂丫所劣切,入,薛韵,山。

像“刷”的情形可以占两行,但这样的很少,不过占百分之几,绝大多数是像“制”的情形。这样,每个注音下就空一行,词典收一万多字,有的字不止一个音,估计这一项要空一万四五千行。四、还有可压缩的字句,见后边的“内丘”例。第四项姑且不算,仅前三项就要多排一百三四十页。顺便说句题外的话,注音的排列,不大合乎一般阅读的习惯。这样排,照一般的阅读习惯,是:“zhì→征例切,去,祭韵,照。→虫”。编者的意思恐怕是:“zhì→虫→征例切,去,祭韵,照。”这样,既多占了行数,而且又容易引起误解,还不如一行直接排下来好。

《现代汉语词典》1973年本,音节标题占两行,可以回行的地方回了行,一两个字占一行的尽量压缩,排得还比较紧凑。1978

年本,音节标题占三行,可以回行的地方没有回行。再加上由于1973年本每行19字,1978年本每行17字,过去正好排一行的,这次就得多排一行,这样就多占了不少篇幅。统计了一下1978年本的30—39页,如照1973年本处理,每页可省出6行,全书可省出9240行,约少排一百页。

《现汉》是每条都注音的,从注音这部分看,像拼音文字的词典。拼音文字的词典,一般不另加音节标题,检查起来不感到有什么不方便。我查《国语词典》,从不去找音节标题,只是看正文条目的注音。如果翻查《现汉》的人也都是这样,那么音节标题是不必要的,可以省去。或者不分声调,像《新华字典》一样,列一个不标声调的音节标题。从道理上讲,这样处理不大合适。但如果把这个只看做是个指示符号,倒也无可厚非。这样,就又可省出两千来行。加上检字表改排7栏(1980年重排本已经这样排了,可以少排二十来页),《现汉》可以少排一百五十来页。基本形式没有变,而纸张省了近十分之一。如果利用这些纸张再增加一些条目,估计可以增加五千条。不增加读者经济负担,而可以增加这么多条目,这对读者该有多么大的好处。如果不增加内容,用纸减少了,估计可以减少书价四角。假定《现汉》能发行到五百万册,就可以减少读者二百万元的负担,或为国家多二百万元的积累,这是多么可观的数字呀!

不但词典存在这个问题,字典也有类似的情况。像《新华字典》“ㄑㄩㄢˋ 卷 quàn ㄑㄩㄢˋ 见 366 页‘ㄑㄩㄢˋ’字条‘ㄑㄩㄢˋ’(qiǎnquǎn)。”占三行。这类见条完全可以压缩在两行以内,不会影响读者检查,而可以省出一行来。如果照《新华字典》部首本的办法,这样的见条,字头用小字排,有的只占一行就够了。字典里每页也都有一两个字

占一行的,这些有的可以回行,有的可以压缩。这样就能省出一些篇幅来。

当然一本小字典,不会像一部词典一样,能省出那么多的纸张,但省纸的比例还是不小的。我统计过一本小字典,版式照旧,只减少空行和占一两个字的行数,就可以省出七八十页来。这本小字典,除按声调分别列出音节标题外,还在前面列一个不标声调的音节标题,如“ba bā bá……”。单个音节标题占三行,两个音节标题连在一起的,像“ba bā”,共占五行。前边不标声调的音节标题是不必要的,也是没有道理的,可以全部去掉。音节标题可以占两行,不必占三行,32开本占两行都不挤,64开本占两行就更不会显着挤了。这本小字典有的另见音前空一行,像“盟⊖发(誓)。
〈例〉盟个誓。⊖méng(354页)”,“盟”的注释跟下边的另见音之间空一行,这里的空行是不必要的。这本小字典每页都有一两个字占一行的,有的可以回行,有的可以压缩。按照上边说的三项,以248—293页为例,平均每页可省出6.4行,正文716页,共可省出4582行。这本小字典还有少量插图,有的占的版面太多,像“笙”的图、“女陶俑”的图占一页的四分之一,“刨”下的图占了半页,这些都可以缩小些,既可省篇幅,又比较协调。这样,这本小字典可以省出十分之一的篇幅。

现在的字典词典里还有一些情况,也造成了空行。比如单字、音节标题或笔画数目。因为单字占两行,音节标题或笔画数目一般占两行或者更多,如果这一栏只剩了一行,碰到单字等就排不下了,需要排到下栏,这上一栏就空了一行。如果单字前面还有音节标题或笔画数目,就得有四行(或五行)才能接排,不够这么多行,就得排在下栏,这上一栏就会空一到三行(或四行)。这类情形,每

本字、词典里都有。

我对于版式设计是门外汉,说的可能都是外行话。但我总感到我们出版的字典词典,在充分利用版面上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比如单字不占两行,收的字多的字典词典就可以少空很多行。因为有不少生字,注释是比较简单的,只有一行就够了。现在单字占两行,就得空一行。再比如举例前边不写“例”字,例中用“~”代替本条目,都是节省篇幅的办法。集思广益,大家重视起来,一定能找出很多节省篇幅的办法。

充分利用词典版面,节约纸张,不只是出版者大有用武之地,词典编写者也是大有可为的。过去,一般不大注意。如果在这方面稍稍留点意,压去注例中的水分,减去不必要的字句,就能节省很多篇幅。比如“内丘”的注释,多一个字,就得多排一行。如果把最后一句“清因避孔丘名,丘字加邑旁作‘邱’”。改作“清因避孔丘名,丘改作‘邱’”就可以排下了,省去一行。这种情况是颇不乏例的。这些不过是小焉者也,那些水分很大的注释中,油水就更大了。如果我们把节约篇幅当做一件事来做,一定会对节省纸张减轻读者负担做出不小的贡献。

关于资料*

李国炎

一

诸桥辙次先生在《汉和大词典》序言中谈到,他连续三十余年从事编辑该词典的工作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以搜集资料为主,后一时期以整理资料为主。这是诸桥辙次先生编纂《汉和大词典》的工作经验总结,它向我们说明资料在整个词典工作中是何等的重要!

资料,是编纂词典的依据,是基础。历来为词典编纂者所重视。要编出一本高水平的词典,没有扎实的资料工作,是不行的。以“依史则”著称于世的英国《牛津新英语大词典》从 1858 至 1880 年,做了近二十三年的资料搜集工作,搜集人员从八百人增加到一千二百人,共制资料卡片三百五十余万张。苏联《俄罗斯文学语言词典》的资料工作开始于 19 世纪。1886 年起,每年从五十到六十部多种体裁的著作中摘抄词语卡片五至七万张,现已积累七百多万张。这些资料既是编写与增订十七卷本《俄罗斯文学语言词典》和其他多种语文词典的依据,也是广大俄语学者研究俄语的重要依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1 年第 3 期,署名李实。

据。目前,许多国家已利用电子计算机大量采集和储存语言资料。如法国《法兰西宝典》采取资料数为3800点。该词典用例总数为一亿左右,那么它采集的资料数肯定在一亿个以上。我国解放前计划编写的《中国大辞典》和《中山大词典》都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前者做了二百五十多万张资料卡片,后者共做了七百四十余万张(包括剪贴各种字书、类书、百科全书的资料在内)。

解放后我国第一部中型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在编写工作开始前,以一年多时间,集中力量从“五四”以来的重要著作和报刊中勾乙并制做了约一百万张资料卡片,为《现汉》的编纂,打下了基础。

二

资料,分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前者是直接 from 书籍报刊中勾乙的词语和例句,是编制词目、分析词义的依据,又是例句的主要来源,是资料中的重点;后者是指已有的辞书和其它有关语言词汇研究的成果。

收集资料要求“宁滥勿缺”,以便编写时精选。《现汉》收词五万三千多个,只占搜集的资料词目的四分之一,其余十六万个词目用作储备,需要时加以利用。很有“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的情形。有些词语,暂时虽还不规范,或是生造的,也要把它搜集起来,也许由于使用的人多了,有可能进入语词领域。总之,词典要广收资料,要从量中求质。只有具备了丰富的高质量的资料,词典才能根深叶茂,枝叶常青!

勾乙资料的工作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不被文章的内容吸引

而走神。勾乙资料是要读书的,但不是为了它的内容,而是为了它的语言,要一句一句地读,要做到“目无全牛”。不论是勾乙一篇文章还是一本书,最好是“毕其功于一役”,保质保量一次完成,不要有返工,否则会造成时间和人力的很大浪费。勾乙工作进行一个时期之后,可以停下来做做编写工作,或是抄写工作。这样做,可以发现自己的勾乙工作中的弊病,对提高勾乙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是大有好处的。为了节省编写人员查找、使用资料的时间,资料排列要科学,要经常进行整理,把重片、废片、冗片等清除出去,做到去芜存精。

三

资料是词典的根本。词典从编制词目到释义、举例等等,都离不开资料,没有资料,编写工作就会寸步难行。《现汉》收的五万三千多个词,是从约一百万张资料整理出的二十余万个词目中挑选出来的,没有这一百万张资料,《现汉》的词目就难以产生

有一种意见认为:词目是词典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义项、例句的收集,是以词目为先决条件的,因而不能离开词目去广积资料。按照这种意见,是词目决定资料。我们认为这正好把问题弄颠倒了,试问词目从何产生呢?如果听从上述意见,编制《现汉》词目的唯一办法只能是从现有的词书中去搜罗。这就会陈陈相因,阻碍词汇新陈代谢的作用,使词典丧失生命力。从事实看,现在收录现代汉语词语的只有《新华字典》、《同音字典》、《四角号码新词典》和《国语辞典》等,前几部是小字典,收的词很少,《国语辞典》(以下简称《国语》)收的词语虽比较多,但很大一部分是古汉语,现

代部分中又有好些是解放前的已经陈旧了的。这里我们做了个小统计。如“单”(dān)字下《现汉》收了七十三条,《国语》收了五十四条。《现汉》的七十三条中有四十五条是《国语》所没有的;《国语》五十四条词,只有二十八条收入了《现汉》,只占《现汉》收词的百分之三十八左右。再如“基”字,《现汉》收了三十六条,《国语》收了四十三条。《国语》的四十三条中只有十二条收入了《现汉》,只占《现汉》收词的三分之一。像《现汉》中收的“基层”、“基地”、“基干”、“基建”、“基因”等,是《国语》所没有的,而这些词都是现代汉语词典必不可缺少的。这些事实说明,利用二手材料,企图走捷径、编词典的办法是不可取的。

例句,是语文词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语文词典缺少例句是不可想象的。《现汉》的例句跟古汉语词典的要求有所不同。古汉语词典的例证,主要用来证明词义和词语的源流,一般要求引用原文,并要标明书名、篇名和作者名。《现汉》对例句的要求是:语意健康,语法规范,能帮助读者对词义的理解,在组词、造句等方面为读者提供范例,最好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为了减少篇幅,例句还要求尽量简短。这样,《现汉》的多数例句不是引用原文,而是在原文的基础上给以加工或改写。这就必须有语言资料做基础,它对资料的质与量的要求可能比古汉语词典更高些,因为没有大量的、实用的资料作为参考和依据,就写不出好的例句来。《现汉》中也有少数例句是临时现编的,但这类例句不宜过多,多了容易千篇一律。按照《现汉》上述要求来选择例句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有时找一个好的例句比起解释一个词的词义要困难得多。在语言中有些词从意义上看彼此没有多大区别,而在用法上却有所不同,不能互相代替。对这类词,编者很难在释文中说清楚,只好利用举例来

表明它们之间的差别。像这类的例句就更加难找了。

在举例这个问题上,有的编写人员不如像对待释义那样认真,随意增删例子,不管需要不需要,也不管恰当不恰当,随便给举个例子就算完事。例句,不是语文词典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而要根据词语本身以及读者的需要而决定取舍。例句与释义好比绿叶与红花,好的释义要有好的例句来衬托,好的例句对释义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要求得到好的例句,只有到资料中去发掘。

解释词义,给词语下定义,是语文词典的根本任务。尽管我们每一个人对语言中的大部分词语既能说又能听,但要简单扼要地说明某个词语的含义及其用法,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办到的,即使是善于运用语言文字的文学家也是如此。因此解释词义的任务落到了词典工作者的身上。词典工作者不是天生的词义解释家,唯一有利的条件是他们拥有供解释词义的资料。所以,离开了资料来解释词义是不可能的。《现汉》在释义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也有某些突破,如给词语下定义,解决同义互训等,多少做出了一点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资料。当然,《现汉》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释义不够准确,义项不够齐备,好些地方还存在着同义互训的问题。主观原因是编辑人员的编写水平有限,客观原因则是资料还不够丰富。

《现汉》拥有约一百万张资料卡片,看来数量不少,但具体地分析一下,不是多,而是少。一百万用二十万个词目一除,每个词平均只有五张卡片。《现汉》选收的五万三千多个词的资料是要多一些,但多也超不过平均每个词十张资料。实际上,第个词拥有的卡片数是很不均匀的,少的只有一张,多的几十张,甚至一百多张。

这一百万张卡片,如果把重片、废片、冗片,以及二手材料和其他没有派上用场的统统除掉,剩下来的真正有使用价值的资料就不太多了。

在《现汉》的编写过程中,以及后来的修订工作中,都深深地感觉到资料不足。为了补充资料,我们曾两次停止其他工作搞突击,但增加的东西仍然有限。《现汉》如要扩大和进一步提高质量,还需要在资料方面下一番工夫。

有的语文词典,如历史性的语文大词典,还有溯源的任务。对一般词语以及成语典故等进行追本溯源,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在目前资料十分贫乏的情况下,要做好这一工作是比较困难的。要做到真正的溯源,资料不仅要丰富,而且要完备。不掌握基本完备的资料就轻易地宣称:我这里找到的就是源,再没有比这更早的了。这样做难免要被人(有时也会是自己)打嘴巴子的。我们肯定某个词语在某个时期存在,这是容易的,只要掌握了资料就可以做到。但是,要肯定某个词在某个时期以前不存在,那是很难的。有什么证据呢?没有。只是凭个人臆断。臆断是不能代替科学的。翟灏在《通俗编》“盘缠”一词下说:“按二字(即盘缠)元以前未见用者,方回《听航船》歌‘三日盘缠无一钱’,亦是降元以后作。”事实上,盘缠不但在宋代有(《京本通俗小说》中多处可见),在宋以前就有了。如“蕃王……拜舞既了,遂拣绉马百匹,明驼千头,骨咄羝羴麋鹿麝香,盘缠天使”(见《敦煌变文集·韩擒虎话本》)。又,“此寺先来贫虚,都无一物。纵有些些施利,旋总盘缠齐斋供,实无财帛……”(见《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四

我们搜集资料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可是,有些编写人员却有轻视语言资料的倾向,他们的着眼点不是在资料上,而总是在已有的词书上。收词立目,他不去翻检卡片,看看该词的使用频率是否高,而总要先翻翻别的词典,不然就放心不下。释义时放着手边的资料不用,干脆照抄别的词典。我们不反对使用第二手资料,当然,参考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必要的,是无可非议的,正确的东西就是要抄,但利用第二手材料切不可陷入盲目性。正确的态度是要分主次。第一手资料是居第一位的,是编写词典的主要依据,第二手资料是第二位的,是供参考的。如解释词义,第一步工作是要把已有的资料卡片进行排比、分析、归纳,然后确定义项的分合,并拟出初稿来。不要一上来就翻词典(或看用词典剪贴的卡片),那样容易受影响,产生框框,束缚自己的手脚。在自己动了一番脑筋,拟出初稿之后,再去查对一下其他词典的注释是必要的,只要有可能,应尽量多查几部词典。把自己的初稿跟其他词典的释文做一番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来,然后再仔细审查资料,反复琢磨,反复推敲,就会使我们的注释逐渐接近于正确。前人的注释也是在掌握了一定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归纳出来的,也是经过认真推敲过了的,我们不能轻易地否定它。要否定别人的东西,得有足够的证据,要有第一手资料做后盾。前人因受资料限制,或是其他原因,对某个词的解释不够正确,以至完全错误,这样的事是经常会有,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们自己往往也会这样。词典涉及的知识面是极为广阔的,而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

限的。词典工作者永远是个小学生，虚心和谨慎应是他们的座右铭。

以往的词书辗转相抄，以讹传讹的现象相当严重。据说《中华大字典》编辑时核对原书，发现《康熙字典》错误达四千余条。台湾出版的、洋洋八千万言的四十卷本《中文大辞典》在《编后记》中宣言：“本书资料来源，网罗经史子集，旁采类书、丛书……”又说：“本书编校谨严，每一资料，初编之后，复阅再三，综计四编六校，凡有讹讹，悉为考正。”宣言是这样说的，事实又是怎样呢？我们仅核对该词典“至”字下收的五十余条词的例证就发现了如下一些重大错误。

①引文错了的：如“至友”条“行忠信而不相疑”，“信”误作“言”；“至感”条“志感祥开，洪辉物覩”，“祥”误作“神”，“辉”误作“晖”；“至虚”条“同规易简”，“易”误作“量”；“至公楼”条“主文登之以观试”，“主文”误作“主人”。

②篇名错了的：如“至友”条“《大戴礼·文王官人》”，“《文王官人》”误作“《文王宦人》”；“至性”条应是《后汉书·光武十三王列传·东平宪王苍传》，误作“《后汉书·王苍传》”；“至情”条“《三国志·魏志·袁术传》”，“《袁术传》”误作“《董卓传》”；“至贤”、“至赏”等条下应是“《孔子家语·王言解》”，把“《王言解》”误作“《始诛》”。

③书名错了的：如“至化”条“《晋书·阮种传》”，“《晋书》”误作“《齐书》”；“至公楼”条“《松漠纪闻》”误作“《漠北纪闻》”。

④作者错了的：如“至心”条《论盛孝章书》的作者是孔融，误作“杨恽”。以上错误既不是笔误，也不是排版造成的，而是因袭了《汉和大词典》的错误。此外，我们从该词典的收词、注释、引例，看到大量抄袭《汉和大词典》的痕迹。如收词，“至”字下《中文大辞典》收了二百五十二条，除了“至它”、“至于”、“至如”三词外，其余的跟《汉和大词典》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少收了二

十余条词。在释义上,《中文大辞典》除“至意”条把《汉和大词典》的①③两义合并为一义,和“至虚”条义项顺序有所不同外,其他跟《汉和大词典》大同小异。在引用例证方面,从上面我们查对的五十余条词所引的一百零几个例证,除“至交”条引李咸用诗“凤雏麟子皆至交,春风相逐垂阳桥”,和“至竟”、“至情”、“至言”、“至贤”等条例证顺序稍有不同外,其余完全跟《汉和大词典》相同,连引文的起讫、省略,以及是否引注疏等都一模一样。所有这些,决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中文大辞典》之所以走上抄袭这条路,其根本原因是它自己没有踏踏实实地去做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工作,加之对《汉和大词典》等盲目信赖,结果是以讹传讹。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对此,我们能不引以为鉴吗?

五

最近,吕叔湘先生在《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说:“中国的词典事业可怜得很,在国际上比较起来,简直太不像样。这么一个文明大国,词典事业是如此之不发达。”我们希望吕先生的讲话能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中国词典事业的落后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仅要看到这方面的落后状况,更重要的是要分析一下落后的原因,对症下药,迅速地行动起来,改变现状。造成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领导是否重视的问题,词典机构和人员的组织问题,资料建设问题,等等。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的词典编纂与研究的机构,唯一的一个专门从事语文词典编辑工作的机构,还是附属在一个研究所的下面,二十多年来,不但没有发展,反而抽了一大截。广州词典会

议之后,为了应急,拉起几个临时班子,各行其是,人力物力都十分分散,事倍功半,浪费极大。这种局面何时结束,词典事业下一步如何发展,如何统一规划……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吕先生在这次会议上还谈到:“咱们现在手头掌握的材料在全部可用的材料之中,我看恐怕只有百分之一,真是九牛一毛。”缺乏资料是我国词典事业落后于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解决资料问题,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是不可能的。从上面吕先生的意见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资料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如此繁重的任务,如果仍然按照目前“各行其是”的方式继续干下去,是无法完成的,非另想办法不可。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有无比的优越性。但优越性要人去利用和发扬它,它才能表现出来。有了优越性不去利用它,就会失去优越性。拿词书资料来说,我们现在无法跟英、美、法、苏等国相比,恐怕连解放前我们也比不了。过去《中国大辞典》和《中山大词典》在那样的环境中,尚且搜集了近一千万张资料,而我们三十多年来全国收集的资料加起来还没有那么多。目前,在我国系统地做语言资料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其原因是资料工作在今天不但得不到鼓励,而且受到种种歧视,连词典编辑工作也是受歧视的。

自从几部大词(字)典上马之后,认识到资料的重要意义的人是愈来愈多了,包括词典界部分领导同志在内。我们认为只要有强有力的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现全国大协作,做好资料工作,在词典事业方面打一场翻身仗,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指日可待的。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着手筹备建立全国语言资料中心(或名词书资料中心)。建立这样一个中心,是词

典工作者和语文工作者多年来的心愿。这一工作如能做好,不仅会对我国现时的词书编纂工作及语言研究工作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将长期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意义是极其重大的。这项工作本应早做,现在来做是晚了一点,但晚做总比不做好。现在来做还来得及,还有条件。不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不做,等十年八年之后,老一辈的语言工作者会越来越来少,那时的困难要比现在大得多!

把词典编纂与词汇研究结合起来*

晁继周

吕叔湘先生在《语言和语言学》一文中说：“一个语言的所有语素和所有具有特定意义的语素组合，总起来构成这个语言的语汇。罗列一个语言的语汇，解释每一个语汇单位的意义的是词典。词典是语汇研究的成果。”（《吕叔湘文集》第4卷48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吕先生所说的具有特定意义的语素组合，指的是词和固定词组。汉语的语汇，其主体部分是总数约以数十万计的词。词和一部分作用相当于词的熟语（主要是成语和惯用语）构成汉语的词汇。吕先生的论述告诉我们，词典编纂与词汇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词典是词汇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词典的水平，取决于词汇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我国传统语文学中，字和词的界限不清楚，甚至只知有字，不知有词。我国古代只有字书（小学类除字书外的韵书和训诂书也是着眼于字的），而没有现代意义的词典（dictionary）。古代汉语的词以单音节为主，在多数情况下一个字就是一个词，传统方法只讲字不讲词，对于分析语句、理解意义尚无大碍。现代汉语双音节、多音节词增多，研究者如果仍旧把眼光盯在一个个汉字上，就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中国辞书论集·1997》。

将寸步难行了。20世纪初,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研究汉语的学者才建立起词的概念。1907年,章士钊在《中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中率先提出“一字可为一词,而一词不必为一字”,“律字以为词,规词以为句”。当时还没有语素的概念,把字、词、句放在一个层面上讨论并不科学,但比起只谈字不谈词的传统认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从20年代到40年代,黎锦熙、王力、高名凯、吕叔湘等众多学者以现代汉语为材料,对词作了更加深入的研究。确立了词的概念,才有了以词为本位的句法研究,也才有了以收列词和解释词为主要任务的词典。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在解释字的时候,已注意到兼释由这个字组成的某些复词,如在“击”下,解释了“击戾”、“击穀”、“击间”、“游击”等词。真正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创新,可以称为现代意义上的词典的是1915年出版的《辞源》。《辞源》经过续编并出合订本后,共收单字11204个,复词87790条,所收词语以古代书面语为主,也包括许多新的名词术语。《辞源》之后,又有《辞海》(1936)、《国语辞典》(1945)等新型词典问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语辞典》,该书所收词语以现代语词特别是通俗口语词汇为主,兼收成语和其他熟语、古今中外人名、地名,以及常用的百科名词术语,总计约10万多条,并首创音序(按注音字母顺序)排列的查检法。

20世纪50年代以后,汉语词汇研究出现高潮,先后开展了基本词汇问题、词义与概念的关系问题、词汇规范问题等讨论。语素(morpheme)概念的引进,使词的划分及汉语构词法的研究更加深入。汉语史的研究和汉语方言的研究更促使汉语词汇研究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展开。这一阶段语汇研究的丰硕成果,集中体现到《现代汉语词典》(以下作《现汉》)、《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

国家重点辞书的编写中。

《现汉》等词典通过特定的体例,严格地区分了字(如玻、琥、琉)、语素、词和词组。比如,同是主谓结构,有的是词,有的是词组,《现汉》通过拼音连写或分写来区分。“心疼”是词,拼音写作 xīnténg;“心硬”是词组(可以说“他心很硬,儿子牺牲眼泪都没掉”),拼音写作 xīn yìng。“眼红”是词,拼音写作 yǎnhóng;“眼尖”是词组(可以说“她眼真尖,一下就认出了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拼音写作 yǎn jiān。又比如汉语里有一类动宾结构的词,中间可以插入别的成分,如“睡觉”(可以说“睡了一会儿觉”、“觉睡够了”)、“打仗”(可以说“打了三年仗”、“仗打赢了”)。吕叔湘先生说:“从词汇的角度看,睡觉、打仗等等都可以算做一个词,可是从语法的角度看,不得不认为这些组合是短语。”(《汉语语法分析问题》2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现汉》为这类“离合词”加上标志(在汉语拼音的两音节中间加斜的双短横),以示它们在结构和用法上的特殊性。

同音词与多义词的区分,是研究汉语词汇的学者着力研究的问题之一。多义词是一个词有几个不同的意义,这几个不同的意义又互相有联系;同音词则是发音相同而意义完全不同的词。以前的词典,不区分同音词和多义词,如把“开花”的“花”与“花钱”的“花”当作同一个词的不同义项。《现汉》第一次在词典里把同音词与多义词区别开来,把“开花”的“花”与“花钱”的“花”当成两个不同的语素分别立条,把“告别”的“别”,“区别”的“别”,“胸前别着红花”的“别”,“别闹了”的“别”,当成4个不同的语素分别立条。复音词中,也作了这样的区分,如“燃点”分为“燃点¹”(加热使燃烧)和“燃点²”(某种物质着火燃烧所需要的最低温度)，“小节”分为“小

节¹”(指与原则无关的琐碎的事情)和“小节²”(音乐节拍的段落)。

词义研究的深入,使得词典释义更加完备、精细、准确。以“管”字为例,旧《辞源》列为9个义项,而《汉语大词典》增为26个义项,足见其完备和精细。有的义项,纠正了前人的失误。如旧《辞源》第6个义项为:“贯也。《礼》:‘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此义《汉语大词典》改释为“包容;包括”(新版《辞源》也作了修正),例证除《礼记》外,增加了《荀子》和《韩非子》。在分时代先后,明字义、词义孳乳,以及据有丰富妥切的例证方面,《汉语大词典》比前出的同类词典前进了一大步。以前辞书释义中存在的互训、递训等问题,在建国后编纂出版的一些有影响的辞书中也得到较好的解决。

词汇研究与词典编纂是密切相关的两件工作。词汇研究的成果体现到词典中,使词典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反过来,词典编写和修订中也不断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要求通过词汇学的研究给以解决。目前,从词典编纂的角度看,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一 词汇的体系性问题

“词汇体系”是词汇研究和词典编纂中常说到的一个概念。但是,一种语言(如汉语)的词汇究竟是不是一个体系?如果是,又是怎样的一个体系?这个问题目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词典编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词典的收词有密切关系。拿汉语规范型词典(如《现汉》)来说,它要全面反映普通话语汇的面貌,但由于篇幅所限,又要有所取舍。取舍的标准有三个,一是依据词频,二是看有无查考的需要,三是要照顾词汇体系。如果不

考虑体系,收词就会失衡。如原《现汉》收了“上学”,而没有收与“上学”有对义关系的“下学”,就是收词上的失衡,《现汉》修订本补收了“下学”。在语言发展中,新词的产生要比旧词的消亡速度快得多,规范型词典每一次修订,为使规模不过多膨胀,在增收新词的同时必须删除部分旧有的词(有些是尚未消亡的),删除旧有词语时也要注意词汇的体系性,否则也会造成失衡。如有人指出的,《现汉》修订本保留了“加仑”、“品脱”,却删去了介乎于以上两者之间的容量单位“夸脱”(1品脱等于1/2夸脱,4夸脱等于1加仑);保留了“派力司”、“乔其纱”、“开司米”,却删除了“法兰绒”(见孟伟根《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外来词的处理》,载《词库建设通讯》第12期),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刘叔新先生在《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一书中对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作了详尽的描述,他否定了从逻辑的、语法的、词语历史渊源的组织关系上来考察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做法,提出了同义组、反义组、对比组、分割对象组、固定搭配组、特定搭配组、互向依赖组、单向依赖组、挨连组、级次组以及同素组等11种“真正词汇本身内部的词语结构组织”。他认为这些词语结构组织加连起来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密网”,把现代汉语全部词语网罗在内。(见该书380—381页)在考察研究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时候,刘先生研讨的思路和得出的结论性认识,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二 标注词性问题

汉语的词类问题,一直受到语法学界的极大关注。经过几十

年的研究,包括 30 年代和 50 年代的两次大讨论,一些理论问题已经接近解决。近些年来,已有一些词典作了标注词性的尝试,这是值得欢迎的。词性问题主要是语法问题,但也涉及词汇问题和词典编纂中的技术处理问题。比如,词的兼类问题,在词典里就表现为不同词性的义项的划分问题。“科学”分为名词和形容词两个义项,这已不成问题。“礼貌”在名词义外,是否应立形容词义项(你这样做很不礼貌)?“理智”在名词义外,是否应立形容词义项(面对对方的过火行为,他表现得很理智)?什么情况下不分立义项,什么情况下分立义项,分立义项后怎样分别作注,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单字如何标注词性情况更为复杂。有的单字不是语素,自然不必讨论。有的单字是不成词语素,词性可以不标,但应该想办法让读者明白它们与不是语素的字有区别;进一步说,不成词语素是否也可作出类别标示?最复杂的情况是有些字分为多个义项;这些义项有的成词,有的不成词;成词的义项又分属不同的词性。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标注词性做得既科学又实用,既严密又不烦琐,是需要下一番研究功夫的。

三 离合词问题

前文说过,《现汉》为离合词作出了标记,这在汉语词典编纂史上是个首创。结合词典编写,还有必要把对离合词(这里主要谈动宾式离合词)的研究深入下去。对动宾式离合词的研究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划清动宾式离合词与动宾式短语的界限,另一方面是划清离合词与非离合词的界限。前一个问题已有学者作过探讨(见赵金铭《能扩展的“动+名”格式的讨论》,载《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4年第2期;赵淑华、张宝林《离合词的确定及其性质的再认识》,载《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后一个问题则需要依据语言资料对动宾式合成词逐一检查作出判断,所依据的资料不充分或不准确就会造成判断的失误。还有一种非动宾式用如动宾式的离合词。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1979)一书中把这种现象称做“假V—O复合词的离子化”,他举的例子中有体操(“体了一堂操”)、取消(“取了消了”)等。现在我们见到的多是联合式用如动宾式的离合词,如鞠躬(“鞠了一个躬”)、洗澡(“洗个热水澡”)、游泳(“游了三回泳”)、游行(“那段时间他没游过行”)、考试(“考完试才放假”)、登记(“去年就登了记,到现在还没房子住”)。这6个词情况基本相同,词典处理上却不一致,鞠躬、洗澡看作离合词,游泳、游行、考试、登记没有当成离合词。诸如此类的问题怎样处理还值得研究。口语里,还常有在提问中把双音节动词拆开的情况,如“愿不愿意”、“希不希望”、“喜不喜欢”、“高不高兴”等,这类格式是临时省略音节,不应作离合词看待。

四 义素分析法与词典释义

义素分析法(sememe analysis),也叫构成成分分析法,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家在研究亲属词的含义时提出。60年代初,义素分析法用来为生成转换语法提供语义特征,很快受到语义学界的重视。1978年义素分析法介绍到中国(参看周绍珩《欧美语义学的某些理论和研究方法》,载《语言学动态》1978年第4期),很快在语言学界引起反响。义素分析法把义位(即词典学上

说的义项)分解成若干义素,用义素作语言分析比较的最小单位,加深对语言成分及成分间关系的认识。80年代以后,有些学者开始尝试把义素分析法运用于汉语词义分析。符淮青先生发表了多篇论文,如《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分析》(《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构成成分分析和词的释义》(《辞书研究》1988年第1期)、《“词义成分——模式”分析(表动作行为的词)》(《汉语学习》1996年第5期)等,并于1996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传统的词典释义,是收集尽可能多的例句,从例句中分析概括出所要解释的词的意义;义素分析法则强调从相关的一组词、一群词的相互比较中提炼词义的构成成分,使被解释的词的意义在同有关的词的比较中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今后要继续进行把义素分析法运用于词典释义的探索,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在已给出的词的释义的基础上,通过义素分析加以适当的调整 and 限制,在词义的分析 and 说明中体现一定程度的形式化,以纠正 and 弥补释义中的某些偏颇 and 缺失。

辞书编写与研究工作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李 国 炎

近几年来,在辞书的编写、出版与研究方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形势喜人。

第一,在辞书编写与出版方面不但数量多,而且品种也较多。1978年,以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为目的的《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在全国公开发行;1979至1982年,收录古汉语语词的修订本《辞源》先后出版了第一、二、三分册;1979年,三卷本大型综合性辞书——新《辞海》问世了。近几年间,还出版了《四角号码新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小词典》《汉语小词典》《新华词典》《汉语成语词典》和各种汉外语文词典、少数民族语言词典、汉语方言词典,以及各种专科词典。此外,还重印了一部分旧辞书。《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这两部大型语文辞书的编写工作正在加速进行。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正式开始筹划编纂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这部书初步确定的总体规划达到八十卷(其中包括索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中国语文》1982年第4期,署名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引两卷),每卷一百万至一百二十万字,全书约一亿字,计划十年左右完成。第一卷《天文学》已于1980年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和《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的编纂和陆续出版,标志着我国辞书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辞书编纂队伍不断壮大。近几年,参加各种辞书编写工作的人员迅速增多。拿语文词典来说,过去主要由少数科研机关和出版单位编纂,现在除了由有关部门组织的班子编写之外,一些大专院校和少数中等学校也在编写某一方面的词典,同时还有个人独自编写某类词典。从地区来看,过去主要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现在编写辞书的单位遍及全国各地。

第三,伴随着辞书大量地编写与出版,辞书研究工作也蓬勃开展起来。这几年《中国语文》和《辞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评论辞书的文章。文章主要有四类:一是探索和论述各种词典的编纂方法,对语文词典如何使释义准确、注音规范以及正确使用例证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二是评论各种词典,对新出版的词典以及古代和外国的一些辞书进行评论;三是参加《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辞海》《辞源》和其他各种词典编写与修订的工作人员,撰写了一批有关编写词典问题的文章,在文章中总结了他们在编写与修订工作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四是讨论语文词典有无阶级性等问题。

辞书工作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可喜的成就,是与出版界、辞书界、语言学界有关领导的重视与关怀分不开的。大家还记得,在“四人帮”倒台不久的1978年,陈原同志首先发表了《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的文章,提出在词典工作中要划清的八个是非问题。这篇文章对“四人帮”及其极左思潮作了严肃的批判,说

出了广大辞书工作者的心里话。

解放思想对于辞书工作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可以想见,假如现在我们辞书工作人员的思想仍受种种清规戒律的束缚,词典界是不会有今天这样生动活泼、蓬勃发展的局面的。这使我们想到了《中国语文》。上面提到陈原同志的文章就是发表在1978年复刊的第1期《中国语文》上。这期《中国语文》一共发表五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其中两篇是关于词典的,两篇是关于文风的。除陈文,另一篇谈词典问题的就是我们所写的《批判“四人帮”扼杀〈现代汉语词典〉的罪行》。这一年的第3期又发表了《关于词书的思想性问题》等三篇文章,都是围绕词典的思想性问题批判“四人帮”及其极左思潮的。这说明《中国语文》十分重视辞书工作者解放思想的问题。把广大辞书工作者从极左思潮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语文》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文风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国语文》不仅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帮八股,而且在它发表的文章中,在文风方面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不妨拿评论词典的文章做个比较。由“四人帮”授意炮制的《评〈现代汉语词典〉(重印本)》是“四人帮”文风的代表作。这篇文章打着评论词典的幌子,极尽歪曲事实和无限上纲之能事,文风之恶劣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语文》从1978年复刊以来,对新出的几部词典,如新《辞海》、修订本《辞源》(第一分册)和《汉语成语词典》、《四角号码新词典》(1977年修订重排本)、《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现代汉语八百词》等,一一做了评论。对这些词典在收词、注音、释义、引例及溯源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意见,正确的加以肯定,错误的给以批评,并指出错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改正。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文字质朴,

内容充实。写评论词典的文章要讲求文风,编写词典也要讲求文风。过去在词典编写工作中滥加批判,穿靴戴帽等,都是文风不正的表现。虽然在这点上近年来出版的词典有了很大改进,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词典也应该在文风方面为读者树立典范。

评论辞书,目的是为了促进辞书编写工作质量的提高,使辞书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不同的辞书有的编得好一些,有的编得差一些;同一部辞书,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这是客观事实。因此,评论应有褒有贬,好的要发扬,差的要改进。辞书的质量就是在这样不断地批评、不断地改进中逐步提高起来的。

语文词典是对客观语言在语音、词形、词义、词法、语法等方面的综合反映。这个反映往往是打了折扣的。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受到人的认识有局限性的制约,受到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词典反映语言的工作是由人来做的,而人的知识范围、语文表达能力,以及他的出身、经历、籍贯、信仰、世界观等,都会在编写工作中起一定的作用。如一个学过医的人,在收词时他会有意无意多收一些医学名词,一个来自某方言地区的人,也会多收一些他所熟悉的家乡方言。在编写工作中表现得最顽强的当然要算人的阶级立场、政治主张、世界观、宗教信仰等。这就是过去各种词典存在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和阶级局限性(或阶级偏见)等的根本原因。这些倾向性、局限性影响了词典的科学性,即影响词典忠实地、客观地反映语言。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的阶级,所以不存在阶级局限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编写的词典虽然也有政治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不仅不会影响词典的科学性,相反地更能忠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列宁在指示要编写《苏维埃百科词典》时指出,全书应贯穿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且应该具有严格的科学性。这说明词典

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与科学性是一致的。这样说,是否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编的词典科学性都很差,社会主义国家编的词典科学性都很强呢?事实也不尽然,不能一概而论。资本主义国家编词典的人也有思想比较进步、认识比较全面的,对一些词也能做比较客观的注释。如“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美国大学词典》的注文是:“这是一种思想体系,是马克思发展了的。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剥削群众的机器,阶级斗争是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时就包含了腐败的种子,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为无产阶级的制度所代替。”社会主义国家的词典按要求应该是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但这跟参加编写工作的人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认识水平有直接关系。

不管是“阶级性”“思想性”,还是“政治倾向性”,名称是次要的,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词典的编写工作,我们只要知道这个问题是如何引起的以及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去对待它,目的就达到了。

尽管我国过去在编纂辞书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近几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一个时期我们对辞书工作不够重视,加上十年动乱期间又受到“四人帮”的扼杀,使得我国目前在辞书的编写、出版以及研究等方面,比起先进国家来落后了许多。拿语文词典来说,我们还只刚刚改变十亿人民只用一部小小的《新华字典》的局面,现在出版的词典不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需要。广大读者热切地盼望我们尽可能地多出辞书,快出辞书。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为了振兴我国的辞书事业,我们以为现阶段应当从三个方面去努力工作。

一 填补缺门

目前,我国的辞书品种仍然很少,缺门很多。百科词典与专科词典姑且不论,单是语文词典,需要补缺的就相当多,比较重要而又急需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1. 同义词词典。这种词典主要为中小学学生学习和语文教师教学所急需。编写同义词词典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过,当时认为条件还不成熟,未能列入计划。1975年广州词典会议把同义词词典列入计划,但是由于承担单位限于人力和资料的不足,未能上马。现在,由张志毅同志以一人之力编写的《简明同义词典》,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收汉语常用词一千五百个,编成六百组。这是一本小型的词典,显然是不够用的。同义词词典最重要的工作有两项,一是同义词分组,即将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收集起来编成组,以组为单位进行注释和分析。分组要做到恰到好处,分得过细会显得支离破碎,分得过宽又会流于形式。总之,过细与过宽都会影响词典的使用价值。第二项重要工作是对同一组的词进行释义与辨析,分析同一组各个词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每一词在使用范围以及用法和色彩等方面的细微差别。分析要精当,要详尽。要做到这些,需要有充分可供分析的语言资料,没有丰富的、足够的资料,要编好同义词词典是根本不可能的。希望今后能编出一本分析详尽的、较大型的同义词词典。

与同义词词典在类型上相近的还有反义词词典。反义词有时也不大好区别,要找一个词的反义词,有时也并不那么容易。如有的教师把“活泼”当作“严肃”的反义词,有的词典把“权利”当作“义

务”的反义词,都未必恰当。中小学校对反义词词典也是很需要的。

2. 断代语文词典。1980年吕叔湘先生在《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上说:“我们这部汉语大词典编完之后,大有可为,可以编一部上古汉语的词典,就是先秦时代的,汉魏六朝时代的编一部,唐宋元明再编一部,可编的东西多得很哪!”确实如此。像这类断代的汉语词典可以编好几部,首先我们可以编一部近代汉语大词典。现在出版了很多用近代汉语写的戏曲、小说等,阅读这类书的人也越来越多。读者在阅读这些书时碰到的疑难较多。旧有的辞书对近代汉语的词语收录不多,虽然出版了几部专门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书,如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等,但收录的词语有限,各书体例不同,读者检查不便,而且在注释方面各书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编写一部较大型的近代汉语词典是很有必要的。

《现代汉语大词典》是我国目前需要编写的另一部大型词典。前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指示语言研究所编写一部十卷本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由于资料和人力的关系,这部书未敢贸然上马。像这样一部大型词典上马前,不但要在人力、物力(主要是资料)等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也需要制定一个比较详细的编写方案。这部词典应该怎样来编,比如收词的数目,收多少合适?收词范围,古汉语和方言词语收多少,专用名词收不收?注释方式,百科条目仿新《辞海》还是《现汉》,语文条目是否可采用《现汉》的注法?语文条目的例句是像《现汉》那样只做一般的举例,还是像编古汉语词典那样引用书证,注明出处?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深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的。

3. 方言词典。汉语方言相当复杂,各个方言之间,或方言与普

通话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即使是同一方言,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分歧。这种差别影响了人们相互间的交际往来,给工作和生产带来了许多不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大力地推广普通话和实现汉语规范化。编写方言词典,对方言的语音和词汇等加以整理和研究,有助于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方言中不但保存了许多古音,也保存了不少古词和古义,对研究古汉语,特别是近代汉语有很大帮助。如普通话中的“热闹、介绍、势头”等等,在近代汉语中这些词字的顺序正好倒了过来,作“闹热、绍介、头势”。像这样的很大一部分词至今仍保留在各地方言中。“心影”(恶心、腻烦)、“头信”(索性、干脆)、“瞎扯蛋”(指人胡说、乱说;也可单说“扯蛋”)、“吊猴”(指人调皮捣蛋或耍滑不老实),以及“影响”有“下落、音信”义,“照会”有“通知、招呼”义,“买办”有“置办”义,等等,都在方言中可以找到。另外,近代汉语中有些词语的含义或说法与普通话的不同,如“罪犯”不是“有犯罪行为的人”,而是指所犯的罪行,形容因替人担心而心情紧张常说“替他捏一把汗”,而近代汉语则多说“捏两把汗”。方言中可能会有相同的意思或说法。编纂方言词典主要是为了推广普通话,同时也可以为研究古汉语与近代汉语服务,两者是不矛盾的。因此,编写方言词典时是可以有意识地兼顾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在编写某地区方言词典时,把用该地区方言写的戏曲、小说中的方言词语收录进去并加以注释。如编写山东方言词典,可以把《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书中的山东方言词语收到词典中去,编写河南方言词典,可以把《歧路灯》等书中的河南方言词语收到词典中去。这样做会增加工作量,也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意义是很大的。目前已经出版或正在编写中的方言词典有《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

《广州话方言词典》《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等。希望今后能编写和出版更多的方言词典,最好是每个大方言区能先有一部较大型的方言词典。

4. 双语词典。双语词典包括外国语(如英、日、法、德等语)和汉语词典及少数民族语言(如满、蒙、藏、维、朝等语)和汉语词典。我国是多民族国家,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编写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词典,不但便于广大少数民族的人民学习汉语普通话,也便于汉族人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这样,既有利于民族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又有利于民族团结,工作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无论是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包括某些方言)都从少数民族语言中借用了不少词语。因此,编写少数民族语言词典,对研究汉语也有一定的意义。这类词典过去出版的不多,近年来出版了一些,如《朝汉词典》(1978年)、《哈(哈萨克语)汉词典》(1980年)、《汉维成语词典》(1979年)、《汉、傣、景颇日常用语对照手册》(1979年)、《维汉学习小词典》(1980年)等。从数量上来看显然是不多的,还不能满足各民族人民的需要。

5. 其他各科词典。我们需要编写的词典还有:正音词典(主要任务是提供标准发音,在汉语语音方面起规范作用)、语法词典(主要任务是提供词语的语法特征)、搭配词典(主要解释词语的搭配关系,包括语法搭配关系和词义搭配能力)、例解词典(用列举例句的方法,使读者从例句中去领会词语的用法和含义)、分类词典(有两种,一是从词性的类别编排,一是从词的意义类别编排)、倒序词典(也叫逆序词典。词的排列顺序与一般词典的排列正好相反,如汉语词典一般单字下收的词语以该单字领头,然后按笔划或音序排列。如《现汉》“笑”字下词语的排列是“笑柄”“笑哈哈”“笑

话”“笑剧”……倒序词典则是“干笑”“奸笑”“苦笑”“微笑”……)、作家语言词典(专门收录某一作家所有著作中的词语。如我们可以编写《毛泽东语言词典》《鲁迅语言词典》《老舍语言词典》等)、专著语言词典(以在语言上有特色的某一著名著作的词语为内容的词典。如可编《红楼梦词典》《水浒传词典》《金瓶梅词典》等。也可以以某一时期同一体裁的作品的词语为内容,如可编《元曲词典》《宋词词典》《唐诗词典》等)、引语词典(这种词典只收集引语,不做注释。分“博引”与“专引”两种,博引词典博采百家之言,兼蓄百科之义,如《牛津博引词典》。专引词典只收集某一学科的引语,如《历史引语词典》《莎士比亚引语词典》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要,各种各样的词典应运而生,名目繁多,举不胜举,有些名称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如在美国有《罪犯教育学词典》。对于外国的词典我们不应一一照搬,我们应根据本国人民的需要,分清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发展我国的辞书事业。目前,只能根据现有的人力物力,把最紧要、最缺门的词典尽快地编写出来。

二 提高辞书编辑水平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一些辞书,如《现汉》、修订本《辞源》(第一、二、三分册)、新《辞海》等来看,都是有一定水平的。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词典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从《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的许多评论词典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现在出版的词典不论在注音、释义上,还是引例溯源上,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词典是被人们当做典范来看待的,不管在哪一方面出现了差错,都会造成不良的后

果。法国词典学家保罗·罗贝尔说：“尽管词语的含糊和混乱一般来说不会像在医生的药方、刑法的条文、起诉书或判决书中的字词倒错给一个人所带来的危害那么大，但词典编者不要忘记，有时一个不正确或不准确的定义，会引起相当严重的后果。”这话绝非耸人听闻，这里可以举两个事例来证明。一件事是，前两年河南一个印刷工人排字时擅自把一张布告中的“罪刑”一词改为“罪行”，结果赔偿重排费一千余元。据他说，他查了《现汉》，词典中只收了“罪行”而无“罪刑”，因此断定是别人写错了。为此，“官司”一直打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法学研究所。另一件事是，某地一位高考生给《现汉》编者写信，信中谈到他在考政治时解答“毛泽东思想”用的是《现汉》的注释，评卷人只给了答对一半的分数，结果影响了他的考试成绩。这两件事责任不一定都在《现汉》身上，但从这里可以看出词典的影响。此外，在国外因词典的收词或释义而引起政治纠纷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词典在注音、释义等方面做到准确，是它的责任，词典编写人员没有任何理由为词典中出现的差错进行辩解。他们应把提高词典质量，避免出现差错作为一个严肃的任务去完成。为了提高我国辞书的编辑水平，保证辞书质量，目前似应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1. 资料收集工作。资料是词典的根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离开了资料，词典工作就寸步难行。现在认识到资料的重要性的人（包括某些领导）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光认识是不行的，重要的在于行动，特别重要的是如何行动。编词典的单位没有一个不在行动，几乎每天都在做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工作。问题在于这种行动的效果如何。吕叔湘先生曾说：“咱们现在手头掌握的材料在全部可用的材料之中，我看恐怕只有百分之一，真是九牛一毛。”据粗略

的估计,我国各地现有的语文资料卡片加起来不下两千万张,数字并不小,为何吕先生说只是“九牛一毛”呢?资料不能光从数量上来看,而要从质量上来看,从“可用”上来看。资料贵在丰富,尤其贵在齐全;量多不等于丰富,更不等于齐全。现有的资料是重复多,废片、冗片多,二手资料多,这些资料规格不同,不齐全,无法统一利用,实用价值低。这样一些弊病是明摆着的。大家也明明知道,像现在这样干资料工作是事倍功半,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收效不大,但仍然不想做些改变。《辞书研究》1981年第三辑《关于资料》一文曾倡议建立“全国语言资料中心”(或辞书资料中心)。这个倡议代表了广大辞书工作者和语言工作者的共同心愿。资料中心的建立是改变我国辞书资料落后状况的根本措施,对促进我国辞书事业和语言研究工作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希望能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尽快地把这一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 标准化工作。在工业生产方面为了适应科学技术和合理组织生产的需要,在产品质量、品种规格、零部件通用方面规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使之标准化,它对发展生产有重大意义。辞书工作能不能在某些方面实行标准化呢?不仅可以,而且必要。标准化自然不能适用于辞书的各个方面,不同的辞书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不能搞标准化的,但是辞书的共同部分,如字音、词形(包括字形)、检字法等搞标准化则是很有必要的。

a) 字音标准化。现在已出版的几部词典,如《现汉》、《新华字典》、新《辞海》等,在注音方面出入较大。如“清”,新《辞海》注音为 jìng,《现汉》作 qìng;“间不容发”的“间”,新《辞海》和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编的《汉语成语词典》等均注音为 jiàn,《现汉》作 jiān;“佶屈聱牙”的“佶”新《辞海》注音为 jié,《现汉》与《新华字典》作

jí。由于各词典注音不一致,读者很有意见,他们希望词典部门对注音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要各行其是,互相矛盾,使得他们无所适从。新《辞海》与《现汉》等书收录的单字较少,在注音上已出现不少问题,正是编写中的《汉语大词典》与《汉语大字典》收的字比这要多几倍,在注音方面出入谅必更大,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须从速采取措施。造成语音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属于正误问题,也有的是属于取舍问题,如从俗、从古、从今,以及地名字名从主人等问题。过去为了解决普通话读音问题,曾专门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于1957、1959、1962年分三批审订了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即所谓“三审”)。十年动乱中,这个机构停止了工作,直到最近才恢复。今后审音委员会不但要担负起普通话的审音工作,希望同时也把协调各词典的注音工作担当起来。

b)词形标准化。词形是指词语的书写形式。同一个词语音同、义同而书写形式有时不同,如“负隅”又写作“负隅”,“落寞”又写作“落漠、落莫”,“照相”又写作“照像”,“纪念”又写作“记念”,“侥幸”又写作“傲倖,徼倖”,等等。书刊上词语的异写、误写给词典的编者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汉》是担负有规范化任务的,所以在处理上更要慎重。误写的词,如“执扭”(应作执拗)、“沾污”(应作玷污)等一律不收。不收也是一种处理。对于异写的词,《现汉》一般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取并列方式,把不同词形的条目并列起来,如【负隅】【负隅】、【落寞】【落漠】【落莫】。二是采取正副条的方式,在正条下面作注,副条见正条,如【纪念】下有注文,【记念】注见【纪念】。如果词目第一个字相同,就不另出条,只在正条下注末加一句“也作××”,如【照相】注后有“也作照像”,照像不另出条。三是作异体处理,如【侥幸】(傲倖、徼倖)。第一种方式表示所列的词

都通用,哪一种写法都可以,而编者倾向于用排在最前面的(注文即在条下)。第二种方式表示正条是通用的,但用副条也不错。第三种方式表示只能用词目中一种写法,圆括号内是被取消了的。这三种方式以第三种最彻底。目前提倡简化汉字,要实现汉字标准化,词形也应标准化。词形的不同,特别是不同的词典同一词采取不同的词形,也会像注音一样使读者无所适从。在这方面,读者也有所反应。如纺织工业用的“捻度”一词的“捻”,《现汉》作“捻”,新《辞海》作“拈”。读者就曾来信询问究竟应该用哪一个字。

在注音和词形等方面,词典固然不能以立法者自居,使读者必须服从自己。但词典的编者可以根据语言文字的客观使用实际,加以分析和选择,向读者推荐最正确、最通用、最规范的东西。汉语规范化是语文词典的一大任务,是责无旁贷的。

c) 检字法标准化。目前我国各词典通用音序检字法、部首检字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各词典使用的同一检字法往往也有所不同。如部首检字法,《现汉》用的和新《辞海》用的就不同。先后出版的同一种词典用的检字法也不相同,如《现汉》(试用本)的部首检字法是用《辞海》(未定稿)的,1978年本因听说《辞海》的部首检字法要修改,于是又改用《新华字典》的。在词典不多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那么突出。现在词典出得越来越多,如若各个词典的检字法互不相同,读者势必要熟悉每一部词典的检字法,那样就要耗费读者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过去有过检字法整理小组,这个组织应该恢复。由检字法整理小组制定全国通用的各种检字法,这样不仅便利了读者,也省得各词典的编辑人员在检字法上多费精力。

3. 积极开展辞书研究工作。现在辞书研究工作已经开展起

来,局面已然打开,但这仅仅是开始。由于这项研究工作历史短,我们还缺乏经验,对于许多问题,如方法问题、方向问题,还不甚明确,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是采取我国固有的传统方法,还是仿效西洋的,还是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还是在此之外另创新的方法?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辞书研究工作是为辞书编写工作服务的。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一定要结合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词典的编写工作进行。现阶段我们的研究工作主要应该做的是:

a)进一步开展辞书评论工作。我们不仅要评论今天出版的各种词典,也要对我国古代各种主要辞书加以评论;对外国有影响的词典要加以介绍和评论。评论各种辞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弃其所短,扬其所长。评论工作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上,要提高到理论上来,使之对词典编写工作能起指导作用。

b)编写中国辞书史。我国编纂辞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前,如《尔雅》成书在公元前二世纪。我国古代出版的辞书不仅多,品种也比较完备。前人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辞书遗产,同时把他们在工作中充分占有材料、坚持科学的求实精神也传给了我们。通过中国辞书史的编写,我们可以更好地吸取前人的经验,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

c)探索和研究各种辞书的编写方法,建立现代词典学。目前,我国不论在编写一般语文词典,还是双语词典、专科词典、百科词典,都是采取现成的编写方法。《现汉》虽说在某些方面比旧有的语文词典有所突破和创新,那也不过是从以往的词典或外国词典中移植过来的。注释方式虽然多种多样,《现汉》也未能根据词性或词的构造方式等总结出一些内在规律来。《现汉》对于我国辞书

的传统,如讲究释义简明扼要,有所继承,但在引用资料,以例证义方面做得不够好,一部分语文词该举例的没举或举的少,举了例子的,也有一些不够理想。《现汉》在编写工作中有不少框框,有些框框是需要的,但框框太多容易束缚手脚。词典工作墨守成规是不可取的,一味模仿前人或照搬外国的一套,我们的辞书事业就不会有远大的前程。英国辞书事业本不发达,但由于创造了“依史则”而为世人所称誉。要使我国辞书的编写与研究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破除旧框框,走大胆创新的道路。

词典学是探索和研究各种词典的编写方法和技巧的,因此,它必须建立在词典编写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前人和外国人的经验,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在实践中进行总结。这样得来的东西才最可靠,最有价值。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现汉》在正式编写前,语言研究所的几位同志曾写过《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但是,由于撰写者缺乏实际编写经验,因此,它就无可避免地带来理论脱离实际的缺陷,在后来的编写工作中未能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我们的词典学必须是科学的,而科学一定产生于实践。再一点,我们的词典学应该富有民族特点。不同语种的词典有共同的东西,也有各自特有的东西。汉语词典有本身的特点,研究汉语词典的词典学必然要有自己的特点,而不应当照搬英语的或是法语的词典学。词典学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把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修辞学等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词典编写工作中去,这些任务的完成,可以促进词典学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我们研究词典学的同时,要熟悉和研究汉语的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修辞学等。

4. 采用新技术。词典工作中有许多工作是异常繁重的,如勾

乙资料,抄写和剪贴资料卡片,排卡片和检字表,等等。这些工作耗费工作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目前已有很多国家利用电子计算机排卡片,编词汇索引,收集资料和储存资料,甚至有的编写工作也由计算机来做。我们也应该尽快采用新技术,利用计算机,使我们的编写与研究工作逐步实现现代化。

三 辞书的编纂队伍与组织机构

要做好辞书的编写与研究工作,必须要有一支精干的专业队伍。过去那种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辞书工作的路子已被证明是失败了的,为了应付任务,临时拉起一支编写队伍的做法,也不是长久之计,从根本上说,也是不可取的。组织专业队伍就需要有人来参加。既懂得词典业务,又愿意献身辞书事业的人并不很多。在国外,语言学家、大学教授等名流投身辞书编写与研究工作的不在少数,在我国却是寥寥无几。原因何在?编写词典是苦差事,长年累月埋在故纸堆里,工作既繁杂琐碎,又不易在短期内出成果,在工作中得益不多,付出的劳力却不少。因此,有人把词典工作人员比作蜡烛,耗干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英国词典学家塞缪尔·约翰逊说:“作家都可以指望蜚声扬名,唯独词典编者只能希望不受指责。”尽管词典印数是那样的多,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某些小说、诗歌,可何时见过一部词典得过奖!陈原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词典工作不是人干的”,又说“但它是圣人干的”。“不是人干的”,是说词典工作十分艰苦,又不为世人所理解,“聪明人”是不干这样工作的。所谓“圣人”是指有献身精神的人,愿做“蜡烛”的人。辞书事业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编纂队伍一定

要扩大,可是原有的编纂人员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久就要减少一批,这样,又需要有人来补充。辞书编纂人员从哪里来,怎样去培养和组织一支具有献身精神的辞书专业队伍,是辞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一切工作都要有计划,辞书工作也应该这样。计划得好,就可以节约人力物力,做到事半功倍。辞书工作要做到有计划,全国一盘棋,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就需要有一个全国的统一组织机构。由这个组织机构来负责统筹规划全国语文词典的编写、出版与研究工作的。辞书事业的发展形势逼人,我们相信一个全国性的辞书组织机构在不远的将来是一定会诞生的。

法国词典学家马托雷在《法国词典史》中预言,“总有一天,由于人类知识达到如此广博的程度,以致不得不改变教学的目的和方法,那时候主要的不是传授专门知识,而是教会学生借助工具,以作为猎取知识的手段”。不管是否会有这样一天,辞书愈来愈广泛地被人们使用着,社会对于辞书的需求,以及辞书在文化、教育、生产、科研等领域中的重要性已日益显示了出来。辞书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辞书工作者大有可为。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辞书事业更加发展、更加灿烂的明天吧!

辞书中国化小议*

闵家骥

最近辞书学界提出辞书中国化,走中国式编写辞书的道路,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今后辞书的发展方向有着直接的关系。

辞书中国化,这就是说,编写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中国大众所乐于使用的辞书,这就是今天“四化”建设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但是怎样才能编写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辞书,这还有待于大家来共同探讨,并通过编写实践逐步加深理解。本文仅就语文词典的编写谈一点对辞书中国化的粗浅认识,借以抛砖引玉。

辞书中国化归根结底是走什么道路、如何提高辞书编写水平的问题,而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说,新中国建立以后编写的辞书没有表现一点自己的特色。不是的。建国以来编写出版的辞书,有些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例如旧《辞海》和新《辞海》区别就很明显。所以,辞书中国化是从提高的意义上来说的,是要探索如何在现有编写水平的基础上提高辞书编写质量的路子。辞书中国化,具体来说,就是要走中国式辞书发展的道路。辞书中国化并不排斥学习外国辞书编写的好经验,更不拒绝吸收我国古代编写辞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3年第1期。

书的好传统,而是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勇于创新,勇于实践;走自己编写辞书的道路。就语文词典的编写来说,怎样中国化,有下面一些问题需要考虑。

(一) 继承并发扬我国辞书编纂的优良传统,开展对古代辞书的比较研究。我国的辞书编纂有悠久的历史,也是世界出版史上出版辞书最早的国家之一。汉代可以说是我国辞书编纂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几部重要的辞书都写定于汉代。如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方言》,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第一部词典《尔雅》,还有如探索词义来源的同源字典《释名》。魏晋以后,另一种类型的字典——韵书,大量产生,如《声类》、《韵集》、《切韵》、《广韵》等。这些古代字书和韵书的编写,无论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编写辞书时借鉴的宝贵的经验。语文词典中国化如果离开这个历史传统,也就失去了辞书发展的坚实基础。所以,辞书的比较研究,研究外国辞书固然是一个方面,但就汉语单语词典编写来说,开展古今辞书的比较研究,似乎更为急需。目前,我们对于我国古代辞书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特别是对于韵书从字典的角度上去研究它,更做得不够。韵书虽然是为审音辨韵的目的而编写的,主要供写作韵文的人检查押韵之用,但它的客观作用不仅仅限于语音方面。唐以后的韵书,兼起字典的作用。在收字数量上、释义完备程度上、注音规范上、资料引用上,在这些方面字书有时还不及某些韵书。例如《广韵》不仅是汉语语音史上一部重要的韵书,从辞书的角度上看,还是一部不可多得同音字典。它在规模上,“取说文、字林、玉篇所有之字而毕载之”。潘耒在《重刊古本广韵序》中说它是“意欲举天地民物之大,悉入其中。凡经史子志,九流百家,僻书隐籍,无不摭采。一公字也,而载人姓名至千有余

言；一枫字也，而蚩尤桎梏化枫，枫脂入地千年变虎魄之说，无不备录。不惟学者可以广异闻，资多识，而世本姓苑、百家谱、英贤传、续汉书、魏略、三辅决录等古书数十种，不存于今者，赖其征引，班班可见，有功于载籍亦大矣。”关于姓名的注解，音韵学者一般都认为太繁琐，看作是《广韵》的缺点，但作为字典来看，姓名注解详细一点不一定算是缺点，《现代汉语词典》坚持注姓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了《广韵》的。为了更好地继承并发扬我国古代辞书编纂的优良传统，就需要认真总结前人编写辞书的经验，开展对于汉语辞书发展规律的研究，这对于辞书中国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二）结合语文工作三大任务，编写出版社会急需的各种语文词典。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就是根据当时在全国开展推广普通话的需要对词典提出的任务。国务院发布这一指示距今已有二十多年了，《现代汉语词典》继1973年出版了“试用本”之后，已于1978年正式公开发行，那么，国务院这个任务是否算是完成了呢？作为一个具体的项目来说，应该说是完成了，但是，对于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词汇规范化这一长期的、带根本性的任务来说，就不是一部词典所能解决的。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和词典中国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最近，我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明确写有“国家推行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条文，看来1956年国务院对词典提出的任务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在这方面虽已做了一些工作，但有些问题看来并没有完全解决。建国以来出现的新词，《现汉》收录的不多；方言词收录不平衡，北方方言、吴方言多一些，其他几个大方言区收的就很少。容易懂的词收录上，

掌握标准不统一。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认为,编好综合性的语文词典,首先应该编好各种语文性的专门词典,例如编好汉语新词词典。大量新词不能进入词典,一是认为生造,不宜推广;二是认为新词需要有个检验过程,用开了才能收入词典。新词词典就可以回答什么样的词是生造,不合规范;什么样的词符合汉语造词的规律,具有生命力。编写方言词典,有助于普通话吸收方言词,丰富汉民族共同语。大量方言词不能进入词典,一是属于认识问题,认为语文词典收过多方言词,不利于推广普通话,二是认为太土,使用面窄,不宜收入词典。第一点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适当收录方言词,不仅不影响推广普通话,而是更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第二点理由,理论上是成立的,问题是土不土,使用的面窄不窄,不能凭编者的经验去判断,要根据客观的使用情况。这和编者对于某种方言的熟悉程度有关。方言词典则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它可以提供大量的方言资料供选择。我国幅员广大,方言复杂,编写全国性的方言词典目前有一定困难,可以先编一个点或一个地区的方言词典,然后再编全国性的方言词典。就提高释义水平来说,可以编写同义词典、用法词典,等等。编好这些词典,都有助于提高整个辞书编写的水平。

(三) 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编写出体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具有社会主义个性特点的辞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最近,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问题座谈会上指出:“社会科学的每一门学科几乎都有它可以直接应用的方面。为了使各门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应当努力发展一切可以直接应用的部分,用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并提高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觉悟和社会科学水平。”(《人民日报》

1982年10月15日第一版)辞书是每个人学习和工作所不可缺少的,辞书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全民族文化的提高的大事,为了使辞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辞书编纂需要出现一个新的面貌,不应当因循守旧,陈陈相因,而要不断有所创新。词典的特色,是词典的生命,一部词典没有它自己的特色,也就失去了这部词典存在的价值。辞书中国化也就是研究新中国编写的辞书怎样具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中国式的词典它的社会主义个性特点表现在哪些方面,现在要作全面的描述是有困难的。下面就词典的编纂思想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第一,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词典编纂的指导思想,坚持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新中国编写的辞书不同于旧中国的辞书,也不同于外国的辞书的重要特征,是要求既有高度的思想性又有严格的科学性。这种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编写辞书一贯遵循的原则。但在十年动乱时期,这个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的原则遭到了践踏。粉碎“四人帮”以后,肃清“左”倾流毒,批判被“四人帮”篡改了的所谓“思想性”并加以唾弃,这是拨乱反正所不可少的,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正确意义上的“思想性”,不仅不能抛弃,而且必须很好坚持。思想性,不能理解为是喊些政治口号,说些革命词句。词典中过多的政治口号,过多的革命词句只能有损于词典的科学性。词典观点必须正确,但观点正确是建立在对词义实事求是分析的基础上。词典中带有政治色彩的词,释义的观点还是应该鲜明。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国际共管”注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共同统治或管理某一地区、国家或某一国家的部分领土。帝国主义常常利用国际共管达到其侵略目的。”这里加上后一句看来是必

要的,而不是多余的。它有助于读者对于“国际共管”实质的理解,也符合客观事实,这和“四人帮”要对每一个词条表态有本质上的区别。至于一般的语文词,只要准确地注明词义就可以了。这种区别对待,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第二,加强词典的科学性,为读者提供准确可靠的知识。科学性包括的方面很多,就释义方面来说,词典必须科学地揭示词的客观意义,而不能从抽象的原则和教条出发。过去在词典编写中,对某些词的解释往往根据经典作家的一些解释,而忽视词在语言中实际的客观意义。例如有的词典“阶级”条就常常只根据列宁对“阶级”概念的阐述作定义式的注释,没有揭示“阶级”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新《辞海》除了注明“阶级”的政治概念外,还注明了它的一般意义,一是:旧指官位俸给的等级;二是:台阶。这样注释就比较全面。

第三,词典编写中各项工作的处理要从汉语的实际出发,不能照搬别的语种词典的处理方法。例如收词原则的制订,就要根据汉语词汇的特点。什么是词,在某些语言里很清楚,但在汉语里,词素、词、词组三者的界线有时很难区分,收词就不能死扣是词收、不是词不收这一条,例如“此致”,不管是词也好,是词组也好,词典都可收录。同一个概念,用词还是用词组来表达在不同的语言里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汉语里很多词组在其他语言里是词,例如英语 Sunday(星期日)、Monday(星期一)、Tuesday(星期二)、Wednesday(星期三)、Thursday(星期四)、Friday(星期五)、Saturday(星期六),都是词,英语词典收,但在汉语里,星期一至星期六很清楚是词组,汉语词典不收,一般只收“星期日”,因为它有特定的含义,看作是一个词。《现汉》注为:“星期六的下一天,一般定为

休息日。”并连写作 xīngqīrì。

第四,词典编写要考虑实用性,要多为读者的需要和使用上的方便着想。要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向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即使一时做到有困难的,如标注词性,方言词注明使用的地区等,也应作为专题研究,逐步解决。有些方面则是需要改进的,例如现在的几种汉字查字法,都不够理想,读者使用感到不便,音序查字法是很科学的,但方言区的读者使用有困难。这些问题都应该是属于辞书中国化范围内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辞书中国化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是需要大家来共同探讨的问题,以上说的一些意见很不成熟,如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语文规范标准与规范型 字词典的编写*

晁继周

语言文字规范近来成了一个热门话题。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这个问题自身的重要,人人须要关心,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广播电视部门、新闻出版单位尤其须要重视;二是由于近几年来以“规范”冠名的字典、词典多起来,从而引起人们对语文规范问题的特别关注。本文不打算一般地谈论规范问题,只想就规范型字词典如何贯彻语文规范标准的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方言歧异,语言文字规范问题十分突出。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国家有关部门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标准。字形方面,主要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年)、《简化字总表》(1964年,1986年重新发表)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年);字音方面,有《普通话异读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中国语文》1999年第1期。

词审音表》(1985年)。这些标准的制定和颁行,对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字典和词典,特别是规范型字词典,在推行语文规范标准方面是责无旁贷的。像《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下文简称《现汉》)等一些规范型字词典,无论在编写时还是在每一次修订中,都把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作为目标,自觉而认真地贯彻各项规范标准。正因为如此,广播、电视的播音,报刊、书籍的用字,常以这些权威的汉语工具书为依据。

二

规范型字词典贯彻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应该是全面的,科学的,准确的。而全面、科学、准确地贯彻规范标准是要花费一些气力,下一番研究功夫的。

要准确地贯彻语文规范标准,首先就要钻研这些标准,弄清这些标准。既要了解这些标准制定的一般原则,也要了解某字形、某字音审定的具体依据,这样在处理问题时才不会简单从事。比如“胜”字,《审音表》规定统读 shèng。胜,繁体字是“勝”,原有 shèng、shēng 两音,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意义。读 shèng 时,是战胜、胜利的意思;读 shēng 时,是能够承担或承受的意思。“胜任”、“不胜枚举”、“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中的“胜”,按传统读音都是 shēng。《审音表》规定的“统读”是针对上述情况而定的。按照这个规定,“胜任”、“不胜枚举”、“高处不胜寒”中的“胜”应读作 shèng,不应再读作 shēng。但是,汉字中还有另一个“胜”,音 shēng,是一种有机化合物,由氨基酸脱水而成,

也叫肱。这个“胜”是后起字，不是“勝”的简化字，《审音表》规定的“统读”与它了无干涉。主持制定《审音表》的已故徐世荣先生说：“作为一种有机化合物讲的‘胜’必念平声 shēng，《审音表》未及照顾。”（《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说明》）如果不了解《审音表》的精神，在词典中把有机化合物的“胜”也注成 shèng，或由于该音与“统读”不合而把“一种有机化合物”的意义也取消，都是不妥的。

又比如“澹”字。“澹”有 dàn 和 tán 两个音。读 dàn 时，有安定、平静的意思（澹乎若深渊之静）；有水波起伏的意思（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有淡薄的意思（澹泊，澹然），在这个意义上，与“淡”相通。读 tán 时，组成复姓“澹台”。《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把“澹”作为“淡”的异体字淘汰了，这显然是对 dàn 音而言的，“澹台”（tántái）这个复姓还应存在，自不待言。1988年3月25日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在《关于发布〈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联合通知》中确定“澹”等15个字为规范字，不再作为淘汰的异体字，这当然是对 dàn 音而言的。规范型字词典如果仍坚持把“澹”当作“淡”的异体字排斥在规范字之外，就不妥当了。

三

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既要抱学习、贯彻的态度，又要抱探究、研讨的态度。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具有法规的性质，它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些标准又不同于别的法规。首先，由于它们与亿万人民群众每时每刻的交际活动发生联系，只能引导，不能动辄加以责罚，因而在执行中不能不带有较大的宽容度。其次，这些标准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它们的制定过程本

身就是学术研讨的过程,在执行中也应该允许人们评论得失。

以《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例。这个表制定于1955年,当时汉字简化、异体字整理都在进行,但主导思想却是汉字彻底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在这个主导思想影响下,简化字中同音替代式较多(如“后”代“後”,“干”同代“乾”和“幹”、“榦”,“发”同代“發”和“髮”);异体字整理中,有些意义不完全相同的字也简单地作为异体字对待了。“澹”在安定、平静以及水波起伏等意义上不同于“淡”,“脩”在干肉、引申为送给教师的薪金的意义上不同于“修”,“淼”在形容水大的意义上不同于“渺”,都分别被当作“淡”、“修”、“渺”的异体字淘汰了。对《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处理,学术界向有不同认识,字词典在这些字的处理上也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现代汉语词典》中“澹”、“脩”、“淼”都立了条,作出注解,也用不同方式指出它们与“淡”、“修”、“渺”的关系。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名称中既然有“第一批”三个字,就说明这一表之外还有许多异体字需要继续整理,还应该有新的“整理表”发表。但遗憾的是,“第一批”之后,异体字整理工作就停止了。如何对待《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之外的异体字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里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做法。一种做法是凡是《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未整理过的异体字,一律当规范字看待,单立字头,注为“同某字”,或再加上引导性的话“现在通常写作某字”。另一种做法是对表外异体字再做整理,把一部分音义全同的异体字置于大字头后面的括号内,使它们与《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整理过的异体字一样处于停止使用的地位,如《现汉》对“捱”(“挨 ái”的异体)、“搨”(“搨”的异体)就是这样处理的。吕叔湘先生在为《现汉》制订的《编写细则》中就曾规定:“每字只有一个正体,其余都是异

体。”这样做有利于减轻汉字使用者的负担,避免用字混乱。以“沈”、“沉”二字为例。“沈”原有 shěn、chén 二音,“沉”只有 chén 一音,在读 chén 时,“沈”、“沉”是异体字关系。在近几十年的使用中,“沈”和“沉”已有明确分工,“沈”读 shěn,用于姓氏,又用于地名“沈阳”,还作汁讲(墨沈未干);“沉”读 chén,即沉浮、沉重的“沉”。如果只因为《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未作整理,字词典为“沈”立 chén 音,注为“同‘沉’”,读者据此把“沉重”写作“沈重”,“沉着”写作“沈着”,到底算正确还是算错误,谁能说得清楚?而像《现汉》那样,在读 chén 时,把“沈”看作是“沉”的异体字而置于停止使用的位置,则较为妥当。

四

语言文字规范的基本原则是约定俗成。规范标准只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相一致,才能得以顺利推行。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同时也要考虑到符合语音演变规律和有利于全国广大地区人民学习普通话的原则。有些词来源于以北京为核心的北方地区,而规范标准又不合于北京话的实际情况,这样的标准推行起来就会遇到困难。比如“作死”的“作”,北京话读作阴平 zuō;“作料”的“作”,北京话读作阳平 zuó。按照《审音表》的规定,“作”除在“作坊”一词中读 zuō 外,统读 zuò。这一规定在“作死”、“作料”等词中就不合于语言实际了。这就给规范型字词典的编纂者出了难题:执行《审音表》就不符合语言实际,不执行又会被指责“不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规范型字词典应该体现“弹性原则”——按《审音表》注音,同时用加括注的方式或其他方式把口语

中的实际读音告诉给读者。这样做不应视为对规范标准的背离，而应看作是对规范标准的补充。

规范型字词典要贯彻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然而，词典的任务不是简单地解说文件，它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学术含量要大得多。词典编纂的过程，既是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贯彻的过程，也是对这些标准的正确性全面检验的过程。对规范标准个别不完善的地方，规范型字词典应该取什么态度？是绝对依从，还是适当地体现字词典编纂者的学术见解？我们认为应取后一种态度。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规范标准也不应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发表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1985 年经过修订重新发表时，就改动了许多内容。如“迹”，《初稿》规定读 jī，《审音表》审定改读 jì；荨麻疹的“荨”，《初稿》规定读 qián，《审音表》审定改读 xún。字音如此，字形的审定也如此。1986 年经过修订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和 1988 年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就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作为异体字淘汰的 26 个字重新确认为规范字。值得注意的是，这 26 个被淘汰的异体字在某些字词典（如《现汉》）中一直未被“淘汰”，足见字词典编纂者在经过深入的学术研究后，在字词典中反映一下学者的意见是有必要的。《审音表》中对“荫”、“螫”两字读音的处理，就曾引起学术界的不同意见。《审音表》规定“荫”字统读 yìn，“树荫”、“林荫道”应写作“树阴”、“林阴道”。“荫”字自古就有阴平音和树阴义，一直沿用到现代。北京有一条以“军民共建”闻名的街道，叫柳荫街，后来又建了柳荫公园；山东济南则有个槐荫区。《审音表》公布十几年了，上述地名中的“荫”字均未见改写成“阴”，书报上“绿树成荫”的写法也不少见。可见《审音表》对“荫”字音、义的规定与人民群众的使用习惯

有距离,而且实际上已涉及字形,超出审音的范围了。再看“螫”字,《审音表》规定“文读 shì,语读 zhē”。螫,《广韵》释为“虫行毒”,施隻切,音 shì。《广韵》另有“蜇”字,释为“螫也”,陟列切,音 zhē。可见,“螫”与“蜇”古来一直是义同而音不同的两个字。现代作品中有把“蜇”(zhē)写成“螫”的,如杨朔的《荔枝蜜》中“蜜蜂从来不螫人”一句。“螫”若读成 shì,会与“是”相混,闹出笑话,只能读 zhē。20世纪90年代后中学课本中《荔枝蜜》一文“螫”已改成“蜇”,这是极妥当的。《审音表》把“螫”字读音分化为文读和语读两个,而语读音 zhē 早已有“蜇”字存在,这就形成了新的异体字。从字音上看,“螫”字一音变两音,也不符合语音规范的一般原则。像“荫”、“螫”等字处理上明显存在的问题,规范型字词典还是应该通过适当的形式表示一下态度,这既是在学术原则问题上负责任的表现,也可以由此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在重新修订规范标准时参考。这样的地方毕竟是极个别的,字词典的变通处理并不影响对规范标准的全面贯彻和遵行。

语词琐记*

孙德宣

语词和它的意义是发展变化的,新词新义不断产生,旧词旧义逐渐消失。有些词的本义、引申义、转义、喻义、古义、今义虽然错综复杂,却有线索可寻。有些是字形或读音相同,但从来源上看,了无关涉,这只能看作是同形词、同音词或者说有的是词,有的不是词。对本民族语言某些词语的通用义,一般人还比较熟悉,对它的古义往往很生疏,须借助于辞书才能明了。但现有的汉语辞书,由于编者掌握的资料有限,注释常偏而不全,并多谬误,质疑问难,令人每感不解决问题。暇日就通行辞书及辨析词义的论述中,涉及词语注释之未详或未尽确切者,搜集例证,拾遗补阙,略记数则。囿于见闻,难免纰缪,望读者予以指正。

参差 王镆同志说:“参差,有‘几乎’、‘大概’、‘大约’等义,表示估量的副词,与通常用的形容词,作‘不齐貌’解者不同。”(见《诗词曲语辞举例》,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按所论极是,但“参差”尚有“乖违”、“耽误”、“差错”等义,皆其通用义“不齐”、“不一致”之引申,注释家多未述及。其用为“乖违”、“耽误”之义者例如: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中国语文》1979年第2期。

每常同坐卧，不省便参差。_{△△}（元稹《代九九》诗）

向来惶惑，实畏参差。_{△△}（张文成《游仙窟》）

又数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适以亲情事言于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许之’模样云云，恐是参差也。”_{△△}仙客闻之，心气俱丧，达旦不寐，恐舅氏之见弃也。（《太平广记》卷486，引薛调《无双传》）

佳期，谁料久参差。_{△△}（秦观《一丛花》）

那知风雨，此事又参差，成怨恨，独凄惶，清泪潸然洒。_{△△}
（陈东《暮山溪·元宵》）

用为“差错”之义者例如：

处判针药，无得参差。_{△△}（孙思邈《千金方·大医精诚》）

词头 令语“词头”指“词之前缀”，近代汉语则指“命某官任某职之谕旨，中书舍人等官所据以起草除授诏书者”。宋代史籍屡见，例如：

中书舍人刘珣奏：“准中书省送到词头一道。_{△△}中书舍人安扶奏：‘准词头——李纲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李纲轻率寡谋，强执自任，前后败军覆将非一。所有词头，未敢具草’。”_{△△}奉圣旨，令以下舍人行下者。（《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中帙30》）

一日，上忽于崇礼处取秦桧麻制。崇礼在翰苑，初未承词头，_△莫知所以。俄遣一中使来催，崇礼不得已，赴殿侧祇候，奏请词头。_{△△}（《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51》）

中书在朝堂西，是为政事堂，其属有舍人，……舍人六员，与学士掌内外制。朝廷有除拜，中书赴院纳词头。_{△△}其大除拜，

亦有宰相召舍人面受词头者。（《宋会要辑稿·职官一》
2337页）

若政事有差失，委给事中封驳；若除有不当，委中书舍人
封还词头。（同上书 2343页）

此义有关封建王朝典制，中小词典可不注出；历史性汉语大词
典如不收录，则为缺失。

淡泞(zhù) 也作“澹泞”，有“水清而深”一义。《集韵》语韵：
“泞，澄也。丈吕切。”木华《海赋》：“泱泱澹泞，腾倾赴势。”李善注：
“澹泞，澄深也。”白居易《送客回晚兴》诗：“参差乱山出，澹泞平江
净。”所用“澹泞”义同木华《海赋》的“澹泞”。宋词中“淡泞”习见，
也作“澹泞(泞)”，而义有别。有用来形容花卉、容饰之素净、淡雅
或雅致的，例如：

天然淡泞好精神，洗尽严妆方见媚。（柳永《木兰花·杏
花》）

梅好惟嫌淡泞，天教薄与胭脂。（王安石《西江月·红
梅》）

国艳天葩，真澹泞，雪肌清瘦。（吴师孟《蜡梅香》）

又正是、梅初淡泞，禽未绵蛮。（晁补之《凤凰台上忆吹
箫》）

当日岭头相见处，玉骨冰肌元淡泞。（毛滂《玉楼春·红
梅》）

冰溪疏影竹边香，翠袖天寒炯暮云，雪里精神澹泞人。
（张元干《豆叶黄》）

红杏白梨肌理，时样新妆淡泞。（史浩《如梦令·饮妇人

酒》)

淡泞轻盈,谁付与、弄粉调朱纤手。(辛弃疾《念奴娇·赠妓善作墨梅》)

有用“淡泞”形容景物色彩之浅淡、暗淡的,例如:

潇洒太湖岸,淡泞洞庭山。(苏舜钦《水调歌头·沧浪亭》)

疏雨才收淡泞天,微云绽处月婵娟。(杜安世《渔家傲》)

楼外轻阴春澹泞,数点杏梢寒食雨。(张元干《天仙子》)

又,“淡注”也常见于宋词,乍看似跟“淡泞”是一个词,实则各不相干。“淡泞”是并列结构的词,“淡注”是偏正结构,结合较松,不一定是词。“注”、“泞”声清浊不同;“泞”为“澄”义,“注”有“附着”一义。“淡注”是说“淡淡地着上”或“淡着(色)”,例如:

翠叶银丝簪未利,樱桃澹注香唇。(张孝祥《临江仙》)

胭脂淡注官妆雅,似文君、犹带春醒。(赵长卿《一丛花·杏花》)

嫩黄染就蜂须巧,香压团枝。淡注仙衣。方士临门未起时。(李之仪《丑奴儿·谢人寄腊梅》)

“樱桃澹注香唇”是说像樱桃那样红艳艳的口脂圆点淡着于香唇。白居易诗“樱桃樊素口”,用樱桃形象地描写樊素的口小而红,张氏此词则用樱桃象征唇边红艳的口脂圆点,用各有当。“胭脂淡注”是说像淡淡地搽着胭脂。“淡注仙衣”是说淡淡地着上仙衣。

“淡注”不同于“淡泞”,还有个旁证,即唐宋词中有“深注”、“浅注”、“轻注”等语。“注”也作“著”。例如:

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李煜《一斛珠》)

过雨花容杂笑啼，淡妆深注半开时。（王之道《浣溪沙·和张文伯海棠》）

一一淡匀深注，总堪怜。（管鉴《虞美人·送杏花与陆仲虚》）

铅华淡薄，轻匀桃脸，深注樱唇。（赵师侠《朝中措》）

玉人好把新妆样，淡画眉儿浅注唇。（辛弃疾《鹧鸪天》）

淡妆娇面，轻注朱唇，一朵梅花。（辛弃疾《眼儿媚·妓》）

江南春早，春到南枝花更好，不比寻常，深著胭脂学弄妆。（赵师宰《减字木兰花》）

可见“淡注”、“浅注”、“轻注”是跟“深注”相对的说法，“淡注”不同于“淡泞”，至为明显。

荡(盪) 在古汉语中有“冲”、“冲冒”之义。例如：

《玄中记》曰：汉桓帝时，出游河上，忽有一青牛从河中出，直走荡桓帝边人皆走。（《太平御览》卷 239）

当日并州时三门各有一秃师荡出，遍执不能禁。（《太平广记》卷 91，“阿秃师条”）

逆风荡雨行，面干顶额湿。（《太平广记》卷 257，“伧人”条）

有的词典把“荡”的这类用法释为“冲杀”，不确。

将 古汉语有时用作表示“大概”、“大约”的副词。例如：

介子推不出，晋文公焚林求之，终抱木而死。公抚木哀嗟，伐木制屐，每怀割股之恩，辄潸然流涕视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言，将起于此。（引自《余嘉锡论学杂著·殷芸小说辑证》上册，295 页）

庐山上有康王谷，巅有一城，号为钊城。……传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爱奇好异，巡历名山，不远而至。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弓、弩、金之属，知非常人之所处也。而山有“康王”之号，城又以“钊”为称，斯言将_△有征。（《述异记》，引自鲁迅《古小说钩沉》，137页）

刘淇《助字辨略》、孙经世《经传释词补》“将”字条俱有“犹殆也”一义，甚是，更引中古例证，以明沿用之广。

女真 古称得道而长生不死的人为真人。《史记·始皇本纪》：“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说文》：“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真人即仙人，因称女仙为女真。《太平广记》卷67“崔少玄”条：“往往有女真_{△△}，或二或四，衣长绡衣，作左鬢髻，周身光明，烛耀如昼，来诣其室。”此“女真”乃“女仙”，非女真族。

手力 古代指“差役”或“仆役”。唐李肇《翰林志》：“度支月给手力_{△△}资四人，人钱三千五百。”又《太平广记》卷355“刘鹭”条：“鹭_{△△}时为县手力_{△△}，后数年，因事至都。”此指差役。《太平广记》卷131“僧昙欢”条：“欢乃多将手力_{△△}，自往伺之。”此指仆役。

同情 今语“同情”指“对于别人的遭遇在感情上发生共鸣”或“对于别人的行动表示赞成”。古汉语有时用来表示“同案情”、“同作案”。例如：

大历中，太原偷马贼诬一王孝廉_{△△}同情。拷掠旬日，苦极强首。推吏疑其冤，未即具狱。（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7）
此义虽僻，编汉语大词典当收录之。

委曲 通常指“曲折”、“弯曲”。古汉语也指事情的底细和原

委。《古文苑·杨太尉夫人袁氏答书》：“见公与太尉书，具知委曲。”也指机密文书之类。例如：

（吕）用之比来频启令公，欲因此相图，已有委曲在张尚书所，宜备之！（《通鉴·卷257·僖宗光启三年》胡三省注：“当时机密文书谓之委曲。”）

遣所部击讨副使许戡，赍骈委曲及用之誓状并酒馔出劳师铎。（同上书同卷。胡三省注：“委曲即骈手札也。”）

唐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12有委曲十二首，即崔氏佐幕时起草的文书。有的词典此义释为“批示”，未尽确，不如从胡注“机密文书”或注“文书”。

以来 古“以”、“已”通用。“以来”也作“已来”，多用来表示从过去某时直到现在的一段时间。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穷奇极妙，栋宇已来，未之有兮。”古汉语“以来”（已来）也用在数词或数量词后表示较某整数或某整数数量略多的概数。例如：

即唤香儿取酒。俄尔中间，擎一大钵，可受三升已来。（张文成《游仙窟》）

其夕，梦一少年，可二十已来，衣白练衣，仗一剑。（《太平广记》卷352，原注：“出《潇湘录》”）

其家老人……忽以杖击破燕巢，随手有一白凤雏，长三尺以来，自巢而堕，未及于地，即掀然出户，望西南冲天而去。（方回《虚谷闲抄》，据《说郛》本）

此义语法书和词典尚少述及，故论列之。

成语之释义与考订*

——读《汉语成语词典》小议

刘洁修

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汉语成语词典》(以下简称《成语词典》),已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了。这本《成语词典》所收条目多达五千五百条,而且大都征引出处,因而很受读者欢迎。

通读《成语词典》,感觉优长很多,但是,如果深入探讨,认真推敲和比勘,仍会发现不少的条目在释义、源流和征引等方面,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问题。为了提高词书的质量,推动学术研究,下面仅就管见,谈点个人见解,以就正于《成语词典》的编者以及广大读者。为了节省篇幅,每个问题之下限举一例,以见一斑。

一 成语释义之误往往系于一字

不可一世 《成语词典》释为:“不能同他一起生活在同一世界上。形容……”这是把“可”字解作“能”了。这样解释是与此语的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中国语文》1979年第3期,署名梁之抑。

原始和沿用情况相悖的。例如：

(1)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侯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五）

(2)不佞懒如嵇，狂如阮，慢如长卿，迂如元稹，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汤显祖《艳异编序》，见《汤显祖集诗文集卷五十补遗》）

上二例均带名词宾语，故“可”字不含“能”的意思。从上面两个例子看，均可以得出“可”是“肯”义，亦即“肯定，认可，称许”的意思。

“可”和“肯”是同义，故可作并列结构“肯可”。例如：

……未尝有所肯可，独称君为能。（《欧阳文忠公集·司封员外郎许公行状》）

既然“可”与“肯”完全同义，“不可一世”也就可以作“不肯一世”。例如：

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往时，苏才翁笔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称文正公书与《乐毅论》同法。（黄庭坚《山谷题跋·跋范文正公帖》）

这个例子更有力地证实“可”字是不能用“能”字来解释的。

二 训释分歧兼及音读

间不容发 《成语词典》释为：“间：空隙，隔开。距离极近，中间不能放进一根头发。比喻情势危急到了极点。”“间”字注音“jiàn”，并加“〔辨误〕‘间’不能念成 jiān。”单字“间”释为“空隙，隔开”，而串解却又用“中间”和“距离”，岂非自相抵牾？这个成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间”注音为“jiān”，那末，究竟应该读去声还是

读阴平呢？下面举几个例子加以检验。

(1)律、麻迭相治也，其间不容一发。（《大戴礼记·曾子天圆》）

(2)将军毋失时，时间不容息。（《史记·张耳陈馥列传》，司马贞索隐：以言举事不可失时，时几之迅速，其间不容一息顷也。）

(3)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留侯论》）

(4)先生聪明才能，过人远甚，而刺口论世，立是立非，其间不容豪发。（《宋史·儒林二·王向传》）

(5)海道幽险，死生之间，曾不容发。（《苏东坡集后集·广州资福寺罗汉阁碑》）

(6)危疑之间，一发不容。（《陈亮集·祭章德文侍郎文》）

例(1)至(4)有“其间”(例(2)见索隐文)；例(5)(6)有“之间”；例(2)正文是“时间”。(虽然“息”与“发”意思不同，但作为整个成语，其结构相同，含义也近似；“发”除了可作“息”外，还可以作“瞬、瞬息的古字、缕、稊、针”等等，意思也都相同或相近。)无论“时间”或“其间”，“间”都只能读阴平，而不能读去声。显然，“间不容发”的“间”字应当是“中间”的意思，释为“空隙，隔开”是不恰当的。

三 古今字义有别

差强人意 这个成语中的“差”字，既有今义(稍微，大致，比较)，又有古义(甚，颇，殊)。作为“甚”义，张相在《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二“差(二)”中剖析甚详，已然明确指出《后汉书·吴汉传》中

的“差强人意”，“乃甚强人意之谓，非稍强人意之谓也。”然而，《成语词典》仍释为：“差：稍微，大致……原意为还算能振奋人的意志。现在表示还能够使人满意。”（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这是误以今义为古义。

“差”本与“甚，颇，殊”等为同义，故亦可说“甚强人意”，“颇强人意”，“殊强人意”。后来逐渐用“差强人意”专指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就与“甚强人意”等有所分工。例如：

(1)明代无一工词者，差强人意，不过一陈人中而已。（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2)晏、欧著名一时，然并无甚强人意处。（同上）

(3)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鲁迅书信集·一九一九·一七·许寿裳》）

(4)二公独径还，乡试殊强人意。（《朱子语类》卷一一四）

例(1)之“差”是“稍微，比较”的意思，有前后文的衬托，不会误解为古义“甚”。

四 褒贬之意不宜轻断

有恃无恐 《成语词典》在注释中说：“含贬义。”这个断语下得未免有点轻率，因为即以所征引的《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原文来看，“齐侯曰：‘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展喜）对曰：‘恃先王之命’。”这里显然不存在什么贬义，后来使用这个成语，也不一定用于贬义。例如：

(1)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苏东坡集·祭欧阳文忠公文》）

(2)两京大贾,往往喜与邢〔德〕俱,途中恃以无恐。(《聊斋志异·老饕》)

(3)……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毛泽东选集·井冈山的斗争》)

这三个例子都是用在积极方面的,根本不含贬义。

五 征引出处宜考史实

抛砖引玉 《成语词典》在引《景德传灯录》之前说:“唐朝诗人常建听说赵嘏(gǔ)来到苏州,断定他一定要去游灵岩寺,就先在寺前写了两句诗,赵嘏看到以后,便接在后面加了两句,完成一首。常建写的不如赵嘏的好,因此说常建这种作法是‘抛砖引玉’。”看了这段文字,满以为常建和赵嘏就如同李白和杜甫一样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其实不然,常建是开元十五年(727)进士,而赵嘏则是会昌二年(842)进士,赵嘏晚于常建百余年,赵嘏降世之际,常建早已下世,怎么可能“听说”赵嘏要来苏州,并“断定”他要游灵岩寺呢?显而易见,所谓常建抛砖引来赵嘏之玉的故事纯属无稽之谈。

常建“抛砖引玉”的故事,似作俑于《谈徵》,而老《辞源》承其讹。《谈徵》一书有嘉庆二十年(1815)柯古堂刊本,编者佚名。后来程登吉编《幼学求源》(道光丁未年刊本),在卷二十四“抛砖引玉”条,即据《谈徵》引述。然而程登吉比较慎重,在引文末尾加了一段按语,谓为荒谬不足置信。对此类史实问题,应该持特别慎重的态度。

六 征引出处应溯本源

磨杵成针 《成语词典》沿袭老《辞源》《辞海》征引《潜确类书》。类书是分门别类汇总前人的文字材料,除非是佚佚的古籍或现存古籍的佚文,一般不宜作为本源加以征引。《潜确类书》是明代陈仁锡编纂的。比《潜确类书》部头更大的《山堂肆考》,编者是彭大翼,与陈仁锡同为万历年间人。在《山堂肆考》第二十四卷中亦录有李白遇媪磨针的故事。显然,《潜确类书》和《山堂肆考》都不是此语之本源所出。

早在宋代祝穆《文輿胜览》卷五十三“磨针溪”就记述了磨杵成针的故事。这条材料并不难于发现,在清代王琦注《李太白集》的附录之中和顾张思编《土风录》的卷十三“铁孔(音 chuǎng)磨如针”条下,均注明引自《方輿胜览》。

应该承认,很多成语是无源可溯的。征引出处常遇到的是时代早晚的问题。即以“班门弄斧”为例,《成语词典》除引柳宗元《王氏伯仲唱和诗序》外,兼引了关汉卿的《金线池》。兼引不过是举例性质,时代的早晚并不显得突出。但在《中国语文》1978年第4期所刊之《“班门弄斧”考》一文里,这个问题就显得突出了。此文作者说:“四字成文的……当推关汉卿《金线池·楔子》为最早。”这就不免《颜氏家训·勉学》中所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之谓。四字成文比关文更早的见于《欧阳永叔集·书简卷六·与梅圣俞》:“昨在真定,有诗七八首,今录去,班门弄斧,可笑可笑。”这比关文要早二百余年。

七 引证古书应扣紧字面

一叶知秋 《成语词典》引《淮南子·说山(训)》：“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这段引文缺少一个很重要的“秋”字，于是不得不兼引宋代唐庚《文录》：“唐人有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虽然扣紧了字面，毕竟绕了点弯子。其实《淮南子·说山训》的引文两见于《太平御览》，一见于卷之十七，作“见一叶之落，知岁之将暮”，比今本多了一个“之”字，少了一个“而”字；再见于卷之二十四，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就明用“秋”字。由此可见，在一些类书中仍有未被发现而加以利用的宝贵材料，有待我们去开发搜集。

八 成语衍变应说明原始

一蟹不如一蟹 《成语词典》转引“清·翟灏《通俗编》引宋·无名氏《圣宋掇遗》。《圣宋掇遗》今已亡佚，无从查证原书，但其中的片段文字，还可以在《粤雅堂丛书》三编和《十万卷楼丛书》三编的《续谈助》中见到，共得十来条，惟不见“一蟹不如一蟹”。

原来《圣宋掇遗》的原文不是“一蟹不如一蟹”，而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有两种材料可资佐证：其一，曾慥《类说》卷四十四引《圣宋掇遗》，小标题是“一代不如一代”，引文之末句是“真所谓一代不如一代也。”其二，戴埴《鼠璞》（据《百川学海》本）上说：“世传《艾子》为坡仙所作，皆一时戏语，亦有所本。其说一蟹不如一蟹，出《圣宋掇遗》……穀曰：‘真所谓一代不如一代也’。”

曾慥和戴埴都是南宋人，他们都极有可能直接见到《圣宋掇遗》原书，曾、戴的引文完全一致即可为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鼠璞》中提到了伪托苏轼的《艾子杂说》，强调是“一时戏语”，明确指出“一蟹不如一蟹”出自《圣宋掇遗》，但在引文中却是“一代不如一代”，足证《圣宋掇遗》原本作“一代不如一代”无疑。

其次，宋代王铨（君玉）《国老谈苑》卷二载陶穀奉使吴越事，亦作“一代不如一代”；宋代龔藏主辑《古尊宿语录》卷十三载南唐元宗时人赵州真际禅师的语录，亦有“一代不如一代”之语，均可作《圣宋掇遗》原本作“一代不如一代”的旁证。只是到后来纂辑的一些丛钞，诸如冯梦龙《古今谭概·酬嘲部》、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委巷丛谈》、潘永因《宋稗类钞·诙谐》、李调元《全五代诗》（卷十五）等等，才千篇一律地作“一蟹不如一蟹”。

复次，《圣宋掇遗》的作者，翟灏失考而署无名氏，后人亦相沿而不改。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先谦以汪刻衢本为底本的校刊本）卷六著录《圣宋掇遗》，即题欧阳靖撰；另据袁本，则题作余靖撰。无论作者叫欧阳靖也好，叫余靖也好，总之是一位单名“靖”的人，宋人记宋人，当是可信的。

九 引证出于转引须查原书

见猎心喜 《成语词典》转引“清·郑志鸿《常语寻源》卷下引魏·曹丕《典论自序》”。

曹丕的《典论自叙》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三国志》各种版本，均找不到“见猎心喜”四个字。

《常语寻源》是一本不足为据的语源书，虽也有一些材料可供

参考,但所寻之源多不可靠。如“儿女情长”《常语寻源》丁册引所谓《后汉书》:“袁绍至荆州,与刘表谋共起兵讨董卓,表以爱子病,无心军国大事,议久不决。绍叹曰:‘景升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段话说得活龙活现,然而今本《后汉书》以及袁宏的《后汉纪》等书均查不出来。又如“顽石点头”一语出于《莲社高贤传》,《常语寻源》壬册“顽石尚知点头”条却说出自《高僧传》。在各种版本的《高僧传》中均不见“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记载。其他各种谬误也比比皆是。此等第二手材料,不经查核,不可置信,以免谬种流传。

“见猎心喜”一语实出于宋代的程颢。老《辞源》和《辞海》均引《近思录》,后来亦有改引《二程全书·遗书七》者,文字完全相同:“明道(程颢)年十六七时,好田猎。十二年,暮归,在田野间见田猎者,不觉有喜心。”

这段文字在意思的表达上不够显豁明确。校以《周濂溪集·卷九·周子遗事》(据《正谊堂全书》本):“〔明道先生〕又曰:‘吾十六七时,好田猎。既而自谓已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暮归,在田间见猎者,不觉有喜心。因见果知未也。”可以看出,它比《近思录》、《二程全书》多出的文字,与“见猎心喜”一语都有直接密切关系,对深入理解这个成语的含义很有帮助,绝非可有可无。“十二年”就不如“后十二年”的意思明白;“既而自谓已无此好”,是“见猎者不觉有喜心”之所以为故态复萌,周敦颐的一段话也很有衬托作用。两相比勘,显然是《周濂溪集》中的文字意思完整而明确。乃知征引古书不仅要辨别真伪,还要择优而从。

方言词典编写的理论与实践*

闵家骥

一 编写方言词典的意义

方言是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方言是全民族语言的分支,是共同语的一部分。方言词典的编写有利于促进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丰富民族共同语,方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来源。过去由于对方言词汇缺少整理,见于书面的方言词语在字形、词形上十分混乱,口语里使用的词大多是有音无字,如吴方言里的[t'iŋ³⁴]留;剩:“小菜[t'iŋ³⁴]眼拨我吃。”[hɿ³⁴]许诺;答应:“伊[hɿ³⁴]我明朝去看电影。”在记录方言时只能记音,不能记字,这不利于普通话的吸收,如果经过整理,进入方言词典,就便于学习和使用,为方言词进入普通话增加机会。

编写方言词典,可以帮助读者阅读作品时释疑解难。阅读方言作品需要借助于方言词典,就是阅读用普通话写作的作品,方言词典也是不可缺少的。鲁迅的作品被誉为白话文著作典范,而鲁迅作品中就用了不少方言词语。这些方言词语,有些可以在一般语文词典里查到,如“荐头”(介绍佣工为业的人)、“全家福”(一家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90年第4期。

大小合拍的相片)、“作兴”(可能、也许)、“倒灶”(倒霉)等,有些则需要查方言词典才能解决,如“这分明是无常少爷了,大家都叫他阿领”(《朝花夕拾·无常》)中的“阿领”(妇女再嫁时带去的前夫的女儿)、“他那里有好声好气呵,开口‘贱胎’,闭口‘娘杀’”(《彷徨·离婚》)中的“贱胎”、“娘杀”(骂人的话)、“但看看记载,还不过是‘曲辫子’、‘阿木林’”(《准风月谈·“抄靶子”》)中的“曲辫子”(称初到大城市对城市生活缺乏经验的人)、“阿木林”(呆头呆脑或土里土气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请你不要见气”(《华盖集·牺牲谟》)中的“见气”(生气)。作家们重视方言词语的“提炼”、“超生”,使这些方言词语增添了生命力,但它们毕竟还是方言,一般语文词典不收,读者只能求助于方言词典。

编写方言词典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方言词典能帮助方言区的人们了解方言与普通话的异同,了解什么是方言,什么是普通话。如日头、热头、前天爷、老爷儿、佛爷儿、阳婆儿,在普通话里应该说太阳。波棱盖、波罗盖,在普通话里应该说膝盖。另外还为方言区的人们提供普通话与方言的对照读音,《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就属于这种性质的词典,这种工作有利于学习和推广普通话,也便于方言区内人们的相互交际。

方言词典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书,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方言词典的编写,有助于汉语史的研究。古代汉语、近代汉语中的一些音义无从查考的字、词,有些是古代的方言字,我们可以通过方言词典的编写,经过发掘与整理而明了其意义。方言词典的编写,也有利于汉语方言研究的开展,通过方言词典的编写可以逐步摸清汉语方言词汇的分布情况,通过对本字的考证,减少有音无字的现象,字的写法也可逐步得到规范。例如吴方言里的第三人称代

词读[i⁵³]或[hi¹³],但书面上一律写作伊。伊是清声字,记浊声时用的“夷”成了记音字,其实夷不应看作是记音字,现在《简明吴方言词典》收了这个字,承认了它的地位。

我国方言词典的编写有着悠久的历史,西汉扬雄编写的《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距今已有近 2000 年的历史。继《方言》之后有清代杭世骏的《续方言》、程际盛的《续方言补正》等,另有明代李实的《蜀语》、清代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近人章炳麟的《新方言》等。前人为我们在方言词典的编写上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方言著作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方言词典,这些经验对于今天编写方言词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并不完全适用。编写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方言词典还需要进一步摸索和探讨。近几年来陆续出版了一批有一定质量的方言词典,都是这方面的一种新尝试,为今后编写方言词典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二 关于收词的范围

方言词典主要记录方言词汇。确定收词范围首先要搞清什么是方言词。顾名思义,某一种方言里的词汇就是方言词,但构成某一方言词汇系统的方言词并不全部为这种方言所独有,其中不少词是几种方言所共有的,这就使方言词汇系统复杂化,涉及某一个具体词,看法更为分歧,试以《方言词例释》为例,它所收录的方言词,如:安生、熬煎、熬夜、白面、摆弄、比画、病号、彩号、凑手、出洋相、搭讪、打掩护、钉梢、哆嗦等,《现代汉语词典》都不认为是方言。对于什么是方言词,目前在划分界限上有以下几种认识:

1. 普通话里不说的是方言词；
2. 在多数方言区说的就不是方言词而是普通话；
3. 虽在多数方言区说，但只要普通话里不说的仍应看作是方言词。

我们认为，普通话里不说的并不都是方言，还可能是来不及进入普通话的新词，或者是生造词等。所以，第一种观点不完全妥当，定义欠严密。再者，判断普通话里说不说，大多是凭经验和语感，没有严格的标准。第二、第三两种说法前提都是承认这些词在方言口语里存在，分歧只在于算不算方言词。

这些认识上的分歧，说明普通话和方言词的界线有时并不泾渭分明，如老爷（外祖父）、姥姥（外祖母）和外公、外婆，一般认为前者是普通话，后者是方言，然而从地区上看，说外公、外婆的地区比说老爷、姥姥的地区大得多，说老爷、姥姥的限于北方部分地区，说外公、外婆的则南方北方都有。普通话与方言有紧密联系，极大部分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只是语音上有差异，所以不会说普通话的方言区的人，同样能看懂用普通话写的作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与作为基础方言的北方话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不可能是封闭式的。尤其汉语的书写符号——方块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虽各地方音不同，但通过汉字仍可进行交际，这就加强了词汇的渗透力。大批普通话词语进入方言，方言中也有不少词被普通话吸收。

了解了普通话与方言的共同性及其错综复杂的一面，对于方言词汇的描述就应该从实际出发。我们认为，下面列出的六种词是方言词：

① 只在少数地区使用的词,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特殊词汇,无疑是方言。如吴方言里的“阿拉”(我)、“白相”(游玩)、“肮三”(使人讨厌;差劲)、“拆烂污”(不负责任把事情搞坏了),粤方言里的“奘”(瘦小)、冇(没有)、靚(漂亮;好看),福州话里的“拍电话”(打电话)、“赶圩”(赶集)等等。

② 在方言地区使用的范围虽广,但普通话里不说的词,应看作是方言。如“差池”(差错,见于北方话、粤方言)、“长年”(长工,见于吴方言、四川方言、闽方言)、“车大炮”(吹牛,见于粤方言、客家方言)、“吃零碎”(吃零食,见于吴方言、赣方言)、“错非”(除非,见于北京方言、天津方言、河北方言)、“达”(父亲,见于山东方言、河南方言、陕西方言)、“大虫”(老虎,见于粤方言、河北方言、山东方言)、“电戏”(电影,见于厦门方言、潮州方言)、“包打听”(巡捕房中侦缉人员,见于吴方言、武汉方言、安庆方言)。

③ 在普通话和方言里都说,但意义和用法不同或另有方言义的,应看作是方言词。如“地板”,普通话的意思是“室内铺在地面上的木板”,在山西方言里是土地、田地的意思。又如“吃”在普通话里指把食物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后咽下去,但在吴方言、赣方言、桂林方言里有吸、喝的意思。再如“白话”在普通话里指白话文的白话,跟“文言”相对,在吴方言里是谈话或闲谈的意思。

④ 现在仍活在某一方言区人们口中的古代汉语词,也应看作是方言词,如“夜来”,古代汉语有二义:昨天;夜间。前一义在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方言里说;后一义吴方言里常说。

⑤ 一部分开始只在某一方言地区内使用的汉语外来词,也应看作是方言,这些词在语音上带有明显的方音色彩。如“沙发”,英语是 sofa,显然这个词最早是在吴方言地区使用。“沙”北方话念

shā,音与原文不合。又如“的士”,英语是 taxi,显然最早是在粤方言地区使用,广州的“的士”念 [tɪk⁵³ ʃi²²],与原文音相近。

⑥有些源自方言的词,在普通话里书面应用已很广泛,但口语里仍很少使用,从语源角度考虑,它们似也应看作是方言,如“里手”(湘方言)、“像煞有介事”(吴方言)。

上面这六个方面的词就是方言词典收录的范围。但要说明的是,方言词典并不一定要把所有方言词都收进来,收词量要根据词典性质来确定。汉语方言词典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①收录整个汉语方言词汇的全国性方言词典,如《汉语方言小词典》。②收录某个大方言区方言词汇的词典,如《简明吴方言词典》。③收录某个大方言区的某一地点方言词汇的词典,如《广州话方言词典》、《北京方言词典》、《四川方言词典》。④普通话和方言对照的词典,如《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这几种类型的方言词典就各有它们自己特定的收词范围。

关于方言词典收不收有音无字的方言词的问题,现在认识上还不完全一致,所以有的方言词典收,有的方言词典不收。收这类词的有《广州话方言词典》、《四川方言词典》等;《简明吴方言词典》则不收。哪一种处理方案更能为读者接受,可让实践来作出回答,但是编词典时,应该结合词典的特点、用途来考虑。方言词汇调查应记录有音无字的词,但词典是供查检的工具书,给读者提供的词不应是有音无字的,而应是有音有字的。

三 方言地区的标注

现在一般语文词典收录方言词,多数只注明是方言,不注明是

哪个地区的方言,甚至有的方言词典也不一一注明方言使用的地区。诚然,注明方言词的使用地区有很大困难,但从学术价值上看,标注方言地区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① 标注方言地区有助于方言词汇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通过方言地区的标注可以逐步摸清汉语方言词汇的分布情况,从而使我们对汉语方言词汇的面貌有个整体的了解。

② 标注方言地区有助于方言语源的考证。我们对某部作品所使用的某些词语常常不能确切肯定是何种方言,就是因为对这些词的语源不清楚,如《金瓶梅词话》,有人认为是山东方言,有人认为其中许多是吴方言词。通过方言地区的标注,摸清词汇的分布地区,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就会逐渐趋于一致。

③ 标注方言地区,有助于普通话吸收方言词。有一些词被认为是方言词,其实从它使用的地区看,不应算是方言词,但由于缺乏调查了解,就认为它是方言词了,如上面所说的“外公”、“外婆”就是一例。如果我们标注方言地区的工作做得好,那末肯定有很多过去认定的方言词会升格为普通话词语。

④ 标注方言地区的意义不限于语言学,对于其他部门也有实用价值。例如在侦破案件时,识别方言地区就有实际的意义。过去某些案件破获后,作案人即抓获于据语言特征分析断定的地区。

方言词典的编写传统十分重视标注方言地区。扬雄《方言》所收录的,包括古今方言和通行的普通话,凡方言都分别注明“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指因地域关系,语言发生变异的各地方言)或“某地某地间通语”(指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章炳麟《新方言》还从时间地域两方面出发,结合音义,说明某些方言词语的错综演变。如卷一“释词”一条:《小尔雅》:“肆,极也。”《说文》:“肆,长

也。”通以今语，犹言极好耳。今辽东谓富有曰“有得肆”。苏州谓甚好曰“好得肆”，甚热曰“热得肆”。

今天，可供标注方言地区时参考的资料应该说比过去丰富得多，进行这项工作的基本条件是具备的。各地已有不少方言词汇调查报告，各省编写的地方志中也有专门的方言志，近几年来又出版了不少方言词典，这些都是标注方言地区的重要参考资料。当然，这并不是说标注方言地区没有困难了，标注方言地区目前仍然是编写方言词典的一个重大难题：

① 前人方言著作所记录的方言词汇在数量上比起现在的方言词典要少得多，如《新方言》只搜集方俗异语 800 余条，而现在一部小型方言词典收词一般都有五六千条，如要一一注明使用地区，确有不少困难。

② 现在虽有一些方言词汇资料可供参考，但这些资料多数是词汇记录性质的，如方言词汇调查报告。编方言词典过程中遇到书面上记录下来的方言词比较生僻或特殊一点，就得对这部分词的使用地区重新调查，而这种工作又不像记录方言词汇那样单一，有的词需要找许多人调查，有的词则还不知道该找哪些人调查。

③ 方言词汇错综复杂，有些词不限于一个地区使用，要为这些词确切指明方言地区有相当大的困难。我们虽然不苛求注明某地说就意味着其他地区一定不说，但对于词汇使用地区范围的大小，在标注方言时，还是应该考虑的。例如“抱出笼”，《小说词语汇释》注吴方言，虽说武断一些，但还能为大家所接受，如果注成鄂州方言，则显然不合适，因为这词在吴方言里被广泛使用，通行的范围远远超过后者。

我们编写《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时,在标注方言地区上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但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认为标注方言地区也不是不可能的。

① 标注地区要从实际可能性出发,不能求全责备,如果想把某一个方言词在全国的使用地方一一指明,这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对如此复杂的汉语方言词汇分布情况了如指掌,如果他只了解个别几个地区的方言,那他所作的结论必然带有一定主观性。同时,对于方言词的归属问题,各人的看法也未必一致。有的人主张,某方言里说的,就属于某方言;有的人主张应从语源上来看,某方言里说的,并不一定就是某方言。我们认为,词典标注地区只能肯定某个地区说,但不能保证某个地区不说,如果这一原则得到公认,那么标注地区的困难就会小得多。

② 标注的地区不必强求统一尺度。有些可以标宽一些,有些可以标窄一些:

(a) 某个大方言区里多数地区都说的,标大方言区就可以了,如“开洋”(虾米),上海、江苏东南部、浙江大部分地区都说,就可标吴方言。

(b) 只限于某个狭窄地区内说的,可标具体的地点方言,如“豁鼻子”(揭发别人隐私),北京说,就标北京方言。

(c) 跨大方言区的,可以从词源上考虑,如包打听(包探),上海、武汉、安庆等地都说,但究其源,一般都认为是吴方言,就标吴方言。词源一时难以查明的,也可以都标上,如“话”(说),见于《简明吴方言词典》、《南昌方言词汇》、《广州话方言词典》,就可标吴方言、赣方言、粤方言。

(d) 有些词一般认为是方言词,但它们的使用地区十分广泛,几乎各个大方言区里都说,这就很难标明是哪一地区方言。这类词,一可以升格为普通话,方言词典不收;一可以根据掌握的资料客观地注明见于某些资料。如“把”(给),南方各省都说,标哪一方言都不合适,《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采取罗列资料出处的方法来加以说明:

把 bǎ 给。例:喏!你这个送把我!(睦剧《牧牛》)|我不管,那五十块钱也要还把他!(《湘江文艺》1979.3)○见于《简明吴方言词典》、《浏阳南乡方言记略》、《南昌方言词汇》、《四川奉节方言分类词汇》、《安庆方言词汇》。

③ 标注方言地区一定要准确,做到这一点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a) 判定每一个词的所属地区不能凭语感,要通过实际调查或充足的书面材料才能作出。即使对于自己会说的方言,也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对某些不太有把握的词更需要调查。只有在调查的基础上,才能注得合适,注得准确。

(b) 标注大方言区要注意大方言区所包括的范围,一般人常常把某一省的方言和大方言区等同起来,如说湖南方言,就认为是湘方言,这是不合适的,湖南省说湘语的有岳阳、衡阳等 35 个县市,面积只占全省一小半,其他分属于北方方言的西南方言区及赣客方言区。显然我们不能把属于后两个方言区的词语注成湘方言,而应注为湖南方言。

(c) 标注方言地区要和所引的例证一致,如标吴方言,一般最好引吴方言区的一些作品。老舍和鲁迅作品中都用了一些吴方言词,但引例时最好选用鲁迅作品,这样就可以避免方言词在归属上的纠葛,还可以少出差错。

四 关于注音

方言词典的注音也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普通话有统一的标准读音,所以在一般语文词典中,注音问题不太大。方言读音非常分歧,不同地点的方言在语音上差异很大,甚至存在着交际上的困难。一个字有众多读音,词典不可能兼收并蓄,这就出现了方言词典注音难的问题。但是作为语文性词典,注音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无法回避。此外方言词典要不要注普通话读音,这也是一个问题,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讨论。

方言词典注方音,理论上一般都能接受,需要讨论的是方音如何注。如果我们编一部只记录某一地点方言词汇的词典,如《广州话方言词典》,注音一般没有多大困难,只要注广州话就可以了。如果编一部大方言区的方言词典,如《简明吴方言词典》,注音就有了困难。江苏东南部、上海以及浙江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吴方言区域,内部方言分歧很大,怎么注音?近年来一般都是选择一个代表点作为注音的依据。《简明吴方言词典》注上海话,《四川方言词典》注成都话,《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也以厦门话与普通话对照。这种处理方法基本上是可行的,只要选好方言的代表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现在留下的问题是全国性的方言词典怎么注音?根据已出版或正在编写的方言词典的情况来看,不外乎有三种处理方法。

1. 全部不注音,如已出版的《汉语方言小词典》。

2. 部分加注方音,如《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原则是:若方言词折合成普通话读音后与方音相差较大,则加注方音。如吴方言

里的“呆大”，普通话读 dāidà，加注方音(上海话) [ŋɛ¹³ du¹³]; 粤方言里的“奘”，普通话读 ēn，加注方音(广州话) [ŋan⁵³]。

3. 全部加注方音。

现在说说方言词注普通话读音的问题。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如《简明吴方言词典》、《四川方言词典》都只注方音，不注普通话音；但也有人认为方言词典可以注普通话音。哪一种主张可取，我们认为要结合方言词典的特点来考虑。方言词典不同于方言词汇调查报告，前者注音是为了供读者查考，后者注音是为了记录该地区的方音系统，两者不能等同。方言词典注音的目的主要是为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提供方便，其次才是使非本方言区的读者知道这个词在某方言里的读音。方言词典不可能向读者提供某一方言完整的方音系统，读者也不可能从方言词典中学会某一种方言；相反，将方言折合成普通话音，可使方言区的读者知道自己方言里的词在普通话里应该怎么读，这就有利于推广普通话。其次，要考虑到目前全部注方音的条件还不成熟，有些生僻一点的方言词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哪一地方的方言，也就谈不上注什么地方的音了。第三，知道词的使用地区，但那里的方言还没有作过调查，我们也就无法正确地注出它们的读音。第四，邻接的地区在词汇上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共同点，某些方言词的分布常常超出一个方言区的范围而遍及若干方言区，读音分歧很大，显然词典无法一一注出，即使全部注出，那么对读者又有多大意义呢？方言词注普通话音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现代汉语词典》已经这样做了。如“亭子间”(旧式楼房中的一种小房间)，吴方言读 [diŋ¹³ sl³⁴ ke⁵³]，《现代汉语词典》注为 tíng · zǐjiān。这样处理基本上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所以方言词典注普通话音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可

行的。问题是方音怎样折合成普通话,如果折合不好,就不能起到注普通话音的作用,并且引起语言上的混乱。

《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在方音折合成普通话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

1. 根据这个字在普通话里的读法注,如骺(骨节与骨节衔接的地方),吴方言读 [ga¹³],普通话从古反切(古黠切)折合来读 jiè,从普通话注 jiè;“搭界”(发生关系;有联系),吴方言读 [ta⁵ka³⁴],“界”普通话读 jiè,“搭界”就读 dājiè。

2. 迁就方言的读音。如尴(古咸切)尬(古拜切)(神色态度不自然),吴方言读 [ke⁵³ka³⁴],照普通话应读成 jiānjiè,迁就方音读 gāngà。轧,《辞源》只有一音,乌黠切,音 yà(排挤,倾轧),《现代汉语词典》另有 gá(拥挤;结交;查对)和 zhá(压钢坯,轧钢)音, gá 是根据吴方言定的音。

3. 标注的普通话音要跟所标明地区的读音一致。如“再哭我量你两个大嘴巴”中的“量”,标北方方言,音 liāng,标洛阳方言,则应音 liáng。

以上是我们在编写方言词典中碰到的一些认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在此提出一点粗浅而不成熟的意见向专家、同行请教。

提高辞书质量的若干设想*

刘庆隆

面对着开创新局面的要求,辞书质量的提高应当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内容。这里,试就保证和提高辞书质量的问题谈谈一个辞书工作者的想法。

一、加强计划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都是按计划进行的,辞书的编写出版也不能例外。应由出版领导机关和有关出版社根据全国辞书需要情况,制定长期的全面的计划。按照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编写出版某些辞书。这样便于安排工作,调配力量,减少盲目性,避免都搞热门,冷门无人问津。还可避免抢先出版,忽视编写质量,乱拉稿件,不顾出版水平。

二、加强领导和组织工作。编好辞书,上级的领导是关键,这已为事实所证明。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等的编写出版,没有上级的领导和大力支持是做不到的。现在已经有了良好开端,还需要上级加强领导,才能保证辞书有较高水平。其他没有落实的大型辞书的编写计划,像《现代汉语大词典》等,也需要上级来抓,计划才能落实,工作才得以展开。

一般辞书的编写,由出版社来组织,各出版社可以分工。比如

*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辞书研究》1984年第5期。

各种专科词典,由各专业出版社负责组织编写出版,一般语文辞书由几个专门出版社分工负责,统报出版领导机关协调备案。

负责组稿的出版社,还要负责编写的指导,尤其是对于一些非专业单位编写的词典,包括机关、学校临时组成班子编写的、个人或几个人业余编写的,从计划到编写都要进行具体指导。交稿后要认真审稿,严把质量关,凡达不到质量要求的,都要帮助编写者进行细致修改。经过修改,仍达不到质量标准的,要坚决不予出版。提高辞书质量,编写是关键,出版是关口,把住这两道关,就不会出现粗制滥造的辞书。

为了确保辞书的质量,各出版社对分工组织的辞书,除编写时进行具体指导外,还应给予必需的物质帮助,比如提供资料、参考书等,并向他们通报有关的辞书的编写出版信息。这些帮助对非专业机构的辞书编写者是很必要的。提供的资料等可以收费,将来在稿酬中扣除。

三、开展辞书评论。现在辞书出版的数量不少了,重在提高质量,正确地开展辞书评论,是提高辞书水平的重要一环。评介辞书是个严肃的工作,既不能作庸俗的捧场,也不能作简单的否定。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认真的分析,肯定其优点,指出其不足。尤其是对书中的缺点错误,要指明问题,找出原因,提出改进的办法,使其修改后,能有所提高。对于粗制滥造、极不负责任的辞书,或者问题严重而不肯改正的辞书,要进行严肃的批评,这既是对编写者,也是对出版者,目的是促使他们联合起来进行认真的修订。

四、开展辞书研究工作。要进一步提高辞书的质量,不开展研究工作是难以实现的。辞书的内容包罗万象,跟所有的学科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当然不是辞书工作者所能担负起来的。辞书工作

者所研究的,主要是辞书本身和编写中的问题,研究如何利用各种学科的成果来进行辞书编写,如何把每个学科的知识反映到辞书里。当前要研究的课题,还是辞书编写中亟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要深入研究编写体例、收集资料、选词、注音、分析意义、注释方式、举例,以及各类辞书的编写方法等。这虽是一些极普通的问题,也进行过探讨,但如果能把这些问题研究得更深入些,研究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辞书的质量就会有所提高或就会有更大的提高。

五、培养辞书编写出版人才。现在的辞书编写队伍虽然比过去壮大了,但和承担的任务相比,差距比较大,而且现在的队伍临时的多,基本队伍少。几部大辞书的编写,主要是靠各方面的支援,专业队伍很少。这些大型辞书出版后的经常维修工作(包括继续补充或更新资料和修订),还须有一定的专业人员来做,否则就难以进一步提高质量。各辞书机构人力都比较薄弱,尤其是缺少骨干力量,进行一些小型辞书的编写,尚可应付,编写大型辞书就力不从心了。现在出版辞书的单位增多,如果这些单位都要担负起计划、组织和指导工作,就要有一批熟悉业务、有一定水平的辞书编辑,才能担负起指导和把关的重任。现在辞书队伍中精通业务、有理论又有一定编写能力的人不多,各辞书机构都需要这样的人才。因此,除增加人员外,还要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培养人才的办法,除各辞书机构“带徒弟”或办培训班外,还可以委托大学开办辞书班,中国人民大学曾已开了头,应继续办下去,年限似宜适当延长。如有可能,还可办研究班、研究所,培养较高水平的辞书人才。

辞书刊物是指导辞书编写,开展辞书评论,推动辞书研究,培养辞书人才的极好阵地。要充分利用这个阵地,交流经验,探讨问

题,传播知识,推动工作。整个辞书界要共同努力把这些刊物办好,使它们成为辞书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学习书刊,提高业务水平的教材。

六、为了提高辞书的质量,有些工作,各辞书编写出版单位可以协作。各辞书中的分歧,可以讨论协商解决。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把工作做好。

1. 收集资料。资料是编写辞书的基础,没有足够的资料,难以编写出有水平的辞书。因此,各专业辞书机构都非常重视辞书资料的收集,用很大的力量去收集资料。但我们现有的资料,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还不能满足辞书编写的需要。今后收集资料的任务还是很重的。这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应不间断地进行。一些临时性的编写辞书组织和个人,一时难以收集大量的资料,而且以后不再编写辞书,就是收集部分资料,过后也无大用处。因此,前面提出由出版单位提供资料。这也只是设想,目前不一定能办到,因为有的出版单位也没有资料。鉴于这种情况,似可考虑,拟定收集资料办法,制定统一的卡片,由辞书出版单位委托临时性的辞书编写组织或个人收集需要的资料,辞书编成后,由出版单位收购。这也是一种积累资料的途径,或者尚可实行。

乍看起来收集资料不难,其实做好资料收集工作很不容易。应进行资料收集问题的探讨,提高资料工作水平。另外,资料收集一直是用手工式方式进行,耗费人力时间。今后应创造条件,利用电子计算机来收集、储存资料。现在有的单位已经利用电子计算机统计单字或词汇的频率,编制专书索引。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应加快发展。

由于资料收集、储存的困难,有的建议成立辞书资料中心,这

个建议很好。有了这个中心,可以大规模地收集资料,而且更便于利用现代化设备,使资料的收集、储存、使用现代化。不过这个建议,一时恐难实现。为了解决当前的需要,似可采取分工合作的办法,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比如以语文辞书资料为例,现在已有的收集了古汉语资料,有的收集了汉字资料,有的收集了现代汉语资料,有的收集了少数民族语文资料,有的收集各专门学科的资料,等等,各单位就自己的专业继续补充,使其逐渐完善。这样,从一个单位看只是一个方面,把这些方面合起来,资料就比较全面了。需要的单位可以有偿地借用,使资料充分发挥作用,为缺少资料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方便。

2. 统一字形。解放后,进行了汉字简化、异体字整理、字形整理等,做了许多工作,但辞书里还存在着一些分歧:①个别字的处理不一致,比如做“汁”讲的“瀋”,简化为“沈”,还是作“津”?做“田字草”讲的“蘋”,简化为“蘋”,还是作“苹”?“只是”的“只”的繁体字是“祇”,还是“祇”?“阪”、“挫”是否算异体字,等等,在字典和词典里都有分歧,应该一致起来。②现在印的字词典大都是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的字形,像《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收字多的古汉语辞书用什么字形?有的用旧繁体字(旧字形不统一)。这样,其中的通用字的字形就跟现在用的不一致。如果通用字用现在的字形,生僻字用旧字形,一部书里字形不一致,也给排检造成麻烦。看来还是全部用现在的字形为好。字形统一了,还应制造统一的字模,这才能保证各辞书字形的一致。

3. 统一排检法。排检法不统一,一部辞书一种方法,读者不胜其烦。20世纪60年代初,文化部等单位曾成立查字法整理小组,拟定了音序、部首、四角号码等查字法。音序查字法已经用开

了,修改的四角号码查字法有的字词典也用了,只部首查字法还没有一致起来。去年文改会召集会议,进行了商讨。各种查字法都有一定的优点,也有缺点,选出便于推行的,各字词典都来使用,就会省去广大读者许多麻烦。

4. 统一异体词。无论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异体词都很多,这不是语言的丰富,是文字的混乱,异体词给读者带来了许多麻烦。字词典应起规范作用,不能成为写别字的依据,每部辞书都要认真处理异体词。有些词的不同写法都很常见,推荐哪一种,确实费斟酌。因此,不同的辞书常有分歧,这就使得读者不知道该用哪种写法,起不到规范作用。异体词的统一,不能等哪个机关去定,只能靠辞书编写单位自己解决。可由各辞书编写单位协商处理原则,然后分工整理异体词资料(编写哪种辞书的,负责哪方面的整理工作),提出处理意见,分送各单位审阅提意见。意见一致的,各辞书就照此处理。意见不一致的,把不同的意见整理出来,仍照上述程序办理。最后剩下少数不一致的,开会解决。这样,各辞书就会一致起来了。

5. 统一读音。不少字词有异读,旧辞书收的又音多,彼此矛盾不突出,新的辞书基本上收一个音,各书选的音不同,这就显着有分歧了。普通话中的异读词,有审音委员会去审订,问题不大。难处理的是生僻的字词、古汉语中的字词,没有机构负责审订,只能靠各辞书单位协商解决,办法仍可仿照异体词的处理。

6. 统一符号。辞书中用的符号,凡能统一的,都应统一起来,这不会影响各书的特色,而方便了读者。技术方面的统一,是发展的趋势。

各辞书中应统一的问题,由各辞书编写出版单位协商解决,是

可行的,今后应多采取这种方式,解决各辞书之间的分歧。这种办法,各单位是赞同的,只是无人组织,工作就开展不起来,今后似可由主要出版辞书的出版社发起。

经过上述努力,想来有助于编写出版更多更好的辞书。当然,恰当与否,是有待研究讨论的。

汉语规范型词典编写的历史 和面临的问题*

晁继周

一 关于规范型词典

规范型词典是语文词典的一个重要类别,它的编写目的是推广标准语,促进语言的规范化。规范型词典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现代,二是共时,三是按规范性原则来编写。

汉语辞书编写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我们把《尔雅》看作最早的汉语词典,把《说文解字》看作最早的汉语字典,汉语辞书编写迄今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然而汉语规范型词典编写的历史却是短暂的。严格意义的汉语规范型词典的编写只是 20 世纪以来的事情。

二 汉语规范型词典编写的起步阶段

规范型词典的编写,是在社会自觉地提出语言规范的要求之

* 这篇文章曾收入《世纪之交的应用语言学》。

后提出来的。汉语很早就存在方言分歧。为克服交际中的困难,明、清以来开始提倡“官话”。然而长期以来,官话也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大抵是指流行地域较广、使用人口较多的北方方言,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20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推广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的主张。这无疑是个很大的进步。语言由语音、语法、词汇三个要素构成,“以北京话为标准”,是指这三个要素而言,还是指其中某个要素而言,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并没有明确说。

汉语方言的分歧,最突出的是在语音方面。因而规定标准,人们首先关注的自然是语音。辛亥革命以后,教育部先后组建了读音统一会和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原名国语统一筹备会),进行汉字读音的审定工作。这时字音的审定不再是为了读经训诂的需要,而是试图对当时正在使用的活语言做读音统一工作,在这一点上与传统的小学有本质的区别。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标准是折中的产物,北京音在这个标准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是又有人声,有浊声母,分尖团。这个标准1921年在《国音字典》上正式公布。《国音字典》所反映的读音“折中南北,牵合古今”,是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联合音系”,后来被称为“老国音”。《国音字典》所体现的“标准音”,无论在官话区,还是在别的方言区,推行中都遇到了困难和阻力。然而这部字典作为贯彻国家标准的第一部字典,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嗣后,1928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组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开始编写《国音常用字汇》,并于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字典由当时的教育部正式颁行,作为正字音、推行国语的标准字典。该字典共收汉字9883个,按注音字母音序排列。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署名的《本书的说明》,指出《国音字典》的不足,认为它“对于现代的北平语音不免忽略,故所注之音

稍有庞杂之处”，并明确宣示：“本书所定的音，是以现代的北平音为标准的。”《国音常用字汇》标志着以北京语音音系作为汉民族共同语语音标准这一事实的基本确立，在语言理论上和推广标准语的实践上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国音字典》和《国音常用字汇》虽然在推行国音标准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它们只是字典，不涉及汉语中数量繁多的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语，因而，它们在推广国语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是有限的。推广国语，需要一部体现国语标准的词典。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国语辞典编纂处（1928年改称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开始筹备编写《国语词典》。1937年到1945年，8卷本《国语词典》全部出齐。该词典收词语10万条，以国语语词为主，也收了不少备查考的古语词和早期白话作品中的词语。《国语词典》重在正音，它不仅给作为字头的单字注音，也为复合词和短语注音。凡现实中使用着的词语，注音以北京话实际读音为准。只见于古籍的生僻字，参照唐宋以来的韵书，遵循古今音变的规则斟酌定音。读音以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种方式标注，轻声、儿化音皆一一标明。《国语词典》的又一个贡献是定词，注音时一词之内连写，词与词之间分开，在汉语划分词的工作上做了有益的尝试。释义上，《国语词典》比以前的辞书也有进步。一是避免互注，“如甲词既‘即乙’或‘犹乙’，则乙词必有相当之注释”（《凡例》）。二是对部分词注明词性或词性变化。三是开始注意用例句显示词的用法。因此，无论从注音上，还是从收词和释义上，《国语词典》都可以看作汉语规范型词典的滥觞。《国语词典》所收的现代词语的注音、释义，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参考，成为后来汉语规范型词典编写的重要基础。《国语词典》收词过于芜杂，古语词和早期白话

语词收得过多。现代语词中,过多的北京土语词不加标志地收入,不利于标准国语的推广。另外,此书重在注音,释义偏简,并且使用浅近文言,不符合规范型词典的要求。

三 汉语规范型词典的成熟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语文规范问题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后第十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后更名为文字改革委员会)即宣告成立,主管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等工作。国家的统一,建设事业的发展,对推行汉语标准语提出了迫切需要;政府的重视,又为普及文化、推行标准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汉语规范型词典的编写逐渐提到日程上来。

1950年8月,国家出版总署组建新华辞书社,动手编写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为普及教育和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字典——《新华字典》。1953年《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57年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字典收单字8500多个,并突破传统字典的局限,在字头下收含有这个字的复音词语三千二百多条,对所收字词都用现代白话作出解释,对多义词的义项用“引”“转”“喻”“泛指”“特指”“又指”等说明其间的意义关系。《新华字典》经过多次修订,到现在印行总量已达3亿多册,在中国辞书乃至世界辞书出版史上创下了纪录。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把现代汉语标准语定名为普通话。1956年2月,国务院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

范”，从而严格规定了汉民族共同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的标准，使普通话比此前使用了半个世纪的“国语”的概念含义更清楚，标准更明确。

推行语言规范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要编写出全面体现规范标准的字典、词典来。国务院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提出：为了帮助普通话的教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原新华辞书社和大辞书编纂处两部人员并入语言研究所，与语言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一起组成词典编辑室。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先后主持词典编写工作，近百位学者先后参加了词典的编写和修订。《现代汉语词典》初稿完成后，多次以“征求意见稿”“试印本”和“试用本”的形式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经反复修改，于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现代汉语词典》是第一部汉语规范型词典，它的规范性体现在诸多方面。在字形和字音上，《现代汉语词典》在编写和修订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标准，包括《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以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条目的注音，严格贯彻词连写的原则，轻声、儿化音则反映北京话读音的实际情况。通过收词，确定普通话的词汇范围，凡是收入《现代汉语词典》而不加任何标志的词，都是普通话的词。为适应查考的需要，普通话语汇之外，还收录了一些常见的方言词语和方言意义，以及书面上还能见到的文言词语。这两类词语分别加上〈方〉和〈书〉的标志，使它们和普通话语汇在词典中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做，就使规范性和实用性在词典中得到了结合。除规范性和

实用性外,《现代汉语词典》还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它充分吸收了近些年来汉语研究的成果,对词的义项划分比较细致精当,对词义的表达准确并能正确地显示词性。《现汉》在汉语词典编写中第一次明确区分多义词与同音词,离合词与非离合词,这些做法为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现汉》的编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和第二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至今总印数超过 3000 万册,是我国最畅销的词典。

四 汉语规范型词典编写面临的问题

(一) 近一个世纪以来,汉语规范型词典经历了从起步阶段到成熟阶段的发展过程。从《国音字典》《国音常用字汇》《国语词典》,到《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我们可以看出,规范型词典的编写基本上属于政府行为。这首先是因为,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是政府部门制定的,而规范型词典是这些标准的重要载体。其次,规范型词典的编写常常是由政府组织人力进行的。拿《现汉》来说,编写任务是国务院下达的,把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两部人员并入语言研究所,成立以编修《现汉》为中心任务的词典编辑室,这样的人力组织也不是个人或某个单位所能做到的。为审订《现汉》,成立了由多位著名语言学家组成的编审委员会。词典编好以后不是急于出版,而是两次铅印,广泛征求意见,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力求尽善尽美。这样慎重地对待一部词典,在我国辞书编纂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可以说,《现汉》编写的成功,是国家和社会大力支持的结果。

近些年来,一些人过分看重辞书出版的商业性一面,较多地考

虑所谓市场份额。既然规范型词典被市场“看好”，大家就都来试一把。我个人认为，辞书需要填补空白，原有的品类也需要不断提高质量，因而有竞争是好事。但是对于国家组织力量编写的为语文规范化服务的规范型词典，应该集中力量编好一部，并且经过不断修订，使它日益完善。如果多部词典都标榜自己是规范型的，而实际上对规范的理解又不一致，这对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非但无益，反而会形成干扰。

（二）规范型词典应该如何贯彻语文规范标准，目前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规范型词典必须贯彻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语文规范标准，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怎样去贯彻，是全面、科学、准确地贯彻，还是机械、刻板地贯彻。具体地说，贯彻规范标准允许不允许有一定的必要的灵活性，对国家标准尚未规定到的地方可以不可以提出“专家标准”；对标准中个别不妥的地方能不能用适当的方式表示不同的意见。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规范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新国音”就是对“老国音”的否定，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审音表》就是对60年代《审音表初稿》的部分否定，1986年经过修订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和1988年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就把1955年《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作为异体字淘汰的26个字重新确认为规范字，这都说明标准不是僵死的，而是随着语言的发展，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适时改变的。“老国音”为什么会被“新国音”所取代，因为“老国音”的创制脱离了语言实际。赵元任先生在为“老国音”灌制留声片时曾调侃式地慨叹，“老国音”只有他一个人说。我们在为普通话审音的时候，也要力避把实际语言中不存在的读音作为规范读音“审定”下来。《现汉》中一部分词的规范读音（即《审音表》审定的读音）后面用括注的方式说明

“口语中多读某音”，体现一定的灵活性，是很必要的。对现行规范标准中存在的个别问题，规范型词典通过适当的方式表示一下态度，既是在学术原则问题上负责任的表现，也可以由此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在重新修订规范标准时参考。

（三）随着语言的发展，随着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规范型词典要不断修订。就汉语规范型词典来说，修订周期以5至10年为宜。规范型词典修订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调整收词。在规范型词典的每一个修订周期中间，都会有新词的产生，也会有旧词的消亡，而新词产生的速度要比旧词消亡快得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有一个“新词新义新用法”课题组，一直从事新词新义的研究工作。根据他们的统计，汉语中新词语“每年以数百条乃至上千条递增”。（《文汇报》1998年8月27日：《面对新词语的丰富世界》）旧词消亡的速度目前尚无测算，但恐怕要慢得多。如果按新词增加与旧词消亡的自然比率修订词典，每修订一次，篇幅就会扩大一次。一般说来，一部有影响的规范型词典篇幅是不宜无限膨胀的。这就要求词典修订中在增加新词的同时必须对原有的收词作相应的调整。如何保持规范型词典收词的适度与均衡，需要综合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从根本上说，要以科学的词频统计为基本依据，应保证在语言使用中出现频率高的词进入词典。其次是注意词汇内部的系统性。浩如烟海的现代汉语词汇并不是一盘散沙，不同的词语单位之间，有着相互制约、相互依赖以及同义、反义等关系，形成一个完整的词汇体系。词典增删条目时，一定要注意到这种系统性，不要顾此失彼。第三是适当照顾查考需要。规范型词典收词，词频统计固然是重要依据，但也不能忽视查考需要。一部词典，如果读者不需要查的词收

了很多,而要查的词又查不到,这部词典在收词上不能说是成功的。

汉语规范型词典的编写是国家和整个社会的事,语言学界和辞书学界应该给以更多的关注。直接从事规范型词典编写修订工作的同志,更应认清自己的责任,认真研究问题,排除干扰,力戒心浮气躁。20世纪,汉语规范型词典的编写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通过我们的努力,汉语规范型词典一定会在规范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上再提高一步,以新的面貌进入21世纪。

附 录

1993 年以来有关《现代汉语词典》 的评论文章篇目索引

王 楠

浅谈《现代汉语词典》中一些词语意义的发展变化

程志兵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3 年第 3 期

《现代汉语词典》的敬谦词

王泽鹏 《辞书研究》1993 年第 3 期

在《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绳 《中国语文》1993 年第 4 期

现代汉语字词典的注音

刘庆隆 《辞书研究》1993 年第 5 期

论《现代汉语词典》的百科条

李志江 《辞书研究》1993 年第 5 期

《现代汉语词典》用例笔记

吴昌恒 《辞书研究》1993 年第 5 期

论《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一般原则

韩敬体 《辞书研究》1993 年第 5 期

现代汉语工具书的代表之作

鲍克怡 《辞书研究》1993 年第 5 期

《现代汉语词典》指瑕

峻峡等 《辞书研究》1993 年第 6 期

《现代汉语词典》在日本

刘向军 语文建设 1993 年第 12 期

《现代汉语词典》在词典史上的贡献

汪耀楠等 《辞书研究》1994 年第 1 期

评《现代汉语词典》对异体字的处理

陈抗 《中国语文》1994 年第 4 期

《现代汉语词典》某些语素义项需要增补摭谈

孙继善 《文科教学》1994 年第 4 期

《现代汉语词典》与词汇规范

李建国 《辞书研究》1994 年第 6 期

浅谈《现代汉语词典》的虚词注释

孟庆海 《辞书研究》1994 年第 6 期

《现代汉语词典》收词立目商榷

闵龙华 《南京师大学报》1995 年第 1 期

谈《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的白璧微瑕：

从“膝”、“蛛”等字的字形想到的

金树培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

关于规范词典的收词问题

晁继周 《语言文字应用》1995 年第 2 期

专门术语注释应遵循“四性”原则：

兼谈《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林立 《编辑之友》1995 年第 3 期

必须注意词典注释的准确性：

兼评《现代汉语词典》

林立 《编辑之友》1995 年第 4 期

关于《现代汉语词典》的再评论

沈燕 林立 《编辑之友》1995 年第 6 期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述略

晁继周 《辞书研究》1995 年第 3 期

白璧微瑕，美中不足：评《现代汉语词典》成语的释义

张德继 《太行学刊》1995 年第 3 期

颇具特色的辞书编纂符号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

程荣 《辞书研究》1995 年第 4 期

必须注意词典注释的准确性:

兼评《现代汉语词典》

林立 《编辑之友》 1995 年第 4 期

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规定和规范化字词典的编写

李志江 《辞书研究》 1995 年第 6 期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中的语音规范

晁继周 《语文建设》 1995 年第 9 期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修订举隅

晁继周 《辞书研究》 1996 年第 2 期

试析《现代汉语词典》对词的理据的注释

吕波 《辞书研究》 1996 年第 2 期

《现代汉语词典》收词立目商榷

闵龙华 《辞书研究》 1996 年第 2 期

关于《现代汉语词典》对部分迷信义的解释

孔昭琪 《辞书研究》 1996 年第 2 期

《现代汉语词典》拾误

缪亚奇 《南京师大学报》 1996 年第 3 期

词的语言意义、文化意义与辞书编纂

苏宝荣 《辞书研究》 1996 年第 4 期

精益求精出精品:《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出版

张红军 《新闻出版天地》 1996 年第 5 期

“打”字的语义分析

——为庆贺《辞书研究》百期作

曹先擢 《辞书研究》 1996 年第 6 期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介绍

韩敬体 《中国语文》 1996 年第 6 期

语文词典条目收选编排中的几个问题

程荣 《语文建设》 1996 年第 7 期

略论《现代汉语词典》的社会影响与历史贡献

赵克勤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用科学精神编词典

张万起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弘扬《现汉》精神,增强读者意识

李达仁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现代汉语词典》的历史功绩

柳凤运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试谈《现代汉语词典》成功的历史经验

董琨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
10

关于规范型词典的收词问题

晁继周 单耀海 韩敬体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读《现代汉语词典》笔记(提纲)

李荣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
10

现代汉语字典词典中的字形处理

刘庆隆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现代汉语词典》在词语释义方面的贡献

符淮青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把汉语词典的编写提高到新水平

孙德宣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现代汉语词典》的收词、释义和注音

胡明扬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现代汉语词典》点滴谈

刘学林 迟铎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
馆 1996.10

《现代汉语词典》科技条目编写和标注外来语问题

李伯纯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谈谈《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北京话词语

贾采珠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谈谈多义词的义项划分

吴崇康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现汉》对解决循环互训问题的贡献

陆尊梧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现代汉语词典》的编排

宋惠德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现代汉语词典》小议

郑怀德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词典的规范化与科学性刍议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浅谈

曹聪孙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难字·难词·难义——《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丛谈

舒宝璋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谈《现代汉语词典》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张大建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现代汉语词典》使用调查报告

党怀兴 王楠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商务印书馆
1996.10

谈《现代汉语词典》对异体词的整理

- 张小平 《高等自学考试》1996 年第 12 期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概述
- 韩敬体 《辞书研究》1997 年第 1 期
《现汉》修订的重要出发点:促进规范
- 晁继周 《辞书研究》1997 年第 1 期
《现汉》哲社条目修订的构想和实践
- 董琨 《辞书研究》1997 年第 1 期
《现汉》科技条目的修订
- 李志江等 《辞书研究》1997 年第 1 期
《现汉》修订中的相关照应问题
- 毛永波 《辞书研究》1997 年第 1 期
从《现汉》修订谈计算机在词典编纂中的应用及展望
- 王伟 《辞书研究》1997 年第 1 期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释义选评:
兼及《现代汉语大词典》有关词目
- 闵龙华 《淮阴师专学报》1997 年第 1 期
谈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虚词条目的处理
- 徐枢 《语言文字应用》1997 年第 1 期
希望《现代汉语词典》精益求精
- 陆俭明 《语言文字应用》1997 年第 2 期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释义求疵
- 闵龙华 南京师大学报 1997 年第 2 期
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词目纂集
- 王宁 《语言文字应用》1997 年第 2 期
浅论“品位”的发展:兼与《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有关注释商榷
- 李小梅 惠州大学学报 1997 年第 2 期
略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释义
- 符淮青 《语言文字应用》1997 年第 2 期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语文知识条目和标词类的一些情况
- 施关淦 《语言文字应用》1997 年第 2 期
《现代汉语词典》的规范化和创造性
——答王同亿先生

- 晁继周 《辞书研究》 1997 年第 4 期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摘瑕
- 张玉萍 《河南大学学报》 1997 年第 5 期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字形处理
- 李义琳 李仲湘 《语文建设》 1997 年第 5 期
动词“捷”的释义:与《现代汉语词典》商榷
- 东平 《汉语学习》 1997 年第 6 期
《现代汉语词典》部分释义之考订
- 林天虹、周迎燕 《语文建设》1997 年第 9 期
有关异体字问题的思考:兼谈《现代汉语词典》的遗憾
- 萧振华 《中国出版》1997 年第 11 期
《现代汉语词典》与当代语言理论
- 葛本仪 《语文建设》1997 年第 12 期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义项划分二题
- 邹玉华 《语文建设》 1998 年第 1 期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异形词的处理
- 张万起 《辞书研究》 1998 年第 2 期
试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比喻义的处理
- 卢建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2 期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释义推敲
- 闵龙华 《辞书研究》 1998 年第 3 期
浅议新《现汉》“〈口〉”标注的取消
- 杨金华 《辞书研究》 1998 年第 3 期
《现汉》对异形词的修订
- 李晓静 《辞书研究》 1998 年第 3 期
《现汉》关联条目的几点质疑
- 马镇兴 《辞书研究》1998 年第 3 期
《现汉》例证的搭配关系问题
- 段晓平 《辞书研究》 1998 年第 3 期
评《现汉》的数词释义
- 党军旗 《辞书研究》 1998 年第 3 期
《现代汉语词典》疑误二则

- 董树人 《语文建设》 1998 年第 3 期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释义商榷
- 程志兵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1998 年第 4 期
《现代汉语词典》若干词条释义商兑
- 董树人 《语文教学与研究》 1998 年第 4 期
“播”字该读什么音:读修订本《现汉》杂记
- 王剑 《辞书研究》 1998 年第 5 期
现代汉语辞书呼唤训诂学
- 祝鸿熹 《辞书研究》 1998 年第 6 期
《现代汉语词典》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订音的差异
- 余中明 《语文建设》 1998 年第 8 期
它们是同一条成语的不同书面形式吗?——与《现代汉语词典》商榷
- 姚鹏慈 赵建刚 《语文建设》1998 年第 9 期
ABB 式形容词中 BB 注音的声调问题
- 李志江 《语文建设》 1998 年第 12 期
词典标注词性的两项基本原则
- 黄华 《辞书研究》 1999 年第 1 期
现代汉字部首与古代哲学思想:试析《现代汉语词典·部首》的深层建构
- 季素彩 《汉字文化》 1999 年第 1 期
《现汉》修订本的异体词整理
- 高更生 《语文建设》 1999 年第 1 期
语文规范标准与规范型字词典的编写
- 晁继周 《中国语文》 1999 年第 1 期
汉语语文词典标注词性的难点
- 赵大明 《辞书研究》 1999 年第 1 期
隐喻扩展与义项建立
- 毛永波 《语文建设》 1999 年第 1 期
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问题
- 郭锐 《中国语文》1999 年第 2 期
从词长看词典语汇单位的确定
- 周荐 《辞书研究》1999 年第 2 期
古语词分布状况和使用频率考察:兼评《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频词

典》的收词

刘延新 《辽宁大学学报》 1999 年第 2 期

《现代汉语词典》收词初探

白云 《山西大学学报》 1999 年第 2 期

《现代汉语词典》中异形词的处理

刘云汉 《语文建设》 1999 年第 2 期

谈谈《现代汉语词典》科技术语释义规范问题

温昌斌 《南昌大学学报》 1999 年第 2 期

汉语辞书中词性标注引发的相关问题

程荣 《中国语文》1999 年第 3 期

汉语词语的表达色彩与语文辞书的释义规范

胡中文 《中国语文》 1999 年第 3 期

论《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词条增删

徐沛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99 年第 3 期

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几项不足

曾子凡 《语言文字应用》 1999 年第 3 期

《现代汉语词典》注音拼写中的大小写问题

张军 《语言文字应用》 1999 年第 3 期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指瑕

董树人 《汉字文化》 1999 年第 4 期

双字组合与词典收条

周荐 《中国语文》 1999 年第 4 期

按《新华》《现汉》整理《一异表》修正的 28 个字

朱斌 《辞书研究》 1999 年第 4 期

规范型汉语词典的异形词处理问题

程荣 《中国语文通讯》(香港) 1999 年第 6 期

贯彻规范标准不能胶柱鼓瑟

范晓耘 《辞书研究》 1999 年第 6 期

我国第一部规范性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词典》

晁继周 《中国辞书论集·1997》商务印书馆 1999.11

把词典编纂与词汇研究结合起来

晁继周 《中国辞书论集·1997》商务印书馆 1999.11

谈辞书的修订问题

张万起 《中国辞书论集·1997》商务印书馆 1999.11

辞书释义与词义研究

苏宝荣 《中国辞书论集·1997》商务印书馆 1999.11

语文性辞书的语义学原则

长召其 张志毅 《中国辞书论集·1997》商务印书馆 1999.11

试论语文辞书义项内部的一致性

李志江 《中国辞书论集·1997》商务印书馆 1999.11

辞书中成语注音的分词连写问题

毛永波 《中国辞书论集·1997》商务印书馆 1999.11

词的意义、结构的意义与词典释义

谭景春 《中国语文》 2000 年第 1 期

关于“打”的第二十六个义项：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商榷

侯明申 《武警指挥学院学报》2000 年第 1 期

谈《现代汉语词典》对通假异形词的处理

薛克謩 《河北大学学报》 2000 年第 1 期

修订本《现代汉语词典》的一处疏漏

程国焯 《昭乌达蒙旗师专学报》 2000 年第 1 期

规范还是误导 修订还是“修正”：《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问题展列与评说

师叔树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0 年第 1 期

《现代汉语词典》注音拼写的连写分写问题

张军 《辞书研究》 2000 年第 2 期

《现代汉语词典》对文白异读字的处理

段晓平 《辞书研究》 2000 年第 2 期

新旧版《现代汉语词典》专科词语立目之比较

牛敬德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0 年第 2 期

当代汉语变化与词义历时属性的释义原则：

析《现代汉语词典》二、三版中的“旧词语”

苏新春 《中国语文》 2000 年第 2 期

辞书的词义解释和词性标注

毛永波 《中国辞书学文集·199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3

关于语文辞书词性标注的探讨

李志江 《中国辞书学文集·199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3

双字组合与词典收条

周荐 《中国辞书学文集·199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3

辞书中标注轻声时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谢仁友 《中国辞书学文集·199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3

评《现汉》“然”尾词中的副词

徐祖友 《中国辞书学文集·199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3

工具书的字形有点乱

费锦昌 《辞书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现汉》两个版本立目和收条的比较

张铁文 《辞书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成语注音问题

王金鑫 《辞书研究》 2000 年第 4 期

《现代汉语词典》关于“〈书〉”的标注有点乱

冯振广 《辞书研究》 2000 年第 5 期

同形词与“词”的意义范围

——析《现代汉语词典》的同形词词目

苏新春 《辞书研究》 2000 年第 5 期

《现代汉语词典》以“客套话”为释语的条目浅析

王世友等 《辞书研究》 2000 年第 5 期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了什么

汤伏祥 《新闻出版报》 2000 年第 5 期

读修订本《现代汉语词典》

张成材 《青海师专学报》 2000 年第 5 期

“先生”释义辨证

刘光满 《辞书研究》 2000 年第 6 期

浅谈辞书对姓氏“萧”的处理

萧惠兰 《辞书研究》 2000 年第 6 期

论语文词典的专科词条及其释义

李尔纲 《中国辞书论集·1999》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9

试论中型语文词典应有的功能

- 闵龙华 《中国辞书论集·1999》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9
关于汉语规范型词典收词问题的思考
- 晁继周 《中国辞书论集·1999》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9
词的借代义及其注释
- 黄华 孟庆海 《中国辞书论集·1999》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9
略谈汉语辞书中的配套词照应问题
- 刘玲 《中国辞书论集·1999》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9
语文辞书中词语的轻声标注
- 李志江 《中国辞书论集·1999》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9
试论合称及其相关问题
- 胡中文 《中国辞书论集·1999》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9
《现代汉语词典》二题
- 劳臣 《语文建设》 2000 年第 10 期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儿”尾词该如何处理？
- 苏新春 《语文建设》 2000 年第 12 期
关于由名词转变成的形容词的释义问题
- 谭景春 《辞书研究》 2001 年第 1 期
词的语境义与功能义
- 苏宝荣 《辞书研究》 2001 年第 1 期
辞书单字条目与相关词语关系的处理
- 程荣 《语文研究》 2001 年第 1 期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同音同形字
- 刘川民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1 期
汉语辞书中古今关系的处理问题
- 程荣 《中国语文》 2001 年第 1 期
“人”“机”分词差异及规范词典的收词依据
——对 645 条常用词未见于《现汉》的思考
- 苏新春 《辞书研究》 2001 年第 2 期
《现代汉语词典》四字成语的意义及释义特征
- 余桂林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年第 2 期
比喻义的训释与比喻义的形成
——《现代汉语词典》比喻义计量研究之一

苏新春 赵翠阳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1年第5期

成语释义商榷

——《现代汉语词典》札记

村夫 巧生 《新闻出版交流》 2001年第2期

轻声音和文白音的规范问题:兼评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的部分注音

苏少波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2001年第2期

同素族词语与语素义项的归纳

胡中文 《辞书研究》 2001年第3期

“出”、“入”语素义分析

——在《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基础上的再探讨

史锡尧 《辞书研究》 2001年第3期

谈谈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问题

兼答李一民先生

董树人 《汉字文化》 2001年第3期

《现代汉语词典》对异形词的整理及对当前词汇规范的启示

苏新春 《语言文字应用》 2001年第3期

论词义在异体词整理中的核心地位

——兼谈《现汉》的异体词规范思想

黎良军 《辞书研究》 2001年第4期

关于《现汉》修订本对原本词条的删节及其他

施春宏 《辞书研究》 2001年第4期

关于《现代汉语词典》收释外来词的几个问题

刘中富 《东岳论丛》 2001年第4期

词条“分家”与义项“分配”

董为光 《辞书研究》 2001年第5期

《现汉》(修订本)疏误举例

劳臣 白云 《语文建设》 2001年第5期

《现汉》词性显性标注的失误

黄理兵 《辞书研究》 2001年第6期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待嵌格式

周荐 《中国语文》 2001年第6期

外国人使用《现代汉语词典》时遇到的几个问题

岑玉珍 白荃 《语文建设》 2001 年第 9 期

现代汉语规范型词典收录新词的原则

晁继周 黄华 《中国辞书论集·200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1.

10

浅议字母词的人典问题

沈孟瓔 《中国辞书论集·200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1. 10

词的语境义与功能义

苏宝荣 《中国辞书论集·200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1. 10

论“区别义”

李尔钢 《中国辞书论集·200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1. 10

语词兼释, 小题大做

——谈《现代汉语词典》的一种特殊的释词方式

韩敬体 《中国辞书论集·200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1. 10

多义词语法属性的地位与作用

——兼论分立义项的语法标准

刘晓梅 《中国辞书论集·200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1. 10

《现代汉语词典》1996 年版四字词修订的计量分析

余桂林 《中国辞书论集·200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1. 10

现代汉语异形词的规范问题

杨春 《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四辑 商务印书馆 2001. 11

从出版工作的角度看《现汉》

湛艾 《中国图书评论》 2001 年第 12 期

论规范性现代汉语语文词典的编写原则

——兼议《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王东明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12 期

关于《现代汉语词典》词汇计量研究的思考

苏新春 《词汇学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 2001. 12

单音词和单音语素与同义复音词的注释问题

程荣 《词汇学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 2001. 12

汉语语文辞书的词性标注及其对释义的影响

苏宝荣 《词汇学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 2001. 12

词语的比喻用法和比喻义及其在《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中的处理方式

- 韩敬体 《词汇学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 2001.12
关于《现代汉语词典》收释外来词的几个问题
- 刘中富 《词汇学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 2001.12
《现代汉语词典》部分复合词例证评议
- 沈怀兴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2 年第 1 期
关于成语注释:《现代汉语词典》札记
- 陈霞村 白云 《山西大学学报》 2002 年第 1 期
《现代汉语词典》应补量和单位课
- 李寿星 《编辑学报》 2002.1
《现代汉语词典》对异形词整理的意见
- 李志江 《北京晚报》 2002.1.15
我对《异形词整理表》的意见
- 李志江 《北京晚报》2002.1.16
“仔细”还是“子细”,早已不是问题
- 王楠 《文汇报》 2002.1.26
“戒严”与“营造”
——《现代汉语词典》误释二则 刘传鸿 《语文建设》2002 年第 2 期
- 《现代汉语词典》义项划分刍议
刘哲 《辞书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 《现代汉语词典》的现代思考
俞允海 《语文学刊》 2002 年第 3 期
- 《现代汉语词典》中同形多字词目分析
王楠 《中国语文》 2002 年第 3 期
- 《现代汉语词典》四音节成语注音的按词分写问题
余桂林 《语言文字应用》 2002 年第 3 期
- 词义研究与语文词典释义
解正明 《辞书研究》 2002 年第 3 期
- 词义的扩大与《现汉》释义的滞后
栾锦秀 《辞书研究》 2002 年第 5 期
- 积极稳妥地推行异形词的整理和规范工作
韩敬体 《光明日报》2002.6.18
《现代汉语词典》收词释义质疑

- 俞允海 《浙江社会科学》 2002 年第 6 期
词语释义中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 贾宝书 《辞书研究》 2002 年第 6 期
《现代汉语词典》异形词处理的层次
- 李志江 《辞书研究》 2002 年第 6 期
为《现代汉语词典》“牵引”条补一义
- 黄河清 《辞书研究》 2002 年第 6 期
词频统计在词典收词中的作用
- 潘雪莲 《中国辞书论集·2001》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9
语文辞书释义方式上的两个“误区”
- 苏宝荣 《中国辞书论集·2001》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9
用品类名物词的释义方式
- 谭景春 《中国辞书论集·2001》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9
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
- 李红印 《中国辞书论集·2001》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9
三部主要语文词典在专项标注及释义表述上存在的问题
- 曹炜 《中国辞书论集·2001》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9
《现代汉语词典》微瑕谈
- 李震陆 《中国图书评论》 2002 年第 10 期
语文词典释义括注体例的一致性
- 解正明 《辞书研究》 2003 年第 2 期
试析辞书释义中的总称、统称、合称
- 卢莹 王金鑫 《辞书研究》2003 年第 3 期
规范词典的内容必须符合国家规范
- 张觉 《辞书研究》2003 年第 3 期
新词语的成熟与规范词典的选录标准
——谈《现代汉语词典》(2002 年增订本)的“附录新词”
- 苏新春等 《辞书研究》 2003 年第 3 期
汉语计量词汇学的丰硕成果
——读《汉语词汇计量研究》
- 张志毅 解海江 《辞书研究》 2003 年第 3 期
词义派生与释义

- 兰宾汉 《辞书研究》 2003 年第 4 期
《现汉》引例篇目体例应规范统一
- 张双亭 《辞书研究》 2003 年第 4 期
给《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体例挑刺
- 曾大力 《辞书研究》 2003 年第 4 期
比喻义的生成基础及理解策略
- 施春宏 《语文研究》 2003 年第 4 期
新词新义的收录与规范
- 周一民 《语言文字应用》 2003 年第 4 期
《现代汉语词典》古词语释义辨证(上)
- 黄金贵等 《辞书研究》 2003 年第 5 期
改进部首检字法的几点建议
- 王汉卫 《辞书研究》 2003 年第 5 期
关于《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的几点认识
- 晁继周 《辞书的修订与创新》 商务印书馆 2003.8
浅谈汉语字/词典立目单字的规范问题
- 杨蓉蓉 《辞书的修订与创新》 商务印书馆 2003.8
辞书的修订和增收新词语
- 刘一玲 《辞书的修订与创新》 商务印书馆 2003.8
《现代汉语词典》词性标注和释义互补
- 李开 《辞书的修订与创新》 商务印书馆 2003.8
《现代汉语词典》兼类多义词义项的分合及词性表现
- 刘晓梅 《辞书的修订与创新》 商务印书馆 2003.8
确定“口语词”的难点与对策
——对《现汉》取消“口”标注的思考
- 苏新春 顾江萍《辞书的修订与创新》 商务印书馆 2003.8
《现代汉语词典》的历史地位
- 曹先擢 晁继周 《中国辞书论集·2002》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3.10
《现代汉语词典》古词语释义辨证
- 胡丽珍 《中国辞书论集·2002》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3.10
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释义之不足
- 闵龙华 《中国辞书论集·2002》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3.10

现代汉语词典和字典编写思想的现代化

彭泽润等 《辞书研究》2003 年第 6 期

谈《现汉》对义位褒贬陪义的标注

解海江等 《辞书研究》2003 年第 6 期

现代语文词典应拒绝同义相训

杨金华 《辞书研究》2003 年第 6 期

《现代汉语词典》古词语释义辨正(下)

黄金贵等 《辞书研究》2003 年第 6 期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44CK546w5Luj5rGJ6K+t6K+N5YW444CL57yW57qC5a2m5pyv6K665paH6ZuGXzExNTMwODc2LnppcA==",
  "filename_decoded":
  "\u300a\u73b0\u4ee3\u6c49\u8bed\u8bcd\u5178\u300b\u7f16\u7e82\u5b66\u672f\u8bba\u6587\u96c6_11530876.zip",
  "filesize": 39202986,
  "md5": "e57659f781a95e238adfb60e737e5915",
  "header_md5": "845b0c0cc199abe1770c43f60dbea36e",
  "sha1": "b16e84e5e6a2bd13e2d95fc56c90e96793a1e11f",
  "sha256": "326d90003233b57785a519ec2e2e7a348c92ddcb9b1bec0bca78795cb7a979a",
  "crc32": 891311201,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41794590,
  "pdg_dir_name": "\u00ed\u2562\u2567\u2553\u2524\u00b7\u2551\u2551\u2559\u2229\u2524\u2569\u2561\u03a3\u00ed\u2556\u2592\u03b1\u256b\u03b4\u2564\u00ba\u2569\u2321\u252c\u2588\u256c\u2500\u255d\u00bb_11530876",
  "pdg_main_pages_found": 653,
  "pdg_main_pages_max": 653,
  "total_pages": 680,
  "total_pixels": 259247411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